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三卷

馬士著

商务印书馆



2 027 9692 9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三卷

一八九四——一九一一年被制服时期

[美] 馬士 著

张汇文、姚曾虞、楊志信

馬伯燿、伍丹戈 合 譯

商 务 印 书 馆

1960年·北京

Hosea Ballou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UME III

The Period of Subjection
1894—1911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Shanghai, Hongkong, Singapore & Yokohama, 1918

根據上海、香港、新加坡及橫濱別處圖書公司1918年版譯出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三卷

一八九四——一九一一年被制服时期

[美]馬士著 张汇文等合譯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10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京华印书局印装

统一书号: 11017.90

1960年6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454千字

印张: 17 插页4

印数: 1—2,000册

定价: (9) 2.70元

目 次

第一章	朝鮮、中国和日本	1
第二章	对日战争	28
第三章	邮政的发展	61
第四章	铁路的发展	77
第五章	中国面临瓜分	108
第六章	百日维新	137
第七章	义和团的起源	166
第八章	暴风雨的爆发	205
第九章	北京和天津	241
第十章	北京各使馆获得解救	277
第十一章	列强的同床异梦	307
第十二章	外交解决	351
第十三章	商务协定	384
第十四章	协定中的海关	413
第十五章	帝国的复亡	435

附 录

(1)	一八七四——一九一一年間中国所借外債表	475
(2)	一九一五年在中国領土內已完成，在建造中，或已訂約承造之铁路表	479
(3)	上海淞浦局岁入岁出表	482
(4)	海关：应有的精神鼓励，指导它的方針，它应达成的任务；一般論点和特別規章	484

(5) 中国海关总稅务司及邮务总办赫德爵士所受荣典表	505
(6) 同文館沿革	508
(7) 关于日俄战争时期中国中立問題的备忘录摘要	518
(8) 一五一七——一九一一年間各国派至北京政府之 外交代表名单	528

第一章 朝鮮、中国和日本

一	作为中国藩屬的朝鮮	2
二	一八六六年法国对朝鮮的远征	2
三	一八六七——一八六八年美国軍艦的訪問	3
四	一八六八年对朝鮮的海盜式侵掠	3
五	建議下的美国外交使节	4
六	一八六九年德国和俄国的企图	5
七	一八七一年中国放弃对朝鮮的責任	5
八	一八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美国使节所受的敌意接待	6
九	朝鮮炮台被平息；出使失敗；六月至七月	7
十	一八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中、日間的第一个条約	8
十一	一八七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和朝鮮間的条約	9
十二	一八八二——一八八六年朝鮮和西方各国間的条約	10
十三	一八八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汉城的排外暴动	11
十四	袁世凱和穆麟德奉派前往朝鮮	11
十五	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四日汉城的政变	12
十六	一八八五年四月十八日的中日条約	13
十七	穆麟德同俄国的阴谋	13
十八	一八八五年五月十二日英国占領巨文島，十月墨賢 理奉派前往朝鮮	14
十九	墨賢理奉有維持中、朝关系的使命	14
二十	一八八六年一月德尼奉派为朝鮮国王的顧問	15
二十一	德尼欲使朝鮮脱离中国	16
二十二	袁世凱維護中、朝的关系	17
二十三	一八八八年一月十七日朝鮮使节在华盛顿受 接待；十二月德尼辞去朝鮮的职务	18

二十四	中国和日本在朝鮮的对抗情形日益加剧	20
二十五	一八九四年三月至五月朝鮮东学党的起事	21
二十六	三月二十八日金玉均被刺	22
二十七	中国应邀平定东学党；中、日双方派遣军队	23
二十八	日本否認中国对朝鮮有宗主权的主张	24
二十九	中国接受同时撤兵的建議，日本拒絕	24
三十	七月二十三日日本人侵占汉城王宫并改組政府	25
三十一	七月二十五日中国租用的运输艦“高陞号”沉沒	26
三十二	七月二十九日牙山之役；八月一日宣战	27

一 作为中国藩屬的朝鮮

高丽，即朝鮮、这“清晨恬靜之乡”、这“遁世者的王国”，現在就要变成中国和日本之間的爭夺物了。朝鮮作为中国的藩屬已經有几世紀之久；双方朝廷完全承認相互間的义务，一方給以抵御外侮、弭平內乱的保护，另一方則輸納貢物，并为每一个新統治者請求承認和冊封。在一五九二年明万历皇帝当朝时，这个藩屬曾經受到丰臣秀吉率領的日本人的进犯。他蹂躪了朝鮮全境之后，又渡过鴨綠江，进入滿洲；最初遭过一次挫敗，随后他击败了中國派来迎敌的军队，但是因中国军队得到了增援，于是他被迫退出了滿洲；一五九八年，丰臣秀吉死，日本人撤出朝鮮，但釜山港还繼續被日人盘踞。一六一八年滿洲人兴师征明，結果把南滿洲并入他們的版图；一六三七年又征服了朝鮮。滿洲統治者在一六四四年登上了中国的帝位，这个俯首称臣的朝鮮王国又恢复了对中国皇帝的藩屬地位，历时两百多年，一直平靜无事。

二 一八六六年法国对朝鮮的远征

一七九四年羅馬天主教传教士进入朝鮮。一八三九年有法国神甫三人受到斬刑而殉道，在以后十四年中，又有当地神甫九人遭

遇同样命运。一八六六年，有法国神甫九人被斩首，只有三人获救。一支由七艘船组成的海軍远征队在罗兹海軍上将 (Admiral Roze) 的統率下，于十月間奉派駛往江华，当他們的一支登陆部队在海岸上立下据点之后，便宣布封鎖通往国都汉城的各孔道。朝鮮朝廷絲毫沒有开始談判的表示；那位法国海軍上将又不敢离开海岸；因而法国軍队在十一月底便折回芝罘，他們不但一无所获，甚至对于他們所提出的种种要求連一个答复都沒有得到。^①

三 一八六七——一八六八年美国軍艦的訪問

一八六六年六月，美国双桅帆船“袭击号”(Surprise) 在朝鮮海岸遇难，船上的水手备受优待。^② 同年七月，当美国双桅帆船“薛尔曼將軍号”(General Sherman) 在一个朝鮮的港口停泊时，船上的水手因行为野蛮，在岸上滋事，但被救脫逃；于是那只船受到民众的攻击，他們杀死八个水手，并把其余的人一并生擒。^③ 美国三等炮艦“华楮塞号”(Wachusett) 曾經在一八六七年一月間进行过一次毫无結果的調查；一八六八年三月，巡洋艦“申南多亚号”(Shenandoah) 訪問朝鮮，但是“並沒有听到任何可以証实关于兩項报道的消息……一項报道是說有几名“薛尔曼將軍号”船上的水手依然生存，另一項是說朝鮮政府有意派遣使节前往西方各国。^④

四 一八六八年对朝鮮的海盜式侵掠

上述报道是由一个美国公民任金斯 (F. B. Jenkins) 传达給美国当局的；一八六八年春間，他偕同一个普魯士商人欧斐特 (Ernst

① 高第，“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卷一，第二六五以下各頁。

② 西华(駐上海总領事)致西华德(美国国务卿)函，一八六八年十月十四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七〇年，第三三七頁。

③ 又函，一八六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前引，第三三六頁。

④ 西华致西华德函，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前引，第三三七頁。

Oppert) 和一个法国神甫費龙(Abbé Féron) 搭乘租用的一艘德国輪船“中国号”(China) 前往朝鮮, 声称他們的目的是要調查这些报道的眞象。在他們回到上海之后, 人們才知道他們策划这次远征的眞正目的却是要盜窃某几处朝鮮故王的坟墓; 企图获得他們意想中埋藏在这些坟墓里的黄金和其他宝物; 或者把这些尸体运走, 借以勒索贖金; 或是, 据他們自己揚言, 借劫持这些尸体来随心所欲地要挾朝鮮宮廷肯和他們各自的政府談判商約。美国人任金斯以六項罪名被控于上海的本国領事法庭, 但是公訴时沒有能把他和控案直接联系起来, 虽然已經証明了他曾經付給眞正教唆犯欧裴特一笔錢并且曾經偕同远征。“其他各关系国領事都等候我的[美国領事的]起訴結果, 再决定是否对于他們本国国民提起訴訟。”他們都沒有提起这样的訴訟; 但是法国神甫則被驅逐回国, 后来他又回到本地治里担任教会工作。普魯士人欧裴特却写了一本書。^①

五 建議下的美国外交使节

到这时为止, 西方各国和朝鮮的关系不过是一次被击退的武装远征, 一次受到冷遇的友好訪問, 和一次归于失敗的海盜式劫掠。一八六八年, 有人建議美国政府, 應該派遣一个負有双重目的的使节: 第一个目的是調查“薛尔曼將軍号”水手的命运, 假如他們受到虐待, 还要要求补偿, 同时“把我們对于他們厚待‘袭击号’遇难水手的那一番感激的意思, 告訴朝鮮人”; 第二个目的是取得一項商約。这个建議也指出, 美国儘可率先談判一項条約: “法国在朝鮮已經遭到不幸; 英国的利害关系并不見得比我們的还更为重大, 而且也沒有冤抑須要伸雪; 北德意志……在东方迄未有确定的

^① 西华致西华德函, 一八六八年七月三日, “美国外交关系”, 第三三七頁; “北华捷报”, 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一日; 高第, “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 卷一, 第二七四頁; 欧裴特, “禁地”(A Forbidden Land), 伦敦, 一八八〇年。

政策。”^①因此美国駐北京的公使就奉派去作这项建議中的調查工作，并且“如果时机有利于在朝鮮猎取商业利益的話”，当即商定一件具有那种意义的条約。他應該由駐扎当地的海軍司令陪同前往，并“携带一支足以显示美国政府声威的兵力。”^②

六 一八六九年德国和俄国的企图

就在这时，德国政府于一八六九年六月間，試图通过一位伴随德国使节的日本官員的媒介来打开談判之門。釜山的朝鮮官員“認為通过一个日本人來传递这种信息是非常唐突的”；因而朝鮮人和日本商館間的关系就此中断，“直到外国船上的日本人离开国境为止”。日本駐留地的景况听說是凄慘可怜的——其中“住有六名官員和三、四十名苦力，他們都不得远离他們的住所半哩以外，并且大家都受着朝鮮人极恶劣的待遇”。^③一八六九年五月間，在朝鮮海岸从事测量的俄国炮艇受到轟击而遁去。^④

七 一八七一年中国放棄对朝鮮的責任

在这几次远征中，沒有一次曾經提到有关中国宗主权的話。的确，美国国务卿菲士(Fish)曾經警告过該国公使說，“在中国和朝鮮之間存有一些政治关系，因此你最好还是事先取得北京政府的乐許，如果可能的話，請它从中斡旋；”^⑤但是鑾斐迪(Low)公使对于这项建議却置諸不理——“朝鮮實質上是一个独立国。誠然，

① 西华致西华德函，一八六八年十月十四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七〇年，第三三七頁。

② 菲士(Fish)致鑾斐迪(Low)函，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日，前引，第三三四頁。

③ 巴兰德(Brandt)致李福斯男爵函，引証于鑾斐迪致菲士函，一八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七一年，第七四頁。

④ 高第，“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卷一，第三九二頁。

⑤ 菲士致鑾斐迪函，“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七〇年，第三三四頁。

它每年向中国进貢，但是这种进貢毋甯說是換取对中国通商权益的一种代价，而不是一种政府間的进貢。”^① 他沒有提到冊封，也沒有提到两国間已經存在有几世紀之久的关系，并且他会很容易地在北京把他自己陷入一次外交糾紛中。但是中国一直还没有吸收到台湾的教訓，^② 李鴻章只是最近才在天津上台，而且中国的大臣們又事事不肯負責。他們甚至于声称，“朝鮮虽为中国藩属，其政教禁令，悉听其自为，中国向不干预。”^③ 鏤斐迪曾經請求借調中国海关的一位美籍稅务司杜德維 (E. B. Drew) 充任他的使团的翻譯，翻譯这个位置在东方的談判中是一个最重要的位置。赫德以這項請求向总理衙門請示，但是接奉札諭說，“鉴于朝鮮和中国間現存的关系，本衙門不能批准一位海关稅务司前往該处，但杜德維如欲請假，当可照准；”于是杜德維获准“照通常办法給假六星期”。^④

八 一八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美国 使节所受的敌意接待

由一艘巡洋艦、两艘三等炮艦和两艘炮艇組成的一支美国艦队在罗求斯 (John Rodgers) 海軍司令的統率下，于一八七一年五月三十日駛抵江华島外，鏤斐迪和他的僚属也都在船上。这位公使由于立刻收到了一封詢問这次远征目的的信件而大为鼓舞；鏤

① 鏤斐迪致菲士函，一八七〇年七月十六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七〇年，第三六二頁。

② 参看本书，第二卷，第十三章第七至第十三节。

③ 总理衙門致鏤斐迪函，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七一年，第一一二頁。

④ 赫德致杜德維函，一八七一年三月七日。这封信非常明显地繼續写道：“我希望你不致被枪杀，或受到其他的伤害——但是我总認为朝鮮人会抗爭；如果他們真的抗爭，美国将有荣誉去維護民主原則，并以武力打开这尘世間的最后一把鎖。罗求斯海軍司令 (Admiral Rodgers) 是相信武力的，就我所能見到的而論，以武力作为一种工具来运用，和运用外交狡計或人們用以使別人信服他們的意見的其他种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方法，都是同样神圣的。”

斐迪当以書面答复和口头解释告訴來信人說，在朝鮮方面派定了地位足够高的官員來会晤公使的時候，他就將這次遠征的目的宣布，又說在這期間，他將分別派員前往勘查海灣及河道。^①鑲斐迪想要從他這次出使中獲致外交結果的希望，立即幻滅了，因為在六月一日，測量船隻受到了掩蔽下的炮台的轟擊。^②雖然這位公使“並沒有忘記政府的總政策是和平，而且在世界上一個遼遠地區的敵對行動應該極其小心地予以避免”，他却同海軍司令商定，對於這樣一種“無緣無故加諸和平使節的攻擊”，須要立即採取行動，^③否則“美國政府的威望會受到嚴重打擊的”。^④隨後雙方又有信件的交換，其中的一封信附有一件朝鮮王寄致北京禮部咨文的副本，在咨文中，朝鮮王請他的宗主國在他的困難中予以援助——“凡在人臣，義無外交”。他懇請“特降明旨，開諭該國使臣，以為破惑釋慮，各安無事。”他又暗示宗主國當局應答复使節的來文：“而藩邦侯度，不敢以轉遞答函，煩瀆部堂。”^⑤

九 朝鮮炮台被平息；出使失敗；六月至七月。

他們事先已經決定要平息和占領江華島上的各炮台，並在據守二十四小時之後撤退——“據守這樣長的時間，方足以表示我們有隨意懲罰這類罪行的能力。”^⑥一支由兩艘炮艇和二十艘武裝汽艇組成的遠征隊於六月十日離開了艦隊，占領並毀壞了架有四八

① 鑲斐迪致菲士函，一八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美國外交關係”，一八七一年，第一一六頁。

② 又函，一八七一年六月二日，前引，第一二一頁。

③ 同上。

④ 又函，一八七一年六月二十日，前引，第一二六頁。

⑤ 鑲斐迪致菲士函附件。

⑥ 羅求斯海軍司令致伯萊克中校(Comander Blake)函，一八七一年六月九日，“美國外交關係”，第一三五頁。

一尊大炮的五个炮台，夺得五〇面旗帜，杀死二五〇名以上的朝鲜兵，并打伤了其他许多人，然后，于十二日折回，少有伤亡。于是鑲斐迪又试图打开谈判；但是尽管据他的看法，“这些军事行动比起一八五八年英法两国占领大沽炮台，致使中国立刻派来枢臣并在天津締結条約的时候所采取的那些军事行动来，关系更为重大”，^①可是这样的对比完全錯了。地方官拒絕把他的信件轉送到国都，对于他的要求也沒有給以答复，于是他不得不呈报失敗。他曾經受到过警告，要他留心不完善的談判会产生麻煩；^②但是現在的麻煩却是談判根本沒有可能，所以这位公使报告說：“最近的示威对于談判毫不发生作用。如果不进抵京城，那就什么事都办不通。可是要想推进到那里，兵力却嫌不足，除非甘冒很大的危險。假使和平方法失敗，我們势将撤退，等候訓令。”^③于是在七月三日，这位公使和艦队一齐撤退，那些曾經希望和平打开朝鮮海禁（縱使，以武力支援而其本意却是和平的）的人們又都失望了。^④

十 一八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中、日間的第一个条約

就在这时，中国和日本簽訂了第一个条約。一八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簽訂的这个条約^⑤多少象是两个平等国家之間所締結的。商业規定一般是以中国和西方各国間的成例为依据；但是其中沒有“最惠国”条款；也沒有規定，象西方各国人民所享有的那种完全的

① 鑲斐迪致菲士函，六月二十日，同上。

② “交涉时要注意一件事：在中国的一切麻煩都是由不完善的交涉而产生的……約定的种种限制，是世界上終于最难打倒的东西——特別是在这些国家中。”赫德致杜德維函，一八七一年六月九日。

③ 鑲斐迪致菲士电，一八七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七一年，第一四九頁。

④ “如果美国在这件事上就此停步的話，朝鮮将会象一个长熟了的梨子，落到俄国的嘴巴里。”——赫德致杜德維函，一八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⑤ “条約汇编”，卷二，第一二三五頁。

領事裁判權地位，而訂明一切刑事犯應由領事和地方官會審；^①但是却進而規定，^②“兩國政教禁令各有異同，其政事應听己國自主，彼此均不得代謀干預，強請開辦。”由於省略未提的原故，凡民事案件都應該由當地官員依據訟案發生地所用的本國法律去裁判。兩國相互讓與通商的权利，就象中國給予西方各國人民的那樣，不過^③在兩國間的任何一國內，另一國的人民却不得將進口貨運入內地，或在內地購買產品；這樣運入的進口貨以及購買的產品都應受到沒收的處分；貿易嚴格地限于通商口岸。

十一 一八七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日本和朝鮮間的條約

在遠征台灣之後，^④日本就開始在國外尋求另外一些逐鹿之場，來吸引它那些已經解除了武裝的武士們的注意。一八七四年，它提出了對琉球群島的完整宗主權的主張，^⑤這項主張最後在一八八一年經中國承認。一八七五年，一艘日本兵船奉派沿朝鮮海岸進行巡邏；十二月間，船上的一些水手在江華島岸上遭到射擊。一八七六年一月，日本在釜山作了一次海軍示威；在探悉中國必象一八七一年那樣地置身事外以後，日本就強迫那位滿心不願意的朝鮮國王接受一件友好通商條約，這條約是在二月二十六日在江華島上簽字的。^⑥據第一款的規定，“朝鮮國為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平等之權；”並且根據條約，開放釜山、仁川和元山等口岸，對日本通商。

① 第十三款。

② 第三款。上引字句系按照第一三〇〇頁所載日文本的譯文錄出。

③ “通商章程”，第十四款、第十五款。

④ 參看本書第二卷，第十三章第七——第十三節。

⑤ 同上，第十五章第十七節。

⑥ “朝鮮和其他各國間的條約”，一八九一年。

十二 一八八二——一八八六年朝鮮和

西方各国間的条約

几世紀以来,这两国的人民之間一直就有商业来往,虽則那种往来只限于这些口岸中的一个口岸之內,并且很少有人注意到提出独立自主的主张的是日本而不是朝鮮;朝鮮那种藩服中国和与世隔絕的政策,依旧沒有变更。当一度在一八七八年,另一次在一八七九年,有法国神甫在朝鮮被捕,生命发生危险的时候,法国代表申訴的对象是北京的总理衙門,使囚犯获得释放的也正是中国政府。①可是日本人却分明在汉城設法削弱藩属对宗主国的关系;因而李鴻章于一八七九年給了一位朝鮮高級官員(按:指朝鮮原任太师李裕元)一个老謀深算的忠告,他說“为今之計,似宜用以毒攻毒……之策”,抵制日本詭計的惟一办法就是同西方各国締結条約。后来当美国公使請求中国政府就美、朝建立关系事,从中斡旋时,中国政府就劝他直接向汉城朝廷請求。于是朝鮮就在一八八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和美国,一八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和英国及德国,一八八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和意大利,一八八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新历七月七日)和俄国,一八八六年六月四日和法国分別簽訂了条約。欧洲各国为避免对朝鮮独立問題作成定案起見,都委派他們的駐北京公使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兼充駐汉城的代表;但是美国鉴于北京方面放棄責任,便援日本例,委派了一个与北京和东京使館完全无关的全权公使駐在朝鮮——这一步驟使日本方面异常欣慰。②

① 高第,“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卷二,第五八三頁。

② 平安(Bingham)致夫里令亥槽(Frelinghuysen)函,东京,一八八三年四月十四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八三年,第六〇三頁。

十三 一八八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汉城的排外暴动

对美条约的签字使得国王的父亲、摄政王大院君所领导的朝鲜反对党派大为震惊。^①排外的謠言开始流传，在一八八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有一群暴动者攻击汉城的日本使馆，杀死里面几个人，但是日本公使逃脱了。第二天，暴动者进犯王宫，索取王妃的性命，他们认为对政府的积弱应该由她负责。中国和日本都派兵来恢复秩序。日本军队在九月间取得惩办暴徒和赔款五〇〇、〇〇〇元的保证；但是在这笔款额中，有四〇〇、〇〇〇元在两年之后由日本退还。^②中国逮捕了大院君，并把他送到保定府，他在那里一直被拘留到一八八五年九月。

十四 袁世凯和穆麟德奉派前往朝鲜

于是中国决定要比较积极地干预朝鲜事务。负责这件事的李鸿章调派他的最亲信幕僚之一袁世凯为驻汉城商务总办。此外，他还决定在国王身边位置一个外国顾问，想使这位顾问对于朝鲜就象赫德对于中国那样；至于这个位置的人选，他择定了穆麟德，穆麟德到中国来原是为参加海关工作，当时则任职于德国领事馆。他在一八八三年春季到达朝鲜，期望他能够凭着他的进言献策使大局按照中国的利益去发展，并且维持对中国宗主权的承认。他的第一步骤就是开办一个海关，自己担任主持人。当时朝鲜外务署已经成立，他奉派为参判(vice-president)之一，并且积极参加署务的一切讨论和决定。他把他自己和朝鲜视为一体，采用朝鲜服装，

^① 前王于一八六四年逝世，无子女；王后立李显应（中国人作这样的称呼）的儿子为嗣，李显应因而僭居摄政的职位。

^② 顾基(Kuki)致夫里令亥姆函，华盛顿，一八八五年一月九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八五年，第五六七页。

并在許多方面遵从朝鮮风俗。在他本身的职责以外，他还为朝鮮的工、商、財政的改善和交通工具的改良，积极介紹革新办法。在这些办法之中，很多是相宜的与合理的，虽則有一些还嫌为时过早，但是其中沒有一件是在財政上成功的，沒有一件筹得充分款項，足敷适当的开办之用。他經常吁請李鴻章給以同情、贊許和幫助；論同情，他固然得到不少；但是那位总督对于朝鮮的事情却不想耗費非必要的精力和金錢。^①

十五 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四日汉城的政变

穆麟德的方案之一就是成立一个邮政机关；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四日，因庆祝邮署成立举行宴会。街上突然发生了暴动，一位出席宴会的朝鮮官員（按：指閔泳翊）在街上被杀。其他朝鮮官員則赶往王宮，向国王告急，并偕同他到自从一八八二年起就駐扎在汉城的日本卫队营里去避难。第二天早晨，即十二月五日，发生一次“东方式的普选”，七名內閣大臣被杀，反对派組成一个政府。中国商务总办袁世凱率同自一八八二年起即駐扎那里的中国卫队前往王宮去保护国王，但发现王宮已被日本公使和日本軍隊盘踞。中国軍隊向日本軍隊开火，接着便有普遍的騷动，汉城的一般居民都投入其中。日本人于是冲出城，直奔仁川，登上一艘日本輪船。当时中国正处于东京（按：指越南的北圻）糾紛之中，不能和日本抗衡，因此日本特派大使井上馨（Inouyé Kaoru）伯爵在一支强大海軍的支持下，由一八八五年一月九日簽訂的一項条約，取得了十足的賠償。根据这项条約，朝鮮同意道歉惩凶；賠款三〇、〇〇〇元；并为日本使館卫队建筑营房。^②

^① 主要取材于墨賢理在一九一〇年三月十六日为著者所写的备忘录。参看下文第十八节。

^② 高第，“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卷二，第五八八頁；平安致夫里令亥贈函，东京，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八五年，第五五三頁。

十六 一八八五年四月十八日的中日条約

到春季的时候,显然东京的糾紛可以擱置一旁,中国方面快要騰出手来了;可是中国和日本都不大愿意立即解决朝鮮問題。因此在一八八五年四月十八日伊藤博文在天津和李鴻章商妥了一項条約,根据这项条約,两国将在四个月内从朝鮮撤出它們的一切軍隊;劝促朝鮮建立它自己的軍隊,中国人和日本人均不得充任教練官;两国間任何一国如果要派軍隊前往朝鮮平乱,应先行文知照对方,所派軍隊,一俟目的达到,应立即撤回。①

十七 穆麟德同俄国的阴謀

改組朝鮮軍隊曾經是穆麟德的計劃之一,在一八八四年年底之前,他曾經懇請李鴻章举荐教練官;但是由于那位总督把全副精神貫注在东京事务上,或是由于他存心阻撓朝鮮的一切軍事組織,而沒有采取任何行动。日本侵略的危險是有目共睹的,所以穆麟德建議外务署与俄国商定一件协定,規定:俄国同意借調軍官給朝鮮訓練軍隊;除去俄国大臣們所可能有的別具用心的动机以外,俄国将立刻得到永兴灣(Port Lazareff)的使用收益权。②这个港口(在北緯三九度)的占有,給与俄国一个比較不封冻的海軍基地,而海参崴則每年有四个月要封冻。日本認為这是直接来自日本海对岸的威胁;在中国方面看来,这会危及朝鮮的独立生存,因而也就危及中国对朝鮮的宗主权;英国則必須面对着有利于它的亚洲主要敌手的一种亚洲均势的变动,与此同时,法国仍然占据着澎湖列島,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已日趋紧张。

① “条約汇編”,卷二,第一三一六頁。

② 墨賢理备忘录;“北华捷报”,一八八五年七月三日。

十八 一八八五年五月十二日英国占领巨文島，

十月墨賢理奉派前往朝鮮

为应付这种使英国受到了影响的局势，英国海軍在一八八五年五月十二日占领了巨文島——这是朝鮮南端海面上一群小島中的一个停泊所，在战略上可以監視俄国、日本和中国方面的一切可能影响到朝鮮的行动；这次占领一直繼續到一八八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为止。^① 中国和日本为了这一項以及其它的理由，同意以天津条約来平息他們的爭端。^② 但是現在因局势陆危而彻底惊醒了的中国，却要鏟除朝鮮方面的祸根，因而李鴻章命令(朝鮮)国王废弃对俄条約并立即将穆麟德解职。那位国王这时已深切了解他处境的危险，乃一一照办；他否認了对俄协定，解除了穆麟德的外务署参判职务。可是他暫留穆麟德主持海关，而請求李鴻章举荐一个美国人繼他充任这个职位。这项請求經发交赫德爵士办理，赫德推举了在中国海关服务的墨賢理(Henry F. Merrill)；墨賢理在一八八五年十月接任了朝鮮海关的职务。^③

十九 墨賢理奉有維持中、朝关系的使命

朝鮮海关里的比較高級的职位都逐步由調自中国海关的人員担任。他們的經驗自然是一个重要考虑点；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們和中国的关系——“表示朝鮮是中国的属国。”^④ 赫德爵士主张要

① “暫時占领哈米奄港通訊”，一八八七年呈送。

② 參看本章第十六节。

③ 墨賢理备忘录。

总督給穆麟德以在天津的一个小职位；三年后，在一八八九年春季，他又以二十年前离职时的原等級参加中国海关工作；最后他升到稅务司的等級，但是沒有被安置在任何負責和有实权的地位。

④ 赫德致墨賢理函，一八八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在这同一封信中，他向墨賢理力陈：“我們既不應該失掉接触，也不應該听任現在正从胚胎掙扎成形的那种联系遭到墮胎、流产或任何其他可能阻碍它发育成熟的禍患。”

“时时注意朝鮮和中国海关合并的可能性——这样一种結果对于朝鮮和中国双方都会是最好的”；他希望朝鮮的大臣們会“認為調用中国海关人員的制度施行得很好，今后他們会穩步地把它建為他們自己的控制”；^①但同时他警告墨賢理要“有聞必報，使我很快地就能知道那里的一切情形，因为你終久会发现最好的根据地还是在本机关——所以不要在別的地方攬事或插足”，^②象穆麟德实际上曾經作过的那样。那种“联合”始終沒有实现，但是中国和朝鮮的真正关系却公开地表現出来了；因为朝鮮海关虽則是一个独立机构，却还是从属于中国海关的。美国人墨賢理在一八八九年由德国人史納机(J. F. Schoenicke)接替；史納机又在一八九三年为英国人柏卓安(John McLeavy Brown)接替；他們也都是調自中国海关的。柏卓安还奉有勒紧国庫开支的权力，支付命令都要經他副署，他担任这个职位一直到一九〇五年为止。

二十一 一八八六年一月德尼奉派为 朝鮮国王的顧問

墨賢理只是奉派为朝鮮海关关长，而他的前任則曾兼充外务署参判。赫德在北京实际上也占有这种双重地位，他虽則在名义上只是一个稅收机关的主持人，却也是中国大臣們在国际困难中的非正式顧問，由于后一种的身份，他的影响力在一八八五年达到了最高峰。原希望墨賢理也可以备朝鮮大臣們的同样的諮詢，^③年紀虽然才三十三岁，他却是一个具有冷靜头脑和健全判断力的人，他給予朝鮮的忠告会是有帮助的，同时他对于中国的忠誠和維

① 赫德致墨賢理函，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② 同上，一八八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③ “德尼的来到朝鮮，从头到尾是一个錯誤，只要他留在那里，或是他有一个特別的繼任者在那里，就不会有安宁。就国王所需要的一切忠告而言，海关关长是足够有力的。”——又函，一八八九年二月十九日。

持中朝两国間現存关系的意愿，是毫无問題的。但是李鴻章已經猜忌赫德在北京对于外交問題的影响力，因而他不愿意看到这种影响力，通过赫德所主持的机关中的一个人員，再伸张到朝鮮事务方面去。再者，在天津那位总督的身边已經有了一个海关職員德瑾琳(G. Detring)；德瑾琳虽然对于中国完全忠誠，却通常不屈从于他自己的上司的計劃。于是那位总督就以推荐美国前任駐天津領事德尼(Owen N. Denny)为朝鮮外务署参判的办法来解决他的政治困难。^①

二十一 德尼欲使朝鮮脱离中国

俄国沒有完全放棄它的計劃，日本在随后几年中仍繼續追求它的目标；中国的主要目的則是要对二者一并加以遏制。李鴻章把德尼安置在朝鮮国王的身边，就是希望他忠实支持他的政策；但是他却沒有認識到，一个从来沒有担任过中国官职的人，似乎不見得会对中国忠誠，而相反地，却会感觉到他的首要职责就是要对他所服务的国家尽责。德尼不但不力图維持朝鮮对中国的从屬关系，而且多方設法使朝鮮独立自主。在一八八六年夏季，人們一度相信朝鮮已經請求俄国的保护，但是，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話，中国方面所持的坚决反对态度却制止了这个阴谋。^②在一八八八年春季，其它的計謀也都显现出来，却多少都趋向于独立一途——但也不过是在一个外国保护下的独立而已；正当这个时机，穆麟德被

^① 这件事的經過似乎一定是袁世凱授意朝鮮外务署，外务署于是致函总督，总督就飭德瑾琳遵办，德瑾琳便致电住在俄勒岡(Oregon)州波特兰(Portland)家里的德尼。——德瑾琳致墨賢理函，一八八五年十二月六日。

^② “总督相信，或者似乎相信国王实际上已經申請俄国保护。……中国駐圣彼得堡公使已經奉令劝阻俄国方面不要接受这项任务，如果这项任务要强加在他們身上的話，因为假使他們这样作，总督必将采取断然手段破坏这样的一项計劃。艦队已經奉命开往济物浦，一支军队已經整装待发，一声令下，立刻登船。”——又函，一八八六年八月二十日。

起用于落魄之中，并奉派往朝鮮“去牽制那个似乎已經擺脫了总督駕馭的德尼，并且由他設法把朝鮮国王再度置于中国的羈縻之下。”^①

二十二 袁世凱維護中、朝的关系

从一八八三到一八九四这十二年中，中国派駐朝鮮的代表是李鴻章推荐的駐汉城总办袁世凱。他的任务，就最簡單的一面說，就是确保朝鮮对中国的从屬性，并打击朝鮮国王的一切要实现独立自主的努力，不問那些努力是打算把那位国王領上受俄国或日本武装保护的的道路还是打算使朝鮮甚至成为在美国策动下的一个主权国家。^② 他积极劝諭朝鮮的腐朽政府采行有益的改革，但是始終不渝地坚持朝鮮对中国的从屬地位。^③ 他在执行他的政策时，抱

① 赫德致墨賢理函，一八八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② 在面临着可能因失眠症而病倒的情形下，赫德爵士写道：

“凡有关朝鮮的一切，出发点是：朝鮮是中国的藩屬，中国不但願同任何人作战而不放弃它的宗主权，并且將被迫併吞朝鮮，如果那里有令人為难的詭計在施展。美国人說‘維護你們的独立’，这是无用的。日本人說‘到我的怀抱里来’，也是无用的。沒有三段論法的其余各段，‘独立’这一个名辭就沒有邏輯可言，正如沒有其余的事物，‘美索不达米亚那个可崇敬的名詞’中沒有宗教可言一样。你的国人〔美国人〕所給予国王的支持，和日本人正放在他的途程上的誘惑，都同样是陷阱；国王陛下有落阱之虞！事情还有更甚于此的——这类陰謀只是太有可能来扰乱世界上这一个区域的和平而使外間的群狗相互爭奪朝鮮这一块骨头。你同情朝鮮的願望而憤于中国的干涉和否決权制度，这正如我从前在一次信里說过的那样，是很自然的；但你是宗主国的人，應該就力之所及保持藩屬的权利——你可以指出激怒中国的危險，企图独立的无益，以及公开和宗主国站在一边的实际聰明和安适愉快；如果朝鮮‘搖擺不定’，它就会在变为它的爱人之一的金錢势力下的牺牲品之后，失去一切爱人；但如果它大胆声称它已經和中国訂了婚，别的求婚者也就引去，而中国这个适得其当的人将会替它謀求福利。”——赫德致墨賢理函，一八八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③ “在国王的顧問当中，沒有一个人在这里扮演成象中国代表这样活跃的一个角色。我送上他在去年九月呈遞給国王的一件稟帖的譯文，在稟帖中，……他提出十項紧急改革办法。……他又力劝国王专心依靠中国的帮助，只有中国能够保护朝鮮不受各国的侮辱待遇。”——柔克义(W. W. Rockhill)致白雅德(Bayard)函，汉城，一八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八七年，第二五六頁。

着一种也为其他一些人所同有的进一步的见解，他大可早日使中国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宣布将朝鲜合并，并且把那个王国改为帝国的一个行省。但是他更进了一步；不管他的上司们^①是否与闻及核准，一般人相信，他却立意非解决这个问题不可，并使朝鲜的合并成为不可避免之势。^②

二十三 一八八八年一月十七日朝鲜使节在华盛顿受接待；十二月德尼辞去朝鲜的职务

朝鲜已经向俄国献过慇懃，并且闪开了日本的张臂拥抱；一八八七年，一个朝鲜使节又奉派前往华盛顿。中国政府命令这个使

^① “至于袁世凯：我也觉得袁在那里是奉有训令的，并且要执行一种政策，但是关于这两者，我却不知道什么——不知道或许是最好。当我同总督谈到他的时候，回答是：凡是批评袁的人，都不知道他在那里作什么，或是他为什么那样作；总督阁下说的话并不多，但是他所说的已足给我一个清楚的印象。中国断不起承认朝鲜的独立，其他国家投向那方面的贪婪的神色，定会迫使中国终于合并这个地方而把它建为行省。萧孚尔的作法会使他成为一时的‘英雄’；如果他要朝鲜在世界的面前侈谈独立，中国接着就会作出相反的表现！你现在的位置，以及我和朝鲜海关的关系，具有同一基础——那就是朝鲜的从属地位和昭告全世界，说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的必要性，这点不要忘记！只有承认这一点，朝鲜才能免于那种必然随着争夺领土而来的凄惨待遇。如果你同朝鲜人谈到这方面的事，应该本着这种方针同他们说：在两者之间，独立的情况对朝鲜比从属要有更多的危险；中国将和一切来者作战以保持朝鲜，并且它会战胜——然后它会兴师问朝鲜惹事生非之罪。我个人的私见是：如果中国公开地、大胆地、彻底地（都是一样）将朝鲜合并，它就作得聪明了，我可不能说袁的使命就是执行任何这类的政策；但是，他奉有训令——知道他干的是什么——并且有中国方面的支持，这是可以确信无疑的。”——赫德致墨贤理函，一八八六年十二月四日。

^②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并于今天早晨复行警告总督不要太相信袁的话，并且向他说明，我深信袁不是在安撫朝鲜，而是有意煽动。总督虽然对于袁的问题还没有下决心，可是疑心他私下玩什么把戏，并且我敢说，在最短期限内，这里就会有人奉派前往朝鲜，深入调查那里的情形。随时注意着：我有一种预感，仿佛有什么严重的事情正要发生。北京政府已经将朝鲜问题完全交由总督处理。他希望平静无事，但是他一旦看出因循观望是一个不好的政策，就会毫不迟疑地实行行政上的根本改革。”——德琳致墨贤理函，一八八六年八月二十日。

节必須由中国使臣帶見，并須事事請命而后行；^①但是美国政府認為，“美国既沒有与聞中国和朝鮮間的相互关系，我們將把双方看作按照常例分別由各自的独立代理人所代表的政府”；^②所以在一八八八年一月十七日朝鮮使节謁見美国總統时，並沒有中国使館的公开干涉。^③中国駐朝鮮总办和朝鮮国王的美籍顧問間的摩擦已非一朝一夕；^④現在这两人已經沒有同朝共事的余地。他們每一位都要求免去另一位职务；但是一位却代表着一个威信还没有完全丧失的强大帝国的，那么必須离开的，显然是那位沒有任何政府支持而为那个亚洲国王服务的美籍平民了。中国着手把这件事加以处理，德尼于一八八八年十二月同上海道台談判之后，同意以下述四点为条件，离开朝鮮：（一）他的离职須由国王同意；（二）袁世凱必須調回；（三）如奉国王召喚，德尼得听便回任；以及（四）他的欠薪三〇、〇〇〇元应〔由中国〕給付。^⑤根据这些条件，在目的极其良好，动机极其忠誠的情况下竟闖了不少的祸害以后，他离去了。袁的召还是在信其必有地被期待着；^⑥但是国事非常紧急，而且来自日本方面的危险已經迫切到不允許这样作，所以他依旧留任原职。

① 李鴻章致袁世凱电文，見丹士謨(Dinsmore)致白雅德函，汉城，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八八年，卷一，第四四一頁。

② 白雅德致丹士謨函，一八八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前引，第四四三頁。

③ 同上。

④ “你沒有提到上次袁世凱和德尼的事件：为什么秘书們逃跑？他們帶走什么东西？德尼对这事將怎样处理？”——赫德致墨賢理函，一八八八年十月三日。

⑤ 馬士致墨賢理函，一八八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和二十九日。著者曾主持上海的會談。

⑥ “我想总督已經要求朝鮮政府將德尼解职。袁似乎立刻就要在这里請病假，不再回朝鮮。”德璫琳致墨賢理函，一八八八年九月十三日。

一八九三年九月的一道上諭委袁为温州道台，这是升調，因为道台这个职位是中国的正印官，而駐朝道員的职位却沒有升迁的机会，也沒有俸外所得；他在汉城的遺缺的繼任人選甚至已經物色到，但是還沒实行調动。參看“北华捷报”，一八九四年一月五日。

二十四 中国和日本在朝鮮的对抗

情形日益加剧

从一八八九到一八九四这五年期間，俄国的计划在停頓中，美国对于朝鮮爭取独立的迷梦的那种空泛支持已不复有证据可寻。^① 因而在汉城的朝廷中只剩下中国和日本面面对。滿意现状派，也就是支持現政权的那一派，愿意維持对中国的关系，希望保持现状，他們从中国派駐朝鮮的总办处得到支援；不滿意现状派，要求改革的那个“少年朝鮮”党（按：即中国旧档中所称的开化党或維新党），也就是那些希冀摆脱中国方面一切联系的人們，那些倾向于日本这样一个表面上已經現代化的国家而拋棄中国及其古老制度的人們，所有这类的人，都从日本使館方面得到支援。一切东方式的阴謀都被采用过了——示威，攻訐，勾結內廷，謀杀大臣，在各道謀叛——但是不論哪一次事件都无法获得任何证据，足以証明它是由可能得到好处的那一方面所主使的。阴謀和反阴謀；攻訐和反攻訐，建議和反建議，这一切的一切都灌进了心煩意乱的那个傀儡国王的耳朵里，一直到只有听候战争的最終裁判而后已。双方对于結果都有信心：中国相信它能够保持它的古老的宗主权，以一种比較积极干涉朝鮮事务的方法来代替宗主权的消极行使；日本相信它能够把中国驅逐出朝鮮，并且自己能够在那里雄視一方。枪炮都完全装上了实弹，朝鮮地位的解决，只需火門上的一个火花了。

^① 美国駐朝公使館的通訊并没有列入一八八九至一八九三年的“美国外交关系”中。

俄国的计划虽然已經擱淺，但直到战争爆发时止，还隐藏在幕后。参看“北华捷报”，一八九四年一月五日，三月三十日，六月二十九日。

二十五 一八九四年三月至五月朝鮮

东学党的起事

一八九四年三月十八日，駐漢城各使館得知“东学党有好几万人正在前来，他們的信条之一就是驅逐洋人”。^①东学党(东方人的东方，朝鮮人的朝鮮)是一八五九年建立的一个会社，走的大抵是中国三合会或太平軍的路綫，所奉的信条是由儒、佛、老諸說的共同要旨糅合而成的；可是因为它要求革新，所以它的党人一經露面，自然要受到迫害。三月二十九日，这个会社的一个代表团来到王宮的門前，在那里一直耐心地等到三十一日国王拒絕傾听他們的請愿为止。在随后九天中，反对洋人的揭帖出現了。^②袁世凱立即通知各使館說，两艘中国兵船已在途中，并完全承担“外国人和外国財產的安全的責任”。^③日本侨民則接到他們領事的警告，說局势对于他們的家庭是充滿着危险的，因为专门反对日本人的揭帖已經出現了。^④經過了一些时候，这种危难临头的傳說也并没有得到証实，但是在五月間，据报大批东学党人已聚集在南方各道起事，高举写着“灭尽夷倭”字样的旗帜。派往抵御他們的軍隊都被打敗，叛乱似乎要发展成为一次严重的造反；^⑤但政治局势却模糊不清——“整个的[运动]可能是，也許就是在存心要替政府找麻煩的一个政党的指揮之下，但是这个政党是誰，它的力量怎样，到現

① 何德(Augustine Heard)致葛禮山(Gresham)函，漢城，一八九四年四月四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九四年，附录一，第五頁。

② 同上。

③ 同上，一八九四年四月七日，前引，第一〇頁。

④ 同上，一八九四年四月二十日，前引，附录，第一〇頁。

⑤ 同上，五月十六日；息尔(Sill)致葛禮山函，漢城，一八九四年五月十七日，六月一日；前引，第一五、一七、一八頁。

在为止我們还不得而知。”^①就中国方面的利益來說，主要是不要給朝鮮政府招致麻煩，东学党运动所抱的那样政治目的，很可說是对日本有利的。

二十六 三月二十八日金玉均被刺

就在这三月里还发生了另一件东方式的阴谋举动。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中的暴动和政变的領袖^②是金玉均。当中国方面在表面上重新树立起它对朝鮮王廷的旧有威权时候，金玉均逃往日本躲避，他在那里住了九年，在这九年当中至少有一次对他行刺未遂的事件。在一八九四年三月間，他被“誘”到上海来，于二十七日偕同一个曾經在巴黎受过教育的“少年朝鮮党”的朝鮮人洪鍾宇、一个中国駐东京使館的翻譯吳靜軒和一个日籍仆人抵达。次日，三月二十八日，金玉均在上海美租界的一个日本旅館里被洪鍾宇謀杀。与此同时，在东京的另一个朝鮮亡命者朴泳孝，将一个名叫李逸稷的朝鮮人图謀杀害他的事向日本警察报告；那个被告逃往朝鮮使館求庇护，但被日本警察强行逮捕。在上海，杀人犯洪鍾宇逃往吳淞，在那里被上海租界巡捕捕获，当由巡捕把他解交中国当局审讯。当时中国方面应朝鮮国王的請求，将他和被害者的尸体一并派中国軍艦送往朝鮮，四月十二日到达仁川。金玉均的尸体蒙上了一块写有“金玉均，巨逆教匪”字样的布单，于十四日被割下头来并加以肢解，头在汉城示众，四肢于再度分割后，送往八个道。洪鍾宇在备受礼遇的情形下被护送到汉城，并在那里获得释放。^③如

① 何德致葛礼山函，一八九四年五月十六日，“美国外交关系”。

② 參閱本章第十五节。

③ 高第，“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卷三，第二二八頁；亚林(Allen)致葛礼山函，汉城，一八九四年四月六日、十七日，“美国外交关系”，附录一，第一六頁。亚林曾經要求美国駐上海領事將凶手送交朝鮮当局，为了这件事，美国国务院很适当地予以斥責。——烏尔(Uhl)致息尔函，华盛顿，一八九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前引，第一八頁。

果东学党运动可以被認為是有損中国方面的利益，那么金玉均的被杀和随后的經過必然要被看成是对日本的挑衅了。

二十七 中国应邀平定东学党；中、日 双方派遣军队

这桩謀杀案件以及事后对杀人犯和金玉均尸体的处置办法，使日本国内的情緒大为沸騰，不过这并没有促致該国采取直接行动；但是东学党叛軍的节节胜利，一直繼續到五月以后，这却促使朝鮮政府对它的宗主国发出呼吁。在五月間袁世凱就力請干涉，但是李鴻章“坚持要朝鮮国王提出一个乞援的明白要求，以便使行动的责任由他来承担”。呼吁来到了，中国方面应其所請，在六月六日从天津用輪船調派一、五〇〇名軍隊前往牙山，随后不久，又有七二五名軍隊和另外三艘軍艦派往仁川。“总督曾經正式向日本政府保證，敌对行动一旦停止，这些軍隊将立刻撤回，同时他也向俄国〔駐北京〕公使作了同样的保證。他也向日本表示，他愿意該国政府派遣一、两艘炮艇到朝鮮来保护它的臣民。”^①日本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六月十日，五〇〇名日本海軍陆战队到达汉城；六月十三日，一支一、〇〇〇名士兵的部队到达汉城；六月十六日，另一批三、〇〇〇名士兵在仁川登陆；并且“〔在汉城〕据报，日本正調派大量軍隊到釜山和元山”。^②在这期間，当中国和日本的这些部队还没有到达之前，朝鮮軍隊已經打敗了东学党叛軍，并且擒获了他們的为首者；^③但是敌对双方（按：指中国和日本）的軍隊仍然留駐不去，互相監視。

① 田貝(C. Denbg) 致葛亂山函，北京，一八九四年六月九日，前引，第二〇頁。

② 息尔致葛亂山函，汉城，一八九四年六月十八日；同上。

③ 同上。

二十八 日本否認中国对朝鮮有宗主权的主張

中国在行动上一直絲毫不苟地遵守着它作为一个宗主国所具有的责任，以及一八八五年天津条約規定的义务；日本則墨守条約而否認中国对宗主权的主張，就象它在一八七六年否認的情形一样。^① 当总理衙門把調派中国軍队前往朝鮮的意思通知日本公使时，它把下列原則作为那項行动的依据：“派援兵戡定內乱，乃从来保护屬邦之旧例。”六月七日的日本复文則声称，“查貴国照会有保护屬邦之語，但〔日本〕帝国政府从未承認朝鮮为中国之屬邦；”并且這項声明在六月十二日的一件公文中又重复了一遍——“本帝国政府未尝認朝鮮为貴国之屬邦。”后来在六月十七日，日本提議中、日两国会同改組并改革朝鮮政府。中国的复文声称，就朝鮮为中国的藩服而論，宗主国向来沒有干涉屬国内政的慣例；但如果把朝鮮看作独立国，則任何一国也无权干涉。日本政府于是在六月二十二日把它要单独行动的意思告知中国；^② 六月二十八日日本駐汉城公使向朝鮮国王提出要求，要他声明朝鮮是一个独立国，而不是中国的屬国。^③

二十九 中国接受同时撤兵的建議，日本拒絕

当时，在六月底的时候，牙山有三、〇〇〇名中国軍队，汉城和仁川有几百名卫队。日本已經調来了更大数目的軍队；有五、〇〇〇名配备有炮队的軍队駐扎在汉城周围，另有几百名在仁

① 参看本章第十一节。

② 这些公函載在諾曼(H. Norman), “远东各民族和政治”(The peoples and Politics of the Far East), 第三六二頁；又載在“北华捷报”，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九日。

③ 息尔致葛礼山函，汉城，一八九四年七月二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九四年，附录一，第二八頁。

川，同时据报正有大批军队开进釜山；①在朝鲜领土上，共計約有一八、〇〇〇人。②美、俄、法、英的駐汉城代表向中国和日本的代表分別提出一件联合照会，要求“中国和日本の军队同时撤出朝鮮領土”。③敌对双方都坚持对方先行調动，虽則象美国駐汉城代表那样的一位通常对朝鮮独立怀好意的人也曾經报告說：“双方都不愿意先撤退；他們駐留此間，前途危險实甚；中国方面贊成同时撤离；日方倔强；疑其別有用心；它似乎志在必战；朝鮮的完整已受威胁。”④不多久以后，美国駐北京的代表电称：“朝鮮局势危急；敌对行动迫在目前；尽管日本抱侵略态度，中国却表示妥协。”⑤正在这期間，中国請求西方各国出面干涉，日本則不愿接受。⑥

三十 七月二十三日日本人侵占 汉城王宮并改組政府

局势确实危急。日本国民的态度可以从当时駐紮在朝鮮的军队的行为中反映出来；在沒有开火以前，他們就已經摆出一副战胜者的面目。七月十五日，当英国总領事賈德納 (C. T. Gardner) 偕同他的妻子和两个朋友在大街上散步的时候，他們两次受到穿制服的日本兵的袭击，在第二次被袭击时，他認出“其中有几个人就是先前曾經袭击过他的人”；他所希冀的賠償却始終沒有給。⑦然而据日本方面声称，它并不是以战胜者的資格，而是以朋友的資格来到朝鮮的；所以日本代表就提交朝鮮政府 (King's Council) 一

① 息尔致葛礼山函，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九四年，附录一，第二三頁。

② 又函，一八九四年七月十八日，前引，第三一頁。

③ 联合照会，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前引，第二三頁。

④ 息尔致烏尔电，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前引，第二二頁。

⑤ 田貝致葛礼山电，一八九四年七月三日，前引，第三〇頁。

⑥ 又电，七月六日、八日；葛礼山致白雅德(駐倫敦大使)函，七月二十日；息尔致葛礼山函，汉城，一八九四年十月十二日；前引，第三〇、三六、七二頁。

⑦ 賈德納致大鳥函，一八九四年七月十五日；大鳥致賈德納函，七月十七日函，前引，第三三頁。

項包括有二十六款的改革綱領，关于这个綱領我們只須提一下屬於“限十日內決定并付諸實施”那一款中关于修筑道路和建設鐵路及電綫的規定就足够了。用外交方式進行既已證明为过于迂緩，在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四時，“日本軍隊就冲入王宮并加以占領”，把王妃和她的子女擄走，囚禁在日本使館里，并指派國王的老父，當時年屆八旬的大院君代國王攝政。二十七日，这个攝政者对他的宗主國宣布戰爭，并邀請日本將中國軍隊逐出朝鮮。^①

三十一 七月二十五日中國租用的 運輸艦“高陞號”沉沒

在朝鮮，中國只有一支力量薄弱的軍隊駐紮在牙山，牙山位于牙山灣 (Prince Jerome Gulf)，是仁川南面的一个小鎮；七月二十五日有援軍乘兩艘輪船从白河出發，这才使兵力約可達到四、五〇〇人。第三艘是專為增援而租用的英國輪船“高陞號”，載同一、二二〇人和一、二尊炮于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時駛離大沽，二十五日清晨抵達牙山口外，和日本的一支分遣艦隊相遇。从“浪速丸”巡洋艦上派出的一只小艇駛近“高陞號”船邊，檢查了船舶證件，对于處置这样一只船的最妥善辦法，當時略現遲疑，因为这只船虽然是供敌方運輸之用，却正确地挂着一个中立國的旗幟，并且聲稱在宣戰以前就已經離開港口的。然后“浪速丸”發出“跟我走”的信号；但在这時，船上的軍隊已經在惊惶之下譁變，聲明他們有意抵抗，他們并且拒不允准船上的非戰鬥人員服从一道“離船”的命令。于是“浪速丸”升起紅旗，隨着就放出一个魚雷，但未命中，繼而艦上的大炮一齐開火。“高陞號”在不到半小時的時間內就下沉了，船上的一、三〇〇人中，約有一七〇人泅水上岸，得以逸去。

^① 息爾致葛禮山函，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四日，“美國外交關係”，一八九四年，附錄一，四〇頁；高第，“中國与西方列強關係史”，卷三，第二三五頁。

內中包括中国军队的陆军教练官汉纳根 (C. von Hanneken) 陆军少校; 船主高惠悌 (Galsworthy) 大佐, 大副田浚林 (Tamplin) 和一些中国人则被“浪速丸”派出的小艇救起。日军曾经射击在海中溺水的人们。^① 英国外交部断定战争在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四时 日人进犯汉城王宫时业已开始; 承认了这项判断, 那么也就得承认日人击沉一艘载有拒绝投降的敌军的运输舰, 是他们权利以内的事了。

三十二 七月二十九日牙山之役; 八月一日宣战

留下一个旅团扼守汉城和仁川, 大岛义昌少将 (General Oshina) 就率领第五师计一三、五〇〇人和第九混成旅, 一支备有各种武器的共约二万人的军队, 向牙山叶提督 (按: 指叶志超) 所部的中国军队方面进逼; 他在七月二十九日拂晓时向他们进攻, 经过五小时的作战, 获得全胜; 中国方面死伤五〇〇人 (本人记载为一、二〇〇人), 损失炮四门, 日本人伤亡七十五人。^② 中国的残余部队在平壤与主力会合, 把汉城以南的朝鲜地方全部委弃给日本人。战争已起。中、日双方在八月一日同时发布开战理由的宣言。^③

① 汉纳根的誓词, “美国外交关系”, 一八九四年, 附录一, 第四五页; 高惠悌大佐和田浚林八月十七日的抗议照会, “北华捷报”, 一八九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② 高第, “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 卷三, 第二三七页。

③ 中国诏书原文载田贝致葛礼山函, 北京, 一八九四年八月五日, “美国外交关系”, 附录一, 第五三页; 日本诏书原文载长尾, “中日战争” (La Guerre Sino-Japonaise), 第二〇页。

第二章 对日战争

- 一 中国对朝鲜事务所抱的目的29
- 二 中国只想维持现状30
- 三 在征服心理鼓动下的日本30
- 四 领事裁判权的各项问题成为一个因素32
- 五 一八九四年七月邀请外国调停的建议33
- 六 宣布上海在战区以外33
- 七 中国民众攻击英国轮船34
- 八 九月十六日日本在平壤的胜利35
- 九 九月十七日鸭绿江(海阳岛)的海战35
- 十 中国人的慌乱36
- 十一 十月间重提出外国居间调停的建议37
- 十二 十月到十二月间日本在满洲的进展38
- 十三 十一月间恭亲王又提调停之议38
- 十四 十一月二十一日旅顺口的攻占; 屠杀39
- 十五 十一月十七日到二十六日谈判的交叉进行40
- 十六 中国官吏受到严厉的处分41
- 十七 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二日威海卫和舰队的投降42
- 十八 一月, 张蔭桓和邵友濂奉使议和43
- 十九 张邵两使的国书被认为全权不足(二月三日)44
- 二十 一月至三月间日本在满洲的进展45
- 二十一 二月十五日李鸿章奉派为头等全权大臣46
- 二十二 三月二十日和议在馬关开始46
- 二十三 三月二十四日中国钦差被日本狂徒狙击负伤47
- 二十四 日本因此而作的几点让步48
- 二十五 四月十七日签字的馬关条约43

二十六	朝鮮的獨立	49
二十七	割讓給日本的辽東归还中國	50
二十八	台灣境內反对割讓的騷動	51
二十九	五月二十四日台灣共和國宣告成立	52
三十	中國主戰派策動下的運動	53
三十一	六月二日李經方將台灣交給日本	54
三十二	五月二十九日日軍在台灣登陸；台灣共和國瓦解	55
三十三	台灣被占領：六月北部被占；十月南部被占	56
三十四	一八九五年七月的法俄貸款	56
三十五	一八九六年和一八九八年的英德借款	57
三十六	中國在戰敗后对教會的仇視	58
三十七	戰爭的結果	59

一 中國对朝鮮事務所抱的目的

按照西方行事的照例的办法來說，中國應看作是对朝鮮未尽責任。它既是宗主國，那么它就必須保護它的藩屬，使免于內憂外患。它從來沒有放棄过这种責任；但是中華帝國已經不能保護它的本土免于外患，并且苦于內戰已達四十年之久；皇帝自然無法給予朝鮮以他所不能為他的本土確保的東西。中國在朝鮮的政策，據一再表示，在名義上是給予这种保护的，但是在所有其它各方面，則盡量不干涉朝鮮的行政；聰明也罷，不聰明也罷，这种不干涉政策竟然執行到那样的地步，致听任朝鮮隨意和外國作條約上的安排。中國本着同样的精神，決定不凭优势強以“改革”加諸朝鮮。朝鮮政府或許是世界上最腐敗的政府，靠政府贍養的人在它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在其它任何國家都要大；但是任何對於改革的策動都會使宗主國不悅，因為后者本身的政府由于貪污盛行，已是百孔千瘡，它的富源似乎只供維持官吏們的生活而已。中國已經決計在保護与不干涉兼施的政策下，維持朝鮮作一個緩沖國；琉

球、安南、暹罗和緬甸（就实际來說）相繼地擯棄了它的宗主权，現在只剩下朝鮮一國拒俄、日兩國于堂奧之外了。

二 中国只想維持現狀

中国在对朝鮮的政策上，最初曾經有过一些錯誤；但是将朝鮮事务交由李鴻章負責之后，从他認識了他的第一个錯誤步驟，并改派墨賢理代替穆麟德的时候起，錯誤就比較少了。① 我們不能根据西方的原則来批判东方；但是必須承認中国的政治家們是机会主义者，他們很少能够遵守一貫的政策；同时我們必須留心，不要被“改革”的固有优点所迷惑。在这一条件下我們可以說那位总督在朝鮮事务中的方針是聰明的；袁世凱久已想把事情逼出一个結果来，但是却被他的上司約束住了。当东学党叛变爆发，中国軍隊奉派前往維持秩序的时候，中国曾經按照一八八五年的协定，給日本以适当的通知；并且在双方敌对的武力在朝鮮对峙的时候，中国曾經答应同时撤兵，而日本則予以拒絕。中国的要求仅在于維持現狀；可是为了維持現狀，却事与愿违地被迫作战。

三 在征服心理鼓动下的日本

日本并没有表示过这种不愿意。它派在朝鮮的那些士兵，既然是来自一个黷武的种族，甚至在敌对行动爆发以前，就表现出鼓动了整个国家的那种精神；② 而那种精神也正反映出政府的种种意向。③ 它作战的唯一合理原因就是中国拒絕同它合作，以各种改

① “近年来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比总督李和駐朝道員袁对日本和俄国的态度更加正確的了。”——“北华捷报”社論，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② 参看第一章第三十节。

③ “为避免本国的一次禍乱，它〔日本〕得意洋洋地举步向前，去招惹国外的一次大破坏。”日本通訊，載“北华捷报”，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日。

革强加于朝鮮政府。日本固然把它本国的政府加以改塑了，但是这并不能作为有力的理由，来要求另一个比較落后的国家在一夜之間去承允将政府組織全部改观。再者，日本已經被它自己的行动堵住嘴了：根据一八七六年的“日朝条約”，日本曾經强逼朝鮮自称是一个独立国；在世界历史上从来就沒有见过以那样激烈的改革强加于一个独立国的事。朝鮮的改革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日本已下决心，要实行侵略，以期建立它在国际間的地位，特别是想取中国在朝鮮的优势地位而代之。在战争爆发之前，日本政治家中的一个領袖人物大隈伯爵，就曾經发表一件具有相当重要性的声明，大隈从一八七三到一八八一年任藏相，在一八八八和一八九六年两度出任外相，又在一八九四年是将政府推向战争的反对党領袖。他曾經宣布說——“日本雪除一八八四年的耻辱的时机终于来到了。……如果能够善自利用目前这个千載难逢的机会，日本政府可能尽贖前愆，而使日本帝国不但受到朝鮮而且同时也受世界上其它各国的敬畏。”^①当战争正在一触即发之际，日本駐欧洲的某外交代表声称——“至少这一点我可以有把握地告訴你們，在我們不拘用什么手段达到我們的目的以前，我們决不能，也不会再离开朝鮮。我們正为我們的前途——我也可以說，为我們的独立——而在朝鮮作战。一旦讓朝鮮落到一个欧洲强国的手里，我們的独立就要受到威胁。”^②日本在朝鮮的动机就是爱德华第三 (Edward III) 在亚奎丹 (Aquitaine)、腓特烈第二 (Friedrich II) 在西利西亚 (Silesia) 和拿破仑在意大利及西班牙的那种动机。

① 大隈伯爵語，发表于“报知新聞”(他的机关报)，轉載于“北华捷报”，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② “科隆新聞”(Kölnischer Zeitung)，七月二十五日，該报伦敦通訊，轉載于“北华捷报”，一八九四年九月七日。

四 領事裁判权的各項問題成为一个因素

使日本在这个特定時間对中国采取行动的一个特殊理由可以在有关領事裁判权各項問題中看出。西方列強在十九世紀中一般都是为了它們侨居在土耳其、波斯、暹罗、中国、日本等东方独立国家中的臣民要求这种例外的特权；^①但是日本早已对于这种从属地位感觉到不能容忍，而且自一八八六年起，就一直采取外交步驟，以求废除这种特权。这些努力終于获得成功：一八九四年七月十六日，英国和日本在伦敦簽訂一項条約，規定废除領事裁判权，并适度地提高海关关税稅則；但在另一方面則允准英国臣民在日本境內自由旅行通商，而不再局限于通商口岸。新稅則应立即生效，其它各款則在五年后生效。^②必須注意，這項条約是在一般人都認為日本在它对中国的冒险事业中不可能成功的时候簽訂的。同样的建議也曾經向美、法、俄、德各国提出，但是除美国外，都以技术上的理由予以拒絕。^③美国已經准备步英国之后尘，于是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华盛顿簽訂了一个內容相同的条約；后来，其它西方列強也都同意簽約了；在所有这些条約中，領事裁判权的废除和自由行动的許可都展緩到一八九九年。日本既处于大为改善了的国际地位中，对它重要的，便是如何为它的旅华臣民要求領事裁判权而拒絕給予旅日华侨以這項特权，和如何能使它为本国的旅华臣民要求自由行动的权利而拒絕給予旅日华侨以同样的权利。只有躋于西方各国平等之列，日本才能够做到这一步，而对华战争的胜利，乃是达成这个目的的唯一途径。

① 參看馬士，“中朝制度考”，第七章，“領事裁判权”。

② 条約原文載“北華捷報”，一八九四年九月十四日。

③ 亨克爾(Hinckley)，“美国在远东的領事裁判权”，第一八七頁。

五 一八九四年七月邀請外國調停的建議

戰爭攪亂了西方列強的一切打算。俄國首先採取單獨行動。七月初，“新時代報”（“Novoe Vremya”）在一篇由關係方面授意的論文中宣稱：“俄國必須支持朝鮮的自主，如果日本企圖主張它的優勢地位，俄國就要建立一個俄華的保護國。”^①關於這項動議，以後就不再聽到什麼消息。中國為求避免戰爭，曾經向列強呼吁。各國駐漢城的代表曾經在六月二十五日力促中、日兩國駐朝部隊同時撤退；^②總督李鴻章在七月八日邀請美國政府斡旋，^③英國外交部也詢問過究竟美國政府可否為同一目的而合作。^④美國國務卿却謝絕干預——“本國政府就連會同別國進行友誼的干涉，也不可能”——但是他建議將成為爭端的問題付諸仲裁。^⑤

六 宣布上海在戰區以外

由於戰爭的逼近，上海的地位成為通商各國所關心的一件事。七月二十三日，上海道將他“擬在必要時設法封鎖吳淞口的意思”通知各領事。對於這種停止上海口岸全部貿易的威脅，各國一致提出抗議，因為上海在一八九四年的直接對外貿易計值一五五、〇八三、七五〇兩；^⑥於是英國駐東京的代表向日本政府取得了一項保證，“承認上海不在它的軍事行動範圍以內。”^⑦雖然如此，吳淞

① 倫敦電，七月十日，“北華捷報”，一八九四年七月十三日。

② 參看第一章第二十九節。

③ 田貝致葛禮山函，一八九四年七月八日，“美國外交關係”，一八九四年，附錄一，第三〇頁。

④ 葛禮山致白雅德函，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日，前引，第三六頁。

⑤ 同上。

⑥ 這是一八九四年中國全部對外貿易的百分之五十三。

⑦ “北華捷報”，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田貝致葛禮山函，前引，第五四頁。

口还是局部被封鎖，^① 并且在惊惶之中，中国还在广州、福州、宁波等其它口岸的入口处，布置了障碍物。日本当局不久又懊悔他们对于尊重上海的地位所作的决定，这是很有理由的：中国主要的兵工厂就在那里，而且这个港口被自由地利用来輸送軍械、給养、甚至軍隊；但是，虽然“日本政府已經表示过有收回上海不被攻击的諾言的明显的意向”，可是它并没有采取直接的行动。美国政府会同英、法两国出面干涉。^② 但是日本报界仍繼續在煽动，所以在一月間，英国海軍司令奉到訓令，着他“使用他認為必要的手段，来保証(中立协定)得受适当的尊重。”^③

七 中国民众攻击英国輪船

由于“高陞号”的被击沉，中国人的情緒非常激昂，他們認為这件事是在和平时期內未加警告而作出的一种野蛮行为。在宣战之后，北京和天津的日侨搭乘英商“重庆号”輪船，駛往塘沽，在沽河口等待使領館人員。在八月二日深夜一点鐘的时候，“重庆号”受到一群中国兵的袭击，这些中国兵并没有穿制服，但是手持武器，高呼着“高陞号，高陞号，”船上的日本人当被劫掠并被赶来赶走。^④ 中国当局一直在規避他們的責任，拖延了很久；但是最后，在十一月十四日，在英国公使欧格納 (N. O'Conor) 的坚持要求下，那艘在前桅悬有英国旗帜的輪船，受到大沽炮台发炮二十一响的敬礼，作为認錯的表示。

① 田貝致葛礼山函，一八九四年八月六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九四年，附录一，第五四頁。

② 又函，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五日，前引，第五八頁。

③ “北华捷报”，一八九五年一月十一日。

④ 同上，一八九四年八月十日。

八 九月十六日日本在平壤的胜利

中国駐牙山軍隊的一部分，在七月二十九日的行动以前，就已經开拔，并且在汉城和鴨綠江之間的平壤同中国駐朝鮮軍隊会合。中国軍隊从这一点起向汉城方面挺进，但是前哨各站却一个个地被迫后撤。九月間，中国駐平壤的軍隊据說虽有从二〇、〇〇〇到一〇八、〇〇〇人的各种不同的估計数字，可能只有四〇、〇〇〇人；而日本駐朝鮮的軍隊約达八〇、〇〇〇人；在平壤参加作战的中国軍隊的实际数目，^① 据比較准确的估計，是一四、五〇〇人。^② 有三个日本縱队向平壤集結；其中一个縱队在九月十五日作了一次过早的进攻，战斗历十二小时后，被击退。次日，重新进攻，經過几小时搏斗，中国軍隊完全潰散；伤亡六、六〇〇人，日本方面的伤亡，据公布是六三二人。中国将帅之中只有左宝贵一人曾經表示出一点个人的勇敢，却没有一个人表現过一点将才；有一位叶提督（譯者按：指叶志超）率同他来自牙山的軍隊，在第一天傍晚就想悬挂白旗。中国兵勇也并不比他們的統帅們表現得好一些；凡是抵挡过一陣的士兵，則退却自然稽迟，因而遭受重大損失。日本人占領了平壤，中国的残余部队赶忙撤过鴨綠江。

九 九月十七日鴨綠江（海阳島）的海战

在这期間，中国軍隊的主力正沿着鴨綠江集結，軍隊和給养都加紧送往鴨綠江口的大东沟。載运軍隊和給养的运送艦，是由丁汝昌提督指揮下的中国唯一精銳艦队——北洋艦队——护送的。丁汝昌自一八八〇年起就担任海軍最高統帅，并且在北洋海軍总

^① 息尔致葛礼山函，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九四年，附录一，第五九頁。

^② 高第，“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卷三，第二四六頁。

教习琅威理(W. M. Lang)由英国海軍部“借調”的一位皇家海軍大佐的指导下,已經把那支艦队訓練得有比較高度的效能。这次随同丁提督一道的有几个外国人,其中包括汉納根、泰萊(W. F. Tyler)和瑪吉芬(McGiffin)等人;在丁提督的指揮下有两艘鉄甲兵船和十艘未装甲的巡洋艦,共計十二艘船,凡三五、〇七〇吨,另外还有四艘魚雷艇。在九月十七日中午,伊东祐亨海軍司令率領的日本艦队出現于鴨綠江口外;在他的指揮下,有兵艦十二艘,共約四〇、〇〇〇吨。中国方面的两艘鉄甲兵船固然实力雄厚,但日本艦队則比較配备整齐,而且就速度上和快速射击炮的数量講,却占有优势。第一炮是在十二点四十五分发出的,战斗一直繼續到下午五时双方弹药都形缺乏时为止。日本方面伤亡二三九人;中国方面,包括溺毙者在內,伤亡約六〇〇人;受伤者之中包括那位中国提督在內。日本旗艦受重伤;中国船艦被击沉或被迫靠岸者計四艘,并且有一艘曾經掉头不战而去。鴨綠江或海阳之战在战术上的胜利,就某种意义來講,是归于中国的两艘鉄甲兵船;因为在傍晚撤退的是日本艦队,而且中国运输艦曾卸下了它們的軍隊和給养;但是从那一天起,海上霸权却归于日本了。①

十 中国人的慌乱

这两次作战的結果,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在这之前,当权的人們还可以对于战争漫不經心,繼續进行西太后六旬大寿隆重庆典的筹备事宜;②但是現在大家都惴惴不安了。“济远号”小型巡艦上的方管帶(譯者按:即方柏謙)的处斬,乃是第一件信賞必罰的举

① 高第,“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卷三,第二四八頁;井上,“海阳之战”;“北华捷报”,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十月五日,一八九五年一月十八日。

② “西太后的万寿大典的筹备工作前途真不可乐观,如果日本开始向北京进军,我怀疑那里还会有什么庆祝;自然,朝廷表面上当作没有战争这一回事,仍然过着寻常的生活。”——赫德致葛显礼(H. Kopsch)函,一八九四年八月十七日。

动，方管带先则在“高陞号”被击沉的那天，繼则在鴨綠江口，表现出懦弱畏葸的情形。国内人心的慌乱对于李鴻章和他的亲眷以及在他羽翼下的那些人頗为不利。从战争的考驗中証明了艦队的弹药不足，因为总督的女婿张佩綸和他的侄子都在兵工部門任要职，所以他們都被革职，并且以侵吞公款罪送审。至于战争的爆发、調度、以至失利，則認為应由这位总督本人負責，于是他二十五年来因身兼总督和大学士而頤指气使所不可避免地树立起的那些敌人都紛紛起来反对他；但是他仍然留任原职并保有他的官銜，仅是受到訓斥，并褫夺了两項最高的荣典，那就是他在太平天国叛乱的时候因有功而受賞的“黃馬褂”以及因平“捻匪”有功而賞戴的“三眼花翎”。^①全国人民的情緒已經由各口岸內仇視外国人的历次表示反映出来；在北京，中国人方面的态度已經被認為是这样的具有威胁性，以致总稅务司署里的已婚職員都派由未婚男子来接替，以預防在当年冬季可能发生的事变。^②

十一 十月間重提由外国居間調停的建議

中国現在又作了爭取西方国家干涉的第二次試探，以期在“商由列强保护朝鮮的独立和允賠日本战費”的基础上确保和平。十月六日，英国外交部将这项建議送达美、法、德、俄各国政府；美国政府答复說，“本国总统不能如所請求而会同英、德、俄、法各国参与干涉”；經指明“拟議中的干涉将只以外交行动为限”之后，建議也就被放棄了。^③

① 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上諭，載田貝致葛禮山函，一八九四年九月十八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九四年，附录一，第六一頁。

② “北华捷报”，一八九四年十月十二日。

③ 高斯川(Goschen)致葛禮山函，一八九四年十月六日；葛禮山致高斯川函，十月十二日；高斯川致葛禮山函，十月十四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九四年，附录一，第七〇頁。

十二 十月到十二月間日本在滿洲的進展

在占領平壤之后，日本軍隊繼續前進，到了九月三十日，已經馳騁朝鮮全境，直抵于鴨綠江。十月二十四日，他們渡江成功，中國軍隊被迫退到九連城，兩天之后從那里退到鳳凰城，然后又向摩天嶺退却，這座山經相當頑強的據守之后，終被日軍攻陷。十二月十一日，兩軍又在海城東南十里處的析木城相遇，經過兩天的戰鬥，中國軍隊又遭敗北。侵略軍於是占領了海城。在這期間，十月二十四日，由大山伯爵率領的第二支日本軍隊在旅順口東北的貔子窩登陸；竟輕蔑地將當地炮台和中國軍隊視若無睹；十一月六日這支軍隊攻占了大連灣〔後來相繼稱為達爾尼 (Dalny) 和大連 (Dairen)〕，並完成了對旅順口的包圍之勢。

十三 十一月間恭親王又提調停之議

北京方面感覺到的驚慌為從來所未有。這時發生了漢納根先生(將軍)和德璀琳先生奉召來京的那樣一件史无前例的事；前者至少覬見過皇上一次，他們兩人常常被邀和樞臣們會議，^① 並且毫無疑問，事實真象都被他們兩個人坦率說明。^② 十一月七日(陰曆十月初十)是西太后的六十誕辰，為了籌備慶祝，曾經由清廷撥款一千万兩，可是這個日子是幾乎無聲無息地過去了。^③ 十月間恭親王已經官復原職，負有“將現任樞臣們粉碎了的杯子修補完整”的責任。^④ 十一月三日，他向美國政府呼吁，請根據天津條約(第一

① 天津電，十月二十九日，“北華捷報”，十一月二日；北京通訊，十一月八日，前引，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② 由於和這兩個人人都相熟，所以著者毫不遲疑地這樣說。

③ “沒有任何公開的歡樂或慶祝。”——北京通訊，“北華捷報”，日期同上。

④ 恭親王本人語，見十月二十七日北京通訊，前引，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九日。

款)，对中、日两国进行斡旋；①次日他又召集美、英、德、法、俄各国公使磋商，要求各国政府会同干涉；每次建議都是以朝鮮独立和对日賠款作为談判基础的。② 英国虽愿意調停，但不肯复行首倡；俄国和法国是愿意的；德国則認為当时干涉无用。③ 美国政府在收到这项請求之前，曾經詢問，如它出面干涉，中、日双方是否都能接受；④ 在收到这项請求之后，美国駐北京公使則接到通知說，“虽則总统情愿采取单独行动，但是单就决定賠款的数目一节，如果能取得日本的同意，他将不拒絕和其他各国会同行动的請求。”⑤ 日本政府謝絕了一切干涉的建議——“〔日本〕帝国政府无意把他們的胜利推进到为他們确保公平合理的战争果实的限度以外；可是在中国覺得对于和談問題應該直接向日本接洽以前，却不能說这种限度已經达到了。”⑥

十四 十一月二十一日旅順口的攻占；屠杀

中国艦队在鴨綠江战役以后，沒有再遭遇到任何煩扰就駛到旅順口，而且沒有参加旅順口的保卫战，就从那里駛到威海卫。在大連灣被攻占的时候，宋提督率領一队中国兵，計八千名，从摩天岭南下堵击日軍；他一到金州，便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向敌人进攻，但被击败。旅順口的防卫是由中国最精銳部队中的訓練最优良的一鎮的統帥卫汝成总兵指揮的，但是他所采取的措施并不比中国方面在这次战役中其他負責指揮的人更加得力一些，日軍于十一

① 田貝致葛礼山电，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三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九四年，附录一，第七三頁。老查理·田貝現在已經回任美国派駐北京的公使职。

② 又电，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四日，前引，第七四頁。

③ 伦敦电，十一月六日、十日，“北华捷报”，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九日、十六日。

④ 葛礼山致田貝和(东京)譚恩(Mr. Dun)电，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六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九四年，附录一，第七六頁。

⑤ 葛礼山致田貝函，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八日，前引，第七七頁。

⑥ 口头照会，东京，十一月十七日，見譚恩致葛礼山函，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前引，第七九頁。

月二十一日发动的最后一次进攻使他們完全占有了炮台、港口和城鎮。这次的胜利由于許多中国人的被屠杀而失去了光彩，在占领后被杀的人数，据某些人的估計，竟达二千名之多。屠杀是发生过的，虽則它的数额現在被否認；据解释，屠杀是因为日本进攻軍隊在看到他們被俘同伴的被肢解了的尸体和割下来的头顱时，发出压制不住的怒火，又因为中国兵的一般习惯都是在战敗时抛棄了他們的寬松制服而穿上乡下劳动人民的便装。^①“被杀的中国人远超过真正有必要去杀的数目，^②”这是毫无疑問的；但至少可以想象的是在激战方酣的时候，在同样的憤激情况下，大多数其它国家的軍隊也都会做出同样的事情。

十五 十一月十七日到二十六日

談判的交叉进行

在这期間，曾經有过两个互不相关的試行談判的发动，但彼此交叉而且相互抵触。十一月十七日，日本政府通知美国政府說，它“請求在中国愿意和日本商談和平的情形下，即由美国的駐北京公使館洽办。”^③美国派駐北京的公使旋即拍电报告說——“昨天(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国通过我向日本直接談和：談判基础为，朝鮮独立和賠償兵費。”^④在采取这个步驟的前一、两天，并且至少在北京方面获知这个步驟的前五天，一道批复李鴻章奏摺的上諭曾經命

① 詹姆·克里尔曼(James Creelman)致橫濱“紐約世界”(New York World)电，十二月十一日；长尾，“中日战争”，第八〇、八三及以下各頁；陆奥子爵的說明，見譚恩致葛礼山函，十二月二十日；陸軍中尉欧布連(Lieut. M. J. O'Brien)〔美国武官〕致譚恩函，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見譚恩致葛礼山函，一八九五年一月七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九四年，附录一，第八五、八八頁。

② 陸軍中尉欧布連語，十二月三日，見譚恩致葛礼山函，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同前引。

③ 譚恩致葛礼山函，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葛礼山致田貝函，十一月十九日；又致楊儒函，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前引，第八〇頁。

④ 田貝致葛礼山函，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前引，第八一頁。

令那位总督派遣德璀琳前往日本，要求停战，并询问日本应允締和的条件。① 德璀琳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到达神戶，但是他被通知說，“由于他不是中国政府正式委派的，他不能在任何情形下被接待或被承認。”② 在事实和形式上，德璀琳都是一位由李鴻章委派的使节，并“未賦有全权代表的权力”。③ 不管詳情如何，德璀琳在刚发出他抵达神戶的报告以后，已由恭亲王去电召回，恭亲王那时（十一月二十六日）正把他的希望寄托于美国的出面干涉。④ 但是这也归于失敗，因为德璀琳出使的非正式性引起日本的疑心。

十六 中国官吏受到严厉的处分

当旅順口陷落的时候，中国朝廷在其他方面同样表现出它的惊慌。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上諭着三个将领戴罪图功；他們被革去了品級和官銜，仍准留軍中効力，但是“倘再不知愧奋，定按軍法从事……。”⑤ 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一道上諭，斥駁了奉委为奉天府尹的福裕的辞呈；同日的另一道上諭将李鴻章的最高指揮权划交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⑥ 后者避未服从这道命令。二月十九日，王文韶任直隶总督。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一道上諭飭将提督丁汝昌、道台龔照輿〔掌管旅順口的民政〕和总兵卫汝成〔掌管旅順口的軍政〕等送审；丁汝昌未被提訊，卫总兵却被革职；龔道台被判断刑，緩期执行。⑦ 卫汝成的兄弟卫汝貴曾經統率北洋軍隊的一个鎮，參

① 李鴻章致伊藤伯爵函，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見田貝致葛礼山函，一八九五年一月十四日，前引，第九二頁；“北华捷报”，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七日。

② 譚恩致葛礼山函，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七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九四年，附录一，第八三頁。

③ 田貝致葛礼山函，一八九五年一月十四日，前引。

④ “北华捷报”，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⑤ 同上。

⑥ 同上，一八九五年一月四日。

⑦ 同上，一八九五年一月四日、二月二十二日。

加平壤战役，一八九五年一月十七日被斩首。^① 总之，朝廷和政府因李鸿章的赞助者和敌对者之间的斗争而分裂了，后者在当时占上风。^②

十七 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二日威海卫 和艦队的投降

日本人继续他们的军事进展。一月十八日、十九日和二十六日，山东登州府一再受到日本兵船的轰击。^③ 这项在表面上显得反常的行动是在完全无视中国艦队的情形下进行的，中国艦队已经被中国方面为保护港口而放置的一圈触发水雷封锁在威海卫；据推想，日本人的这一行动是打算分散对于东面一百哩的另一项军事行动的注意力的。一月二十日，黑田元帅所部的二〇、〇〇〇日本兵团，连同一〇、〇〇〇人的运输队在威海卫以东约三十哩、山东东北海角南端的荣城湾登陆。在占领荣城之后，他们进而围攻炮台，中国艦队在它的大炮掩护下就停泊在那里。中国政府已经决定不让这支艦队驶出作战。艦队的弹药没有得到适当补充，并且鸭绿江战役的经验已经指明：要同组织比较优良的日本人再作另一次对抗的尝试是没有希望的。希望只在于当时正提出的和平建议的成功和中国将因之而得保留它的残余艦队的可能性方面；但是在这种希望上，中国人又落了空。排列在港口南岸的各炮台，在一月二十六日遭到攻击。锐气顿挫和军餉不足的中国兵的抵抗，是无足轻重的。这些陆地上的炮台不难成为日本人的缴获品。一层，已经在丁提督的意料之中，于是他预为布置，准备在日本人的攻占迫在眉睫的时候，由几队海军人员将弹药库炸毁，并将大炮

① 田貝致葛礼山函，一八九五年一月十八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九四年，附录一，第九六页。

② “北华捷报”，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③ 同上，一八九五年，二月一日、八日。

毀坏。这些部署，就已办的而言是成功的，但是日本人从旅顺口带来了装配零件，就立刻把几尊大炮修复，并且用这些大炮，配合着日本艦队，开始对刘公島进行轟击。有一艘中国船被炮火击沉，另有几艘，包括旗艦“定远号”在內，被設法侵入防卫綫內的魚雷艇击沉。投降是不能避免的了。提督丁汝昌在将艦队指揮权交給副指揮刘步蟾后，便自杀了；后者将指揮权交給第三位指揮官后，也自杀了；在刘公島，炮台的守将张德山和他的副将戴某（譯者按：即道台戴孝侯）也都自杀了；这样他們就摆脱了懦怯的名声，而恢复了英名，^① 并且使他們自己免于斬首，他們的家屬免于死亡和财产免被查抄。^② 这个要塞所残存的一切連同一艘鉄甲艦和四艘巡洋艦，便在二月十二日投降。另一艘鉄甲艦和四艘巡洋艦則已經在魚雷艇进攻时被击沉。^③

十八 一月，張蔭桓和邵友濂奉使議和

在日軍开始向威海卫进军以前，中国派遣了另一个和平使节，以补救德璀琳探和使节和美国干涉的失敗。十二月二十一日の上諭簡派張蔭桓和邵友濂同为大使，“探詢日本对于終止目前战事所要求的条件。”前者曾經出使美国、西班牙和秘魯，現任戶部左侍郎；后者曾任駐圣彼得堡代办，在战争爆发时任台湾巡撫。后者以巡撫的資格，負責台湾的防务，在他指揮下的軍隊达五〇、〇〇〇人以上；为激励他的軍隊的积极行动，他曾經发出布告，对于毀灭

① 参看本书第一卷，第十章第三十六节。

② “中国官員(在上海的)和其他人等坚不相信了提督投降日本的消息，他們宣称丁提督不可能以他本人和他屬員們的家屬那样多人的生命为孤注，这些人在那种情形下一定会被处死的……然而甚至中国政府……也不敢厉行国家的峻法。”——“北华捷报”，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五日。

③ “北华捷报”，一八九五年二月八日、十五日、二十二日，三月十五日、二十二日。

敌船和斩获敌方官兵的首级悬现金赏格。^① 以一位博学之士和谦恭君子，他只知遵循中国作战的古老习惯；^② 而看不出他的举动有什么错误的地方，然而这却是违反时代的作法，所以受到整个西方世界的谴责。将这人列入议和使节之内是中国政府愚蠢地铸成的一个大错。一般人都能预料到日本方面会根据这项理由拒绝接受这个使节的；^③ 可是日本所望更奢，并不在细节上作文章。日本的意愿是，中国必须在全世界面前，承认它自己战败，并且必须给予它的代表以最充分的求和的权力。

十九 張、邵兩使的國書被認為 全權不足(二月三日)

這兩位中國專使自知他們是沒有中國方面的真正支持的，也自知日本對他們的接待會是冷淡的。他們假借種種借口，一路逡巡不前，一月三十日才抵達神戶，在那里和科士達先生(J. W. Foster)相遇。^④ 在專使人選提出的時候，科士達先生已經被邀參加，聘函中說：“皇上希望你在日本與使團會晤，并借大才惠予贊襄”；^⑤ 他因此擔任了這個使團和接踵而來的另一個使團里的法律和外交顧問；他擔任這個職務，據陸奧伯爵公開聲稱，是令日本方面完全滿意的。^⑥ 他並不希望有任何成就；他寫道——“日本人由於勝

① 布告的原文見田貝致葛禮山函，一八九四年九月六日，“美國外交關係”，一八九四年，附錄一，第五七頁。

② 參看本書第一卷，第十章第七節；第十六章第十三、第十八節；第二卷，第十七章第二十三節。

③ “北華捷報”，一八九五年一月十一日、十八日，二月十五日。

④ 科士達生於一八三六年，在美國內戰時升為陸軍上校；一八七三——一八八五年，相繼任美國駐墨西哥、俄國和西班牙公使；一八九三年任白令海仲裁案美國代表；一八九八年任美、英、加拿大委員會委員；一九〇三年任阿拉斯加邊界仲裁委員會美國代表；一八九二——一八九三年任哈里遜(Harrison)總統的國務卿。

⑤ 科士達上校於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華盛頓接到這項電報。——科士達，“外交回憶錄”(Diplomatic Memoirs)，卷二，第一〇二頁。

⑥ 同上，第一〇五頁。

利而得意揚揚，并且深感中国过去对待他們的侮慢，因而想尽量使中国屈辱。”^① 他也告訴中国专使們說，他們的国書不合乎国际慣用的款式，如果日本人要挑剔的話，他們就会否認中国专使們的談判全权。^② 国書在表面上指派这两位专使为“出使日本議和大臣，着即前赴日本，与日本所派議和全权大臣会商一切事件”；但是連帶着却有一項訓令，飭“电达总理衙門轉奏裁决”。^③ 日本人是非有意挑剔的，在二月二日双方会晤的时候，中国专使們得到通知說，由于他們的权力不充分，“足証清廷之意，尙未切实求和”；他們更得到通知說：“故誠信求和，委其使臣以确实全权，选择有名望官爵足以担保实行条約之人員，当此大任，則我帝国当不拒絕再开談判。”^④ 中国专使在次一日所提的重开談判的建議，当被立刻拒絕。^⑤

二十 一月至三月間日本在滿洲的进展

拒絕这次的求和給予日本人以巩固他們在滿洲的地位和在那里再作进展的时间。他們在一月十日从海城的中心点出发，攻陷盖州。宋提督所部的中国軍隊于是向海城挺进，于二月十六日被击退，并且在牛庄的海港——营口——被迫后退。三月四日，日軍攻占辽阳，五日攻占牛庄城，六日攻占营口港，九日攻占田庄台；中国軍隊节节被迫后退，这时日軍与山海关之間已經毫无阻挡。这个介乎山海之間的隘口是滿洲和直隶之間的最后屏障，这个险要一旦落到日軍手中，那就无法阻止他們向天津和北京进軍了。

① 給他妻子的信，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科士达，“外交回忆录”，卷二，第一二頁。

② 同上，第一一四頁。

③ “北华捷报”，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④ 伊藤伯爵向中国专使講的話，同上；譚恩致葛礼山函，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五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九四年，附录一，第九九頁。

⑤ 科士达，前引，卷二，第一一六頁。

二十一 二月十五日李鴻章奉派为头等全权大臣

二月十五日，李鴻章开复了一切革留处分，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約；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职务則在十九日由他移交归王文韶署理。^① 这位欽差記取了先前的經驗，将他的証書全文經由美国使館电知东京方面，三月四日中国政府接获通知說，証書的款式可以接受。^② 日本現在滿意了。中国派了它的最大的政治家亲身前去求和，这位政治家曾經在多少年来掌握着中国的外交政策，为它議定条約，并且在朝廷和帝国之內有充分的支持，足能将他承担的一切付諸实施。他在三月五日离北京，十五日离大沽，^③ 偕同前去的有科士达、李經方（李鴻章的儿子，由于他是一位伯爵的儿子，所以在英国被称做李爵爷）、罗丰祿、伍廷芳以及随員等一行共一百三十五人；上述的三位中国人当中，第一位后来奉派为欽差全权大臣，并且所有这三人在随后几年之內，都代表他們的国家出任駐外国的使臣。这个使节在三月十九日抵达馬关。日本方面的全权办理大臣是曾經簽訂一八八五年“天津条約”、^④ 現任內閣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伯爵和現任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伯爵（譯者按：系子爵之誤）。

二十二 三月二十日和議在馬关开始

第一次會議是在三月二十日举行的，双方互換并且接納了証書，于是中国全权大臣要求完全停止敌对行动。在三月二十一日

① 北京电，二月十五日、十八日，“北华捷报”，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② 同上，一八九五年三月八日。

③ “我們启航的日期已經从十五日改到十三日，因为星象家告訴总督說，十三日是黃道吉日。这样就决定試行騙一下老天爷，裝作在十三日开始登程，虽則在十五或十六日以前我們或許还不会駛出海口。”——科士达，“外交回忆录”，卷二，第一二七頁。

④ 參看第一章第十六节。

的會議中，日方同意休戰，條件是將山海关、大沽和天津，連同聯系這三個地方的鐵路一併交與日本。由於這樣一來必使北京聽由日本軍隊支配，這條件立刻為中國拒絕。伊藤伯爵於是宣稱，如果那樣，軍事行動將繼續進行，休戰問題將不再加以考慮。中國特使於是要求休會三天，以便向北京請示。第三次會議是在三月二十四日舉行的。中國特使遵照訓令，放棄他的休戰建議，而要求日本開列和平條件；日方答應在第二天提出。伊藤伯爵曾經偶然提到，一支日本遠征軍那時正在前往進攻台灣的途中。^①

二十三 三月二十四日中國欽差被 日本狂徒狙擊負傷

當李鴻章從這次會議回瀋的時候，他遭到一個日本的愛國主義狂徒的狙擊，子彈射入面頰的左眼下一寸的地方，嵌在那里深不可及。李氏本人很鎮定，不聲不響地離開轎子走到屋里去；但是他滿腔怒火，決計要使日本政府對這種行為負責；使節團里的全體人員都害怕再遭受襲擊；中國人民對於“高陞號”事件和旅順口的屠殺，記憶猶新，愈加憤怒。西方各國也一致譴責這次“幾乎成為一種國際災害”的罪行。^② 日本惊慌起來了。^③ 它的主戰派勢力強大，^④ 非獲重要的割讓不肯締和；現在據陸相宣稱，“這個惡棍已將國家的偉大功業毀於一旦。”^⑤ 日本天皇頒布了一道勅書，表示最深切的傷痛和歉意；^⑥ 皇后對於這位欽差也備加關注；同情的表示紛紛來自日本社會各階層。事實上，這次謀刺給與中國的好處，比戰場

① 科士達，“外交回憶錄”，卷二，第一二九頁。

② 同上。

③ “這次行刺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件。日本人內心情感的自發流露，說明了全國在這一場合的衷心的遺憾。”——長尾，前引，第二四七頁。

④ 倫敦轉橫濱電，三月二十二日，“北華捷報”，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⑤ 科士達，前引，卷二，第一三五頁。

⑥ 同上；長尾，前引，第二四八頁。

上的一次胜利还要来得多。

二十四 日本因此而作的几点让步

李鴻章在病房里繼續办理交涉事宜，他臥病达十七天之久，李經方这时已参与交涉。这次行刺的第一个結果就是日本自动建議在滿洲、直隶和山东无条件休战二十一天；关于这项建議的协定，在三月三十日签字，在四月十七日又展期二十一天。^①第二个結果是日本所提的苛刻条件相当地減輕了；割讓滿洲土地的面积縮減了，賠款減去了三分之一，攫取在中国內地的特別权益的主张也放棄了，并且日本人撤回了占領清朝老家奉天以为实际保証的要求。^②在用来往照会交涉了三个星期之后，以日、中、英三国文字写成的“馬关条約”^③于四月十七日签字，其中包括的条件，虽經一再減讓，但是即使就中国的那种束手无策的处境而言，也还是十分苛刻的。^④

二十五 四月十七日签字的馬关条約

根据这个条約，中国必須“認明朝鮮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⑤和“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永远讓与日本国”，（甲）辽河以东（辽东）以及从安平河和鴨綠江的汇合点起，沿凤凰城、海城直到营口这一条綫以南的滿洲地方，（乙）台湾，以及（丙）澎湖列島。^⑥此外，中国将偿付賠款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两；^⑦并且

① “条約汇編”，卷二，第一三二七、第一三三〇頁。

② 科士达，“外交回忆录”，卷二，第一三八頁。

③ “条約汇編”，卷二，第一三一八頁。

④ 科士达，前引，卷二，第一二九以后各頁；“北华捷报”，十八九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六月十四日、二十一日、二十八日，七月五日、十二日。

⑤ 第一款。

⑥ 第二款。

⑦ 第四款。

日本將繼續占領威海衛直到賠款付清、商約簽字批准時為止。^① 雙方應該立刻議定一件滿意的通商條約，同時增辟長江沿岸的沙市和重慶以及運河沿岸的蘇州和杭州為通商口岸——並將直接通往這些地方的水道開放航行。^② “中日通商行船條約”^③ 在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在北京簽字；其中載有業經許給一般西方國家的一切權利，包括對日本旅華臣民的領事裁判權和最惠國條款。在一點上，這個條約比其他各條約更進了一步，那就是它特別讓與了^④ 在一切通商口岸“從事商業、工藝制作及別項合例事業”的權利，這是中國人以前所拒不給予外人的一項權利。^⑤ 這個條約也是以中、日、英三國文字簽訂的；據規定，^⑥ “如將來漢文、日本文有參差不符，均以英文為準。”^⑦

二十六 朝鮮的獨立

就時間而言，“馬關條約”內有待實行的第一項規定，就是承認朝鮮的獨立。美國派駐漢城的代表在他和日本當局的公文往來中，“拒絕承認朝鮮獨立是從一八九五年六月六日開始的。”他的這種態度得到了贊同——“本國政府自從一八八二年和朝鮮締結條約以來對它所採取的立場，並沒有因最近的事件而受到任何影響；就我們而言，朝鮮在條約上所享受的獨立地位，從那時起，已經是

① 第八款。

② 第六款。

③ “條約匯編”，卷二，第一三三二頁。

④ 第四款。

⑤ 參看本書第二卷，第十五章第九節。

⑥ 第二十八款。

⑦ 科士達上校留居中國一直到台灣根據條約正式讓交之後。他曾經受到百般引誘留在北京擔任政府的正式顧問，但是辭謝了；他終於在六月八日離滬返美。——科士達，“外交回憶錄”，卷二，第一五五以後各頁。

一个既成的和公認的事实。”^① 这种哲学上的态度由后来一项比較符合冷酷事实的决定所矫正了。在十月間，朝鮮政府被一次叛乱所推翻，杀戮之事也照例随之而来，包括王妃的被杀，并且那些杀人犯在日本方面的同意和支持下，夺取了政权；于是英、俄、法、德、美各国代表采取步驟，进行干涉。^② 美国政府立刻通知它的代表說，“干涉朝鮮的政治事务并不在你的职权范围以内，”并且这位代表由于曾經“对日本公使完全不加理睬”而受到严厉的斥責。^③

二十七 割讓給日本的辽东归还中国

条約規定将辽东割与日本，但是早在四月十日，俄、法两国就已經开始协商办法；在批准書交換（五月八日于烟台）以前，日本政府收到了俄、法、德的一件联合照会，“建議”将这块土地归还中国。科士达先生的著作中說道，他最初听见这项要求，是在四月二十四日到五月二日他在北京的时候，又說“李鴻章殷切地期待俄国方面有所表示；但是直到我們在归途中抵达天津的时候，他还没有接到任何消息”。^④ 这就祛除了俄国曾經給予任何直接保証的可能性；但是无论如何，那位总督一定有合理的根据，来期望俄国采取行动。認为值得記載的，即是李鴻章在离开北京之前曾經往俄、法两国使館作过一次特別訪問；^⑤ 三月間俄国地中海艦队奉命調駐太平洋。^⑥ 在馬关會議时，中国欽差对于台湾的割讓曾加辯駁，但是并

① 息尔致奥尔尼(Olney)函，一八九五年六月七日；亚迪(Adee)致息尔函，七月九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九五年，卷二，第九七一頁。參看本卷第一章第十二、第二十三节。

② “北华捷报”，一八九五年十月至十二月份，散見各版；汉城使館致国务院电，十月和十一月，“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九五年，卷二，第九七二頁。

③ 奥尔尼致息尔函，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一八九六年一月十日，前引，第九七三頁。

④ 科士达，“外交回忆录”，卷二，第一五〇、一五三頁。

⑤ “北华捷报”，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⑥ 伦敦电，三月十九日，同上。

不認為有急切的需要來提一提遼東問題；^① 當五月八日在煙台換約的時候，有許多國家的軍艦停泊在那里，其中包括一支擁有十七艘軍艦和若干艘魚雷艇的俄國艦隊。^② 歸還遼東的要求在日本看來並不覺得驚奇。在那時候兼併中國大陸上的領土，本來就和伊藤伯爵與陸奧伯爵兩人的比較高明些的意見背道而馳，但是他們由於軍方的態度而被迫提出要求。^③ 抗拒三國的勸告是不可能的，因而日本屈服了，十一月八日在北京簽訂了一項條約，根據這項條約，日本得到的交換條件是將賠款增加到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兩。^④

二十八 台灣境內反對割讓的騷動

就台灣來說，這次條約只是種種事件的開始，而不是結束。伊藤伯爵對李鴻章說過的那支遠征軍在三月二十日到達澎湖列島海面；二十三日轟毀了各主要炮台；隨後三天之內，作戰軍隊戰勝了一切抵抗，完全占有了構成台灣鎖鑰的那些列島和馬公港。台灣方面人心惶惶，三月三十日的停戰協定並不包括南方海面在內的那個消息使驚恐加劇；四月二十日當割讓台灣作為和平條件之一的消息傳出後，驚恐更有增無已。人心的激動，以四月二十二日在台北府撫署攻擊巡撫唐景崧本人而達到最高峰。混亂繼續不已，無政府狀態已經迫在眉睫，於是為保護外國僑民的生命和利益起見，防衛軍隊曾經奉派往大稻埕^⑤——計有二十五名德國水手和三十名英國海軍陸戰隊士兵——并有英、德炮艇各一艘調駐淡水，英國

① 科士達，“外交回憶錄”，卷二，第一三〇、一四一頁。

② 同上，第一五一頁。

③ 同上，第一五三頁。

④ 原文見柔克義 (Rockhill)，“條約匯編”(一八九四——一九〇四年)，第二六頁。

⑤ 參看本書第二卷，第十一章第十四節。

炮艇一艘調駐台灣南部的打狗港。在這支小規模兵力的保護下，信心暫時恢復了，並且貿易已經可以這樣安全地進行，到六月八日止，從淡水運出的茶葉計有五一、八〇〇担，樟腦一〇、〇〇〇担，並且從台南運出六三〇、〇〇〇担的糖，但是在島的兩端，到處是騷擾和紛亂。^①

二十九 五月二十四日台灣共和國宣告成立

條約內各項條款剛剛傳出，台灣巡撫和“台灣縉紳代表”就在四月二十日商請英國把該島作為被保護國；所提的條件是中國應保留主權和田賦，而由英國單獨管理行政，行政費用則由征收捐稅來負擔。^②在這項建議被拒絕之後，又在五月二十日向法國提出同樣的建議，但是也遭拒絕。^③這時，台灣的不滿情緒仍然在持續着；于是在中國主戰派的直接鼓勵下，台灣共和國在五月二十四日宣告獨立。^④中國的官方人員立刻離去，而由另一些更忠誠愛國的人士來代替——惟有巡撫唐景崧是個例外，他接得通知說，他本人和任何軍需品以及任何貴重物品都不准撤離台灣；“窺見眾志已堅，群情難拂”，據他聲稱，所以不得已而接受新共和國總統的職務。同時召開國會，議員早已由士紳選出，每日各得酬金五角（一先令）。

① 關於台灣情形的敘述是基於著者本人的回憶，因為他曾經同巡撫有過密切的接觸，但是所述各節也都參証戴維生 (J. W. Davidson), “台灣島” (The Island of Formosa); 馬士, 一八九五年“淡水貿易報告書” (Report on the Trade of Tamsui, 1895); 斯賓奈 (W. F. Spinney), 一八九五年“台南貿易報告書” (Report on the Trade of Tainan, 1895)。

② 馬士致赫德函，淡水，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③ 又函，一八九五年五月十日、二十四日。

④ 著者藏有殘存的唯一真實可靠的共和國國旗——天藍色，有一只回着頭、搖着一條頗有挑逗性的長尾巴的老虎。這面藍綢制的國旗，寬約十呎，長約八呎，是由總統頒下并附有訓令，飭即懸挂于淡水海關。可是中國國旗仍然繼續飄揚在那里，直到六月九日被日本旗所代替時為止。

三十 中国主战派策动下的运动

导向这个步骤的精神上的鼓励并非来自台湾本身。人民固然不愿意他们自己被割让给日本，而且恼恨中国把他们遗弃，但是他们的不满情绪，虽然可以借暴动表现出来，却绝不会采取有组织的叛变形式。驻守台湾的军队至少有五〇、〇〇〇名，有些人把数字高估到八〇、〇〇〇名。其中五分之三在台湾北部，归巡抚直接指挥，五分之一在台湾南部，由黑旗军领袖刘永福指挥，^①在战争初期刘永福已经将他的部队开来。这些军队都是些苦力军，素质良好，就象华尔和戈登曾经证实过的那样；但是他们没有训练，没有纪律，没有善于指挥他们的军官，并且配备着杂色的旧毛瑟枪(Mausers)、温彻斯特连发枪(Winchesters)、李·麦特福式来福枪(Lee-Metford rifles)和〇·四五〇口径的黑烟火药枪，而日本人则有他们改良过的村田式〇·三一五口径的无烟火药枪。中国军队并不自知他们的缺点，可是这次运动的中心却也不在他们当中。^②新动向是从中国方面策动的，是主战派为了破坏求和所采取的步骤而作出的绝望中的最后一次努力。这是每一次战败之后照例采取的一种途径；^③从四月二十日到五月二十四日这一个多月以来，台湾和大陆之间对于这个问题一直在函电交驰，在发电人当中有

① 参看本书第二卷，第十七章第十节。

② 有几个部队里的步兵和砲兵们曾经以差不多相同的口吻向着我说，“我们不愿意为这个倒楣的共和国作战；全是这些老百姓们。”

③ 参看本书第一卷，第十章第十三、第十九、第二十一节；第十二章第十四节；第十六章第二十四节；第二十五章第十二节；第二十六章第十四节。

“事实上，昨天的情形已经严重到无以复加：因为前天夜里我曾经使总理衙门为日本的和平条件开过一次会——一个很长的会，而且在我写信的时候，我正等候我的车子把我接回到另一个同样凄惨的集会上去。对北方有效而对南方无效的休战，由今天起两星期后届满，如果我们在那时不吞下日本的药丸，军事行动将在第二天重行开始，那就意味着日本人会来到这，而皇帝，也许连同朝代，在五月底的时候就会不

中国著名領袖人物如张之洞^①和他那一派中的其他人士等。^②

三十一 六月二日李經方將台灣交給日本

李鴻章應該對於這次悲慘的戰禍負責；中國的唯一“有訓練”的軍隊——北洋軍隊是由他直接負責成立的，那支軍隊中的指揮和供應方面的職位則都是由他的羽翼來擔任。當其它外交措施失敗之後，他是全權大臣，簽訂了那個不愉快的條約，接受了戰勝者所強加的種種條件；並且說服朝廷和政府同意批准那條約的也是他，^③至於中國的主戰派和俄、法、德三國公使却反對批准那個條約。^④現在主戰派却在設法使李鴻章的兒子兼議和代表李經方出任割讓台灣專使一事上獲得成功，李氏父子想逃避這一個富有危

知往那里去了。現時，我預料本星期內電訊一定極度頻繁，因為日本人在兩個星期前已經攻占了澎湖列島，現在應該已經布置妥當，準備作一次進攻了。中國的潰敗非常可怕，在事變之中，喜劇和悲劇一直是以最令人悲痛斷腸的形式交織在一起。甚至在今天，凡是能那樣作的人，還是試圖利用任何發作經費的銀兩以自肥，內地人民完全不知戰事如何，他們將不會原諒失敗；因此政府要使一般人民相信為締和而作的犧牲，確有它本身的困難，外患一結束，內憂就會隨着發生。中國一次又一次挨打的地方雖然只是龐大帝國邊緣上的一小點，可是事實上蛋殼已經打碎了——據我看來，還是一只壞蛋。情況是可怕的，詭計多端的日本人已經利用文明的面目和亞洲人的機詐相混合的手法而大玩其花樣，甚至在擬具條件時也是如此，因而全世界的人都會站在他們的那一邊喝采，而整個中國將會從南到北負痛退縮六十年！我正在設法擺脫隨時都會變為破壞條約或宣戰原因的一種不可能履行而天真地提出來的條件，以及使人難以承受和難望在略事修削之後就變為較易承受的形狀的一種出賣血肉的約定；但是我發覺對方太聰明了，它知道需要什么和怎樣拿到手，而且知道得太清楚，致使我無法希望獲得成功。日本想要在戰爭、商業和製造方面領導東方，因此，下一世紀將是西方國家的一個艱難的世紀！凡是中國一旦被要求就會惠然讓予別國的每一種事物，現在不得不在威協之下都讓給日本；然後日本將要採取一種姿態而昭告天下說：“你們看，那才是做法呢，而且做出來的就是我！”——赫德致杜德維函，一八九五年四月七日。

① 參看本書第二卷，第十八章第八節。

② 當著者旅居中國的時候（一八七四——一九〇七年），政府機關，特別是電報局，洩漏機密是出名的。不必特別作什麼手脚，人們就能夠很容易地經常知道一切情形。

③ 科士達，“外交回憶錄”，卷二，第一四九頁。

④ 同上，第一四八頁。

險性的差使的一切企圖終歸無效；^① 這位專使在科士達的伴同下前往台灣。在淡水港的外面，有一位報訊人員登上他的輪船，^② 說明了島上的情況，並且代表“總統”給予警告說，台灣方面對於割讓一層，認為首先要由二李負責。於是那位專使就前往基隆，六月二日在一艘日本旗艦上，正式把台灣島交給日本官員。

三十二 五月二十九日日軍在台灣登陸； 台灣共和國瓦解

台灣共和國是在五月二十四日宣告成立的，但是在一個星期內就敲起了喪鐘。五月二十九日，日本軍隊在基隆東南二十哩的地方登陸；他們的進展被挡住了幾天，但是在六月三日他們占領了基隆和當地各炮台，他們發現各炮台都十分完好，並且未經據守炮台的虎旗營發放一炮即被放棄了。台灣北部的中國部隊，從那時起就不再是一支有組織的軍隊；他們被軍官們委棄了以後就四出劫掠以維持他們的生活；不到幾天，他們中間有好幾千人按照慣常的辦法拋棄了武器和制服，裝成不足為害的農民的样子，這樣便又輪到他們被當地人所劫掠了。政府的組織已經解体，在六月四日中午的時候，新共和國的新官員已經沒有一位還守在他的職位上；無政府狀態達於極點。省會台北府被放火焚燒和劫掠，所有政府機關都被洗劫一空；但是，這個局面却有助於使大稻埕轉危為安，況且這地同它的外商二十人和中國居民三萬人又受到為了保護他們而登陸的五十名英、德水兵的保护。與此同時，淡水港受到一艘英國炮艇和一艘德國炮艇的保护；有一萬多名散兵游勇麇聚在港口附近

① “我問道……是否一個政府官員就沒有辦法去辭謝掉他不歡迎的任命。‘是的，有三種辦法：一是稱病，但是這種辦法因常用而往往失效；二是逃出國外，但是逃職者就永遠不能回來；三是自殺，這並不是不常有的結果’。”——科士達，“外交回憶錄”，卷二，第一五五頁。

② 著者當時任淡水海關稅務司。參看前引，第一五九頁。

达两三天之久，經常胡乱放枪，但是没有什么特别坏的意图，只是想夺路逃去罢了。

三十三 台灣被占領：六月北部被占； 十月南部被占

日本軍隊于六月七日进入台北，以拯救者的模样受到人民的欢迎；日軍于六月九日占領了淡水和当地各炮台。在随后三个星期之内，台湾北部的零星中国軍隊不是被包围和被可耻地运往大陆，就是被圈到台湾中部，留待日后随意处理。台湾南部仍然在刘永福和他所指揮的軍隊的固守中。当令的西南季候风在海里激起的浪潮推迟了軍事行动；但是在十月十二日，日本艦队即出現于安平海面。經過几次試图交涉之后，刘永福拋棄了他的軍隊而逃亡；在他逃亡以前及以后都沒有抵抗，于是在十月二十一日，台南府被日軍占領。在这次失信地想推翻馬关条約的企图中，中国方面的損失不得而知；日本方面在戰場上計死亡一六四人，受伤五一五人，因病（主要是瘧疾）而死的为四、六四二人，失去工作能力的达二六、九九四人；^①但日本是滿意了，它現在已經占有了台湾。

三十四 一八九五年七月的法俄貸款

在一八九五年六月的时候，中国在这次战争以前所借到的一切外債除掉約三〇〇、〇〇〇鎊的些微余款以外都已还清；为了这次战争的用途，中国曾通过外国銀行借到六、七五〇、〇〇〇鎊；^②所以帝国举債能力的唯一限制就是用关税担保的七、〇〇〇、〇〇〇鎊債款，連同每年四二〇、〇〇〇鎊的利息負担。一八九四年的海关收入是二二、五二三、六〇五两，按那年的平均兌換率計

① 戴維生，“台灣島”，第三六四頁。

② 參看附录(1)。

算，等于三、六〇一、四三一镑。在必须筹措约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镑的对日赔款的时候，中国行政当局便自然地商之于他们的可靠顾问赫德爵士。^①但是其它西方国家深怕中国在公开金融市场上举债，其结果会使英国“得以对中国财政作危险性的把持”；^②在干涉国之中，曾经领先的两个国家，俄国和法国，觉得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丧失它们从那次干涉所得到的外交上的势力。^③据最初的提议，由俄国借给中国一亿两（一六、五〇〇、〇〇〇镑），利息五厘，一年后，再借给同样的数目。^④巴黎的金融巨擘反对由俄国单独承贷，因为这样将会激起其它金融中心的反对；^⑤于是经过中国驻巴黎公使馆的交涉之后，以俄国财政部为一方，六家法国银行和四家俄国银行的一个银行团为另一方，在六月二十四日（新历七月六日）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在俄国政府的担保下，借给中国为期三十六年的一笔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一五、八二〇、〇〇〇镑）的借款，利息四厘。^⑥

三十五 一八九六年和一八九八年的英德借款

英国派驻北京的公使对于这项借款愤怒地加以抗议。^⑦德国由于被俄法所抛弃，被迫和英国携手；为筹措赔款和恢复战争创伤

① 北京电，五月七日，“北华捷报”，一八九五年五月十日；社论，同上，五月十七日。

② 同上，一八九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③ 高第，“中国与列强关系史”，卷三，第三〇五页。

④ “北华捷报”，一八九五年六月七日。

⑤ 高第，前引。

⑥ 同上。公债按百分之九八·八〇至九九·二〇在市面发行；中国则按百分之九四·一二五收款。公众所提出的申请共达五九亿六千八百万佛郎，将近公债总额的十五倍。

⑦ 同上，第三〇九页。中国要求召回欧格纳，于是在一八九五年十月，他奉派为驻圣彼得堡大使。

的后两笔借款是由汇丰銀行(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和德华銀行(Deutsch-Asiatische Bank)会同承借的。一八九六年的第一次借款計一六、〇〇〇、〇〇〇鎊,为 期三十六年,利息五厘,一八九八年的第二次借款計一六、〇〇〇、〇〇〇鎊,为 期四十五年,利息四厘半;这两笔借款都未經各有关西方国家的政府的保証。以上三笔借款都是以关税收入为担保的,每年应还本息共計二、六二六、一九五鎊;为求足够偿还第三笔借款起見,中国不得不提供揚子江流域里的六个征收区的盐稅和厘金的收入为担保。这几个征收区每年应提出五、〇〇〇、〇〇〇两(八三三、三三三鎊)的款項,由总稅务司加以监管;如有欠繳情事,总稅务司則立即接管各該区的征收事宜。

三十六 中国在战敗后对教会的仇視

中国人在战敗后是不善于自处的;他們既然敌不过日本人,就狠狠地打击传教士。在一八九五年的每一个月当中,美国駐北京使館都有关于美国传教士处境危險的事項要陈报;①在締和以后,痛定思痛,更使这种情形变本加厉,甚至繼續到一八九六年。最严重的騷动,一次在一八九五年五月发生于四川成都,另一次在八月一日发生于福建古田地方;前一次是針對法、英、美三国教士,后一次則針對美、英两国的教士。四川的官員被控以縱非唆使、亦是失察的罪名;福建的官員則被控不但唆使、而且企图压制事后調查的罪名。②这样的态度是和人民的輿情出諸一轍的。在湖南,那位曾經在一八六九和一八七〇年張貼告白、激烈反对传教士的紳士③周汉,又以一系列的对一般外国人特别是对传教士的謾罵而

① “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九五年,卷一,第八七——一九八頁。

② 同上,散見各頁;“北华捷报”,一八九五年七月至十一月,散見各版。

③ 參看本书第二卷,第十一章第十九节和第二五八頁注②。

显露头角。① 北京政府力图庇护省当局，但是三个关系国政府却非常坚定；由于成都的骚动，四川总督被降调，② 其它一些官员被革职，六名滋事的人被斩首，十七名受到其它的处罚，③ 由于古田的屠杀，二十六名滋事的人被斩首，④ 但是并没有一个官员受到处分。⑤ 后一事件的解决是基于一项照会，其中“要求颁行严厉训令，飭将古田屠杀事件中牵连的一切证实有罪的人等，立即处以极刑，并且声明，死刑的执行并不算是最后解决办法”；⑥ 在审讯中，“屠杀事件的干系人等都讯问、定罪、并依中国刑律判刑”。⑦ 美国政府曾经通知中国政府说，“设法更进一步防范这类令人痛心的暴行问题正在郑重考虑中。”⑧ 可是进一步的行动并没有被采取，究竟有什么防范办法可以采取，却也难以看出。

三十七 战争的結果

一八四二年，中国被战败，并且被迫签订了条件虽然温和，可是由战胜者强索的一个条约，然而它并没有受到屈辱。一八五八年和一八六〇年，它再次败北，又不得不屈从于战胜者所强加的条件；但是它的大臣们尚可聊以自慰的，就是回想到它的处境危困是由于太平天国的叛变这个毒疮侵蚀着它的内脏，而不是由于外国

① “北华捷报”，一八九五年十月十一日、十一月八日、十二月六日。

② 上谕，载于田贝致奥尔尼函，一八九五年十月七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九五年，卷一，第一五七页。

③ 上谕，载于又函，一八九五年十月十六日，前引，第一六二页。

④ 又函，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前引，第一七三页。

⑤ 同上，一八九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引，一八九六年，第六八页。

⑥ 奥尔尼致田贝函，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前引，一八九五年，卷一，第一七一页。

⑦ 调查委员会美方委员纽威尔海军中校(Comander J. S. Newell)的报告书，前引，第一七四页。

⑧ 柔克义致田贝函，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前引，一八九六年，第五七页。

武力所加給它的外伤所致。一八八五年，它經過了一整年的軍事行動而陷入了一種僵局。但是現在，在一八九五年，它不僅被打敗，而且已經受到屈辱。它的軍隊未曾打過一次勝仗，在每一個戰場上都是望風而逃，並且把堅強的陣地一個個地放棄了；它的希望所寄的艦隊被可耻地驅逐到設防港口的掩護下；它的將領們表現出一齊無能，並且很多是懦夫；它的行政方面的缺乏效率和腐敗，在國家危急之秋和承平時候是一模一樣的；^① 它的人民，雖然已經有了一些國家意識，却仍然是一群原始的庶民，在他們之中個人利益是唯一的原動力，並且以盲目的憤怒來代替愛國主義的發奮圖強。帝國現在喪失了台灣，而遼東則僅是由于三個西方國家因利害關係而作出的干涉才得保全；戰爭賠款強行加給它以過去從來沒有過的一筆國債；除去蒙古和西藏以外，它已經失去了它的最後一個屏藩（按：指朝鮮）；並且這些結果是由一個受人輕視的亞洲國家所造成的，這個國家現在已經表現出它比中國優越，並且是和素來享有特權的那些西方國家居于平等地位了。隨着和約的締結，它的大臣們普遍地不受信任，就連它的唯一的政治家李鴻章也是其中的一個，李氏在一個時期內被貶到一個湮沒無聞的地位；^② 中國是屈辱備至了。

^① “甚至今天，凡是能那樣作的人，還是試圖利用任何發作經費的銀兩〔錢〕以自肥。”——赫德致杜德維爾，一八九五年四月七日。

“可憐的中國被痛擊了一番，前途是險惡的；他們的官員不會改革。……局勢是可悲的，已經使我非常憂慮、愁苦和焦急。”——赫德致漢南（C. Hannen）函，一八九七年一月六日。

^② “李鴻章僅是一個總理衙門的大臣，但是只要西太后活着，他還會再度當權的——現在他却是無足輕重的人。在總理衙門和在他的同事面前，他不得不‘博得大眾的稱讚’，因此非常頑固——在這位老遊客接受過歐洲對他的待遇方法之後而竟採取這樣一種態度，不禁令各使館為之愕然。”——同上。

第三章 邮政的发展

一 中国的瓜分殆不可免	61
二 中国的邮政：为官方传递消息的驛站	62
三 文报局(递信机关)	63
四 台湾邮政的试办	63
五 传递中国信件的民信局	63
六 传递外国信件的外国邮局	64
七 反对中国自设邮政的三种因素	65
八 使馆邮件在冬季由中国方面递送	66
九 海关兼办邮政的最初情形	66
十 历次发行的中国邮票	67
十一 赫德不愿接办外国邮局的工作	67
十二 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日奉旨创办邮政	69
十三 创办邮政所遭遇的困难	70
十四 建立在海关机构的基础上的邮政	71
十五 这样建立起来的中国邮政局	72
十六 中国邮政局遵守国际邮政联合会的惯例和章程	72
十七 和外国轮船商订的办法	73
十八 参加国际邮政联合会延迟到一九一四年	74
十九 民信局争持，但未被压制	75
二十 一九一一年邮政脱离了海关；它的发展情形	76

一 中国的瓜分殆不可免

对日战争和不幸的结局使中国陷于束手无策的境地。在作战期间，它的最大努力不用在击败敌人，而用在乞求列强的干涉，它的统治者期望列强的干涉能够将它从积弱的后果中拯救出来，

而无須認真地努力救治那种积弱的原因。拯救中国免于侵略和瓜分是列强的事，而中国却不負丝毫責任；在一切有經驗的（对西方的方法有經驗而不是对东方的方法有經驗的）观察家們看来，显然，瓜分是迫在眉睫并且不可避免。^①但是在考虑战争对于帝国的政治和行政的影响以及瓜分的问题以前，有几件次要的事情必須加以研討，特别是邮政的发展和鉄路的创办。

二 中国的邮政：为官方傳遞消息的驛站

驛站^②（为官方传递消息的机构），在周朝的記載里就提到过，它的創始远溯到三千年以前；在随后各世紀中，維持皇帝及其京城里的政府和他的地方官及駐軍之間的这种交通脉絡一直保持得有条不紊。在一九〇二年，据中国官方宣称，驛站的經費是每年三、〇〇〇、〇〇〇两。驛政是在北京兵部的直接管轄下的，在各省省城駐有一个軍官充任提塘，归按察司节制；在一个县里由边境

^① “中国應該被瓜分。如果它不能管理它自己，那么有人能够，并且也願意管理它。”但是这篇由一个了解中国的人（李德爾 [Robert W. Little]）所写的論文进而指出：“如果中华帝国就这样被瓜分，那么搗毀欧洲生活的那些傾軋、猜忌和整軍的因素，就会深入到亚洲的最东端。”——“北华捷报”，一八九五年九月十三日。

“滿洲人既然不能使中国人保守秩序；又沒有人准許日本人来这样作；那么誰来作这件事呢？”——“紐約交換消息”，轉載于前引，一八九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局势是可悲的，已經使我非常忧虑、愁苦和焦急。……这个地方和君士坦丁堡一样地令人难以索解——鷹隼盘旋空际，而人人都知道这位富有者已病势沉重。”——赫德致汉南函，一八九七年一月六日。

諸如乔治·克宗 (George Curzon [Lord Curzon of Kedleston]) 的“远东問題” (“Problems of the Far East”)；查理·比里斯福勳爵 (Lord Charles Beresford) 的“中国的分崩” (“The Break-up of China”)；克勞斯 (Alexis Krausse) 的“衰微中的中国” (“China in Decay”)；柯居洪 (Archibald R. Colquhoun) 的“变化中的中国”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等书，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版的。

^② 中国邮政的早期历史是就著者“中朝制度考”第十三章，“邮政局”一章摘要写成；那一章主要是就皮瑞 (T. Piry) 的那篇令人欽佩的“一九〇四年邮政局工作报告” (“Report on the Working of the Post-office, 1904”) 撮要而成的。

到边境的实际传递是由各知县承办的，經費則由他作正开支。驛站工作在一九一二年七月移交給郵政局。

三 文報局(遞信机关)

文報局(遞信机关)是驛站的一个派生物。它創始于一八七六年，以備將寄往出使外國的欽差大臣們的公文遞送到上海，並從上海遞送他們寄來的公文；上海是外國郵船航綫的終點。近年來，該局唯一的職責就是在寄往外國使館的官方信封上加貼郵票，並將這些信封交與郵政局。

四 台灣郵政的試辦

一所供民用的官辦郵政局是于一八八五年在台灣由這個新省份的首任巡撫^①劉銘傳創立的，劉氏曾經以欽差大臣的身分在對法戰爭中保衛該島。他採取了粘貼預付費用的郵票的方法，而只以本省的郵遞為限；從英國獲得兩種票面的刊刻精良的郵票，分別供作短程郵遞和長程郵遞之用——紅色三分，綠色五分。這個幾乎完全劃一的制度太簡單，不太合乎實用，可是這些郵票在集郵方面却有着一段獨一無二的歷史；照章繳付另加的費用之後，這些郵票便被用作台灣鐵路上的火車票。按照最後採取的制度，郵差傳遞的每站路程(約二十五哩)取費二十文(二分)。這種郵政在一八九五年停辦。

五 傳遞中國僑件的民信局

中國人基本上是擅長文學和商業的一種人，因此也是好寫信的人；過去幾世紀以來，他們就籌辦了商業函件和家信的傳遞，在

^① 實際上福建和台灣(福摩薩)的巡撫直接管理福摩薩事務；福建的事務則由駐福州總督掌理。

这方面所受到的政府的支持和干涉并不多于在其他商业业务方面。这种工作是由“民信局”^①办理的，“民信局”通常是由一家汇划庄或商号设立的，这家庄号总是在其它若干地方有它本身的业务联系，因而必须办理它本身的信件的往来；这些民信局为了取得酬报就替别人传递信件，逐渐地把它們的邮递工作扩展到同一方向但为它們的寻常业务所不达到的其它地方。在这种制度下，很有势力的民信局就发展起来，它們利用各种运输方法，在各方面予公众以便利；有需要特别快递的，就維持特别快班，如以节省为第一义的，就不妨用緩慢的传递方法；只要业务上有需要，不惜将营业时间延长到深更半夜；并且在中国方面最引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受信人須付一部分邮資，通常是一半。邮費非常低廉，按路程远近收費二十文到二百文（二分到二角）不等，但是民信局对于重量并不斤斤計較；并且按年一次总付的减收邮資办法是习常的事。这种制度的为人民服务是值得贊美的；不过，从整个国家的观点来看，它却有一个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它只发展了利益优厚的路綫，而忽視了那些不敷开支的路綫。

六 傳遞外国信件的外国邮局

外国公众則由外国邮局为他們服务，外国邮局是为了传递中国和西方各国間的邮件需要才开办的。这样开办的第一个邮局是一八三四年的英国邮局；^②香港邮局随后又在广州、福州、上海、汉口和天津等主要口岸內开办了分局，給予外侨以他們别无其它办法取得的服务。由于其它各国依次和中国建立了邮船交通的关系，它們也在上海开办了邮局，其中有美国的、法国的、日本的和德

^① “局”轉譯为“Hong”（“行”），是指某一种商号而言；譯它作“公司”，名称嫌太大，譯它作“店鋪”，名称又嫌太小。

^② 參看本书第一卷，第十三章第三节，第二十三章第四节。

国的；并且还有一个和经过恰克图的邮件相联系的俄国邮局也开办了。在一九〇〇年以后，这些邮局又普遍地在中国各城市创设分局；一九〇六年在满洲以外的中国领土上开业的外国邮局计有：英国十个，法国十三个，德国十四个，日本十六个，俄国五个，美国一个（在上海）。① 在沿海口岸投递信件由轮船免费代办，照字面上讲，发信人将信件“投掷”在每一艘正要起航的轮船上；在船到达之后，由那些盼信的人向轮船代理机构检取。上海开办了一个当地的邮局；这个邮局同一般公众都享有将邮件免费寄运的权利；而且它在上海本埠的信件收派方面，作了有益的服务。后来其它各口岸也仿效这个先例，但是它们的主要职务却是为了维持当地的邮路而向不住在本地的邮票收藏家们征收一笔费用。上海地方邮局在一八九八年合并于大清邮政局；其它各口岸的邮局则在设立全国邮政的时候结束。

七 反对中国自设邮政的三种因素

任何成立全国邮政的建议都遭到三种因素的反对。官方人员必会反对取消驿站，并反对将有关每年三百万两预算的行政和财政上的补贴由中国转到外国人的手里。民信局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必会抗拒将邮递机构强迫关闭，这类邮递机构只在有近利可图的路线上经营，而忽略了那些由它们自己去经营就无利可图的路线。外国邮局在供应海外邮件的海洋运输方面有合法的利益，因为他们付过代价；他们在将邮务交给一个乍看好象是不可靠的中国的行政机关以前，却要求当地信件的派送要有安全的充分保障；并且在一九〇〇年以后，各有关外国都不愿意放棄他们在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邮政局中的政治利益。为应付前两种因素的反对，重要的是必须按照中国自己的方式去发展一种邮政，并须按照

① 一九〇六年邮政局报告。

中国方法去經營；为調和外国方面的反对，需要的是任用“誠实精干的人員”；^①由于这双重的責任，中国政府便不得不为邮政而采取一种类似于海关的制度。

八 使館邮件在冬季由中国方面递送

中国政府保証英国公使，并按照“最惠国条款”，因而也保証所有其它各外国的公使，^②“皆可任意往来收发文件……由沿海無論何处皆可送文，专差同大清驛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在一年里有九个月的时间，使館邮件的递送只須邮差往来于天津和北京之間；但是从十二月初到次年二月底，天津海口是封冻的——这种情形因早年尚无电报設備，更增加了不便。在那时的冬季，北京的邮件必須經由鎮江递送，需要十二天的驛使路程（六二五哩），所經過的地方在六十年代初期先后受到太平軍和“捻匪”的騷扰。总理衙門为履行保护的义务，曾經負責护送邮件；在总稅务司在北京建署办公之后，就把这项收发邮件的任务，最后又把护送邮件的任务，一并交由总稅务司掌管了。

九 海关兼办邮政的最初情形

为筹办这项工作，海关在北京、鎮江和上海以及先后在牛庄、天津和烟台各封冻港，添設了邮务办事处；并且在这项工作中，总稅务司怀有大清邮政局这个想法。一八七六年，他奉总理衙門的命令通知英国公使說，如果邮政問題可以列入烟台条約，总理衙門准备着手創辦全国邮政；但是威妥瑪爵士(Sir T. Wade)正为其他問題所困扰，因而这个問題就沒有被談到。但是德瑾琳却在天津把这事筹办起来了，他在李鴻章总督的支持和赫德爵士的授权下，

① 參看本书第二卷，第一章，第二十二节。

② “中英天津条約”，一八五八年，第四款。

于一八七八年監督着建立起限于北方各口岸的邮务，一八七九年推展到揚子江各口岸，一八八二年推展到福建以北的所有各口岸。在筹办专寄外国信件的“邮务办事处”的同时，还試办了一个专寄中国信件的“書信館”(信局)。

十 历次发行的中国邮票

邮票的第一次发行是在一八七八年，計分三种票面，一分、三分和五分(○·○一两，○·○三两，和○·○五两)；共計发行一、○四、八六四张。第二次发行是在一八八五年，有同样几种票面，共計发行一、七〇七、五三九张。第三次发行在一八九四年，是为庆祝西太后的六旬大寿^①的；这次发行計有九种票面，从一分到二十四分，共发行六二四、八五七张。第四次发行是在一八九七年，只不过是第三次发行的邮票和三分印花稅票上加印銀元数字，計分十种票面(半分、一分、二分、四分、五分、八分、一角、三角、一元和五元)，它的淨发行額是二、二二九、九六六张。第五次发行是在一八九八年，計分十二种票面(半分、一分、二分、四分、五分、一角、二角、三角、五角、一元、二元和五元)，发行額是四、五六二、一三〇张。第六次发行是在一八九九年，加印了三种票面(三分、七分和一角六分)。第七次发行是民国办理的，只在第六次发行的邮票上加印增資字样；第八次是民国新发行的。

十一 赫德不愿接办外国邮局的工作

在一八七六年，中国已經无意于創立全国性的邮政，虽然計划已經草拟了一半；但是在一八七八年，它被正式邀請参加国际邮政

^① “西太后的万寿大典的籌备工作前途真不可乐观，如果日本开始向北京进军，我怀疑那里还会有什么庆祝……所以人們对于庆典紀念邮票，并不表示热心籌办。再者，关于彫刻底版一层，日本現在是不能办了，因而上海將不得不做这项工作——上海能够做嗎？”——赫德致葛显礼函，一八九四年八月十七日。

联合会。同年，当赫德爵士在巴黎的时候，法国外交部长曾經和他接洽，建議关闭当时仅設上海的法国邮局，由中国接办；香港邮务长在当时和随后几年中，也屡次表示一旦中国承担这项工作，他将完全准备关闭中国各口岸的英国邮政局；在这期間，接办上海工部局邮局的办法正在商談中。但是总稅务司在他具备适当組織的全国邮政机构和权限以前，不愿同意接办这些工作。由于驛站和民信局的存在而使他受到阻碍，又因为必須将西方的方法移用于一个中国的机构之上，所以他遵循的一句格言就是在起步之前要先站稳，而后緩步前进。①

① 在办理大清邮政的第一年将近告終的时候赫德写給邮务司的那一封信，可以給他在這段准备时期中所采取的步骤作一个良好的說明。它虽然是縱笔疾书和以散文形式写成的，但却是押韻的，并且意义深长，行文謹慎。作为受信人的那位邮务司兼任注册处稅务司，他的办公地点在上海，此后繼他而任邮务司的人，办公处所則都在北京。

“我生怕你越急躁，我們的苦惱也就会越多，我認为邮务不应发展得太快：我們現在所最关心的，只是中国的沿海——那里即使最后得到的外国事物也来得較易。首先將我們适当范围以内的一切混乱状态扫清，然后再进而解决一些別的事物：当水深的地方有危險的时候，我們停在港內近岸的平靜水面上岂不更好？我們有的是時間，——何必弄得扰攘不宁？把事情办好并不是浪費時間！如果我們的人都如醉如癡，业务也将会一塌糊涂，那样究竟会釀成什么麻煩，令人不敢預卜！我想如果我們坚定沉着，有了准备再动，我們一定会贏得胜利，而沒有一点不幸；但是如果我們离开了軌道，我怕挫折滋生，不但进行得不会更快，反足債事。关于輪船的談判曾經引起过一些憤怒——各使館認为他們受到了侮辱！——但是如果我們曾經表明我們的企图，我們就会喪失掉我們的東西——支配权，这便是为什么不向他們商量的理由。因为倘使我們得不到我們所需要的事物，我們在遞送邮件方面将会处在一种怎样为难的境地！但是現在路已經扫清，只有錢花在失敗的計劃上面，才会使成本昂貴。那些邮票版到了嗎？我不禁为这些邮票版不能在我們的工作开始以前到达而担心；薄紙也缺乏——虽然要求已經答应，可是伦敦办事处什么时候才能把一切办妥？香港方面在你那次公出时向你所作的建議，如果付諸实行，会是非常适时的；但是我看不懂手边的电报，正等待閱讀你的信中带来的消息。你所建議的通告——將那些机关一律关闭——也似乎超过了我們所要求的一切：它們自己会停业嗎？我們是否應該坚持？我希望在你发电告的时候，电告得清楚一些！我們的邮差在雪落得很大，路上积雪很深的山东，行走得很慢；我們曾經有过若干天沒有接到邮件，我們的制度不但沒有贏得贊美，而且喪失了一些声誉。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补救，因此我們只有决心維護它，希望現在走失的人将会到达；

十二 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日奉旨创办邮政

始終为李鴻章所支持的那个書信館是在赫德爵士的控制下經營的，不过它的发展情形却直接操在德璀琳的手中；但是除去在冬季邮递方面，它的扩充并不足道。然而要创办全国性邮政的那种观念并没有被遗忘，官方一直受到敦促，德璀琳敦促那位总督，赫德爵士則敦促总理衙門。在一八九三年，这个问题已經在郑重考虑之中，^①可是战争阻止了进展。战后，虽然计划又重新提起，^②但是依旧迟迟未付实行。^③最后，經過多年的考虑，^④在一八九六年

但是我生怕那些行动象蜗牛一样緩慢的使館邮件会不能偿付沿海的費用——你的意見如何？抱怨是没有用的；我們逐漸取得的經驗應該有所裨益；因此我希望，下一个冬季的来临不致再作为解释我們办法不健全的理由。当你巡迴視察的时候，你查看出什么毛病？我們的人是否已經有了很好的准备？你是否認为一切都会进行得順利，你的訪問是否有什么效果，有没有什么可以自行庆幸的理由？我并不想压制人，但是你真的必須写得詳詳尽尽，將你所作所为和你的消息全部告訴我；照情勢的需要，我們兩人必須保持接触——就地行动必須符合北京的看法！我一面写信，一面在发笑，但是我不認为是在嬉笑；我深信我的每一个字都有适当的含意；請細心加以融会，当你体驗到的时候，你将会发现其中有很值得采摘的意見。”——赫德致葛显礼函，一八九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① “郵政局仍在迟迟进展中，我相信总理衙門正在征求各省要人的意見，然后再作最后的冒险。”——赫德致葛显礼函，一八九四年二月十三日。另参看田貝致葛礼山函，一八九三年七月一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九三年，第二三七頁。

② “上星期五我曾同翁同龢和李鴻藻这两位新大臣作过一次长談，他們对我大講其不应將不易实行的事作出建議的一套理論。他們說，‘任何人都能够建議，每一个人都在建議，但是必須由我們做出来：建議是輕而易舉的，要做出来可就是完全另一回事了！’如果張負責处理郵政問題，我敢說他会把它办起来的；两个星期以前我又提請总理衙門注意这件事，問他們究竟是要实行，还是要放棄，可是一直沒有得到答复；如果由总理衙門，也就是由中央政府而并非由省官吏負責发动改革，那会是最好的；其結果全是有計劃，有持續性和有成就。”——赫德致葛显礼函，一八九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張也許指当时駐南京总督張之洞，也許是指当时总理衙門的一位大臣張蔭桓（参看本卷第二章第十八节）；可能是指那位总督而言（参看注③）。

③ “我希望你的南京之行称心快意。張滿腹都是計劃，可是直到今天，他一直是被他的左右利用着，錢花的很多而成績寥寥。如果你能够把握住他，或許你可以‘指导’他趋向对中国比較有利的方面。我在六个星期以前把郵条和其它許多問題提呈給王大臣，但是至今件件都遲延不決，正等候各省的答复，也許是由于辽东局势不定的緣故。”——又函，一八九五年九月九日。

④ “总理衙門告訴我，明天（二十日）將有一道上諭发出，飭即按照我为如何开办而建議的簡便办法，創設郵政。……一想到中国官員需要多么久的時間才說出一个办字，真令人生气！这两件东西（郵政和銀兩）都已經在总理衙門的手里擱置好几年了！”——又函，一八九六年三月十九日。

三月二十日頒下的一道上諭，飭即成立全國郵政，委由赫德主持，自此赫德便成為海關總稅務司兼郵政的總辦了。在他的主持下，德羅琳以極大的精力和效率為郵政工作了二十年。此後繼任郵務司的有一八九六年的葛顯禮，一八九七年以後的艾斯特 (J. A. van Aalst)，和一九〇一年以後的帛黎 (Théophile Piry)；目前郵政局的組織雖然是歸功於帛黎，但是調度其事的却始終是赫德爵士。^①

十三 創辦郵政所遭遇的困難

赫德爵士的任務是困難的。西方國家的郵務官員所賦有的權力和壟斷權，並沒有，也不能許給他。驛站繼續遞送政府的公文，要廢除驛站是不必談起的。民信局不能被強行封閉；並且對於它們的“總包”，還要給予優待價格的便利；這樣只有提供給公眾以更良好、更低廉和更迅速的服務，才能和它們競爭。外國郵局起初倒很願意把在中國收派郵件的工作移交出來；可是它們對於受補助的郵船航綫却還存心把持不放，並且到時還有種種有關政治利益的問題使得它們不大願意自行關閉。中國並沒有強制的力量可以迫使往來內河和沿海的懸掛外國旗的輪船只接受大清郵政局的郵

^① “我完全相信我的計劃是穩妥的，我的步驟不但是明智的，而且是唯一走得通的，為各方面的利益計，我們應該效法的是龜行，而不是兔走。”——赫德致葛顯禮函，一八九六年八月十二日。

“我的意思是要盡量把細節交由郵務司辦理，但是他必須遵循我的總計劃，並且聽從我的指示。”——又函，一八九六年八月十四日。

“將來請你將所作的一切事都報告我，因為前面有暗礁，四周有困難，如有任何事情出了毛病，受到鞭撻的是我本人！”——又函，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六日。

“在你我定出商談什麼事情以前，不要開始任何商談。最重要的是，你必須用公私函札使我經常詳知一切，你拍電時，電文要明晰。我們非獲得勝利不可，但是必須慢慢地走；你必須要象副官一樣，依照總部——北京的命令按‘時’行事。”——又函，一八九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另參看第六八頁注^①。

件，而拒絕接受其它中外邮局的邮件。国际邮政联合会一直邀請中国参加；但是因为中国对于本国的邮务不能完全作主，又經常拒絕它入会。所有这一切錯綜复杂的情形都足以致使赫德爵士声称——“我們走得越慢越好；走得越快，我們就越准定会失足而陷入沙洲或浮沙之內。”^①

十四 建立在海关机构的基础上的邮政

当时的风尚是小心謹慎：海关机构被用作邮政的基础，每一个海关的轄区在起初就变成了邮务工作的区域单位。海关稅务司变成了各該区的邮务长；它的海关員司兼办一切文書、會計和档案工作；而只是为了与处理信件直接有关的工作才設置了一批邮务人員。邮政在它的那种生存条件下，本来是无法自給自足的；虽然沒有政府的补助，它居然經營了七年之久，直到一九〇七年。在那一年，政府才許給它七三〇、〇〇〇两的补助金，其中实际拨付的大約只有一半；在一九一一年以前的十五年中，每年大量的亏空都是用海关經費基金来弥补。^②这是因为担任邮政方面的重要工作人員，如总办、副邮务司、邮务长、区會計、区文書以及許多屬員等等，都是由海关基金給养的；大量需用的表冊都是由海关供应；办公房舍在許多比較小的口岸，都是海关撥給；輪船邮件的补助費也以海关基金支付；并且很多次要的开支也都沒有成为邮政預算上的負擔。

① 赫德致葛显礼函，一八九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② 当一九一五年有少量盈余出現的时候，趋势为之一变；一九一六年邮政收入計超过支出达六二五、四八五銀元。——中国邮务会办鉄士兰 (H. Picard-Destelan) 一九一六年年度报告书。

十五 这样建立起来的中国邮政局

在这种制度下，海关的資財被耗尽，可是沒有这种帮助，中国邮政就不可能创办起来；沒有这种帮助所形成的会是一个脱胎于西方习惯而不能滿足中国需要的外国式的机构；有了这种帮助所长成的是一个按照中国需要而吸取西洋方法的服务机构。^①那机构是由受过中国海关的訓練而沒有邮务經驗的人們所筹办的，它充分发挥了海关服务的精神，致使这种陌生的工作被欣然承担而且貫徹到底。这机构是由海关里的外国員司們所組成的；但是邮务工作所借重的外国帮助却很少。在一九一〇年，海关有各級外国職員一、三六九人和中国人員五、八一六人；而同年邮局的職員中有海关職員兼办邮务的外国人九十五名，从海关确定轉职的外国人九十九名，各級中国職員一一、八八五人。

十六 中国邮政局遵守國際邮政联合会的慣例和章程

一八九六年四月間，中国致函瑞士联邦議會，将帝国邮政的建立及其在組織就緒之后拟加入国际邮政联合会的意思通知給它；同时并表示，中国邮政局愿遵守国际邮政联合会的慣例和章程。但是它虽然遵守章程，仍然不愿正式入会；正如赫德爵士說的那

^① “这里的情况和別处不同，我們要取得同邮政联合会的联系，一下手未免太費力——自然我們要努力向这一方面去作。至于‘专家’問題——我已經商請 B 君借給我兩名好手，一名为上海用，一名为北京用，但是借重他們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在我們已經把木块砍得有些成形以后，我們再請他們把它削成定型，作些打磨工作；他們現在会见而生厌，会立刻拂袖而去！总之，責任是在我的肩上，我們只能遵照我的方針，穩步前进——这就是我所希望大家照办的，但各口岸人員自然可以便宜行事，这并不是說可以变更总的原則，而只是說使实践适合于口岸的要求，并依从当地的特点来规划当地的办法。”——赫德致葛显礼函，一八九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样，“要求正式加入国际邮政联合会和要求赶办一切——要求我們在能够爬行之前就先奔跑——这使我感觉到象是一个关在馬車里的人，讓一个想把那不馴的馬赶下左面的斜坡而不是赶上前面的山坡的御者端坐在御台上一样。”^①所以在最初就着手办理各局的內部工作，并将通邮的便利給予和通商口岸有商业关系的那些城鎮。首先要做的就是要使公众习惯于一种全国性的邮政那种观念。要鼓励发信人把他們寄到外国的信件交給中国邮政局按照国际邮政联合会的定率粘貼中国邮票；然后中国邮局再按相同的定率貼上外国邮票而将信件交給外国邮局；用这种办法，中国邮局虽然没有得到一点邮資，但是仍然奠定了須由它們处理邮件的那項原則；并且它們又进一步接受那些寄来的外国邮件，免費予以分送。

十七 和外国輪船商訂的办法

这样謹慎办理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必須爭取航行中国海面的外国輪船的合作；^②这一点是以牺牲海关利益来做的。在海关的早期历史上有一項定例：装卸貨物只能在上午六點鐘到下午六點鐘之間进行，星期日停止装卸；^③如有例外情形，得发給特別許可証。取費是：半夜收銀十兩，整夜收銀二十兩，假日收銀二十兩，假日夜班收費加倍；久而久之，輪船用途增加，这种加班工作也就变成了經常的业务，而輪船公司則感覺到額外收費一层是一种冤屈。不过這項取費并不是作为担任加班工作的職員們的津貼，而是作为增添担任這項职务的人員之用的。赫德爵士这时就提出一項巧妙的建議，拟将同意专运大清邮政局的而不运其它一切通信机关

① 赫德致寬顯疏函，一八九六年八月十二日。

② 一八九六年进出中国各口而悬外国旗的船舶吨位：对外貿易，九、〇五九、三六五吨；沿海貿易，一七、一七五、二〇〇吨。

③ 参看本书第二卷，第七章第七节。

的邮件的那些輪船公司所繳的特別許可証費发还一半。他在提出這項建議时竟也非常謹慎——“留心你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因为，如果[輪船]公司想到我們是在它們的掌握之中，它們就难于对付了，不是要勒索我們一笔錢再答应，就是拒不答应——在后一种的情形下，我們就会真的进退两难！你現在总可以明白为什么我这样慢慢地并且小心地在行动，以及为什么在將我們的各种事情办理就緒以前，我拒不完全参加国际邮政联合会了。”^① 輪船公司答应了這項建議，并且同意接受这笔发还的款項作为沿海运送邮件的給費；当时它們的确占了便宜，可是不到十年，便宜就归于中国邮政局了。

第十八 参加国际邮政联合会延迟到一九一四年

参加国际邮政联合会仍然沒有成功，但是中国在各方面都遵照它的章程和慣例行事；所采取的原則可以簡明地叙述如下：“各地方上的递信机构必須維持，对于外国邮政局必須迁就，国际邮政联合会帮不了我們的忙；所以我一直用一种办法来推进我們的制度，不仅要适应这些情况，而且要一方面爭取在原則上受到承認和支持，另一方面还要避免我們沒有准备去担負的那些責任。”^② 在这一切小心謹慎的情况下，进展是緩慢的，但是終于一九〇〇年二月和法国簽訂了一項协定，接着在一九〇三年和日本，在一九〇四年和印度与香港也簽訂了协定。橫越西伯利亚的路綫还没有开辟，这些邮政机关正控制着中国的国外邮件的路綫；所以中国就和它們商定：各方应收受、轉运和分送按照国际邮政联合会所規定的邮資貼有另一方邮票的邮件，然后这种相互的服务再根据每年的統計数字結算，就象任何两个联合会會員国之間的办法一样。这

① 赫德致葛显祖函，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六日。

② 又函，一八九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些协定已經將中国置于和所有联合会會員国相同的關係之中，仿佛它已經入會一樣；但是中国答应完全正式入會还是在它派代表出席那次原拟于一九一四年九月在馬得里举行而未能举行的世界郵政會議的時候。

十九 民信局爭持，但未被压制

因为驛站是以官方的利益为背景的，所以凡是在任何方面可能和它相抵触的事都沒有作过；可是对于民信局就必须进行斗争了。在民信局的背后有一种强大的商业利益，这种利益总可以得到縉紳們的支持，而官吏們又大都来自这些縉紳們之間。所以对于民信局就必须一面进行斗争，一面好言劝誘。它們首先奉飭登記；最初它們虽然普遍予以拒絕，可是由于郵政局在和輪船公司所訂的合同中取得了用輪船递送的壟断权，致使它們不得不照办。然后它們又被勒令將它們封在“总包”中的邮件交由郵政局代寄；对于這項規定，它們遇有可能，就拒不照办。从通商口岸到通商口岸，这种“总包”起初是免費代运的；若由其他輪船航綫托运这类邮件，則按半价收取郵資，由信差路綫托运这类邮件，則收取全数。一九〇六年，民信局在揚子江沿岸各城市激起了騷动，要求凡总包邮件不问目的地和运输方法，一律免費运送。这次运动失败了，帝国政府規定民信局必須按照总包邮件的毛重繳費，凡經由輪船、火車运输路綫的，交納郵費半数，經由信差郵路的，交納全費。民信局仍然坚持斗争，准备放棄无利可图的路綫，而为可以贏利的路綫作坚决的斗争；結果是一場失敗。总包內的信件数目如下表：

一九〇四年.....	八、三〇四、一二五
一九〇七年.....	六、三八九、三七四
一九一〇年.....	七、四〇九、六〇〇
一九一三年.....	四、七九六、一〇〇

二十 一九一一年邮政脱离了海关；它的发展情形

大清邮政局在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脱离了海关，改隶邮传部；李經方奉派为总办，帛黎为会办。十年間的发展情形可以由下列数字表示出来：

	1904年	1908年	1913年
邮区数目	40	44	45
邮政局数目	392	592	1,276
邮政代办所数目	927	2,901	6,487
邮件件数①	66,000,000	252,000,000	629,447,000
包裹数目	772,000	2,455,000	6,177,091
总包信件数	8,300,000	8,042,000	4,796,100
发行的汇票元数	752,500	3,867,000	10,161,000
邮路：			
铁路：哩数	2,780	4,000	6,300
輪船：哩数	8,000	8,000	9,700
民船：哩数	5,000	6,800	9,700
邮差：哩数	33,000	68,300	127,300

① 这一行表示所有各局經办邮件的件数。真正的統計項目应是“邮递品”，計一九一三年为一九七、四八四、一三六件，一九一六年为二五〇、四三二、二七三件。包裹的数字也有夸张（一九一三年为一、三八〇、九一二件）；但是其他各項无需訂正。

第四章 铁路的发展

一	中国满足于它的交通状况	78
二	一八六三年建议的苏沪铁路被拒绝	78
三	一八六三年的斯蒂芬孙建议被拒绝	79
四	一八七五——一八七六年，上海吴淞间铺设了铁路	80
五	中国收购铁路并撤除铁轨	81
六	一八八〇年的开平轻便铁道	82
七	一八八七年的台湾铁路	83
八	一八八八年开平铁路延展到天津	84
九	拟向北京延展遭到反对	85
十	一八九一年铁路延展到山海关并伸入满洲	86
十一	山海关内外各铁路的完成	87
十二	在李鸿章的势力下俄国得到支持	88
十三	一八九六年关于满洲的中俄协定	88
十四	华俄道胜银行和西伯利亚铁路	89
十五	中东铁路	90
十六	矿务铁路总局	91
十七	京汉铁路：管理权的争夺	92
十八	一八九七年德璀琳的禀帖	93
十九	京汉路建筑事宜委由比利时人办理	94
二十	德国在山东所造的铁路	94
二十一	从天津到扬子江的英德铁路	95
二十二	浦口条件的最后解决	96
二十三	法国在中国南部所造的铁路	97
二十四	粤汉铁路：美国合同	98
二十五	中国用英国借款贖回京汉路	99

二十六	英国政府对于有关铁路的各项要求所持的态度.....	100
二十七	揚子江流域的英国各铁路.....	102
二十八	河南的英国铁路：被中国贖回.....	103
二十九	中国境内的其它铁路.....	104
三十	在滿洲的日本各铁路.....	105
三十一	四国銀行团的組成.....	106
三十二	湖广铁路由四国銀行团承办 (中国铁路一覽表見附录2).....	107

一 中国满足于它的交通状况

五十年前，中国是世界上一个沒有铁路的大商业国。在中国本部十八省之中，有十二个省^①在所有人烟稠密的部分靠着水路来供給它們的商品以安全而又廉价的运输。在其余各省中，四川省是物产独丰，人烟稠密，但是它的整个地带都是山巒起伏，高低不平；云南貧瘠多山；貴州人口稀少，河流已足利用；甘肃貧瘠而僻远；只有山西和陝西这两个毗邻的省份，証諸我們新近的見聞，还可以作为铁路发展的一个有希望的地区。山西的銀号对于所有各省的金融都有关系，它們并不是以本省的发展为主的。全中国的一般商人都非常滿意于所具备的运输方法，尤其是自从迟緩而不可靠的沙船已經有了迅速而又能够保险的輪船作为补充之后；因此，国家在铁路方面应采取什么政策就只好由帝国的統治者們去决定了。

二 一八六三年建議的苏沪铁路被拒絕

一八六三年三月，戈登在李鴻章的最高指揮权之下，統率起“常胜軍”。在随后五个星期之内，他曾經在福山、常熟和太仓打了几

^① 直隶、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

次胜仗，并且在五月底攻占崑山；从这时起，太平軍叛乱的結束已經显然在望了。戈登然后进一步去孤立苏州，那个城随即在十二月四日陷落。^① 苏州的陷落既在意料之中，上海有二十七家英、美洋行在七月二十日递給江苏巡撫李鴻章一个稟帖，請求准許修建一条从上海到苏州的铁路。这位巡撫对于外国人的侵略性非常敏感。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他恼恨一八四二——一八四四年以及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年历次条約所强加于中国的条件，特别是关于領事裁判权的要求；作为一位行政官員，他曾經接触到外国商人慣于不根据条約文字而根据条約精神来解释条約，借以扩张他們的权益的那种傾向；^② 并且作为一个戰場上的司令官，他曾經在前六个月之內遭遇到由外国軍官所統率的那支“常胜軍”的三次兵变。^③ 处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他批复說，“铁路只有由中国人自办，自行管理，才会对中国有利；在內地雇用許多外国人，却有重重障碍；而且人民对于因筑路而被夺去土地，也一定非常反对。”稟帖就这样被駁回了。^④

三 一八六三年的斯蒂芬孙建議被拒絕

在那同一年，有一位英国工程师，麦唐納·斯蒂芬孙爵士(Sir MacDonal Stephenson)，抱着使中国免于受到象英国所受

① 参看本书第二卷，第五章第四至第十一节。

② 同上，第六章第七、第十一、第十六节；第七章第四至第六节。

③ 同上，第四章第十八、第十九节；第五章第五、第八节。

④ 巴夏禮爵士致斯蒂芬孙函，一八六四年三月八日，載于肯特(Kent)，“中国的铁路投資”(Railway Enterprise in China)，第二頁；拉波萊(Laboulaye)，“中国的铁路”(Chemins de Fer de Chine)，第一一頁。这两部著作对于中国铁路建設的进展，作了杰出的、可靠的叙述。其中有需要訂正之处，只是由于他們对于中国国内情况缺乏亲切的認識。例如肯特(书中第五頁)将斯蒂芬孙在一八六四年失敗的原因归于下述的事实，即他只在中國的商人中获得支持，而“这个階級在中国政治社会中却居于最下层，在那时簡直不受重視”。这是日本的情形，而不是中国的情形。中国的行会始終行使着很大的权力，并且在中国，士紳和商人密相結合着，人們毫不費力地从一個階級过渡到另一个階級，而且常常兼跨两个階級。

的那些由于任意发展而产生的祸害这个宏愿，来到中国作了一位不速之客。根据当时所可利用的不完全的資料，他拟定了几条干綫：从汉口向西，經過四川和云南到緬甸；从汉口向东到上海；从汉口向南到广州；从鎮江向北到天津和北京；从上海到宁波；以及从福州进入內地。这些建議并不需要一位伟大的工程师来提出，所以一經提出就被拒絕了。^① 但是它們却成为一个个的友好的顧問們劝諫中国統治者以建筑鐵路来促进国家利益的蓝本。这层倒使他們惊惶失措；当顧問們越来越为兴建中国鐵路的美滿幻想所鼓舞的时候，統治者們对于領事裁判权所庇护的另一种外国利益的可能渗入，則更加感到惶惶不安。外国人的目的在一八六八年已經由蒲安臣(Burlingame)的口里說出，据他說，中国当时已經准备聘用西洋工程师来开采矿山和兴建鐵路；但是帝国大臣們的态度却由文祥一語道出——“我們給予我們的使节的唯一訓令，是不讓西洋强迫我們建設鐵路和电报，我們只希望这些事情由我們自己来提倡。”^②

四 一八七五——一八七六年，上海

吳淞間鋪設了鐵路

一八六五年，上海商人（譯者按：指洋商）組織了一个公司，要兴建一条从上海到吳淞的鐵路，全长十哩。在两年以前，当鐵路要經過的地帶正由据守三十哩半径的英、法联軍占領着的时候，这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但是在一八六五年，这个地帶已經归由中国民政官員管理，所以只有获得那些官員們的最热誠的支持才能克服那滿布坟山和墓地的地段中征購土地的困难，因为坟山和墓地是所有中国人最尊敬的东西。于是那些发起人就来設詞蒙混。他們

① 肯特，“中国的鐵路投資”，第三頁。

② 參看本书第二卷，第九章第六、第九节。

获得了許可去重修从上海到吳淞的軍車道路，并且以私下商議的办法取得为加寬和整理道路所必需的土地。这样，他們就不声不响地購得了土地，并且筑成一条高出于一片溪流交錯且易于氾濫的地面上的道路所需的那些堤坝和涵洞。在一八七二年，又有另一項在上海租界境內修建电车道（在那时还需要使用馬力牵引）的方案，拟从虹口的頂端，經過百老汇路和外滩，直到县城的东門。^①不久以后，吳淞鉄路的发起人就宣布他們想要沿着他們的新路敷設“街車”路軌；^②关于这种作法，他們至少获有英国公使的許可，英国公使的行动則根据一八五八年的条約第四款里的文字——由沿海无論何处——这样就使外国商人們的极端主张有了后盾。^③“街車”的鉄軌在一八七五年十二月在上海卸下，一条軌幅三十吋的永久鉄路的工程就立刻开始；但是中国人随即知悉所謂电车道实际上就是火車道，^④于是上海道于一八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札諭发起人在他向北京請示以前停止兴筑。在这时期，英国公使曾經被喚起注意，他的本国政府从来不支持这样一种論調，說外国人的活动可以伸张到“无論何处”；当发起人空等了一个月而沒有得到官方的許可証就决計繼續兴工的时候，連他們本国使館的許可也沒有获得。

五 中国收購鉄路并撤除鉄軌

通往江湾长达五哩的路綫在六月三十日完工，从那一天起，每天上下行都有六节車行駛，仅以載客为限。車上非常拥挤，这条鉄路似乎很投人民的所好；但是在八月三日，有一个在軌道上走路的

① “新聞通信”，載“北华捷报”，一八七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② 在翻譯“路”和“車路”这两个字的时候，都不可能不用“馬”字作为冠首詞。

③ 参看本书第二卷，第十章，第七、第八节。

④ “車路”，指馬車鉄路；“鉄路”，指火車鉄路。

人被压死，照情形看来，出事原因不是由于死者极端愚蠢，便是他心存恶意，想借自杀而造成对铁路的偏见。如果后一种想法是对的，目的是达到了，人民声势汹汹。威妥玛爵士那时正在上海，准备动身到烟台去商订“烟台条约”；^①遵照他的训令，車輛停駛了。十月二十四日，两江总督签署了一件合同，根据这个合同，铁路，连同土地和工場，由中国按二八五、〇〇〇两銀子的实价，一并收購。然后发起人又恢复通車以作收購价款的担保；但是在一八七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付清价款之后，铁路便移交給中国官員，他們立刻把它拆毀，并把鉄軌和車皮运到台湾，任其在海边上锈烂。^②一项想用譎詐手段以中国还不需要的铁路强加在它身上的企图就这样地归于失敗。

六 一八八〇年的开平輕便鉄道

下一次的企图也是基于一种設詞蒙混的办法，但却是由中国人为了中国而进行的，并且避开了成为前几次冒险的致命伤的外国因素。招商局的主持人唐景星曾經在一八七八年开办开平煤矿，以便为他的輪船取得本国煤炭的直接供应。^③在唐山的主要矿井距离最近的装运港北塘有二十九哩，距离可以开凿运河的最近地点胥各庄有七哩。总工程师薄內 (R. R. Burnett) 建議修筑一条从矿山到北塘的铁路；这项建議由唐景星認為可行，当經奏准，于是派金德尔 (C. W. Kinder) 主持筑路事宜。不久之后，皇上又收回成命，因而工程停頓。金德尔嗣后得到了唐景星的許可，以一条电車路連接唐山和胥各庄，路軌按照四呎八·五吋的标准軌幅，車輛則用騾拖拉；这条路在一八八〇年开工，一八八一年竣事。

① 参看本书第二卷，第十四章，第十八节。

② 肯特，“中国的铁路投資”，第九頁以下各頁；拉波萊，“中国的铁路”，第二二七頁以下各頁。

③ 参看本书第二卷，第十五章，第八节。

在这期间，金德尔已经建造了一个火车头，锅炉原是一部活动起重机的旧物，车轮是当作废铁买来的，车身是用波形旧铁构成的；它的总值是五二〇元（九五镑）。虽然屡次奉命停造，但是李鸿章很感兴趣，就加以核准；所以最后于一八八一年六月九日当乔治·斯蒂芬孙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的那天，它就被命名为“中国火箭号”（“Rocket of China”）。它的成就立刻被显示出来，一八八二年又买了两部附有水柜的机关车，在通往运河的那条七哩长的铁路上行驶，运河在这期间已经开凿到北塘河上的蘆台。^①

七 一八八七年的台湾铁路

再一次的冒险是在台湾进行的。刘铭传曾经在一八八四——一八八五年，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抵抗法国人，成功地捍卫了全岛，但是战争使人清楚地看出台湾有变成帝国的一个行省的必要，于是这个行省的保卫者就成为第一任巡抚。战争也指明了基隆的重要性和它的弱点：它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是台湾岛上的唯一有掩护的港口，并且在它附近有一八七五年开办的各煤矿；弱点则在于它是被陆地那一面的一带崎岖山脉紧密地包围着，而这一带的山脉却在海上的炮程以内。在省会从台南府迁到台北府之后，兴筑一条联络台北府和基隆的长达十八哩的马车道的计划曾经在考虑中；但是刘铭传是一位奋发有为的军事统帅，他很容易地接受了^②以铁路代替马车道的劝告。就象台湾那样的一个实验性质的省份，奏准皇上也要费些时日，但是终于在一八八六年年底奉旨核准；于是在一八八七年三月，这位巡抚本人在英国工程师的帮助下，率同他的全体随从，勘测了这条路线的起头四哩。这一条路是

^① 肯特，“中国的铁路投资”，第二二页以下各页。拉波莱，“中国的铁路”，第一二页以下各页。

^② 著者相信他或许是在一八八五年七月公出期间拜访钦差大臣时，第一个建议这种调换的人。

要由中国人为了中国人来建筑的，所以沒有遭到任何障碍；但是工作是由兵士担任的，而且劳动条件則令人不能滿意到如此的地步，以致有五位总工程师相繼辞职。工作終於在亨利·孖地臣先生(Henry C. Matheson)的监督下进行到底。^① 到基隆的一段在一八九一年完工，向台湾南部伸展的那段于一八九三年筑到距台北府三十哩的新竹。这条路自始至終就是中国官吏管理下的牺牲品；它在建筑、設備和工作条件方面，都是因陋就簡；北京当局拒絕批准任何发展基隆的步驟，要不然，基隆就很可能变成一个使敌对军队垂涎的釣餌；因而在一八九五年，除去五十哩鋪設簡陋的鐵路而外，日本人並沒有拿到些什么。^②

八 一八八八年开平鐵路延展到天津

对法战争的結果之一就是揭开了企业組合时代的序幕，最初采用这种企业組合的只有法国。据条約規定，如果中国决定建造鐵路，“其招募人工，法国无不尽力襄助”，^③ 为求尽量利用这项条約規定的利益起見，法国工业界联合起来在天津設立了一个总办事处，准备承办中国鉄路的建筑事宜。它取得了一件建筑中国主要海軍基地旅順口的船塢和防御工事的合同，估价为二、五〇〇〇〇〇〇两，但是中国人却依然宁愿建筑他們自己的鐵路。一八八六年，开平輕便鉄道伸展到蘆台，二十哩的建筑費不过一三五、〇〇〇元(二五、〇〇〇鎊)。李鴻章大感兴趣；不过他虽然看清楚了

① 孖地臣在一九〇〇年春季是和約翰·拍其(John Birch)及华茲-格蘭特陸軍中尉(Watts-Grant)在湖南进行勘测的三人工作队中的一人，他們在义和团动乱开始的时候，正在从汉口往天津的途中。當他們乘木筏橫渡黃河时，拍其墮水淹死；后来，华茲-格蘭特陸軍中尉在蒙古被戕害；孖地臣在服役于天津义勇軍之后，于一九〇一年四月当“里約·热內卢城市号”輪船在旧金山港外遇難时失踪。

② 戴維生，“台灣島”，第二四七及以下各頁；馬士，“淡水報告書”，“十年報告書”，一八八二——一八九一年，第四四九頁。

③ 參看本書第二卷，第十七章，第二十九節。

商业方面的利益，但是他的兴趣却是基于軍略上的理由，并且在这些理由方面，他得到了皇上的父亲、新設海軍部大臣醇亲王奕譞的支持。一八八七年三月十五日，这位亲王奏請將鐵路向东延展到山海关，向西延展到天津，然后再从那里延展到北京，“以便利軍队的調动和軍需品的运输”；当即奉旨批准。^① 中国鐵路公司于是組織成立，以伍廷芳为总办，負責財政，金德尔为工程师，負責建筑事宜。招募的股本定为一、〇〇〇、〇〇〇两，經過許多延宕和困难之后，股本方才募齐；应邀供应二、〇〇〇吨鉄軌的投标很多，投进得很快，并且价格也很吸引人。通往白河口大沽对岸的塘沽那一段工程在一八八八年四月竣工，通往天津的那一段在八月竣工，总建筑費約合每哩一九、〇〇〇元（三、〇〇〇英鎊）。

九 拟向北京延展遭到反对

建議中的鐵路綫現在已經筑成三分之一，共計八十哩；西段，从天津到北京（蘆沟桥）也是八十哩；东段，从唐山到山海关也是八十哩。現在建議要先筑西段，后筑东段；但是反动的和反对李鴻章以及他的工作的各种势力活跃起来，軍机处迟迟不予批准，仅征詢督撫們的意見。^② 在所收到的复文中，李鴻章的同党、台湾巡撫刘銘传的咨复支持鉄路的延展最为明显；他駁倒了鉄路会使北京門戶洞开，任受攻击的那种論調，而指出，塘沽才是北京的真正門戶，要維持这个門戶，最好就是提供增援那里的防軍的手段。反动派的領袖，两广总督张之洞根据軍略上的理由，反对这条鉄路的延展；

^① 奏章原文載田貝致白雅德函，一八八七年四月五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八七年，第二〇八頁。

^② 这种对李鴻章計劃的反对已經指向塘沽和天津間鉄路的建造。田貝致白雅德函，一八八七年一月十二日、二月二十五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八七年，第一八二、一九一頁。这种反对意見被三月十五日奏章的御批所击碎；又函，一八八七年四月五日，同前引。

主他张建造几条远离海洋而贯通内地的主干线，以从北京到汉口的一条干线为张本。张之洞是一位文章家，他的奏章使得皇帝左右的大臣们由衷地折服；于是他调任武昌，奉命承办他所规划的干线，用中国材料、在中国人的监督下进行建筑，一如他所建议的那样。他自知不能贯彻自己的宗旨，但是为将来计，设立了汉阳铁厂。

十 一八九一年铁路延展到山海关并伸入满洲

将铁路向北京延展一层就这样被搁置了，并且因为必需使用中国资本和中国材料，各铁路干线也无限期地被搁置下来。李鸿章不是一个专坐在帷幕里生气的人，他决计执行醇亲王已经奏准的那件奏摺中的方案，继续将铁路向东往山海关延展。没有另行奉准，工程就在一八九一年开始，并在一八九四年竣工。他把这事当作一件政府的事业来办，以总督的岁入为担保，向银行透支款项来支付一切开销；并且他为此而成立了一个政府机构，叫做“山海关内外铁路局”，这个局在一八九四年将中国铁路公司的路线和工场一齐合并进来；然后又将金德尔调任该局总工程师，柯克思(A. G. Cox)为建筑工程师。同时，为使满洲能有一些防御进攻的准备，他建议将他所筑的铁路推展到山海关以东，伸入关外，即(长城)关口以外的地方；金德尔遵照他的命令，在一八九〇年开始向那一方面进行勘测。俄国方面注意到，这个企图是要阻挡俄国，使它不能进行为了控制满洲而订出的发展俄国铁路的计划，因此，对于拟议中的由中国延展铁路线的那种积极反对意见在北京受到了鼓励。可是在一八九三年，李鸿章得到了他所企求的许可，①在对日战争爆发的时候，铁路已经修到山海关以东四十哩的中后所。

① 田貝致葛礼山函，一八九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九三年，第二三六页。

十一 山海关内外各铁路的完成

这就是中、日战争以前铁路发展的情形。那次战争的结果显示了铁路的军略价值，和建造“远离海洋”的路线的荒谬；一八九五年秋季，那件曾经被驳斥下来的将铁路延展到北京的计划已经着手实施，一年之后修到丰台，随后又修到离北京城外不远的马家堡。增修部分是向银行透支款项支付的，透支的款项则用一八九八年发行的本金二、三〇〇、〇〇〇英镑的公债去抵还；这一条铁路纯粹由中国管理，并且管理得那样地得力，以致可以用它的赢余来增筑几条支线：一条通往天津和牛庄封冻港之间的那个秦皇岛不冻港的四哩长的支线；一条从北京到通州十二哩长的支线；一条从北京，经过长城上的南口，到宣化府和张家口的一二五哩长的支线。在一九〇六年，从北京到关外的新民府之间通车的路线，不包括侧线在内，全长五八八哩，建筑和设备费共计四七、九七〇、〇〇〇元，或每哩八一、五八二元（按一八九八年的汇率合一二、四八二英镑，按一九〇六年的汇率合八、七二三英镑）；收入帐目如下表：①

收入, 关内线	7,016,334元	
收入, 关外线	4,857,526元	
收入, 杂项	317,329元	
		12,191,189元
营业费用	3,429,943元	
净 入		8,761,246元
2,300,000英镑公债利息	1,748,008元	
中国政府借款利息②	1,068,500元	
赢 余		5,944,738元

十二 在李鴻章的勢力下俄國得到支持

中、日戰爭之前，李鴻章一直懼怕俄國對朝鮮的計謀：一旦朝鮮被俄國吞併，他看出滿洲將完全被俄國的領土所包圍，致使中國無法希望再在那里保持商業自由。所以，在他不能單獨依靠他個人的情形下，他就傾向於依靠英、美等商業國家，並在商業上去發展滿洲。戰爭結束後，他才領悟到出面干涉和要求日本放棄遼東的是俄國領頭的各軍事國家，^①而各商業國並沒有採取任何步驟來幫助帝國；所以從那時起，他就頗有越來越依靠俄國的跡象了。然而他的動機卻受到人們的懷疑，甚至連付給了他幾筆錢都在聚樂場所被恣意地談說；但是平心而論，這却是一位愛國的政治家企圖“減少損失”，並且以聯合最可怕的敵人為手段來保全受到威脅的那些省份的一些主權殘迹的舉動。已經從山海關修築的那條鐵路依然保留，並且到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爆發的時候，已經在中國人的監督下，向奉天方面修築到新民府，另有從溝幫子到牛莊海口營口的一條支綫；但是滿洲的其餘部分則讓由俄國去發展了。

十三 一八九六年關於滿洲的中俄協定

達到這次協議的談判不是在剛剛收回遼東之後開始，就是格外可能地，與商議收回遼東的同時開始的；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底，雖然事實並未公布，但是大家知道，俄國的西伯利亞鐵道將不會北

① 肯特，“中國的鐵路投資”，七一頁。

② 一九〇六年年底，中國政府的債務計達二一、三七〇、〇〇〇元，並且從一九〇五年起，按每年六九〇、〇〇〇元的數目清償。

③ 參看第二章第二十七節。

“他〔李鴻章〕也是在某種重要意義下受俄國保護的，俄國已經保證使他不因向日本投降（一八九五年）的後果而遭受損害。”——密其（Michie），“在中國的一個英國人”（*The Englishman in China*），卷二，第三八七頁。

向而远繞黑龙江,然后再沿烏苏里江而南行,而是将穿过滿洲,“从尼布楚笔直地到达海參威”;^①这是在十一月八日签署收回辽东的条約一个月以內;并且与十一月二十九日交換批准書同时的事。^②一八九六年三月,李鴻章奉派为欽差头等出使大臣代表中国参加沙皇加冕典礼。他在离开北京之前,曾經和俄国公使喀希尼伯爵(Count Cassini)商談一項关于滿洲的密約,但是沒有签字;^③当他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和罗巴諾夫亲王(Prince Lobanow)商談同样的一項条約,并且签了字;^④喀希尼伯爵曾經声明,在条約签字以前,他将不会离开北京,当条約在九月二十九日签过字以后,他就在三十日离去了。^⑤据条約規定,俄国得自行建造一条通过滿洲到海參威的鐵路(西伯利亚鐵道),和一条从海參威到琿春和吉林的鐵路;中国只应向俄国銀行借款,以供建筑从山海关到奉天和从[哈尔滨]到旅順口及大連湾的各鐵路之用;后一条鐵路应依照俄国軌幅的尺寸。^⑥这些条約的确实性始終沒有被承認过,但是值得玩味的是,一八九六年所披露的各条款,在随后几年之內都一一見諸实施。

十四 华俄道胜銀行和西伯利亚鐵路

为执行条約中的鐵路条款,俄国在一八九五年特許成立华俄道胜銀行,这个銀行的目的就是执行所謂“鐵路征服”政策,这个政策到后来于一九〇九年又归并在所謂“金元外交”政策之內。这个銀行在名义上是一家俄国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但是在它的創辦

① “北华捷报”,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六日。參看第五章第一、第四节。

② 条約載柔克义,“条約汇编”一八九四——一九〇四年,第二六頁。

③ 摘要載“北华捷报”,一八九六年三月六日。

④ 法文本的英譯文載“每日电訊报”(倫敦),轉載于“北华捷报”,一九一〇年三月十一日。

⑤ “北华捷报”,一八九六年十月九日。九月二十九日所签条約的摘要,載同上,一八九六年十月三十日。

⑥ 一八九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条約,第一至第四款。

人之中，有四家巴黎的主要銀行和許多法國金融界的領袖人物；它的資本是一一、二五〇、〇〇〇金盧布，此外，中國政府預付五、〇〇〇、〇〇〇兩作為永久存款。中國政府給予這家銀行以在滿洲建造鐵路的特權；為了建造鐵路，這家銀行根據俄國法律，成立一個中東鐵路公司，資本為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靠着這筆微小的款項以及由直接或間接賣給俄國財政部的債票而得到的一筆數目大得多的金額，^① 俄國在滿洲的鐵路得建築起來，計有從西到東，滿洲里—哈爾濱—綏芬河綫，長九五〇哩；從北到南，哈爾濱—大連灣—旅順口綫，長六四六哩；到一九〇四年為止，共計長一、五九六哩。根據協定，中國得在三十六年後備價贖回各鐵路，在八十年期滿時，所有各路全歸中國所有，不另給價。^②

十五 中東鐵路

在滿洲的鐵路之中，山海關內外鐵路局于一八九五年以前及以後分期建成的那兩條從山海關到新民府和從山海關到營口（牛莊）的鐵路，並不在俄國的控制之下。為供應這兩條路的建築費用，到一八九七年年底為止，外國銀行共計墊付了二、四四〇、〇〇〇兩。^③

匯豐銀行	1,240,000兩
華俄道勝銀行	500,000兩
德華銀行	700,000兩

企圖將俄國的控制權伸張到這兩條鐵路上來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欲將金德爾解聘的要求——據俄國公使巴甫洛夫 (Pavloff)

① 貝佛里奇參議員 (Senator Albert J. Beveridge), “俄國的墊款” (The Russian Advance), 第一〇三頁。

② 合同載柔克義, “條約匯編”: “中俄銀行合同”; 第二〇七頁; “對銀行的讓與”, 第二一二頁; “東省中俄合辦鐵路公司合同章程”, 第二一五頁。

③ 拉波萊, “中國的鐵路”, 第九五頁。

声称，“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英国人，而是因为他不是一个俄国人，因为……俄国政府的意思是，凡中国和俄国接壤的省份，都不应该处于俄国以外的任何国家的影响下。”^①英国公使提出了抗議，于是要求被撤回。一八九八年六月七日，关内外铁路督办大臣胡云渭与代表中英公司(The British and Chinese Corporation)的汇丰銀行签署了一项合同，商借“約合华銀一千六百万两的一笔英鎊借款”，利息五厘半，以作清償銀行債務和增修鐵路之用；担保品是“各路及新路造成后所有車輛、一切产业以及脚价进款……”。^②俄国公使提出抗議，主要的理由是：如果中国方面不能履行債務，一家英国公司就会占有了在滿洲的几条鐵路，而在滿洲建筑鐵路的独占权利却已經讓給了华俄道胜銀行。一次外交战随即发生；九月七日，李鴻章被免职；^③十月十日，又签订了一项新合同，借款二、三〇〇、〇〇〇英鎊，利息四厘半，按九折发行。担保品名义上相同，但經双方同意，在不能履行債務时一切短付款項，应由中国政府归还。^④

十六 矿务鐵路总局

中国曾經作过几次努力以巩固它在鐵路建筑方面的控制权。一八九五年六月，张之洞将中国駐美教育考察团的前任团长容闳从美国召回到汉口，以便在鐵路事宜方面对于他并且通过他而对于政府有所建議。^⑤在一八九六年一月，前广西按察使、現任北洋軍粮台总办的胡燏棻奉派为京津鐵路总办。^⑥一八九六年五月，

① 麥納乐爵士(Sir C. MacDonald)致薩里貝利勋爵(Lord Salisbury)函，一八九七年十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号”，一八九八年，第五頁。

② 合同原文載拉波萊，“中国的鐵路”第八六頁。

③ “李鴻章是巴甫洛夫的棋盘上的一个主要棋子；很少在中国的外国人不認为他是被俄国收买的工具，很多中国人也抱同样看法。”——社論，“北华捷报”，一八九八年九月十二日。可是造成他的舞台却还有别的原因。參看第六章第十五节。

④ 合同原文載拉波萊，前引，第八六頁。

⑤ “北华捷报”，一八九六年一月十日。

⑥ 同上，一八九六年一月十七日。

津海关道、招商局总办兼电报局总办盛宣怀奉派为督办铁路大臣；^①并且在十月，奉旨加派他负责筹筑京汉路^②事宜，这条路却早由张之洞交由他管理了。^③一八九八年四月，作为那一年的维新运动的一部分，皇上颁谕设立矿务铁路总局，特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王文韶和张蔭桓主持其事。^④这个局大大地削减了许多养尊处优的官员们的俸禄，所以它的主持人在维新运动逆转的时候受到严厉的处分。^⑤这个矿务铁路局在一九〇三年归隶新成立的商部，后来又改隶邮传部。

十七 京汉铁路：管理权的争夺

京汉铁路是必须要用中国资本和中国材料建造的。张之洞为应付这后一项要求，设立了汉阳铁厂，并且在萍乡开办一个煤矿，在扬子江下游，距汉口七十哩的大冶开采了一个铁矿，在大冶“矗立着一个含纯铁百分之六十五的铁矿山，长三哩，高四〇〇呎，每天开采七〇〇吨铁，足供开采一千年”。^⑥资金的筹措却比较困难，因此在一八九六年十月，奉准举借外债。^⑦和（美国）前参议员华士本（W. D. Washburn）所主持的美华合兴公司（American-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的谈判首先开始，这家公司也曾草草地勘查过路线；这时，一家比利时银团却提出更有吸引力的相对开价；于是为华盛顿国务院所冷淡视之的这家美国银团^⑧竟丢掉

① “北华捷报”，一八九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② 一八九六年十月二十日上谕，载拉波莱，“中国的铁路”，第一〇八页。

③ “北华捷报”，一八九七年四月九日。

④ 一八九八年四月二日上谕，载柔克义，“条约汇编”，第二四九页。

⑤ 参看第六章第二十二节。

⑥ 罗纳谢（Ronaldshay），“在远东漂泊的学生”（Wandering Student in the Far East），卷一，第五四页。

⑦ 同本页注②

⑧ 约翰·谢曼（John Sherman）致田贝函，一八九七年三月八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九七年，第五九页。

了它自以为是囊中物的那笔买卖。但是比利时方面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凡是利害攸关的明眼人，不拘中外，都看出在比利时的幕后有法、俄两国；其它各国对于美国的主张可能是有的支持，有的不肯支持，^①但是对于比利时的主张，却全体联合一致反对。比利时的谈判于是中辍，不过在一八九七年七月又重新恢复，但是附有一项明白的条件，即“款项必须全部出自比利时，凡是出自法国或俄国的款项，将一概不予接受”。^②

十八 一八九七年德璀琳的稟帖

一八九七年九月，德璀琳采取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步骤，竟然用他自己的名义递给总理衙门一个稟帖：建议仿照洋关的先例，组织一个矿务铁路总局，就象次年四月间实际成立的那个局的样子。关于铁路事宜，他告戒总理衙门应特别提防比利时；在筹措铁路的筑费用方面，法国在俄国的帮助下，会是一个能手；它们的目标是要达到帝国的心脏（汉口），法国从南面来，俄国从北面来。他也提出防范盛宣怀的警告——“使用他，就象骑在老虎的背上，骑上去危险，下来更危险”，铁路、矿山、纺织厂、电报、轮船等等，样样事情都已由他经管。^③ 我们不能设想德璀琳递这个稟帖给总理衙门，而他的后台老板，^④ 即当时任总理衙门王大臣之一的李鸿章，事前会不知情，而且没有给予可能的支持；两个月后，据闻盛宣怀和比利时企业组合间的谈判已经“完全垮台”。^⑤

^① 在一篇社论中曾声称，“中国之所以宁愿把合同放在一家美国公司手里，还有别的理由。每一个欧洲国家运用它的势力都以它本身的利益为第一，美国则以它本身的利益为第二；而且美国以它自己的选择为第一，以其他各国一致的选择为第二，就在竞争中获胜了。”——“北华捷报”，一八九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② “北华捷报”，一八九七年七月三十日。

^③ 同上，一八九七年九月十日。

^④ 参看本书第二卷，第十四章第十九节；第十七章第十五节。

^⑤ “北华捷报”，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五日。

十九 京汉路建筑事宜委由比利时人办理

在一八九八年四月間設立矿务鐵路总局的时候，中、比間又恢复了談判，^① 在同年六月二十六日簽訂了一項最后的关于借款和經營鉄路的合同。^② 借款金額是一一二、五〇〇、〇〇〇佛郎，利息五厘，九折发行，借款从一九〇九年一起，分二十年还清；从合同簽訂之日起，这个銀团得繼續經營鉄路三十年，并得于减去营业費用和拨还借款本息之后分取淨利百分之二十。全綫在一九〇五年完工，共长八一二哩，包括支綫五十八哩在內。鉄軌和配件全部購自汉阳鉄厂，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免費供应銀团以估值为五、八〇〇、〇〇〇两的劳务。^③ 据規定，中国应有权在一九〇七年九月一日以后，随时清偿借款；这项权利是在一九〇八年十月行使的，为行使这项权利，中国向汇丰銀行和汇理銀行借款英金五、〇〇〇、〇〇〇鎊，为期三十年，前十五年利息五厘，后十五年利息四厘半，九四折发行；又借款四五〇、〇〇〇鎊，七厘計息，并按票面价格于一九二〇年以前偿还。

二十 德国在山东所造的鉄路

德国要求以山东作为它的发展范围。根据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簽訂的一項条約，中国允将胶州地界“租与德国，先以九十九年为限”；^④ 在这个条約內中国又“允准德国在山东省筑造鉄路二道”。根据这项条約，在一八九九年六月一日山东胶济华德合办鉄路公司 (Schantung-Eisenbahn-Gesellschaft)，获得德帝国的一項特許狀，确定資本为五四、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将建造一条从青島

① “北华捷报”，一八九八年四月四日。

② 原文載拉波萊，“中國的鉄路”，第一〇七頁；柔克义，“条約汇编”，第二三二頁。

③ 拉波萊，前引，第一〇五頁。

④ 参看第五章第九节。

到济南府的铁路；股东为德人或华人；得尽量采用德国材料；而且在胶州的德国财政局得于发付股息五厘后分沾利润。这家公司也有权呈请建造从青岛到沂州和从济南府到沂州的铁路。^① 这项特許状由于一九〇〇年三月二十一日签订的一项“山东胶济华德合办铁路章程规定”取得土地和保护铁路的办法而获得补充。^② 根据这项特許状，这条从青岛到济南的铁路，长二四五哩，连同到博山煤矿区的支綫三十六哩，共长二八一哩，在一九〇四年竣工，計用去德国資本五二、九〇〇、〇〇〇馬克。这条铁路的成就可以从山东的貿易由烟台移轉到青岛的情形反映出来，移轉情形見下列純进出口貿易总额价值表：

	1903年	1913年
烟台	38,183,912两(72%)	31,641,224两(35%)
青岛	14,598,411两(28%)	59,168,880两(65%)

二十一 从天津到揚子江的英德铁路

在一八九七年年底，容閔奉旨建造一条由天津經济南府到鎮江的铁路，准許自由招募外国資本。这件事立刻遭到德国公使的反对，他說依照当时正在談判中的“胶澳租界条約”，应只有德国才有在山东建造铁路的权利。^③ 虽然如此，一八九八年八月容閔为了这个目的向美国銀团借到了五、五〇〇、〇〇〇英鎊的一笔借款；^④ 合同虽然签过字，可是沒有执行，因为德国提出抗議說，它在山东的权利使它碍难同意。在这以前，一个德国銀团曾經建議为修筑一条联络天津和揚子江的铁路，承借四、五〇〇、〇〇〇英鎊，但是建議被拒絕；英国銀团又不愿意承办这条路，虽然它是通往揚

① 原文(譯本)載柔克义，“条約汇编”，第三六三頁。

② 原文(譯本)載拉波萊，“中国的铁路”，第一七四頁。

③ “北华捷报”，一八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④ “中国，第一号”，一八九八年，第一六八頁。

子江流域的。^① 结果是英、德双方的利益都被承认了，于是在一八九九年五月，以中国铁路总公司为一方，以汇丰银行（代理英中公司）和德华银行为另一方，签订了七、四〇〇、〇〇〇英镑的一项借款合同，利息五厘，按九折发行；合同于五月二十四日奉旨批准。^② 德国最初曾经建议，北段由德国银团为中国建造，山东境内的中段由德国公司照胶济路的办法来建筑，南段则由英国公司替中国兴建；但是据这件合同规定（第十八款），北段〔从天津到山东南境〕应由德华银行，南段应由英中公司代为经理“建造、行车一切事宜”。

二十二 浦口条件的最后解决

由于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运动，这项合同没有执行；当一九〇六年谈判重新开始的时候，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种政策，虽然仍然招募外国资本的借款，可是一切新路线的建造和经营必须由中国总办办理。经过历次冗长的商谈之后，于一九〇八年一月十三日中国和代表德国利益的德华银行以及代表英、法联合利益的华中铁路公司订立了一项新合同。^③ 根据这项合同，联合借款的数额是五、〇〇〇、〇〇〇英镑，利息五厘，按九三折发行，又根据以后的一项合同，在一九一〇年又续借了三、〇〇〇、〇〇〇英镑的一笔借款，利息五厘，按九四·五折发行；南段的终点改为在扬子江北岸、南京对面的浦口，全线计长六七四哩。借款并不是以铁路的收入，而是以某几项指定的省库收入为担保的（第九款）；并据规定（第十七款），“此铁路建设工程以及管理一切之权，全归中国国家办理”……以及“工程造竣后，中国国家即将南北两段合为一官办铁路”。象这样指明出来的政策，便叫做“浦口条件”。

① 肯特，“中国的铁路投资”，第一五〇页；拉波莱，“中国的铁路”，第一八〇页。

② 原文载柔克义，“条约汇编”，第三五五页；另载肯特，前引，第二六〇页；拉波莱，前引，第一八七页。

③ 原文载拉波莱，前引，第一九五页。

二十三 法国在中国南部所造的铁路

法国要求以毗邻东京的三个省份作为它的发展范围，并且把它的要求扩充到包括四川在内。一八九五年六月，中、法双方议定，“至越南之铁路，或已成者，或日后拟添者，可……接至中国界内。”^① 根据这项条约，双方又在一八九六年六月五日签订一项合同，允许建造一条从越南边境到广西龙州的铁路，并根据后来在一八九七年所给予的权利，得延长到南宁和百色。经过勘测而证明了这带地方的崎岖不平，又经过调查而反映出贸易的微不足道，这就显示出此路不能作为法国势力深入中国的真正路线；因此这个计划在一九〇〇年就被放弃了。一八九八年六月，法国取得了建筑从北海到西江的铁路权利，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又取得了建筑从广州湾到广西境内的西江的铁路权利；可是这两条路，一条也没有着手兴建。据一八九七年六月签订、并于一八九八年四月批准的一件合同的订定，允准法国从越南边境修造一条铁路到云南府（译者按：即昆明），与在东京方面拟从河内溯红河筑到老开的铁路衔接。路线需要长期的勘测，义和团运动的发生阻碍了这项工程的进行，使人遭殃的那个南溪河流域曾经杀害了成千累万的工人；因此这条路直到一九一〇年才通车。全线长二八九哩，工程费用计一六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其中有七六、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出自法国政府担保的借款，六三、五八〇、〇〇〇佛郎出自东京政府的补贴，二五、四二〇、〇〇〇佛郎出自承办建筑工程和经营行车的法国公司。对于蒙自贸易所生的实效可见下列数字：

	1910年	1913年
进口货	5,077,320两	8,612,646两
出口货	6,387,609两	11,066,270两

① 一八九五年六月二十日所签条约第五款，“条约汇编”，卷一，第七二五页。

这种实效之所以不能再較大些，是必須归咎于在东京的法国当局所采取的保护貿易政策的。

二十四 粵汉鐵路：美国合同

参議員华士本的美国銀团已經失敗了；^① 鉴于至少有欧洲四个强国在 1898 年春表現了領土野心，中国方面自然有充分的理由要去寻求那些还没有表現出这种野心的美国資本家的援助。在一八九七年十二月間，盛宣怀奏請允准兴建一条从汉口到广州的鐵路，并且因为“允許英国、法国或德国去承办这项工程，有重重窒碍”，所以他建議合同应在美国商談。一八九八年四月十四日，中国駐华盛顿公使伍廷芳和参議員喀尔文·巴时(Calvin Brice)所主持的美华合兴公司簽訂了一项合同。^② 借款金額是四、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利息五厘，本金按九折向合兴公司实收；合兴公司承办建筑工程，除地价和土方工程方面的开支以外，得按其它一切开支抽取手續費百分之五；鉄路的經營由合兴公司担任，所得酬劳为淨利的百分之二十，并以取得等于鉄路建筑費用五分之一的公司債券为担保。同时又議定，假使比国銀团不能完成京汉鉄路，該路应轉移給这家美国公司承办。^③ 一八九八年四月，西班牙和美国发生战争；而且当以巴克萊·帕孙斯(Barclay Parsons)为总工程师的那个勘测队到达現場的时候，反对維新主义者的大政变已經开始，一种普遍的仇視外国在华开发的情緒已經勃发。^④ 这种情緒在鉄路拟經過的湖南省为最盛，这就延擱了勘测工作，^⑤ 但是在一

① 参看本章第十七、第二十一节。

② 原文載柔克义，“条約汇编”，第二五二頁。

③ 同上，第二五七頁。

④ 参看第五章第二十九节；第七章第十五节。

⑤ 著者在一八九九年一直在有关岳州的开放方面为湖南省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发展打开道路，并就湖南人本身的利益來說服湖南人。在那一年，湖南断然放弃了它的仇外态度。参看“岳州”，海关总稅务司署造册处，上海，一九〇〇年；下文第七章第二、第三节。

八九九——一九〇〇年冬季，勘测还是进行了。勘测结果，拟建的路线计长七四〇哩，另有支线一〇〇哩（到萍乡六六哩；到岳州二五哩；到湘潭九哩），共计八四〇哩。工程方面被发现将有相当大的困难，以致对估价不得不作一番修正；因此，在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三日又签订了一项补充合同，^①将借款总数增加到美金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又据第三款规定，“故声明，即以此续约作为按美国通例之抵押据”，以铁路用作借款的“初次抵押”。这条铁路除有抵押关系外应是中国的财产；并且据规定（第十七款），合同中的利益“准美国公司之接办人或代办人一律享受，但美国人不能将此合同转与他国及他国之人”。

二十五 中国用英国借款赎回京汉路

如果中国人渴望那条由北京经汉口到广州的伟大的中央铁路不要全线都落到比利时人的控制之下，那么，以其它国家利益为背景的比利时人，其渴望取得那项控制权的殷切，也不稍减。在一八九九年，外交颇形活跃，中国却越来越畏怯，也不大给与合同以文援，但是美国人终于获得胜利，补充合同经双方签字了。随后，又发生了进一步的麻烦：中国因义和团运动而陷入混乱状态；英国的金融市场因南非战争而封闭了；喀尔文·巴时的逝世也使得美国资本家们不愿意再在目前已经失去了他的支持的一项事业中去冒险。这是比利时人的机会，他们不声不响地就取得了美华合兴公司中的大多数股权；在一九〇三年年底，他们选出他们的被提名人惠铁尔将军（General Whittier）为公司的总经理。中国根据补充合同第十七款的规定提出抗议，该款明文禁止这样一种管理权的转让；但是美国政府则坚持着这个问题的法律观点而认为公司依然是

^① 原文载柔克义，“条约汇编”，第二五九页。

“地道的一个美国公司”。^①中国对于这种违约行为非常愤怒，并且因为对于比利时的要求作最有力的支持的俄国屡次败北（译者按：指日、俄战争时）而强硬起来，便正式通知取消合同。^②美国国务卿提出抗议，并且在几天之内就能够作出声明说：“美国各业主……已经重新取得全部股份中真正大多数股份的完全所有权的控制……这种控制，事实上始终就没有完全离开他们的手掌。”^③这并没有解决问题，主要是“因为广东、湖南和湖北三省士绅激烈反对”；^④并且为这项事业去筹措资金的困难依然存在。于是双方议定以“六、七五〇、〇〇〇元（美金）将租让权和铁路卖给中国政府”；^⑤这项办法得到了两国政府的同意，^⑥中国方面为筹措一部分的款项，从香港殖民政府借得英金一、一〇〇、〇〇〇镑，利息四厘半。广东省境内的南段，从那时起就已经由广东人“进行建造”，而北段却在一九一一年委托给四国银行团兴筑。

二十六 英国政府对于有关铁路的各项 要求所持的态度

在军事国家之中，俄国、德国和法国分别在满洲、山东和南方三省要求发展铁路的权利，都已经获得成功，并且还各保有排斥其

① 海约翰(John Hay)致梁诚函，一九〇四年五月十一日，“美国外交关系”，第二七八页。

② 梁诚致海约翰函，一九〇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同上，一九〇五年，第一二四页。

③ 海约翰致梁诚函，一九〇五年一月六日，同上，第一二八页。

④ 库理治(Coolidge)代办致海约翰函，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同上，第一二九页。

⑤ 代理国务卿卢米斯(Loomis)致驻北京公使柔克义函，一九〇五年六月八日，同上，第一三二页。

⑥ 梁诚致卢米斯函，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卢米斯致梁诚函，八月二十九日，同上，第一三四页。

它国家的权利；至于日本也曾經对福建提出同样的要求。在商业国家之中，美国曾經得到一件它无法履行的合同，英国資本則正要获得其它的讓与权利；但是美国和英国都以維持“門戶开放”政策为它們的主要任务，所不同的是美国主张以这项原則适用于整个中国，而英国則承認其它国家在滿洲以及在山东、福建、广东（指西部而言）、广西和云南各省份的优先权利。一系列不得割讓給它国的声明将在別处提到。①关于由山海关②往东的那一条鉄路的爭执已經反映出英、俄两国确有締結某种协定的必要，于是在一八九九年四月双方議定英国将不在中国长城以北寻求筑路的讓与权，也不阻碍俄国在那里的要求，同时俄国将不在揚子江流域寻求筑路的讓与权，也不阻碍英国在那里的要求；又議定山海关鉄路連同它的各段直接延长綫，是一条中国的鉄路，不得抵押或轉讓給一个非中国的公司。③这是一个“互作讓步”的事例。一年以前，当英国攫取海軍基地而夺得威海卫的时候，英国政府曾經自动发表一项声明：“英国正式向德国宣布，它的占据威海卫，并无損害或爭夺德国在山东省的权利和其它利益的企图。……英国将不建造从威海卫通往山东內地的任何鉄路，則更不待言。”④又在这項声明之前，当“胶澳租界条約”的談判正在进行中的时候，薩里貝利勛爵曾經声明过：“英国政府为山东省境內的英国工程师要求平等待遇；”又說：“对德国作任何专有特权的讓与，必遭遇我方的反对。”⑤

① 参看第五章第二十四节。

② 参看本章第十五节。

③ 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斯柯特爵士 (Sir C. Scott) 和木里斐岳福伯爵 (Count Mouravieff) 間的交換照会，載柔克义，“条約汇編”，第一八三頁。

④ “国家公报”，柏林，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同上，第一八〇頁；“中国，第一号”，一八九八年，第二七頁。

⑤ 薩里貝利勛爵致贊納乐爵士函，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八日、十五日，“中国，第一号”，一八九八年，第三、七頁。

二十七 揚子江流域的英国各鐵路

抱自由貿易政策的英国就这样被接連几次慷慨的讓步所引导，承認了在各自发展范围内主张保护貿易原則的其它各国的最大限度的要求，而本身則只落得在揚子江流域的鐵路发展方面，享有依照自由貿易的方式同俄国以外的其它一切国家相与竞争的这项权利而已。在这流域内第一件英国的合同是由英中公司获得的，拟建造一条从上海經苏州和鎮江到达南京的鐵路。初步协定是在一八九八年五月十三日簽訂的，但是它的履行，始則因南非战争，后又因义和团运动，而被耽擱下来；在恢复平靜之后，最后的合同在一九〇三年七月九日签字。^① 根据这项合同，借款以五十年为期，金額为三、二五〇、〇〇〇鎊，利息五厘，本金按九折委由公司发行，但第二次发行的六五〇、〇〇〇鎊，实际上却是按九·五五折。^② 建筑工程和行車事宜由一个总管理处掌管，总管理处有委員五名——中国人两名，英国人两名和（英籍）总工程师一名。鐵路和设备应一并作为借款的抵押品；公司应拨付一、〇〇〇、〇〇〇两（一二五、〇〇〇英鎊）給中国人已經建成的淞滬鐵路。这条路长計二一〇哩，在一九〇八年竣工，从那时起，管理权就已經交到一个中国总办的手里了。^③ 一八九八年八月，这家英中公司得到了修筑一条由苏州經杭州到宁波的鐵路和一条由浦口到信阳州（京汉鐵路上的一个交叉点）的鐵路的讓与权，以作为“中国政府在京汉鐵路事件上失信”而提供的酬答。由于省方的反对，这两項工程的实施并没有委托給英中公司，但是在一九〇八年，这家公司曾經为前一条鐵路承办了一笔一、五〇〇、〇〇〇鎊，利息五厘的借

① 原文載柔克义，“条約汇编”，第二八一頁及以下各頁。

② 肯特，“中国的鐵路投資”，第一三六頁。

③ 拉波萊，“中国的鐵路”，第二三四頁。

款；至于后一条铁路则已经搁浅了。

二十八 河南的英国铁路：被中国贖回

山西省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产煤区之一，此外它还有大量铁矿的蕴藏。在一八九六年，代理牧师职务的安吉罗·陆采提(Angelo Luzatti)曾经对这个产煤区作过一番研究，因而在一八九七年他就提倡组织一个公司进行开采，名称叫福公司(Peking Syndicate)，虽为英、意合办，但是资本却是英国的。在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这家公司和山西商务局签订一项合同，^① 给予该公司以“专办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与平阳府属煤、铁以及他处煤油各矿”，为期六十年；矿税应为总收入的百分之五，然后以百分之六发付投资的利息，再以净利的百分之十作为偿债的基金，在所余的净利中提百分之二十五缴给中国政府，百分之七十五拨给公司。另据(第十七款)议定，公司得用“自有资金，筑路造桥，开挖河道，或修筑与干线或水道相联接的铁路支线”(译者注：以上照英文逐译，按中文原本合同第十七条为：“应准福公司禀明巡抚，由矿地建造铁路，接至干线，或即逕达水口”)，以运输煤铁。在一八九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它和河南巡抚特准的一个人员签订一件类似的合同，给予在“豫省怀庆左右、黄河以北诸山各矿”以同样开矿筑路权。^② 这两件合同于一八九八年五月十七日奉旨批准；^③ 各准利用外国资本以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两为限。于是该公司便以筹集的一、五二〇、〇〇〇镑的资本来进行开矿，并建造一条起自卫河上的駁船渡口道河镇的铁路。义和团运动耽搁了这项工程，但是在一九〇二年工程重新开始，在一九〇五年修筑到清化，计长九十哩。中国方面后来决

① 原文载柔克义，“条约汇编”，第三〇五页。

② 同上，第三二〇页。

③ 载“道清铁路借款合同”第一款。

定收买福公司在铁路方面的权利，在一九〇五年七月三日签订了两个合同。根据合同，福公司承借一笔利息五厘、按九折发行、为期三十年的七〇〇、〇〇〇镑的借款，并按照六一四、六〇〇镑的价格将铁路售出收现；借款的担保品即为铁路，借款未还清前，铁路由该公司管理。^①至于将铁路再延长三十五哩，直到山西的泽州，则是政府的意思。

二十九 中国境内的其他铁路

其它铁路也都着手兴造，关于这些铁路，一言以蔽之，每一条都表现出中国政府所受到的一些外交压力。

(甲)连接山西省会和京汉路一个车站的正太铁路。在一八九八年，山西商务局为兴建这条铁路曾经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了一项协定，后来又在一九〇二年缔结固定合同加以补充，^②借款为四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为期三十年，利息五厘，按九折发行，由帝国政府担保，以运输收入为抵押。合同后来转让给一个法国公司。这条轨幅一公尺的铁路，计长一五一哩，在一九〇七年竣工。

(乙)同黄河平行的由开封府经河南府到西安府的铁路。一八九九年，中国方面为兴建计长一一五哩的由开封府到河南府的一段铁路，曾同法、比银团铁路电车公司 (La Compagnie Générale des Chemins de Fer et Tramways en Chine) 签订一项协定，随后又于一九〇三年缔结最后合同。^③根据一九〇三年的合同，借款共计二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后来又根据一九〇七年的合同，续借一六、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利息五厘，按九折发行。这段铁路在一九〇九年竣工。

① 原文载肯特，“中国的铁路投资”，第二三五页及以下各页。

② 原文载柔克义，“条约汇编”，第三〇九页及以下各页；拉波莱，“中国的铁路”，第一二四页。

③ 原文载柔克义，前引，第三八九页；拉波莱，“中国的铁路”，第一五四页。

(丙)香港和廣州間的鐵路交通純然是英國的權益，並且在殖民地地界內的那段長達二十八哩的鐵路，就籌措資金和建筑工程來說，也是英國的事情。從九龍邊界到廣州的那段八十五哩長的鐵路，是由廣州的中國人着手建造的。在一九〇七年三月七日，中國方面和英中公司訂立一項合同，^①借款英金一、五〇〇、〇〇〇鎊，以三十年為期，利息五厘，按九五折發行，以鐵路為抵押，並由中國政府擔保。鐵路經營各事一概由一個總局辦理，總局設“中國總辦一人……佐以英國總工程師及總管帳各一人”。

其它規模較小的鐵路已經由中國人自行承辦，一般都沒有外國的資金援助和中國政府的擔保；但是它們的長度是不足道的。

三十 在滿洲的日本各鐵路

日俄戰爭的結果使俄國在滿洲的鐵路權益大部分轉讓給日本。俄國保留從滿洲里到綏芬河的西伯利亞鐵路的全部干綫，計長九五〇哩；在從哈爾濱到大連灣的南北路綫中，它保留了直到寬城子的一三二哩長的北段，從那個地點往南的五一四哩長的鐵路却讓給了日本。此外，日本在一九〇五年更和中國議定，得由日本自籌款項，建築一條從奉天通往朝鮮邊境上的安東計長一八九哩的鐵路，另一條從新民府到奉天計長四十八哩的鐵路，以及一條從寬城子到吉林計長七十五哩的鐵路；後兩條鐵路的建造費用由中國籌措，但由日本籌借半數。^②日本曾經按五厘的利息，借給中國三三、三〇〇鎊，修建新民府到奉天的鐵路，又借二二五、〇〇〇鎊，修建寬城子到吉林的鐵路；為興建它在滿洲的其它鐵路，日本在一九〇六年設立了南滿洲鐵路株式會社，資本為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① 原文載肯特，“中國的鐵路投資”，第二八七頁；拉波萊，“中國的鐵路”，第二八八頁。

^② 草約摘要，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合同，一九〇七年四月十五日；載拉波萊，前引，第六九、七三頁。

日元(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鎊),^①其中半数由日本政府撥給,另外有四、〇〇〇、〇〇〇鎊則是用一九〇六年在倫敦發行的三十五年期的五厘債券籌募的。

三十一 四國銀行團的組成

四川是英、法逐鹿之場;後者希望從東京,前者希望從緬甸以貫穿雲南的鐵路打開貿易之門;英國將會借沿揚子江航路的貿易聯運而受到裨益。一九〇五年有一家英、法銀團,華中鐵路公司^②組織成立,專為承辦揚子江流域的鐵路;美國金融集團曾經被邀合作,但是當時它們不肯同意。一九〇九年,德國銀團由於北京方面的外交勢力,獲得了一種強有力的地位,因而被容許加入而組成了三國銀行團;同年,一個美國集團也要求參加。一九一〇年五月,在巴黎舉行會議,簽訂了一項協定,將包括川漢鐵路和粵漢鐵路在內的湖廣鐵路平均分配給“四國銀行團”里的各成員,其中計有代表英國的匯豐銀行,代表德國的德華銀行,代表法國的東方匯理銀行(Banque de l'Indo-Chine),和美國集團(由紐約的摩根公司[J. P. Morgan & Co.],昆洛公司[Messrs. Kuhn, Loeb & Co.],第一國立銀行[The First National Bank],和花旗銀行[The National City Bank]組成)。此處我們可以提到的是,四國銀行團宣稱為了中國的利益,保有承辦中國政府為了各項用途而舉借的一切借款的獨占權利;並且為了這種作用,四國銀行團因俄、日兩國的要求參加而成為六國銀行團;並且在一九一三年三月威爾遜總統(President Wilson)就任時,因美國集團喪失了官方“金元外交”的支持,而變為五國銀行團。

① 公司條款載拉波萊,“中國的鐵路”,第五二頁。

② 參看本章第二十二節。

三十二 湖广铁路由四国银行团承办

(中国铁路一览表见附录2)

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十日，四国银行团和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签订了一件湖广铁路合同。^① 合同中订明，目前筹借六、〇〇〇、〇〇〇镑，按五厘计息，以后再筹借四、〇〇〇、〇〇〇镑（见第十五款），统在四十年内还清，以营业收入和（第九款）湖广两省（湖北和湖南）的某些盐、厘税为抵押，并（第四款）由中国政府担保。目前的借款是为了提供一笔资本：

（一）为赎回美华合兴公司代理大清政府发售的金圆债票，计美金二、二二二、〇〇〇元之用。

（二）为建造粤汉铁路的湖北至湖南段（估计长九〇〇公里〔五五九哩〕）之用。

（三）为建造一条计长六〇〇公里（三七三哩）的由广水经襄阳府和荆門州到宜昌的铁路以及一条计长三〇〇公里（一八六哩）的宜昌到夔州府的铁路之用。

这几条铁路的“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之权，全归大清政府独自办理”（第十七款）；为了这项建造工程，大清政府自行聘用英国人一名作为湖南南境宜章县到汉口段的工程师，德国人一名作为广水—宜昌段的工程师，美国人一名作为宜昌—夔州府段的工程师；再者，所有应用材料应尽量采用中国货。四家银行（第二十二款）“均分承办，惟彼此均无互相担保之责”。另外有汉口到荆門州的一段铁路并不在合同范围之内，而是委由一家用中国资本的中国公司承办的。至于将铁路延长到四川境内，则有待另一件合同的订定。中国境内的铁路一览表见附录2。

^① 原文载拉波莱，“中国的铁路”，第二一〇页。

第五章 中国面临瓜分

一	中国变更它的外交原则	109
二	一八九六年李鸿章出使西方列强	109
三	李鸿章出使的公开承认的目的	110
四	中俄秘密协定	111
五	俄国控制朝鲜; 继而撤退(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年)	112
六	德国教士在山东省被戕害(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	113
七	十一月十四日胶州被占领; 赔偿要求	114
八	德国剑拔弩张和耀武扬威的态度	115
九	割胶州湾为租借地; 德国在山东省的各种特权	116
十	宣布青岛为中国海关管辖下的自由港	117
十一	各方对德国的举动所持的意见	118
十二	俄国获得旅顺口和大连湾的租借权 (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119
十三	四月十一日法国获得广州湾的租让	120
十四	英国对于德国的要求所提的强硬抗议	121
十五	英国撤销反对意见	122
十六	一八九八年一月八日英国向中国建议一千二百万 镑的借款	122
十七	法、俄两国反对英国借款	123
十八	俄国抗议英国船只停泊旅顺口	124
十九	二月三日中国在恫吓下拒绝英国借款	125
二十	英国无法阻止旅顺口的租让	125
二十一	英国获得威海卫的租让	126
二十二	英国给予德国以自制的保证	127
二十三	英国取得香港界址的扩充	128

二十四	“領土不割讓”的各項聲明	128
二十五	這些聲明的限制	129
二十六	管理海關和郵政的各項聲明	130
二十七	上海外國租界的擴充	131
二十八	英國得到的補償	132
二十九	一八九九年意大利要求割讓三門灣；被拒絕	133
三十	美國由於在開發中國問題上被排斥在外表現 驚慌	134
三十一	一八九九年海約翰主張對貿易實行門戶開放 政策	135
三十二	中國屈辱未到止境	136

一 中國變更它的外交原則

對日本的戰爭使中國處處低頭——“中國這個氣泡已經爆破了”^①——而日本已經擁有和歐洲列強處於平等地位的权利。可是中國的統治者們並沒有從失敗中得到教訓，他們隨後的行動只表現出兩種政策：第一，他們必須籌措一筆巨額款項來支付帝國被迫承擔的賠款；第二，他們必須重新考慮他們和西方國家的外交關係，並且必須更加倚靠俄、法、德這三個干涉國。他們沒有改革計劃，沒有發展國內資源的計劃，也沒有使帝國自力更生的計劃；他們還是一味地認定將中國從它本身積弱的後果中拯救出來乃是西方列強的責任，商業國家既然使它失望，那個責任現在只好落到軍事國家的身上。

二 一八九六年李鴻章出使西方列強

為慶祝一八九六年六月二日（新曆）在莫斯科舉行的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禮，中國被邀派遣一位近支王公代表參加，但是李鴻章

^① 社論，“北華捷報”，一八九六年一月三日。

却奉派为致贺沙皇的钦差头等出使大臣。中国的这位重要政治家和最强有力的行政官的任命，欣然为俄国所接受，于是他在三月八日偕同李经方、罗丰祿、馬建忠和随員多人，从北京启程。他也要訪問其它各国的首都，并且特別委派了几个海关稅务司充任使节的參贊，以作他的顧問——在俄国是柯乐德 (Victor von Grot)，在德国是德瑾琳，在法国是穆意索 (A. M. de Bernières)，在英国是赫德 (James H. Hart)，在美国是杜德維 (E. B. Drew)。这位大使从上海搭法国邮船公司的輪船启程，在香港沒有上岸，据称是由于他年老体衰，他想避免宴会和广东官員的拜会 (否則会有无数次的)，并且他极想躲避新嘉坡的检疫，因为香港正流行着鼠疫。①他曾經在西貢登岸，并且受到法国当局一次“堂皇的招待”；②他在新嘉坡也受到适当的接待。俄国的一艘义勇巡洋艦将他从塞得港 (Port Said) 接到奥德薩 (Odessa)；他在四月二十七日到达，并且受到一次“隆盛的招待”。他在俄国一直勾留到六月二日加冕典禮之后。从那里，他前往柏林 (六月十四日)，在柏林他受到一次“隆盛的招待”；七月五日抵海牙，七月十三日抵巴黎，他受过一次“热烈的欢迎”；八月三日抵伦敦，他只受到“简单的接待”。他从那里再前往华盛顿，八月二十八日抵紐約，他和美国人民的关系是以这位钦差方面的无礼挑剔和他所遇到的新聞記者及著名人士方面的仰慕心情与戏謔嘲弄相互交織为特色的。他从溫哥华 (Vancouver) 橫渡太平洋返回中国。

三 李鴻章出使的公开承認的目的

从各国首都接連发出的新聞报道中，表示出人們所揣想的李鴻章出使的目的，据称，“官員和制造商們对于李大人沒有留下軍

① 香港电，社論，“北华捷报”，一八九六年四月二日。

② 所引下的形容詞都是“北华捷报”轉載路透电的原用語。

火或鉄路的定貨单一事，深感失望。”出使的公开承認的目的在这位欽差奉到的訓令中有所表明：

“一、代表中国皇帝参加沙皇加冕典礼。

“二、为俄、德、法出面干涉，因而收回辽东，向它們正式道謝。

“三、向維多利亞女王和美国总统递送問候信。

“四、向西方列强呼吁修訂关税稅則。”^①

在这些目的之中，唯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項。不經各条約國中每一个国家，即使是最小的一个国家的同意，中国就无法修改它的稅則。这个稅則是在一八五八年按照那个时期市价百分之五的征課所确定的从量稅訂定的；在这期間，价值标准已經有变动，由于銀价跌落的关系，^② 国庫在許多重要商品上所收得的关税只有百分之二、三，而不是百分之五。中国建議仍按照一八五八年的稅率征收，但是照黄金而不照白銀計算，以作为一种临时办法。^③ 俄国同意；德国虽不是不愿意，但是要等待英国的决定；法国交由它的駐北京公使去决定；^④ 英国是同情的，可是“却要問一問，对中国本身的好处是什么”。^⑤ 美国政府在原則上接受“改善中国稅收”的建議。虽然有了这种絕对的或是附有条件的一般的同意，接下去却没有行动，关税稅則依然沒有改变。

四 中俄秘密协定

李鴻章出使的真正目的当时并没有公开，并且从来也沒有被

① 一八九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伦敦每日新聞”(London Daily News)所載通訊，一般人相信是由德璣琳投寄的。

② 参看本书第二卷，第十九章第十八、第十九节。

③ “現在送去的改按英鎊計征的秘密备忘录，应尽快印妥，俾李(鴻章)氏隨身带去。”——赫德致葛显礼函，一八九六年三月十九日。

④ 这就是說內中含有生絲出口稅不得增加的意思。

⑤ 德璣琳的通信，同前引。

承認过。俄国在北京的影响比誰都大，^① 因为認識到这种情形，所以中国政府訓令它的欽差大臣尽可能爭到最有利的条件。中国被迫承担的条件是十分苛刻的；这些条件的初次披露是在一八九六年春季，^② 再度披露是在六个月以后；^③ 它們的可靠性如何，人們議論紛紛，但是在二年以后，当披露的大部分条款已經見諸实施的时候，披露这些条款的那家报纸觉得他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提醒讀者們一句話，事实上，“我們这样告訴过你們的。”^④ 当时北京和莫斯科所締結的协定，除铁路条款以外，^⑤ 規定俄国人和中国人应在滿洲享有同等的采矿权；应由俄国軍官組織和訓練中国軍隊；接下去便是：

“九、为給予俄国一个不冻港，中国以胶州租借与俄国十五年，但是目前暫緩借用。

“十、中国将在旅順口和大連灣建筑适当的防禦工事，俄国将援助并愿担保中国保有这两处地方。

“十一、若非軍务紧急，則旅順口、大連灣两处地方統归中国自行管理，与俄国无涉。

“十二、九至十一款应保守秘密。”

五 俄国控制朝鮮；繼而撤退（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年）

当俄国正在这样地巩固它在中国，特别是在滿洲的优越势力时，它却同时向外伸张，建立它对朝鮮的支配力量；^⑥ 在随后两年中，在一八九六和一八九七年，凭着外交和暗中以武力为威胁的錯綜

① 北京电，載“北华捷报”，一八九六年三月十三日。

② 同上，一八九六年三月六日。

③ 同上，一八九六年十月三十日。

④ 同上，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⑤ 参看第四章第十二至第十五节。

⑥ 参看“北华捷报”，一八九六年四月二日。

关系，它在这个新近宣布独立的王国里，取得了一个极有势力的地位。中国海关的柏卓安（John McLeavy Brown）在中、日战争过程中和在朝鲜独立以后，一直保持住他的职位，继续担任朝鲜国王的财政顾问和朝鲜海关的主持人；但是在一八九七年年末，他终于被解职，这两项职务都由一位俄国人名叫亚历山叶夫（Alexei-eff）的来代替。^① 这是政府各部门作出许多影响深远的变动的征兆——“我们看到一个英国人为了让出地位给一个俄国人而被排挤出财政部，看到由俄国军官指挥朝鲜军队，由俄国军官掌管兵工厂，由同时充任俄国副领事的俄国人担任海关税务司，以及由一个亲俄的朝鲜人担任外相。”^② 俄国已经如愿以偿，已经公然将日本从朝鲜事务的管理中驱逐出去；但是它的箭射得太晚了。英国过于关心胶州和旅顺口等问题而无暇干涉，所以除由英国公使向北京和汉城的朝廷提出一件正式抗议外，并没有采取任何直接行动；美国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利害关系；而法国和德国却是俄国的友邦。但是这时俄国更关心于保持它在中国的地位，因此为避免分散力量起见，就从在朝鲜已经猎取到的地位撤退，并且召还所有的官员。^③ 柏卓安于是又恢复了他从前的职权。在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东京签订了一个条约，根据这项条约，俄国明文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商业利益。^④

六 德国教士在山东省被戕害（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

对于辽东的归还，中国显然应该给三个干涉国以酬报；其中第

① 参看“北华捷报”，一八九八年一月七日。

② 同上，一八九八年二月七日。

③ 朝鲜外务卿致斯皮瓦（俄国公使）函，三月七日；斯皮瓦致朝鲜外务卿函，三月十七日；载“汉城独立报”（Seoul Independent），三月十九日，转载于“北华捷报”，一八九八年四月十一日。

④ 原文载柔克义，“条约汇编”，第四三三页。

一个得到酬报的就是德国。德国在一八九七年春季，就已经将它想要在中国取得一个海军基地的意思，通知俄国、奥国和意大利；^①在次年夏季和秋季又不断地传出它的军舰在福建、浙江和山东沿海一带勘查的消息。^②最后，期待的“机会和借口”^③是找到了：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一个天主教会的两名德国教士 尼斯 (Franz Nies) 和休尔 (Richard Heule) 在山东西南角曹州府巨野县贾庄被杀害。杀害是洗劫全村的土匪们干的事；中国当局立刻采取行动，并且臬台也赶往肇事地点进行审讯。^④ 凌辱和杀害外国教士事件的频繁已经成为前一年，即一八九六年的特色。^⑤ 在一八九七年六月，人们非常担心天津会有骚动，并且一八七〇年的拐骗幼儿的谣言会得复活；这正是临近法国新教堂六月二十一日开堂式的时候，这座新堂是代替一八七〇年被毁去的那座教堂而重建的，是法国公使施阿兰 (Gerard) “想要重振法国声威”而极力促成的。^⑥ 外国教士迫切需要保护，甚至连美国政府在一八九六年都通知中国说，“设法更进一步防范这类加诸教士们的令人痛心的暴行问题，正在本政府郑重考虑之中。”^⑦

七 十一月十四日胶州被占领；赔偿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信任德国是有意在中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面前显示出一个强大的军事国为了出面保护它的在外国地方从事于合法职业的那些臣民时所持的态度的；但是它所采取的

① 柏林通信，“伦敦标准报”(London Standard)，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② 散见中国各报。

③ 参看本书第二卷，第十七章，第三、第五节。

④ 济南府电，十一月十日，“北华捷报”，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⑤ 参看第二章，第三十六节。

⑥ 天津通讯载“北华捷报”，一八九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⑦ 参看第二章，第三十六节。

措施却远远超过这个宗旨了。德国已经准备有所行动，因此它就立刻行动起来。在十一月十四日，也就是杀害案发生后的第十三天，得到消息后的第四天，一小股德国军队驱走了在胶州湾头的一个港口——青岛的中国守军，夺取了炮台，占领了港口。中国是屈辱备至了，^①它的那种一筹莫展的情形也暴露无遗；于是德国抓住了它的机会。很久以来，德国就一直要求中国给予一个海军基地，这时德国报纸立刻鼓噪起来，力促政府永久占领胶州湾。^②政府并不是不情愿的，就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提出下列要求：^③

“一、建立御赐匾额，纪念被害的德国教士。

“二、给他们的家属以赔偿（最后定为每一个教士三、〇〇〇两，三个教堂的重建费各六六、〇〇〇两）。

“三、李秉衡（交卸的山东巡抚，新选而未到任的四川总督）革职，永不叙用。

“四、偿还青岛的占领费。

“五、给德国以在山东建造铁路和开采煤矿的独占权。

“六、以胶州军港给予德国。”

八 德国剑拔弩张和耀武扬威的态度

中国的大臣们因青岛炮台被夺而“大为不安”，^④但是他们摆出了一条大胆的外交战线。第一和第二两项要求被接受了，对于第三项要求却踌躇不决，但是上谕禁止李秉衡在教士戕杀案解决

^① “由于被从前为人所看不起日本人轻易战胜而加给中国的屈辱，中国现在的地位是更加屈辱了。一个外国用三只船和六百个人就毫无困难地侵入一个拥有三亿人口的国家……并且在距京城不到三五〇哩的地方，不遭抵抗而盘踞下来。”——社论，“北华捷报”，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三日。

^② 伦敦电，十一月十七日，同上，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③ 北京电，十一月二十九日，同上，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三日；霍纳乐爵士致萨里贝利勋爵函，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号”，一八九八年，第二页。

^④ 北京电，十一月二十日，同上，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以前离开山东任所；第四、第五和第六三項要求被拒絕。德国屹然不动。在十二月一日德意志帝国国会开幕的时候，德皇声言德国海軍力量不充实；德国虽不想和其它国家竞争，但是它的艦队的規模，必須能够維持帝国在海外的威望；于是在十二月五日提出海軍預算案。船艦、人員和野战炮的增援立刻在德皇的兄弟、海軍大将普魯士显理亲王 (Prince Heinrich of Prussia) 的統率下，奉命駛出。德意志精神的主旨，在十二月十八日汉堡举行的欢送海軍大将的宴会上已經布露无遺。德皇在致詞中說道：

“我自知：伸张和扩大先皇所传留給我的一切，是我的責任。……愿每一个在那辽远地带的人都能知道，德国的天使长已經把德国鷹徽的盾牌牢固地树立在中国的土地上，以便永远給予一切要求保护的人以保护。……如果有人试图毀損我們的正当权利或是伤害我們，那么就起来，以武力对付他。”

海軍大将在答詞中，也持同样的論調：

“最庄严的皇帝，最伟大的国王和君主，威名赫赫的兄长……有一件事，我可以向陛下保証，声名和荣誉都引誘不了我。我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在外国土地上宣布陛下神圣之身的福音，把它传布給每一个愿意听的人，也传布給那些不愿意听的人。……最庄严、最伟大和敬爱的皇帝，国王和君主啊，讓这种呐喊的声浪迴蕩于全世界，以至于永远。”^①

九 割胶州灣为租借地；德国在山东省的各种特权

中国已經学会了依靠西方列强的互相猜忌，使它得以摆脱其中一国所提出的令人头痛的要求。在这次危机中，俄国虽然对于胶州有过要求，但是別有其它用心；法国已經发生了德雷福案件

^① 原文引自“伦敦观察家”(London Spectator)，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Dreyfus case), 并且(在次年九月)正要发生法紹达事件(Fashoda affairs), 何况还答应过要支持德国的要求; 英国已經开始听到南非暴动的风声; 美国已經为古巴担着心; 中国虽然有了两年的时光, 可是改革行政和改組軍隊的事, 却是一无成就, 現在只有独力应付这种威胁性的进攻了。面对着德国那种坚定不移的态度, 中国早在一月間就节节讓步, 最后一次行动是在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 在北京簽訂了一个条約, ① 根据这个条約, 中国答应了德国最后的一项要求。根据这点, 中国允将胶州湾入口处两岸“租与德国, 暫以九十九年为限”(pachtweise, vorläufig^② auf 99 Jahre), 其中包括青島和一切島屿, 以及湾內的海面; 在离胶州湾海岸五十公里的界限內, 中国仍保有主权, 但准許德国軍隊自由通行, 当地行政事宜, 应事先和德国商定; 中国海关在五十公里范围內执行职务, 应受保障; “嗣后如德国租期未滿之前, 自愿将胶州湾归还中国, 德国所有在胶澳費項, 中国应許賠还, 另将較此适宜之处讓与德国; 德国向中国所租之地, 德国应許永远不轉租与別国”。中国許給德国以在山东省兴建铁路和开采矿山之权, ③ 并且“在山东省內, 如有开办各項事务, 商定向外国招集帮助为由, 或用外国人民, 或用外国資本, 或用外国物料, 中国应允先問德国商人等愿否承办工程, 售卖物料”。

十 宣布青島为中国海关管轄下的自由港

在一方面德国当局表現出了他們的智慧。为調和西方国家的意見, 他們宣布有意开辟青島为自由港 (Freihafen), 虽則这项宣言經首相于二月八日在德国国会发表的下述声明中予以限制: “虽然在胶州(青島)建立一个自由港^④ 是最符合德国的利益的, 可是

① “条約汇編”, 卷二, 第九四四頁; 柔克义, “条約汇編”, 第四五頁。

② 中文本中有一个字含有“先”的意思。

③ 參看第四章第二十至第二十二节。

④ 在內地, 位于五十公里的中立区內, 远离灣头的胶州城, 仍归中国管轄; 德国的港口和行政中心則在灣口的青島。

我不應該事前束縛我自己，特別是就对各外国的关系而言。”最后，按照赫德和德国公使在一八九九年四月十七日及一九〇九年十二月一日所簽訂的两項協議；中国海关行政机构不但不被移出界外，設在中国領土上，而且被邀請进入无稅区域，設立在青島。根据这两項协定，港口、船塢和制造业区域划为一个保稅区域；进入这个区域的貨物一律免稅；凡是从这个区域运往中国領土的进口貨和从这个地区装船出口的山东土貨，一律照征中国海关正稅；作为交换条件的是，青島享有中国通商口岸的特权，中国以海路进口貨稅收淨額的五分之一給付德国行政机关。^① 这个自由港在鐵路輔助之下，繁荣起来，^② 但是它的繁荣是基于一种英国式的自由貿易政策，而不是基于在德国領土中各处所采取的政策。

十一 各方对德国的举动所持的意見

中国已經答应对于德国参与干涉辽东將給以酬报，这种酬报可能采取租讓一个海軍基地的方式是人所共知的。这项租讓本来可以用对北京施加普通外交压力的方法取得，中国人將抵挡不住这种压力；但是德国故意要用一种大张旗鼓的方式，不惜恼怒和侮辱中国的統治者与人民以提出它的要求。一种穩健的評論曾經宣布說，“我們并不打算对于国际道义問題展开无味之爭，但是我們認為德国的办法背离了国际慣例。”^③ 即将簽訂割地条約的李鴻章曾經声称，“德国的占領胶州构成了公然违反条約和国际公法的行为。”^④ 在五月十八日业經恢复友好关系之后，皇帝在頤和园以皇

① 原文載“条約汇编”，卷二，第九五一、九五七頁。

② 統計数字見第四章第二十节。

③ “远东”，一八九七年十二月，載“北华捷报”，一八九八年一月七日。

④ 高第，“中国与列强关系史”，卷三，第三五三頁。

室礼遇接見显理亲王；对于这项双方在表面上都很友好的举动，中国方面的評論是：“其来也不速，其去也不悲。”^①一位史学家曾經說过，“义和团运动之所以发生和西太后之所以給予支持，我們虽不能說胶州事件的处理方法是唯一的原因，然而却應該說是主要的原因。”^②汉堡致詞的精神被貫徹到在中国的行动中，并且在那里对帝国的人民和統治者們产生出最恶劣的影响；在德国的一切要求还都沒有被允准之前，“日本官方的一般看法就認為，事情作得这样迫不及待是毫无必要的，而且由一个西方国家长期占領，甚或永久占領这样一个重要的軍略据点，势必危及远东和平”。^③

十二 俄国获得旅順口和大連灣的租借权

(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俄国曾經認定胶州是它的囊中物，暂时却在旅順口“享受款待”。^④它只能經由蒙古和直隶从陆路通往胶州，而且它已經保証过，要支持干涉行动中的伙伴所提出的要求；因此它迅速把注意力轉移到旅順口，这是它自認為是它的势力范围的海岸上的一个不冻港。在德国突入青島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俄国軍艦就开抵旅順口，并且由中国政府按照事先存在的条約，^⑤允准它們在那里过冬。俄国已經准备侵吞这个港口，中国无法作任何抵抗；^⑥于是它的命运就被先后于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和五月七日在

① “北华捷报”，一八九八年六月六日。

② 高第，“中国与列强关系史”，卷三，第三五六頁。

③ 薩道义爵士 (Sir E. Satow) 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东京，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一日，“中国，第一号”，一八九八年，第一二頁。

中国絕无收回失地的可能；但是在欧战爆发后，日本軍队在英国分遣队的协助下，围攻青島，并且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七日占領該地，連同它的堡垒、船只和要塞。日本宣布了战后在日、中商定的条件下將該地归还中国的意向。

④ 參看本章第四节。

⑤ “北华捷报”，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八九八年二月七日。

⑥ “据北京方面的消息，軍机处为答复紛紛的抗議，已經通知各省督撫說，中国无法阻止外傳俄国夺取旅順口的意图。”——同上，一八九八年一月十四日。

圣彼得堡签字的两个条约给决定了。^① 这两个条约允将旅顺口和大連灣，連同邻近的海面和島屿，以及东至貔子窝、西至普兰店以南的辽东半島租与俄国，惟对“中国帝权不得稍有損碍”；租期定为二十五年，“惟滿期之后，应准由两国会商斟酌續租”；在租界以北約六十哩划定一个中立地带，归由中国管理，但是禁止中国軍隊进入西起金州河口，往东到大洋河，再往南到大洋河口大孤山的一带地方；辟旅顺口为軍港，只准中、俄两国船只停泊，但是辟大連灣〔此后更名为达尔尼(Dalny)]为貿易港，准各国商船往来；准俄国建造铁路，連絡这两个港口和〔哈尔滨〕，但承認中国有从山海关向东修筑铁路的权利；并訂明不得将中立地带中的开矿和其它特权讓給俄国以外的任何外人。依照这两个条约，中国守軍在三月二十七日撤出这两个港口，俄国軍隊便在次日加以占領。

十三 四月十一日法国获得广州灣的租讓

法国密切注視着这些动作。当时任外交部长的哈乐駝(Hanoaux)在二月間声称，法国“毫沒有意思要做法德国而在中国攫取一个海軍基地”；^② 但是在四月十一日，法国駐北京公使就通知他說，中国已經允許将广州灣連同它的附屬地带租与法国(为期九十九年)，作为海軍基地了。四月二十二日，广州灣升起了法国旗，租借条约^③ 在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七日送呈总理衙門，但是直到一九〇〇年一月五日中国才加以批准，因为这时有两名法国海軍軍官在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广州灣附近被杀害的事件使

① 約文：中文本載“条约汇编”，卷一，第九四、九八頁；俄文本，同上，第一二六、一三〇頁；英文譯本，柔克义，“条约汇编”，第五〇、五三頁；法文譯本，高第，“中国与列强关系史”，卷三，第三六二、三六五頁。

② 伦敦电，二月二十八日，“北华捷报”，一八九八年三月七日。

③ 約文，高第，前引，卷三，第三七〇頁；英譯文，柔克义，“条约汇编”，第五五頁。中国的“条约汇编”中略未备載。參看本书第二卷，第二〇一頁注⑤。

得中国大臣們不得不作此决定。这个条约允将广州湾連同它的内外島屿，以及从北緯二十度五十分到北緯二十一度二十五分的海湾周围大陆上的土地一并租与法国；凡在这个范围以內的地方，允由法国一国管轄；所有各国船只“按照在中国通商各口的办法一律优待办理”；并且中国讓給法国一項鐵路特权。海防的近在咫尺使广州湾除作避风港以外失去一切功用，不过租讓的主要作用乃是使法国国旗又向中国的心脏推进一步。

十四 英国对于德国的要求所提的强硬抗議

英国不愿意看到中国被“瓜分”，而这些接連不断的租讓，却象是“瓜分”的开端；按照它的坚定不渝的对华政策行事，它的愿望就是要保持迄当时为止一直存在着的均等机会。当德国的要求訂定出来的时候，英国公使只知道前五款；^①第六款則是以口头方式，要求中国对于嗣后为保护德国臣民的身体所作的善良行为，給以具体的保証，这一款不是寶納乐爵士不知道，就是被当作一句大家都听得进的安慰之詞了。寶納乐公使奉命劝告中国大臣們立刻接受第一至第四款，不过告訴他們說，英国政府“将会覺得在第五点获得同意的情况下，不能不根据諸条约的最惠国条款，为英国臣民要求平等待遇，并且将对于条约所保障的权利已經遭到忽視的各点提出賠償要求”。^②他后来又奉命声明，“在一八九五年中法条约訂定的时候，英国政府曾經对于讓給別国以专有特权一事，提出異議，因此对于德国作任何这类性质的讓与，也必为[我]方所反对。”^③正是在这个阶段上，中国大臣們告訴英国公使說，“因为还没有任何保証能担保在要求被同意的情形下，胶州一定撤兵，所以

① 參看本章第七节。

② 薩里貝利勋爵致寶納乐爵士函，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三日、十二月八日，“中国，第一号”，一八九八年，第三、七頁。

③ 又函，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同上，第八頁。

談判一直迁延不決，而且德國曾經要求过一个加煤站”；^①但是直到这些要求“实际上全部被同意”的时候，英国公使才明白是要以胶州湾領土的租讓作为“嗣后善良行为的担保的”。^②

十五 英国撤銷反对意見

关于商业問題，薩里貝利勛爵曾經经历了整整的一个星期才向中国，而不是向德国提出了一个强硬抗議；但是在領土租讓問題发生的时候，事情已經超过抗議的限度，除非他准备使用武力才行。这里計有三个問題：領土租讓，鐵路和矿山的开发，以及貿易。对于租讓曾否提出过抗議，无案可稽；对于专有的开发权，並沒有提出进一步的抗議；对于德国政府所作拟将青島对各国貿易一体开放的有关貿易利益問題的声明，經毫无异議地接受。德国首相給与英国的这位外相一項甘言蜜語的保証，据称他无法找到比在采行自由貿易政策下如此繁荣起来的英国各殖民地（諸如香港和新嘉坡）更可效法的一个典型；但是他無論对于英国，或是对于其他各国，都不屑再給以进一步的保証——“德国政府在整个进程中，已經表現得如此忠实，爱好和平和适可而止，所以無論在派遣艦队到胶州去以前或以后，特別声明都是不必要的。”^③

十六 一八九八年一月八日英国向中国建議

一千二百万鎊的借款

在十二月中旬，俄国正同中国大臣們商談一項按四厘計息、九折发行的一六、〇〇〇、〇〇〇鎊借款的建議，这是类似数目的

① 賽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国，第一号”，一八九八年，第八頁。

② 又函，一八九八年一月三日、五日，同上，第一四頁。

③ 首相布罗 (Reichskanzler von Bülow) 在帝国議會預算委員會中的发言，“科隆新聞”(Kölnischer Zeitung)，一月二十五日，見拉塞尔爵士 (Sir F. Lascelles) 致薩里貝利勳爵函，柏林，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同上，第三一頁。

筹募付日賠款的借款的第三笔。第一笔是俄国政府担保的法俄借款，第二笔是由英、德两国銀行会同承办而沒有政府担保的，寶納乐爵士現在建議以第三笔借款归由英国政府直接正式承办。^① 在一月八日，他受权建議这样一笔借款，总额一二、〇〇〇、〇〇〇鎊，即是还清对日賠償所需要的数目，按四厘計算，照票面发行，担保品是洋关和常关稅，盐稅和厘金；并附有下列几項条件：

“一、对充作担保品的稅收的管理权。

“二、从緬甸到揚子江流域的一条鐵路。

“三、不割讓揚子江流域的土地与其它任何外国的保証。

“四、辟大連灣、广西的南宁和湖南的湘潭为通商口岸。

“五、划定通商口岸的免厘区域。”^②

十七 法、俄兩國反对英国借款

法国政府在巴黎宣称它对于一笔由英国政府单独担保的官方借款，表示“反对”，^③ 并且在北京对于开放南宁作为通商口岸和允准从緬甸修建鐵路，提出抗議。^④ 俄国派駐北京的公使，遵照他本国政府的訓令，对于开放位于俄国势力范围以内的大連灣为通商口岸，提出最严重的抗議，并且警告中国大臣們說，他們因这样一种举动会使中国遭受俄国的敌对态度；^⑤ 抗議和警告又都經由木里斐岳福伯爵(Count Muravieff)在圣彼得堡和俄国大使在伦敦重复提出；^⑥ 并且作为一种暗示，在十月开始的那个反对金德尔和

① 寶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号”，一八九八年，第九頁。

② 又函，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薩里貝利勛爵致寶納乐爵士函，一八九八年一月八日；同上，第一一、一六頁。

③ 孟松爵士(Sir E. Monson)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二日，同上，第一七頁。

④ 寶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同上，第二四頁。

⑤ 又函，一八九八年一月十六日，同上，第二一頁。

⑥ 欧格納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薩里貝利勛爵致欧格納爵士函，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九日，同上，第二三、二四頁。

反对英国同满洲发生关系的运动，^① 现在又死灰复燃了。薩里貝利勳爵讓步了，于是在北京抗議之后，但在圣彼得堡和伦敦抗議之前，就从要求中撤銷大連灣一节。^②

十八 俄国抗議英国船只停泊旅順口

俄国現在从另一綫进攻。它已經在十二月二十二日为其艦队取得了在旅順口过冬的許可，同时日本政府接到正式通知說，这种許可只是作为暂时之用的。^③ 英国艦队立刻北駛；二十九日，有七艘船只停泊在一个最难得的过冬港口济物浦，二艘停泊在旅順口。^④ 英国船只的出現于旅順口被指斥为“这样的不友善，致使对英战争的謠言在圣彼得堡方面盛传一时”；^⑤ 并且薩里貝利接得通知說，“俄国极盼維持友好关系，但是希望英国努力避免在俄国势力范围内的摩擦。”薩里貝利答复說，只有“伊菲基內亞号”（Iphegenia）一艘船駐泊旅順口，这是海軍司令根据他的便宜行事权限派到那里去的，将依常例于几天之内离去；同时他辯明“英国船舶有充分权利訪問旅順口和其它中国口岸。”^⑥ “伊菲基內亞号”后依常例离去，中国人却相信它是在俄国威胁下离去的，圣彼得堡所作的官方声明中，也含有这个意味。^⑦ 虽然薩里貝利通知中国大臣們說，“所称海軍司令奉政府命令，将船舶从旅順口撤出云云一节，純粹是捏

① 参看本卷第四章第十五节。

② 薩里貝利勳爵致蜜納乐爵士函，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号”，一八九八年，第二一頁。

③ 薩道义爵士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同上，第一〇頁。

④ 英国海軍司令致海軍部函，济物浦，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同上，第一一頁。

⑤ 欧格納爵士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九日，同上，第二三頁。

⑥ 薩里貝利勳爵致欧格納爵士函，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同上，第二四頁。

⑦ 伦敦电，一月二十四日，“北华捷报”，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造之辞”；^①但是英国在中国的威望还是照样受了一个严重的打击。

十九 二月三日中国在恫吓下拒绝英国借款

一月十八日中国同意英国政府借款的条件；^②在二十一日它的大臣们竟大胆要求一六、〇〇〇、〇〇〇镑，以代替仅敷赔款需用那个数目；^③这个要求被拒绝了；^④在二十五日俄国公使“以最严重的方式抗议扰乱中国势力均衡的这笔借款”，法国公使则抗议其中的某几项条件；^⑤于是恭亲王在二月三日通知赛纳乐爵士说，俄国已经使出这样强大的威胁，致使中国决计不再从任何方面借款了。^⑥建议不得不放弃，可是在二月十九日中国和汇丰银行及德华银行会同签订了一件一六、〇〇〇、〇〇〇镑借款的草约。

二十 英国无法阻止旅顺口的租让

既然已经被逼得节节后退，萨里贝利勋爵就退一步把注意力集中在获取当时显然将成为一个俄国港口的商务便利的工作上。他通知俄国政府说，他并不反对商港的租让，但是军港却是另外一件事——对此我方有严重异议。^⑦木里斐岳福伯爵对这件通知答复说，旅顺口对于俄国是极端必要的，许给日本和德国的东西不能不给俄国；于是他似乎又悲痛又惊讶地补充说，唯一提出任何异议的政府就是英国。^⑧萨里贝利处境之难在于：德国和法国是俄国的同盟者；日本战后的疲敝还没有复元；美国并未抱有侵略政策，

① 萨里贝利勋爵致赛纳乐爵士函，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号”，一八九八年，第二五页。

② 赛纳乐爵士致萨里贝利勋爵函，一八九八年一月十八日，同上，第二二页。

③ 又函，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同上，第二三页。

④ 萨里贝利勋爵致赛纳乐爵士函，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同上，第二四页。

⑤ 赛纳乐爵士致萨里贝利勋爵函，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同上，第二四页。

⑥ 又函，一八九八年二月三日，同上，第三二页。

⑦ 萨里贝利勋爵致欧格纳爵士函，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同上，第五二页。

⑧ 欧格纳爵士致萨里贝利勋爵函，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同上，第五三页。

而且正忙于别的事情；^①因此以英国的干涉来阻止或是推迟瓜分^②是无法得到其它任何国家之支持的。薩里貝利勛爵認清这点；木里斐岳福也認清了这一点，于是租讓辽东半島的条約在三月二十七日签了字。

二十一 英国获得威海卫的租讓

二月間寶納乐爵士报告英国政府說，一位身据要津的中国大臣暗示中国政府如認為建議会得到良好的反应，愿以威海卫租与英国。^③ 薩里貝利勛爵立刻答复說，^④英国政府的政策是要阻止分割中国的領土，租借威海卫的建議，时机尚未成熟。不久他就重新考虑他的立場，因为“如果俄国有了旅順口和大連湾的租借地，那么俄国对北京政府的影响力将增强到損害英国利益的程度”；^⑤因此三月二十五日他訓令他的駐北京公使說，“由于北直隶湾的势力均衡已經因旅順口的租讓給俄国而实質上有了变更，所以在日本人离去之后，按照旅順口租借的同样条件，取得威海卫的租借是有必要的。”^⑥日本政府表示它“同意以拟議的口岸租借給英国”；^⑦中国大臣們立刻同意，^⑧或許还因安了心而叹了一口气；于是在七月一日签訂了一項条約，^⑨租讓威海卫海湾連同刘公島和威海卫沿海岸約十哩寬的地帶，“租期应按照俄国駐守旅順之期相同”；但是在威海卫城內，中国官員仍可各司其事。在最后一期賠

① 二月十五日，“梅因号”(Maine)在哈瓦那港(Havana)內爆炸。

② 中国人形容一八九八年春季中国处境用語。

③ 寶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一八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号”，一八九八年，第四一頁。

④ 薩里貝利勛爵致寶納乐爵士函，同日，同上。

⑤ 又函，一八九八年三月七日，同上，第四二頁。

⑥ 又函，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同上，第五四頁。

⑦ 薩道义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一八九八年四月二日，同上，第六一頁。

⑧ 寶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一八九八年四月三日，同上。

⑨ “条約汇编”，卷一，第三四九頁。

款于五月九日付清之后，日本军队从威海卫撤退，英国国旗于是在五月二十四日升起。

二十二 英国给予德国以自制的保证

英国孤立着，薩里貝利勋爵既已承认胶州租让给德国，因而渴望不要引起那个国家的猜疑。在他对于租借威海卫一事采取任何步骤之前，他向德国政府声明说，他想要“占用山东省的一部分土地”，并且保证说，威海卫并不是，也绝不能变成是一个通往全省各地的商港；英国本不愿干涉德国在那个地区中的利益；而深以为憾的是俄国的行动迫使它不得不采取拟议中的步骤。^① 经过一番磋商之后，那件经核准在“德国政府公报”发表的保证采取了下述的形式：

“英国政府鉴于威海卫的占用日益迫近，曾经自动通知德国政府，谓本政府无意损害或非议德国在山东省的权利或其它利益，或是在该省为德国政府制造麻烦；特别是无意要从威海卫或该口岸所属各地向山东内地修建铁路交通。”^② 这项自制的声明简直是明文承认英国企业在山东省内不能享有德国理应承认的权利，虽则薩里貝利勋爵先前曾对这些权利加以维护；^③ 并且它把取得威海卫租借地的目的仅限于“作为一个基地，用以阻止对北京施加不当的压力”，以及“保护北直隶湾免于外国控制”。^④ 英国政府并没有在威海卫设防，它不过作为英国舰队可以随时派往而不会有任何

^① 薩里貝利勋爵致拉塞尔爵士函，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号”，一八九八年，第五四頁。

^② 又函，一八九八年四月十九日，拉塞尔爵士致薩里貝利勋爵函，四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号”，一八九九年，第二七、三〇頁；“伦敦泰晤士报”，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柔克义，“条约汇编”，第一八〇頁。

^③ 参看本章第十四节。

^④ “伦敦观察家”，一八九八年四月九日。

問題的一个英国的港口罢了。

二十三 英国取得香港界址的扩充

香港的軍事地位久已是英国当局极关切的一个問題。这个口岸北面的大部分紧靠着中国領土，^① 因此爭取殖民地界址的扩展，使城鎮和口岸避免任何敌意进攻的危險，是在企望中的。作为对广州湾租讓給法国的一个直接补偿，先前扩展界址的試探性談判，現在又推动起来；中国在向一、二西方国家呼救无援的情形下，准备答应这个要求。因此，在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双方在北京簽訂一項条約，^② 依照这项条約，英国得到从深圳湾到大鵬湾的九龙半島的全部，連同这两个海湾的海面，以及北緯二二度九分以北，东經一一三度五二分和一一四度三〇分之間的全部海面和島屿为期九十九年的租借；九龙城的民政管轄权仍然留归中国官員；并且也規定将来得修建一条通往广州的鐵路。在原有二十九方哩的面积上，就这样又增加了三七六方哩（在大陆上二八六方哩，在島屿上九〇方哩），共計四〇五方哩。原打算在一八九九年四月十七日在新租借地上悬挂英国国旗；可是在十五日群情激昂的当地居民奋起抗阻割讓他們的家宅，但是暴动被英国軍警鎮压下去，在随后三天的冲突中，有一些伤亡；因而在五月十六日，中国的管轄权被驅逐于九龙城以外，^③ 以作为对于抗拒的懲罰。把深圳湾和大鵬湾海面包括在租讓之內，是对中国海关巡艇工作上的一重严重障碍，因为在这海面以內是不許它們巡邏的。

二十四 “領土不割讓”的各项声明

对中国的要求，并不只是領土租讓而已。第一件“不割讓的声

① 參看本书第二卷，第十八章，第十五节。

② “条約汇編”，卷一，第三四七頁。

③ “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五月二十二日。

明”是在一八九七年三月十五日向法国提出的；法国曾經要求中国声明“永不将海南島讓予任何他国，不論久暫，作停船躉煤之用”；对于这项要求，总理衙門答以中国絕沒有割讓海南島給任何国家的意思。^① 当德国已經确实取得胶州湾的租讓，并且俄国对于辽东的要求已經显然露出端倪的时候，英国公使要求“中国政府立一确实保証，以后决不将揚子江沿岸各省地方以租借、出典以及其它名义讓与他国”；于是总理衙門在一八九八年二月十一日出具上开字句的保証。^② 在一八九八年四月，法国要求“中国保証，决不暫時或永久地，或以租借，或以其它任何名义，将中国与东京接邻諸省的全部或一部讓与其它任何国家”；在四月十日中国給了按照上开条件的保証。^③ 日本于是要求对福建省作同样的保証；四月二十六日中国也作了决不将福建的任何部分割讓与任何国家的保証。^④

二十五 这些声明的限制

邻接东京的省份是云南、广西和广东；但是对于广东的保証必須認作是只限于西部，既然中国已經被要求租讓广州湾給法国，因之香港界址的展拓在六月間获得同意而沒有遭到法国方面的抗議。关于揚子江区域的声明是一件維護門戶开放的主张，而不是一件参与瓜分中国的要求；誠然，英国的政策是要避免或推迟那种瓜分的。薩里貝利勛爵曾經提出过以下的要求：“別的事情一律平等，可是在揚子江区域内鐵路应归英国公司承办，在山东省应归德国公司承办”；^⑤ 但是他曾接得通知說，德国認为它在山东的地位

① 柔克义，“条約汇编”，第一七三頁；高第，“中国与列强关系史”，卷三，第三三三頁。

② 柔克义，前引，第一七四頁；高第，前引，第三六八頁。

③ 柔克义，前引，第一七八頁；高第，前引，第三六八頁。

④ 柔克义，前引，第一八一頁；高第，前引，第三六九頁。

⑤ 薩里貝利勳爵致贊納乐爵士函，一八九八年六月八日，“中国，第一号”，一八九九年，第一一七頁。

和英国在揚子江流域的地位不同——〔德国大使〕“認為德国因为占有胶州和訂有关于山东的中德条約，已經在該省取得一个特殊地位，因而对于英国企业并不是无保留开放的，至于英国，既然沒有在揚子江流域取得任何地方，那个地区对于德国企业仍然是无保留开放的”；^①最后占上风的还是德国的主张。可是英国在一八九九年四月間和俄国取得一項協議：俄国同意不干涉揚子江流域，英国同意不干涉长城以外地区。^②

二十六 管理海关和邮政的各项声明

有两項伟大的服务是由赫德爵士以海关总稅务司和邮政总办的名义主持的，为了要确保这些服务，現在也提出要求了。由于拟議对华借款的失敗，^③英国公使“查……英国在华貿易既已超过他国”，便要求一項保証，声明“海关总稅务司将来仍照以前办法，应由英人担任”；在一八九八年中国作了必要的保証——“将来如有一国貿易总额超过英国时，总稅务司之任用，中国政府当自行决定，不限定任用英人。”^④法国要求一項同样的保証，声明中国将位置一名法国人为邮政主持人；^⑤但是总理衙門在指明邮政系由海关兼办之后，止于答应：“将来如成立一个单独的邮政机构，而以一个欧洲人任主持人时，法国当与其它国家同样有对该項职务推荐一位候选人的权利。”^⑥

二十七 上海外国租界的扩充

中国国势衰微也被利用为可乘之机，在若干通商口岸建立起

① 薩里貝利助爵致拉塞尔爵士函，一八九八年五月十三日，同上，第八二頁。

② 参看本卷第四章第二十六节；柔克义，第一八三頁。

③ 参看本章第十六、第十七、第十九节。

④ 柔克义，前引，第一七六頁。

⑤ 高第，“中国与列强关系史”，第三六九頁。

⑥ 寶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助爵函，一八九八年四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号”，一八九九年，第一〇二頁。参看第三章第十二、第二十节。

新的外国“租界”，各通商口岸迄当时为止，已经有了几处名义上由英国专用而实际上对一切国家平等开放的英国租界。俄国在牛庄、德国在天津都取得了这样的租界，日本也在厦门和福州要求租界。在显然要成为一个伟大的铁路中心点的汉口，各国都争先恐后地进行强夺；法国又重新要求它已经放弃了的一处租界；俄国、德国、日本和比利时都提出了新要求。在上海，从前的英、美租界已经演变为一个公共自治租界；但是法国租界则仍然保持在法国单独管辖之下。^①公共租界拓界问题已经鼓噪将近二十年之久，租界里的富商们感觉到界址太狭，束手束脚；但是现在，一八九八年七月，法国却要求将它的租界面积大加扩充了，那里主要的商务利益是江边的码头，然而并不是法国人的。拟议展界地带中的英、美土地租用人立刻提出抗议，他们反对夺去他们本国法庭的管辖权，但是这种抗议却被一项法国法庭将不要求管辖权的声明给挡住。^②在这时，公共租界的拓界要求又紧迫起来，法国公使对公共租界的拓界提出抗议。^③中国人反对两个租界的拓界，可是欢迎双方的抗议。在法国公使撤回他的抗议之后，公共租界从约一、五〇〇亩拓展到五、五八四亩一事，在一八九九年五月达成协议；^④法国的要求后来缩减到不把英、美人租用的土地包括在内，于是在英、美抗议撤销之后，达到三五八亩的界址的拓展也在一九〇〇

① 参看本书第二卷，第六章第八节及以下各节。

② 蜜纳乐爵士致萨里贝利勋爵函，一八九八年九月十六日、十二月五日，“中国第一号”，一八九九年，第二七五、三一二页；康格(Conger)致海约翰函，一八九九年一月五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九九年，第一四三页。

③ 又函，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同上，第一四五页。

④ 又函，一八九九年七月五日，同上，第一四八页；巴克斯-埃龙赛(Bax-Ir-onside)致萨里贝利勋爵函，一八九九年，五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号”，一九〇〇年，第一五六页；上海道台的声明，五月八日，载“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年一月达成協議。^①

二十八 英国得到的补偿

孤立无援的英国已經无法阻止德国对胶州海軍基地和在山东省占优越地位的要求；它也被迫撤回它对于俄国要求旅順口和大連灣的租讓以及在滿洲的优越地位的积极反对；这些地方都是外国深入中国的进攻基地。法国除去其它列举过的利益以外，又得到广州灣这个防御基地，英国則占据了威海卫这个防御基地。大多数英国著作家都認為这对于英国来說是处于一个屈辱的地位，这个国家在中国国际关系的第一个阶段中，在一八三四——一八五六年，曾經只手打开帝国对西方各国的貿易；在第二个阶段，一八五六——一八九四年，曾經在西方列强的會議里占据一个领导的地位；但是現在，在第三个阶段，似乎已經喪失一切事务的支配权。可是在汗流浹背之余，它还成功地拾到一些零星的利益。在威海卫以及香港拓界之外，它得到了关于揚子江流域不割讓和海关总稅务司职位的声明，虽然这两件事之中任何一件的实际价值都可能是很小的。它們都是由于中国拒絕一項业經接受的由英国政府担保的借款的建議而要求到的补偿，此外，为了补偿这同一項过失，^② 寶納乐爵士爭得开放中国“內河”^③ 航行并开辟广西南宁和湖南湘潭（后来改为岳州）为通商口岸。在开发中国資源方面，英

① 亚地(Adee)致康格函，一八九九年八月二十六日，“美国对外关系”，一八九九年，第一四九頁；寶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号”，一九〇〇年，第四〇九頁。道台的声明，一月二十七日，載“中国回声报”(Echo de Chine)，上海，一九〇〇年二月十二日。四明公所房屋問題也乘机按照有利于法国的要求的方法予以解决。參看本书第二卷，第十三章第十五节。

② 寶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一八九八年二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号”，一八九九年，第一四頁。

③ 据一八七六年“烟台条約”(第三端，第四款)的規定，“內地”一詞“系指沿海、沿江、沿河及陆路各处不通商口岸。”

国也获得一些成功，除去采矿权讓給英国福公司而外，寶納乐爵士声称，迄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底为止，中国在铁路方面所作的讓与如下：^①

英国	2,800哩
俄国	1,530哩
德国	720哩
比国	650哩
法国	420哩
美国	300哩

这些数字如果不是多少有些虚构的成分，倒会令人觉得更加快意的。^②

二十九 一八九九年意大利要求割讓三門湾，被拒絕

在曾經对中国事务表示积极兴趣的六个强国中，五个已經各自爭得瓜的一片，只有美国沒有下手。意大利的出場使世人为之一惊。一八九九年二月，据宣称意大利打算派遣一支艦队到中国海面来，并且要增加它派駐中国領事的人数；^③ 在一个星期之后，它要求割讓浙江东海岸上一个深入的海口，三門湾，为海軍基地。^④ 这项要求曾經由英、德、法三国認可；俄国的态度不明；至于日本，則認为意大利所要求割讓的“地方，正位于根据中、日协定不得割讓給任何其它国家的地区范围以內”。^⑤ 英、德、法的認可純粹

① 寶納乐爵士致貝里斯福勳爵函，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号”，一八九九年，第三四四頁。

② 參看附录(2)。

③ 伦敦电，二月二十四日，“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④ 同上，一八九九年三月二日，同上，三月六日。

⑤ “神戶导报”(Kobe Chronicle)，二月二十八日，轉載于“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三月十三日。

是精神上的，只限于外交上的支持，并且以意大利給予各国一項愿避免使用武力的保証作为条件；在一开始，意大利駐北京公使，代理牧师馬迪訥（R. Martino）曾經为这个問題向中国大臣們提交一項最后通牒，但經意政府予以否認，并将他召回。^① 面对着在这样的支持下的一項要求，中国大臣們采取强硬态度，应是不足为奇的；軍机处札諭浙江巡撫抵御任何侵略行动，必要时，即分請閩督和甯督增拨軍队和給养。^② 帝国全境一时鼓动起来，^③ 上下各阶层一般都覺得必須抵拒意大利的要求，并制止外国无止境地蚕食中国領土。面临着这样的抵抗，意大利放棄了它的要求，在五月底发出声明說，它“无意要在中国推行侵占政策，而只是要推行一种扩展商业的政策”；^④ 爱国的中国人士的心里，不胜洋洋得意之感。

三十 美国由于在开发中国問題上被排斥 在外表現惊慌

美国曾經站开。它在一八九八年忙于对西班牙作战，在一八九九年忙于应付菲律宾的叛乱；但是舍此而言，国外侵略和割讓不接壤的外国領土的要求也是和它的一貫政策互相抵触的。可是馬琴力（McKinley）总統的政府看見势力范围在中国的建立，不禁有些惊慌，在这些势力范围地区，別国为它們的臣民要求，并且获得了专有特权的讓与，而美国人却在那些地方硬被排斥在铁路和矿山的开发事业以外；但是一向致力于“門戶开放”政策而这时更加倍致力于此的英国所不能担任的工作，显然是美国力所不能承担的。資金，工程与工业人才，以及铁路与采矿材料等的供应，这时

① 伦敦电，三月十四日、十六日，“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日。

② 北京电，三月十五日，同上。

③ 著者在当时和駐武昌的总督张之洞有密切接触，知道在他的轄区内有大規模的軍事部署。参看第七章第十五节。

④ 伦敦电，六月二日，“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六月五日。

在帝国的某些省份要屈从于利益关系国的否决权，至于在其余一些省份，主要由于英国政府的行动，还似有可能；但是对于铁路和采矿设备以外的无限制商品交易，各处都还没有关门，美国政府就着手来维护这个门户的洞开。

三十一 一八九九年海約翰主張对貿易 实行門戶开放政策

海約翰在一八九九年九月六日行文美国駐英、法、德、俄等国大使，又在十一月十三日和十七日分別行文駐日本大使和駐意大利大使，訓令他們从各該派駐国政府取得一項正式保証，声明各該政府在它的不論什么样的势力範圍內，

“一、在中国任何所謂势力范围或租借地內的通商口岸或既得利益，無論如何不得加以干涉。

“二、关税只应由中国政府按照中国协定稅則征收。

“三、它的本国臣民不应享有任何优惠的港口捐或铁路運輸的利益。”^①

列强都給以所想望的保証。俄国以“关税問題的決定是中国本身的事”一节作为保留，但否認有任何“为它本国臣民要求任何排斥其他外国人的特权的意义”。^②德国声明它“不但从一开始就主张，而且实际上在它的中国租借地內对于貿易、航运和商业还最彻底地实行各国絕對平等的待遇”；^③又說，“德国对远东的政策在事实上就是門戶开放的政策。”^④法国声明，它“希望享有中国全境

① 函件載“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九九年，第一二八及以下各頁。

② 木里斐岳福伯爵致托威尔(Tower)函，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三十日，同上，第一四一頁。

③ 布罗伯爵致怀特(White)函，一九〇〇年二月十九日，同上，第一三一頁。

④ 杰克逊(Jackson)致海約翰函，柏林，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四日，“美国外交关系”，第一三〇頁。

內各国公民和臣民的平台待遇，特别是在关税、航运税、以及铁路运输税方面。”^①这三个国家中沒有一国表示任何要放棄在它們的利益範圍內為它們的臣民所主張的開發和發展資源專有特權的意願。其它各國則毫無保留地表示同意了。

三十二 中国屈辱未到止境

在世界史上，沒有一個象中國領土這樣廣袤，人口這樣眾多，而又同隸於一個政府之下的國家——沒有一個擁有它的面積和人口十分之一的國家——曾經遭到這樣一連串的侮辱，或這樣多的受人輕視的證明，就象中國從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到一八九八年五月這六個月中所遭受到的那樣；可是我們更不妨說，也沒有一個國家曾經這樣地應遭受它的厄運；沒有一個國家曾經在糾正行政上的公認弊端方面，或在組織由具有許多優良品質的堅強民族居住着的一個極其富庶的地區的資源方面，表現過這樣的無能。有一些愛國的中國人已經感覺到這一點，但是，雖然有很多人認清局勢中的事實，但是想得出辦法的卻寥寥無幾；而且那寥寥可數的幾個人，在國家陷入更深的屈辱以前，還對於國家發揮不了任何作用。列強現在正心滿意足地期待着中國迫臨的瓜分；它還得陷入那樣深的一個屈辱階段，以致列強會害怕它被瓜分而設法予以防止。

^① 德賽加塞(Delcassé)致波特(Porter)函，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同上，第一二八頁。

第六章 百日維新

- 一 对于改革行政的要求日益增长 138
- 二 发动改革的早期步骤 138
- 三 广州是根本改革的中心 139
- 四 革命者孙中山和他的性格 140
- 五 变法者康有为和他的性格 141
- 六 維新情緒的迅速传布(一八九八年春季) 142
- 七 国内的南北两派 143
- 八 康有为被推荐而受到皇上垂青 144
- 九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和十三日的第一批維新詔
和它們的預防策 144
- 十 高官显宦对于維新的延誤 145
- 十一 张之洞的論文:“劝学篇”摘要 146
- 十二 皇上所頒布的主要維新詔書
(六月二十日到九月十六日) 147
- 十三 倒置的金字塔 149
- 十四 后来打击到一切官吏特权的詔書 150
- 十五 李鴻章和其它大臣被解职(九月四日、七日) 150
- 十六 袁世凱奉詔扶助皇上(九月十六日到二十日) 151
- 十七 袁世凱泄露皇帝的大計 152
- 十八 袁世凱对于他所奉到的詔書和他的举动的自白 153
- 十九 皇帝被拘囚; 生命危殆 154
- 二十 由于英国官員的协助康有为得以逃亡 155
- 二十一 九月二十二日西太后重新訓政; 荣祿当权 156
- 二十二 維新分子的緝捕、处死、充軍和革职 158
- 二十三 各維新詔的大翻案 159
- 二十四 政府担心外国干涉 159

二十五	各省的排外騷动	160
二十六	使館卫队和董福祥的甘軍	161
二十七	贊成和反对維新的力量，說明了失敗的原因	163
二十八	外国人对于維新运动及其失敗的意見	164

一 对于改革行政的要求日益增長

由于中、日战争而造成的中国屈辱情形，劳苦大众或許感觉不到，因为他們的眼界只局限于自己的本乡本土，充其极也不过是限于他們的本省；但是这对于受过教育的各阶层，却产生一种深刻的影响。凡是受到的教育使他們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和日本在管理国家事务和为人民謀幸福方面已經有了些什么成就的人，一致渴望着他們本国也能达到同样的进步水平；可是他們最多不过几千人，而且在那个时期，他們对輿論所能发生的作用实微不足道。但是帝国的历次灾难也使得其他多少万仅仅能够以他們对于中国情况的知識判断中国事务的人們受到了启发；而且在力主維新的那种人当中，还有一些官場人士，就这些人的利益來說，任何行政改革計劃都一定会給予最不利的影响的。

二 发动改革的早期步驟

最早的公开宣言发布于一八九四和一八九五年。第一次是正在对日战争以前，由孙中山起稿，經許多广东士紳签名的广东人的奏章。^①第二次是刚刚在那次战争結束的时候，也是一件奏章，是由“中国当代圣人”康有为起稿，由来自許多省份的一千多名举人^②签名的，其中包含維新的各項建議，并且是作为对于批准“馬

① 康德黎(J. Cantlie),“孙逸仙和中国的覺醒”(Sun Yat-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 第五七頁。

② 第二級，較高的省級學位。四种學位可以比拟为学士(秀才)、碩士(举人)、博士(进士)和院士(翰林)。

关条约”的抗議而提出的。^① 这两次奏章沒有一次发生任何效果。宣传維新的組織各处都在成立起来。其中之一就是南京的“强学会”，会长一职由总督张之洞担任，^② 张之洞是宁愿乘潮御浪，以免为潮浪所复沒；这个强学会引起了高級当局的注意，并由皇帝降旨取締了；^③ 从那时起，它就在另一位会长的领导下，变成了一个中国向来很流行的秘密会社。會員多是帝国中的优秀分子的北京“强学会”，也同时被取締；^④ 但是得力于重要大臣們保證它不会为害，就又复活起来；^⑤ 两年之后，当“百日維新”开始的时候，据聞它正“盛极一时”。^⑥ 一般說来，官方的一切維新傾向，始終是一个誠意問題，未曾导致任何結果。

三 广州是根本改革的中心

然而維新的种子已經撒播下去了，全国各地都覺得必須要变——多少要变，不論怎样变。这种感觉在沿海和揚子江流域要比在內地更加强烈些。在內地，散布在帝国各处的传教士們所引进的醞釀因素多少发生些影响；但是在通商要道的城市中，从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洋学堂以及从后两个地点发行的汉文报纸中发挥出来的影响，却产生了更强烈的效果。沒有一个省份象广东那样全心全意地致力于这件事情；广东省的子弟們感到香港英国行政的直接影响，惟有他們源源不断地向加利福尼亚和澳州移民，而且前

① “北华捷报”，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六日。条约批准书在一八九五年五月八日互換；奏摺自然是在前一天呈递的。

② 张之洞在一八九六年一月調回武昌，刘坤一就任来南京；他們在一九〇〇年仍留在那两地。

③ “北华捷报”，一八九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④ 同上，一八九六年二月十二日。

⑤ 同上，一八九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⑥ 同上，一八九八年四月十八日。

往新嘉坡和南洋群島其它地方的大多数移民和其中最大多数的知識分子也都是他們；并且他們从那些民主思想的所在地，帶回了民主的理想，而那些理想，在腐朽的老大中华帝国令人沮喪的空氣里，不可避免的变成为革命性的。从产生太平天国領袖的广东省，又产生两位当代改革的斗士，革命党的領袖孙中山和变法派領袖康有为。

四 革命者孙中山和他的性格

孙中山^①生于一八六七年，他的父亲信奉基督教。他在教会，主要是英国教会的帮助下受的教育；一八八七年他前往香港，在新創設的医科学院讀書。他在一八九二年考試合格，为該学院的第一名毕业生，于是开始在澳門行医，正是在那里，他和广东的革命人士发生了密切接觸。从此以后，他就积极致力于革命企图。一八九四年，他在广州建立了一个哥老会分会，并且因为是向广州府請愿的代表团的一分子，他險被逮捕。在一八九五年十月，他組織了一次从香港对广州的武装袭击，以配合汕头方面的革命运动，但是当局早有戒备，因而失敗。他先后逃至澳門和香港避难，但都被拒絕，于是取道檀香山往美国，在他所到之处，都組織起中国人民对于腐敗的滿清政府的反抗；随后他从美国轉赴英伦。一八九六年十月他在伦敦被綁架，幽禁在中国公使館达十天之久，后来因为薩里貝利勛爵受了孙中山从前在医学院里的教师康德黎博士的鼓

① 他的官印或“洗禮的”名字是孙文；逸仙（一种广东音的讀法）是他自己照中国习惯在成年后起的一个別号，也是为朋友們所习知的名字。有一个时期，英国兵会更容易地称“博布斯”（“Bobs”），而不称呼“陸軍中将非得烈·罗伯茨爵士”（“Lientenant-General Sir Frederick Roberts”），更不称呼“陸軍元帅堪德哈尔子爵罗伯茨”（“Field-Marshal Viscount Roberts of Kandahar”）。在一八六四年，美国兵也一样，他們絕不称呼維康·德索塞·謝曼將軍（General William Tecumseh Sherman）而称为“比利”（Billy）。

动,亲身出面干涉,才被释放出来。在随后几年中,“中国政府的密探追蹤孙中山的足迹遍于日本、中国、安南和他所到的其它各处,不拘生擒或杀害他都悬有重赏”。^①从一八九五到一九一二年这十七年中,他经常处在横死的威胁中。^②他的朋友们对他的评语是一向没有过争辩的——“他为人光明磊落,爱国之忱溢于言表,他秉性纯朴,准备为他的国家忍受一切,虽受酷刑至死亦在所不惜。”^③他抱着教会教育所形成的见解,并吸取了民主的理想,所以相信一旦满清被驱除,代替它的必是一个共和国;^④但是在一八九八年,他所抱的见解还不能为中国人所普遍接受。

五 变法者康有为和他的性格

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教主。他也是广东人,生于一八五八年;虽然他所学只限于中国固有的学科,却能将日本所采取的措施的成就,和所有中国政治家们的昏聩糊涂作一番对照,并且他对于帝国一筹莫展的处境,非常痛心。但是他并没有推翻清朝和驱逐满洲官吏的思想;他的目的是要使皇上赞助维新,并向满清官吏指出彻底改组政府机构的明智和必要。由于他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大同书”、“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法考”这三部书),他已经受到大众的注意,并且在帝国全境获得“当代圣人”的称号;^⑤他虽然没有官职,可是那些既憎恶革命方法,而又渴望以维新将中国从它似乎不可避免的命运中拯救出来的受过教育的人们,却将他的名字挂在嘴边。他的理想是要“使中国成为仅有一

① 康德黎,“孙逸仙和中国的觉醒”,第六三页。

② 同上,第六六页。

③ 同上,第三四页。

④ 同上,第一四三页。

⑤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六日的“北华捷报”提到他时就用这个名字;另外一种称呼他的方法是“孔夫子第二”。

名义上的世袭统治者的共和国”，换一句话说，就是君主立宪政体；他又声称“中国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又说“中国的政治演变自然地导向君主政体”。^①

六 維新情緒的迅速传布(一八九八年春季)

当帝国因对日战争而受到屈辱的时候，这些运动已经有了一些进展。以一八九七年十一月青島的海盜式袭击为开端，以四处新租借地的强夺和第五处租借地的展拓以及某些外国的专横态度为终结的那一段外国侵略举动，^②大大地加深了屈辱的感觉，并使帝国的知識界更加認識了維新的迫切需要。我們很可以说，在一八九八年春季，在所有滿清官吏和士紳中間的較为年輕的人都是維新者——其中有一些人对于什么是維新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但都准备贊助溫和的变法，另一些人則决心用激烈的手段。甚至連滿清貴族中的青年分子也都受到感染——这也許是一时的时尚，但是他們的贊助毕竟还是可貴的。他們对于割讓胶州和辽东的憤怒情緒，表現在四月間由一、二〇〇名年輕京官和新进士(其中也有一些滿洲人)签具的一件奏章中，他們力請皇上不要相信他的大臣們的“貪利自私而又懦弱的劝告”，要“独奋乾綱，当机立断”；这件奏章是由一位近支王公呈上的。^③与此同时，还发现了一件对付当朝的可怕的內廷陰謀，这是由“一些对于出卖他們国家的行为怒不可遏的汉、滿进步青年所发动的”。^④

① 孟禧宗 (音譯 Mang Hyi-zung), “論康有为”, “圣約翰大学回声报”(St. John's Echo), 上海, 一九一五年四月。

② “中国人抱怨巴甫洛夫 [俄国公使] 把中国当作一个直隸省份看待。”——北京电, 七月二十九日, “北华捷报”, 一八九八年八月一日。

③ “北华捷报”, 一八九八年四月十八日。

④ 同上。

七 国内的南北两派

当时维新之声甚嚣尘上，甚至在北京也有一个维新党，它的机关报“强学报”，本来是一个很能直言不讳的而发行额达一万份的周刊，现在改出日刊。^①两个维新派沿着两条岔路而形成：年轻而爱国的为一派，年老而世故深的为一派；南方为一派，北方又为一派。北派，即满洲派的领袖是徐桐，他是汉军旗人，从前是同治皇帝的师傅，以及李鸿藻，他是大学士，直隶人；南派的领袖是翁同龢和潘祖蔭，都是江苏人，也是有成就的学者，而且翁同龢又是皇上的师傅，因此常常得见皇上；所有这四人都“以诚信蜚声于时”。^②在这四人之间，多年来就一直互相水火；北派在西太后和满洲贵族及宗室的有力支持下，始终保住它的地位；但是在大多数汉大臣赞助下的比较有才智的南派，也没有完全被压倒。舞台上的另外几个重要角色，就是荣禄、刚毅（这两人都是西太后的同党，皇帝的死敌）和现在闭门养晦的李鸿章。慈禧太后已经在一八八九年二月间还政，虽然她已放棄了她的权力，但是遇有她认为必要的时候，还是不停地干涉国事。两位亲王，道光的两个儿子，本可以起一种节制作用；但是皇上的父亲，醇亲王已经在一八九一年一月逝世；四十年来以大部分时间任军机大臣的恭亲王自从一八九八年一月起患病，已经在五月二十九日逝世。一般人认为如果恭亲王不死，可能会挽救国家很多的不幸。^③

① “北华捷报”，一八九八年四月十八日。

② 叔兰德 (Bland) 和白克好司 (Backhouse)，《西太后治下的中国》(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第一八〇页。

③ “恭亲王的死是一件严重的事。……如果他还活着，或许不会有义和团乱事。”——同上，第一八四页。

“诚然，[恭亲王的]势力是很大的，在一八九八年春季他死去的时候，错综复杂的政府机器中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轮轴。”——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一，第一二八页。

八 康有为被推荐而受到皇上垂青

翁同龢并不是一个维新者——他的利益和满清官吏们的利益是密相契合的——但是他是拥有维新者的那一派的领袖；因此早在一八九八年^①六月间他就将康有为的名字奏请皇上亲加留意，并且极力推荐。皇上虽然幽处深宫，可是很想学习别国的所作所为。在一八九四年，一〇、九〇〇个基督教妇女在西太后六十大庆时献给她的那部装订得富丽堂皇的新约圣经吸引了他的注意；并且从那时起，他就孜孜不倦地尽可能吸取关于西方宗教和习俗方面的各种知识。^② 他当时虽然已经年近三十，但是智力尚未成熟，知识也很浅陋；但是在一八九八年春季，他却已经觉得如果要拯救国家，就有变的必要——多少要变，不管怎样变。对于他——立宪改革者已成为一个光明的使者，他的第一个举动就是阅读康有为呈上的“俄大彼得变法考”和“日本明治变政考”，并大为感动。于是效果立刻就发生了：六月十三日的一道上谕派康有为任工部主事这个低级职位，但赐以六月十四日召见的殊荣。

九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和十三日的 第一批维新诏和它们的预防策

在六月十一日，皇上已经下了第一道维新诏，这是一件一般地宣示变法的必要和预示成立京师大学堂的诏书；^③ 六月十二日的第二道诏书督飭宗室王公游历各国，研习外国制度。这两道诏书使得满洲人大为震惊，但是因为已经奏明慈禧，^④ 所以抗议无效。不

^① “在恭亲王死后不久。”——濮兰德和白克好司，“西太后治下的中国”，第一八四页。

^② 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一，第一二八页。

^③ 译文见濮兰德和白克好司，前引，第一八六页。

^④ 同上，第一八五页。

过这位伟大太后的敏锐嗅觉已经觉察到危险，于是就迅速采取步骤，凭着这些步骤，她就在一百天之后，制止了维新运动。六月十三日出现的几道上谕都带有在西太后胁迫下发表出来的迹象；一道是开去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翁师傅同龢的一切职衔，着令“回籍”；一道是着文武大员，凡补授官职，一体向皇上和西太后两方面陛见谢恩；另一道是以命荣禄为直隶总督，调王文韶入军机处来补翁同龢的职位。由第一道上谕，慈禧显示出她能够沉重地打击她的敌人；由第二道上谕，她可以在还没有重新垂帘听政的时候，就将她的手指按在政府的脉搏上；由第三道上谕，她使她的密友和亲信掌握住中国唯一有组织的军队的统率权。^①

十 高官显宦对于维新的延误

可是这一切都隐伏在幕后，而维新却风行一时。在许多人中间，荣禄也受了感染：他在启程到天津之前，保举了一个年轻的维新者，这个人后来被处死。^②甚至于批准过第一批诏书的西太后，也可以说对于皇帝的寻求维新之道是以好意看待的，只要所变的法足以使国家强盛而不损害清朝的威势，并且不减损满洲贵族和帝国官吏的特权。维新运动的最有力的附和者是后来成为稳健保守派领袖的一位总督，即当时驻武昌总督张之洞。这时他写了一本书，叫作“劝学篇”，^③这本书在帝国境内行销了一百万册，普遍为人所阅读。^④在毫无瑕疵的古典式的行文之下，它对于凡是读过

^① 荣禄在一八九四年奉派为步兵统领，正白旗副都统和总理衙门大臣；一八九五年为兵部尚书；一八九六年为协办大学士；一八九八年为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译者按：应系兵部）；现在六月十二日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高第，“中国与列强关系史”，卷三，第四〇二页。

^② 濮兰德和白克好司，“西太后治下的中国”，第一八六页。

^③ 伍德布里其(S. I. Woodbridge)的一部杰出的“劝学篇”摘要，假托“中国的唯一希望”作为书名。

^④ “中国的唯一希望”，第六页。

这本书的知識分子都很有号召力，并且在皇帝^①以下所有人們的心里都起了作用。

十一 張之洞的論文：“劝学篇”摘要

著者在他的“劝学篇”的序文中，列举了知的五个对象：知耻——耻不如日本等国；知懼——懼蹈印度、安南、朝鮮、埃及、波兰的复轍；知变——如不改变我們的习俗，就不能变法；知要——特别是要知道西方各国为政之道；知本——不要因多知而忘記圣賢；凡是这种知，都将符合中庸之道。他諄諄以保教、保孔夫子的訓誨相規劝；并且声称，自从汉、唐^②以来，沒有一个朝代曾經表现出比“我圣清”有更好的、更应该为全国人民效忠的精神。他曾經証实西方各国普遍遵守着的三項道德責任：“君为臣之綱，父为子之綱，夫为妻之綱”，又証实他們也承認階級的区别；因此研究他們的制度是有利的。一切文章的价值必須以孔夫子的标准来測定。中国不宜于成为一个共和国——凭着漫无限制的自由，則“士愿坐食，农愿蠲租，商愿专利，工愿高价，无业貧民愿劫夺，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賤不服貴，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因此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是必要的。他又劝諭人民仍須研讀四書五經，但应兼学其他科目；因为日本比較近，学生可以前往留学。学校應該普遍設立，現在用于慈善机关、迎神賽会、~~演~~和祠堂的款項，應該移充学校必需的經費；如果这些还不敷用，“可以佛道寺观（連同庙产和它們的收入）改为之”。書籍應該译譯，报纸應該增办；方法應該改良，铁路應該兴筑，军队應該改組并保全实力，以及

① 七月二十五日的一道上諭声称“劝学篇”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着广为刊布。——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一，第一四〇頁。

② 汉朝（紀元前二〇六年至公元二五年），唐朝（公元六一八年至九〇七年），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光輝的时期。中国人一般都自称为“汉人”，但是广东人則自称为“唐人”。

一切宗教均應兼容。他更聲稱，“中國前途惟士是賴”；又稱，反對變法的人計分三類：泥古不化的保守者；那些怕一旦變法就必須發奮自勵的苟且偷安的中国官吏；以及遇事就要批評的吹毛求疵的人們。

十二 皇上所頒布的主要維新詔書

(六月二十日到九月十六日)

維新運動現在已經充分地發軔了，皇上完全處在康有為的影響下，以令人迷惑的速度，紛紛頒下詔書。茲將具有較深遠意義的變法詔書列表如下：

六月二十日——總理衙門奉諭籌議文藝、科學和農業的獎勵辦法具奏。

六月二十日——諭令趕築京漢鐵路。

六月二十三日——廢止以八股文為考試的要点，此種的考試舉世公認是戕害中國人的思想的。

六月二十七日——諭王大臣等對於滿洲各旗採用西式武器和操法一事，妥議具奏。

七月四日——各省成立農業學堂。

七月四日——諭示有意指派進步人士孫家鼐為新辦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

七月五日——采行專利法和版權法。

七月六日——諭內閣妥議廢除武試中現行騎射劍術考試，代之以智力測驗具奏。

七月七日——對發明家和著作者給以獎勵。

七月十日——各省府廳州縣成立各級學堂，并着以民間祠廟改充。

七月十四日——飭各地方官獎勵貿易，幫助商民。

七月二十九日——全国各城市設立学校管理委员会。

七月二十九日——預示改革法庭。

八月九日——鼓励新聞記者撰著政論，以广官吏見聞。

八月九日——京師大学堂成立，派孙家鼐为管学大臣，派丁建良为总教习并賞二品銜（紅頂）。

八月十日——設矿务鐵路总局，由王文韶和张蔭桓两位欽差大臣督办。

八月十日——命荣祿和刘坤一^①对筹办海軍学堂，添置練船，妥議具奏。

八月十日——
八月二十六日——

勗勉內外臣襄助皇帝变法維新。

八月十六日——設譯書局。

八月十九日——改革选授翰林的办法。

八月三十一日——設立农工商总局。

八月二十一日——为侨居国外的中国子弟在海外建立学堂，由各使館督办。

八月二十四日——皇帝和西太后拟于十月二十九日乘火車赴天津閱兵。

八月二十八日——刘坤一和张之洞奉命在上海和汉口設立商务局，講求商务。

八月三十日——裁撤北京不重要的六个閑曹；凡設有总督省份的巡撫，一律裁撤——計有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惟江苏因巡撫駐在苏州，不在此例；东河总督，不产盐和不办漕运的各省的盐、粮道，以及很多不重要的閑曹，一并裁汰。

九月五日——准张蔭桓奏，筹办以征兵为基础的仿西法操練

^① 駐天津和駐南京的总督分別兼任南、北各省的通商事务大臣——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他們分別在南北各省以总管总督的資格行事。

的国家军队，并裁撤绿营（即“常备”汉军）。

九月八日——关于工赈、奖励机器和设立医学堂的各道上諭。

九月九日——晓諭臣工不得乱上奏章。

九月十日——裁汰更多闲散多余的职缺。

九月十一日——設茶务学堂，蚕桑公院。

九月十二日——諭总理衙門和兵部对于驛站^①事宜移交大清邮政局兼办一事，妥議具奏。

九月十二日——改定武科考試办法。

九月十三日——准許一切臣民封折奏事。

九月十四日——准不愿或不能充任文武官职的滿洲人經商貿易。

九月十四日——准卫所的荒地由人民領种。

九月十六日——准編岁出岁入表，公布周知。

九月十六日——袁世凱晋授侍郎銜，責成专办北洋練兵事务。

十三 倒置的金字塔

如果認為維新是要从頂端而不是从基础上开始的話，在这一张变法的清单上是挑剔不出什么毛病的。条条都很健全，条条都打中一个显著的弊端，并且条条都是可以付諸实施的；但是这种以上諭变法的整套結構就是一个倒置的金字塔。这只是一位身体孱弱、精神衰頹的皇帝和他的一位心思單純的赤誠顧問康有为能够干的事，而这位顧問却既无行政經驗、又乏駕馭人們的本領，他一朝得势，便驕矜起来；他本人並沒有做大官，而只滿足于他对于皇上的意志所发生的影响，但是他的心目中的政府乃是一个哲学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政治家的政府。除去这两个人之外，維新运动

^① 参看第三章第二、第十九节。

是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青年学子們和广东官紳所积极拥护的；南派中其他人物都抱冷淡态度，或担心它的后果；北派則联成一系，虽然在百日期間他們不敢公然反对，却暗中抵制。国内大众一般說来还无动于衷。

十四 后来打击到一切官吏特权的詔書

直到八月底为止，在这最初几个月里，主要在于奠定广泛基础的那些詔書是普遍受到贊許而不为任何一派所反对的；但是这两位变法者由于順利而胆壮，接着就頒行了一連串的上諭，打击到現存弊端的根源，这就惹起本身利益直接或間接地受到波及的許多人們的积极的仇視。八月三十日的那道上諭，不但打击了被夺去官职的那些閑曹，而且也打击了为获得一笔报酬而把他們安插在那里的那些人，以及那些希望营求这类职缺和那些打算为他們的侄輩或忠实追随者謀求这类职缺的人們。九月五日的那道上諭害及士紳中間不学无术的武职人員，就如同八月三十日的那道上諭害及有才学的文职人員一样。九月十二日的那道上諭則意在将每年三百万两邮政費用的那項補貼移作一种办理得宜的邮政之用。六月二十七日和九月十四日关系到滿洲人的那两道上諭，打击到滿洲平民的特权，并且使他們有不久就被迫去工作的可能性。普遍的奏事权打击了享受着这种专有权利的高級官吏的特权；公开預算的采行，威胁着帝国官吏凭以按照官职大小分肥的那个方式的根本。礼学家們听到八月底所作并經西太后批准的一項决定更为震惊，这项决定就是太后和皇上将于十月二十九日乘鉄路上的火車巡幸天津，并在那里检閱軍隊。

十五 李鴻章和其他大臣被解职(九月四日、七日)

在这时期，虽然为促进变法而設的新官职自然是委由維新派

的人物担任，一般原有的在职官员都留任不动，但是也有例外：九月七日，李鴻章和一个滿洲大臣敬信一同开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职缺；李鴻章旧有的实权已经丧失殆尽，但他仍然是中国最能干的政治家、西太后的坚决拥护者，他坚信国家只有由她把舵才会安稳；他的倒台虽然是直接由于他支持俄国在滿洲的计划和反对英国，^①但是他对于維新的不友善的态度，无疑也是皇上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之一。九月四日，为不遵从准于普遍上書言事的諭旨而压制一件奏折的事，許多礼部官员终于被革职，遺缺則以維新派人物补用；革职人員中，有两个尚書，西太后的亲戚怀塔布和汉人許应駘，以及两个滿侍郎和两个汉侍郎。保守派为着他們的特权而惊惶失措，維新派对于他們的敌人的可能行动，也同样心怀戒懼，双方都看出行动的时间已经到了，于是双方都动了，皇上打得虽狠，但是乱打，而西太后打得既狠又准。

十六 袁世凱奉詔扶助皇上

(九月十六日到二十日)

每一方面都需要軍隊的支持，就象一八七五年有过的那种情形一样。^②軍隊現在是在西太后的人榮祿的統率之下，但是在榮祿的下面有袁世凱，他在派駐汉城的职务結束之后，已于一八九五年奉派以文职統率北洋軍隊中五、〇〇〇名洋法操練的定武軍，^③后来又晋升为直隶按察使。西太后愿意在行动以前先等一等，以便到預定巡幸天津的时候，她可以亲自和榮祿商量一下如何才是

① 參看第四章第十二节。

“李鴻章最近表現得有露骨地敵視我們的利益之意。”——贊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伯爵，一八九八年九月八日，“中国，第一号”，一八九九年，第二四〇頁。

② 參看本书第二卷，第十三章第十八节。

③ “北华捷报”，一八九六年一月三日。

抵制南方各省的敌视态度的良策；^①但是康有为警告皇上说，慈禧在李鸿章和心怀怨恨的宗室们的支持下，正要采取步骤限制皇上的自由，于是皇上决定先下手，把慈禧幽禁起来并翦除她的羽翼；这是一个生死关头，第一步他就召袁世凯晋京。袁世凯应召而来，并且在他第一次陛见时，使皇上相信了他对于变法的热诚；于是降旨以侍郎候补，责成他专办练兵事宜；这就使他实际上成为北洋各军的统帅，而总督荣禄的号令不出衙门的指挥权，将变成徒有其名了。他也奉召朝见西太后，并于九月二十日又对皇上作了最后一次的陛见。于是他奉旨暂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接奉最后的谕旨^②——将荣禄立刻在他的衙门里就地正法，夺取了政权，迅即统领北洋军队进京。当时皇帝的目的是要抓住西太后并逮捕保守派的领袖，特别是刚毅、裕禄、怀塔布和许应骙等。^③

十七 袁世凯泄露皇帝的大计

对于袁世凯在这个时候所采取的行径，有两种可以推详的叙述。一种是照着上文所说的在北京所发生的事实的说法，根据这种说法，给袁世凯的命令是直接出于皇上的主动的；同时并指出：袁世凯在九月二十日早晨乘火车离开北京，在正午以前到达天津，立刻前往荣禄处，问荣禄是否把他当作忠实的亲兄弟一般看待，因为他们两人在几年以前已经换过帖。这位总督给了正面的答复，于是袁世凯说：“你说得正好，因为皇上派我来杀你了，可是由于我对太后的忠心和对你的情感，却不打算这样办，现在我把他的计划泄露给你听；”于是他就把他所奉到的谕旨，放在他的上司面前。^④

① 濮兰德和白克好司，“西太后治下的中国”，第二〇一页。

② 参看下文第十八节。

③ 濮兰德和白克好司，前引，第二〇一、二〇二页；“北华捷报”，一八九八年十月十日。

④ 濮兰德和白克好司，前引，第二〇六页；“北华捷报”，一八九八年十月十日。

这种叙述是当时计划都成泡影的維新党人物和外国史学家普遍所承認的；^①也是当一九〇〇年的时候希望获得他的支持的义和团运动的領袖們以及为他在当时的山东巡撫任上会采取的行动而担心着的天津方面的外国人士所相信的；当一九〇九年因他的后台西太后逝世而調动人事，因而他被夺去官职的时候，保守派中的維新分子就是照着这种說法行事；并且在一九一二年，这也曾使革命党人接受他为民国总统有些为难。

十八 袁世凱对于他所奉到的詔書 和他的举动的自白

另一种叙述是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間，当袁世凱被起用以图挽救清朝于万一时，他本人在北京对“泰晤士报”記者所发表的。他在事情发生十三年之后說：九月十八日夜間，康有为的追随者、軍机处章京譚嗣同来拜訪他，向他說明这项已經决定的計劃；据譚嗣同說，这项計劃已經得到皇上的同意和批准；他拿出一道墨笔写的諭旨，其中对这个問題給了一般的訓示。袁世凱詰以諭旨并非出于硃笔，而且只說到“另議良法”，並沒有特別提到捉拿西太后和将荣祿正法这些話；于是他声称，沒有硃笔的特別命令，他是不能采取这种行动的。当他在二十日破晓陛辞的时候，皇上並沒有提到“另議良法”一事，除去要他襄助变法而外，也沒有給他任何特殊命令。当他在天津見到荣祿的时候，首先說破这件事情的是荣祿——“你取我的头来了；你最好自己招認，已經有人把事情都告訴我了。”袁于是解釋說：“你所听到的只是几个政治阴謀家的阴謀，皇

^① 漢兰德和白克好司，“西太后治下的中国”，第二〇六頁；高第，“中国与列强关系史”，卷三，第四〇八頁；肯特，“滿清的复亡”(The Passing of the Manchus)，第一八頁；撒坚特(Sergeant)，“中国的伟大西太后”，第一八四頁；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一，第一四八頁；丁戈(Dingle)，“中国的革命”，第225頁。

上没有向我提过这个计划，他对于这样的措施毫不知情。”^①这段叙述同一般人（即使是那些指责他的行径的人）对于袁世凯的看法并不矛盾；^②但这是两个关系最切的人当中唯一活着的人所说的无法对证的片面之辞，因而只能作有保留的接受。同时，我们应该记得，正如他的伟大领袖（译者按：指李鸿章）在三十五年前所说的那样，^③“这是中国，不是欧洲”；而且一位虽然身居要职，但却为人下屬的官員，在君主是一位既无經驗，又輕举妄动的傀儡，而由一位空想家牵着走的时候，很可能不大考虑到对于他的君主的效忠，而考虑到他对于直接上司总督和中国的真正統治者西太后所負的責任。西太后是官吏特权和滿人权利的維護者，而且由于当政四十年，已經获得經驗，并且办事老練；因此一个謹慎的官吏很可能决心支持她这一派而不支持皇帝的那一派。在亚洲各国中所举行的普选，就是用現在行将采用的方法进行的。

十九 皇帝被拘囚；生命危殆

在得到維新派方面的陰謀的警告之后，荣祿毫不怠慢，在九月二十日当天下午五点钟就到了頤和园西太后的面前。西太后的拥护者中的最重要人員举行了一次會議，其中有軍机大臣們和許多

① 麦克康密克(McCormick)，“中华民国”(The Flowery Republic)，第359頁。

② “他[袁世凱]是袒護維新的，但是象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他是一个天生的两面派，在危急的时候，他撇弃了皇帝，以他的計劃向荣祿告密。”——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一，第一四八頁。

“在孙逸仙，‘我的回忆中’，据称袁世凱曾經派人到孙那里，传达袁对于他所作一切的欽佩之意，并且願意在他的运动中給予帮助。我的妻子和我自己是从孙博士本人那里得知这件事情的。……袁至少有一种維新的傾向。”——康德黎，“孙逸仙和中国的覺醒”第一四九頁。

“袁世凱應該譴責的地方太多了，我們可以穩当地說，如果能有一个进步的政府建立起来，他最好还是早点逃出中国。”“北华捷报”，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五日。

③ 参阅本书第二卷，第五章第十四节。

尙書、許多滿洲王公貴族、和兩位革職的尙書懷塔布和許應騏；在这次會議中，他們決定了反革命的計劃，以榮祿派來的軍隊為後盾；榮祿則當夜趕回天津。九月二十二日早晨，皇帝原定召見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侯爵；在指定的鐘點以前，他奉召前往他原想要捉拿的那位西太后面前，從此就沒有在完全自由的情形下再被人看見了。有很多夫人們都疑心他已經被處死，他政躬不豫的謠言（這通常是壽終的先聲）一直不斷地在傳布着。外國公使們向中國大臣們表示，他們自認是遣派給皇帝一人的，皇帝本人有任何意外，都會引起嚴重的疑心；他們對於皇帝的健康狀況，時常提出尖銳的詢問，只是最後按照賽納樂爵士向中國大臣們所作的建議，由法國公使館醫生德對福博士（Dr. Dethève）為皇帝診視一番，他們才算放心；並且當時有這樣一種看法，認為“西太后和她的一派很想緩和各國對他們不利的那種意見”。^①只是由於擔心各國方面的反對意見和物色一個繼承者的困難，皇帝的性命才得保全，這是確凿無疑的。

二十 由於英國官員的協助康有為得以逃亡

在這期間，這次維新運動的主角康有為已經逃脫。在袁世凱第一次陛見之後，西太后就告訴皇帝說，康有為對於她的私生活和德行曾經有過失敬的話語，應該將他逮捕。^②在九月十七日，皇帝給他一道密諭，問他何以不恪遵前諭，前往上海，設立官報，又補充說，“汝可迅速出外”〔國外？還是北京以外？〕，“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他躲避了兩天，和他的追隨者作了一番商量，他們告訴他

^① 賽納樂爵士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一八九八年十月十八日、二十九日，“中國，第一號”，一八九九年，第二七〇、二七八頁；“北華捷報”，一八九八年十月十七日。

^② 譚蘭德和白克好司，“西太后治下的中國”，第二〇三頁。

說，“局勢已經越來越緊”；于是他請一位相好的顧問李提摩太牧師 (Rev. Timothy Richard) 爭取英、美公使的幫助。^① 他在九月二十日天亮以前離開北京，和袁世凱同車到天津。在天津，他險遭不測，但終於乘上一艘英國輪船逃脫；在上海，一切到埠的輪船都為搜捕康有為而被檢查，但是他已經在吳淞口外直接換乘開往香港的大英輪船公司輪船“巴拉勒特號” (Ballarat) 了；在香港他避居于警察署的宿舍里。從香港他前往西貢和新嘉坡，自此以後，他就避難海外。每逢他在英國旗幟之下的時候，英國當局總是給他以特別保護，以期避免因一個並沒有証實犯有刑事罪的政治逃亡者的遭到暗殺或綁架而可能引起的外交糾紛。中國政府對於弋獲他的正身或屍身，一律懸賞十萬兩，並且下令焚燬他所著的一切書籍和文章，掘去他祖先的墳墓，並盡力逮捕所能捕到的所有他的親屬，一律正法；^② 但是上海廣東同鄉會送給報館一項決議案，其中對英國拯救他的性命，表示謝意。^③

二十一 九月二十二日西太后重新 訓政；榮祿當權

九月二十二日，幽居宮中一個閣裏面的皇帝呈給西太后一件

① 凡是象賽納樂爵士、康格 (Conger)、海京男爵 (Baron von Heyking) 和赫德爵士等能出一點聰明主意的人，在那危急的時候都不在北京。李提摩太後來得到賽納樂爵士的通知說，他最好不要干涉國家大事。

② 康有為本人的談話，載“德臣西字日報” (China Mail)，香港，一八九八年十月七日；香港總督致殖民局函，十月八日，海軍上將西摩爵士 (Sir E. Seymour) 致海軍部函，十月二日，賽納樂致薩里貝利勳爵函，十月十三日，“中國，第一號”，一八九九年，第二八〇、三〇〇、三〇六頁。

照“京報”所刊九月十七日的上諭，結尾的字句是“着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延擱”。其中並沒有提到要他為皇帝求援的話。

九月二十三日，搜尋康氏家屬的衙役，兜抄廣州對面珠江南岸的芳村，住在那裏的人們已經得到信息，在幾小時前逃跑。——“北華捷報”，一八九八年十月七日。

③ 同上，一八九八年十月三日。

俯首下心的奏折，籲懇她重新訓政，并且請求准許他在次日行朝見禮；于是慈禧下了一道懿旨，恩准辦理朝政。第二天，皇帝率領王公大臣依式恭行“朝賀”。^① 慈禧對政府的掌握也加強了。公開主張維新的人們都被免去他們已經奉派擔任的職位，他們的遺缺都由那些對西太后的效忠毫無疑問的人們遞補。最重要的步驟是派宗室裕祿為直隸總督，調榮祿到北京；裕祿就這樣照例兼任北洋大臣，但是北洋各軍仍歸榮祿節制，頒發下的新總督印，刪去了這一項職權。榮祿是慈禧的姨侄，是慈禧年輕時候的朋友（據說不止於是朋友），^② 是她全部經歷中的堅定擁護者，是她自始至終最可靠的顧問，他現在奉派擔任好幾個職位，這幾個職位給了他清代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個權要地位。已經是八旗中的一個都統，又保有北洋新軍的統率權，他現在又進入軍機處，任協辦大學士（大學士是李鴻章），并奉派為兵部管部大臣。^③ 慈禧的另一些親戚，或給以八旗的重要統率權，或派任各省的職缺——她的侄孫曾蘇任湖北巡撫，裕長任南京藩台；她的親戚松壽任江西巡撫，德壽任江蘇巡撫——又以其它一切滿洲人分任其它職位。^④ 漢籍的老政治家們立刻順風轉舵。駐武昌總督張之洞急忙將他那套鼓勵維新的話吞到肚子里去；并且致電慈禧，促請她採取強硬手段對付維新分子；但是另一個漢籍政治家、駐南京總督劉坤一“却表現得那樣勇敢和不顧一切，竟出面為皇帝講話”，^⑤ 并且他的主張也應該被認為是保全了皇帝性命的原因之一。

① “北華捷報”，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② 參看本書第二卷，第三章，第七、第十節。

③ “北華捷報”，一八九八年十月三日、十日。

④ 同上，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曾蘇在兩個月之後被革職。同上，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⑤ 濮蘭德和白克好司，“西太后治下的中國”，第二二〇頁。

二十二 維新分子的緝捕、处死、充軍和革职

西太后对維新分子痛予打击，特別选出广东省为报复的对象。九月二十三日，頒下一道上諭，革去康有为职位，并拏捕立即問斬；另一道上諭飭即逮捕张蔭桓，并查抄他的家产。前者已經逃脫，但后者却被逮捕，只是各国公使为一位曾經出使外洋的中国大臣提出最强硬的抗議，才暂时保全了他的性命；^① 他被遣戍到新疆边境，只有知道中国司法程序的人才能体会这样一种判决，对于一个家产被查抄、朋友不敢相助、而又被迫甚至为生活必需品都要付出无尽无休、勒索备至的要求的人，是如何的可怕。在二十四日，御史宋伯魯（慈禧所特別厌恶的一个广东人）因为保荐了一个奸人（也就是維新分子）“时务报”編輯梁启超而被革职；第二道上諭革了三个道台的职——徐建寅、吳懋鼎和端方——他們曾經因为奉派管理农工商务总局的事务，而厚顏无耻地以欽差大臣自居；一道上諭命令拏捕十六名維新分子——全是广东人。在这十六个人之中，有几个逃脫，有几个被革职，也有六个人被拏問、迅即判决、并于二十八日問斬；这六个人是康广仁（康有为的兄弟）、^② 楊深秀（御史）、譚嗣同（湖北巡撫的儿子）和三个翰林：林旭、楊銳和刘光第。^③ 在鎮压維新和搜捕維新分子方面最积极的两个人，就是前广东巡撫、現任兵部尚書刚毅和刑部尚書兼步軍統領崇礼。^④

① 参看第十章第二节。

② 沒有入敢認康广仁的尸首，九月二十九日劊子手將尸拖走，丢在义塚里，沒有掩埋——这在中国是被認為是最大的耻辱和不幸的。——“北华捷报”，一八九八年十月十日。

③ “烈士的鮮血將是新中国的种子。这些人不只是无所隸屬的学者，而且除康氏以外，都是居于負責地位的高官阶的人。”——同上，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④ 同上，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二十三 各維新詔的大翻案

反維新的活動立刻就着手進行。九月二十六日有一道包羅萬象的上諭，把許多變革都一掃而光：在北京的各類被視為閑曹而裁撤的衙門都一一恢復原狀，這些衙門的官吏也都恢復原職原薪；但是各省被裁汰的職缺的恢復却留作以後考慮；“時務官報”被取締，業經給予一切人等具折奏事的權利被撤銷，而這項權利在以後，就象在過去一樣，又僅限于御史和高級官吏了；京師大學堂和各省會的中學堂准予繼續存在，至于建立小學堂一事，則听由各府、縣自願辦理；前經奉令改為學堂的佛道寺觀和民間祠堂，一律改回原有的用途；其餘獎勵商業、農業、科學和軍事改革的擬議，一般予以保留，但以不和政府的利益沖突或不與既成的習慣相違背的為限。^①十一月一日的一道上諭恢復了廣東、湖北和雲南巡撫以及東河總督的職缺；第二道上諭恢復了武科用馬步箭弓刀石等項的舊有考試。^②最後一道上諭安定了北京和北京附近滿洲士兵們的心；但各省的滿洲士兵已經感染了維新的思想、希望比較好的事物；據傳杭州和乍浦的駐防軍，共計六千人，已經放下他們的弓石，而以毛瑟槍武裝起來，^③並且已經開始認真以西法操練了。^④

二十四 政府擔心外國干涉

滿洲人和他們的附和者權勢日盛，但是在面前出現了兩個令人懼怕的原由却在限制着他們。在他們的集團內部有着許多各種

① “北華捷報”一八九八年十月三日。

② 同上，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七日。

③ ○·四五〇口径、一八八〇號的來福槍；這時其它國家的軍隊已經採取了約○·三〇〇口径的來福槍。

④ “北華捷報”，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不同的利害关系，西太后也还不能排除他們的互相猜忌。十月二十三日，当皇帝的最終命运还悬而未决的时候，一件內廷陰謀，大約在慈禧明知故縱之下，爆发了，把当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門王大臣庆亲王奕劻^①的十四岁儿子拥上皇位；这个計劃为当时任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的两位宗室（荣祿或許是其中的一个）所反对，慈禧在他們的高人一等的洋务知識面前，不得不讓步；这次危机却使西太后賜給惇亲王的两个儿子載漪（端王）和載濂以上方宝剑，这种宝剑賦有对于不論身居什么官阶爵位的人，先斬后奏的权柄。^②在九月二十二日，西太后很想起用她的忠实追随者和最能干的政治家，在两个星期以前被开缺的李鴻章，但是荣祿力陈这会招致英国的反对；^③十一月十三日的一道上諭终于又将他起用，派他查勘黄河工程。^④朝廷极想避免使中国內部的爭論加上一层国际困难。各国公使館已經变得事事都要管到——他們似乎已經把他們本身的猜忌暂时丢在一边——經常不断地詢問皇帝的健康和起居，并且婉轉提出各国公使是派給皇帝而不是派給任何篡位繼承者的。由于在天津所得到的比較开扩的眼界，荣祿对于各国海軍节节向北海方面移动以及各国使館坚定的口气，有深刻的理解；当西太后的这位忠实而又可靠的顧問劝請她慎重将事的时候，她不得不听从他的劝諫。但是她一面屈从，一面却办妥一切預防步驟，軍隊从帝国各方北調，集中在北京、天津和山海关。

二十五 各省的排外騷动

这时局势非常不安，列强的預防之策不但是針對着由于这个

① 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六年）的第十七子的孙子，嘉庆是第十五子。关于嘉庆的后裔，見本书第二卷，第十三章末的世系表。

② “北华捷报”，一八九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③ 同上，一八九八年十月十日。

④ 同上，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原因而产生的种种危险，而且也针对着北京的政局。在一八九八年春季和夏季，海南岛、①沙市、②松柏③和扬州④都有排外运动的发生；并且“著名的周汉”在湖北又出现了，鼓动人民屠杀全部当地教民。⑤在广西，有一个法国教士白道雷神父 (Père Bertollet) 在春季被杀，⑥夏季发生了一个叛乱，⑦一直用了五年的兵才镇压下去。在这次政变之后，广州在十月二十五日有一次排外暴动；⑧十一月有一个名叫福来明 (Fleming) 的英国教士在贵州被杀；⑨并且在曲周县、山东沂州府，一再有严重的排外运动，在十一月五日的一次动乱中，有一个德国教士被攻击，在十一月十三日第二次动乱中，有三个美国教士被攻击，但是在这两次事件中，地方官对于外国人的身体都给以有效的保护；⑩在十二月间的第三次动乱中，“有两名天主教教士被杀，并且有教会的许多财产被毁。”⑪

二十六 使馆卫队和董福祥的甘军

在北京，混乱的政治情况实在令人担心，但是真正的危险却来自调到京师以防范外国侵略的那些骚扰的军队，其中最为骚扰的

① 赛纳乐爵士致萨里贝利勋爵函，一八九八年四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号”，一八九九年，第一〇二页。

② 又函，一八九八年五月十一日，同上，第七八页。

③ 又函，一八九八年五月十五日，同上，第八五页。

④ 又函，一八九八年七月七日，同上，第一四〇页。

⑤ 又函，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同上，第一一九页。

⑥ 又函，一八九八年五月三日，同上，第七一页。

⑦ 又函，一八九八年七月十一日，同上，第一六三页。

⑧ “北华捷报”，一八九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⑨ 赛纳乐爵士致萨里贝利勋爵函，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号”，一八九九年，第三〇〇页。

⑩ “北华捷报”，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五日。

⑪ 赛纳乐爵士致萨里贝利勋爵函，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号”，一八九九年，第三三六页。

就是駐扎南苑的董福祥的甘軍。这支軍隊里面的士兵曾經在九月三十日攻击內有英、美使館人員的一伙人，于是各国代表决定从他們各自艦隊中調派一支海軍卫隊。津督曾經不許他們通过，但是因为各公使的坚持，总理衙門下令，准予通过；中国駐伦敦使館也抗議这个步驟，并且在卫隊既經到达之后，要求他們在封航以前撤退，但是这项要求沒有被同意。① 十月二十三日董福祥的士兵又在火車站对一伙工程师和英国使館人員作了一次攻击。因为指揮的將領对于肇事人迟迟不予处罰，荣祿就負起責任来，并且为順天府尹胡燏棻請得西太后的特旨去調查这件事；但就在这时候，軍隊里的高級長官竟还采取一种大胆而坚决的拒絕調查的态度。② 北京周围的軍隊，人数比先前大为增加，对于看得見的敌人——在北京的少数外国人——充滿着敌对的情緒，那些被認為是正企待着普遍起事信号的人們中的粗暴分子，也附和而支持他們；③ 使館人員所面对的危險是明显的，于是各国公使要求將董福祥的甘軍撤出北京近郊。中国大臣們左右为难。他們相信在現勢下与列强協調的政策是聰明的，但是他們又无法压制这些不守紀律的軍隊；这些軍隊有力量使北京陷入混乱，并且只要他們能够有好的領導和比較好的紀律，那他們就有力量推翻滿清的政权組織，因为它是靠滿洲八旗的那个紙老虎来維持的。可是帝国大臣們在想办法了，或許是用增加董福祥和他的將領們的錢庄存款的办法，終于做到將甘軍移往北京以东八十哩的祁州碑，虽則还在各公使所希望把他們調到的地方山海关以西一五〇哩；但是这个結果却被認為是一

① 賽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財爵聖，一八九八年十月一日，五日，十二月二日，薩里貝利財爵致賽納乐爵士聖，十月五日、十二日、十五日，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二月二日，“中國，第一号”，第二五八、二六四、二六六、三一〇、三一—頁。

虽然通行是由总理衙門的命令許可的，但是剛毅却把这个行为作为彈劾府尹兼鐵路督辦大臣胡燏棻的一个理由。——“北華捷報”，一八九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② 同上，一八九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十一月七日。

③ 北京電，十一月三十日，同上，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五日。

个满意的解决。^①

二十七 贊成和反对維新的力量,說明了 失敗的原因

除掉在一年多以后着手进行的那个安排皇位繼承問題以外,^②反維新运动如今已經完成。西太后已可安枕无忧;維新的領導人物們已經被处死、遣戍边疆、放逐、革职或被迫反悔;广东派已經被打倒,絕對再爬不起来了;并且在帝国范围内变帝国的法,矫正明显的弊端和不合时宜的事物,而同时还把清朝維持下去的这种大有可为的企图,已經归于失敗。失敗的理由是明显的。运动是康有为和皇帝两个人的創作,一个是空中樓閣的幻想家,一个是毫无經驗的懦弱耆;他們只获得在北京和在本省的广东人的积极支持,这一派革命党人的支持在所有其他各省都引起人們对运动的怀疑。在有地位的政治家之中,他們只得了一个广东人张蔭桓的积极支持,张之洞給予一种精神上的贊許;刘坤一却保持冷淡的中立态度。正如上文所說,維新的金字塔是倒置的。帝国所有的力量,对于这个运动都消极地或积极地严陣以待。农民倒欢迎租稅的减低或苛扰的蠲免,否則他們就要求別管他們的事;商人們或許足够开明,可以欢迎弊端的改革,但是害怕混乱发生;官吏所自出的士紳階級則憤慨于既成习俗的修改;士紳和官吏們同样对于官吏特权和薪俸的削減感到惊惶失措;象李鴻章这类政治家却認為既定制度是帝国唯一可行的制度;以綠营为代表的那一部分軍隊拒不肯被消灭;滿洲旗丁受到被迫工作的威胁;滿洲士紳和貴族

^① 北京电,一八九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十一月七日,十二月五日;寶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爵函,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十一月二十日、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号”,一八九九年,第二七八、三〇〇、三二二、三五—頁。

^② 參看第七章第二十七至第三十节。

看出滿人权势已受到威胁；宗室和近支王公看出滿洲皇权的基础已被危及；西太后看出她自己的生命在危险中，并且看出她四十年当政所获得的一切会全部翻案，尽管这一切是血迹斑斑，尽管是腐敗的，但仍是基于健全的和有政治家风度的原則的。凭着这样的支持并遭到这样的反对，任何維新运动，不論宗旨怎样美好，原則怎样崇高，是一定要归于失敗的。

二十八 外国人对于維新运动及其失敗的意見

外国人的意見，照已經发表过的看来，一般都称赞康有为的方案，但是指責他的輕率。法国史学家說：“維新派的最大錯誤就是要在太短的一个时期內使中国全然改观，要同时把所有的政府机构都抓在手里，要一举而肃清所有的弊端。……在日本，虽然有封建制度需要打破，但是沒有若干世紀的傳統要推翻。”^①一个美国作家为了“列强如此不重視这种危机的性质”而惋惜；他对于英、美公使沒有給予帮助，表示懊喪——“一个千載难逢的珍貴机会被丢掉了；把这个伟大的危机說成是与外国人毫不相干的一次‘滿洲家族的口角’，竟变为时髦之談。”^②但是另一个美国作家总结这个局势說：“这个年輕的皇帝显出他是一个有希望的学生，他下了一連串的維新詔，使得保守分子惶惶不安，因而激起反动。”^③写西太后小传的作家們有以下的言詞說明了她的展望：

“光緒的統治已經过去了；他所剩下的仅不过是一个皇帝的尊号罢了。他曾經有过他的机会；凭着青年人和新思想的热情，他曾經和上层的黑暗势力作过一番殊死之爭，可是他失敗了。……慈禧曾經讓她的侄儿任便行事，她曾經引退而讓他主持国政；如果他

① 高第，“中国与列强关系史”，第四一三頁。

② 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一，第一五〇頁。

③ 丁韪良，“中国的覺醒”，第一七二頁。

把国家弄得鼎沸不安，如果她順从公意而重执国政，这是天命，并不是她的过错。”^①

在中国的外国报纸是同情维新党的——“维新党的计划太轻率了，太危险了，每一个步骤都需要一位强者的勇气……袁世凯的迟疑陷他们于失败和死亡的深渊。维新在中国并没有死去。一个巨大的家庭纠纷掩蔽了它，但它还是生气蓬勃的。”^②又说“烈士们的鲜血将是新中国的种子”。^③最后，那位在半世纪的从政期间作为中国的坚定不渝的朋友的人（译者按：指赫德爵士）在一件不打算公开的信中表示他的意见如下：“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顾问康有为和其它人等都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他们把足够九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这样它就暂时被扼杀了，但是将来它一定会有它的适当的代表人物重新显露于世。”^④

① 濮兰德和白克好司，“西太后治下的中国”，第二一一页。

② “北华捷报”，一八九八年十月十日。

③ 同上，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④ 赫德致马士函，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第七章 义和团的起源

一	一八九九年的商业发展	167
二	湖南和湖南人的特性	168
三	湖南省对于对外贸易和传教的开放	169
四	許給天主教传教士以官員的地位	170
五	不安的感觉普遍于各省	171
六	一八九九年浙江的情况	172
七	福建的情况	173
八	广东和广西的情况	174
九	云南和貴州的情况	175
十	四川的情况	176
十一	甘肃、新疆和陝西的情况	177
十二	湖北和江西的情况	178
十三	安徽和江苏的情况	179
十四	滿洲和直隶的情况	180
十五	因抵抗德、意侵略使不安情况加甚	180
十六	剛毅的使命使不安情况更加严重	182
十七	榮祿与庆亲王之間的敌对	183
十八	山东省的排外态度	185
十九	德国所采取的制止反德行为的行动	186
二十	中国人所作的行动威胁；教徒在危險中	186
二十一	义和团的組織	188
二十二	义和团为官吏的同情所支持	188
二十三	义和团的活动增加	189
二十四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杀害伯魯克案	190
二十五	毓賢对于义和团的兴起所負的責任	191
二十六	袁世凱接替毓賢为巡撫	192

二十七	廢棄光緒帝的最初各項企圖	193
二十八	繼續煽動	194
二十九	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四日溥儀被選為同治帝的 假定繼承人	194
三十	光緒帝未被廢，但被棄置；廢君的決定延期	196
三十一	一九〇〇年一月十一日頒發了一件不祥的鼓勵 義和團的諭旨	197
三十二	對毓賢的恩寵加深了對義和團的鼓勵	198
三十三	各國使團要求取締義和團	199
三十四	袁世凱任巡撫時的行為	200
三十五	對中國官吏們的賞罰	201
三十六	帝國普遍不安	202
三十七	德國報紙對於綏靖的保證	203
三十八	警告排外起義的通知	204

一 一八九九年的商業發展

一八九八年是在一種“疑難”的情況結束的；^①但是商業特權方面有了一些進展，這些特權是由英國公使，並不是單獨地為了英國的利益，而是為了各國的好處而獲得的。^②各種管理內河航運的規章很快地頒布了，^③在這些規章下，輪船開始發展成為一個巨大的運輸事業；一般地是一些小的輪船，有時裝載貨物，有時拖曳當地貨船；但是來往在非條約口岸的大型輪船，也受到這些規章的管理。總的說來，很少有摩擦，但是偶爾也產生一些騷動，這些騷動有時是由於那些厘金官吏們所鼓動，因為他們的好處受到了妨礙，有時是由於船民們所造成，他們痛恨被迫而不得不跟從新的和快速的習慣。屬於後一種性質的騷動，雖然可能因為當時在江蘇北

① “時代是太動蕩不安了，甚至在我們自己的園地上也不可冒險，處處都必須小心和謹慎。”——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德使馬士函。

② 參看第五章，第二十八節。

③ 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九日總稅務司通令。

部所发生的飢荒而加甚，却在一八九九年三月发生在鎮江——在那里放火事件是惊人地多^①——在揚州——在那里发现了反对洋人的揭貼，并且集聚大批的人去寻找一个被認為是被拐騙而失踪的儿童。^② 中国曾經允許开放南宁和湘潭（用来代替岳州）；开放大連湾的要求已經提出，但是俄国出面干涉；青島（胶州的口岸）被德国所占用。受了这些事件的警告，中国現在赶紧把其它口岸給予条約口岸的地位以便放在半国际性的保証之下；秦皇島——一个在天津和牛庄两个冻港之間的不冻港；三都澳——并没有商业上的价值，但是对任何一个貪婪的国家都具有一个海軍基地的引誘力；南京——帝国的前朝的国都，它的开放曾在一八五八年的中法条約中有所規定。^③

二 湖南和湖南人的特性

岳州所在地的湖南曾經支配着帝国有四十年之久。这个省份的人曾經把清朝从太平天国叛乱中挽救出来，并且不讓朝廷和帝国的大臣們忘記他們的恩德；^④ 在这个时期中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湘勇为中国的軍力提供了战斗的先鋒。在这省被叛軍蹂躪，致使帝国的主权中断之后，地方政府是由当地紳士組成的委员会所管理，稅捐也由他們来征收；在帝国主权恢复以后，这种制度还繼續存在，并且对于每个知县和每个稅吏（都是外乡人）都給他成立一个地方咨詢委员会，他們对于这个委员会的建議是不能拒絕的。甚至省当局（外乡人）也不敢反对紳士們所考虑过的意見，因为那种意見的后台，是在北京和其它各省供职的湖南籍官吏，以及滿載而

① “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三月十三日。

② 同上，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日。參看本书第二卷，第十一章，第九、十节。

③ 參看本书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第七节。

④ 湖南省相繼产生三个为中国人很推崇的行政官：曾國藩、左宗棠和刘坤一。

归、退休在湖南本籍的官吏。結果，行政效率比中国其它各省都高些，而貪污腐敗却較輕些；厘金的征收，手續較簡，負擔較輕；人民的繳納与国庫的实收之間的差額也不象他省之大。^① 具有这种行政的优良，而且大部份就是由于这个道理，这个省份仍然保留着一切旧有的对于外国人仇視态度。在省境以內不許传教士居住；凡在省內“游蕩”的外国人沒有不遇到被逐或被辱的巨大危险的，最近在一八九九年四月还有一个传教士在由他正式拜訪岳州府后回到他船上的途中被人投石。

三 湖南省对于对外贸易和傳教的开放

在各国使团中，有一种承認中国当局的真正困难的共同傾向，而强行进入湖南省的那种特殊困难是明显的。^② 最初的步驟就是用岳州来代替湘潭作为进入省境的地点，以便与湖南人的意見取得妥协。岳州是这省的咽喉，是一个商业重要性較小的地方，但是十分之九的貨运都經過这道門口，而湘潭虽然是这省中心的一个大的貿易市場，但在冬季則吃水三呎的船只就不能到达。这种妥协使双方相安，但是沒有一方感到滿意；一方接受了它，是因为它給予一个进省的楔子，另一方接受了它，是因为它可以把乱闖乱进的外国人暫時拒絕于相当里程之外。派往安排开放事宜的代表是特別获得护卫的，以防无礼的不幸事件的发生，他并且有北京当

^① 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馬士上赫德的报告，一九〇〇年刊登在上海总稅務司統計科所編的“岳州海关”中。

^② “倘若你帶家眷在一起的話，我可以派你到天津；倘若你把他們送回国去而单身在外的話，十之八九你可以被选派去开放岳州海关，并将它在草創阶段树立一个規模。湖广当局急盼能有一个有經驗的、有理智的和有常識的人来担任那里的稅務司职务——这个职务将要有它的困难和苦处，而且湖南人的情緒不可一时或忘，所以这个职务就变得重要，不能派遣任何年輕或者三心两意的人前去充任。”——一八九九年二月八日赫德致杜德維函。杜德維先生終于被派到天津，而著者以署汉口关稅務司的身份奉派前往安排开放湖南对外贸易事宜。

局和駐武昌總督張之洞的支持；但是他的使命的主要部分是去勸說湖南省的官民，使他們相信所建議的開放並不會構成一種損害，並且在不使政府的意圖失敗的範圍內，照顧他們的反對意見和恐懼心理。在六個月的期間中，他同省巡撫和他的代表們、同各地來見他的官吏、同各地來的紳士代表們以及同他所能遇見的商人等舉行了多次的會商；在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三日這個口岸開放以後，他覺得他有正確的理由，可以寫道：

“三十餘年來湖南省曾經堅決拒絕那個可以把它的資源和商業對外國企業開放的楔子的進入；這個楔子現在是准許進來了，雖然呼聲還是‘湖南是湖南人的湖南’，可是有顯著的證據，可以證明這個特權並不是在怨恨下讓許的。在官吏方面這也並不僅僅是一種態度的改變。在過去的歲月中，百姓們不願與洋人接觸；現在，在本年內，外國官吏、傳教士以及商人們的作證都表示出岳州人民有友好的態度；有一位名叫楊篤信 (Griffith John) 的傳教士研究湖南有二十五年之久，他公開地紀錄下他的信念說，湖南人的精神已經普遍地有了一種顯著的改變，但是他又補充他的信念說，他們必須被當作好漢去看待。”^①

四 許給天主教傳教士以官員的地位

各地對於傳教士和他們的工作^②的仇恨引起了當局的注意。在一八七一年，在天津屠殺案之後，中國提出一些想把傳教士置於更完善的保護之下的建議，這些建議在原則上是被贊許的，但在細節上却受到嚴厲的批評。^③ 在一八八六年曾經有過一次企圖要請

① 一八九九年海關年鑑所載馬士關於岳州海關的報告。遲到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三日止，楊篤信牧師報告說，湖南人向友好態度方面的完全轉變仍在繼續中。——“北華捷報”，一九〇〇年六月六日。

② 參看本卷第二章第三十六節；第六章第二十五節。

③ 參看第二卷，第十二章第二十二節。

求教皇派一位使臣作为他的代表和教徒們的首領，以便把天主教传教士們从政治中摆脱出来；但是法国反对，并要求繼續它旧有的保护权。^①在一八九九年三月十五日帝国頒布了一道諭令，給予传教士以官員的地位。主教与总督及巡撫列为同等，并且得以平等地位拜訪和写信給他們；副主教和会长与司道（藩台、臬台、道台）为同等；一般的传教士与府、县为同等；主教要把他下屬的名单送給官方，传教士不得在法庭上干涉案件。^②这个最后的一项条款表示出中国对于补偿損害的要求。就官員地位而言，可以注意的是，駐在中国的各国領事不仅是商务代表，并且代表他們的政府而执行着行政的和司法的职务；在民事和刑事的案件上，他們是所有的传教士們的上級官吏；虽然以后在实际行动上他們是与总督平列，但是一八五八年的条約却声明他們的官方地位是与道台相等的。英国政府立刻命令它的使节通知中国大臣們說：“关于英国籍的主教和牧师，英王陛下政府不能允許他們的事务受到英国政府以外的任何其它政府的官吏們的干涉；”^③德国在一八九七年采取了同样的态度。那一道諭令在文字上仅仅是針對天主教传教士而言，但是其它的传教士自然也享受同等的特权；这些特权很快地为天主教传教士們所主张，而为基督新教的传教士們所一致拒絕。

五 不安的感觉普遍于各省

在一八九九年，只有湖南一省沒有动乱，但是在帝国的其它各

① “北华捷报”，一八八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米其（Michie），“英国人在中国”（The Englishman in China），卷二，第三四四頁。

② 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巴克斯-埃龙賽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中国，第一号”，一九〇〇年，第一四一頁；“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③ 六月二十日薩里貝利勛爵致巴克斯-埃龙賽函；一八九九年八月十六日巴克斯-埃龙賽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中国，第一号”，一九〇〇年，第一四九、三二三頁。

地却发生着灾害和变乱。在有些区域内，民众的起义是反对朝廷的，在另一些区域内，是反对洋人的，在还有一些区域内，特别是反对传教士的；在有些区域内，民众的起义是由一种反叛的精神而产生，在有些区域内，是由于对洋人的仇视，在另一些区域内，激起的原因是食粮的缺乏。一八九八年，黄河泛滥，因而复设黄河督办，派李鸿章充任；他调查灾区后报道，一个完善的治黄计划需款四〇、〇〇〇、〇〇〇两，一个治标的计划需款半数；所需要的这个巨大的款额，使所有计划无法实行。结果灾害很大，如往常一样，在中国的外侨慷慨捐助；在上海有一时期救济基金达到二四、二一九元，^①在镇江达到三、八九八元。^②这个数额是杯水车薪；在三月间，苏北“人民是面无人色的鬼”，出卖孩童，特别是女孩，以免饿死，其价格每孩从五〇文到一、〇〇〇文（等于一便士到二〇便士）；^③并且“拐骗”的呼声一如曩昔。^④在另外一些区域内也发生灾害，但是叛乱通常是由于人民的情感而发生的。

六 一八九九年浙江的情况

在浙江，三月间从温州得到报告，反对洋人的谣言正在流传，中国基督教徒正被迫害。^⑤在一八九八年，绍兴府和宁波府因歉收曾有抢米风潮，在一八九九年十月，这些风潮又发生了。^⑥在台州府太平县六月间发生严重的暴动。这是天主教与基督教教徒之间的一种争吵状态的表现，两方的首领发动了攻击和反击；这种情况由于夹杂了其它两个因素而更趋恶化。在五月间，意大利要求在浙

① “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② 同上，一八九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③ 同上，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日。

④ 参看本书第一六八页注②。

⑤ “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四月三日所载三月二十四日温州通讯。

⑥ 同上，一八九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江沿海取得一个海軍根据地的这种威胁态度，促使頒发諭旨，命令两江和閩浙总督所管轄的五省当局整軍备战，并且采取必要的步驟以防三門湾的被侵；^①这就激起了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此外，普遍的不安情况自然会吸引着所有的不稳分子，整个的府不久便陷于一种叛乱的状态之中，这种状态一直延长到次年。在七月間，叛乱者抵制住了軍队，在八月間乱民懾服了軍队而使他們不敢前进。^②

七 福建的情况

在福建，三月間从兴化得到报告，局势一天比一天危急；在“枪会”和“刀会”的名义下的秘密会社都組織起来了；每天都有拦路搶劫的情事发生，官吏們无力制止；大部分人民都組織起来发动叛乱而反对現存的政府，他們对于他們的企图并不隱瞞；但是直到那时为止，运动还不是反对洋人的。^③一年以后，在这同一地方有报告道，由于缺乏食粮，发生許多搶劫案件，社会秩序极端紊乱。^④一八九九年六月，建宁在一次暴动中，有教会的房产被毀坏焚烧，七个教徒被杀死，最初据报为被杀的三个英国传教士仅得逃命；据說，反对洋人的情緒在該县是很普遍的，并且“当地的基督教徒象野兽一样地被追猎着。”^⑤更有报告道，“在福州的流氓們散布謠言，說外国传教士拐騙孩童并挖取他們的脑子和眼珠。”^⑥英国当局实

① “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載五月二十六日上諭。

② 同上，一八九九年六月十二日及以后各日；參見“中朝制度考”第二版附录四。

③ 同上，一八九九年四月十日。

④ 同上，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四日。

⑤ 同上，一八九九年六月十九日、二十六日，七月十日。

⑥ 巴克斯-埃龙賽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一八九九年七月十日，“中国，第一号”，一九〇〇年，第二五七頁。

施了外交压力，“建宁的名流具結負責保护传教士們的安全。”^①廈門在八月間发生了一次反对日本人的暴动。^②

八 广东和广西的情况

两广受到反維新的反动浪潮的打击异常严重，人民的憤怒也是同样地巨大。他們的情緒在一份广州的地方报纸中足以表現出来，^③在这份报纸中有这样的說法：

“外国全是貪婪无厌的，并且准备瓜分中国：俄国攫去了旅順口和大連灣，并且在滿洲駐軍二五、〇〇〇人；英国实际上占有了包括有七省之多的揚子江流域；德国夺取了胶州并且要求山东全部作为它的势力范围；同时又向河南伸张；法国占据了广州灣，但是它的隱蔽而确定的目的是要全盘占有广东、广西、云南和貴州；日本得到了台湾，現在又向福建伸手；中国必須提高警惕，必須自求改良，必須保卫自己以防侵略。”

当意大利施行恫吓的时期中，一艘英国軍艦被誤認為是意大利的而受到虎門炮台的炮击；^④但是一般地說来，广东人的敌意是对滿洲統治而不是对外国人的，虽然在十一月間有几名法国軍官在广州灣附近被暴民所杀。在广西，从一八九八年开始发生叛乱，并繼續蹂躪該省。在广东的西境在夏間发生了很严重的叛乱，規模是如此之大，以致派遣名将刘永福率領三千五百人和八門大炮前往鎮压；^⑤这个叛乱最后平服了，是用招撫叛軍首領到帝国軍隊中担任帶領一百个人的百长职位的便宜条件而取得的。^⑥在广东，

① 巴克斯-埃龙賽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一八九九年十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号”，一九〇〇年，第三八四頁。

② “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九月四日。

③ 同上，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四日所載譯文。

④ 同上，一八九九年七月十日。

⑤ 同上，一八九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⑥ 同上，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普遍的紊乱不安的情况导致了范围很广的水上搶劫，通常称之为海盜。在二月間，这种海盜是如此的猖獗，以致引起香港总督的一份“有力的声明和强硬的抗議”；^①这种海盜行为繼續不断地进行着，最后，英国海軍在广州人民的合作下，在粵海三角州的內河上巡行保护，以便使香港的貿易从这些恶魔手中得到自由。^②

九 云南和貴州的情况

在云南，法国的企图造成了不安的情緒，这种不安的情緒发展为敌对的行动。在这年之初，从云南省东北部的昭通府得到报告說，“动乱是很普遍，正在扩展到全省。”^③在該省的其它各地，这种敌对的行动是特別对法国人的。六月二十二日駐蒙自的法国領事館被乡村的一群人所焚毀，領館的人員只是空身逃到城里躲避；^④海关的房屋和官員們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但是暴民的首領送来一封道歉的信解释道，这是他的党徒們把海关的房屋誤認爲領館所造成的。^⑤云南府在八月間发生了反对法国人的暴动，街上貼着告白，号召爱国志士起来反抗洋人；住在庙里的法籍鐵路工程师被驅走。^⑥在貴州省，十月間在仁怀县发生武装暴动，县长被杀。除此之外，主要的注意是对审判謀杀英国传教士弗萊明 (Fleming) 案的进行状况。这件謀杀案是发生在一八九八年十一月間，得到的

① 伯萊克(H. A. Blake)致张伯伦函，一八九九年三月二日，“中国，第一号”，一九〇〇年，第六八頁。

② 海軍部致外交部函，八月二十二日；巴克斯-埃龙賽致薩里貝利勛爵函，八月二十五日；又函，九月八日；外交部致殖民部函，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同上，第二六五、三三九、三四九、三八〇等頁。

③ “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三月六日。

④ 同上，一八九九年七月三日。

⑤ 海关稅務司斯品納(W. F. Spinney)对著者私人講的。

⑥ “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證明指出了該省的高級官員是犯有縱容的罪，至少也犯有疎忽的罪的。一个英国領事被派到該省的省城貴陽，在进行了三个月的調查和交涉之后，报告道，真正的凶手們在审判之后依法定罪了，六名官員被撤职了，三个紳士被取消功名了，并且还要賠款二二、〇〇〇两；但是这个謀杀事件发生地重安村的村长却逃跑了。英国的政策是使地方当局負責，并且認為逮捕和处罪該村长是极为重要的。有証据获得証明該省巡撫默許他的逃跑并任其逍遙法外，在六月間英国提出罢免該巡撫职务的要求。关于这一点所一再提出来的要求都被中国的大臣們所拒絕，但是最后在十月間据报該村长已被捕获了，于是这个案件就結束。^①

十 四川的情况

四川在一八九八年发生了一个严重的叛乱，这个叛乱是由余蛮子領導的，波及的地方很广，并且造成重大的破坏。在一八九八年六月間，这个叛乱已經达到很大的規模，当时把重庆府荣昌县里的天主教堂毀坏了，神甫夫勒里(Père Fleury)被扣作人質。这位神甫的被扣“使省当局的行动陷于癱瘓”，因为法国政府要省当局对神甫的安全負責。在九月間，余蛮子的力量更大为扩展，他的爪牙并在实际上不属他所盘踞的县份里組織秘密会社；在这个月中一支帝国的軍队被击敗了。到十月底“叛乱有了一个惊人的发展”，帝国的軍队为了要保全神甫夫勒里的性命而在行动上感到有障碍；但是在十二月底軍队摆脱了束縛，而打了一次胜仗，神甫在一月二十日被救出，余蛮子投降了。叛徒的小头目們被处刑，但是

^① 賽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九日，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和三月十五日；巴克斯-埃龙賽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五月四日，六月九日，十月六日；薩里貝利勛爵致巴克斯-埃龙賽函，一八九九年九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号”，一九〇〇年，第四、四五、九六、一〇八、二〇八、二九四、三七三等頁。

“余蛮子是……被赦免了，只是加以管束而已”。^① 这次举动使人可以推想到，在镇压叛乱中银制的枪弹所发生的作用不亚于铅制的枪弹。在五月间余蛮子又揭杆造反并糾合了心怀不满的人在他身边。^② 他又被“镇压”了；七月间在大竹又发生了另一次叛乱，在那里很多的教徒被杀害了。^③ 余蛮子又被加管束，在八月间被逮捕；他的同乡人发动了叛乱，作为对这件事的抗議。^④ 与此同时，另一叛乱在川东发生，叛徒們任意劫掠；^⑤ 另一叛乱发生在順庆府，教堂被毁，但是传教士脱逃了，并且由府衙門給他們安置了住处。^⑥ 在十月间万县的許多茶館里流传着洋人在井里放毒的一类不安的謠言；^⑦ 在湖北的施南府也流传着同样的謠言。^⑧ 在当年年底，据报哥老会用武力占据了与湖北交界的川东四县。^⑨

十一 甘肃、新疆和陝西的情况

在三月间，据报在甘肃发生了回民的叛乱，而新疆也十分不稳；叛徒們宣布了一个反对异教的宗教战争，喊出了“杀死佛教徒”的作战口号。^⑩ 新疆的不稳到下一个个月便发展成为叛乱。^⑪ 一八

① 巴克斯-埃龙賽致薩里貝利勳爵函关于余蛮子动乱的提要，一八九九年五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号”，一九〇〇年，第一五一頁；“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一月九日、二十三日、三十日。

一月间电报局通告，从重庆拍发的电报“因廬州段电钱杆被暴徒破坏而迟誤。”——同上，一八九九年一月九日。

② “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五月十三日。

③ 同上，一八九九年七月十七日。

④ 同上，一八九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⑤ 同上。

⑥ 同上，一八九九年九月四日。

⑦ 同上，一八九九年十月九日。

⑧ 同上，一八九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⑨ 同上，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四日。

⑩ 同上，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⑪ 同上，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九八年年底从陕西得到的报告说，三原县有“消灭洋人的阴谋”；^①在一八九九年十月，“巡撫的离省給各秘密会社以倡乱和攻击教会的又一次机会”。^②

十二 湖北和江西的情况

湖北由于毗邻四川而受到波及，据报在一八九八年年底发生了一次叛乱。^③这次叛乱被镇压下去了，在二月間，有四个人因为在宜昌以南的长阳犯罪，在宜昌被处死刑；据报乡間比較平靜，但是謠言盛行。^④三月間在更南的长乐有更多的叛徒被处刑，在西面一带被处刑的叛徒更多，在当月月底被处刑的人数有增无已。^⑤施南府^⑥在四月間、安陆府（在湖北省中部）^⑦在六月間先后发生变乱，在七月間长阳又发生了一次特別为反对教会的叛乱。^⑧在九月間，武昌东南的兴国州表现出一种敌視洋人的精神，人民喊着“杀洋鬼子”的口号。^⑨九月底据报，在湖北省的西南部，已經在春季镇压下去的叛乱，計劃在一九〇〇年春重整旗鼓，再次爆发；对于洋人或与他們有关系的人絕不加怜恤；南京将要作为帝国的首都；^⑩事实上，一九〇〇年在湖北是以“哥老会十分活跃”而开始的。^⑪在邻省的江西，传说二月間在长江沿岸的武穴“发生不穩”。^⑫

① 十二月二十八日三原通訊，載“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二月六日。

② 十月二十五日同上通訊，同上，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四日。

③ 給刘坤一的上諭，同上，一八九九年一月三十日。

④ 同上，一八九九年三月十三日。

⑤ 同上，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四月三日、十日。

⑥ 同上，一八九九年五月一日。

⑦ 同上，一八九九年七月十七日。

⑧ 同上，一八九九年八月七日。

⑨ 同上，一八九九年九月十一日。

⑩ 九月二十九日宜昌通訊，同上，一八九九年十月九日。

⑪ 一月十五日同上通訊，同上，一九〇〇年一月三十日。

⑫ 同上，一八九九年二月二十日。

在六月間，省会南昌于二十一日发生了反对教会的暴动，并且宣布在二十六日那天把所有的洋人驅出城外。^① 十月間在广信府的河口发生了一次暴动，內地会教堂被毀了；^②在饒州府发生了一个普遍反对天主教的行动，教堂被毀，神甫們被迫逃跑。^③ 在十二月間在跨越湖南的萍乡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叛乱”，要想鎮压它，須派遣六、〇〇〇名軍隊。^④

十三 安徽和江苏的情况

在安徽和江苏的北部叛乱传布很广，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黄河泛滥的灾害而引起的。^⑤ 在一月間，上諭曾述及“徐州府[江苏]和阜阳[安徽]的叛乱，两地相距一百哩”。^⑥ 在二月間，安徽的叛徒“向北进展”^⑦这就是說，向河南进展；江苏北部的叛乱“仅仅部份地被制止了”。^⑧ 在三月間，安徽北部发生了普遍的慌乱，这是由于懼怕叛徒們而引起的；^⑨ 在江苏的揚州，有发生暴动的恐懼，哥老会和大刀会正在举行秘密會議以組織叛乱。^⑩ 在四月間，安徽的叛乱据說是平定了；^⑪但是在第二年的一月間，受到在山东的大刀会的成功的鼓励，安徽便成立了一个名叫小刀会的組織，据宣布，其目的是“劫掠教徒和富人”，許多搶案都是他們干的。^⑫

① “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七月三日、十日。

② 同上，一八九九年十月九日。

③ 同上，一八九九年十月十六日。

④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宜昌通訊。

⑤ 給刘坤一的上諭，同上，一八九九年一月三十日。

⑥ 同上，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⑦ 同上，一八九九年二月九日。

⑧ 同上，一八九九年二月二十日。

⑨ 同上，一八九九年三月十三日。

⑩ 同上，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日。

⑪ 四月十五日湯阳通訊，同上 一八九九年五月十五日。

⑫ 同上，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四日。

十四 滿洲和直隶的情况

在滿洲，发生了一次由駐在旅順口的俄国当局的行动所引起的騷动。他們僭取了在保留給中国管轄的領土之內征收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地租的权利；因此一群农民，也是当地的居民，无武装地聚集起来并呈递了一份謙卑的抗議式的請愿書，他們遇到哥薩克兵，并遭枪杀；俄国人当然沒有受到損害，据报中国农民有九十四人被杀，一百二十三人受伤，其中許多是妇女和儿童。^① 俄国最后同意对每名被杀的人賠償七〇〇两銀子，对于受伤的人也賠償以相当数額的錢。^② 两方面都沒有繼續进一步行动，但是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感情却未見增加；中国人民就在这个时候，要求国家“否認英国和俄国有达成划分势力范围协定的权力，理由是：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帝国。”^③ 在滿洲的其它各地，非法的事件盛行，乡野被馬賊所蹂躪，^④ 这些馬賊以后被称为紅胡子。^⑤ 正在直隶边界的南票被称做是一个“匪窝”，当地的人口有六分之一是这个匪組織的积极分子，其余則大多数是贊助者和煽动者；在这周围二、〇〇〇方哩的地区都受到威胁。^⑥ 在直隶南部有很多的繼續不断的騷动都是与山东的情况直接关連的，这点以后再講。

十五 因抵抗德、意侵略使不安情况加甚

在一八九九年的一整年，并繼續到一九〇〇年，帝国的每个省

① “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三月十三日。

② 一八九九年六月十二日涇阳通訊。

③ 同上，參看第四章第二十六节；第五章第二十五节。

④ “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六月五日、十二月四日。

⑤ “紅胡子”。Chunchutze [Khunkhutze] 是俄文的譯文，就象 Kharbin 之譯为哈尔滨一样。

⑥ 巴尔敦 (Sidney Barton)，“关于一八九九年滿洲西南边境匪情报告”，“中国，第一号”，一九〇〇年，第三七四頁。

份都发生有不安、暴动或叛乱的情况；在每一个省份里，传教场所都被攻击，在云南和山东的铁路工程师是在中国的外国人当中唯一不在条约口岸庇护之下的人也被攻击；在许多省份中，不满的情绪竟采取了对现存政府背叛的方式。贯穿着整个的不安情况有两条恐惧的线索，一条是对德国人在山东的所作所为的恐惧，一条是恐惧意大利在中国中部沿海所抱的目的，这两条线索都激起了对所有的外国人的不信任。在三月间，在中国的领海上的意大利舰队包括有四艘巡洋舰，计一四、三五一吨，装有一一〇门大炮，另外还有两艘巡洋舰正在来华途中，^①借以支持它的要求。^②在中国，意大利从未被视作是列强之一，中国人——大臣和百姓们都是一样——觉得“意大利的行动是完全不合理的——他们甚至来不及等到一个传教士的被杀，便提出海軍根据地的要求”。^③抵抗是决定下来了。在五月间，在两广和閩浙总督统轄区以内的五个省份的总督和巡撫“奉命因意大利和德国的恫胁态度，应整軍备战”，浙江省当局则奉命采取积极步骤以保卫三門湾；^④在六月间又頒下一道諭旨，命令南洋大臣刘坤一在他的轄区内用武力抵抗任何欧洲国家的武装部队的登岸，为了这个目的，他是被授以“全权”的。^⑤在整个的一年中，繼續不断地准备着抵抗；^⑥国家已經燃烧着叛乱和排外暴动的火焰，現在又煽起了敌視外人侵略的烈火。政府也掀起了得意的情绪；在这年春季，据报“政府自信有力可以用武力来对付武力”；^⑦在十一月底，下令所有各总督和巡撫，授他們以“武

① “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三月十三日。

② 參看第五章第二十九节。

③ 三月二十日北京通訊，“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四月三日。

④ 五月二十六日上諭，同上，一八九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⑤ 六月五日上諭，同上，一八九九年六月十二日。

⑥ 同上，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十二月四日。

⑦ 同上，一八九九年五月一日。

裝抵抗所有對你們統轄區的侵略的全權和自由，並且在必要時，可以不先請示北京而宣戰”；“如果再有一八九七年在膠州發生過的那種情形發生，優柔寡斷，或對犯境敵人的保證深信不疑”，他們將不得“辭其咎”。^①

十六 剛毅的使命使不安情況更加嚴重

在這個動蕩時期中，帝國由於採取各種步驟以彌補已經枯竭了的國庫而致舉國沸騰。五月間，協辦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剛毅被派為欽差大臣調查江蘇省官吏的行動，特別是總督劉坤一的行動。^② 剛毅是滿族近支，他在前幾年的反維新的運動中擔任了一個主要的角色，他是極端反對外國和一切改革的^③。他的使命包括三方面：表面上的目的是調查；其次是設法把省的稅收從現在的八千萬至少增加到一億，以便彌補帝國國庫估計約有兩千萬兩的虧欠；而最重要的還是西太后需要錢，很多的錢，以鞏固她的地位，以便對付維新派，因而剛毅就奉派為她弄這筆錢^④。這位“勒索大王”——外國的報紙如此稱呼他——找到了這筆錢。劉坤一足夠伶俐，他直接與西太后接頭，因而剛毅受到了冷淡的接待；但是僅僅從江蘇一省的其它官吏中，他却獲得每年增加二百萬兩的捐獻，這個數目“恰好比一向匯解的數目增加百分之五十”。^⑤ 他的使命

① 西太后密旨，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總理衙門通告，見一九〇〇年一月二日康格致海約翰書，“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〇年，第八四頁。

② 五月二十一日上諭，“北華捷報”，一八九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巴克斯-埃龍賽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一八九九年七月十日，“中國，第一號”，一九〇〇年，第二五六頁。

③ “剛毅對洋人的狂妄的仇恨是很容易把這個帝國在不久的將來置於災害的苦境。”——北京通訊，“北華捷報”，一八九九年一月十六日。

④ “剛毅是一個全然無知的老頑固；他在職好多年，什麼也沒學到。”——同上，一八九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⑤ 同上，一八九九年八月十四日。

⑥ 梅耀立(S. F. Meyers)，“關於剛毅巡遊江南的報告”，一八九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國，第一號”，一九〇〇年，第三五〇頁。

被扩大了，他又依次去江西、安徽、浙江和广东；在这五省中“刚毅对于制止勒索并把本来流入省方官吏私人腰包里的款子变为帝国国库收入的工作”，被西太后宣称为“实在值得表扬而切实可靠的”。^①从这五省，他必须把省方每年对国库的献款至少增加五百万两。此外，他既然大权在握，^②便不能不替西太后弄回成百万的银子，作为捐献者们的特别孝敬；我们可以相信这位满汉官场里的代表人物为了他出了力的原故，曾经使他自己得了足够的酬报。在一八九八年一月由于德国的要求而被革职的李秉衡为了同样的目的奉派至满洲充任钦差大臣，兼至直隶巡查；在天津，开平煤矿各董事被要求付出一〇〇、〇〇〇两，海关道被派定付出一〇〇、〇〇〇两；这一位官员实处于两难之中，仅仅在三个月之前他曾为现在的这个职位花了四五〇、〇〇〇两，以致他的财源枯竭，现在他想只拿出七〇、〇〇〇两作为折衷之数；但是最后他还是不得不照所要求的数字付出。^③当中国的官吏被他们的上司如此剥夺时，他们并不驯服地认为这种损失是不可挽回的，而是把勒索转嫁到他们的捐献者身上，归根到底还是由人民来负担；中国人民，已经十分激怒了，税吏们对他们的课征的增加更是火上加油。^④

十七 荣祿与庆亲王之间的敌对

继承皇位的问题^⑤还没有得到解决，对于国家已经产生了影

① 八月十三日上谕，“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② 八月十三日的第二道上谕，加封和提升了一些由刚毅保荐的官员，也贬黜了一些被刚毅参劾的官员。——同上，一八九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③ 天津通讯，同上，一八九九年八月七日。

④ “为这个不幸的帝国增加苦难，刚毅又被派遣到广东省搜括钱财和兵丁；看来这差不多象是西太后急欲把那里经常燃点着的叛乱星火煽成大火。”——同上，一八九九年九月十一日。

⑤ 参看第六章第十九、二十四两节；参看本章第二十七到三十节。

响；北京的党派斗争更加激烈。维新派自然是处于一种停止活跃的情况，但是在那个牵制维新和请西太后复行摄政的一派中又有两派。温和的一派是以荣禄为首，他统辖着全部北洋的汉人军队，更能得到在北京和各省的汉人的普遍的支持；极端的保守派包括大多数满人在内，是以庆亲王为首，他操着满洲旗营的最高指挥权。倘若发生武装冲突，没有训练的满军一定是要屈服的；但是这个战斗是用阴谋的手段在朝廷里来进行的。在四月间，当意大利初次提出要求而德国在山东采取强硬手段的时候，温和的协商被舍弃，人们看出“在北京的极端保守派自信他们现在有能力以武力来对付武力”。^①这种自信使他们占到上风，到了八月间两派首脑之间的互相仇视更加尖锐。^②可是，西太后现在还没有对那一方面加以支持的准备；正在这个当儿，有把裕禄从天津调到南京去接替已经提请辞职的刘坤一，并复派李鸿章到天津之议；^③但是这个建议，由于荣禄的反对而未实现，他的表面理由是，李鸿章重登政治舞台必将疏远英国，但是实际是因为他想把他的亲信裕禄留在靠近北京的地方。然而阵营中的这种分裂情况使西太后认识了她的地位不巩固，于是决定把废弃当今皇帝的問題再度拖延下去。^④两派斗争愈趋激烈。^⑤刚毅在他从广州归途中，接到把他的使命扩展到四川的命令；但是在十一月十二日他匆忙地离开上海返回北京，以使用他的势力来对付他所坚决反对的荣禄。^⑥由于广州湾方面发生困难問題，李鸿章在十二月间奉派代理湖广总督。^⑦

① “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五月一日。

② 八月二十三日北京电，同上，一八九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③ 同上，八月二十五日，同上。

④ 同上，一八九九年九月四日。

⑤ 同上，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六日。

⑥ 同上，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⑦ 十二月十九日上谕，同上，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参看本章第二十八节。

十八 山东省的排外态度

帝国之中，群情惶急，山东省亦不例外，它在这年中的情况足为一般情绪的典型。在一八九八年，沂州府发生对教会的严重的骚动；帝国的保护命令和安撫的布告是发布了，但是事情的实质是，鎮台已經声明，未經得到巡撫——駐在二百哩远的济南——直接发下的命令，他是不能派军队去保护教会的。^① 情势愈趋恶化，“虽然还未达到一个有組織的叛乱的程度，但是却很快地向着那个方向发展”；有警告說，“在春季德国館团的預計購買土地一定要引起当地的糾紛”，^②进一步的警告是日照“已經达到排外叛乱的边緣，紳士們在領導”。^③排外的风潮現在暫時沉寂，“理由是凡是可以被怀疑与洋人有关系的人，他們所有的每件值得被取去的东西都被夺去了”；^④但是在二月底又重新发现了“反对教会的揭貼和暴动”。^⑤正当这一堆易燃品就要被燃着的时候，有三个德国人想由日照到内地去，在三月二十二日那天被一百名村民所攻击，經過很大的困难才把他們打退。

① 乔尔芬牧师(W. P. Chalfant)致弗乐尔領事(Fowler)函，沂州府，十一月二十九日；康格致总理衙門函，十二月二十日；总理衙門致康格函，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九九年，第一五四頁。

在这个时期內，“北华捷报”有派駐在山东的通訊員們賢能地为它服务，著名的有駐在西北方潘庄的史密斯牧师(Rev. A. H. Smith)，他曾著有好几本书談到中国，还有駐在山东南部沂州府的乔尔芬牧师，这人后来先任濰县华人学院(The Chinese College)監督，其后则为青州府美国神学院(The American Mission Theological Seminary)院长。

② 乔尔芬等人致弗乐尔函，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同上，第一五九頁。

③ 一八九九年一月九日又函，同上，第一六一頁。

④ 沂州府通訊，一月三十一日，“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二月二十日。

⑤ 同上通訊，二月二十五日，同上，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日。

十九 德国所采取的制止反德行为的行动

德国当局采取了迅速行动以制止这个“在整个山东南部正流行着的排外情绪”；^①他们严重地认为这个“继续滋长的扰乱对于传教士和工程师们造成很大的危险”；^②甚至在这件攻击事件发生之前，他们已经派遣武装军队向着日照方面去巡查，这支军队对于两次反对德人的暴行都能予以报复。为了报复对三个工程师的进犯，一队一百二十五名德兵把暴民所自来的两个村庄焚毁了。另一队一百二十五名德兵进到在内陆十五英里的日照，要去惩罚在当地对于一个德国传教士的扣押和虐待行为，并且夺取而占据了城镇。^③这并没有产生效果，在占据这个城镇六星期之后，德兵队长约请地方官吏和士绅开会，在这个会议中他告诉他们，他要带走五个绅士到青岛作为人质，以保证解决这个案件；当时发生很大的惊慌，并且他被谴责失信，但是这个队长照着所宣布的企图去做，把人质带走。^④德国的要求于是解决了；对于其它天主教堂的损失也给以赔款；但是对基督教教会的要求一直到来年的八月还没有解决。^⑤

二十 中国人所作的行动威胁；教徒在危险中

中国政府匆忙地作抵抗侵略的准备，可是为时已迟。在五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内，袁世凯带着他的五、五〇〇名士兵、聶提台带着他的七、五〇〇名士兵、董福祥带着他的九、〇〇〇名甘肃军奉

① 奧斯塔夏路易德(Ostasiatische Lloyd), 上海, 一八九九年四月五日。

② 海靜男爵(Baron Heyking) 致康格函, 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美国外交关系”, 一八九九年, 第一六六頁。

③ 康格致海約翰函, 一八九九年四月十七日, 同上, 第一六八頁。

④ 奧斯塔夏路易德, 一八九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⑤ 乔尔芬等人致弗乐尔函, 一八九九年八月十四日, “美国外交关系”, 一八九九年, 第一七七頁。

命出发至山东操演；但是袁世凱所轄的一师兵的德国教官从五月一日起給假三个星期，这就可以假定向南方的进軍并不是仅仅为了操練的目的。^① 这支二二、〇〇〇人的軍隊进入山东，又在一个月之内回到直隶；^② 但是在这个期間内，出現了五月二十六日由于“意大利和德国的威胁态度”而頒发的那道好战的諭令。^③ 从这时起，对于外国人的仇視情緒在所有各省都是那样地强烈，而在山东表現得更为深刻。外国的警卫部队是可以保护他們自己的；外国商人是在条約口岸得到安全的保障；在内地的外国传教士却过着焦急的日子，有一些教会是被毀坏了，但是在目前还没有謀杀事件发生；但是本土的教民被認為是染上了外国的思想，那种别无其它方法可以发泄的全部憤恨就发泄在他們身上。对于每件外国事物都加以仇視的情况繼續增长着，在九月間已經发觉“有一个教派兴起了，他們能够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他們对于外国人和外国宗教的仇恨。为了某种神秘的理由，他們取名为‘义和团’，在上年春季他們曾經企图把在萧张（河北省中南部枣强与衡水县之間）的传教士驅逐出境”。最近他們在庞庄有同样的企图。他們自由行动了有好几个月，知县官明知其存在，但不加鎮压。現在，在宗教狂之上又加上了搶劫，暴徒与强盜都入了伙，于是胆子更大，知县官只能试图同他們說理而已。每天晚間总有某一基督教的村庄被袭击；教徒处于恐怖之中——有些是叛教了，有些是听任敲詐，有些是坚持住他們的信仰。各村庄开始联合起来进行抵抗了。于是人們抱有一种希望地說道，“象在中国发生的其它乱事一样，这个

① 奧斯塔夏路易德訓，一八九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有許多紛乱的謠言，甚囂塵上，說董福祥的兵已經回到此地附近，在山东出現大批的中国軍隊。倘若这些都是事实的話，我恐怕我們的夏天将要免不了有一場亂乱！”——赫德致杜德維函，一八九九年五月十四日。

② “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六月十二日。

③ 參看本章第十五节。

乱事也有消逝的希望。”^①

二十一 义和团的組織

書面中提到义和团，这是第一次。一年以前，大刀会在江苏北部和山东西北部积极发动叛乱；但是在毁坏了一些教会和在乡村造成許多苦难之后，乱事便被镇压下去了。在一八九九年五月間，一种同样的乱事发生于直隶省南部，也同样地被镇压下去了。在所有这个时期中，山东省西部是混乱繼續发生的場所，九月初才知道这些乱事是由“义和拳”操縱的；义和拳这个名称能有两种解释：从文字上来看，——已見之于各种官方的文件中——它表示“义与和的团体”或是“义与和的拳头”；后者是公認的字样，实际上，这个团体是一种“体育会”，以打拳和体育鍛炼作为它的表面的目的。所以，它常被称为“义和团”。在它的旗帜上有四个字的題辞作为标记——“兴朝灭洋”；它的党羽們須經過各阶段的秘密入团式和神秘的仪式；最高級的传授者由于有死人的灵魂附着身体而能使刀、矛或枪弹不入，他們在进行攻击时表现了很大的活跃。当月月望的那天(九月十九日)被选定为攻打山东西北部恩县教会的日子；但是北京和天津方面发出給巡撫的严厉命令，叫他們有效地保护洋人，义和团于是改变了他們的目标而攻打中国教徒的村庄了。^②

二十二 义和团为官吏的同情所支持

在所有被扰乱的地区內的官吏們似乎对义和团表着同情，或是罪恶地加以忽視，充其量也不过是束手无策，袭击天天在进行，

① 庞庄通訊，九月二十一日，“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十月九日。

② “山东西北”通訊，同上，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四日。

而袭击者是受着紳士們的有組織的掩护的。^① 中国的基督教徒被强迫烧香并在庙宇的神象前下跪；但是，不管他們是否屈服，他們所有的可以被拿走的东西都被搶走了，甚至为了准备过冬的粮食也被搶走，而当时由于歉收的原因，从长城起远到黄河的地区都普遍鬧着灾荒。^② 但是对于这些搶劫者却絲毫沒有采取行动予以制止；誠然，在十月初，在山东省西南的曹州府鎮台因为逮捕了大刀会的門徒，曾經同他的六名卫兵遭到暗杀。^③ 可是軍队却曾被派来鎮压这种普遍的紊乱，有一支軍队与一队义和团相遇，后者被驅散了，一百名被杀，若干名被俘虏。这对秩序的恢复曾經給以希望；但是省撫却把府、县都革职，召回軍队，并把逮捕过义和团的捕头鎖铐着押解济南府。于是义和团們明白了，巡撫对于他們的那个团体并不是不友善的，而对于攻打他們的人却是痛恨的，他們的行径受到了鼓励。至于軍队，不管駐扎在什么地方，都奉到命令，除非得到巡撫的明确的指示，不得开枪，这些命令抵銷了以前发給各知县要保护洋人、維持治安的那些訓令的效力——“現在沒有一件比中国当局既不能又不愿‘治理’山东这个事实更确实了。”^④

二十三 义和团的活动增加

义和团繼續着他們的袭击。这些袭击是正常地組織起来的，有一个令传是这样写的：“义和团：着你在九月初七聚齐。兴朝灭洋。有不服从此令者，头顱遭殃。”^⑤ 德国使館在十一月間报告柏林說，“‘紅拳’[义和拳]和‘大刀’教派的党羽們現在是在一种对山

① 沂州府通訊，十月四日，“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② 天津通訊，十月十一日，同上。

③ 同上，一八九九年七月十六日。

④ “山东西北”通訊，同上，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四日。

⑤ 天津通訊，十月二十九日，同上，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东政府和人民进行叛乱的状态中，并在許多地方从事搶劫。”^①有一次，十月十八日在山东北部，他們被从直隶派来由袁世凱的弟弟袁世敦所率領的軍隊打散，六十名被杀，一百名受伤，其中包括数名‘枪刀不入的人’在內”。^②但是他們的行动仍然繼續到年底，在本質上总是反对基督教的，并且总是打着“灭洋”的旗帜；在义和团与教民之間經常发生着战斗，而軍隊却袖手旁觀；对于本国人的基督教徒的虐待是“极端残忍的”，人們被拷打，房屋被毀坏，教民被迫叛教；这个运动已經扩展很远而至直隶。^③

二十四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杀害伯魯克案

在十二月三十一日英格兰教会牧师伯魯克 (Rev. S. M. Brooks) 从泰安回到他在平阴的传教所，在济南府西南五十哩的毛家鋪被一群强盜所謀杀。强盜的首領們被証明是大刀会分子，并且他們有五天的工夫在組織一个排外的变乱；在第六天，他們看見了伯魯克在他的归途中，他們赶紧扎上了紅头巾，^④冲向前去向他攻击；在攻击中他受了伤。他們于是把他的衣服完全剝去，在那极冷的天气中把他綁在外边。在夜間，他們把他帶到毛家鋪，他到达那里的时候，由于赤身露体和受伤，已經筋疲力尽了。他就在这里逃去，但不久即被抓回，并且被斬首。^⑤这种暴行不过是一年多以来在山东

① “北德意志报”(Nord-Deutscher Zeitung)引自古夫勋爵(Lord Gough)致里里貝利勋爵函，柏林，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号”，一九〇〇年，第三六八頁。

② “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③ 十二月四日济南府通訊，十二月一日臨清州通訊，十二月十一日庞庄通訊，十二月四日山东西部某地通訊，十二月十一日天津通訊；同上，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庞庄通訊，十二月十八日，一九〇〇年一月一日，同上，一月十日、十七日。

④ 紅腰帶是义和团的特別符号。

⑤ 正式出席的軍考齡 (S. Couling)所写的二月二十八日在济南府审判的報告——“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三月二十一日。

省对基督教徒所进行的战争中的一个高潮而已，但是它激起了当局的普遍的谴责。帝国政府由西太后的亲笔宣称那是“实深悲痛”；它指出一再宣布过的“所有国家都可以在中国宣传他们的宗教”这句话，并且指出关于此意的“一再颁发过的命令和禁令”，它命令“杀人犯必须捕获并加审判”。^①这个照办了，并且在二月二十八日在济南府把被捕的七个人由臬台当着英国领事甘伯乐的面加以审判。在这些犯人中，两人被判处死刑，一人终身监禁，一人监禁十年，一人监禁两年，一个旅店店主被释放，因为他曾仁慈地给伯鲁克克饮食并替他松绑；村里的地保也被释放，因为他是被大刀会所威逼的，这并不是说他受到这被捕的六人的威逼，而是受到在背后没露面的数百名的大刀会分子的威逼。赔偿费为九、五〇〇两，这是作为纪念死者的费用的，而不是作为偿付血债的费用。当地的知县被控诉到皇帝面前。^②

二十五 毓贤对于义和团的兴起所负的责任

“毓贤是主要的罪犯，除非这个人首先被处刑，我们不能坚持对低级官吏们的处刑，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在他的命令之下行动的，”这是英国公使的评论。^③毓贤——一位皇族，为西太后所特别袒护的人，满洲人反维新派的附和者，因此极端排外并反对一切改革——在一八九九年三月奉派为山东巡抚。^④五月二十六日、六月五日和十一月二十一日朝廷谕令，着所有官吏抵抗外侮，其意

① 六月五日上谕，蜜纳乐爵士致萨里贝利勋爵函，一九〇〇年一月五日，“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三页；康格致海约翰函，一月六日，“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八六页。

② 康寿龄的报告，如前注；蜜纳乐爵士致萨里贝利勋爵函，一九〇〇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一二页。

③ 同上。

④ “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日，四月十七日。

固在对付意大利的要求，亦在对付德国在山东的侵略，这就在毓賢的肩上加了一个特别重担，那就是要把山东的德国人局限于适当的范围之内。他是个满洲人，在治国的观念上不及普通的汉人官吏，他在一开头便接受了这样的思想：制止洋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使他处境不安，这也是董福祥和許多地位更高的人們的思想。接連地經過夏季与秋季，上海的新聞記者，一般都是美国传教士，他們指出，那是巡撫毓賢，只有他一个人，使恢复治安成为不可能；就是他支持士紳們仇恨洋人的态度，是他阻止了地方官吏保护受害者的热誠，是他禁止軍隊采取行动，是他用某些技巧释放了义和团的头目。中国人的意見也支持这种信念。在一封从济南府的一个中国人发給他在上海作官的兄弟的信中确凿地說明毓賢教唆了义和团；他实际上对义和团和大刀会曾經說过——“去杀搶，并且消灭一切洋人和教徒，虽然結社是朝廷明令禁止的，我愿赦免你們的这种罪。”这位中国人写了許多义和团搶掠的例子以后，写道，毓賢曾經对他的官吏們說过——“把所有的传教士和他們的教徒們的請愿書都視作废紙；”信中又加了一句——“倘若他要攻击洋人，为什么不打发义和团到胶州去对付德国人呢？”^①

二十六 袁世凱接替毓賢为巡撫

受到直接影响的洋人是美国、英国和意大利的传教士以及德国的传教士和工程师；而美国的传教士則首当其冲。美国使館感到这种危险，一再提請总理衙門注意，对山东的紊乱情况有采取有力措施的急切需要，并且对于这事要发給巡撫以“絕对的，不容誤解的命令”；^②最后那位公使要求将毓賢撤职——“倘若这位巡撫

^① “北华捷报”譯文，一九〇〇年一月十日。

^② 美国使館致总理衙門函，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十六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十二月二日、三日、五日，“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七八及以后各頁。

不愿意或不能够控制暴徒和保护人民，他应当立刻撤职，派能够而愿意的人去接替他。”^① 中国政府照办了，十二月六日的一道諭旨把毓賢召回北京，派袁世凱代理他的职位。^② 义和团的运动繼續扩展着，但是叙述一定要暂时中止，以便談論一下皇帝的命运。

二十七 廢棄光緒帝的最初各項企图

在反对維新的运动中，光緒帝的生命在实际的危險中，即使生命可以保全，他的旦夕被廢似乎只是为了怕外国的干涉和在保守派中对他有利的那一系的存在而避免了。^③ 在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西太后表示了一个要用覲見的方法来与外国意見达成妥协的愿望，皇帝与西太后第一次接見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奧国、荷兰和日本使节的夫人；貴重的礼品賜給每位夫人，一个有利的印象产生了。^④ 但是廢君的問題并未放棄。在九月初——在勒索大王剛毅要結束他的出巡的时候，在义和团兴起于山东，而成为真正的危險的时候，在榮祿与庆亲王之間的互爭变为明显而两派的御史爭向皇上呈递弹劾，互相攻訐的时候——在这种危机之下，廢君問題确切地决定了，拟議中的光緒帝的繼任者为溥儀，他是載瀾（按：系載漪之誤）——庆亲王的朋友和拥护者——的一个九岁的儿子；最初的步驟是在九月四日单独用皇帝的名义下詔說明他的健康情况不佳并向西太后請求准許讓位。^⑤ 中国的一种习惯是一个官員要想辞职須連上三次說明健康不好的辞呈，头二次要被拒絕，在第三次的呈請中才得到他所要的最后答复，皇帝这项請求第一次被拒絕了；但是据报俄国从滿洲准备調派大批軍隊，

① 康格致总理衙門函，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五日，“美国外交关系”，第七八及以后各頁。

② 康格致海約翰函，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七日，同上，第七七頁。

③ 参看第六章第十九、二十一、二十四各节。

④ “北华捷报”，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⑤ 北京电，九月七日，同上，一八九九年九月十一日。

这是一个不祥之兆。^① 汉人官吏呈递了许多奏折反对任何废君的企图，并且荣祿的力量也足以使这种决定延缓。^②

二十八 繼續煽动

滿洲王公、貴族和各旗坚定地站在庆亲王方面，荣祿現在实际上陷于孤立；从这时起，他在西太后左右議事的影响迅速地减退。^③ 可是，他对庆亲王的优势仍然坚持斗争；^④ 但是后者現在找到端王載漪为其联盟，載漪是嘉庆帝的第三个儿子的孙子、第四个儿子的嗣孙。^⑤ 他是慈禧的坚强的党羽并且在朝廷中是个新起的人物；他原是貝勒（三級王爵），在一八九四年晋升为郡王（二級王爵）。^⑥ 在十一月間，一个重新提出的废君的建議是被大部分滿人所支持，但是为一部分滿人和許多有势力的汉人，包括李鴻章、刘坤一和张之洞在內，所坚决反对。^⑦ 李鴻章的反对可能就是 he 虽然保留着軍机大臣职位，但在作了北洋大臣之后，却奉派为辽远的、职位較低的代理湖广总督的一个因素。^⑧ 在一月一日光緒帝下了一道很重要的詔書——“現在朕躬違和，所有年內及明年正月应行升殿一切筵宴均着停止。”^⑨

二十九 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四日溥儀被选为同治帝的假定繼承人

中国六十年甲子中的庚子年，即光緒二十六年，西历一九〇〇

① 北京电，九月七日，“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九月十一日。

② 北京电，九月十七日，同上，一八九九年九月十八日。

③ 同上，一八九九年十月二日，一九〇〇年一月三十日。

④ 同上，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六日。

⑤ 参看本书第二卷，第十三章后附表。

⑥ 北京通訊，十一月二日，“北华捷报”，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⑦ 同上，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四日。

⑧ 参看本章，第十七节。

⑨ “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一月三日。

〇年，是滿洲大清朝代命運有關的一年。那年的閏月^①是八月，年份為庚，又遇到閏八月，這一向被人們認為是對於朝代充滿着災害的。這個惡兆從以下的事實看來更加令人驚心動魄：雖然“庚”年每十年逢到一次，但是從一六八〇年直到一九〇〇年，從來沒有這樣的一個年又遇到這樣的一個不祥的閏月。再者，在一八九八年，中國百日維新的那年元旦，是西曆一月二十二日那日發生日蝕，日蝕的中綫經過拉薩到內蒙古，在北京日蝕達六分之五——這預示人民有災害。這些惡兆如此緊接着發生，一個是對人民有關係的，一個是對皇帝有關係的，在人民的心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但是西太后是會被任何一個惡兆所阻擋的，因此在一月二十四日單獨用皇帝的名義下了一道詔書，在這個詔書中他引叙了他是由於作為咸豐的繼子而為皇帝的這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所以他的兒子要被過繼給同治作為他的繼子；^②他已經虛弱無力有一年之久〔從一八九八年九月開始〕；“……敬念祖宗締造之艱，深恐弗克負荷，且追維入繼之初，恭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繼穆宗毅皇帝為嗣，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乃朕痼疾在躬，難于誕育，以致穆宗毅皇帝嗣續無人，統系所關，至為重大。忱思及此，無地自容，諸病何能望愈？用是叩懇聖慈于近支宗室中，慎簡元良，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為將來大統之歸。再四懇求，始蒙俯允，以多羅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儀，承繼為穆宗毅皇帝之子。欽承懿旨，感幸莫名，謹當仰遵慈訓，封載漪之子溥儀為皇子，以綿統緒。將此通諭知之。”

① 陰曆年的十二個月共有三五四或三五五天，與陽曆年的差別是用每十九年中插入七次閏月的辦法來校正的。在中國歷史中曾經採用過許多方法。現在實行的制度是基於兩項原則：第一，冬至一定要在十一月，夏至一定要在五月，春分一定要在二月，秋分一定要在八月；第二，陰曆的閏月一定要在太陽不從黃道帶的一個宮轉到另一個宮的時候。在中國的天文學上，黃道帶分為二十四位，相當於太陽進入每一宮里的第一位（主位）和第十五位（接位）的日子；因此閏月包含一個接位，但絕不包含一個主位。參看賀安（P. Hoang），“論中國曆書”。

② 參看本書第二卷，第十三章第十八節。

第二道詔書冊封溥儀為“先皇同治”的繼承人。第三道詔書任命崇綺(同治的岳父)為太傅,徐桐(漢軍旗,具有頑固的排外觀點)為少傅,隨侍大阿哥,或稱太子,那時他已十四歲。^①西太后又下了一道諭旨“元旦日皇帝[獨自]到甯壽宮叩賀,之後,我到皇極殿受太子和所有王、公、貴族叩賀”。^②

三十 光緒帝未被廢,但被棄置; 廢君的決定延期

光緒帝沒有被廢,但是他被迫承認他作為皇位的繼承者的不合法,這種不合法的情形在一八七五年就有許多滿人和漢人認為是“祖宗的慣例和一向遵守着的繼承法的破壞”。^③這個弱點,當它合於慈禧的計劃而需要被忽視的時候便被忽視了,但是現在她的計劃改變了,所以它又重新被提出了。可是光緒帝自從他繼位以來算是稱職的。由於守孝三年,他得了作為同治的嗣子的應得的地位,並且他已經在位二十五年了;這些事實引起廣大帝國人民的同情,並且夾雜着人們對西太后的深刻的不信任,因為人們覺得她在晚年是濫用她所篡奪得來的權力的。廣東省是反對她的,但是敢怒而不敢言,她為了要控制廣東省,便採取措施要逮捕或暗殺康有為;^④各省的維新派沒有一人不忠於皇帝本人的;大多數漢人官吏也是如此。^⑤劉坤一奉召到北京去,對他被控各事進行答辯,但是

① 一月二十四日上諭,“北華捷報”,一九〇〇年一月三十日;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九日,“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〇年,第九一頁。

② 一月二十六日上諭,“北華捷報”,一九〇〇年一月三十日。

③ 參看本書第二卷,第十三章第十九節。

④ 一月二十四日北京電報,載一九〇〇年一月三十日“北華捷報”。二月十四日上諭,懸賞銀子一〇〇、〇〇〇兩捉拿康有為或梁肩超,活的或死的,同上報紙,一九〇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⑤ 湖北巡撫、臬台和其他五十二名官員曾聯名呈遞一個抗議的奏折。這份奏折曾送給總督張之洞,因他拒絕署名而引起公憤——一月二十七日武昌電報,同上報紙,一九〇〇年一月三十日。

行期一直延迟到春季；^① 张之洞受到示意，着他請假到北京，但是他婉却了，^② 因而受到斥責。^③ 奏折雪片飞来，有一份在一月二十六日由經元善和其他一二三〇人联合签名的电报从上海拍給皇帝，向他保証他們的忠心，并請求不要讓位。^④ 这种集体式的奏折共收到了四十六份，^⑤ 发生了效力，使慈禧犹豫而采取中間路線。一月二十九日发出四道諭令，規定在八月六日庆祝皇帝三十岁誕辰的程序：第一道禁止举行任何特殊的仪式；第二道禁止高級官吏請假来京祝賀；但是第三道对于照例的恩科却令其举行；第四道規定須穿七天全副朝服，就是在誕辰的前三天和后三天。^⑥

三十一 一九〇〇年一月十一日頒发了一件 不祥的鼓励义和团的諭旨

一月四日的諭旨对于伯魯克被杀案是用一种安撫的口吻的，但是在十一日另行发出一道諭旨，美国的使节对于这道諭旨声明說——“对于它的奇怪的措詞，我个人是有些担心的；”^⑦ 法国的代表認為它的詞句的特点是“含糊不清，模稜两可”因而是“語意双

① 同一九六頁注⑤；參看本章第三十五节。

② “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二月七日。

③ 一月三十一日上諭，同上。

④ 同上。首先在这个电报署名的經元善后来在澳門被捕。二月二十六日，香港电报，同上，一九〇〇年二月二十八日。葡萄牙当局把他关在獄中，并对他的案件加以考虑，直到义和团起义时，才把他釋放——同上，三月二十一日。

⑤ 宮廷里的一个太监曾經宣稱当一月二十四日皇上被逼簽署退位詔书时，他是在場的；在这个行动之后，皇上由于微血管爆裂而政躬不豫。西太后接到經元善等的奏折时異常憤怒；但是又收到四十六份同样的联名抗議书，这才使她对于废君問題停止和擱下，但并不放弃。——同上，一九〇〇年三月十四日。

⑥ 同上，一九〇〇年二月七日。

⑦ 一九〇〇年一月十五日康格致海約翰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八八頁。

关”；^①但是，英国公使只說道，“其中有些部分是可以疑懼的。”^②这道諭旨先說“邇來搶劫之事在各省都大为增加”，并說这是由于“坏人和叛徒們的帮会和社团”，然后便命令“对于这些团体的性质和目的須加以区别”。为了搶劫和暴动而成立的那些組織是不能容許的，但是“倘若是守法而忠誠的人民联合自保，或是各村联合互相防禦，这是老百姓实行守望相助的天职”。官吏們倘若不能如此的加以区别，便是未尽他們的职责；对于传教士和教民应公平待遇并加以保护；但是“保护或防守他們的家园是人民的天职……安靜与和平于是可以实现……实所殷盼”。

三十二 对毓賢的恩宠加深了对义和团的鼓励

从山东和直隶南部再传来的报告“証实了一般的意見，即这个諭旨……被义和团和大刀会認為是袒护他們的，并且給他們許多鼓励……他們的人数逐日增加并有发生更严重的麻煩的危險”。^③一般人更进一步的相信，西太后已經决定“董福祥应当实行他的把所有洋人驅逐到海里去的計劃”，要达到这个目的，她認為义和团是一个很有用处的联盟。^④这些信念，由于在北京給与毓賢的接待，在洋人乃至义和团的心目中都加强了。一月十六日的京报記載宫廷消息說，“毓賢到达北京，被召見了，西太后并賜以福字的匾額。”^⑤总理衙門解釋說，这不过是照例酬答勛劳而已；^⑥但是美国

① 一九〇〇年三月十三日唐紹納 (d'Anthouard) 致德賽加賽 (De Cassa) 函，一九〇〇年，“外交文件”，第七頁。

② 一九〇〇年一月十七日寶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八頁。

③ 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康格致海約翰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九三頁。同时參看一月十一日天津通訊、一月十日沂州府通訊、一月六日臨清州通訊、一月十六日和二月六日山东西北部的通訊，載于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四日、三十日和二月十四日、二十八日的“北华捷报”。

④ “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二月十四日。

⑤ 同上。

⑥ 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康格致海約翰函，同前注。

公使对于处置山东乱事失之太宽一节，立刻提出抗議，他声明說，“朝廷对巡撫毓賢的表揚，必然为这样的一些意見提供了理由。”^①

三十三 各国使团要求取締义和团

直接有关的各国使团是美、英、法、德和意的使团，他們更为感到惊恐之后，便在一月二十七日向总理衙門提出一个同样的照会，吁請注意那道諭旨的模稜措詞，并且要求另发一道諭旨“下令指明对义和团和大刀会予以全部取締”，并且可以“在諭旨中清楚地說明，凡属于这些团体的或隱藏其分子的，都是违反中国法律的罪犯”。^②这个问题对于使团是很急迫的，但是中国政府并不觉得如此，因为它正忙于解决繼承皇位和庆祝新年等更重要的事务；但是一个月之后，在二月二十五日，各国使团被通知，已經发出了一道諭旨命令直隶总督和山东巡撫取締那些团体；在三月一日，直隶总督按照給他的命令发出一道布告。在三月二日，各国使团在与总理衙門举行的一个會議上，提出另一份照会，要求把这个諭旨在京报上发表；但是在三月七日，以与先例不合这个照会被拒絕了。使团在三月九日的照会中用更坚持的口吻再度提出他們的要求。美国公使表示他的意見說，“中国政府不是故意地，就是由于怕发生普遍的乱事，对于这件事一开始便公然玩忽，并且完全破坏了条約上的义务；”所有这五位公使都同意劝告本国政府在北直隶湾进行一次海軍示威。^③

① 一九〇〇年一月十八日康格致总理衙門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九三頁。

② “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一三頁；“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九六頁。

③ 一九〇〇年三月十六日、二十三日蜜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一一、二四頁；一九〇〇年三月十日康格致海約翰函，“美国外交关系”，第一〇二頁；一九〇〇年三月十一日、十三日唐紹納致德賽加賽函，“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六、七頁。

三十四 袁世凱任巡撫时的行为

对于袁世凱的行为的意见是分歧的。从他的精力、他的广泛的对洋务的知识以及他在李鴻章手下所得到的长期训练，对他的期望是很大的；所以美国政府就被导致得表示它的信念说，“派袁世凱为山东巡撫，在该省可以展开一个新纪元；”^①但是那些在现场的人们却感觉到“几乎单纯地只有失望”。^②随着时间的前进，那些“在现场”的人们开始看到他似乎是企图做他所能做的事，但是他的手被北京发来的限制的命令以及在他手下的官吏们的暗中阻碍和冷淡的支持束缚住了；^③在中华帝国，一个省的表面上的专制的统治者，总是很奇特地处在一种从上面来的冷淡的不同意和从下面来的暗中的敌视的影响之下。从他在三月十四日由署理巡撫升为山东巡撫的这个事实看来，他是没有逾越北京命令范围的。中国政府不存好意可以由它对于毓賢的宠爱看出来；毓賢是明显地由于美国公使的建议而撤去山东巡撫之职的，那位公使对于西太后加毓賢以恩宠曾经提过抗议，而现在他被任为山西巡撫了；英国和德国公使提出抗议；美国公使认为这个举动是“不友好的”，并且警告中国的大臣们说“他的任命将会引起麻烦”，这个警告获得美国国务院的批准。^④

法国代办认为海軍的示威是“为时过早”；但是外交部长却同意倘若情势没有改进则可以参加合作。三月十三日德賽加賽致法国各大使函，“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一〇頁。英国政府认为这个行动是不合时的，但是同意派遣船只巡邏。三月十五日毕盛(Pichon)从北京致德賽加賽函；一九〇〇年四月四日。刚本(M. Cambon)致德賽加賽函，同上，第一三、一四頁。

① 一九〇〇年二月一日海約翰致康格函，“美国外交关系”，第九六頁。

② 一月十六日山东西北部通訊，“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三月十四日。

③ 同前通訊，三月六日、十三日、二十日、四月二十四日；三月二十九日天津通訊；同上，一九〇〇年二月二十八日、三月二十八日，四月四日，五月九日。

④ 一九〇〇年三月十六日賽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爵士函，“中国，第三号”，第二四頁；一九〇〇年三月二十三日康格致海約翰函，五月十五日海約翰致康格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一一、一二六頁。

三十五 对中国官吏們的賞罰

这个时机被选定为重新发动反維新运动的时机。在二月二十二日，西太后下令逮捕在各省的二十名維新派分子，被迫在江苏常熟原籍家中养晦的光緒帝的太傅翁同龢也在內，^①但是因为他生病的原故，逮捕延期执行。据报，另有几张名单預計要随之而来，包括人数在四〇〇名以上；这是刚毅和其他反动分子搞的，但是荣祿不以为然；人們希望这种迫害只要刘坤一表现出他的力量就可以馬上停止的。^② 在三月九日，有五名主张維新的翰林为了不称职、盗用公款、“失掉正义感”、“居心叵測”等罪状被处极严厉的刑罰；这件事被認為是“西太后和她的亲近的顧問們的极端排外情緒的明証”。^③ 在三月十二日，为了皇帝的誕辰，下了一道諭旨公布了一张加恩賜爵的长的名单；李鴻章奉准在补服上繡龙，^④徐桐賞戴三眼花翎（通常是王公用的），王文韶和刘坤一奉命为太子少保。^⑤ 刘坤一拜命后随即晋京，在四月五日被召見，七日再被召見。他得到了西太后和在場的亲王們的热烈接待；他被强烈地要求去采取步驟“清除”維新派；但是他答复說那是“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工作”；但是明显的是，他是唯一可以維持江浙，及在他管轄下的其他各省的治安的人，不管他一再請求退休，他奉命回到他在南京的职务。^⑥ 他在五月九日又重新到职視事。^⑦ 对維新派的迫害已經停

① 參看第六章第九节。

② 三月一日北京电报；二月二十二日、三月一日北京的中国通訊；“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三月七日、十四日。

③ 一九〇〇年三月十三日康格致海約翰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一〇九頁。

④ 他受到的这个恩賜就等于欧洲的勳章。作为一个头等文官，他所穿的朝服在前胸和后背貼着繡有白色仙鶴的方补；他現在被加恩可以穿戴繡龙的方补。皇帝穿的是繡龙的圓补。

⑤ “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三月十四日。

⑥ 同上，一九〇〇年四月十一日。

⑦ 同上，一九〇〇年五月十六日。

止了，四月十五日的京报公布了取締义和团和大刀会的上諭，外國的軍艦“返回原防”。①

三十六 帝国普遍不安

不安的情緒波及到每个地方。在二月間得到消息說：在距离騰越②二百哩的蛮卡有两名属于英屬緬甸边界委员会的凱德爾 (Kiddle) 和苏滋兰 (Sutherland) 被当地土人所杀，領館人員里頓 (Litton) 受伤；但是这件事上并没有象在一八七五年发生的謀杀案件那样具有重大的政治作用。二月間在河南发生了“普遍不安的情况”，特别是更直接地反对政府和富人。③在湖南，倘若废君問題繼續进行，便有发生总起义的危險，但是在刘坤一——他仍在南京——的影响下，当时該省还保持着安靜。④在湖北，民間普遍傳說当年将要发生叛乱。⑤在云南传播着这句话“磨快你的刀，准备即将到来的战斗”，其意特別在反对法国铁路計劃。⑥在广东，官吏們显然在积极准备对付“在夏季的大叛乱”。⑦在浙江，台州府又发生了教民間旧有的爭斗，并且有一个天主教徒受了重伤。⑧在直隶，“义和拳运动靜靜地伸张到該省的北部”并且据报有八千名端王的軍隊已經“加入了义和团”；⑨在五月初，武装的义和拳袭

① 一九〇〇年四月十六日賽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則爵士，“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二三頁；一九〇〇年四月十六日、五月三日康格致海約翰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一一七、一一九頁。

② 二月十六日北京电报，“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③ 二月二十三日河南北部通訊，同上，一九〇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④ 三月五日北京电报，同上，一九〇〇年三月七日。

⑤ 三月二十七日安陆府通訊，四月十八日宜昌通訊，同上，一九〇〇年四月十一日、二十五日。

⑥ 三月五日昭通府通訊，同上，一九〇〇年四月十一日。

⑦ 五月二日广州通訊，同上，一九〇〇年五月九日。

⑧ 一九〇〇年五月十四日毕盛致德賽加賽函，“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二〇頁。

⑨ “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四月十一日、十八日。

击了距北京八十哩的保定府附近的天主教教民的村庄，杀死和活活烧死的教民約有七十人；^①两天后，他們用同样的方法进攻了距北京仅四十哩涑水县的基督教教民的村庄。^②在山东，除了所有的义和团对教会和教民的攻击外，还有对于德国铁路工程的攻击。最可怕的一次是在二月二日，当时有五名铁路工程师被来自高密的一帮武装匪徒从他們的工地上驅逐出走，在三天之前，有通訊員被中国知县警告不要去到高密附近。^③

三十七 德国报纸对于義团的保証

正当着义和团在山东搶劫各教会的教民和德国工程师的时候；正当着朝廷秘密地在鼓励义和团的时候；正当着皇帝受着被废的威胁的时候；正当着維新派又被追查迫害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在上海的德国机关报抗議在上海的英国报纸“关于中国的事件传播极不可信的謠言，其性质是要使欧洲的人民相信中国不是即将发生革命，就是它的政府制度将要总崩潰”。它譏笑恐懼主义者的报告，它把这种报告指为“野狐禅”，它宣称这种报告用电报拍到外国是为了达到影响股票市場的目的的；它反对这一种要“搖动对中国現况的信心”的企图。^④

① 一九〇〇年五月十四日畢盛致德賽加賽函，“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二〇頁。

② 一九〇〇年五月十六日又函，同上，第二〇頁；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一日康格致海約翰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一二七頁。

③ 一月三十日、二月二日濰县通訊，“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二月十四日、二十一日。

④ 三月二十日“柏林邮报”轉載奧斯塔夏路易德的敘述，引在一九〇〇年三月二十二日德賽加賽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中，“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一二頁。

三十八 警告排外起义的通知

五月初从北京发出一份更为真切的通知，它告大众说，有一种要消灭所有在中国的洋人并从外国手中夺回所有租界的秘密计划；其主要的首领是西太后、庆亲王、端王、刚毅、赵舒翘和李秉衡；在这个运动背后的武装力量全部是满洲军——庆亲王的军队五〇、〇〇〇人，端王的军队一〇、〇〇〇人，刚毅率领的禁卫军一二、〇〇〇人——并把义和团充作援军；这个计划的实行是迫在眼前。所有上层的汉人都知道这事并且警告了他们的外国朋友，但是被取笑了。外国使团已经要求取缔义和团，因而用沙土迷了眼睛；荣禄现在已经决心站在皇帝的一边。^①

^① 五月八日北京通讯，“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五月十六日。

这一个通讯员是一个在北京作官的中国人，他是那个曾经供给中国以伟大的总督曾国藩和能干的使臣曾纪泽的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他在六月或在七月间在北京和长江之间的一个地方被杀害。

第八章 暴风雨的爆发

- 一 一九〇〇年五月提出对义和团的危险的警告 206
- 二 外国公使们的乐观主义 207
- 三 重加保证的上谕;义和团的敌对行动 208
- 四 五月三十一日使馆卫队开到 210
- 五 五月二十八日铁路交通被阻 211
- 六 六月一日孙牧师和孟牧师的被谋杀 212
- 七 铁路工程师等从保定府逃出 212
- 八 义和团被权要的大臣们所支持 213
- 九 各国使馆呼吁援助;六月十日西摩尔援军出发 214
- 十 情势危急;各国公使建议由皇帝亲自召见公使等 215
- 十一 六月九日至十日义和团在北京附近进攻活跃 216
- 十二 六月九日外国人在北京及其附近集中 217
- 十三 六月十一日杉山彬遇害;六月十三日义和团进入北
京城 218
- 十四 六月十四日义和团冲入天津 219
- 十五 六月十六日至十七日各国海军上将发出最后通牒,
夺占大沽炮台 220
- 十六 美国海军上将避不合作 221
- 十七 摆在各海军上将面前的情势 222
- 十八 遭遇到中国政府的敌对态度 223
- 十九 夺取大沽炮台对于外国侨民地位的影响 224
- 二十 夺取炮台是引起敌对行为的借口而不是原因 225
- 二十一 六月十一日西摩尔海军上将在廊坊被阻前进 227
- 二十二 六月十六日到二十六日西摩尔退却并获解救 229
- 二十三 六月十七日向天津外国租界进攻 230

二十四	六月二十三日救兵自大沽开到	230
二十五	六月八日至二十日北京陷入半包围状态	231
二十六	中国政府的坐视和缄默	232
二十七	六月十九日一篇报纸社论和一份捏造的公文	233
二十八	六月二十日军机会议决定开战	234
二十九	六月十九日各国使节限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北京	235
三十	各国公使准备离京, 请求调见	236
三十一	六月二十日克林德男爵独自前往调见	237
三十二	克林德男爵被满洲兵所杀; 柯德受伤	238
三十三	杀害消息的奇怪的预知	239
三十四	使馆区在下午四时被义和团与军队攻击	239

一 一九〇〇年五月提出对义和团的危险的警告

“北京、天津和保定府都被一群如疯若狂的人们所包围，他们的人数因为有一伙激昂的流氓加入而增大，并且由于受到具有高地地位的领袖们的支持，他们在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到处抢、劫、烧、杀。目前，他们的行动是向着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中国教民……他们并不讳言他们要把所有洋人驱逐出去的目的……所用手段是破坏教会和向欧美侨民进行普遍的捣乱……在他们的旗帜上，他们现在自认是接受帝国的命令而行动的。”^① 法国公使就这样在五月二十日那天为北京天主教主教樊国梁 (Mgr. Favier) 的警告信所驱使而采取了行动，这封警告信是那位主教的很多的同样的信里的最严重的一封，他是“在极端惊惧的情况下写的，他要求派遣海军卫队并宣称最大的不幸事件即将来临。”^② 警告是很多的，多得

①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日毕盛致德赛加赛 (Delcasse) 函，法国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二一頁。

② 同上，主教函札，“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一〇七頁；“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一三〇頁。

使人們习以为常而不去理会它們；可是，另一些把它們看得很严重的人却以为乱事的爆发可能延迟到八月（阳历九月），而在那不祥的閏八月的前一个月。^① 在中国的英国报纸有两家——在上海的“北华捷报”和在天津的“京津时报”——它們是重視这些警告的，它們当时都在很有才干的編輯主持之下；前者在这个日期的十天之前发表了一篇社論說，“在北京的汉人写道，他們逐漸更加相信，当权的滿人預备在华北发动一次把洋人一齐驅逐出境的大胆的企图”；它在引証了許多先例之后，指出五月和六月是在中国发动叛乱的有利的月份。^②

二 外国公使們的乐观主义

法国公使“被樊国梁主教的忧懼引起深刻的印象”，^③ 因而和他的同僚們开了一次會議来考虑这个局势。會議一致同意应当发出一个联合照会，明确地要求用逮捕、判罪和頒发諭旨的方法^④ 来

① “我們不能說我們沒有获得警告……事实上，如果有一个警告是我們的耳朵听得太膩煩了，以致我們对它比對我們心脏跳动的声音还要不予注意的話，那就是中国人的虛报‘有狼来’（按：西方故事述及一牧童呼集邻人拒狼吃羊而无狼，其后狼至，虽狂叫而邻人不来。——譯者）……我們当中有些人認為这个运动是很严重的，但是我們不曾預料它在秋季之前会成为一种危险：它的提前发展是真正的一件奇事。”——赫德：“来自中国”，第一頁。

“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中，一般人預料在陰历八月总要发生严重的变乱。許多作这样預測的人，因为災难提前好几个月发生，而感到惊异。”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一，第二一九頁。

“有很多預言說在陰历八月要发生总的变乱。”——四月十八日宜昌通訊，“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② 同上，一九〇〇年五月九日。里德爾（Robert W. Little）是“北华捷报”的主笔，米其（Alexander Michie）是“京津时报”的主笔。

③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一日餐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一〇三頁。

④ 同上，第一〇九頁；“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一二九頁；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二四頁。

取締義和團。召集使館衛隊的問題被考慮了，但是延遲未決定，有幾位使節對於在這個階段就採用這個步驟表示不願，因為他們怕促成排外分子的團結並且把中國政府逼到義和團的懷抱中去。^① 德國公使考慮到，倘若中國政府不能取締義和團，應該採用在山海關附近集結軍艦的方法對它施以壓力；會議決定把這個步驟向各國政府推薦，作為應付意外的手段。^② 英國和美國公使在五月十八日都訪問了總理衙門，並且對將來的結果都抱着希望。前者報告說——“我承認，據我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很少可以証實法國神甫們的悲觀預測。……我對於持續安全的可能性的判斷，一定要推遲到中國政府表現了在最近幾天中是否願意並有力量去完成它的義務之後。”^③ 美國公使報告說——“我相信中國政府是覺醒了，它本身對於局勢感到驚訝，它將要採取更有力量的行動；但是在作出行動以前，沒有人能夠相信。”^④

三 重加保證的上諭；義和團的敵對行動

中國政府採取有力行動一說，沒有獲得證明；但是在政府中可能不同地被稱為小心翼翼的、或畏懼後果的、或顧及政府的國際責任的、或對外國友善的那一派，被允許用極正確的口吻發布些諭令來安慰各國使團。有一道上諭——原想在五月十七日秘密發出的，但是在五月二十一日才讓各使團知道——命令北京警備當局

① “甚至在現在各使館還有許多人反對調來大批部隊。”明恩溥：“中國在激變中”，卷一，第二一〇頁。

② “我們不認為處境已達到非召集使館衛隊不可的情況。”——賽納樂爵士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中國，第三號”，一九〇〇年，第一〇三頁。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一日康格致海約翰函，“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〇年，第一二七頁。

協議并呈报制止义和团活动的最好方法。然后，在五月二十四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又繼續頒发三道上諭，措詞严厉，无以复加，它們限令“立刻采取行动并将义和团首領与头目力予逮捕而驅散其众”，教堂則加以保护云云。^①各使团又一次获得保証了。英国和美国公使抱有希望的那种精神曾經被人提到；这时俄国公使作了一个报告，在俄国的外交大臣看来“危险現在是减少了”；^②同样地，根据法国公使的报告，德賽加賽直到六月五日还繼續認為“在目前，一切紧迫的危险是过去了。”^③可是在此期間，事件的发生超越了重加保証的上諭，在五月二十五日，义和团在北京以南六十英里的霸州攻击并毀坏了一个美国教会的教徒的房屋，并且“杀害了九名基督徒妇女和小孩。”在二十八日，“有消息說，鐵路被攻击了，在保定府鐵路上的两座桥梁和两处車站被烧；仅距北京十英里，在京津鐵路綫上的丰台連同所有的机器間都被焚燒，北京与天津間沒有火車行駛。”^④每个使館单独地已經請調海軍到天津并且在五月二十八日所举行的會議中，決定下令召集使館卫队；^⑤法国公使实际上在召开會議之前已經請調他的卫队了。^⑥

①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日康格致海約翰函中的上諭譯文（十月二十四日到达华盛顿），“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一三二頁。

② 一九〇〇年五月三十一日斯各脫（Q. Scott）从圣彼得堡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三一頁。

③ 一九〇〇年五月三十一日和六月四日、五日蒙森爵士从巴黎致薩里貝利勛爵函，同上；第三二、三四、三五頁。

④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九日賽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同上，第三〇頁；一九〇〇年六月二日康格致海約翰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一三二頁。

⑤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八日同上函，同上，第一三二頁；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九日賽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三〇頁；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毕盛致德賽加賽函，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二七頁。

⑥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九日賽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三〇頁。

四 五月三十一日使館卫队开到

当各使館根据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約在北京建立起来的时候，開設的三个使館^①中的每一个使館都設有卫队，以保护它在一个不欢迎它的首都中的安全；但是日久以后，这个卫队减到仅足以作为仪仗队的数目。后来，在危机来临的时候，就从几个艦队中派遣海軍陆战队去担任在冬季保护使館的特殊职务，因为这时北京由于天津港口結冰而与外界隔絕；在一八九四年和一八九八年年底都这样做了，每次派遣的卫队都在三月間撤回。这种卫队是由各大国按照它們派駐北京的各使节的一个联合呈請而共同派遣的，但是美国政府在一八九五年二月，虽然同意参加行动，却对原則表示不贊同，并宣称适当的办法是由使館要求派兵护送至“一个安全地方，在这个地方你們将在你們本国的国旗下获得直接的和合法的保护。”^②在一九〇〇年美国国务院并没有表示这样的异議，^③但是对于联合行动問題却仍然抱着一些疑懼。^④其他国家毫无保留地同意了。总理衙門拒絕允准，^⑤因而駐天津的总督拒絕批准所

① 美国第一任常駐使节蒲安臣 (Burlingame) 直到一八六二年七月才到达北京。

② “总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讓使館在面临危急的情况下仍留北京，甘願冒险；因此，你有权取得充分的护送而迁移到一个可以在你本国国旗下得到直接而合法的保护的安全地方，以避免这个危险。然而，鉴于你在本月十八日拍来的电报，报告其他使館在中国同意下正調集卫队到北京，我便在十九日电复，准許你在同样情况下調集海軍陆战队。”葛礼山在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致田貝函，“美国外交关系”，一八九五年，第一九八頁。

③ “为了使館的安全如有需要，可与海軍上將商洽派遣卫队前往保护。”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六日喜尔致康格电报，“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一三二頁。

④ “如屬可行，就采取单独行动以保护美国利益；如有必要，才可与其他国家的代表采取共同行动。”一九〇〇年六月八日海約翰致康格电，同上，第一四三頁。

⑤ 一九〇〇年五月三十日寶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勋爵函，“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三〇頁。

必需的鐵路運輸；但是經過再度討論，條件是每個使館不得超過三十名衛隊，於五月三十一日給了許可。^① 這些衛隊是在天津整裝待發的，他們在當天下午六點四十五分到達北京——七十九名英國兵、七十九名俄國兵、七十五名法國兵、五十三名美國兵、三十九名意大利兵和二十四名日本兵；此外，五十一名德國兵和三十二名奧匈兵在六月三日到達；在這些人數之上得加上十九名軍官，總計有四百五十一名武裝人員。其中有兩名軍官及四十一名衛兵保護北堂天主教堂，十七名軍官和三百九十一名衛兵保護使館。英國、美國、奧國和意大利的部隊每隊都有一架機關槍；俄國兵帶來的炮彈，只能用於他們自己的大炮，對於其他國家的炮是无用的，不過他們把大炮留在天津了。英國和法國的衛隊本來各有一百名準備搭乘火車，但是因為俄國衛隊只有七十九名，外交方面的急切需要使兩國不得不將每隊超出的名額留在後面。

五 五月二十八日鐵路交通被阻

引起調集衛隊的警報是很有根據的。直到目前，義和團的仇恨是直接對“二鬼子”的——就是對受了外國毒素的中國教民的；大鬼子經常在危險中，但是除了伯魯克以外，外人的生命還沒有遇到傷害。在五月二十八日那天，外國人造的鐵路已經在北京與天津及保定府之間中斷了，在豐台的機廠也被毀壞；豐台的鐵路工程人員被關在他們的屋子裡。他們遭遇危險的消息在二十九日傳到北京；外國使館忙着開會，具有十來位領袖的外交團沒有採取行動，但是是一個瑞士籍的旅館主人夏慕（Chamot）和他的美國籍的妻子同其他五個人離開了丰台，並且在五月三十日“他們把全部十三個男人、九個婦女和七個兒童平安地帶到北京，他們疲

^① 賽納樂爵士致薩里貝利函，一九〇〇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國，第三號”，第三一頁；一九〇〇年六月二日康格致海約翰函，“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〇年，第一三二頁。

劳，淋湿，并且在一种身心交瘁的情况下。”^①到天津的铁路暂时恢复了，但是到保定府的铁路仍然不通。

六 六月一日孙牧师和孟牧师的被谋杀

六月一日在永清(保定府东北二十英里，在北京沿着霸州方向以南五十英里)有两个英国传教士遭到了他们的厄运。孙牧师(Charles Robinson)和孟牧师(H. V. Norman)遇到一队武装暴徒的威胁之后，逃难到县衙门；当暴徒们要索他们的时候，他们被迫从后门离开衙门，并且被拒绝进入曾经允许收容他们的孔庙。孙牧师在一个城门外被杀。孟牧师逃出城，但是立刻被俘掳了；他被关了二十四小时后被杀。^②

七 铁路工程师等从保定府逃出

在保定府有一大队比利时、意大利和其他国籍的铁路工程师同他们的眷属。接到即将发生严重危险的警告后，他们赶忙集合船只，在五月二十九日下午五点钟从河道开始向天津启程，这是一个包括四十一个人的团体，计有三十三名男人、七名妇女和一个小孩。官方派一队士兵护送他们，但是在五月三十日下午五点钟，军官们用一个小的事故作借口而离开了。在第二天早晨，他们被一群用大刀和长矛(在运动的这个阶段中惯用的武器)的暴徒攻击，而护送的士兵也参加了攻击；这次攻击被打退了。他们于是舍弃了船只，在烈日和风尘之下徒步前进，带着极少的食粮；他们有的时候一面作战一面逃跑，有的时候在村庄之间爬行不使人见，这样经过了四天，在六月四日下午四点钟到达天津。在这一队人中，有

① 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一，第二〇九页。

② 法尔兹(Forsyth)：“一九〇〇年中国殉难录”，第一三——一八页；一九〇〇年六月四日康格致海约翰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一三九页。

九人失踪，二十三名受伤，九名无伤害。^① 这样的开端，是很可以使“各使館認為情况是严重的。”^②

八 义和团被权要的大臣們所支持

在这个危机中，义和团老家的山东，由于巡撫袁世凱的努力而保持了安靜；^③ 但是整个的直隶現在都充斥了义和团，全省都有他們的活動；只是在北京和天津，他們还没有作出公然的暴行，但是甚至在这些城市內及附近，他們已經在招收門徒，訓練并举行神秘的仪式；^④ 甚至在皇宮里，那位新选拔的皇位繼承人“把他自己打扮成一个义和团并且进行鍛炼”，因而受到西太后的斥責。^⑤ 軍机处意見分歧：在持重的那一派方面有荣祿以及几乎是全体的汉大臣；庆亲王总是仇視荣祿的，但是在这次危机中并不反对荣祿的意見；^⑥ 贊成利用义和团运动以驅逐洋人入海的政策的是所有的滿洲

① “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六月六日、十三日。

② 六月一日北京电报，同上，一九〇〇年六月六日。

③ 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二，第六〇四頁；法尔茲：“中国殉难录”，第一二頁。

“茲聞袁中丞〔即袁世凱〕有入洋教之意，如将山东之团禁止，其罪不容于死也。”

——“景善日記”，六月一日，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紀”，第二六〇頁。

④ “对于义和团的操練并不加以禁止，他們公开地在滿洲貴族的府中和庙宇中进行操練。”——一九〇〇年六月八日寶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四二頁。

“〔大公主〕有二百五十名义和团住在后門外的宮里。”（按原文为：大公主亦准二百多团民于府內寄宿）——“景善日記”六月十日，第二六二頁。

⑤ “景善日記”，六月一日，第二五七頁。

⑥ “在另一方面有总理衙門大臣庆王和几乎全部的总理衙門的各大臣。”——一九〇〇年六月四日康格致海約翰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一三九頁。

“庆王在私人談話中习惯地嘲笑义和团，說他們完全无用……可是，在公开場合，他是极端謹慎的。”（据原文为：……庆邸本不信团，力言其愚謬无用，其邪术不值識者一笑。乃日昨召見之时，老佛問其意見如何，究竟可否恃团，庆邸以含糊之辭奏对……）“景善日記”六月一日，第二五九頁。

貴族和大臣，其中为首的是端王、瀾公、徐桐、崇綺和剛毅，站在他們这边的有甘軍領袖董福祥。榮祿年老体衰，常常家居不出；但是在持重的一派中，只有他一人的話还有些分量。在五月三十一日總理衙門准許使館卫队来北京以后，一个以剛毅为首的激烈派仍然要想制止他們进入城門；但是“庆亲王吁請端王不要制止他們进城”，而“榮祿却已經下令准許了”。^① 在六月四日举行的一次宮中秘密會議中，有人建議，义和团不应消灭，因为他們是忠于朝廷的，并且倘若好好地加以武装，他們将成为有用的補助軍隊。反对的人只有榮祿和礼王（代表八大亲王之一）；王文韶默不作声，“西太后未置可否，暗中盘算。”^②

九 各国使館呼吁援助；六月十日西摩尔援軍出发

外国公使們現在看清楚了局势，因而非常惊慌。在六月四日，根据法国公使的建議，他們同时拍电报告八国政府說，“我們可以在任何一个时候被包围，铁路和电报綫被切断”；他們要求，八国政府命令它們的海軍当局“采取联合行动救援我們”；他們声称問題是极端紧迫的。^③ 交通的切断即在目前。“九日从馬家鋪开出最后几列火車；最后一次的电报是在十日发出的；在十五日派出的陆上邮递专差未能到达天津；最后一次从天津来的信是十六日寄出的，十八日收到。”^④ 各国海軍上將們已經被通知了，并且准备应付任

① “景善日記”，六月一日，第二五六頁。

② 六月五日北京电报，“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六月六日。

③ 六月四日、五日贊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三四、三六頁；一九〇〇年六月四日、七日、八日康格致海約翰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一四一、一四二、一四三頁；一九〇〇年六月三日、八日畢盛致德賽加賽函，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三〇、三四頁。

④ 赫德：“来自中国”，第一五頁。最后到达使館的电报是那些报告五百名西摩尔(Seymour)援軍的先遣部队出发的电报。——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一日康格致海約翰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一四四頁。在六月五日以后就沒有通車了；參看本章第十四节。

何事件的发生；但是他們从国内当局方面并没有收到任何明确的命令，这时六月九日，英国海軍上将西摩爾爵士——当时是与其他海軍上将等同在大沽口的——接到一封寶納乐爵士在八点半发出的电报，說“情势万分严重，除非設法立刻向北京进军，怕要来不及了。”^① 这位海軍上将沒有耽擱時間，在两小时之內便帶着陆战队离开他的旗艦。在天津，关于拨給他火車一层曾經遇到一些反对，但是都被克服了，他在六月十日上午九点半鐘帶着一批海軍混合部队出发；第二天在楊村有其他部队加入，他的軍队的总数达到二、〇六六人，包括九一五名英国兵，五四〇名德国兵，三一二名俄国兵，一五八名法国兵，一一二名美国兵，五四名日本兵，四〇名意大利兵和二五名奥国兵。^② 西摩爾海軍上将是当时在場的高級將領，所以由他統率这支軍队。^③

十 情势危急，各国公使建議由皇帝 亲自召見公使等

北京四周“充滿了搶劫、縱火和謀杀基督教徒的报告”，^④ 在六月七日有报告說，“险象环生，祸患即将临头”，^⑤ 在这一、二天之内“此地情势日見恶化”，并且“現在是危急了。”^⑥ 六月七日出現了一

①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日寶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中国，第四号”，一九〇〇年，第一頁；西摩爾：“我的海軍战績”，第三四三頁；湯姆孙（H. C. Thomson）：“中国与列强”（China and Powers），第一九頁。六月七日和八日由海軍部发給西摩爾准其自由行动的訓令并未及时到达；“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三九及第四三頁。美国使节在六月九日也拍电給恩布夫（Kempff）海軍上将說：“铁路交通一定要打开，可能的話，向北京移动軍队。”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一日康格致海約翰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一四四頁。

② 美国海軍部报告，一九〇〇年，第四頁。

③ 西摩爾：“我的海軍战績”，第三四二頁。

④ 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一，第二一二頁。

⑤ 同上，第二一三頁。

⑥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一日康格致海約翰函，同前注；一九〇〇年六月八日寶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三二頁；一九〇〇年六月八日毕瑟致德賽加賽函，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三四頁。

道指責義和團為患的上諭，這道上諭“或許代表朝廷上各種相反意見間的一種折衷意見”；“总的口气是很不能令人滿意的”，並且“它產生了一個很壞的效果”。^①公使們現在要求覲見西太后和皇帝，以便“用很明白的語句說明現在華北存在着的可悲情況，”並且要作一個“強硬的說詞，表示除非中國政府立即取締義和團而重新建立法治和治安，各國將要被迫自行採取措施以達到那個目的。”^②在六月八日，他們復向總理衙門要求准許增添使館衛隊。^③這兩件請求都被中國政府拒絕了。各國使節僅僅是全權公使，沒有大使的特權，他們沒有得到訓令是不能堅持覲見的；訓令是發出了，但是為時已經太晚而歸於無用。被拒絕允准的額外衛隊於六月九日被征調。

十一 六月九日至十日義和團在 北京附近進攻活跌

西太后和皇帝在六月九日從圓明園的頤和宮回到北京紫禁城里的皇宮。在那天以及第二天，義和團在北京附近特別活躍：他們燒毀了在北京西面三英里賽馬場的看台，這個地方主要是用作郊游的中心點的；他們毆打了一群向着那個方向乘馬而行的使館學生；他們燒毀了英國使館在西山的避暑房舍；在距北京東南十三英里的通州，他們燒毀了美國傳教士的房產並屠殺了許多教徒。^④六

① 一九〇〇年六月七日、八日賽納樂爵士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中國，第三號”，一九〇〇年，第三九、四二頁。

② 一九〇〇年六月八日同上函，同上，第四三頁；一九〇〇年六月八日康格致海約翰函，“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〇年，第一四三頁；一九〇〇年六月九日畢盛致德賈加賽函，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三五頁。

③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一日康格致海約翰函，“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〇年，第一四四頁。

④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日賽納樂爵士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中國，第四號”，一九〇〇年，第一頁。

月八日美国公民大会拍給总统麦金萊 (Mc Kinley) 的电报 (并未递到) 曾經把这种局势加以綜述: “义和团毀坏教堂, 屠杀成百的基督教徒, 威胁着要消灭所有洋人。通州被放棄了; 保定府、遵化在极度危险中。中国军队无济于事。北京天津每天有受到攻击的危险。铁路被毀, 电报中断。中国政府癱瘓了。历次上諭譎詐欺人, 贊助义和团。危险遍布。除非局势迅速获得解救, 集会之三十名美国人認為前途是实际无希望的。”^① 作为一个威胁的极峯, 六月十日的上諭派“恶意排外”^② 的端王会同那优柔寡断的庆亲王为总理衙門大臣。

十二 六月九日外国人在北京及其附近集中

现在是远在各地的外国人找寻避难地方的时候了。在内地的传教士沒有避难的地方, 但是在北京城里和它的四周曾經有多次警报, 所以从五月底起有許多妇女和儿童到英国使館去过夜。^③ 在六月八日, 有一个以阿門特 (Ament) 为首的搶救队从通州带来了美国教会人員——六名男子、十一名妇女和七名儿童——此外“还有一大批不敢再留在那里的中国教徒”; 旅途中沒遭到意外, “虽然若迟几小时, 怕就不能成行了。”^④ 在这同一天, 曾經作出决定, 所有在北京的传教士, 凡是还没有到英、美使館避难的, 都要集中在哈德門大街东首美国美以美会的会址中; 在那里他們組成了他們自己的男、女自卫队, 并由二十名美国水兵协助。六月九日, 住在距此以东一英里半远的海关和学院的職員們被召集到海关稅务司署。六月十三日, 一个搶救队从南堂——天主教的南教

① 明恩溥: “中国在激变中”, 卷一, 第二一六頁。

②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一日康格致海約翰函, “美国外交关系”, 一九〇〇年, 第一四四頁。

③ 薩德: “来自中国”, 第一三頁。

④ 明恩溥: 前引, 卷一, 第二一四頁。

堂——带来了男女修士；其他的天主教徒集中在北堂，由四十三名法国和意大利水兵保护着。在使馆区的周围布下防线，由使馆卫队保护；这个防线包括了海关税务司、邮局以及所有的使馆——比国使馆除外。

十三 六月十一日杉山彬遇害；六月十三日义和团进入北京城

义和团在北京城里的徒众，从六月九日起就很出头露面了。在十一日，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在永定门外被董福祥的甘军杀死。在十二日，一个“服装完备的义和团，头上扎着红巾，腕和踝束着红带，腰间系着火红色的带子”，拿着一把切菜刀沿着使馆大街炫耀其能；他立即被德国公使克林德伯爵（Vou Ketteler）用手杖责打；他被俘擒了，但是他的伙伴逃去。^①在六月十三日，一大批义和团，^②束着红腰带，拿着大刀和长矛，蜂涌冲进内城。他们由哈德门进入，绕过了设有警卫的使馆区以后，向北展开，到处纵火蹂躏。在第二天夜里，在三个警卫区以外的所有的外国人房产扫数被破坏和抢劫；在天主教东堂的教民同他们的牧师被屠杀；^③南堂的房产完全被破坏，但是有一个以福里希（Fliche）为首的志愿队带来了四个教士，五个法国修女，二十个中国修女，以后又带来了“二、〇

^① 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一，第二三六页；威尔（Putnam Weale）：“北京书简”，第三一页。

^② “无数的义和团”。威尔：前书，第三五页。“数百名团民”。景善日记，六月十四日，第二六二页。“在人群的喧喊和冲挤之后，继之以义和团的来临。”赫德：“来自中国”，第一四页。“一大队义和团”。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日饗纳乐爵士致萨里贝利勋爵函，“中国，第四号”，一九〇〇年，第一九页。

^③ “我们的岗位距东堂如此之近，以致可以听到那些正在到处捣毁和屠杀的魔鬼们的喊叫之声，也可以听到那些被牺牲的人们呼号的声音；我们以后晓得有许多中国的教徒逃到教堂避难而被屠杀或被烧死。”——海关职员马孔（J. H. Macoun）的手稿，他在被围期间是一名志愿队。

〇〇个中国教民，大部分是妇孺，他们是一次意欲全部杀光的屠杀中的幸免者。”^① 售卖洋货的商店被破坏和抢劫；经售贵重物品的商店也是这样；不久以后，富有的满人和汉人也有同样的遭遇，劫掠蔓延了好几天之久。^② 破坏的规模极大；仅仅七处基督新教教会就损失了三十四所住房，八座教堂，十二所男学校，十一所女学校，四所训练学校，十一个药房和八个医院，它们都在北京城里。^③ 外国人的公墓也被挖掘了，尸身被暴露，墓碑被打碎。

十四 六月十四日义和团冲入天津

当北京公众受着这样的围攻的时候，天津也处在同等的危险情形之下。在六月二日，据报在外国租界内纵火是很普遍的事；^④ 六月四日保定府难民的到达，^⑤ 证实了西部和西南部地区都动起干戈来了。从六月五日以后就没有通向北京的铁路交通，^⑥ 津沽线（至白河口的塘沽）的天津一端的铁路在十七日被破坏。^⑦ 义和团在六月十四日冲进天津城，比北京迟一天，也象在北京一样，官方对于他们的越轨行动不加制止；事实上，以后得到证明，总督衙门就是义和团的总部，在那里发现了许多名册和入团证。^⑧ “义和团的一阵狂风集中在天津县城，所经之地，灾害横生”，正象在北京那样；它的徒众同样地叫官吏和绅士屈膝，并且“杀戮那些同情外国

① 赛纳乐爵士致萨里贝利勋爵函，“中国，第四号”，一九〇〇年，第一九页。

② 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一，第二三七页；“景善日记”，六月十四日、十七日，第二六二页；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五日、十八日康格致海约翰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一五一、一五四页。

③ 明恩溥：同上，卷一，第二三八页。

④ 六月二日天津通讯，“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三日。

⑤ 参看本章第七节。

⑥ 汤姆孙：“中国与列强”，第九页。

⑦ “十年报告书”，一八九二——一九〇一年，卷二，天津，第五一七页。

⑧ “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八月八日。

人或与他們有交往的人們，其狂热之处已使地方变为鬼域，河川之內尸体飘流。”^① 城内和近郊有許多建筑被烧毁了；在六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夜，武装的暴民把所有的教堂和法国天主教堂毀坏了，胜利圣母堂在一八七〇年曾經遭到同样的命运。

十五 六月十六日至十七日各国海軍上将 发出最后通牒，夺佔大沽砲台

在天津的各国領事和在大沽的各国海軍当局之間曾經举行过商談，但是並沒有采取一致行动。在天津有一、七〇〇名俄国軍隊，他們从旅順口来得太晚了，沒有来得及参加西摩尔海軍上将的部队；还有五六〇名不同国家的水兵；还有足够的志愿兵，可使軍隊总額达二、四〇〇人。在六月十五日，各国海軍上将^②举行了一次會議，會議紀录說，已經見到許多中国軍隊的調动，有切断津沽鉄路的企图，在白河口也布置了水雷；會議决定必須采取步驟保全鉄路并保护天津外侨。^③ 三〇〇名日本部队立刻被派到塘沽，另有二五〇名法国和俄国部队被派到这条鉄路綫上更远的軍粮城，这时，义和团繼續他們的破坏和杀戮，“河里充滿了同情外国人的中国人的尸体，他們是被义和团杀死而投到河里去的”；^④ 在六月十四日夜，天津城里三所教堂被烧了，在十五日夜，法国天主教堂和其余的教会房屋被毀坏了。各国海軍上将覺得他們面对着的是一个实际情况而不是一个空洞理論，因此在十六日的一次會議上，决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六月十七日上午两点鐘以前把防护着白河口的大沽砲台移交給他們手中。当天下午，一个由九三五名六个

① “十年报告书”，卷二，第五一七頁。

② 三个国家(日本、意大利、奥匈)派高級艦长作代表。

③ 薩威奇-兰德尔(Savage-Landor):“中国与联軍”，卷一，第一一三頁。

④ 湯姆孙:“中国与列强”，第三五頁。

不同国籍的士兵所组成的陆战部队登了陆，属于六个国籍的九艘浅水炮艇在黄昏以后开进炮台的内侧而停泊下来；巨型的船只泊在沙滩以外，为炮台射程所不及。中国防军在上午零点四十五分钟——在最后通牒的限期前一小时又一刻钟——开了防御性质的攻势炮火。他们受到还击；在黎明时，进击部队开始进攻；在上午六点半钟，最后一处炮台被它们占领。联军的损失是六十四名阵亡，八十九人受伤。^①

十六 美国海军上将避不合作

美国海军上将悬布夫对于这些决议和办法并未参与。在六月十四日他通知英国海军上将卜鲁斯 (Bruce) 说，他“未被授权向一个与我国保持着和平的国家发动任何战争行为”。在十五日，他拒绝参加对塘沽火车站的占领，理由是他“不能参加对中国政府财产的占有。”关于大沽口炮台的夺占，他仅说，“我未参加攻击这个炮台。”“莫诺开西号”(Monocacy) 舰长威兹 (Wise) 已经收到命令要保护美国利益，所以在被中国政府军队攻击的情况下，他将要认为是宣战，从而采取行动。”^② 这艘美国兵舰“莫诺开西号”收容了大沽的外侨，说来奇怪，它是首先被中国炮弹击中的船。海军上将悬布夫的避不合作政策获得麦金莱总统的批准，理由是“我们并未同中国作战，一个敌对性的示威可以促成排外分子的团结并加强义和团对所派救援纵队的反抗。”^③

① “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日、八月十五日；“十年报告书”，第五一五页；萨威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卷一，第一一二以后各页；汤姆孙：“中国与列强”第三一頁。

② 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七日悬布夫海军上将致海军部函，转引汤姆孙前书第二五頁。

③ 致国会咨文，转引前书第二二頁。

十七 摆在各海軍上将面前的情勢

炮台的夺占是聪明而及时的么？各海軍上将是对于在华北开放交通和保护外国利益——生命财产——負責的；除了从旅順口調来的二、〇〇〇名俄国兵外，还没有部队到达；派遣到北京使館的少数卫队都是海軍部队，西摩尔海軍上将增援使館的部队除俄兵外都是海軍部队，警卫天津的武力包括一、七〇〇名俄国軍队和五六〇名海軍；在几天之内是不能希望再有陆战部队到达的。此外，各海軍上将是决定行动的当局；英国海軍部在六月七日和八日所发出的授权海軍上将西摩尔可以自由行动的命令，在六月九日下午十一点他还未收到；^①处在四乡叛乱的情况下的中国的电报綫是唯一的最快的交通路綫；与北京外国使节的电报通訊从六月十日起就中断了。作出一些决定是必要的；行动就是决定；一样事不作也同等是一个决定。在六月十五日，各位海軍上将在决意保卫津沽鉄路的塘沽段方面作出了决定的一半。那天夜里，天津城陷入义和团的暴行之中，在十六日各海軍上将作了他們的决定。悬布夫海軍上将不同意的表决事实上是逃避了一个决定。从他所作的那些規定的文字上面看，他避免对一个未与他的本国开战的國家采取侵略行动，在技术上是正确的；“一次敌对的示威”是不是“能够促成排外分子的团结”是一个政治問題，不是由他来作决定，而是由在华盛顿的上司和駐北京的美国公使来作最后的决定的。他对这两者都失掉接触了；但是他忽略了一个在外国駐扎的海軍軍官的首要責任，那就是要保护他的國家的代表，并且更加緊要的责任就是要掩护他自己的在岸上的部队；他忘記了

^① “不給任何答复的时间……六月九日大約在下午十一时。”——西摩尔：“我的海軍战績”，第三四三頁。

他的前任在一八五九年在天津所作的宣言：“血比水浓厚”。說到他須进一步保护美国公民生命的那个責任，見地各有不同。

十八 遭遇到中国政府的敌对态度

这次决定是聪明的嗎？西太后的态度是可疑的；她可能“未置可否，暗中盘算”，^①但是她的行为已經足够表明她是无疑地十分同情义和团和那些想用义和团作为驅除外国人的同盟軍的滿洲人的；^②固然，她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两位抱友好态度的中国大臣——袁昶和許景澄——的口，保証对使館給以充分的保护；但是据报告者說，“他們对于現在情势的态度使我感觉到他們是言与心违的人。”^③ 宫廷中的官吏沒有不是积极排外的，只有敢言的荣祿和优柔寡断的庆亲王是例外。在政府中，几乎所有的滿人都是积极排外的；在六月十日，他們之中仇外最力的端王奉派为总理衙門的首領，这个衙門管理一切外交事务，并且实际上是帝国的內閣。駐天津的总督裕祿是荣祿的依附者，照理可信为对外人是友好的；但是以后发觉这并不是真实的，这位被認為友好的官吏的附和义和团証明了在六月上半月他必定是在他的上級的命令下行动的。他所轄的直隶全省在叛乱中，政府已經明白地显出无力鎮压，而負責的外国当局曾經宣称政府是不愿意压制的。^④ 所以現在，象在以前六十年中所发生的一切事件一样，保护外国人的生命的責

① 參看本章第八节。

②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日、九月二十日贊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中国，第四号”，一九〇〇年，第一、一九頁；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八月十七日康格致海約翰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一四四、一五一、一五四、一六一頁；一九〇〇年六月三日、六日、九日、十一日畢盛致德賽加賽函，外交文件，第三〇、三二、三五、三七頁。

③ 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日贊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中国，第四号”，一九〇〇年，第一九頁。

④ 參看注②。

任只得由外国武装部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承当；为了这个目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取得进军的据点，以便与受到危险的外国人接近。

十九 夺取大沽炮台对于外国侨民地位的影响

要保护的外国人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分散在内地的各外国人团体，几乎全部是传教士，因为铁路人员大部分已经逃到避难的场所；其次是西摩尔海军上将率领的海军部队；再其次是在北京的外侨公众，他们已经集中起来；最后是在天津的外侨，各海军上将知道他们是处在危险情势下的。分散各地的传教士显然是有危险的；在六月六日，美国政府表示了它的焦虑——“在保定府的美国传教士的国内朋友们，看到报纸的报道，心里非常焦虑；他们获得了充分的保护没有？”^①对于这点，美国政府获得的答复是——“中国政府已经派遣军队，并且答应予以充分的保护，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永久的安全。”^②在占领大沽炮台的前几天，一位领事有一次在天津举行的会议中说，“倘若你们夺取炮台，你们将要为每个在内地的外国人签署死刑证。”这个预言是正确的；但是不能断言倘若各海军上将延迟了行动，他们的安全就可以得到保证。除了有一次以外，传教士们被大批地屠杀，就象在保定府或在以积极仇视洋人著称而不久即使自己“遗臭万年”的那位毓贤管辖下的山西那样，是完全发生在宫廷派人物力所能及的区域之内的。^③在这种样的保护之下，传教士们是难以幸免的，而且我们必须当心，不要硬说一个后来发生的事件必然是以前行动的结果。西摩尔的军队曾经在那

① 一九〇〇年六月六日喜尔致康格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一四二頁。

② 一九〇〇年六月八日康格致海約翰函，同上。

③ 赫德：“来自中国”，第一〇五、一三七頁。“他们所有的人中间最臭名昭彰的”——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二，第五五〇頁。

些負責的各國使節的緊急呼吁下奉召到北京去支援為數甚少的使館衛隊；這支軍隊已經在六月十一日被阻而不能前進，糧食和飲水供應微少；它的危險處境是各位海軍上將知道的。一個水兵首要的天職，他所應盡的最緊要的義務，是要在具有任何預防的方法的條件下挽救他的派遣部隊不致被斃；所以為了這個目的，顯然必要的步驟就是維持或打開交通路線。關於奪取炮台對於在北京的外人們的後果問題，只要引証兩位權威的話就行了，這兩位既不欲對中國作戰，也不是對中國不友好。赫德爵士說——“撇開我們的恐懼不談，炮台就這樣地奪占，對於我們終於是幸運的事，因為倘若不這樣做的話，不僅在北京的我們，並且在天津被痛苦地壓迫着的我們的同胞們都要處在更惡劣的境遇中。”^①明恩溥博士說——“雖然如此，倘若大沽炮台在那時不是在幾個鐘頭之內就奪取了的話，勢所必然的是：不僅北京的使館將要處於比這種行動加於它們的危險還要更大的危險之中，並且在天津的眾多外人中連一個男人、一個婦女或一個小孩都難於保存他們的生命，事實上這些人只是從死亡的危險中經過極大的困難才搶救出來的。”^②

二十 奪取炮台是引起敵對行為的借口而不是原因

中國政府把奪占大沽炮台的行為視為各國聯合的宣戰，於是立刻開始敵對行為。此後，穿著制服的武裝部隊首次公開向外國人進攻；但是引起這樣一個問題，奪取炮台的行動是造成敵對的理由呢，還是一個急切期待的借口？在六月十日通北京的电報被切斷後，各海軍上將對於政治局勢僅具有有限的視域；但是某些調動是被

^① 赫德：“來自中國”，第一三三頁。

^② 明恩溥：“中國在激變中”，卷二，第四三六頁。並參看道格拉斯爵士(R. K. Douglas)：“歐洲與遠東”(Europe and the Far East)第三四八頁；西摩爾：“我的海軍戰績”，第三四八頁。

他們觀察到的。聶軍門的部隊從天津向東的一些調動，另一些部隊的調動是在接近炮台地區或向炮台方向那邊被見到的，在河中和河口放置水雷的人們也被看到了，所以倘若要採取行動，一個迅速的決定是需要的。^① 這些都是在大沽見到的特別的行動；但是一般氣氛好像各處充了電一樣。在六月十二日，寶納樂爵士拍出發報說，^②“通知增援部隊，今天佔有了北京終點車站的那批叛亂的甘軍可能在那裡給他們一些抵抗。中國政府看來是無能為力了……倘若必要，我希望各位海軍上將斷然地把他們的艦隻盡量利用一番。”在六月十四日他從“一個友好可靠的中國方面的來源”獲得消息說，在一次軍機處會議上曾經作出決定，要用帝國的軍隊攻擊西摩爾海軍上將的部隊；^③我們的滿洲當局說，在同一天“剛毅相信她〔西太后〕就要同意向各使館作一個總攻擊”；^④兩天以前“風聞洋兵續行來京之耗，惟老佛尚未允從。”^⑤美國公使報告說，在六月十七日早晨兩點鐘，“我們在三道大街的防綫被中國兵偷偷地開槍攻打；在美國衛隊的前面拾到了一支新的毛瑟槍、一個彈藥箱和一套中國士兵的制服……在昨天〔十七日〕一小隊德國衛兵和中國士兵發生了衝突，在衝突中後者被殺死五名。”^⑥關於中國的意圖，得不到什麼證據；但是在大沽的一些形迹再加上在

① 明恩溥：“中國在激變中”，卷二，第四三六頁；蘭德爾：“中國與聯軍”，卷一，第一一五頁。

②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二日寶納樂爵士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中國，第三號”，一九〇〇年，第五二頁。從六月十日以後，只有二、三封電報被准發出，一封是六月十四日由寶納樂爵士發出的，一封是六月十一日，一封是六月十二日由畢盛發出的，康格沒有發電報。

③ 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日同上函，“中國，第四號”，一九〇〇年，第一九頁。參看本書第二二八頁注⑤。

④ “景善日記”，六月十四日，第二六三頁。

⑤ 同上，六月十二日，第二六二頁。

⑥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八日康格致海約翰函，“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〇年，第一五一頁。并參看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日寶納樂爵士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中國，第四號”，一九〇〇年，第一九頁。

北京的这些形迹却足以表明夺取炮台不是中国开始敌对行为的成因，而是排外派所急待抓住以堵住他们的政敌的口，以便推动政府采取积极敌对行为的确凿的论据。在军事方面，对于各海军上将的决定只有一个批评，那就是它没有更早的作出来；天津和北京没有在最必要的时候得到解救，而一个更早的决定可以使解救更容易一些。在政治方面，或者说，炮台的夺取带来了传教士的被屠杀，但这并不是不可辩驳的，单单炮台的夺取，甚至使抢救西摩尔部队及北京和天津的外侨公众的工作成为可能。

二十一 六月十一日西摩尔海军上将 在廊坊被阻前进

西摩尔海军上将于六月十日带着四七五人离开了天津，在十一日有三列车运载的兵和他会合，使他的部队的总数达到二、〇六六人，已如上述。^①在距离天津二十英里的杨村跨过白河的那座桥依然无损，在这里他“发现了聶軍門的军队，约有四、〇〇〇多人，但是我们互相致敬后，渡过了河，继续前进直到午后，这时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修理被义和团破坏的铁路。”^②从那个地点起，他就不得不经常修理铁路和重建桥梁，但是却能在六月十二日到达离天津四十英里的在天津和北京中途的廊坊。在那里，有好几天，他与义和团经常发生战斗，这些用木棍、大刀和长矛武装起来的“刀枪不入的人”，遭受很大伤亡，而增援部队的伤亡人数是很少的。从那个地点起，“铁路被毁过重，使我们无法修复”，虽然部队在经常的攻击中艰苦地工作着；因此，进军停顿了。“我们现在陷于孤立，没有运输和前进的工具，并且和后方根据地隔断。”^③西摩尔海军上

① 参看本章第九节。

② 西摩尔：“我的海军战绩”，第三四四页。

③ 同上，第三四六页。

将自己在以后承認，鉴于賽納乐爵士吁請迅速营救的电报，“立刻赶往营救使館是唯一應該采取的途径”；^①并且这也是其他消息灵通人士的意見。美国公使，一个美国内战期中的軍人，写道——“我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們不帶着他們統率的大部分的人直接向此地进军，倘若他們覺得鐵路不能很快修复的話。”^②赫德爵士說——“假如他的部队舍棄火車而越过乡野直向京城进军，它可能在十三日或十四日到达我們这里，这样就可能改变历史，因为对抗的行动在当时还没有組織好。”^③但是一个海軍軍人在陆地上指揮，^④不能期望他把局势看得那样清楚，对方的力量并不是一点还没有組織好了的；^⑤西摩尔海軍上将的地位是作为一个高級官长而具有势力的地位，并不是具有指揮权的地位。他率領了一个由八个国籍的士兵所組成的集团，他并没有强行攻进北京城的装备，这个城是被高厚的城牆所围着并且被不知有多少万的軍隊所保卫着的。这次出征在产生一种結果方面是有用的，那就是“它永远地消除了慣常被人提出的那个論点，說一小队的外国軍隊，只要是組織好了并且武装齐备，就可以在整個中国从一端到那端长驅直入而遇不到有效的反抗。”^⑥

① 西摩尔：“我的海軍地績”，第三四六頁以下各頁。

②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八日康格致海約翰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一五一頁。康格在美国内战时期升至少校級。

③ 赫德：“来自中国”，第一一頁。

④ 一位英国海軍上将福里門特（E. Freemantle）爵士曾經在一八九五年提到他的登陸的一队士兵时对著者說：“我不以为然；一个水手活动的地方是在船上。”

⑤ 六月十六日宮中开会討論与洋人对敌的問題，滿洲人都贊成立即采取行动。会幕决定采取折衷办法，派那桐和許景澄前往“劝导”西摩尔海軍上将退回天津。——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一，第二四四頁。

⑥ 同上，卷二，第四四三頁。

二十二 六月十六日到二十六日西摩尔

退却并获解救

这支远征军在廊坊完全受阻，在六月十六日决定修复回到天津的铁路，若是可能的话，在天津，再组织一次由水路的进军。在杨村，发现大桥已经被破坏了，在十九日夺到了九只民船，足以载运伤兵、给养、大炮和军火。这时，由于夺占大沽炮台的结果，在廊坊的殿后部队在六月十八日被为数约有五、〇〇〇人的董福祥的甘军所攻击，这是在天津以外从事公开的敌对行为的首批帝国军队；从那天起直到二十三日，这批和其他的帝国军队经常发动攻击。在六月二十一日下午四点钟，有两队兵——英国和德国的——过了河，占领了距天津三英里、距外国租界五英里的西沽兵工厂，在那里发现了丰富的食粮和估计约值三、〇〇〇、〇〇〇英镑的军火。这所兵工厂在六月二十三日被一大队中国军队坚决地进攻，但被坚守住了；六月二十五日，这支国际军队被从天津开来而主要是俄国兵的一支军队所庖代；六月二十六日，在把兵工厂和所存的物资毁坏后，全部回到天津。在一支二、〇六六人的部队中，死亡六二人，受伤二三八人。西摩尔海军上将在他的报告中特别提到以下各人的功劳：英国海军上校泽力科 (Captain John Jellicoe) 美国海军上校马克加拉 (Captain B. H. McCalla) 德国海军上校犹士敦 (Captain von Usedom)，他们都受有重伤；还有英国领事馆的甘伯乐 (C. W. Campbell) 和毕格罕上校 (Captain Clive Bigham)，他们充任翻译官和情报员有功。^①

^① “十年报告书”，天津，卷二，第五一四页；西摩尔：“我的海军战绩”，第三四五页；明恩源：“中国在激变中”，卷二，第四三九页；汤姆孙：“中国与列强”，第一二页；萨威奇-兰德：“中国与联军”，卷一，第八五——一頁。

二十三 六月十七日向天津外国租界进攻

在西摩尔海軍上将离开天津之后，外国租界由一支約有二、四〇〇人的軍队保卫着，其中有在六月十四日到来的一、七〇〇名俄国步兵。头几天是惊懼的日子，有多次縱火，中国仆人逃跑，搶劫和謀杀等情事。在天津的外侨公众采取了一些可能的預防措施，把妇孺收集在称做戈登堂的市政大厅。大沽炮台的夺占促成了許多事項的发生，六月十七日下午三点鐘，在天津城內及城背后的大炮向外国租界开火，帝国士兵也开始隔河从对岸射击，造成許多伤亡；这些軍队的几次散乱的进攻被击退了。在六月十八日，一支联軍试图由铁路进军援救西摩尔海軍上将，但是被迫退回。在十九日，一支部队把河对岸占有威胁地位的两尊大炮逐退了，但是最后他們还是被迫撤退；整天內炮击和枪射不停。在二十日，有炮击和枪射，以后天天如此，造成許多伤亡，直至解围为止。外国租界在几天之內受到不下六十門大炮的攻击，数千名兵士的射击，以及义和团非法行为的威胁，处境似乎是危险的。袁世凱在山东要采取什么态度还不得而知，各領事对此也无从保証；然而帝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态度是再明白沒有了。在这些情况下，当时在天津的陆軍当局决定，倘若增援部队不能很快到达，就有必要撤退到大沽方面的一个基地。这样的撤退必定会剝夺北京外侨的最后获得解救的机会，并且把上海和其他北方口岸置于危险之中。

二十四 六月二十三日救兵自大沽开到

天下被极少数的勇敢的人从这次灾难中救了出来。同大沽的交通从六月十四日起就发生困难，从十七日起就被切断，在大沽的陆海軍当局对于天津发生的事項沒有得到消息。在六月十八日夜，一个大沽港的領港員席伯（Seeberg）由八名英国水手和一

名法国官长伴同乘汽艇順河而下，但是到黎明的时候，他們被迫上岸；在第二天夜里，他們走向軍糧城的前哨綫，席伯在二十日把他的公文送到塘沽。在六月十九日夜里，一个年青的英国人窩次 (James Watts) 由三名哥薩克兵护送，在黑暗中乘馬而行，把他的公文也在二十日送达。^① 一个由許多国籍的兵組成的增援联队馬上成立，在暴日照晒、食粮缺乏、飲着具有尸毒的溪水等情况下奋勇前进；經過十二英里边跑边战，不惜重大損失而战胜了劇烈的抵抗以后，这支救兵在二十二日黄昏的时候到达天津附近，在六月二十三日早晨进入外国租界。一个强有力的縱队出发救援西摩尔的部队，在六月二十六日把它带回天津。天津被解救了，妇孺們經由海道撤退，接着这支救兵也被包围起来。^②

二十五 六月八日至二十日北京陷入半包围状态

从六月八日到二十日，北京外侨公众陷于一种“半包围”的状态，^③集中在三个地区——使館区、北堂和美以美会教会。在所有这个期間，城内到处有縱火和搶劫情事，尤其是在那些可以找到容易拿走的貴重物品的地区；火灾延至前門（进城的主要入口）上的木楼，并且烧毁了它。政府对于义和团的暴行不加禁止，并且人們知道有許多居高位的滿人是积极支持他們的运动和董福祥的蛮橫行为的；^④值得注意的是，北京順天府尹崇綺曾經在两个高級官吏的陪

① “窩次先生深为熟悉这个地区的情况，致使这个功績成为可能，而且他的行动的英勇却不因他的謹慎持重而有減損。”——卡尔斯領事(W. R. Carles)致薩里貝利勳爵函，轉引湯姆孙：“中国与列强”，第三七頁。

② “十年报告书”，天津，卷二，第五一七頁；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二，第四四四頁；湯姆孙：“中国与列强”，第三四頁；薩威奇-兰德尔：“中国与联軍”，卷一，第一三六——一四九頁。

③ 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散見第十四章各处。

④ “景善日記”，六月一日、八日、十日、十四日、十七日，第二五八——二六四頁。

同下亲自前来要求释放在六月十二日被德国公使毆打而捕获的义和团。^① 北堂处于一种防御的状态中，自卫队巡視美以美会教会，各使館前堆置障碍物以資保护。以大刀和长矛武装起来的义和团在各防綫周围徘徊并且作出一种威胁的姿态；他們在那些表面看来是未曾設防的地点冲击，在那里用尽可能少流血的方法把他們打退了。当义和团在六月十三日冲进城里的時候，他們被来福枪的火力打得离开了各使館；但在那天夜里，他們未被干涉地在南堂、东堂和其他地区縱火和屠杀；在第二天，一群武装的暴民被带着馬鞭的自卫队打散，借以避免造成第一次流血事件。^② 这种政策是各国使节命令实行的，他們从来没有丧失中国政府可能起来認識到它的責任的那种希望，并且他們在这不安的几天当中常常和一些中国大臣举行會議。^③ 但是各使节們由于老是接到西摩尔海軍上将不能前进的报告而感到十分气沮；他們确知，“倘若中国軍隊已經被用来对付那位海軍上将，那就不可能不会用来对付各使館，所以前途是非常暗淡的。”^④

二十六 中国政府的坐視和緘默

中国政府在禁止义和团的暴行和威胁使館两方面都沒有采取公然的行动。在六月十六日，一道上諭述及“人民与基督教徒之間的仇杀引起許多縱火和搶劫事件”，并且命令荣祿布置軍隊更好地去保护使館。^⑤ 一份呈报西摩尔海軍上将要求大沽炮台投降而提

① 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一，第二三六頁。

② “决定用馬鞭向他們进攻，以避免首先造成流血。我們攻不进他們的障碍物，所以下令要水兵和水手們使用斧头。”——威尔：“北京书簡”，第三二頁。

③ 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日饒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中国，第四号”，一九〇〇年，第一九頁。

④ 同上。

⑤ 同上。

出的最后通牒的电报，一定在那天夜里收到了，炮台的被夺取一定在第二天早晨被知道了；但是十七日这天平静地过去，中国方面并无表示。六月十七日下午三点鐘猛烈的炮火向天津租界发射，中国方面仍无表示。在十八日，有三位大臣，包括許景澄在內，前来訪問，要求下令撤回西摩爾海軍上將的部隊，这个要求被拒絕了；“最簡單的或許是最可能的解釋是：政府中的主和派被准許借談判討論以自慰，而他們的政敵認為这是毫无效力，只是徒勞的。”^①就在那同一天的下午，董福祥的甘軍——前一天还在北京^②——向西摩爾海軍上將的部隊发动了攻击。在西摩爾海軍上將的最后通牒送交后七十二小时之內，在炮台被夺取后的六十小时中，中国的公文虽然可以用电报传达，中国政府对于經過的事項都未通知各使館，并且沒有提出过抗議。

二十七 六月十九日一篇報紙社論和 一份捏造的公文

在六月十九日的早晨，在上海占着領導地位的一家報紙发表了一篇社論，用強硬的詞句斥責中国政府。

“中国与各大强国同时在作战，它是由西太后和她的奸党的选择而作战的。他們万分愚蠢，妄自尊大，自以为他們能够安全地抗拒列强……不管发生任何事件，这批奸党若不自动离去，就必须被逐出北京城。希望有可能把光緒皇帝寻出来，把他重新置于皇位之上。現時必須对中国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的战争的是西太后，我們不是对中国作战，而是对那个篡夺政权的北京政府作战。”^③

① 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日賽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中国，第四号”，一九〇〇年，第一九頁。

② 同上。

③ 六月十九日“字林西報”，“北华捷報”每周社論轉載，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日。

在那天——六月十九日——召开了一次軍机会議，在會議上西太后宣布对于大沽炮台的被夺占應該采取什么行动，她要延迟到次日再作决定。于是“端王、启秀和那桐^①递给她一份由各国公使交来的公文，这份公文用最污辱的詞句要求她立即归政，废除皇儲，讓皇帝复政；他們也要求皇帝准許一〇、〇〇〇名外国兵进入北京城維持治安。刚毅来告訴我，他从未見過老佛爷^②那样地发怒，即使当她聞悉康有为謀叛时也沒有如此。‘彼族焉敢干預予之权！’她高喊着。‘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当灭此朝食。’現老佛定准立决死战，慈意所屬，虽沐恩甚优之荣相，亦不敢劝阻，恐生意外也”。^③

二十八 六月二十日軍机会議决定开战

地獄里有怒鬼，但是比不上一位妇人受着藐視的时候怒气之盛。电报綫各国使节虽然不能使用，但对于中国还是开放的，^④那篇社論的大意由电报拍至北京，就被人用以拟就一份說是来自外交团的捏造的公文，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推論。西太后很久以来就避免使她自己陷于一种不能摆脱的地位，但是現在这位政治家現出了妇人的本色，一言既出，战事的惨祸也就莫可制止了。随后就举行了一次全体會議，参加會議的有西太后和皇帝；皇族的領袖人物；恭、醇、端三亲王；載濂、載灃两貝勒；瀾公；庆亲王和五位軍机大臣；庄、肃、怡三王；六部滿汉尚書九卿；八旗都統；內务府大臣；但是荣祿沒有参加。这是滿洲帝国的最高會議，主要是由

① 主战派的領袖。

② 对西太后的一个恭敬的称号。

③ “景善日記”，六月二十日，第二六五頁。景善是刚毅的姻亲。

④ 上海的一份中国報紙“沪报”能于在六月十七日下午三时发出号外，詳确地記載了那天早晨大沽被占的情形。——“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日。

滿人組成，還有少數國家大員的漢人。西太后傳下很長而激動的懿旨，痛罵洋人的無禮，呈給她的那份公文已經竭盡侮辱之能事，所以她要復仇。滿人立三、漢人袁昶和許景澄所發表的言論是唯一的反對開戰的言論；漢人軍機趙舒翹要求把內地的每一個洋人都消滅掉；滿洲貴族們一般是主戰的。一道對所有洋人宣戰的諭旨奉令公布了。^①

二十九 六月十九日各國使節限在 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北京

這次會議是在六月二十日上午三時到五時舉行的，這是老佛爺平常聽政的時候。在這之前，曾經試圖在公開敵對的意圖之上加一件外交的外衣，並且對於榮祿的歷次呼吁給以一種形式上的讓步，因為榮祿是一直在呼吁不可侵犯各國使節以及必須保護他們不受傷害和污辱的；早在六月十七日他就堅請西太后准許他把各國使節護送到天津去。^② 六月十九日，在下午四時到五時，^③外交團各公使接到一份同樣的公文，“在日期上很小心地注明四點鐘”，^④這是總理衙門給他們發出的第一次通知，告訴他們各海軍上將所提出的最後通牒，但是並未說明炮台已經被奪占；並且要

① “景善日記”，六月二十日，第二六七頁。

② 同上，六月十七日，第二六四頁。

六月十七日京報登載了一道上諭，命令榮祿派遣他的部隊保護使館；“倘若各使節和他們的眷屬願意往天津一行，在路上他們必須獲得保護。”——“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〇年，第一六八頁。并參看本書第二三九頁注④。在這方面並未採取步驟。

③ 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七日康格致海約翰函，“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〇年，第一六一頁；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八日畢盛致德賽加賽函，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一九九頁。

④ 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日寶納樂爵士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中國，第四號”，一九〇〇年，第一九頁；明恩溥：“中國在激變中”，卷一，第二四八頁。

求^①各使节同他們的眷屬和僚屬、卫队以及所有洋人在二十四小时以內由北京撤到天津；軍隊已奉令沿途护送。

三十 各国公使准备离京，請求謁見

各国公使被弄得目瞪口呆。他們从十六日起就紧紧地受到包围，所以对于大沽和天津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他們和西摩尔的部队失却联络已經有好几天之久；他們有一小队的混合卫队，用以防守既感到太少，用以行軍也十分不够；他們虽然完全知道任何中国部队，不管它的长官有怎样的善意，是絕對不可信任和沒有紀律的，并且会制造出它本来应当去防止的那种危險，可是除了接受离开北京的命令外，看不出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外交团拟就了一份照会，对于这个突然的要求表示惊讶，并且指出有举行一次會議的必要，以便解决行軍的細节、护送的方式以及运输工具問題；他們并且要求在二十日上午九时到总理衙門謁見。^② 各位公使在他們的正式报告中一般地都認為这份照会是专门用来爭取時間，以便进一步作出表示而說服中国政府承認它的手段愚蠢；^③ 他們一定已經知道中国軍隊的不可靠，后来所作的解释在当时可能是真实的；但是在北京有資格洞悉此事的人在当时以至后来对此都不相信。“各使館人員間一般都同意有离开这个京城的必要，并且或許还要在极端匆忙之中实行”；在會議时“克林德男爵坚决地不同意他的同僚們几乎一致地認為有离开北京的必要的意見。”^④ 另

^① “限令”，寶納乐爵士，見前各注：“請”，毕盛致德賽加賽函，見前各注：“命令”，康格致海約翰函，見前各注。“于斯必須要求”，公文中的外交用語的譯文，“中國，第四号”，一九〇〇年，第二六頁；“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一七五頁。

^② 原件，“中國，第四号”，一九〇〇年，第二七頁；“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一七六頁。

^③ 寶納乐爵士、康格、毕盛，見前各注。

^④ 明恩溥：“中國在激变中”，卷一，第二四九、二五三頁。

写道——“在[一次忿怒的討論]結束时，准备了一个联合照会……那就是說，各位公使准备接受——”^①另一位又写道——“据报公使們已經决定离去；他們极端憤慨。”^②最清楚的証明是从康格先生处来的，他在那天上午九时写信給在美以美会教会的美国传教士們，警告他們必須准备离开——“倘若我們这里有一千个兵，并且对于其他部队所在的地方获有任何消息，那末，我們当时也許会拒絕离去，但是在現在情况下，沒有其他办法了。我們准备启程是需要相当时候的，在这期間，可能发生些事情。”^③美国传教士們对他們的使节指出“在上述情况下离开北京的实际困难，已經离开的人可能遭到的后果，以及不得被遺留下来的中国教徒們必然要受到的屠杀。”^④这时普遍地感到惊慌，“但是在这个惊慌的浪潮之下，騰起了一种更猛烈的音調，这好比是陪审团中一人违抗十一个人的裁决意見的音調”^⑤到第二天早晨，各位使节如果曾經失掉內心的鎮靜的話，这时又把它恢复过来了。

三十一 六月二十日克林德男爵独自前往謁見

第二天——六月二十日——上午刚过八点鐘，外交团集会^⑥。在上午九点鐘——約定为謁見的时间——答复还未收到，因而各

① 威尔：“北京书簡”，第六〇頁。

② 亚伦 (Roland Allen)：“北京使館被围記”，第一〇一頁。

③ 康格致于明威尔 (Gamewell) 函，原文載于屠特尔 (Tuttle) 著“于明威尔传” (Mary Porter Gamewell) 第二〇八頁；参看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一，第二、四九頁。

④ 明恩溥，見前各注。

⑤ 威尔：“北京书簡”，第六〇頁。

⑥ 先前可能在上午七时举行过一次會議。“使团在上午七时发出第二封公文，請求讓他們与各海軍司令們通信。”——毕盛，見前各注。“鉴于他还未接到答复，在次日——二十日——早晨八时又举行了另一次會議以便决定应采取的办法。”——賽納乐爵士，見前各注。“二十日早晨八时半各公使齐集于法国使館，准备一接到庆王在总理衙門的信息，馬上就集体前往。”——康格，見前各注。

使节决定无庸前往总理衙門，那里可能会沒有人接待他們。若是沒有克林德男爵的反对的发言，这个决定是全体一致通过的。克林德男爵告訴他的同僚說，他已經发出照会，声明他个人将去訪問，他打算在訪問时对中国大臣們指出他們违反国际法的罪行和他們破坏使节們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所必然要引起的后果，他宣称他現在就要实行他以前的打算。他的同僚們全体反对，指出对他个人的危险；但是他排除众議，就出发往总理衙門，仅由譯員柯德（Cordes）和沒有武装的中国仪仗队陪伴着。一刻鐘以后，他的一个騎馬的中国随从冲回来报告克林德男爵已經遇害的消息；另一个随从騎着馬跑到总理衙門去报告这个消息。

三十二 克林德男爵被滿洲兵所杀，柯德受伤

两乘轎子在往总理衙門的大街上刚刚經過一个小小的警察局的时候，柯德向左望去看見了一个身着制服的中国兵，把来福枪用肩膀抵住，随着这位公使所乘的轎子的行动，瞄准着他的头。柯德大声呼喊，同时那个兵开了枪，立刻把这位公使击毙。惊慌的轎夫把轎子放落在地上，柯德直跳起来，于是臀部受了重伤，因为他的臀部已經移到他的头本来所在的部位。他从边道逃跑，多次受枪弹的射击但是沒有被認真地追逐，于是逃到美以美会教会的美国人当中，在那里他的枪伤受到医治。^①这次謀杀是一个名叫恩海的滿洲兵士干的，他报告了自己所干的事并要求特別提升；在审判时他宣称“我从上級得到命令把每个到大街上的洋人都杀死，我是一个軍人，我只知道遵守命令是我的天职。”^②在围攻使館以后，他被日本兵捕获，由德国人审判，被处死刑。克林德男爵

① 柯德自己的叙述，为各权威著者所引用。

② 御史的奏摺，濮兰德和白克好司：“慈禧外紀”，第三〇五頁。

的尸体抬到总理衙門，袁昶下令以棺盛之，匆匆予以埋葬；^①在八月十六日，尸体被掘出，第二天用适当的仪式葬于德国使館。

三十三 杀害消息的奇怪的預知

有一个奇怪而不可解的事件牽連到这次杀害案。在它发生的六天前——六月十四日——一个关于一位外国使节已經遇害的消息从北京发出而传播于天津，^②在十七日，电报局总办盛宣怀在芝罘接到一份由伦敦拍来的电报說，“此間謠传德国公使已經遇害。”^③六月十六日的伦敦各晚报登載拉凡(Laffan)通訊社从天津拍来的几封电报說，“德国駐北京公使已經遇害。”当这个难以置信的行将发生的事件的聪明預知变成事实的时候，由于使館区被紧紧地包围着，北京以外的地方对于这个事实毫无所知，达十二天之久。

三十四 使館区在下午四时被义和团 与軍隊攻击

这次杀害事件对于在中国政府中主张和平的少数人是一个严重的打击，逼使他們哑口无言，无法遏止仇視洋人的潮浪，并且推动了进攻派去完成他們的計劃。^④它使外国使节和北京的外侨公众陷于恐怖，他們已經被封鎖在防綫之內，現在只能期待更坏的事情发生。誰也不想在任何种类的中国方面的护送之下离开北

① “瀾公來函，奉袁少卿(譯者按：即袁昶)之命，被杀害之洋夷業經收殮，請端王親尸，并于东安門梟首示众。”——“景善日記”，六月二十日，第二七三頁。

② 六月十四日天津电报，“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日。

③ 六月十七日上海“同文沪报”，轉引同上。

④ “恩瀾來告，甘軍現正攻击使館，榮祿力主护送洋人之办法已成画餅矣。”——“景善日記”，六月二十日，第二七一頁。

京了，每一个念头都轉向了防卫，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决心繼續
抵御到底。在美以美会教会的美国人首先被收容进来——二十名
水兵，七十个美国男人和妇孺，一百二十六名中国女学生，几百名
中国教民，柯德是用昇床送来的；他們限在二十分鐘之內整理就
緒，只帶着他們手中所能拿的东西；他們排成单縱队，慢慢地走，
一直达到使館区，与避难者的主力汇合，并没有遇到煩扰。北堂
的教民和卫队仍然在那里。在白天，并没有敌对的征兆，但是在
下午四点正——在要求公使們离开北京的确切限期二十四小时之
后，正好象那份公文是一份要求使館和它們的人員投降的最后通
牒一样——使館四围和北堂遭到来福枪的猛烈的扫射。从这时
起，四百七十三名的外国平民（二百四十五名男子、一百四十九名
女子和七十九名儿童）、四百五十一名外国卫兵和数千名中国教民
便經常遭受义和团和中华帝国軍队的攻击。

第九章 北京和天津

- 一 六月二十日駐大沽的各国海軍上将发出宣言242
- 二 揚子江流域各总督的正确态度243
- 三 外国同意采取共同行动244
- 四 战争状态并不存在的决定244
- 五 中国国内各派的情况246
- 六 七月三日中国在黄河以南保守中立的协定247
- 七 六月二十日围攻北京使馆区；中国人主张分歧248
- 八 分别指揮使馆区的防御工作249
- 九 在被围期間各使馆的行政工作250
- 十 北京被士兵和义和团所支配与搶劫251
- 十一 宣战和进行战事的上諭252
- 十二 六月二十四日令将洋人統予消灭的上諭253
- 十三 六月二十四日中国教民在北京被处死254
- 十四 六月二十五日因义和团得意忘形或因他故而首次停火...254
- 十五 七月一日保定府屠杀传教士255
- 十六 七月九日毓賢在太原府屠杀传教士256
- 十七 在山西和蒙古的其他传教士的命运257
- 十八 七月三日在奉天府的屠杀；七月十五日海兰泡惨杀案 ...258
- 十九 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浙江省衢州府的屠杀259
- 二十 在天津的軍事行动；七月十四日天津城被攻占259
- 二十一 攻占天津的后果261
- 二十二 围攻使馆；荣祿的牵制力262
- 二十三 荣祿对西太后持异議263
- 二十四 七月三日中国向列强呼吁263
- 二十五 七月十四日据报北京外侨等于七月八日被屠杀264
- 二十六 变乱妨碍了海关工作266
- 二十七 泰勒奉派管理海关266

二十八	李鴻章在对外关系上的影响	267
二十九	七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北京的半停火状态和談判	268
三十	七月十七日仁慈的上諭轉达各国	269
三十一	中国駐外使节的努力;七月十七日北京发出第一封电报	270
三十二	七月十八日到二十七日北京停火期間的一些快事	271
三十三	責成中国政府負責各国使节的安全	272
三十四	迫令負責的办法	272
三十五	七月十九日重提护送各使往天津的建議	273
三十六	八月四日李鴻章向各国提出同样建議	274
三十七	七月二十九日使館复行受攻	275

一 六月二十日駐大沽的各国海軍上将发出宣言

駐大沽的各国海軍上将与駐北京的使节們从六月十日起,与西摩尔部队从六月十四日起,与天津方面从六月十六日起,便断絕信息;①所以他們不得不担負起責任来采取每个人認為对于保护本国利益是适当的那些步骤。这种責任的承担立刻由各本国政府的直接訓令認為允当,一般并没有加什么限制;②不过英国政府指出一些問題,認為这些問題不宜交多数人决定,③它并且“拒絕为其他国家的行动承担任何責任。”④在六月二十日,在天津方面聞悉北京发生的事件之前整整一个星期,大沽口外的各海軍上将发出了一项通知,重新向中国政府和人民保証說:“在中国的各同盟

①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一日卜魯斯海軍上将致海軍部函,“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六七頁。

②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七日德·兰桑(de Lanessan)致庫里如(Coufrejolles)海軍上将函,法国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四四頁。

③ 一九〇〇年七月三日保罗·刚本(Paul Cambon)致德賽加賽函,倫敦,同上,第六六頁。

④ 对中国駐倫敦使节的声明,引自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二日薩里貝利勳爵致賽納乐爵士函,“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七〇頁。

的海軍上將和海軍高級官員願意使中國沿海、沿江以及各省縣的總督和官員知悉，他們只有意對義和團和反對他們前往北京營救他們的同胞的那些人施用武力。”①

二 揚子江流域各總督的正確態度

控制着揚子江流域的駐南京的總督劉坤一和駐武昌的總督張之洞已經有接受這種保證的傾向。早在六月間，劉坤一便發出了逮捕所有的大刀會分子并不必向他事先請示就可立即正法的嚴厲命令；②在六月二十日有兩名大刀會分子在南京正法。③在六月十六日，這兩位總督與山東巡撫袁世凱以及安徽、江西兩省的巡撫聯名電奏朝廷，請西太后採取迅速的步驟來取締義和團，因為他們不是愛國者而是革命黨；上奏章的這幾位大臣準備率領他們的聯合軍隊北上援助政府；他們並且向駐廣州和福州的總督們建議採取共同行動。④在各國海軍上將發表了六月二十日的宣言以後，駐揚子江流域的各位總督馬上聲明，他們將分別竭力維持他們轄區內的秩序，並且慎防各地發生事故；張之洞用簡練的古文体發出一項四字押韻的告示：

“懍遵上諭；緝匪保安；造謠妨教；明正典刑。”

各總督的聲明是與各海軍上將的聲明完全符合的，當經轉達各國。⑤

①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日、二十一日卜魯斯海軍上將從大沽致海軍部函，“中國，第三號”，一九〇〇年，第六七頁；六月二十日芝罘電報，“北華捷報”，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二日。由八個國家的高級海軍軍官簽名。

② 六月八日江陰通訊，“北華捷報”，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三日。

③ 六月二十一日南京通訊，同上，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④ 六月十六日南京電報；六月十六日武昌電報；同上，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日。這位滿洲編史者還說道：“但是〔劉坤一〕堅決不願出兵去屠殺幾個毫無辦法的洋人”，這一個警告激怒了老佛爺。——“景善日記”，六月二十二日，第二七五頁。

⑤ 六月二十一日南京通訊；六月二十二日武昌通訊；“北華捷報”，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七日。六月二十二日伍廷芳致海約翰函，“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〇年，第二七三頁。

三 外国同意采取共同行动

各国内阁在为它们的使节担心之后，随着又担心它们对中国的关系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甚至在接到占领大沽的消息之前，各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彼此保证它们“与其他各国忠诚而完全地合作的意志”。^① 美国政府竟脱离了它避免共同行动的一贯政策，^② 立即同意与其他各国联合行动以打开到北京的道路而援救在那里遇险的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保护美国的一般利益，限制紊乱地区的扩大，防止将来再发生同样的灾难；但是它决意要为中国取得永久的和平与安全，保全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保护条约权利，并维持门户开放政策。^③ 法国政府拟定的共同目标是：援救遇险的外侨公众，维持领土现状，取得对将来的保证，并且为这些目的采取共同行动；^④ 不管它们以往的野心怎样，不管将来发展如何，目前鉴于共同的危险，各国一一都同意了。^⑤

四 战争状态并不存在的决定

要想确定局势，就必须决定另一问题——是否存在着对中国的战争状态。对于这个问题，大家都同意对中国的战争状态并不存在，而且这个决定是根据中国提出的一个论点而作出的。大沽炮台的夺占被北京政府指为宣战的构成，并且用作口实以勒令外国

① 六月十六日日本对法国的保证，外交文件，第四五页；六月十一日萨里贝利勋爵对日本使节的声明；六月十六日俄国对英国政府的声明，“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六〇、六一页。

② 参看第八章第四节。

③ 七月三日海约翰致驻中国的各国使节的通函，引自七月三日铁勃(Thiebaut)致德赛加赛函，外交文件，第六四页。

④ 一九〇〇年七月五日德赛加赛致蒙特贝洛(Montebello)函，同上，第七一页。

⑤ 特别要参看六月十八日奥洛索夫亲王(Ouroussoff)(俄国大使)致德赛加赛函；七月六日蒙特贝洛致德赛加赛函；同上，第四四、七三页。

使节离开北京以及在直隶省发动帝国军队对外国军队的攻击；但是派駐外国政府的中国各使节却有另一种的言論。駐广州的总督李鴻章在六月二十一日通知他們說，他已經奉召晋京陛見，所以訓令他們解釋說：“大沽炮台向外国軍艦开火并未奉到朝廷的命令；倘若各国認為战争状态并不因此事而存在，他将北上，采取步驟取緝义和团，然后与各国进行交涉以求获得一种解决办法。”^①中国人首先开火而造成的这种防御性质的攻击行动在当时无人知悉（至少在伦敦），这说明各海軍上将对于这点并未十分重视；但是大家知道“情势是益趋险恶；整个华北处于軍事行动中；西摩尔的部队毫无音信；天津被切断，六月十七日那里听到大炮声”。^②根据这个消息，各国一致通知駐各該国的中国使节，倘若大沽炮台并没有奉到上峰的命令而开火，倘若对国际部队〔西摩尔的部队〕的攻击并没有授权，那末，就没有理由認為战争状态存在；但是有几国以“据称”字样代替了“倘若”；^③德国則拒絕撤回它的軍队，并認為应当給中国一个严厉的警告，不要錯誤地把时局看得并不严重；^④日本則認為应当責令中国政府鎮压叛乱。^⑤ 西方国家一般都贊同李鴻

① 六月二十二日薩里貝利勳爵致賽納乐爵士、赫伯特 (Herbert) 和列本函，“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七〇頁；六月二十一日德賽加賽致法国駐各国大使函，外交文件，第四九頁。

② 六月十七日卜魯斯海軍上将致海軍部函，六月十七日，旅順，六月二十五日倫敦收到；六月十八日同上函，六月二十日芝罘，六月二十日收到；“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六五、七四頁。六月二十三日庫里如海軍上将致德賽加賽函，外交文件，第五三頁。

③ 薩里貝利勳爵致德賽加賽函，如前注；六月二十四日斯各脫爵士从圣彼得堡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七三頁；六月二十二日里維索 (de Reverseaux) 从維也納致德賽加賽函，六月二十二日巴勒尔 (Barrère) 从羅馬致德賽加賽函，六月二十三日玉耳·剛本 (Jules Cambon) 从华盛顿致德賽加賽函，外交文件，第五〇、五二頁。

④ 六月二十二日諾頁 (de Noailles) 从柏林致德賽加賽函，同上，第五一頁。当时还不知道德国使节被謀杀。

⑤ 六月二十四日阿尔曼 (Harmand) 从东京致德賽加賽函，同上，第五三頁。

章的任务，但是日本政府却不如此，它以为那是无效的，香港政府也不赞同，它以为广州是需要这位总督坐镇的，因此李鴻章决定终止北上^①。

五 中国国内各派的情况

揚子江流域各总督的态度在任何时候都不可疑。张之洞在一八九八年搞了一阵维新之后，便重新依附西太后的反动政策，但是刘坤一，虽然对维新派抱着冷淡的中立态度，却对反动派保持着坚决的抗拒。^② 现在帝国陷于意见分歧之中。满人差不多人人都跟着端王和刚毅走，目的在于维持他们的特权；废棄现在的皇帝而代之以最近被选为储君的端王儿子溥儀；驅逐洋人作为排除外国势力的第一个步骤；并压制一切维新的势力。义和团起先是被毓賢所鼓励，以后又找到权要的支持，目的是在毁灭外国宗教；这个目的终于变成了攻击所有的洋人；他们的信条是支持清朝，他们的运动是限于山东和直隶，在山西只有一次野蛮的暴乱，但是现在在山东却被袁世凱所制止。在黄河以南各省的大刀会和其他的秘密结社具有同一目的——顛复清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随时准备反抗地方政府，或攻击洋人，如果借此可以使地方官吏为难的话。黄河以南的中国民众曾经赞同康有为的主义，并对他的失败表示惋惜；他们并不憎恨清朝，但是他们（尤其是在广东省）对于扼杀维新运动却是愤怒的；并且他们随时随地对于要废棄当今的皇帝都感到愤怒。在这些省份的官吏，五分之四是汉人，他们对于皇帝是忠诚的，但是对于西太后的那些计谋则加怀疑，并且为后果而

^① 六月二十四日施高塔領事 (Scott) 从广州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七三頁。六月二十四日白藻泰領事 (de Bezaure) 从上海致德賽加賽函，外交文件，第五四頁。

^② 參看本卷第六章第二十一、二十七节。

担忧；在这次危机中，他们坚持效忠于皇帝个人。西太后的意图很难捉摸。按照最佳的解释可以认为，她清楚地看出，倘若她想不被义和团的浪潮所淹没，她就必须浮在这个浪潮之上——要想使浪潮不致消灭皇朝，就必须把它转向对付洋人；但是实际上，所有的史家都看到许多迹象，足以表明她很早就鼓励这个运动的。^①各位总督们采取了既忠于皇帝又忠于西太后的那种政策。

六 七月三日中国在黄河以南保守中立的协定

在这种同床异梦的情形下，各国的处境在某种程度上就象在一八五八年那样，那时英国海军一方面镇压着中国沿海的海盗，一方面英国仍然同中国作战，并且也象在一八六〇年那样，那时英法联军正在夺占大沽炮台并向北京进军，但又保护上海县城以免叛军的侵入。^② 在这样的情势之中，各总督对于六月二十三日的声明作更进一步的实行，在七月三日他们拍电给海外的中国使臣，指出了在北方的骚扰将有蔓延到南方的可能，因而建议，“不管在北方将发生若何事件，各国应同意不派遣军队到扬子江流域进入江苏和浙江两省，各总督同意按照条约的规定在他们的各该辖区之内保护各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③ 这个建议是与驻上海的各国领事进行了某几次谈判之后才提出的，领事们考虑并修改了协定中的一些细密的条款，他们最后答应将这份暂行办法向本国推荐。^④ 这

① 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一，第一八七、二二八、二四二页；卷二，第五〇二、五六七、五九六页。濮兰德和白克好司：“慈禧外纪”，第二五七页。麦卡锡（J. F. McCarthy）：“未来的强国”（The Coming Power），第七八页；汤姆孙：“中国与列强”，第六页。萨威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卷一，第六一页。威尔：“北京书简”，第一一页。“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六月六日、十三日。

② 参看本书第一卷，第十五章第五节；第二十六章第二、四节。

③ 七月三日伍廷芳致海约翰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二七六页；七月四日罗丰祿致萨里贝利勋爵函，“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九五页。

④ 六月二十九日裕庚致德赛加赛函，七月五日白藻泰致德赛加赛函，外交文件，第五八、七〇页。六月二十七日、七月四日霍伦领事（Warren）致萨里贝利勋爵函，“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七九、九七页。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七月八日古纳领事（Goodnow）致海约翰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二四八、二四九、二五二页。

个办法由各国認為滿意，并且为它們接受了；两位总督立刻把它用告示向中国人民公布。^① 这个政策在原則上被在广州的李鴻章所接受，他“同意不再承認北京政府”；^② 在山东的袁世凱在被直接征詢意見而加以答复时发出电报說，“我的意見和那几位总督相同。”^③ 后来又看出端方在陝西很坚决地反对北京政府的狂妄愚蠢，所以义和团的暴乱仅仅在直隶、山西和滿洲得到积极的支持。因此，結合着各种动机——反对端王及其党羽的計劃，拥护人民反抗滿人，有意保全皇帝，并将西太后从她自己采取的方針所将引起的后果中拯救出来——所有的南部和中部各省的高級官員，根据这次乱事只是一种叛变而不是一个对外战争，并且各国不能要求获得領土的那項声明，都已与各国結成联盟。

七 六月二十日圍攻北京使館区；

中国人主張分歧

本書是一部中国对外关系史，所以关于围攻北京各使館和包围天津的那种輝煌的故事，只能作簡要的叙述；关于围攻中的惊险、艰苦、豪壮和坚忍等的全部事迹，讀者必須參閱这些方面的专著。^④ 对使館区开火是在六月二十日下午四点钟，除了义和团所

① 布告原文，“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一日。

② 六月二十九日霍伦領事从上海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八五頁。

③ 七月一日同上函，同上，第八七頁。

④ 就象：关于北京的情形，可看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威尔：“北京书簡”，亚伦：“北京使館被圍記”，馬丁(W. A. P. Martin)：“北京之圍”，奧里芬：(N. Oliphant) “北京使館被圍記”，一九〇〇年十月十三日、十五日、十六日伦敦“泰晤士报”发表的莫理逊(G. E. Morrison)的信件，汉澤(Heinze)：“北京使館被圍記”(Die Belagerung der Pekinger Gesandtschaften)，达斯(E. d'Arcy)：“北京法使館的防卫”；关于天津的情况可看，吉普斯(G. Gipps)：“华北作战記”(The Fighting in North China)，馬克里希(W. McLeish)：“天津被圍記”(Tientsin Besieged)。

使用的火枪和长矛大刀外，又首次加用了中国军队的来福枪，^①从那时起，外侨公众就受到了这些武器的一齐攻击，这种攻击一般地是不断而猛烈的，但是有时被沉寂和一种停火所中断；这些停火对于那些躲在使馆界内、完全与外界消息隔绝的人们是十分不可解释的，只能用在北京以外所发生的事件来解释，这些事件是一切满、汉领袖们所立刻知悉的，他们鼓励了那已经很清楚地看出这次凶暴攻击将产生什么后果的一派，而暂时挫折了那些冒死行险的人们。停火有显著的三次——六月二十五日，七月十八日到二十八日，八月三日和四日。“从六月二十日到二十五日，从六月二十八日到七月十八日，从七月二十八日到八月二日，从八月四日到八月十四日，我们是处在炮火之下的。”在这时期，“有人从中给我们以部分的保护，这似乎是可能的事：历次攻击并不是由政府所能调动的数目的兵员所发动——攻击没有一次干到底，总是正当我们恐怕他们一定要成功的时候停住了——假使在我们周围的军队真的彻底而决心地攻击的话，我们支持不了一个星期，或许连一天都支持不了。所以一种解释是可信的，那就是一定有某种保护——有人，或许是知道摧毁使馆区将会对这个帝国和这个皇朝带来怎样的损失的一位聪明人，在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之间从中作梗。”^②

八 分别指挥使馆区的防御工作

使馆区是被大胆的人们防御着的，但是从最初起，各国间的猜忌便制造了祸害。英国使馆是所有外国平民的避难所，由七十九名英国水兵保卫着，它也是大部分平民志愿队的总部，共有七十五名志愿队（包括三十一名日本人）——他们是射击能手。除了日本军

^① 赫德：“来自中国”，第三二页。

^② 同上，第三九页。

队，由于日本使馆完全为其他使馆所掩护，因而在志愿队的支援下被派遣去担任保护集居在肃王府的中国教民的工作外，其余的每一支军队都防卫着它本国的使馆。每个部队都由它本国的军官和公使指挥着，除了在名义上把最高权力授予当时在场的高级军官外，并没有统一的指挥。这位高级军官就是在亚洲大陆上作战经验不多的奥国汤曼海军上校 (Thomann)。在攻击开始的时候，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匆忙地放棄奥国使馆，这是一个被多数人所谴责而被其他的人宣称为不可理解的行动；^①其结果便是暴露了法国使馆的侧翼，并把肃王府的脆弱防卫推到前线去。为善后计，英国公使寶納乐爵士——一位老军人——被提名为防守司令，他委派美国使馆秘书斯奎耳 (Herbert Squiers) (也是一个军人) 为他的参谋长，但是他们所被允许行使的指挥权，也不过是名义上的，^②直到终局每一个使馆主要都是由自己的卫队防卫着。

九 在被围期间各使馆的行政工作

由于美国人特具自治本能，当六月九日各传教士最初避难到美以美教会的时候，他们便组成了各种委员会。当六月二十日全体外侨集合在英国使馆的时候，这些委员会的范围和职能就扩大了。传教士杜克斯伯雷 (E. G. Tewksbury) 领导公共福利委员会 (Committee of General Comfort)，他的工作曾经为寶納乐爵士和康格先生所推许。^③另一位传教士干明威尔 (F. D. Gamewell) 负责防御工事，“他的服务有无限价值，估计这些服务对于被围

① 赫德：“来自中国”，第一九页。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一，第二七八页，卷二，第三九五页；威尔：“北京书简”，第七一页；亚伦：“北京使馆被围记”，第一一二页；胡克尔 (Hooker)：“北京的幕后”(Behind the Scenes in Peking)，第六三页。

② 参看胡克尔前书第一二一页。

③ 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二，第四七五、四九五页。

中的防禦工作的成功是的确少不了的，也不算夸张”；^① 据说在被围期间他是“一位在局部工作中的全能人物。”^② “泰晤士报”记者莫理逊博士直到受伤为止在很多方面都作了有效的活动。大家都认为斯奎耳有乐观和急智的表现。平民志愿队也为人所称誉，战斗教会有“六位战斗牧师”加入了他们的行列。^③ 在军人当中，公认日本大佐水马最为出色。在六月二十九日，他报告肃王府只能再守两三天；但是他一直守到他受伤，并且在他受伤之后守到解围为止。他有不顾一切的勇气，毫不放松的警惕性，并且足智多谋；西方国家的人士对他的评价很高，在这以前亚洲人一向是被视为劣等的。

十 北京被士兵和义和团所支配与抢劫

当中国士兵在六月二十日被放纵时，他们摆脱了所有的拘束。他们不停地监视着使馆并向之开火；但是他们也同样积极地侵袭这个不设防的城市并加以抢劫。义和团已经放火和抢劫了一个星期，现在士兵们也参加了这项勾当，并且把惊恐扩展到各方面。甚至满洲贵族们的奴仆也惊骇逃跑；^④ 富有的人被要求以“贵如珍珠”的米粮来供应军队和义和团；^⑤ 抢劫之风如此之盛，就是高官显宦也为他们的宝藏担心。^⑥ 义和团是局势的主宰者——现在，他们的计划就是政府的计划，他们的意志就是帝国的意志，他们招募的兵丁就是力足以支持他们的那些人的不速之客。当西太后

① 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一，第二七四页。关于他的工作情形看前书，卷二，第四六八、四七五页。

② 赫德：“来自中国”，第四一页。

③ 他们的照片载在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二，第四七四页。

④ 濮兰德和白克好司，“景善日记”，六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第二七三——二七四页。

⑤ 同上，六月二十二日，第二七五页。

⑥ “礼王忧闷异常，恐其财物被抢之故也。”——同上，六月二十二日，第二七五页。

在六月二十一日从一处宫殿越街到另一宫殿时，一队义和团向她致敬；她赏了他们二千两银子，“以其军容之壮特向統領庄王致賀。”^①景善有一百名义和团駐宿在他家里；^②在六月二十五日有六十名义和团由端王、庄王和貝勒載濂、載瀍率領着闖入皇宮。^③士兵的勒索和无礼并未稍減，可以确切地說，那些政府中人員不約束軍隊的人如董福祥，不約束义和团的人如端王，一般說来，对于事态发展的实际控制权并不比一八五七年莫臥儿王公在德里时为大。

十一 宣战和进行战事的上諭

中国政府一旦下了决心，它发布的命令是坚决而严厉的。在六月二十日有一道上諭責令各总督和各巡撫保护他們所轄的省份，“以防外国侵略的企图”，并“派军队到北京去”。^④第二天便出现了中国的宣战書。在引証了近六十年来許多的外国侵略行为以及中国企图妥协的各次努力之后，它宣称夺占大沽炮台表明它們侵略成性，并未低減；中国从来沒有不顧到它們的，“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橫行，专恃兵坚器利”。現在，“祖宗凭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憤，曠代所无，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与其苟且图存，貽羞万古，何若大张撻伐，一决雌雄。六月二十四日的上諭完成了义和团的組織，派庄王和大学士刚毅共同統轄指揮；另一道上諭命令发給义和团米粮；另一道上諭禁止军队搶劫。六月二十五日的上諭发給五軍中的每一軍（包括义和团作为一个軍）現銀十万

① “景善日記”，六月二十一日，第二七三頁。庄王載瀾为禁軍統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他是光緒的亲弟，光緒过繼到另一族中为咸丰之子。

② 同上，六月二十二日，第二七五、二七六、二八一頁。

③ 同上，六月二十五日，第二八二頁。关于兵士們的搶劫情形可看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一，第二七〇頁。

④ 这是毓賢在七月十五日的公文中所引述，見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二，第三八〇頁。

兩；二十七日的几道上諭又發給軍隊(包括天津的軍隊在內)現款。七月一日的几道上諭述及電報和郵政的紊亂和“假冒義和團的人的肆行殺戮和搶劫。”七月二日又下了一道重要的上諭述及“民教相仇之事”；而“其實教民亦國家赤子，其中非無善良之徒”，但是他們“只因惑于邪說，又恃教士為護符，以致種種非為，執迷不返”。應當把教民們領入正途，但是“……現在中外既已開衅，各國教士，應即一律驅遣回國，免致勾留生事，仍于沿途設法保護為要……”。^①

十二 六月二十四日令將洋人統予消滅的上諭

這道上諭語氣很溫和，在前一個星期曾經有一道凶狠的上諭。原諭已無留存，但是好象是在六月二十四日頒發的。^② 雖然得不到存稿，但是它的可靠性是肯定的。關於諭中所載各項命令的警告“幾乎同時由至少三個省份以及遠隔數百里外的許多地方的衙門中的朋友，抱友好態度的電報發報員以及官吏們——其中有許多是高級的——傳達給傳教士等。外國人對於原電最少看到兩次，凡是被那些驚人而無前例的字樣——逢洋人必殺，洋人退回即殺^③——吓呆過的人們都把諭中用語永記心版。這個命令在全世界人的心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④但是世界上的人也不能忘記在北京竟有人有這種勇氣把“殺”字改為“保”字。^⑤ 這項改動被認為是兩位大臣袁昶和許景澄所為，^⑥他倆不久便因為他們的大

① 京報所載上諭的譯文，“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〇年，第一六八以後各頁。

② “十天以前”，景善日記，七月四日，第二八七頁。

③ 明恩溥：“中國在激變中”，卷二，第五九四頁。

④ “十日前老佛爺降密旨，洋人該殺，能退境外，亦該殺。”——“景善日記”，七月四日，第二八七頁。

⑤ “恐有漢奸主持此意，尚未將此事入告老佛爺也。”——同上，日期頁數亦同上。

⑥ “日昨剛中堂與李公，將袁許擅改密旨，蕭殺洋人一句，改為保洋人之事，面奏老佛爺。剛云，老佛爺頗有怒意，慈顏大發雷霆。……今日未刻，業經奔市，恩銘往觀。”——同上，七月二十八日，第二九三頁。

胆行为而被斬首。所以这个消灭洋人的命令，在那些用电报拍去的地方，丧失了效力，有远见的官员们拘泥地遵照他们所收到的上諭，而将那些未经証实的属于一种不同意向的消息置之不理；但是在发生变乱的地区之内，上諭的抄本是由专差递送的，因而毫不迟疑地严厉遵行了。

十三 六月二十四日中国教民在北京被处死

在北京，时间是沒耽誤的。六月二十二日，发出告示，悬赏活捉洋人——男子每名五十两、妇女每名四十两、儿童每名三十两；^①可是现在，六月二十四日，屠杀开始了。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大鬼子”——是在使馆的防卫工事和卫队保护之下的；但是中国教民——“二鬼子”——并不见得不是仇恨的对象，因此他们不得不吃苦了。在那天，“于庄王府外杀害教民数百名”，这是由庄王主持并有四名审判官审判后执行的；“遭池鱼之殃者亦有不少。”^②一个星期以后，在“庄王府门外”举行审判之后，另一批“九百多人立即被义和团处斬。”^③

十四 六月二十五日因义和团得意忘形或因他故而首次停火

义和团追寻基督教徒的狂热，使他们暂时失宠，这是造成第一次无从解释的停火的一个因素。在六月二十五日有六十名义和

① “当这份布告发布的时候，庄王是禁卫军的首領。这份布告盖有禁卫军的关防。”——一九〇〇年九月四日康格致海約翰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一九三頁。这份布告的日期是六月二十八日，但是：

“老佛爷现亦降旨，命載勛立刻悬出頒賞之告示，……果能生擒洋人一名，男者賞銀五十两，女則四十两，幼則三十两。”——“景善日記”，六月二十二日，第二七六頁。

② “景善日記”，六月二十四日，第二八二頁。

③ 同上，六月三十日，第二八六頁。

团，由端王和庄王率领着冲入皇宫；正在喧嚷着要见皇帝——“洋人之友”，他们突然间遇到了西太后，西太后怒骂端王，“废皇上一事，非尔等所得干预，予自权衡；大阿哥之名号本不难撤，将伊逐出宫外，真如反掌之易。”她的愤怒增长，于是下令停止在北京的所有战事，并令荣祿到使馆去磋商和平条件。^①一面白旗送到英国使馆北面的桥上，并且张贴了一份告白说，“遵谕保护外国使节，应即停火；一份公文将在桥上送达。”拿旗的人在回去的时候遭到中国士兵用枪向他瞄准，于是他就走开了。公文并未收到，但是有一个短期的比较上的安静，然后攻击又开始了，比以前更为激烈。^②这次无效的传达音信的企图却被通告到外间——“六月二十五日的一道上谕，飭将在北京的各国使馆不惜一切代价予以保护。”^③这个保护命令的解释是由满洲记注官所作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颁发这道命令的几天中，在天津曾发生了以下的事件：从大沽来的援军在六月二十三日与天津租界的防军获得联合；西摩尔的部队在占据了西沽的兵工厂以后，在六月二十三日打退了一支中国大军的决心进攻，二十五日解围，在破坏了西沽兵工厂和它的储藏以后，在二十六日撤到天津。^④另有一种看法是，“这次休战可能是要我们防备松懈，另有计划以中伤我等——也或许是要将一些友谊纪录在卷。”^⑤

十五 七月一日保定府屠杀传教士

驱除洋人的命令首先能够送到的地方是保定府。铁路工程师

① “景善日记”，六月二十五日，第二八二页。

② 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一，第二九二页；赫德：“来自中国”，第三三页；威尔：“北京书简”，第一〇七页。

③ “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七月四日。

④ 参看第八章第二十二、二十四节。

⑤ 赫德：“来自中国”，第三三页；参看本章第三十二节。

在五月底就从这个地方逃出来了，^①但是那里还留着很多的传教士，他們的安全是令人担心的，可是中国政府曾經允許給他們以充分的保护。^②事实上是派过一队卫兵的，但是以后又撤回了。大約在六月二十四日，有些中国仆人逃跑了，但是大部分还是留在那里与传教士們共命运。六月二十八日，中国的孟牧师被捕、受刑并受审；二十九日被斬首。六月三十日，有一个教会被一群由穿着軍服的乱兵帮助着的义和团所攻击，七月一日其他教会被攻击；传教士和他們的眷属不是在攻击中被杀，就是在家里被烧死，除了一个小女孩是被大刀刺死外，大部分是被斬首的。这样便死了十一个美国人和四个英国人——其中有六名男子、五名妇女和四名儿童。^③

十六 七月九日毓賢在太原府屠杀傳教士

那些命令其次就达到山西省太原府。在六月二十七日，一群暴民攻击并毁坏了一个教会医院；在那里住着的人逃跑了，只有一个英国妇人因受伤被推回到烧着的屋子里烧死了。在以后几天里，传教士們不断地吁請当局給予保护，在七月三日有三个官吏“由巡撫派来”，他們督促所有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集中在一个指定的中国式房子里；在七月六日他們照办了，并且有許多仆人伴随前去。在东面八十英里的寿阳的传教士們在企图逃向东边海岸未成之后，于七月八日被帶到太原府而关在牢獄里。在七月九日，所有的这些人都会被帶到巡撫衙門；在衙門的大門之外，男人、女人、小孩都象普通的犯人一样被剝去上衣等候着。最后，毓賢出来將他們

① 参看本卷第八章第七节。

② 参看本卷第八章第十九节。

③ 法尔茲：“一九〇〇年中国殉难录”，第一九頁。

“他們〔被斬首者〕逃到帝国的軍营里……那个軍营的官长把他們的财物劫夺了，然后把他們送交該省的臬台，后者又把他們送交叉和团。”——同上，第二五頁。

驗明，便下令立即斬首。在那時那地，當着巡撫的面就把男人、女人和小孩都處死；首先處死的是太原府的基督教徒，其次是天主教徒，再次是來自壽陽的基督教徒。“一個年老白須的天主教主教質問巡撫為什麼要作這個罪惡的行動；所得到的答復是，那位巡撫抽出他的腰刀砍在那個主教的臉上，鮮血流到他的須間，他很快就被屠殺；那些修士和修女也很快地繼他而死。”這樣，就在巡撫毓賢的眼前，並且由他的命令，有三十四位英國和蘇格蘭的基督教徒及十二位天主教徒死去——其中有十五個男子、二十個婦女和十一個小孩；根據毓賢自己呈給西太后的報告，另外還有在太谷縣被殺的六名美國傳教士的首級曾經被送到這位“遺臭萬年”的巡撫那裏來。^①

十七 在山西和蒙古的其他傳教士的命運

在山西的其餘的傳教士，那些向西穿越省界逃入陝西的人最後未遭屠殺而被送到漢口；他們遭遇到很多的艱苦，至少有七個人因此死亡，許多人在很多天里處在極端危險之中；但是一旦到了陝西，他們便在巡撫端方的保護之下，因為他曾經奉到“保護”他們的命令，便堅決執行了。他的士兵對他的命令的遵守雖然是勉強的，但是他們卻遵守了，並且把各批逃難的人引送到湖北；在那裏把他們交給張之洞的士兵，張之洞的命令也是被遵守的，雖然有些勉強。^② 那些被驅向北逃到蒙古的傳教士們遇到不同的遭遇，與駐在那裏的傳教士們同其命運。另一些人在山西的各傳教所被殺了——十個在朔平府，六個在大同府，六個在太谷縣，還有許多在

^① 法爾茲：“一九〇〇年中國殉難錄”，第三〇頁以後各頁。

“毓公遵昌殺洋人一疏，業經來到；先是將各該洋人誘入網羅，並將其鎖禁，帶往署內，令大師兄等殺之，惟有一女得脫，逃至城根，因已將其乳部割去，因民未得其生擒也。”——“景善日記”，七月十六日，第二九二頁。

^② 法爾茲：“中國殉難錄”，有關各處；明恩溥：“中國在激變中”，第三三章。

其他許多地方。在山西境內以及在蒙古边界，包括在太原府的牺牲者，据悉总共被杀者有一百七十八人，在基督教徒中成年人有一百一十三人，儿童四十六人，在天主教徒中男子十二人，女子七人，但是后两个数字可能是不完全的。^①此外，在蒙古受刑后被害的有英国皇家工程师瓦茨-琼斯上尉 (Captain Watts-Jones, R. E.)，他是三名为铁路勘查路綫的工程师之一。他們是从广州出发，路过湖南、貴州而到四川，再从那里到天津去的；他們乘着木筏沿黄河而下，木筏于六月二十四日破損；三人中伯尔奇 (John Birch) 当时溺毙；麦契逊 (Harry C. Matheson) 經過了許多危险到达了天津，在天津被围的后期他作了一名志愿兵，最后在一九〇一年春季当“里約热內卢号”輪船 (City of Rio de Janeiro) 在旧金山湾入口处失事时，为了协助拯救小孩而溺毙；瓦茨-琼斯上尉平安地到达甘肃省的宁夏府，但是以后遭到凌迟致死。^②

十八 七月三日在奉天府的屠杀；七月十五日海兰泡惨杀案

那些命令在南滿也奉行了。基督教传教士由于接到警告而占了便宜，在南方的人就避难于牛庄，在北方的有俄国军队驻扎在附近，他們的教会已在六月三十日被毀；在七月三日，在奉天府的天主教主教、四位神甫、两位修女以及其他地方的五位神甫連同所有可以捉住的中国教民都被杀了。^③七月十四日，黑龙江上的俄国汽船在爱琿被射击；十五日北岸俄国城市海兰泡被隔岸中国炮队发炮攻击。俄人給中国一次可怕的惩戒，包括屠杀好几千中国人——男子、妇女和儿童——他們的尸身在黑龙江里漂流而下；但是这个行

① 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二，第六四八頁。

② “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五日，及私人筆記。

③ 同上，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一日；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二，第六〇六頁。

动不为俄国最高政府所承認，而被它指为“远离中央政府而与其意見失却联系的軍人們独断的行动。”^①

十九 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 浙江省衢州府的屠杀

驅除洋人的上諭似乎是用書面，而且並沒有改成比較仁慈的形式而送達浙江巡撫的。在遲疑了一些時候之後，這位巡撫被臬台——一位滿人——所勸誘而把這個命令下達到省內的各知縣；但是，或許根據駐南京的總督劉坤一的禁令，他不久便收回成命。可是，災害却鑄成了。浙江沒有義和團，但是有不安情況，並且有教民的爭鬥；^② 七月二十一日在衢州府有亂兵參加了武裝盜匪共同劫持知縣官，據悉這位知縣是願意保護傳教士的，兵匪等把他和眷屬僕人帶到他的上司知府那里；在那里他的全家三十三人遇害，只留了他的夫人和祖母的性命。然後這群暴民便轉向傳教士；有些傳教士逃到道台衙門避難而被拒絕，有些找到城隍廟暫時躲避；但是或遲或早，總在七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的三天中，所有住在衢州府和由常山逃來的傳教士都被殺了——共計被殺十一人，兩個男人，六個女人，三個兒童，都是英國人。^③ 在從六月二十四日到七月二十四日這個期內，據悉被殺死的，包括在其他各省被殺的幾名天主教神甫在內共計二百三十一人，其中一百七十八名是成年人，五十三名是兒童。

二十 在天津的軍事行動；七月十四日天津城被攻占

援救天津的部隊共約八千名——俄國兵、美國兵、英國兵、德

① 明恩溥：“中國在激變中”，卷二，第六〇七頁。

② 參看第七章第六節。

③ 法爾茲：“中國殉難錄”，第九〇頁；明恩溥：前書卷二，第六〇五頁。

国兵和日本兵；連同原有的卫队和西摩尔的残余部队，現在的防卫部队为数达到一二、〇〇〇人。从这时起，在他們与中国军队之間經常不断地发生着进攻和反攻，中国军队得力在大炮方面占着很大的优势；但是在較大的战事中，攻势必然由外国联军所发动。距天津租界五英里远的东局子(兵工厂)是中国方面在华北的軍火供应主要来源；它有壕沟和堞墙保护着，并且在南面有堡壘掩护，中国人在这方面沿用羅馬人的慣技。六月二十七日，俄国军队在由其他各国兵士八百名組成的一个混合队的支持下攻占了这个兵工厂。然后連續多日，双方都有小規模的进攻，中国方面大事增援并增加了陣地大炮，联军方面在人力上也得到了一些增援，但是大炮不足。在七月九日，一千名日本军队在一千名混合部队的支持下扫清了战地的南部而攻占了在海光寺（即一八五八年的条約签字处）的西局子(兵工厂)。七月十三日最后的一幕到来；約有五、〇〇〇名俄国和德国的军队抄向东面和东北面进攻盧台运河的陣地；日、美、英、法各国军队也約有五、〇〇〇名向天津城作正面的进攻。第一队进展很快，能够冲进了在法国天主教堂附近的黑炮台射程之內。第二队整天地在一块被水塘和沟渠割裂着的平原上作頑强的战斗，人数丧失了七分之一；美国第九步兵队，有四四五人参加战斗，十七名陣亡（包括它的指揮官里斯庫姆〔Liscum〕上校），七十一名受伤，日本方面伤亡的約有五百人；这支军队在整个一昼夜間坚守着陣地，在拂晓的时候，日本部队冲进了外南門，爬上城墙，强登內南門，在七月十四日便占領了天津城，中国守軍撤退而不再抵抗。①

① 前引吉普斯和馬克里希书有关各处；一八九二——一九〇一年十年报告，天津，卷二，第五一九頁；薩威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卷一，第一六一——一八八頁；湯姆孙：“中国与列强”，第四三——八二頁；达格特(Daggett)：“在华解圍远征記”，第二七及以后各頁。

二十一 攻占天津的后果

“天津的攻陷不仅打开了去北京的道路，也把烟台和上海从日益增长的危险中挽救出来。”^① 这一情况使一些中国官吏坚定了保持中立的安全立场，他们以前虽然拒绝进攻外国，但由于他们是中国官员，就不得不抱着观望态度；^② 它警告了各地的老百姓，就是被人认为是通神的义和团也不是所向无敌的。在到处都传说并且相信在北京的洋人已经全体被屠杀的这个消息的同时，^③ 大家也都知道天津已被夺取而且受到惩罚，并且不得不信以为真。因为天津确是被惩罚了。在好几天当中，天津城和它的富庶近郊任凭义和团的摆布，他们随意屠杀、放火和抢劫；另有好几天，帝国军队竟和他们会合起来，这些军队在十九世纪末几乎是世界上最能干的抢劫者；而且天津暴民也相率效尤，不甘落后。在他们之间所造成生命的损失虽无法估计，但是在一个城郊所毁坏的财产据谨慎的估计就值“好几千万两银子”。^④ 中国军队于撤退之前在城里很多地方放火，造成了更进一步的毁坏。外国人尽可能快地成立了天津临时政府；^⑤ 但是在秩序能够适当地恢复以前，外国军队也跟着进行抢劫。银元宝是他们主要的目的物，找到的以吨计——他们据为己有了；但是美国兵的主要乐趣则在砸碎精致的瓷

① “十年报告书”，卷二，第五二一页。又见上海领事团的决定，见于七月五日霍伦领事对萨里贝利勋爵的报告（“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一〇一页），并见于七月五日白藤泰领事对德赛加赛的报告（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七〇页）。

② 当袁世凯所能报告的北京最近消息是“七月十一日各国使节平安”的时候，据说他对各总督的政策所抱的忠实态度已有动摇。——七月十九日芝罘电，“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两日后，据报袁世凯曾在七月二十日说过，由于他的进言，各国使节还很平安，并说“中国当局正设法营救和保护他们。”七月二十一日芝罘电，同上。

③ 参看本章第二十五节。

④ 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二，第五七八页。

⑤ 参看第十一章第二节。

器。^①“有些俄国、法国、意国和德国的军队则拦路抢劫更为出色……军事袭击向各方面进行……耶教十诫之中的最短的三诫肯定地是被大规模地触犯了。”^② 中国曾经破坏了国际法并蔑视全世界，西方各国在对付破坏法律者一方面也未承认自己国家的法律。

二十二 圍攻使館；榮祿的牽制力

在六月二十五日的短时停火之后，对北京各使館的射击不停，有时枪声达到猛烈的程度，这时其中还可以听到野战炮弹的声音。在两个月的围攻中，落在使館区的炮弹据估计有二、九〇〇发，所落的炮弹只有这个数目并且目标也不准确，这是保护被围者的奇迹之一。功劳归于荣祿。他尽可能作出各种努力以牵制这时居于政府领袖地位的那些狂人，他甚至试图阻止发出特别训令给毓賢，要他实行驅除洋人的六月二十四日上諭，^③他的品級太高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太巩固了，所以他的警告是不能完全被忽视的。作为汉军的統帅（汉军不及滿军之多，但訓練較好），他的权力太大了，不容許有任何干涉。他固然未敢做到把他的部队撤回而不参加攻击，但是他却不愿讓大炮用于“皇宮近畿”，他并且干脆拒絕批准使用他的后备大炮——这些是嶄新的炮，甚至还没開箱。^④

① 薩威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卷一，第二〇一頁。某日有自天津运来的白銀一、四〇〇、〇〇〇两在一个日本的口岸卸下，收入政府帳戶。——“东京新聞”，一九〇〇年八月三日。

② 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二，第五八三頁。

③ “景善日記”，七月四日，第二八七頁。

④ “刚相来談，云以董軍門今早至榮相府第請謁，因意欲借大炮也。……于伊入見之后，頗有暴躁之态，榮不应，隱几而臥。……董大怒，因損之太苦，”并上朝入覲西太后控訴，但无效。——同上，第二八四頁。

“聞以榮相頗为兵卒所推重，致无人敢违其号令，虽誘之以重賄亦然也，不亦怪哉。榮相秉性耿直不阿，立言侃侃，真为勇敢”，同上，七月四日，第二八六頁。

“中堂云若用大炮地雷，則董軍采客軍远来，并无大炮，宗庙宮闕內廷，若用地雷，恐为震动。”——同上，七月十六日，第二九一頁。

当援軍占据北京时，在距使館仅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发现所备用的大炮还在草包之中。

二十三 荣祿对西太后持異議

老佛爷因为迟迟不将使館毀去而时常发脾气，^①但是荣祿对于她的盛怒似乎并不介意。除对汉大臣以外，他还独自反对他的同族滿人，^②早在七月間他曾再度奏呈西太后警告她“以春秋之义，两国构兵，不戮行人，蔑視各国公使，即蔑視其国”；“此次攻打使館，比之暴行，尤为恶劣，乃一种愚蠢之举，将使人怀恨中国，永不能忘耳。”^③在七月十二日，他問道，設若义和团被打敗，北京被攻占，則将奈何；^④未久，他面奏老佛爷，“以請归政之照会出自伪纂，^⑤本系端王作主，令章京連某修纂，此事之內容，为荣所深知。”^⑥他的这种坚定的态度，加上中国防軍未能据守天津，对朝廷和政府，甚至对軍队的將領們，都发生了影响，^⑦从而产生了七月十八日的停火。

二十四 七月三日中国向列强呼吁

在这之前，国外因一項消息流传而震駭，以后才发觉是不确的。六月二十日克林德男爵的遇害，在事件发生的六天之前曾被虛报，但是真正被害的消息直到七月一日由各国領事呈报各国后才被証实。当一位正式任命的使臣被害的消息正在对一个震惊的世界发生影响的时候，在中国行政机构中的某些分子認為向各

① “景善日記”，六月三十日，七月四日、七日、十一日、十六日。

② “刚毅声称，荣祿一日左右朝局，則使館一日无法攻下”，同上，六月三十日，第二八五頁。

③ 同上，七月七日，第二八八頁。

④ 同上，七月十三日，第二八九頁。

⑤ 參看本卷第八章第二七节。

⑥ “景善日記”，七月十六日，第二九〇頁。

⑦ 同上。

联盟国发出呼吁的时机似乎已到。正当各使馆每天还都在被攻击的时候，这份呼吁书，日期为七月三日，由中国皇帝分别写给每个国家的政府的统治者，而每一份都以一种特别的理由为根据。每一份呼吁书都是把变乱归咎于“直隶和山东两省教徒与百姓间的”“意见的不合”，并且把大沽炮台的被占指作发生敌对行动的实在原因；但是对于英国，它指出了“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属于英国的”，所以在继续混乱中英国将比其他国家受到更多的损失；^①对于美国，则呼吁按照一八五八年条约第一款，它可以在中国和中国的敌国之间进行调停^②；对于德国，则对克林德男爵被叛徒杀害表示遗憾，并允许惩办凶犯^③；对于日本，则应允对于杉山彬的被杀给以赔偿，并力言东方国家有共同利益，应一致对付西方国家；^④对于法国和俄国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⑤各国作了一致的答复，它们质问使节们是否仍在人间，要求设法和他们立即通讯，并且建议中国军队对于援军的任务应予协助。

二十五 七月十四日据报北京外侨等 于七月八日被屠杀

七月十四日据上海报告，电报局总办盛宣怀已经接到袁世凯的电报——“七月八日由北京来的信差今日到达，据报义和团和董

① 七月十一日罗丰祿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一一三頁。

② 七月十一日伍廷芳致海約翰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二七七頁。

③ 七月二十三日伦敦电报，“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④ 七月二十日神戶电报，同上。

⑤ 七月二十三日伦敦电报，同上。致英国、俄国和日本呼吁书的譯文，見德和白克好司：“慈禧外紀”，第三三五以后各頁；致法国的呼吁书見于高第：“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卷三，第五二二頁。

福祥军队的炮队把使馆围墙打了一个缺口，随后即加以攻占。屠杀继之而来，无一人活命。中国损失极重。外洋军火耗尽。”^①从牛庄方面，这个消息被一位洋人的中国仆人独立地加以证实，这位仆人是从小北京逃来的，他报告说，英国使馆在七月十二日被摧毁，洋人被屠杀。^②盛宣怀立刻声明他并未接到那份据说他已经接到的电报；但是这个惊人的消息已经由电报传到世界各地了。没有一位报馆编辑或记者觉得接受这种否认是稳妥的。这个消息被一般人所相信；^③迎合人心的报纸发表了最悲惨和最可怕的详细经过，情节逼真，犹如亲眼所睹，因而全世界都在痛悼。三位著名的英国人——赫德爵士、赛纳乐爵士和莫理逊博士——以后每人在七月十七日的“泰晤士报”上读到两栏关于他们自己的訃闻，并在其他各国报纸上读到别国人士的訃闻，不禁欢慰。^④这个悲剧性的消息在伦敦被那样地深深相信，竟指定于七月二十三日在圣保罗(St. Paul)教堂举行一个庄严的追悼大会，但是在规定的日期以前，由于金登干的紧急劝告而延期了，金登干拒绝承认他的上司赫德的死讯的真实性。

① “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八日。

② 七月二十日芝罘电，同上，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③ “全欧洲都以同情的心理始终希望在北京的欧洲人或许可以避免全部屠杀。这种希望逐日消减，欧洲各国的内閣现在终于放弃了它，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可怕的事实，即中国政府已经用一种西方国家前所未有的暴行，在整个文明世界面前作出流血的挑战。”——“泰晤士报”社论，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七日。

“在七月十六日，我们确实认为端王和义和团得到了董福祥和他的野蛮甘军的帮助，已经达成了谋杀全部在北京的洋人的企图。我们从中国人士方面得到这个消息。……”——“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八月一日。

④ “国内的报纸满载我自己的訃告等等，看到人们提到我的学生时代的情景，多么有趣！我在一八八六年写给柏其乐(Batcheler)的一封信也被他刊布出来了——我问道：我真的写过这封信吗？那种惊险的围攻和我的住处被焚似乎已使我不复记忆过去，我现在是新生或重生了。”——赫德致杜德维函，一九〇〇年十月十一日。

二十六 变乱妨碍了海关工作

北京洋人被屠杀的报告以及一般人对于它的可靠性的信念，使局势达到空前紧张的地步，这种局势的影响之一，就是对于继续执行海关工作作了一些安排。甚至在这次屠杀的报告还未流传之前，就在种种方面感觉到不能和海关的首脑接触和不能向他请示而造成的不便；要发给经费以维持某几处海关或向银行提取官方存款，就无人行使职权；虽然关税必须继续征收以使用来支付到期的中国外债，但是外国当局却担心关税会用作北京政府的军费开支，所以他们已经准备在必要时把关税收入予以扣留，以防止作敌对性的使用。关于后一项，上海各国领事是特别担心的，他们深怕这个税收要被用来装备正在向北进军的李秉衡部队；^①而其他几种因素则已经推动了分裂的趋势。在广州，李鸿章已经把广东各关交给驻广州的税务司管辖，使他的辖境扩展到与粤海关道的辖境相等；那时负责汉口海关的一位官员被怀疑有建立一个同样的“政府之内的政府”的打算；在上海曾经发现了某些阴谋，要想派一位与海关工作毫无关系的人来担任全部海关的首脑。

二十七 泰勒派管理海关

从常规的观点来看，在赫德“暂时鞭长莫及”的期间，有三个人是可以委派的。资格最老的税务司是杜德维，他服务已有三十五年，从一八六八年就当税务司，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官员，极为他的同僚和中外官员所敬佩；但是他为在天津的重要职务所羁绊，并且由于他是一位美国人，他的委任将要违反那个应以英人为海关首脑的协定，何况现在正是一个不愿惹起国际猜疑的时候。主持最重

^① 参看本卷第十章第一节。

要的海關的是安格聯(Frank A. Aglen),他是英國人,但是是一位資歷淺的稅務司,他也必須放棄他的重要職責才行。第三位是泰勒(F. E. Taylor),英國人,一個中等年資的稅務司,並且是總稅務司公署的秘書,負責統計課,在上海辦公。在這三人當中,總稅務司公署秘書泰勒是合理的應選者,在七月十日有一位領事團里的領事來和他接洽,建議他應當擔任海關的暫時領導工作。在與安格聯磋商之後,他宣布準備擔負起這個責任;在七月十四日,根據領事團的倡議,駐南京的總督以南洋大臣的資格,給了他一份公文,訓令他暫時負責統管各關。各國已對這個位置的虛懸所可能引起的後果感到不安,而僑民被屠殺的報告正好在這個時候到達,這更增加了他們的憂慮;所以泰勒的任命被它們毫不遲疑地接受了①。

二十八 李鴻章在對外關係上的影響

揚子江流域各總督握住了在義和團活動範圍以外的帝國各地方的行政大權,而他們的友伴李鴻章親手控制着對外關係則顯然可見。在六月十日,赫德拍給他一份電報,跟着在十二日又給他一封信分析當時事態,並勸他以西太后的最老和最信任的顧問的資格去警告她:她的義和團派的謀臣們的勸告將會危及帝國和皇朝,並且對於外國使節必須認為神聖不可侵犯。② 在衝突發生時,李氏曾在六月二十一日宣稱他已奉召晉京;他並沒有去,但是却訓令中國駐各國的使節要按照各總督而不是北京統治者的意思向各國解釋說明。③ 在七月十三日,他接到九日的上諭,再任命他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④他在十六日離開廣州,充分地希冀將以進犯他

① 泰勒致赫德爵士函,一九〇〇年九月七日。

② 赫德:“來自中國”,第一八頁。

③ 參看本章第四節。

④ “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〇年,第一七二頁。

人的中国与被人迫害的各外国之间的调人的资格受到欢迎。他从各国外交部得到了满意的保证，各国并无领土的要求；^①但是在香港时，港督告诉他，他的地位是在广州；^②在上海，各国领事告诉他，倘若各使节还活着的话，他必须和他们交涉，倘若他们已经丧亡了的话，他就必须与各国政府交涉。^③李鸿章对于他在上海遇到的接待和由此而向他指出的与外国的关系显然使他大为愤懑；但是此时对于他的本国政府，他却给以有益的劝告。既有天津的陷落和因此而给排外的一派人的那种震惊，荣祿的重新提出异议和忠谏，以及李鸿章，或许是扬子江流域各总督，所坚决提出的劝告，我们对于七月十八日的“停火”便得到了一个充分的说明。

二十九 七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北京的 半停火状态和谈判

在北京，在那次围攻暂停之前，有一次亦庄亦谐的半停火状态，这是从天津陷落的那天，将李鸿章从广州调到直隶的上谕发出后五天，即十四日开始的。在那天，一个在中途被拦截住的使馆信差安然无恙地带回一件由“庆亲王等”具名的照会——这件照会与通常具有总理衙门头衔的公文格式相似，但是为了要隐瞒对公文内容真正负责者的姓名而有些变动。象这样的公文曾经接到了好几封，“是在我们漫长的战线上的一个地点递交的，而在其他各处还同样单调地继续着双方来福枪的射击。”^④第一封信天真可笑地对于使馆卫队不断的攻击，因而“在军民中造成惊慌和疑虑”一

① 七月十八日海约翰致伍廷芳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二七九页。

② 七月十八日香港电，“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③ 同上。

④ 威尔：“北京书简”，第一五六页。

层表示惊异和痛心，而对义和团的势力将使中国政府护送洋人到天津的意图不能实现一层表示忧懼。各国使节现在被要求偕同他們的眷屬和僚屬到总理衙門避難；“但是無論有任何原因都不能随帶任何一个武装的外国軍人，以免在軍民的心里产生疑慮和恐懼。”答复是限翌日午間送去的。^①这种“請君入甕”式的邀約^②沒有被接受；但是复函指出了使节們無論在何时何地都被認為是神圣不可侵犯，并且一切作战都是为了自卫。“庆亲王等”在对这点的答复中答应約束他們的士兵，并且宣称“中国政府将尽力照一般法律的規定維持秩序并实行保护。”^③

三十 七月十七日仁慈的上諭轉达各国

炮火在七月十八日以前停止了，^④轉达給各国的一道上諭，日期則为十七日。它把冲突的原因归于“人民与教会間长期互不相容，以后大沽炮台的陷落促使以武力对付武力”。中国政府曾經“拒絕中断关系”，并且“一再頒发保护使館的上諭，并令飭各省当局保护传教士。”现在又指示他們保护一切外人。对于杉山彬的遇害和德国公使的“死于非命”表示遺憾，凶手們必将逮捕法办。此外还发布几道命令，对人命和財產的損失予以賠償，并“調查各項糾紛，按照情由而采取惩办凶犯和恢复治安的措施”。又这道上諭应广为公布。^⑤

① 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一，第三四〇頁譯文；“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一七七以后各頁。

② “經那請启公致函，仿照总署照会体式，与伊等在該衙門定約会，但不得有洋兵护送，俾我軍途中易于攻打。”——“景善日記”，八月五日，第二九五頁。

③ 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一，第三四四頁。

④ 七月十七到十八日，“至夜只有五次枪声”。——同上，卷一，第三五二頁。

⑤ 七月十七日上諭，刘坤一于七月二十日用电报发出，由伍廷芳于七月二十三日轉交海約翰，“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二八〇頁。

三十一 中国駐外使节的努力；七月十七日

北京发出第一封电报

这道上諭是中国政府内的正人君子将邪恶小人所做的坏事加以修正而作出的努力的最高表现。在七月的上半月中，中国的駐外使节，特别是駐美的伍廷芳，曾經不断作出努力以減輕北京各国使館的长期沉寂对于西方国家所发生的影响。伍廷芳曾經不断地向美国政府和报界代表保証各使館一切无恙；除克林德男爵外，各国使节都活着；中国政府对他們正給予充分的保护，政府本身不过受到义和团叛徒們的威逼而已；西方列强不应把义和团的罪恶加在沒有敌意的中国政府身上；实际上他把南方各总督的一切善意和美意都归于北京朝廷。为了考驗他的态度是否正确，海約翰先生責成他发一封电报給康格并且要得到回电，而来往电报都要用美国国务院的密碼拍发。在这次半停火的中間，在七月十六日，康格从总理衙門那里得到了一封电报，譯出后，文为“通报消息由送电人带回。”在他請求解释时，据說，伍廷芳曾經来电云“美国政府有給中国以协助的意向，但是它首先要知道关于康格先生情况的消息。”这位公使于是在七月十七日发出以下的复电——“我們被围困在英国使館，經常受到中国軍隊枪炮的轟击已有一月之久；只有迅速援救才可以防止总屠杀。”^①这封电报当被拍发了，华盛顿于二十日收到，使千百万焦急地注意着各使节的安全的人們于心稍慰；但是对于那些如此被围着的使館人員、传教士以及他們的眷属和属从們的处境，却画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

^① 七月十六日康格致海約翰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一五六頁；七月十六日、十七日华盛顿的报告，法国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二一四頁；“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三十二 七月十八日到二十七日北京

停火期間的一些快事

过了一二天之后，停火便不全面了，但是在几乎已經到了最后关头^①的时候被围者获得了一个很需要的休息；当时也有某种交欢。七月二十日，总理衙門奉諭餽送蔬菜和西瓜。这次慷慨的餽贈頗受重視，中国駐外使节据此广为宣揚，他們的政府对于各使館正在供应食粮，而且給以有效的保护。^②前一种說法的可笑正如后一种說法的厚顏无耻，在国外广为宣传的那份食粮还不足被困的人們維持一天之用。中国的大臣們对于他們所尊重的行政官赫德爵士表示非常关心其起居。在七月二十一日，有一份公文查訊他的所在，另有一份公文征詢他对于刘坤一所作关于管理海关的安排有何意見；在二十五日他收到送給他的一份由安格联发出的問候电报；在不同日期直到八月十日为止，他收到另外四份公文，其中两份附有他的眷属和金登干的急切查詢其情况的电报。^③他和每一位外国使节，都盼望能够发出象曾經允許康格发出的那种密碼电报；但是中国大臣們的寬容程度不可再伸展了，所以使节們被通知說，因为“目前和平尙未恢复，貴使館等电报必須全部明碼，声明一切都好，而不涉及軍事。”^④这种要求使受电人失去測驗消息的真实性的仅有办法，各国使节对它是不能同意的。

① “那些似乎有权利来下判断的人們說，現在〔七月十四日〕法国人將不能把他們的使館守住两天以上了。”——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一，第三三九頁。

② “从一次探詢中〔一封电报和一封信〕，很明白地可以看出，各处都公布这个政府对于各国使館正在給以保护并供应食粮。我們經常害怕这类保証会造成我們的毁灭，幸而康格的电报打破了这个想法，并且各国政府已經注意到它們的代表处在危險之中。”——赫德：“来自中国”，第三八頁。

③ 赫德：“来自中国”，第三七頁。

④ 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五日庆亲王等致寶納乐爵士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一八三頁；“中国，第四号”，一九〇〇年，第四二頁。

三十三 責成中国政府負責各国使节的安全

揚子江流域各总督已經忠实地履行了他們之間的公約，現在李鴻章担起了解决中国对外关系的糾紛的工作。刘坤一和张之洞在天津失陷之后，在停火終了以及北京获得解救之后都坚定地宣布他們对西太后的忠誠和对义和团运动的反对，但是声明他們的中立地位是以保証对西太后本人的尊敬为条件的；^①至于李鴻章的政策也是以同样的条件为基础。可是，因为他的确实的目的还不十分清楚，所以美国駐上海的領事奉到訓令去要求一个明确的宣告，他报告說，“目的是企图劝告皇上把各使节送到天津；然后希望停止軍事行动，繼則进行談判；中国政府能够制止义和团和軍隊；倘若各使节被安全地护送到天津，請問軍事行动可否停止？担保各使节目前均安。”^②海約翰的答复并不迅速，但是所作决定如下：“本政府在未曾先与康格先生自由通訊之前，将不参与任何关于处理使館的安排。保护使館的責任由中国政府担負。要有在天津交人的权力，必先有保护他們和打开交通的权力。这点是坚持的。”^③

三十四 迫令負責的办法

所有各国曾一再坚持中国政府应对它們的使节的生命負責，但是問題是如何去迫令其实行这种責任。駐天津的各国領事团在同一天，六月二十九日，就在他們“把局势移交给軍事当局去应付”

① 七月十七日駐汉口領事傅孟斯(Fraser)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一九〇〇年八月一日、十八日駐上海領事霍伦致薩里貝利勛爵函；引自湯姆孙：“中国与列强”，第一九六頁。

② 七月二十四日古納致海約翰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二六〇頁。

③ 七月三十日海約翰致古納函，同上。

的那天，^①曾經一致同意向各國建議：“應照會中國政府，倘若侵害了外國使節們本人，外國軍隊將要毀壞當朝的陵寢”；那位軍事統帥對於這個決定曾予支持。^② 這項提議並未被嘉許，因為“對於叛兵或暴徒似乎不致有任何效力”；但是，照此方針，曾有建議，應由各國發出一份聯合宣言：“倘若對使館有任何暴行，所有北京官員，不管品級高低，應以人身和財產肩負其責任。”^③ 這項宣言曾經送交中國駐外各使節，^④但是許多暴行都繼續發生。

三十五 七月十九日重提護送各使往天津的建議

某些方面的人相信榮祿和慶親王曾經在北京發起過一次所謂“反革命”，^⑤不拘怎樣，想使各國使節不攜同衛隊就到總理衙門避難的七月十四日的初次建議，在十九日改變為護送他們到天津的一個舊案重提的建議；並且加上了一項警告說，設若各使“決意留住京城，倘遇不測之災”，中國政府因為已經“忠告於前，自不能承擔責任”^⑥。各國使節在復函中質問說，“若中國政府對於住在京城的各使不能妥實保護，何以自信在京城以外，赴天津途中有力量這樣做呢”；關於那項警告，復函聲明說，“各國使節既然是依靠中國朝廷的保護而來到北京，那末，後者對於他們的安全就不能推

① 一九〇〇年七月四日杜華德將軍(Dorward)致軍部函，“中國，第三號”，一九〇〇年，第九八頁。

②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卡爾斯領事致薩里貝利勳爵函，同上，第八五頁。

③ 七月二日薩里貝利勳爵致古夫勳爵 Gaugh 函，同上，第九〇頁；七月四日德賽加賽致法國駐外大使函，七月四日、五日剛本等人致德賽加賽函，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六八以後各頁。

④ 七月五日薩里貝利勳爵致霍倫領事函，“中國，第三號”，一九〇〇年，第九九頁。

⑤ 七月三日經盛宣懷宣布為事實；上海比國領事傳達；七月八日法國駐布魯塞爾使節轉交；七月九日德賽加賽通告法國駐外大使；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七五、七六頁。

⑥ 七月十九日慶親王等致贊納樂爵士函，“中國，第四號”，一九〇〇年，第四一頁；“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〇年，第一八一頁。

却責任。”^①事实上，各国使节認為那項建議的意思就是“必死无疑”，^②他們的意見与中国政府所取的仁慈态度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照，中国政府在七月三十日曾向各国保証說，“北京各使均安好。近来屡次供应彼等蔬菜、水果和食粮。关系极友善。目前关于保护各使赴天津暫避一层，商談在进行中，不久即可圓滿解决。”^③

三十六 八月四日李鴻章向各国提出同样建議

不久，李鴻章和揚子江流域各总督采取了这项建議。他們在八月四日把二日上諭的摘要用电报拍发出去，摘要說，“在我們的臣民最近因为教会的关系而造成的各次变乱的整个过程中”，对于各国使館已給了有效的保护；但是由于这种保护“或許不能確保绝对的安全，現正与各使节磋商，拟派軍隊护送彼等安全前往天津”；荣祿已奉令負責护送各使，各使的明碼电报可以拍发。^④这后一項的限制經八月五日的上諭予以取消，这道上諭准許拍发密碼电报；^⑤这就使得海約翰先生能够根据在七日收到的文为“帝国軍隊每天都向北京各国使节开火”的电报作出答复，并且“要求立即停止帝国軍隊的敌对性的攻击”；象各国使节所作的一样，他进一步地指出，“倘若中国政府不能保护在北京的我国使节，可以断定它

① 七月二十日寶納乐爵士致庆王等函，“中国，第四号”，一九〇〇年，第四二頁；“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一八一頁。

② 八月三日（八月七日收到）康格致海約翰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一五七頁。

③ 总理衙門于七月三十日由北京发出，八月二日由上海发出，伍廷芳于八月三日收到，八月四日递交，同上，第二八二頁。

④ 八月四日李鴻章、刘坤一和盛宣怀致中国駐圣彼得堡使节电，八月七日收到，八月八日轉达华盛顿（伍廷芳致海約翰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二八三頁），八月九日轉达巴黎（裕庚致德賽加賽函，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一二〇頁）。

⑤ 八月八日伍廷芳致海約翰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二八三頁。

就不能在由北京去海岸的路上保护他”；所以他复行强调中国与增援部队的合作。^①在转达八月二日的上谕给法国外交部长时，中国公使奉令质问，“倘若由于各国使节的迟疑拖延而产生意外事件，则谁将负责？”并且促请那位部长训令他的公使迅予接受那项建议。^②德赛加赛的答复是斩钉截铁的——“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将负其责；它的明确的责任就是要保护外国使节，就象保护它自己一样，甚至还要周到些”；它应当而且能够打开从天津到北京的通路，从而完成保护的工作，这是它的本份。^③英国政府也抱着同样的意见。^④日本政府建议在救援部队可以不遭反抗地把北京外侨带出的条件下停止战斗；^⑤但是这时救援工作已经在不顾反抗和使用武力的情形下予以实行了。

三十七 七月二十九日使馆复行受攻

关于撤退到天津的问题在北京举行的谈判从七月十九日起一直继续到八月六日。^⑥这时有一段期间，直到七月二十八日为止，平静的间歇不断地夹杂着零星的枪声；但是“在二十六、二十七和二十八三天中已经有了停火近于终止的恶兆”；并且“在二十九日就重新发生了敌对行为。”^⑦在那天，李秉衡——他是前几天抵达

① 八月八日海约翰致伍廷芳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二八四页。

② 八月九日裕庚致德赛加赛函，如前注。

③ 八月十日德赛加赛致裕庚函，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一二一页。

④ 八月十五日蒙森爵士致德赛加赛函，同上，第一二六页。

⑤ 八月十六日德赛加赛致法国驻外大使函，同上，第一二九页。

⑥ 七月十九日、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三十一日，八月一日、三日、四日、六日，庆亲王等关于洋人撤至天津问题的函件；“中国，第四号”，一九〇〇年，第四一以后各页；“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一八一以后各页；毕盛报告，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二一六以后各页。

⑦ 九月二十日赛纳乐爵士致萨里贝利勋爵函，“中国，第四号”，一九〇〇年，第三三页。

的——被西太后召見；^① 从那天——頒发八月二日上諭的四天前，頒发八月七日指派李鴻章开始談判的上諭的九天前——一起，在李鴻章以及“庆亲王等”举行他們的談判的过程中，各国使館复行遭到枪炮的猛烈轟击，在里面的人重新受到围攻中的一切困苦和危險。

^① 九月二十日賽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中国，第四号”，一九〇〇年，第三三頁。

第十章 北京各使館获得解救

- 一 一九〇〇年六月李秉衡奉召入京 278
- 二 七月二十八日支持进攻派，打击亲外派 279
- 三 七月中北京消息缺乏 280
- 四 各国使館人員盼望营救 281
- 五 早日从天津发动被認為不可能 281
- 六 促請日本出动；欧洲各国表示迟疑 282
- 七 日本同意在英国保証下采取行动 284
- 八 美、英政府促請前进 284
- 九 八月四日联軍从天津出发 285
- 十 由于联軍出动，华人在其他各地攻击外人 286
- 十一 八月一日到三日在北京与各国使节的談判 287
- 十二 八月五日到十二日从北仓向通州进军 288
- 十三 七月二十四日到八月十六日李鴻章举行的談判 289
- 十四 八月十二日到十七日英軍在上海登陆 290
- 十五 八月四日到十三日与駐北京各国使节談判 291
- 十六 八月十二日到十三日联軍各司令官在通州的計劃 292
- 十七 俄軍的独立行动；八月十四日美軍因而前进 293
- 十八 八月十四日英軍首先进入使館 294
- 十九 被围各使館获救 295
- 二十 外侨与教民創巨痛深 296
- 二十一 外国防守部队的伤亡人数 297
- 二十二 八月十五日美軍停止攻打紫禁城 298
- 二十三 北堂的英勇防守；八月十六日获救 300
- 二十四 朝廷自北京出走 300
- 二十五 中国政府迁到西安 301
- 二十六 北京受到的懲罰 302
- 二十七 联軍占領北京，頒布戒严令 304

二十八	八月二十八日武装队伍穿过皇宫	304
二十九	帝国屈辱已极	305

一 一九〇〇年六月李秉衡奉召入京

李秉衡在一八九七年任山东巡撫，在他的轄区之内发生了德国传教士遇害的案件，因而构成占领胶州地区的借口；作为解决这个案件的部分办法，他被免职并永不录用。^① 尽管有这样的貶黜，他却在一八九九年奉派为欽差大臣前往滿洲調查財政；^② 象滿人刚毅在华中和华南对付汉人官吏那样，汉人李秉衡則到本朝的老家去对付滿人官吏。快到一八九九年年底的时候，他奉派为欽差大臣，統率揚子江的水师，他身居此职时就和两位总督发生了摩擦，因为他和他們在总的政策方面意見相左。早在一九〇〇年六月，即除义和团外还未发生任何公然的行动以前，他就奉命“火速北上”；^③ 据报在他到达的时候，他将奉派为直隶总督。^④ 他曾試圖謝却这次頒賜的荣典，当即称病——这是准許汉人官員应用的唯一托辞；但是他的請求所得到的批复是“急令立即前来。”^⑤ 他奉到命令，至迟在六月十日，而在那天端王奉派为总理衙門大臣，这是据以攻击北京当权人物的一个重要事項。他在七月一日离开揚州，但是又返回那里，因为在清江浦約有一二、〇〇〇名湖南籍士兵拒絕随他出发，或者說，除了他們的同乡刘坤一的命令外拒絕服从任何命令。^⑥ 他取得了另外的部队，率領北上，在途中，在直隶省的河間府屠杀了一千多名中国教徒，这个行动引起了揚子江

① 参看第五章第六、七、九节。

② 参看第七章第十六节。

③ “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三日。

④ 同上，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日。

⑤ 同上，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⑥ 七月七日鎮江通訊，同上，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一日。参看第九章第二十六节。

流域以及南方各总督呈上反对的奏章。^① 在这同一府中的天主教盛行的猷县，有三〇、〇〇〇名教徒掘壕自卫，其中有一二、〇〇〇人是有武装的；他们有足够的食粮和军火，因而得以防守了两个月以上。^②

二 七月二十八日支持进攻派，打击亲外派

李秉衡在七月二十二日第一次陛见西太后；他痛恨以前的罢官免职，便投到端王、刚毅和董福祥这一边来，而且得到了西太后的信任。^③ 他立刻就打击主和派。在七月二十三日，同外国使节的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袁昶和许景澄“呈递了第三次反对义和团的奏折，在奏折中劝将几位军机大臣处死”；景善在日记中写道，“他们的勇气比他们的慎重更值得佩服，特别是因为昨天召见李秉衡的结果老佛爷又相信了义和团。”^④ 当西太后在这种心情之下的时候，他们擅改那道驱逐洋人的上谕的事被提出来了，这两人便在七月二十八日被处斩。^⑤ 朝廷又令飭一八九八年流放新疆的张蔭桓^⑥自尽，违则斩首。^⑦ 这些惩处不仅是对北京的主和分子的当头一棒，而且对于那些正在南方进行协议和交涉条件的总督们也是一种严重的威胁。

① “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八月八日。

② 同上，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

③ “老佛爷对李秉衡极为信任”——濮兰德和白克好司：“慈禧外纪”，“景善日记”，七月二十八日，第二九三页。

④ 同上，七月二十三日，第二九二页。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二十三日之间的三道奏折的译文，“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件第七五及以后各页。

⑤ “予殊为袁公惜……袁以中清亮达，学识闳通，实受无妄之灾，至于许公则早知其不廉之癖，罄金私室，官囊裕如。”——“景善日记”，七月二十八日，第二九四页。

命令将他们处死的上谕直到七月二十九日才由京报刊出。

⑥ 参看第六章第二十二节。

⑦ “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

三 七月中北京消息缺乏

与此同时，李秉衡奉派与荣祿共同統率汉人军队；^①那位不愿指揮敌对行动的統帅的权势太大了，是无法动摇他的，但是现在有了一位更愿意积极行动的同僚，他的势力被抵消了。从到达北京的那天起，甚至还在停火期中，李秉衡就开始推动朝廷重新发动敌对行动，^②并且在一个星期之内，在七月二十九日那天，就重新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从七月二十日收到的康格先生于七月十七日发出的电报中得知外侨尚繼續生存并处于极端危险中的那些显著的事实；但是整个惊恐的世界对于詳細情况，从八月二日“泰晤士报”所发表的由它的通訊記者莫理逊博士在七月二十一日拍来的电报中才首次知悉。信件寄递有极大的困难，很少达到天津，并且这些少数信件在路上耽擱了很久；对于拍发密碼电报，到八月五日才迟迟允准，有几封簡短的呼吁电报拍出，可是这时因为莫理逊博士在七月二十一日拍出的电报已經充分地使各国明了情况，所以那几封电报不免多余。在七月中，消息缺乏而且需要；但是从六月二十九日在天津得到赫德爵士六月二十四日的信（信里說“被围在英国使館。情况危急。請速設法。”）到七月二十五日得到康格先生七月二十一日的信（信里說“我們有数周的食粮，但是軍火无几。倘若他們象以往那样繼續轟击我們，我們就不能支持多久了。希望速来援救。”）这个时期中，从北京得不到什么可靠消息。在天津收到后，每个信息在能达到可以拍发电报的上海之前，还須再加上二至三天。^③

① “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八月八日。

② “今晨往謁瀾公府，适值端王及李秉衡在座。彼等正忙于策划重新攻打使館。李力主自翰林院掘地道前往攻打。”——“景善日記”，七月二十三日，第二九三頁。

③ 例如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五日的“北华捷报”載有一封电报，日期是“七月十七日由天津发，七月二十日由芝罘轉”；一封“于七月十七日由芝罘发”的电报报告七月十四日天津被占。在中国官方，电訊是比較迅速的。

四 各国使館人員盼望营救

在七月間各国从赫德爵士方面得知北京外侨公众被围，情况危殆，迅速营救乃首要之图；在七月二十日，它們从康格先生方面得知外侨仍在枪炮繼續轟击之下；从十四日到二十日，他們相信外侨全体已被屠杀。誠然，迅速营救是首要之图。被围者盼望西摩尔的軍队来救他們；自六月二十日以后，日复一日，他們更殷切而具有信心地在盼望着。^① 他們对于天津租界所遭遇的可怕的困难毫无所知，但却料想那里正在集結大批的軍队，而且这些軍队将很快地扫除那些无紀律的中国軍队而不久即給他們带来安全。过度着急的耳朵一再听到远处的枪声，那只能来自一个救援部队——甚至在天津被占領以前就这样；被围的人們一再以一种希望来互相保証：虽然还未听到援軍到来，但援軍不久即将来到；希望甚至一再变成泡影；最后当援軍确实来到的时候，被围的人們只是在几小时之前才知道它已在附近了。

五 早日从天津发动被認為不可能

在六月底，在大沽和天津之間的外国軍队共有一四、〇〇〇名，其中六、〇〇〇名是俄国兵，四、〇〇〇名是日本兵；全軍中有九、二二三名在天津。^② 当天津在七月十四日陷落的时候，那里的外国軍队約有一二、〇〇〇人；在七月底增加到約有一七、〇〇〇人，計日本兵八、〇〇〇人，俄国兵四、〇〇〇人，英国兵二、〇〇〇人，美国兵一、七〇〇人，其余的属于其他四国，主要是法国

^① “砲轟于七月十六日停止；目下平靜；希望这是援軍击败中国軍队后已近此地的朕兆。”——七月二十日柯尔特門(Dr. Coltman)拍发的电报，七月三十一日到达上海，“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八月八日。

^② 六月三十日卜魯斯海軍上将致海軍部函，一九〇〇年七月二日西摩尔海軍上将致海軍部函，“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八六、九九頁。

兵。^① 营救北京的问题沉重地挂在各军司令们的心头；有些人主张不管现有军队多少，要不顾一切艰险地干一下；另一些人则害怕在烈日之下行军不便，在野外供给军队伙食有困难，饮水有毒，运输不易，尤其是害怕一旦挫败，将危及在华北的所有外人的生命和财产。甚至主张急进的人也提出要求，认为除了从大沽到北京需有必要的卫队以外，应有二五、〇〇〇名野战部队，那些比较谨慎的人仅在野战部队方面所提出的要求，从此数到八〇、〇〇〇人不等。^② 一致的意見是，在九月以前，必要的部队无从集结，而且装备和运输也筹办不了；认为最早可能出发的日期是九月十五日。

六 促請日本出動；歐洲各國表示遲疑

英国正在南非作战，只能遣派印度军队；法国現時只能遣派安南兵否則就要耽擱好久才能有兵开来；德国在国内动员了七、〇〇〇人，但是暫時只能抽出少数海軍員兵；有几千名美国兵从菲律宾派出；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則无军队可派。俄国可以由滿洲南下，派几千人到直隶，但是他們的人数显然有限。只有日本能够派出成千

① 七月二十六日天津电报，“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八月八日。

② 在七月初，統率俄国部队的阿烈克謝也夫 (Alexeieff) 海軍上將估計除了二〇、〇〇〇人警卫交通綫和把守所占領的据点外，需要有“二〇、〇〇〇到三〇、〇〇〇人”的野战部队。——七月四日蒙特貝洛侯爵从圣彼得堡致德賽加賽函，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六七頁。

但是海軍上將會議却通知美国海軍上將說，除掉所必需的警卫人員外，野战部队必須“至少有六〇、〇〇〇人”。——七月七日庫里如海軍上將从大沽致德·兰桑函，同上，第七四頁；七月八日恩布夫海軍上將的报告，引自达格特：“在华解围远征記”，第四三頁。

日本政府認為野战部队应有七〇、〇〇〇人——七月四日怀特海 (Whitehead) 从东京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九七頁。

在七月底杜华德將軍 (英国人) 把所需要的野战部队定为二五、〇〇〇人 (薩威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卷一，第三二五頁)；但是俄国和日本的司令官則坚持要有更多的人数，他們有一个人要求人数为八〇、〇〇〇人。参看八月三日德賽加賽致保罗·刚本函，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一一一頁。

成万的军队，并且能很快地派出，列强是迟早要指望它的。于是英国政府立刻向它呼吁，并且在六月二十二日问它能否再派军队——“立刻行动的迫切需要以及日本在地理上的有利形势都使它的意向在这种困难时期成为极端重要之事。”^①日本政府在五年前曾与欧洲的三个联盟国家发生过冲突，而仅在两年以前还很关心地注意到那个联盟仍然团结一致，因而它害怕陷入一种困难处境之中；这时外相声明说，日本“渴望它的决定与[其他]各有关国家一致”；在第二次会见时，他说，“自然日本有军队可以派遣，但是派遣的后果如何不能预见”；然而在三天之后，日本预料必须作最后决定，因此动员了一个师。^②萨里贝利勋爵于是问俄、德、法三国政府是否赞同此举。^③法国外交部长在六月二十七日“并未就本人意见作任何表示”；^④但是在七月四日他认为“重要的是，当地的行动和指挥的统一，不应由于任何事后的反悔或猜忌而遭受阻碍”，他并且“希望日本政府将立刻派遣那个可用的已经动员的师。”^⑤德国在六月二十八日对于日本的干涉“是否将影响第三国的利益，尚不能判断”，“德国能否负起责任以支持这种干涉也难判断。”^⑥其后克林德男爵遇害的消息收到了，所以在七月二日德皇发表了一篇战争演说^⑦并下令动员一个有七、〇〇〇名兵额的旅；并且德国政府向俄国政府宣布了它的政策，据称是与俄国的政策相同的。^⑧俄国外交大臣在六月二十八日宣布说，“我们无意阻止日

① 六月二十二日萨里贝利勋爵致怀特海函，“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六九页。

② 六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怀特海致萨里贝利勋爵函，同上，第七二、七六页。

③ 六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萨里贝利勋爵致各大使函，同上，第七五页。

④ 六月二十七日蒙森爵士(E. Monson)致萨里贝利勋爵函，同上，第八〇页。

⑤ 七月四日同上函，同上，第九六页。

⑥ 七月一日古夫勋爵致萨里贝利勋爵函，同上，第二六、九一页。

⑦ 参看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

⑧ 七月三日斯各脱爵士(Scott)致萨里贝利勋爵函，“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九二页。

本的行动自由”，但是未作更进一步的說辞。^① 在七月三日，他不得不宣告說，虽然“在这样一个严重的危机面前，把一种委任加在任何一个国家身上是有些反对意見的”，但是他仍“愿欢迎一个二万人或三万人的日本或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来为共同的目的进行合作”；他并且說，有一〇、〇〇〇名俄国军队已經登了陆。^②

七 日本同意在英国保証下采取行动

薩里貝利勛爵对于这点不能不認為滿意，所以他拍出电报，指出情况的极端严重性并竭力陈說，“日本是能迅速增援天津的唯一的国家，任何欧洲国家对于这个办法都沒提出反对。”^③ 日本政府“認為华北的变乱比其他国家看来似乎更为根深蒂固而关系更为重大”，它希望“获得保証，日本将得到保障，避免以后发生糾紛，并且它的費用得到賠償。”^④ 沒有等到答复，日本就毫不迟延地把它在天津的兵力增到二〇、〇〇〇人。^⑤ 英国政府承担了所要求的財政負担，“因为对于这点的国际談判要耗費很多時間，足以誤事”；但是单独地首先提出保証是会增加糾紛的，所以薩里貝利勳爵“希望在可以及时营救使館的那些应立刻采取的行动与将来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之間，划出一条清楚的界綫。”^⑥

八 美、英政府促請前进

許多时光——二周之久——已經丧失了，因为沒有日本的增

① 七月二十八日斯各脫爵士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中国，第三号”，一九〇〇年，第八一、九四頁。

② 同上函，七月三日、四日，同上，第九二、九六頁。

③ 七月四日薩里貝利勳爵致怀特海函，同上，第九八頁。

④ 七月五日怀特海致薩里貝利勳爵函，同上，第一〇〇頁。

⑤ 七月六日同上函，同上，第一〇二頁。

⑥ 七月六日薩里貝利勳爵致怀特海函，同上，第一〇二頁。

援，前进是不可能的。日本的援軍有些在七月底开到，英、美的援軍也到了一些，于是对于前进之举就加以考虑。意見仍然分歧，但是現在比較更趋向于冒险。如前所說，薩里貝利勛爵曾經坚决主张前进，他的急切心情得到了在天津的英国司令們的响应。不管美国政府以前是怎樣的謹慎，在七月二十日接到康格的电报后便改变了态度——“这份公文……呈报了一种情况，它明显地提出救兵出发的急迫性而不是要等到准备完成；它成为催促立即向北京进軍的根据，不要等待以往所建議的要集結一支大軍。”^①具有这种意义的几道訓令被送給沙飞將軍 (General Chaffee)，沙飞將軍是在七月三十日到达天津的。他报告說，他不相信不战就可以把各国使节救出来，当时联軍中可用的作战軍隊不超过一四、〇〇〇人；^②但是他的到达并奉令前进，支持了英国司令官們的前进的愿望并且克服了俄国和日本將軍們的迟疑态度，俄国和日本的將軍們指揮着三分之二的可用的軍隊，自然占着极大的势力。^③

九 八月四日联軍从天津出发

七月二十七日举行了第一次會議，那时沙飞將軍尚未到达，由美国高級軍官达格特上校代他出席。那次會議决定应作好前进的准备工作；但是日期再作商談。在八月一日举行了第二次會議，八月三日举行第三次會議，就决定了在四日出发；但是“因为沒有一个軍官，不管他是什么等級，能够对任何其他国家的軍隊的軍官下令，乃决定每天黄昏或有必要时应举行一次各司令官的會

① 美国陸軍部部长陆特 (Elihu Root) 的报告，一九〇〇年，第一八頁。然而康格的电报并不普遍地認為可靠。在七月二十八日，“紐約世界报”(N. Y. World) 的華盛頓通訊員向該报发电报道，“現在知道了这个康格文件是假造的。中国人知道密碼，捏造了复电。”

② 一九〇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沙飞將軍致副官函，前引报告。

③ 达格特：“在华解圍远征記”，第五八頁。

議，以便决定第二天或以后几天的行动，并决定由多数表决。”^① 联军在八月四日下午三时开出天津，步行四英里后扎营，行军是沿河前进的，俄、法军队担任右翼，在河左岸（东岸）作战，日、英、美军队担任左翼，在河右岸（西岸）作战。野战军的兵力是：

日軍（山口素臣元帅）8,000人
俄軍（李涅維奇將軍）4,800人
英軍（盖斯里將軍）3,000人
美軍（沙飞將軍）2,100人
法軍（福里將軍）800人
奧軍58人
意軍53人

这些是由各国司令官报告的数字，总计一八、八〇〇人；^② 但是“这些数字太大了；可用之兵大概不超过一六、〇〇〇人。”^③ 美军出发时确实有二、五〇〇人。^④ 在英军中，只有炮兵和四营步兵是英籍兵，其余是印度兵。在法军中，大部分是安南兵。意、奥军的参加是为了代表他们的国家。德军的缺席，甚至连一个与意奥军类似的“象征性”的军队都没有，引起很多的评论；^⑤ 法军司令官报告说，“一个为数很少的德、奥、意部队参加联军合作攻取北京”；^⑥ 但是实际上并无德军参加。

十 由于联军出动，华人在其他各地攻击外人

立即进军的决定产生了几种结果。从变乱开始以后，俄人就

① 达格特：“在华解围远征记”，第五五页。

② 一九〇〇年九月一日沙飞将军致副官函，陆军部部长的报告，一九〇〇年，第六三页。

③ 达格特，前书，第五七页。

④ 前引陆军部部长的报告，一九〇〇年，第一九页。

⑤ 汤姆孙：“中国与列强”，第八六页。

⑥ 八月九日福里将军致兰桑函，外交文件，第一一七页

把持着滿洲，在六月底就能在滿洲中部庇护着传教士；^①在七月十四日海兰泡惨杀案发生后，俄人举动更加明显。在七月底，他們和中国軍隊在大石桥（通牛庄的鐵路接軌处）附近发生冲突；在东边的中国軍隊被打退了，但是“在北方盖平县附近”有五、〇〇〇俄兵被一五、〇〇〇中国兵包围，情况危急。^②在联軍作出决定之后，中国軍隊在八月四日向俄軍防守的葦口（牛庄）攻击，“鏖战一昼夜才被逐退”；两艘日本炮艇的水兵曾經登岸协助防守；俄国国旗于是在海关、旧城和炮台上悬挂起来。^③在其它只会碰到手无寸鉄的传教士們的地方，对于战争号召的响应也是迅速的。在长江沿岸的大通曾經发生了騷动；在汕头附近有七个英、美教堂被毀，其中六个是在八月五日到十二日期間被毀的。^④在四川，据报总督曾經奉到一个新的勦灭一切洋人的命令，但是他只是命令他們为自己的安全而离去。除了法国領事厯当悌（Bons d'Anty）和三个非官职的英国人以外，所有就近的侨民、传教士、海关和領館職員，共約一百人都离开了重庆；其后这位总督又极盼望他們回来，并保証他們的安全。^⑤

十一 八月一日到三日在北京与各国使节的談判

第二个結果是被围的各国使館从不断的枪炮轟击中得到另一次的短时间的休息。在七月的最后几天以及八月一日那天，从“庆亲王等”那里一再送来函件，催促各使启程去天津，甚至有一封信

① 参看第九章第十八节。

② 八月三日致日本东京报纸的牛庄电，引自“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

③ 八月九日芝罘电，同上。参看第十一章第三十八节。

④ 八月十三日香港电，同上；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九日欧思特領事（Hurst）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中國，第五号”，一九〇〇年，第九頁。

⑤ 八月五日宜昌通訊；八月七日、十二日重庆电；“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

竟允許對於那些必須留下來的中國教民加以保護；在所有這個時期中，直到八月三日的早晨為止晝夜“槍聲不斷”，白天里間或還有炮聲。在八月二日，總理衙門送來幾封在途中被截取到的信，信上寫了許多令人迷惑的消息，但是却也傳達了一個無疑的事實——在寫信的時節，援救部隊還沒動身。八月三日，“晝夜安靜；大概是中國人希望引起我們的信任，讓我們好決定去天津。”一封來自“慶親王等”的信堅持各使節離京，並且聲明已經派榮祿安排此事。八月四日黃昏時，狙擊又開始。^①對於三日停火的一種更覺可能的解釋是，從北京火綫上撤出軍隊以抵抗援軍的前進。在這些軍隊中有董福祥的甘軍，李秉衡奉派全權指揮各野戰軍。^②

十二 八月五日到十二日從北倉向通州進軍

聯軍的野戰部隊在八月五日用了各種各樣的運輸工具離開了扎營地點。在河的右岸的日軍先頭部隊在上午一點鐘出發，在上午四點鐘向北倉前綫的中國防地進攻，不久就加以強占。整個的左翼於是向北倉攻擊，在進行了一些頑強的戰鬥之後，在午間把它佔領了；在河的左岸的右翼（俄軍和法軍）被困難的地勢所阻，在最後的一次攻擊中只能起威脅中國防地的作用。中國軍隊在相當混亂中逃跑；據報它們的統帥李秉衡已經受傷。在第二天，八月六日，繼續進軍，英軍、美軍和一部分日軍渡河到左岸，整個的右翼沿鐵路前進；在下午二點三十分，中國軍隊在楊村被擊潰，這場戰爭是由美軍和英軍首當其衝。總督裕祿於戰敗後在蔡村自

① 畢盛，報告，七月二十八日到八月四日，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二一九及以後各頁。這陣射擊乃是對於“斷斷續續，火力不猛的一陣排槍”所作的一番表演。

② “鑒帥前赴通縣，以期背城借一與洋人決死戰，並以榮相媚外之實據，奏請老佛爺懲治，其折留中不發。”——“景善日記”，八月三日，第二九五頁。

杀。① 在八月七日，联軍在楊村休息，并举行一次各将領會議，决定繼續向通州进军，并将在那里举行第二次會議。在八日，联軍渡河到右岸前进；日軍人数最多，装备最足，在前带头，俄軍、英軍和美軍順序随后。日軍在上午四点钟出发，整个的軍队編成一个縱队，以致美軍直到上午七点钟才动身；但是在黄昏时刻全体都已在蔡村集中；九日在河西务；十日在碼頭；十一日在张家湾；十二日在通州，除了曝日和风沙外，只有在张家湾和通州之間遇到敌人，阻挡前进，通州是在十二日上午四点三十分占領的。②

十三 七月二十四日到八月十六日李鴻章举行的談判

在这个阶段，李鴻章恢复了他的活动。他已經在上海布置了些試探工作。在那里，七月二十四日，他就着手于取締“义和团和叛軍”，并护送各国使节平安去津之事，但是他很明白地拒絕對其他洋人、“妇孺、牧师、教师、海关人員和卫队”負任何責任；对于那三千名受使館卫队保护的中國教民双方都未提及。③ 由于得到通知，如各国不能与各使节自由通訊，則交涉为不可能，他便在七月三十一日詢問說，“如各使节与各国之間确能自由通訊，美国能否設法使联軍在談判期間不向北京进军？”——那时已經恢复向各国使館开火。他在收到的复信中被通知說：将他的建議提交其他国家并不認為适宜；他得到了这样的通知，便着重在北京繼續談判护送各

① “賊勢日张，师久无功；七月十二日，裕帅在北仓兵敗，退扎楊村，又退至蔡村，恐不欲生，入棺材鋪，用手枪自尽，真系不吉之兆也。”——“景善日記”，八月十二日，第二九七頁。

② 九月一日沙飞將軍致副官函，陸軍部部长的报告，一九〇〇年，第六三頁；达格特：“在华解围远征記”，第五八頁；薩威奇-兰德尔：“中国与联軍”，卷一，第三三九以后各頁；“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二日。

③ 八月二日古納領事致国务院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二六二頁。

使前往天津事宜。^① 八月五日，从康格先生处收到七月二十一日的信，信里說“粮食足，軍火少，望速救”；^② 八日，盛宣怀通知各領事說，“各督日待降詔將彼等黜职并令自戕。”^③ 联軍是在八月四日开始进軍的，六日，中国軍隊便在楊村遭到决定性的挫敗，总督裕祿自杀。八月七日上諭派李鴻章为全权大臣用电报与各国进行談判，^④ 但是各国使节警告各国，如援軍前进受阻，势将造成总屠杀。^⑤ 当联軍在八月十二日到达通州时，李鴻章曾努力想使它們停在那里，他向各国指出：联軍进入北京将使本朝蒙受大难；但是他被通知說，在各使館人員得到足够的外国軍隊护送他們到天津以前，談判不拟进行。^⑥ 联軍已經在这次交換意見的两天前进入北京了。

十四 八月十二日到十七日英軍在上海登陸

自然，在整个的帝国中有很多的騷动。在天津周围以及在天津与大沽之間，在联軍出发后，发现了很多乱兵和义和团的移动，估計在一五、〇〇〇到二五、〇〇〇人之間，但是他們并未接战。^⑦ 在上海及长江各地，惊恐頗多，英国当局从香港派来三千名印度兵；据称总督和地方官均获通知，并未表示反对，^⑧ 但是事实上他們曾向美国政府送了一份抗議書以表示反对，并且以他們对于这

① 八月二日古納領事致国务院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二六二頁。

② 八月五日同上函，同上，第二六四頁。

③ 同上函，八月八日，同上，第二六五頁。

④ “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八月七日总理衙門致康格函，八月十二日伍廷芳致国务院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一八七、二八五頁；八月九日毕盛致德賽加賽函，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一一九頁；八月八日总理衙門致賽納乐爵士函，“中国，第四号”，一九〇〇年，第五一頁。

⑤ 毕盛，同上。

⑥ 八月九日保羅·刚本致德賽加賽函，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一三〇頁。

⑦ 八月九日芝罘电报，“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

⑧ 八月八日白藻泰領事致德賽加賽函，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一一五頁。

个口岸已經給了有效的保护为理由拒絕批准印兵登陆。^① 美国政府对于这个抗議答复說，“如果我們認為有必要派兵登陆以保护上海的我国公民，我們就应当这样作，就象我們已經在大沽作过的一样；我們对于任何其他国家这样作的权利是不能提出質問的。”美国的忍耐被那位中国公使的历次声明消耗殆尽，因为这些声明与現在已經知悉的显明事实太不相符了，此外，他又被通知說，如果要把这次抗議認為是“請我們出面調停的呼吁”以拘束其他国家，“在中国政府还未履行七月二十三日总統信中的要求之前，我們在这方面是不能采取任何步驟的。”^② 这就削弱了各总督的地位，当各領事重新提出他們的建議时，^③ 他們讓步了。印度軍隊自八月十二日起便停留在吳淞口外，十七日在上海登陆。^④ 其他各国对于这种保护表示欢迎，但是却不愿意把保卫上海和长江的責任讓給任何单独的一个国家，甚至是英国；^⑤ 十八日有一〇〇名法国水兵登陆，并且在第二个星期有二五〇名安南兵登陆。^⑥ 以后所有各关系国家的部队也尽快地相繼登陆。

十五 八月四日到十三日与駐北京各国使节談判

当各国使节一知道援軍已經出发，他們覺得“奇怪的是[在北京]並沒有进行談判以阻止它的前进；北京城的被占和朝廷的被迫出走似乎是值得尽任何努力来避免的。”^⑦ 事实上在北京以外是作

① 八月十日李鴻章、刘坤一、张之洞和盛宣怀致伍廷芳电，八月十一日发出，“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二八四頁。

② 八月十一日国务院致伍廷芳函，同上，第二八五頁。參看第九章第二十四节。

③ 八月十五日白藻泰領事致德賚加賽函，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一二七頁。

④ “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二日。

⑤ 八月十六日德賚加賽致白藻泰函，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一二八頁。

⑥ 八月十七日白藻泰致德賚加賽函，同上，第一三〇頁；“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二日。

⑦ 九月二十日賽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中国，第四号”，一九〇〇年，第三六頁。

过这种企图的，虽然作得晚了，没有被各国使节注意到。在进军期中，各国使节在三方面与中国人发生接触——在不同的激烈程度上，他们不断地被中国军队射击；与“庆亲王等”书信来往不断；他们继续从总理衙门收到合式的公函。^①这两种信函都催促至迟在八月四日，即恢复经常射击的一天撤往天津；供给使馆食粮以维持在那里的中国人的问题一直讨论到八月十二日。在那日，就是援军进入通州的日子，“庆亲王等”来函建议“初步停止敌对行为”，要求在英国使馆举行会谈；但是在指定的时间——十三日上午十一时之前，在另一封信中指责了各国使节的不可和解的敌对行为，其所根据的事实是在前一天的夜里有二十七名中国兵士被使馆卫队开枪打死或打伤，并且“各王公大臣都有要公在身，不能前往使馆”。在那同一天中的一封较晚的信里附送了六封拍给四个使馆的电报；第三封信把供应使馆食粮问题延期二、三天，“等到双方前哨都停战的时候再讨论。”在八月十日，通州被占的两天前，中国政府中的主战派占了上风，他们把洋人的三位朋友，立山、联元和徐用仪处斩；^②八月十二日的提议是表示主和派恢复了希望，还是政府表示一种妥协态度的策略，是不得而知的；但是不久它就变为乌有了，在八月十三日到十四日的夜里就发生了各使馆所经验到的一次最猛烈而且最顽强的攻击。

十六 八月十二日到十三日联军各 司令官在通州的计划

当联军从天津出发的时候，俄、日两军的司令官发表了一份解

^① 欲阅两种形式的全部通讯，可参看“中国，第四号”，一九〇〇年，第三七及以后各页；“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一七七及以后各页。

^② 老佛爷听到有两位满洲贵族未经她的同意而被斩首，不禁大怒，尤其是立山是荣禄的老友；汉人徐用仪年已八十，在就刑时说，“将来必有一死厥渠魁〔指端王〕之一日”——“景善日记”，八月十日，第二九六页。

釋他們改變意見的聲明說，他們從諜報人員获悉，在他們與北京之間的中国軍隊奉令對於聯軍的前進只表示一下抵抗而不作有效的抵抗，打算在通州佯作防禦戰后就提議和平。^①顯然，在通州被占時，或在被占以後，一定要發生一些事情的。八月十二日，在占領了那個城市後，日軍又向北京推進了六英里半（到北京的中途）。在各司令官的一次會議上決定第二天，即十三日，致力於偵察；日軍和俄軍在運河右岸——即北岸——進行偵察，俄軍沿着運河及鋪石塊的路進行，日軍向更右方進行；美軍和英軍在運河左岸——即南岸——進行偵察，美軍沿着運河進行，英軍向更左方進行。十四日，所有各軍隊都要在日軍守着的前線上集中，並舉行一次會議以決定攻擊北京所應採取的方法。十三日，美軍和英軍按時完成了偵察工作，日軍偵察了他們的前線，並且還偵察了應該屬於俄軍的前線；這三支軍隊都向前推進到距北京五、六英里的地方。

十七 俄軍的獨立行動；八月十四日美軍因而前進

俄軍司令官在八月十二日提議部隊應該在十三日休息一天，他走不動了；他的兵士一定要休息。其餘的司令官不能同意，在這天致力於偵察的建議是一個折衷辦法。俄國軍隊留在通州的兵營里，到十三日傍晚才出動。大約在下午九點鐘，在西北方聽到沉重的槍聲，整夜不停，到第二天才確悉是俄軍攻打東便門的槍聲。在十四日拂曉的時候，沙飛將軍得到一位日軍參謀官的通知說，俄軍“並不在運河對岸”，那是預定他們應該去的地方；在上午五點鐘到六點鐘的時候，有一位帶領着二〇〇名安南兵的法國軍官通知一位美國軍官說，他將去同美軍前面的俄軍會合，但那並不是預計俄軍所去的地方。沙飛將軍在上午十點鐘知道了俄軍在他的右方

① 八月九日福里將軍致蘭桑函，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一一七頁。

并听到日軍在更右方作战之后，便命令他的部队越过偵察綫前进，約在午間他发现俄軍占領了东便門，但是他們的“炮队和部队在經過时异常混乱，而炮队是面对着两个方向的。”他自己的美国軍队也有些在那里，他們奋勇地爬上北京內城的城牆，在城下部队和炮兵的掩护下攀登城上，于下午三时已經到达美国使館的一边。他們的国旗是第一个实际上悬在城上的。^①这时，日軍正在攻打齐化門，这是他們前进路綫上所指示的地点；但是由于遇到了激烈的抵抗，他們是最后进入北京的軍队。

十八 八月十四日英軍首先进入使館

英軍在左翼实行偵察工作，但是由于严格遵守原定計劃，主力却留在通州；因此就发生了美軍左翼在八月十四日午間以前沒有受到掩护的情事。盖斯里將軍知道了俄軍在十三日午夜攻打东便

^① 事态发展的情形在九月一日沙飞將軍致副官的信中有很生动的描写，見“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六六頁；达格特：“在华解围远征記”，第七五頁。并閱威爾：“北京书簡”，第二〇九頁。

薩威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卷二，第一七三頁，对于俄軍的行动有一个說明，但不甚可信。

一份中文的关于营救使館的述叙是很有趣的。

“在我們的專欄里，我們已經一再指出，我們的軍队在北京和天津附近与外国軍队交鋒了二、三十次，已一再地取得了胜利。这个消息是可靠的。一份外人电报說道，联军在楊村由于李秉衡的堵截和开放河水的战略淹死了几千人。从我們的上海通訊員方面更得到了一封电报——‘在八月七日外国軍队淹死了二〇、〇〇〇多人，被我軍歼灭的有八、〇〇〇到九、〇〇〇人。外国軍队精神沮丧，各国有意求和。他們建議由二、〇〇〇名不带武装的美国兵在距北京九英里的地方扎营；然后中国将外国使节从京城护送至美国兵营，再从那里遣送到天津。今后，倘若他們要战，中国就战，倘若他們要和平，他們也可以得到和平，但是必須符合中国規条第二十五号的規定。’……昨天有一封外国电报說外国軍队已入北京。我們只能設想是，因为一般痛苦过深，所以中国就准許数目有限的外国軍队进入北京以保护他們的使节。我們也听到，我們的軍队虽然获胜，但仍不能避免惊扰朝廷。为了防止意外，皇上和西太后同意离京到山西北部五台山狩猎以待和平恢复。当我们再收到好消息时，我們將乐于发表。”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九日“北华捷报”引八月二十二日广州报。

門后，便在十四日上午二時出動。按照計劃所指示他的路線他到了沙鍋門，這門在外城東邊的中部。他沒遇到多少抵抗便達到那里，不戰而進入城門。英國公使寶納樂爵士本人是個老軍人，他未雨綢繆，早就送出一封密碼信，向蓋斯里將軍指出，在英使館以南的水關是進入內城的捷徑。於是除因軍事戒備而略有稽延外，英軍爭取時間，獲得首先进入內城的榮譽，並且首先进入被圍的使館區，他們是在下午三時進入的。不久，美軍也跟着由水關進城。

十九 被圍各使館獲救

北京各使館獲救時的情景，自從勒克璠總督府獲救一事以後，尚無前例，各書均有描述；^①但沒有一篇記述比本書著者所藏有而未經發表過的筆記中所描寫的更為逼真。^②

“在援軍到達前的那一夜裡，我正在肅王府……忽然間一次為我們從來沒有受着過的最猛烈的來福槍襲擊開始了。從所有中國方面的戰線上，射擊不停。槍彈直向我們傾注。……我們想到，中國人終於準備進攻了，所以，為了恐嚇他們一下，我們四個人就開始歡呼。頓時槍聲減弱。於是，在我們左邊的日軍也開始歡呼並吹沖鋒號，在極左邊的意軍也開始歡呼並把石塊放在火油桶裡搖動作響。中國方面的攻擊又重新开始而更加有力。……槍聲逐漸消滅下去。……雨一直在落，並且打雷；我們濕透了，在戰場裡的雨水高過我們的足踝。……忽然間，杉氏先生(Sugi)喊道——‘听哪！你們听到沒有？你們听到哈德門外的機關槍聲嗎？援軍到城外了！’我們站在那里听，我們歡笑，我們說笑話。……大約在九點鐘的

① 畢盛報告，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二二七頁；明恩溥：“中國在激變中”，卷二，第四六一頁；威爾：“北京書簡”，第二〇四頁；威奇-蘭德爾：“中國與聯軍”，卷二，第一八六頁；湯姆孫：“中國與列強”，第九九頁。

② 海關職員馬孔的私人敘述，他在被圍期間是一名志願隊。

时候，派来更替我们的哨兵队到来了，我们回到使馆进早餐和休息。在那里，我们听到蒙古市场的阵地也同样地遭到猛烈的攻击。……消息开始传来了。外国军队确实到了城外。从那个王府方面也传来消息，说中国军队已经悄悄地溜走了。……大家愉快地吃了午饭；我们都在一种压抑住的兴奋和焦盼的心情中。以后，我们回到蒙古市场放哨。……不久，科诺瓦洛夫(Konovloff)喊着进来——‘援军进来了！西克兵(Sikhs)进入使馆了！你们听听欢呼的声音！’我们当中凡是能够离开岗位的人立刻跑进使馆。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情景啊！男人、女人和儿童，每个人都跑出来，到了草地上，欢呼，叫，喊，兴奋和快乐得发狂；那里一列一列地进来了挥着头巾，欢呼着的、真正的、活生生的、壮硕的印度军队，流着汗，蒙着尘土，疲倦已极。我向我看见的第一人跑去，我拍拍他的背，和他握手；我喊叫，我欢呼。我的蕴藏已久的情感必须要发泄一下。原想是永远不能从这个可怕的围困中活着出去的我，现在能够确实感觉到并且看到终于得救了！”

二十 外侨与教民创巨痛深

紧张过去了，获救的感觉表现在洋溢的欢乐中。在这八星期的被围期中，除了最乐观者外，没有人在任何一个时刻能够想到他们有可能去战胜成千累万的中国武装兵丁的不断的攻击，这些兵丁对他们“只是倾注弹丸”而已。被围者的脱逃被认为是一个奇迹，^① 他们的痛苦是巨大的。一千名养尊处优的洋人在盛暑烈日之下被关闭在屋子里，在大部分时间内靠米和配给的少量马肉来

^① “倘若有人要问，上天注视着人类的事物，有什么证明，简要的回答可能是‘北京的围攻’。” 纒则列举十项显著的奇迹——“在所有这些事情当中，我们看到了上帝在北京的围攻中伸出了援救之手。”——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二，第五〇八—五一六页。

維持生命；三千名中國教民只有米吃，而到被圍的末期，米的配給量也減少了。但是這些不適合和困苦，若與實際所遇到的危險以及他們晝夜所擔憂的更大的危險相比較，就算不得什麼了。^① 中國軍隊有無限的軍火供給；據估計，向使館發射的槍彈有一百五十萬到二百萬粒；據保守的計算，落在使館區範圍以內的炮彈有二千九百發。在另一方面，外國衛隊的軍火供給是極少的；除了供給四挺機關槍的子彈外，有些分隊所有的子彈，每支來福槍還不到一百發，沒有一隊每支有三百發以上；在圍攻快要終了的時候，有少量子彈從進攻中的中國軍隊手裡買來。^② 志願隊裡有些是用美國使館所儲備的來福槍武裝起來的，有些是用他們所能搜集到的來福槍或獵槍武裝起來的，他們的軍火便是那時打獵季節過去後所遺留下來的。在裝備有這樣的差異的情形下，稀奇的是志願隊都沒有被打死；而戰鬥人員的傷亡則十分重大。

二十一 外國防守部队的伤亡人数

在查看下列伤亡人数表的时候，要注意到英国水兵是作为后备軍，把守所有外国非战斗人員前往避難的英国使館；并且他們把守战壕的任务通常只是在使館北面和西面的战綫上；俄軍把守他們自己的使館，有两面受到攻击，此外还支援美軍；美軍把守他們的使館和在它一边的一段內城城牆；德軍把守他們自己的使館，这个使館曾經受到強烈的攻击；奧軍支援四十五名法軍以据守

^① “我每样东西都丢了，只剩下两套夏服——想起不得不放弃的所有那些寶貴的（對我來說）而以後被火全部燒毀的東西，有時令我發狂！自然，人是終久要赤身離開這個世界的，但是這次的弄得精光未免有點太早了，天杀的！可是我同其他各位應當感謝的是——健康照常，性命保存，並且逃過了總屠殺的一切恐怖：感謝上帝！”——一九〇〇年八月十八日赫德致杜德維函。

^② 明恩溥：“中國在激變中”，卷二，第五一四頁。美兵和法兵每人有三百發子彈，意兵九十發，俄兵六十五發，德兵四十發；但在被圍期間曾想出方法將有些子彈重新裝置彈藥。——指揮美軍的中將的報告，一九〇一年，卷四，第四五六、四五九頁。

法国使馆；这是一个最危险的突出阵地，经常受到攻击和地雷的轰炸；日军在三十名意军和大部分的志愿队支持下把守那个没有掩护而伸展出去的肃王府。北堂是由四十三名法国和意大利的水兵以及一些武装教民把守的。

使馆被围期间的伤亡人数表

	作战人员		伤亡人数		
	海军部队	志愿队	死亡人数	受伤人数	共计
美国	56	44	7	11	18
奥国	35		4	11	15
英国	82		6	26	32
法国	79		18	50	68
德国	51		13	16	29
意国	41		13	16	29
俄国	81	31	5	20	25
日本	25		10	29	39
总数	450	75	76	179	255

在被围期中，外国非战斗人员，除有六名婴儿因困苦而死外，伤亡的人数很少；但神经非常紧张，在很多人身上种下了疾病的种子；①在解围后的几个月中，有不少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中死亡了，他们实际上是死于被围，就象在围攻进行时死去一样。

二十二 八月十五日美军停止攻打紫禁城

英军在八月十四日到十五日的夜间占据防线，但是沙飞将军在与美国公使磋商后，撤退了在内城以外的美军，但是仍然把守着

① “华盛〔法国使节〕因伤寒病倒下来了，这是‘被围后’的另一个病例”——一九〇〇年十月十九日赫德致杜德维函。

前門。他和公使再度磋商后，即着手扫清皇城内的中国军队，这些军队从那里仍然威胁着使馆。他扫清了城墙，因为受到内城門上发来的炮火，他就連續逼入那通到皇宫所在的紫禁城的第一道、第二道和第三道門。在到达第四道門的时候，他的进軍停止了。在他的正式报告中，他并未举出特殊的理由，他仅仅說道：“那天下午一次會議上决定不占皇城，于是他撤回了部队。这次會議是在撤兵以后举行的；說出停止进軍的一个理由的唯一权威把它归于以下的事实：“俄国將軍曾經派他的一位副官送給沙飞將軍一封信”，使后者“用了一种不是君子人通常对待君子人的态度和言語来接待那位送信的使者。”^①倘若这封信确曾惹起恶言相向并使那位美国司令官在正要攻占通到中国的最神圣地方的心脏的最后一道門的时候停住他的部队，那末，这就和另外一句引証的話符合了——“‘总是这样混乱，总是这样沒有秩序’，法国軍官們憤怒地評論着，他們用几句话来很快地告訴我說，从一开始在天津起就象这样，每个縱队和其他縱队都在爭先，而表面上却装着合作。”^②美軍撤回后，他們遵守命令，但是悻悻然有愠色——“象許多羔羊一样被迫走开（除一面在发誓外）。”^③十五日各司令官所作的占据紫禁城的决定“在第二天所举行的各使节會議中并未予以同意；他們的意見是应当占領紫禁城。”美軍于是返回，繼續在以前进軍所到的地方守卫各門口。^④这时，在十五日，俄軍和日軍在内城东区及东北区不顧激烈反抗而前进，所經之地“浓烟四起，愈趋愈黑，直到在明亮的天空中展开了象一层烟幕……他們是在放火和洗劫，一場大火已經开始。”^⑤

① 薩威奇-兰德尔，“中国与联軍，卷二，第二〇九頁。

② 威尔：“北京书簡”，第二二二頁，提到了这个确实的时刻。

③ 薩威奇-兰德尔，前引，卷二，第二一一頁。

④ 九月一日沙飞將軍致副官函，陸軍部部长的报告，一九〇〇年，第六九頁；达格特：“在华解围远征記”，第九五及以后各頁。

⑤ 威尔，前引，第二一八頁。

二十三 北堂的英勇防守；八月十六日获救

在北堂有一群中国教民，約有三〇〇〇人；有四三名水兵，从事防守工作；并且約有五〇〇名本来胆小而目下变为雄獅的中国人用临时制成的长矛武装起来，少数从被打死的进攻者的手中获得了来福枪。对北堂的历次攻击比对使館还要猛烈，有二、四〇〇发以上的炮弹落在院內，而地雷轟炸的危险更大；困苦也更甚。快到被围的末期的时候，从八月一日起，每天的配給除水兵外，仅仅是五两食粮，从八日起仅有三两。在四十三名防守的水兵中十一名陣亡，十二名受伤，在两个月期中有四〇〇多名被打死的中国人埋葬在教堂的花园內。这个教会的英勇主教樊国梁大可祷告說——“这是世間奇迹！”——并且悲叹着几世紀的功业毀于一旦，大可痛悼地說“伤心哉，我等沒被全体屠杀；我等应当殉道。”最后，援軍到来了，但是已在使館解围二天之后。在八月十六日的早晨，有两个部队在教堂会合；日軍从北方而来；从西方来的是由福里將軍率領的各有四〇〇名的法、英、俄軍所組成的混合部队。这两个部队几乎同时到达，但是日軍得到了首先战胜抵抗而冲进的荣誉，紧跟着就是从西方来的一队法軍，北堂解围了。①

二十四 朝廷自北京出走

朝廷出走了。这并不是早有准备以便繼續作战的办法，而是一个由于确实駭怕而采取的仓猝的行动。几天之前，由于在北仓和楊村战敗的結果，曾經有一个計劃，仿照一八六〇年的办法把朝廷迁到热河，但是荣祿劝西太后仍留北京，即使联軍进入城內。②

① 薩威奇-兰德尔，前引，第二二七及以后各頁；毕盛报告，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二二九頁。

② “景善日記”，八月九日，第二九六頁。

在八月十二日，一切都在混亂中，榮祿被召見八次，端王被召見五次；“老佛爺頗有殉社之意，并令皇上同時殉社，聖意頗不以出巡為然；……老佛向榮相詢以有何切實辦法，榮云務須勸聖駕，萬萬不可出巡，應立刻獨斷，施行安民之辦法；非將載漪等置諸重典，不足挽危局而贊大猷。”^①西太后拿了一手好牌；她只要占住桌位，玩她的那手牌，她將仍在局中。滿人中以果斷的榮祿和躊躇的慶親王為首的那些少數政治家將集合在他們君主的一邊；那幾位總督早就表示他們附和各國的計劃是以保證他們的君主的安全為依據的，各省是會支持各總督的；至於列強，由於見到它們任命的使節還活着而安了心，是一定會認為權宜第一而承認“國王無過”那句格言的有效，並且只使滿洲貴族和大臣負其責任。但是，在外交界以外，不能期望一個東方人會玩出一局投機而勝的牌來，沒有人能夠懷疑，外國人的第一個行動將是殺死每一個不拘地位高低而能被牠抓到的滿洲人。西太后并不正大光明，她完全在排外的義和團領袖們的支配之下；於是朝廷出走了。

二十五 中國政府遷到西安

八月十四日下午四時，瀾公和剛毅匆忙地跑到老佛爺面前報告她說，洋兵已經進城了；剛毅說——“務祈聖駕立時出巡，否則其禍不堪設想。”在快到午夜的時候召開了軍機大臣會議，^② 僅有剛毅、趙舒翹和王文韶三人參加；其餘各大臣因有它事未來。王文韶因老邁准免隨行；剛、趙二人和貝勒溥倫、溥儀在上午四時扈從皇上和西太后在一乘普通轎車中秘密離開皇宮，他們扮裝做農民，太后的頭髮梳成漢人的式樣，這還是她生平第一次。在離開皇宮之前，西太后——直到最後還是局勢的主宰——下令把皇上的寵妃推入

① “景善日記”，八月十二日，第二九七頁。

② 參看第八章第二十八節。

井中溺斃。這些皇室的逃難者滿身塵垢在上午八時到達圓明園，在那里有四位王爺(端、慶、那、肅)、好幾位公爺和一些朝中大臣和他們會齊。從那里起，他們由一隊軍隊護送往張家口；又從張家口前往陝西省西安府，就在那里建立了朝廷和帝國的政府。^①

二十六 北京受到的懲罰

北京受到屈辱了，它遭受到象一般亞洲城市被亞洲軍隊攻克後所經常遭受到的痛苦——不過，現在的侵略軍却是些西方軍隊。強壯者都逃跑了；不太強壯的人如能找到交通工具的話也逃跑了，但是交通工具是缺少的；許多滿洲貴族和無數的婦女都自盡；^②成千成萬的人在以屠殺為乐的瘋狂放蕩下被殺了；^③留下來的幸存者象被鞭打過的獵犬一般在犬舍里畏縮着。北京城曾經被搶劫，最先被義和團，其後被中國軍隊，但是他們不過撇取了表面上的浮油。外國軍隊現在却着手對它洗劫了，雖然是暴亂地，却是有步驟地在干。最初，他們散布到城內各處，隨心所欲，不管地區。其後，每個分隊在指定由它來維持治安的地區進行搶劫；^④在最後的階

① 關於西狩情況可參看，“景善日記”，八月十四日到十五日，第二九七及以後各頁。西安府在一千四百年前曾經是這個帝國的國都。那里，象奉天一樣，曾經設過各部院，現在都恢復了。參看著者：“中朝制度考”，第二一一、二二六頁。

② “現予聞得以徐相國業經殉難，我公以謙抑自下，不敢自是，推誠待士，博覽書籍，現竟投繯，豈不哀哉。其夫人以及四公子與女眷共十八位，均亦殉死。嗚呼，我聖朝宗族懿親，衰敗至斯，致衣冠填壑，為千古未有之奇禍也。與醇親王指婚之薩克達氏，亦從容引藥而死。……予內眷均欲仰藥殉難，是為最下之策，乃以坤道之愚，實不服勸，致不得阻之也。予決無此意。”——“景善日記”，八月十五日，第三〇二頁。

③ 關於漫無紀律的屠殺以及在城里相繼發生的搶劫情形的敘述沒有人比威爾写得再詳切了，閱“北京書簡”，第二二七——三〇一頁。

④ “自從十四日‘援兵’到達之後，混亂籠罩了一切，中國人想，世界末日到了；但是改善開始了，‘接觸’——由於官吏的逃跑而失掉——通過我又恢復了。……各地蹂躪之重，實是驚人——朝廷所帶給這個京城的懲罰是多麼重呀！格蘭茲拉(Granzella)告訴我，那里[天津]有許多貨物等待出口，但是找不到苦力搬運；我希望

段，各司令官們曾試圖在當時無秩序的狀態中裝出建立秩序的樣子，設立各種戰利品貯藏，並命令所有劫奪到的物品都應交給戰利品的總管。日軍大概是照辦了，但是西方國家的各分隊的戰利品貯藏是不曾達到一個大的數額的；因為這些軍隊都不受管束，把北京和它裡面所有的人和財產都看成是由他們任意擺佈的戰利品；所以，天津如此，北京更甚，由於中國破壞了國際法並向世界挑戰，世界也反過來在對待這個破壞法律者時不承認它自己的法律。

對於人手的需要會產生人手的供給，你可以盡你的‘可能’把商業恢復起來。此處〔北京〕人們被抓伏，什麼事都得做，又不給工錢，所以沒有人受到鼓勵來着手辦事——但是實際上一切都是無秩序和混亂，需要有一個頭腦清楚、胸有成竹、機警敢為的硬漢來從這個混亂中恢復秩序。日本人在機智、紀律、組織和堅忍上所表現的比別人都好。”——一九〇〇年八月十八日赫德致杜德維函。

“每樣事都是混亂的，城里充滿了不安寧和無秩序。”——又函，一九〇〇年八月三十日。

“我從未過着這樣的混亂不安的生活。”——又函，一九〇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我們此地正在逐漸開始整頓，但是做得太慢了，我對於現代軍隊所用的方法感到失望。”——又函，一九〇〇年九月六日。

日本軍隊沒有暴行，因而最為人稱贊。——湯姆孫：“中國與列強”，第一一四頁。

一位日本眾議院議員從各方面贊揚美國軍隊的行為；印度軍隊慣於做些小的盜竊，英國軍官都是無可批評；他說到“俄國軍隊所表現的凶暴殘忍。”——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日“日本每日郵報”，引自上注，第一二六頁。

法國兵作有計劃的和徹底的掠奪。——威爾：“北京書簡”，第二二二頁。

“據說在俄國管轄區內作出了最不可以言語形容的暴行。在法國軍隊占領的地方也是如此……大家公認在日本占領區內秩序首先恢復，稍後是英國占領區……後來美國占領區也恢復了秩序。”——麥卡錫：“未來的強國”，第九五頁。

“蓋斯里將軍說〔在九月十一日的各司令官會議上說的〕，在各占領區都有很多中國人，只是俄國占領區是例外，在那里只看見有狗而已。”——對副官的報告；陸軍部部長的報告，一九〇一年，卷四，第四八二頁。

“十月二十日。美國占領區現在並且已經有一個月之久是擠滿了中國人。街對面的德國占領區，幾乎是荒涼的，所有商店和市場都在我們這邊。據中國人說，他們被德國人掠奪。”——同上，第四八七頁。

作為掠奪物的一部分，德人從欽天監里把美麗的銅制天文儀器掠走而搬到柏林。有一個時候，為討好中國起見，他們提議將儀器歸還中國。中國使節答復道，若能把它們送回北京，中國是欣喜的；德國政府却不願作到如此地步，到一九一四年七月，儀器仍在柏林。

二十七 联軍占領北京，頒布戒严令

在八月十六日的會議上联軍的司令官們把北京城划分为若干地区以便占領和維持治安，每一个国家——日本、俄国、英国、美国、法国为援軍里的各該国的部队所代表，在三个城中——皇城、內城和外城——得到一个指定的地区，而美国又在一個时期內繼續供給卫队把守紫禁城的城門。有一队德軍，人数为一、二〇〇人，在八月二十三日到达，另有一、〇〇〇人可望在几天內到达，当即由指定給俄国的地区內划分一部分給了他們。日軍“直驅國庫〔戶部〕搬了二百万到三百万兩銀子送到日本使館”；^① 他們又为本国政府夺取了內廷綢緞庫和谷倉。^② 有些地区在一二星期內比較地恢复了治安，在另一些地区內，不安的情况繼續了若干星期之久，但是在所有地区內，外国軍隊在頒布了戒严令的情况下将这个被征服的城市加以占領。

二十八 八月二十八日武装队伍穿过皇宫

在占領紫禁城的問題上达到了妥协。大家同意不应占領，但是在八月二十八日外国軍隊的各分队由他們的使节和使館人員們伴同着进入了紫禁城各門并穿过各殿；各使节和高級官員并且檢視了大內各室。軍隊是依照以下的組織进入的：八〇〇名俄軍，八〇〇名日軍，四〇〇名英軍，四〇〇名美軍，四〇〇名法軍，二五〇

① 日本人的情形見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日日本“每日郵報”，見前注。

山口素臣將軍報告道：“到十月第一周为止，日本軍隊获得了二五〇、〇〇〇石米（合一五、〇〇〇吨），二、六三七、七〇〇兩銀子，一、四〇〇把大刀，六七門大炮，二、九八八支米福槍和大批彈藥。”——十月二十二日“長崎新聞”，引自“北華捷報”，一九〇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② 薩威奇-兰德尔：“中国与联軍”，卷二，第二四二頁；奧里芬：“北京使館被圍記”，第一七一頁；“北華捷報”，一九〇〇年十月三日。

名德軍，六〇名奧軍，六〇名意軍。俄軍担負进行正式入城式的責任，他們的司令官李涅維奇將軍 (General Linievitch) 檢閱了各分隊——英國分隊除外——并且接受他們的敬礼；^① 在入城的時候，各分隊一面前進，一面互相歡呼，“和其他日軍分開游行的由水馬大佐率領的一小隊肅王府保衛者盡興地歡呼，這也是應當的了。”^② 各使節、秘書和高級官員們對於所到各室都很感興趣，可能除了少數的小小紀念品外，他們對於各室里的物品都很謹慎地予以尊重。在九月八日，俄國海軍提督阿烈克謝也夫偕同一小群人對皇宮作了再一次的訪問，據記述所載，“自從前次訪問以後，所有小的物件都已移去；中國侍者都穿上了制服并且人數增多了。”^③ 瓦德西伯爵 (Count von Waldersee) 在十月到達北京後，在中國皇帝的宮殿里建立了他的司令部。^④

二十九 帝國屈辱已極

帝國已經降落到這樣的深淵里了。在一八四二年，中國屈從於一個條約，這個條約是被作為結束戰爭的最便宜的方法而接受下來的。在一八五八年和一八六〇年，它降到一種屈服的地位并被迫讓與了侵害它主權地位的許多權利，但它却免了許多恥辱的標志。在一八九五年，它被一個認作次等的國家所戰敗，并且受了很大的侮辱。現在，在一九〇〇年，北京朝廷和政府向全世界挑了衅，由於侮辱和威脅了各國正式任命的使節的生命，由於整批屠殺了無罪的傳教士和他們的眷屬，由於野蠻地攻擊了在北京和天津

① 統率美軍的中將報告，一九〇一年，卷四，第四七九頁。該報告繼續說道：“法國和德國的分隊在參加這次行動的程度上是完全不穩的。在攻打北京時法軍的人數微不足道，德國竟無一人；福里將軍聲稱他有八、〇〇〇軍隊在中國。”

② 奧里芬：“北京使館被圍記”，第一八一頁。

③ 統率美軍的中將報告，一九〇一年，卷四，第四八二頁。

④ 參看本卷第十一章第二十六節。

的洋人，他們已經觸犯了國際法。為了這些犯法行為，懲罰已經加在那些犯罪的官吏，加在曾經是屠殺和破壞的積極代理人的軍隊與義和團的身上；但是，或許在感情上是有罪，而並未積極參加屠殺的老百姓們却受到義和團和中國軍隊的可怕的摧殘，然後又落在外國軍隊的手裡受難，這些外國軍隊是為了他們本國同胞中有些遇到危險和有些遭到屠殺而激怒了的。帝國所受到的恥辱為以往各次戰事後所未有，因為它不但喪失了威望而且也壞了名譽；朝廷受到了流亡和自覺無能的懲罰；行政方面，包括在北京的有罪的滿人和在南方的比較有遠見的漢人，現在不得不進行一次外交戰，其結果是使國家受到了更深的屈辱。

第十一章 列强的同床異夢

一 北京秩序的恢复	308
二 天津临时政府的設立	309
三 各国派定委員	310
四 各部門主持人的委派	311
五 天津临时政府的有限的权力	312
六 行政經費的来源	313
七 中国人口的粮食供应問題	314
八 外国軍事当局夺得的食盐的問題	315
九 天津临时政府着手的土木工程	315
十 海河濬治局的組成	316
十一 領事得否决天津临时政府的提案	317
十二 在軍事当局严密控制下的天津临时政府	318
十三 吞納案件的說明	319
十四 天津临时政府对于中国官員的管束	320
十五 八月十九日，李鴻章請求各国开談判	320
十六 海陆軍司令官們拒絕承認李鴻章	321
十七 各国在承認李鴻章的問題上犹豫不决	322
十八 九月六日，庆亲王企图开始談判	323
十九 李鴻章延迟进京	324
二十 八月二十八日俄国提出从北京撤退的照会	325
二十一 联盟各国一般地拒絕俄国的提議	326
二十二 九月十七日俄国又詢問联盟各国的意图	327
二十三 九月十八日德国要求先行懲办祸首的照会	328
二十四 德国在七月中的强硬态度	329
二十五 瓦德西伯爵被任最高統帥	329
二十六 九月二十五日瓦德西到达天津	331
二十七 瓦德西的任命为其他联盟国家冷淡地予以接受	332

二十八	中国军队的分散	333
二十九	援救北京附近的教徒	334
三十	北京、天津近郊的肃清	335
三十一	九月二十、二十九日北塘和山海关炮台的占领	336
三十二	十月派往献县和保定府的讨伐队	337
三十三	德国陆续派出远征军；其他各国的态度	338
三十四	在部队调动上反映的官方态度	340
三十五	各国对于九月十八日德国照会的态度	341
三十六	九月二十五日中国颁发上谕惩办祸首	342
三十七	九月二十四日俄国着手吞并满洲	343
三十八	十月四日俄国在牛庄的举动	344
三十九	十月四日俄国在天津的侵略	344
四十	十一月六日俄国要求在天津的租界	345
四十一	俄国坚持要求，反对抗议	346
四十二	各国在天津争夺租界	347
四十三	十月十六日英德协定	348
四十四	联盟各国的同床异梦	349

一 北京秩序的恢复

北京在被占领后，曾经分成若干区域，每一个区域由一个联盟国的军队管理和警备。公使所代表的民政当局和将领所代表的军事当局之间的关系，各国的解释不同；但是秩序的恢复似乎并不依靠这些关系。在军事国家方面，日本最迅速地和最完全地将它的区域控制住了，而俄国的区域却是凌辱和暴行最显著而且最持久的区域，至于在德国的区域里，中国人却受到有系统的压迫；在民主国家方面，划归法国的区域并没有好好地控制住，不过英国和美国的区域在秩序的维持上仅次于日本。^① 扫荡城内残敌的工作进

① 参看本书第三〇二页注①。

行得很迟緩，^①武装的义和团，甚至于帝国的士兵，可以从容不迫地改換一个不会为害的市民的服装和面貌；于是“敌人”充滿四乡，甚至靠近城墙，有时是个别地，不带武装，不穿制服，^②有时却又成群結队，全副武装，中国官員一般都已經逃出了城，而那些沒有逃走或者已經回来的人也給吓得屈服了。^③在九月十日，据报告北京城內的联軍有日軍八、〇〇〇人，俄軍五、〇〇〇人，英軍三、〇〇〇人，美軍二、〇〇〇人，德軍二、〇〇〇人，法軍一、五〇〇人，以及少数意大利和奧地利的軍隊。^④

二 天津临时政府的設立

就在天津城被攻下和中国軍隊从天津附近被赶走的时候，联軍統帥們决定組織一个临时的行政机构，授权它管理城內和附郭一带直到“泥墙”^⑤为止的区域內的民政和治安，但不包括各外国租界(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和日本的)，也不包括兵工厂、营盘、铁路、电报以及早已被联軍部队占領的其他軍事設備在內。在这

① “至于敌人，城里仍旧有一些——当然潰散了，但仍旧有敌意——城外四乡还有另外的一些。”——赫德致杜德維函，一九〇〇年九月六日。

② “这个地方〔从北京到通州〕始終一片荒涼，实际上是沒有人居住了，除了有时会突然碰到数十个本地人，大都穿着軍褲可是沒有号衣，奔过大路隱沒在路对面的高粱地里。这种輕举妄动的結果，是他們当中大多数人被刚刚来到这个地方还不熟悉中国人习惯的新的外国部队枪杀了。”——薩威奇—兰德尔：“中国与联軍”，卷二，第四〇六頁。

③ 大約九月中旬外国將領們“接待一个高級的中国官員的拜訪，他的官阶相当于兵部尚書，随他一道来的有这个衙門里的其他大臣，他对于联軍將領們迅速进入北京以及建立和平和安宁的恩德，向他們表示中国人民的謝意！”——同上。

④ “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九日。

一九〇一年美国陆軍部报告，卷四第四八三頁中，俄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人的数目是偏高的，但是“这个記錄想来是不可靠的，每一个国家的代表都高兴用夸张他的部队人員的方法来夸大他的重要和势力。”

⑤ 当代的天津人都知道这是“僧格林沁的蠢事”，参看本书第一卷，第六四九頁注①。

些轄境之內的行政机构，叫做天津临时政府（当时中国人叫它做“天津都統衙門”，为了保持原文意思并避免与当时中国政府机关混淆起見，这里照原文直譯，不用当时的通称。——譯者），最通行的称呼是簡称 T. P. G.，具有对一切中国人征稅和警备的完全权力，并且受权“查抄或接管在它控制之下的政府公廨內或为所有人放棄的私人房舍內发现的一切貴重物品以及公文等項。”^① 原来的轄境，除去儿处寬广的地方以外，地面是窄狹的，但是它們却包含了所有中国人口当中的住戶和行业。为了征稅和警备两重目的，天津临时政府曾經一再努力于扩张轄境，但是上級軍事当局却經常反对；^②但是后来，在某些国家占据了广闊的本国租界之后，^③天津临时政府的管轄权是被扩展了，它包括天津县在內，直至河口为止。

三 各国派定委員

联軍統帅們規定委員們的薪金每人每年一、五〇〇英鎊。^④ 指派的委員有三人：华格克上校 (Wogack 俄国)，包威尔中校 (Bower)，后由烏沙利文中校 (O' Sullivan) 替代(英国)，以及青木中校，后由原田中校替代(日本)；^⑤但是当华格克上校提升为少将之后，在他的“暂时离职”期間 (从一九〇〇年九月三日到一九〇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他的职位由伍魯諾上校 (Woronow) 充任。民族的猜忌立刻发生了。行政會議的第一个告示叙述了三个委員中的每一位委員的国籍和官阶，法軍司令官就为漏掉法国字样表示不滿；于是

① 天津行政条例。

② 天津临时政府行政會議會議录 (以下簡称“天津临时政府”)，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四日、二十九日，十月四日、十五日，十一月十五日。

③ 參看本章第四十二节。

④ “天津临时政府”，一九〇〇年九月四日、十七日。

⑤ 同上，一九〇〇年七月三十日。

告訴他這並沒有任何主張國家的管轄的意圖，問題暫時算告一段落。在十月十一日，瓦德西伯爵通知行政會議說，他有“任用一個和其他國家的委員有同樣權利和同樣義務的德國委員的意思。”^①這是不能反對的，並且，別的国家也要求平等的權利，於是行政會議又添加了三個人：阿拉伯西中校(Arlabosse, 法國)、福脫中校(Foote, 美國)和法克罕少校(Falkenhayn, 德國)。後來意大利由司令官克沙諾伐(Casanuova)代表參加；但是奧匈提名一個人的要求卻被拒絕。^②美國的代表在一九〇一年五月十日退出，可是秘書長却負有將一切與美國政府有關的事宜隨時通知美國使館的責任。^③

四 各部門主持人的委派

在七月三十日行政會議召開了第一次會議。由於委任了若干薪金各八〇〇英鎊的執行部門的主持人以及其他一些屬員，政府於是組成。各部門的主持人，一般都是熟悉中國語言和習慣的，在衙門中有很大的權力和很大的影響，可是衙門中那些名義上的首腦卻沒有這種知識。查理士·田貝(Charles Denby)是前任美國駐華公使(一八八七——一八九九年)的兒子，一個有些能力和外交經驗的人，他被委任為秘書長；他的職責是象軍艦上的作戰官長那樣——天津臨時政府的業務首腦。中文秘書是吞納(C. D. Tenney, 美國人)，過去是傳教士，當時是天津華人學院的主持人，後來(一九〇九年)還當過美國使館的中文秘書；他在有關中國人問題的处理和往來上照例是一個中間人。警察長是麻克勒大佐(Mockler, 英國人)，他除了例有的警察職責之外，還有憲兵隊的職務。財務官是盧普(C. Rump, 德國人)，他的財務技術的熟練和對中國財

① “天津臨時政府”，一九〇〇年十月十一日、十三日。

② 同上，散見各號。

③ 同上，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政情况的熟悉，不仅对于天津临时政府有很大的价值，就是对于各国外交团体在确定赔款条款上也有很大的价值。司法部的主持人是伊門斯 (W. S. Emens, 美国人)，他把对中国語言和中国法律的丰富知識提供到他的工作上。卫生工作的主持人是德巴士医生 (Dr. Depasse, 法国人)，他毕生致力于制定卫生和健康的規章，使一个向不注意这两件事的民族接受；他在任上因公逝世了，^① 他的职务在一九〇一年一月由胡庸医生 (Dr. Houillon) 接替。

五 天津临时政府的有限的权力

行政會議通常只每周开会三次，但是它有一个委員却經常監管每一个部門的日常业务；俄国代表^② 要求对秘書长部門的管轄，其他部門的管轄者也經派定，中文秘書給日本，公共工程和卫生給法国，警察給德国，財務給英国，司法給美国。^③ 在对待中国人的問題上，行政會議的权力是无限的；它对所有中国人实行征稅和防范以及审讯；并且，在謀杀案件或在实际参与义和团暴动事件上，它处决他們；由軍隊逮捕和审判的犯人也解交行政會議处决。可是对待外国人，行政會議却没有权力。与民政有关問題，送交有关的各国領事；至于与軍隊有关問題或則不予受理，或則交由各有关国家的行政會議委員轉呈他的上級即軍事司令官处理。行政會議是各国司令官創立的，也属于他們管轄。要求一个独立地位的企图曾經立刻被制止。在提交北京討論的一个政府方案里，在“行政會議为各国所設立”一句中，“各国”被改成“各統帥”而“在委任統

① “自从行政會議成立以来，德巴士医生在他任事期間以最干練和最忠誠的态度克尽厥职，他为所有同他接触过的人所敬爱，行政會議希望向他在世的父母以及天津的法国侨民致以最恳切的慰問。”——“天津临时政府”，一九〇一年一月十日。

② 同上，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三日。

③ 同上，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治的轄境中享有絕對權力”等詞句，都被刪去。^①

六 行政經費的來源

為了供應開辦需用的資金，聯軍司令官們曾經要求每個主要同盟國家墊付五〇、〇〇〇元鷹洋，^②而各國也就先後撥到五、〇〇〇英鎊，二五、〇〇〇美元，一二五、〇〇〇法郎，一〇〇、〇〇〇馬克，或五〇、〇〇〇日元。這些墊款沒有多久就予以歸還，因為行政會議已經取得稅收。為了組成警備隊，行政會議曾經請求各國司令官調撥軍隊來擔任，它向俄、日兩國各請撥二〇〇名，英、美、法三國各請撥一〇〇名；^③在其他國家參與行政會議之後，也向他們作同樣請求，向德國請派一〇〇名，^④向意大利請派一〇〇名。^⑤這些分配定額並沒有維持下去；人員的撤走事前並不通知，人員的補充更是極不情願；弄到後來這種人員就只好由不可信任的中國警員來遞補。但是，即使它能夠運用的是這些手段，天津臨時政府還是做了很有效的工作，並且也維持了秩序，若不是對於任何外國軍隊都沒有管轄權，秩序也許會更好些。中國人在正常時候所征收的捐稅，天津臨時政府也同樣征收，另外還加征了一些過去沒有征過的車、船、鴉片烟館、娛樂場所等的牌照捐，就是厘金，以及洋貨的過境稅，也落在天津臨時政府手里。這些稅捐，在秩序恢復之後，由海關征收；但是對於將他們的稅收解交天津臨時政府的要求，稅務司杜德維是立刻答應的，^⑥並且這個辦法也推廣到塘沽；^⑦但是在所收總數中，有若干稅項是撥歸海關

① “天津臨時政府”，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② 同上，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③ 同上，一九〇〇年七月三十日。

④ 同上，一九〇〇年八月十日。

⑤ 同上，一九〇〇年九月十日。

⑥ 同上，一九〇〇年八月十八日、三十日。

⑦ 同上，一九〇一年三月六日。

的。① 在中国人办理之下，这些稅收的官方报告，从来没有超过一〇〇、〇〇〇两銀子的数目；②但是在天津临时政府所規定而由海关当局繼續实行的办法的鼓舞下，稅收是增加了；据海关报告，一九〇四年在这些稅捐項目下征得的总数是一、四二〇、四二〇两銀子③。

七 中国人口的粮食供应問題

摆在天津临时政府面前的一个問題，就是在当时和行将来临的冬季期間，在一个城市的各种生計停頓，它和生产及消費区域的通路完全隔絕的情况下，怎样去供应人口的食粮，主要是那些依靠极微薄的工資，④做一天吃一天的人的食粮的問題。第一个步骤是用合理的价格去征購一切可以利用的、为数不多的⑤商品粮食；于是就命令招商局献出它所掌握的漕米，“这种米粮有必要为了紧急救济而发放。”⑥除此之外，軍事当局在大沽、塘沽和天津等地以及在北京进軍途中曾經鹵获了大量的中国政府公粮，天津临时政府曾經悬請他們将这项公粮交給它处理。⑦他們也先后答应了这个請求，主要也是由于这种办法，天津的民食才得到保証，否則是难免发生飢饉的。

① 例如，从一九〇二年一月一日至一月十五日，在稅收总数二四、九五九两銀子中，拨付三、七三四两銀子的数目。——“天津临时政府”，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日。

② 参看本书第一八六頁注③。

③ 一九〇四年天津海关报告。

④ 在义和团事件爆发以前，一个不熟练劳动者通常的工資，大概最多不过每天五辨士，这个工資他要养活一个家庭。

⑤ “天津临时政府”，一九〇〇年八月八、九、二十九等日。

⑥ 同上，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二日。

⑦ 同上，一九〇〇年八月四日。

八 外国軍事当局夺得的食盐的問題

在天津有一个惊人的景象，就是从天津租界的对面起，河岸上有連綿不断的一长列的盐山，这是属于中国政府的官盐。联军占领了这个城市，这些山冈也遍插了国旗，主要是俄国旗和法国旗，在它們上面也布上了崗哨，表示它們已經被那些旗帜所代表的国家占领。但是这种盐却是天津临时政府需要的，一方面是为了要供应在它管轄下的百万以上的中国人民的这一項生活必需品，另一方面是打算把这种政府官产出售，由此取得财政收入。于是就向联军司令官們发出一項請求，主张食盐作为中国政府的财产。①美军司令官同意，但附有“出售食盐所得款項不应用作已經由各国聘任的員司的酬报”的条件；②法軍司令官怀疑行政會議的权力；③俄国人不理会这个請求；④于是行政會議就向瓦德西伯爵申訴，他的答复是食盐的所有权不能授予天津临时政府。⑤后来显然因为人民的需要已經很急迫，各国軍事当局才在一九〇一年五月中，先后將他們所占領的食盐拨归天津临时政府。⑥

九 天津临时政府着手的土木工程

除卫生和鎮压乱事外，天津临时政府的最重要的职能是在土木工程方面。在河上，中国人有两处用船組成的渡桥，一处是在城东，一处是在城北，它們可以分开，讓河內船只通行；在这一方面，天津临时政府又在居留地沿河的地方加了一处船桥，这原来是由俄国人

① “天津临时政府”，一九〇〇年八月二日。

② 同上，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③ 同上，一九〇〇年八月十日。

④ 同上，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⑤ 同上，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二十九日。

⑥ 同上，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設置，后来在一九〇一年一月移交出来的，还有一座通向火車站的鉄吊桥，就是“万国桥”，它实际上是在后来中国政府手里完成，不过它的基金是由天津临时政府筹措出来的。沿河岸一带，从外国人居留地起繞着城到城的西北角，建筑了寬广的堤岸；凡在工程計划范围内的地产的业主都被立刻撵走，但是他們都获得了充分的补偿，或是金錢，或是別处的土地。^① 在一九〇〇年十一月，行政會議决定拆除天津的城墙，这有三个理由：城墙是一个城市設治的标志，剝夺天津这个光荣的标志，就是对于它所犯的罪行加以显著的惩处；从这些城墙上曾經向外国人居留地射出怒潮般的枪弹，为了軍事理由，一定不能讓它們再存留下来；并且城墙的拆除可以騰出地来建造寬广的林蔭大道，增辟交通路綫，以及获得阳光和空气。提案为每一个司令官所贊成；^② 拆除的工作交人承包，包工人可以取去完整的城砖作为他的报酬；碎砖和其他材料由天津临时政府用来鋪修道路。此外天津临时政府还举办了自来水事业，从运河里将水汲进城內。

十 海河濬治局的組成

有一項由天津临时政府实施的土木工程是它的光荣的頂点。天津是內地，从大沽到天津陆路有三十五英里，但是通过弯弯曲曲的河道却有五十六英里。距离并不重要，但是长长的河湾，深水的冲击又使河身更加弯曲；在一个一个的弯曲处又有許多浅滩；并且，由于河水流动受到阻拦，在多雨的夏季河水就高涨，而且河床还涨得更快。切削由河岸伸出去的陆地的頸部，附带地再挖掘浅滩，那么，改进是可能的；在一八九八年，中国当局曾經聘請林德(A. De Linde)为工程师处理过这个問題。現在将这个工作交給天津

① “天津临时政府”，一九〇一年一月二日、四日。

② 同上，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七日，等等。

临时政府，显然是非常聪明的，因为这是决定着联军司令官们将它的管辖权扩张到海边的主要因素。作为联军总司令的瓦德西伯爵就用他的权力创设了海河^① 浚治局，它由下列的代表和成员组成：

阿拉伯西，法国成员，代表天津临时政府。

英国领事，代表领事团。

三个成员，由英国、法国和德国租界各提名一人。

德瑾琳，海关税务司。

林德，主任工程师。

必需的基金由天津临时政府和各外国租界的商界团体共同筹措，在这个项目上，天津临时政府拨出的总数计三三七、五〇〇两。在行政会议将政府移交中国人之前，它曾经创办了三项开河工程，并且供应了施工资金；有两项工程在它存在期内竣工，第三项工程在一九〇四年七月开工。这三项开河工程，总长有四·三英里，使天津大沽间河道的距离从五十六英里缩短到四十七英里；并且，结合着对流入河道和流出河道的控制，这个工程大大地改进了这条航路。其他两项开河工程在计划中是列入的，这两项工程实施之后，可以将河道缩短到三六·五英里。^②

十一 领事得否决天津临时政府的提案

这些工程都是在不正常情况中所行使的权力之下完成的。每一项重要措施都必须向司令官们请示；甚至一个领事对于任何一件事情，如果他认为影响他本国利益，也可以插进来行使否决权。“万国桥”从法国租界通向火车站，最初有人主张将它放进俄国租

^① 在外国地图上标明是北河；但是在天津有三道河流会合——从南方来的运河，从北方来的北河以及东向流入海洋的海河。

^② “天津临时政府”，散见各号；一八九二——一九〇一年天津海关十年报告；上引报告中的地图，载第五六〇页。关于它的最近的历史，参看第十三章第二十四节。

界，但是后来又宣称是中国人的；但是它所通过的那条可以通航的河道，倒公認是中国人的。根据这个理由，天津临时政府主张有权利建筑它并供应修造及保养所需的資金。^①可是法国領事拒不同意，除非将桥梁建筑合同給予蓮尔公司 (Fives-Lille Company)；^②行政會議拒絕接受这个条件；但是最后这件事取得妥协了。天津临时政府担任这个工程，但是它同意在符合領事愿望之下进行工作；天津临时政府供应的資金应不少于六四、〇〇〇两銀子，法国租界供应四〇、〇〇〇两銀子；而在天津临时政府撤消之后，“为了保卫国际利益”，这桥梁應該放在法国租界的管轄之下。^③

十二 在軍事当局严密控制下的天津临时政府

在同軍事当局的关系上，天津临时政府不得不极其小心謹慎，許多指責都是将官們对組成行政會議的校官們作出的。有一个例子可以說明他們的地位。在一九〇〇年十月，中文秘書吞納，向行政會議提交了一位为外国人所熟知的前天津关道发来的公函，这封公函恳求不再派遣部队往滄州（在天津以南八十英里的运河边上），也不再往以南派遣，并且說到“梅东益將軍在鎮压他治下义和团时所采取的措施的效率”。行政會議把这项請求轉致瓦德西伯爵，表示支持并証明“梅东益將軍是享有良好声望的。”^④可是，一个由德国部队組成的討伐队仍旧派出去了。天津的英国传教士向

① “天津临时政府”，一九〇一年六月十二日。

② 同上，一九〇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③ 同上，一九〇一年七月十二日、十七日。

④ 同上，一九〇〇年十月十七日。

“一定有一些誤会造成德国人攻击梅將軍。他曾經成为袁世凱左右手之一；他曾經因为出力鎮压拳民、保卫山东边界和保护教会而出名；似乎是德国司令官为翻譯或向导所蒙蔽。”——“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十九日。再参看本章，第二十八节；以及一九〇〇年九月三十日寶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中国，第五号”，一九〇一年，第一〇二頁。

行政會議提出請求，希望將他們認為品德可以保證的在滄州被俘的一些中國人加以審訊，以便弄清事實。於是行政會議的德國成員，法克罕少校，就通知行政會議說，“這些俘虜早已解交別處，不是解與中國郵政當局[原文如此]，就是解與英國部隊，因為拘留俘虜是和德國的習慣相違背的”；^①而在第二次會議上，他又宣稱，“根據他調查的結果，德國部隊在派往滄州的一役中並沒有獲得俘虜”。^②

十三 吞納案件的說明

幾天之後，梅東益寫信給吞納，對德國部隊在滄州的行為提出了若干確凿的控訴。由於英國成員包威爾上校的申請，他對這些控告加以調查，查問了一些証人；但是他並沒有將這種結果報告行政會議，却逕將全部案卷送達包威爾上校。包威爾又把案卷送給在北京的英軍司令蓋斯里將軍，蓋斯里又把它轉交給瓦德西伯爵。後者立刻命令德國成員要求行政會議就這些文件作一個說明，這些文件都是用打字機打在印有“天津臨時政府——中文秘書處”字樣的紙張上的。行政會議並不試圖調查這些控告，也沒有談起他們的同僚包威爾上校的同謀共犯；而是毫不耽擱、毫不猶豫地斥責吞納，“一、這些有關一個聯軍部隊的事件並沒有報告行政會議，這些事件只是根據他個人傳聞，並不可靠，並且，二、這些訴狀用了天津臨時政府的公文紙”。^③隔不多久，意軍司令官也命令意大利成員要求行政會議對於向意大利部隊提出同樣控告的具呈人加以懲處，因為這些控告已經證明是誣告。^④

① “天津臨時政府”，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② 同上，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③ 同上，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九〇一年一月二日、四日。

④ 同上，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十四 天津临时政府对于中国官员的管束

然而，对于中国官员，天津临时政府却采取了一种坚定而强硬的态度。在李鴻章前来就任直隶总督的时候，它对待李鴻章的态度，是根据瓦德西伯爵的明确的训令执行的，即“李鴻章可作为私人看待，而他的来临并不影响天津临时政府的工作。”^①对其他的官员也作同样的看待。知府（天津府）送来了一件他奉到委任的照会；行政会议向联军司令官们转呈这个文件时，签注意见说：“该知府显然并没有认识到他的国家对列强所处的地位，他的这封公文的形式，照中国习惯判断，是不庄重的，因而这封公文不应当认为是值得答复的。”^②在五月里，知府的上司，即管辖天津、河间两府的道台，前来就任了；行政会议把他唤来，命令他修改他以前所发出的某些告示，声明天津临时政府的辖区并不在他的管辖之下，并且在二十四小时之内退出天津临时政府的辖区。此外还要他去通知总督李鴻章，将来李鴻章如果再派来任何地方官吏，一定会被天津临时政府赶走。^③负有谈判和平的特殊使命的其他官吏，也被警告说，他们只能执行委派给他们的被联军当局认可的职务。^④

十五 八月十九日，李鴻章请求各国开谈判

当援军在八月十二日到达通州的时候，李鴻章就立刻重新提出和平谈判，并企图阻止它进入北京，^⑤可是没有效果。当各国使馆刚解围的时候，他在八月十九日电达各国，呼吁停止军事行动，

① “天津临时政府”，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二十九日。

② 同上，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③ 同上，一九〇一年五月十三日。

④ 同上，一九〇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三日。

⑤ 参看本卷第十章第十三节。

因为联军进军北京的唯一目的已经达到，并且要求谈判应该开始；而且在八月二十一日，他更加坚持地^①再度提出他的要求。在同一个时候，扬子江流域的两位总督请求了并且获得了一项保证，即是“当解决问题的时机来临的时候，一定会邀请他们发表意见并且郑重考虑他们意见的。”^②给李鸿章的一些答复，大概的意思是，只有在联盟国家经过协商并且获得公使们的意见之后，才能进行谈判；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要求却并没有受到理会。^③美国政府^④不接受这个停止军事行动的要求，因为联军并没有取得中国的帮助就已经达成了他们的目标，但是当中国在北京恢复秩序并且表示出它既有决心又有能力制止彼处及各处的战斗之后，它愿意支持一种停战；在这种情况下实现之后，它愿意在七月三日^⑤它所发出的同文照会的条件下，开始谈判。这就包含了一些条件——其中最特出的是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和维持门户开放，这些条件并没有明确地取得别的国家的同意；但是美国政府对于这个政策是从不动摇的。

十六 海陆军司令官们拒绝承认李鸿章

在应否承认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这个问题上，列强曾经在相当时期内具有一些相反的意见。显然，在谈判开始之前，李鸿章的全权证书是不能加以检验的；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曾经在八月八日，由驻在北京的帝国当局在那一天发出的上谕，被任命为全权大臣；

① “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一五页；法国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一三三、一三四页；“中国，第一号”，一九〇一年，第九九、一〇一页。

② “中国，第一号”，一九〇一年，第一〇〇、一〇一页。

③ 同上，第一〇一、一〇四页。

④ 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二日，亚弟(Adee)致伍廷芳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一六页。

⑤ 参看本卷第九章第三节。

虽則使館仍繼續在被围之中，这道上諭的效力是为中国官員所承認的，而对于中国官員的意見，列强也是不得不加以尊重的；后来在八月二十四日，在流亡途中的皇太后，又发出上諭，扩大了李鴻章的权力，还指派了庆亲王同他一起担任这个使命。^①在能够采取外交行动之前，塘沽的海軍將領們，或者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决定“在作为中国政府全权大臣的李鴻章到达塘沽的时候，就禁止他同中国当局有所往来。”俄国和美国政府立刻表示反对，后来据解释說，海軍將領只是采取了这个临时性的决定以便等待从北京公使們方面发出的明确的訓令。^②但是他們的行动，虽說并不符合于列强并没有同中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原則，^③却是同軍事情况以及軍事当局的态度完全一致的；这些当局拒絕承認天津的中国官員，^④如同他們的上司，將軍們和公使們过去在北京的做法一样。^⑤

十七 各国在承認李鴻章的問題上犹豫不决

在北京的公使們，以及他們的本国政府，在达成任何共同的協議上表現得很迟緩。^⑥英国政府在听取到它的公使的报告之前不

① 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二日、九月十日、十一日，伍廷芳致国务卿函，“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一四、二一頁。

② 同上，第一七——一九頁；法国外交文件，第一三三頁。

③ 参看第九章第四节。

④ 参看本章第十四节。

⑤ “看到中国官員在北京是不被容許或承認的，我想天津也会学样并且把黃某【参看第十四节】赶走；并且，事情既然如此，这就是正当行为。”——赫德致杜德維函，一九〇〇年九月七日。

⑥ “我給你送上我写給使节們的交还海关和領事特权文件的抄本：你不能想象，在这里要完成任何事情是多么困难。”——赫德致杜德維函，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日。

“現在还不能要求使节对交还海关問題作出答复——在这里要完成任何事情須經過一个月！……現在全部事情是混乱一团；最初大家好象是一条心——解救使节們。这事情办完以后，他們大家就分道揚鑣，只有天晓得結局会是怎样。”——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八日又函。

愿决定同李鴻章开談判；^① 俄国的决定也是这样；^② 唯一的給予明确答复的国家就是美国，^③ 它小心地表示同意——但中国的美国人协会却在九月三日提出强硬抗議，反对承認李鴻章作为和平談判人。^④ 英国公使的意見是，“除非中国的軍事力量已經涣散和完全崩潰，要想同中国政府进行認真的談判是沒有用处的”，^⑤ 而日本政府鉴于列强不愿接受李鴻章作为全权大臣，認為“列强立刻采取必要步驟去劝导皇帝和皇太后返回北京并組成一个負責的政府，这是絕對必要的”。^⑥ 公使們一般都相信“帝国政府的衰弱变得日益明显，而在中国当局行使主权的情况下恢复和平和秩序的可能也更加渺茫”；^⑦ 并且他們的大多数也都还没有接到訓令。本国当局意見的分歧使明确的訓令不能发出。^⑧

十八 九月六日，庆亲王企图开始談判

事态趋向于混乱，可是在这当中，却有一个人，赫德爵士，尽了他的最大努力去打开僵局。皇太后发出的私人文件要他充任全权大臣助理；但是他認識到了情况的变更，于是答复說，使团的成員必須全部是汉人和滿人。^⑨ 然而，他仍旧努力工作，到处寻訪庆亲王，他发觉了庆亲王在获鹿，但是“很难找到他”；^⑩ 更使他感到

① 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三日薩里貝利勛爵致贊納乐爵士函，見“中国，第一号”，一九〇一年，第一〇四頁。

② 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二日斯各脫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

③ 參看本章第十五节。

④ “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四日。

⑤ 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四日贊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見“中国，第一号”，一九〇一年，第一〇五頁。

⑥ 一九〇〇年八月三十日薩里貝利勛爵致怀特海函，同上，第一二七頁。

⑦ 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三日康格致海約翰函，見“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三三頁。

⑧ 一九〇〇年九月十六日康格致海約翰函，前引书第三四頁。

⑨ 赫德爵士給作者的私人記述。

⑩ 一九〇〇年八月三十日，赫德致杜德維函。

困难的是怎样使这位摇摆不定的庆亲王树起他的脊梁来。①庆亲王满怀惶恐，但是对于他的任务的艰巨并没有清楚的認識；②在这个困难期间他的記載是不清楚的；③但是他承担了他的使命，在九月六日拜訪了每一位外国公使。后来他又邀請他們举行會議，但是由于两个公使拒絕参加，这个企图是失敗了：俄国公使是因为曾經奉有本国政府从北京撤出使館的命令；德国代办則仅仅因为奉命代表德国政府进行談判的新任的大使穆默（Dr. Mumm von Schwartzstein）还没有到达。④这些原因也指出了两种相反的政策路綫。

十九 李鴻章延迟进京

当时李鴻章在哪里？北京方面急于要找到他，天天巴望着他到来——具有如此信心地在巴望，以致赫德把他的証書和公文放在手头，生怕他們在从天津来的路上碰不到他。⑤他仍留在上海，希望他奉派为談判人的身份会被列强所接受，也希望列强会决定

① “亲王一日、二日或三日将来此地，如果要求是过分沉重——我恐怕他們会这样的——他大概会变更态度并参加主战派的。董福祥一党主张坚持到底，不肯讓步——那么，这样子下去，就会是好几年的无政府和混乱状态。”——一九〇〇年八月三十一日又函。

② “我在四日看到亲王，那天早晨他去拜会使节。在他面前擺着一个艰巨的任务，我疑心他是否体会到它的严重：例如賠款，将来怎样償付呢？”——一九〇〇年九月六日又函。

③ “意大利人今天正在枪毙一个义和团头子，他是前任江南巡撫的儿子，并且，我想，他也是两位帝国翰林的兄弟——我相信，事实上这里每一个人都是义和团分子。庆亲王也是在他們的捐簿和礼簿上有名字的。枪杀克林德的軍士属于神机营（庆亲王的部队），他現在說他是奉到‘一个亲王’的命令开枪的！进一步追究就会查出这位亲王的姓名，假如这人就是庆亲王，那就会有一番大騷动，也会有更大的麻煩。”——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又函。

④ 九月十一日东京电訊，見“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九日。

⑤ 一九〇〇年九月二日、七日、十三日、十五日赫德致杜德維函。

軍事行动讓位于外交的时机已經到来。在这一点上他是失望了，最后他就决定，倘使不能被接受为全权大臣，那他就担任直隶总督的职位；在他乘坐一艘外国兵船的請求无望之后，就在九月十四日乘坐了一艘英国商船前往，十八日到达塘沽，二十日到达天津。他的总督印信不在那里，于是他就不得不等待到十月一日，才就任总督的职务。他到了天津之后，“非常生气”^①；在他停留期內，据报告他只同俄国人往来，并且曾經由俄国的騎兵警卫队护送他出游。他在十月三日前往北京。^②他早一点到达北京，对于中国是会有一些益处的，可是那个时候各国意見的分歧已經是很显著的了。

二十 八月二十八日俄国提出从北京撤退的照会

在八月二十八日，俄国政府曾經向其他各国发出一个同文照会，宣告說，“俄国并没有在中国取得領土的意图；同其他国家一样，俄国曾經寻求駐在北京的使节的安全并且协助中国政府平定乱事；适因与俄国边疆的必要防卫措施有关，俄国为了軍事目的^③曾經占領牛庄，在秩序一旦重建之后，如果列强的行动并不引起障碍，将会立刻撤兵；各国政府曾經合作以解救北京使館的目的已經达成；鉴于中国政府已經撤离北京，因而俄国的代表没有必要再留在彼处的这种情势，俄国已經指令俄国公使帶同他的使館人員撤至天津；俄国軍隊也将同样撤出；一俟中国政府重新掌握政权并提供列强能与交涉的权力，而且表示进行談判的愿望，俄国政府也将

① “我听說李現在非常生气，他更趋向于对別人下令而不是同別人商量，更不必說要他听从別人的話了；他的路过天津伤透了這個可憐的老人的心，也触怒了他。”——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一日赫德致杜德維函。

② “北华捷报”，一九〇〇年十月十日、十七日。

③ 参看本卷第十章第十节。

指派它的代表。”^① 俄国的外交大臣还进一步說，“他觉得严重担心的是，委托一个不大的国际军队担当重建和維持北京秩序的任务，因为北京現在已經不存在有中国政府，并且，只要外国军队駐留在那里，中国政府是不会存在的。”^②

二十一 联盟各国一般地拒絕俄国的提議

俄国从北京撤退俄国外交代表全体的意图引起了一場惊慌的感觉，全世界都在怀疑隱藏在这个行动背后的是什么。最为通行的見解是，俄国已經答应在李鴻章的外交攻势中支持他的主张，而以俄国能在滿洲自由行动作为报酬，^③后来几个月表現出来的趋势支持了这个見解。各国一般都是反对，有的是部分的，有的是全盘的。美国政府重新坚持它在七月三日照会中所提出的主张；它觉得可以确定，联军不應該从北京撤退，除非等到“中国政府已經重新建立，能够訂立新的条約，規定适当的賠償并为将来的保护提供保証”之后，但是它認為“北京的繼續占領并不会有产生預期結果的效力，除非是所有各国从此在旨趣完全一致之下团結起来，”既然“决定从北京撤兵的任何国家必然会在以后采取它自己的方法来保护它在中国的利益，”那么，这个危险就“会使总撤退成为上策

① “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一九頁；“中国，第一号”，一九〇一年，第一一三頁。

② 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九日斯各脫爵士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中国，第一号”，一九〇一年，第一二二頁。

③ “你看过十七日‘上海字林西报’的社論沒有，据说李为了北京的撤兵想把滿洲奉送給俄国？这也許是当前运动的關鍵。”——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八日赫德致杜德維函。

“我們在这里（上海）得悉，在李鴻章从上海到北京以前，他曾經同俄国代表洽商好，俄国應該竭尽一切力量阻撓联盟各国对于中国政府所犯罪行从中国索取賠償的企图，交换条件是中国默認俄国的占領滿洲。”——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华捷报”社評。

了”；因而它欢迎俄国关于领土的获得和牛庄的占领方面所提出的保证。^①法国在原则上接受俄国的建议，但是它认为，撤兵的问题只能由就地的司令官们来决定，并且说，“所要追求的主要目标是终止现在的局势，越快越好，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一个真正能够负责的政府的建立是必要的”；^②但是最后它却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俄国的提案。^③日本早就决定减少它的军队的不必要的大量兵员，但是，对于俄国的提案，却认为“对于列强来说，再有一个时候继续共同施行他们的军事压力，是聪明的办法。”^④德国并没有准备现在就从北京撤退它的军队。^⑤英国仍旧很深地陷在南非战事的漩涡里，因而并没有表示很鲜明的态度；政府在听取英国公使和司令官^⑥的意见以前，“并不能作出一个可靠的判断”；公使则表示惊愕，并预言说，“如果所有的外国军队现在就走开，那么对基督教徒以及一切过去表示过同外国人友好的中国人进行一次大屠杀，是一定会来到的”。^⑦于是政府由此就决定说，“从北京撤退英国军队的适当的时机，并没有到来。”^⑧

二十二 九月十七日俄国又询问 联盟各国的意图

除了俄国以及经过一些犹豫的法国之外，各国都不愿意从北

① 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九日觉书，见“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二十七页。

② 一九〇〇年八月三十一日蒙森爵士致萨里贝利勋爵函，见“中国，第一号”，一九〇一年，第一二八页。

③ 一九〇〇年九月十日萨里贝利勋爵致赫伯特函，同上，第一四七页。

④ 一九〇〇年九月七日怀特海致萨里贝利勋爵函，同上，第一三九页。

⑤ 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一日斯各脱爵士致萨里贝利勋爵函，同上，第一四八页。

⑥ 一九〇〇年九月三日萨里贝利勋爵致怀特海函，同上，第一三五页。

⑦ 一九〇〇年九月七日赛纳乐爵士致萨里贝利勋爵函，同上，第一四八页。

⑧ 一九〇〇年九月十日萨里贝利勋爵致斯各脱爵士函，同上，第一四六页。

京撤出他們的軍隊，從而松弛由于首都的占領，以及由于繼續向四周派出討伐隊的潛在可能而施加于中國的軍事壓力。于是俄國在九月十七日，向各國詢問幾點——一、它們究竟有無將它們的使館遷移到天津的意思；二、它們對於慶親王和李鴻章的全權是否認為足夠；三、它們是否準備同全權大臣們開談判。①美國政府答复說，一、它現在並沒有意思從北京撤出它的使館；二、它對於兩個談判人的全權初步認為是足夠的；三、它準備同他們發生關係。②英國政府的答复也具有同樣的意思；③但是德國照會的提出却使其他國家不大願意考慮這些問題了。

二十三 九月十八日德國要求先行 懲辦禍首的照會

在九月十八日，德國政府向聯盟國家發出一個照會，宣告它“認為，將那些可以確定曾經在北京發生的違反國際法罪行中充當最初的和真正的唆使人交出，應該作為同中國政府進入外交談判的先決條件。”從犯的數目是太多了，“將他們全部處決是違背文明人的良心的”；公使們可以指出那些罪行最重的人，但“不必讓很多人受到象主要的唆使犯和首腦們所受到的懲處。”它要求各聯盟國家訓令他們的公使“提出那些毫無疑問地犯有唆使或參預犯罪的主要中國人犯的名單”。④

① “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一年，附錄第二三頁；“中國，第一號”，一九〇一年，第一七二頁。

② “美國外交關係”，同上。

③ 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九日薩里貝利勳爵致哈定 (Hardinge) 函，“中國，第一號”，一九〇一年，第二〇〇頁。

④ 同上，第一七五頁；“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一年，附錄第二三頁。參看下文第三十五節。

二十四 德国在七月中的强硬态度

所有国家从一开始就承认德国在有关义和团叛乱事件方面享有优越的地位，这是由于它的公使被害的事实造成的；但是这种地位最初并不能在军事行动上表现出来，因为德国在远东并没有军队，只有很小的海军。主角必然归属于俄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能够立刻派遣大量的军队到战场上去；可是德国，却不愿意接受一个次要的军事地位，甚至拒绝比照奥地利和意大利的例子，在解救使节的警卫队中都不派遣一个携带着它的国旗的伍长。^①但是德国政府清楚地表示出它企图并向往在结束乱事和勒索赔款所必要的军事和外交行动上取得一个领袖的地位。克林德被害的确实消息在欧洲是在七月一日接到的，第二天就发出了命令组织一支七千人的海外远征军。这支军队的先遣部队于七月二十七日从不来梅港出发，对于这个部队德皇发表了一个誓师演说，其中关系德国政府一般政策的有下列文句：

“当你们遇到敌人的时候，你们就打败他。不许赐予赦免，不许收容俘虏。^② 让一切落在你们手里的人都听你们的发落。如同一千年前的匈奴人一样，在阿提拉(Attila)的领导之下，凭借了他们所取得的名誉在历史的传说中永垂不朽，德国人的名字在中国也要象这样的显赫，使中国人从此再也不敢对于一个德国人侧目而视。”^③

二十五 瓦德西伯爵被任最高统帅

除了奥地利之外，德国比任何一个联盟国家，在海外远征事业

① 参看本书第十章第九、二十七节及本书第三〇五页注①；见前第三、六节。

② 见前第十二节。

③ 一九〇〇年七月三十日“泰晤士报”转载自德国布萊門“魏塞日报”。这个演说

上都要少些經驗，在对非欧洲各国人民的处理上都要欠妥当一些，但是它的领导权利，在最初是一致承認的；于是德皇迅速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八月七日，各国接获通知說，俄皇曾經告訴德皇，“将在直隶省作战的俄国軍隊放在联軍最高統帥瓦德西伯爵的指揮之下，会使他感到异常滿意。德皇准备担負起这个任务，因为他有理由相信俄国以外的其他政府也将認為一个德国的最高指揮是有好处的，”日本在准备同意；而各国都在最高統帥問題以及他們是否愿意將它們在直隶的軍隊同联軍司令部瓦德西伯爵指揮之下的陸軍联合的問題上被征詢意見。① 答复似乎表示了对于自封领导的不高兴，但是又不情愿否定德国在这件事上的权利。俄国政府并没有表示出它有接受加在它头上的教父式地位的迹象，但是却通知了联盟国家，說它对于“这个想法是不会加以反对的”。② 法国政府答复說，为了保証一致努力，“当联軍司令瓦德西伯爵由于他的較高官阶使他将要取得的在將領會議上的特殊地位的时候，法軍总司令是一定能够同联軍司令建立正常的关系的。”③ 英国政府答

的精神是同德皇以前发表的意見保持一致的。在一八九五年，当日本表现了它的上升力量以及俄、法、德三国政府曾經共同压迫它归还辽东給中国的时候，他設計了一幅图画，在这图画中，有一角画着东方的佛坐在从融融火焰升起的黑云中的宝座上，另一角画着天空中有一个光輝灿烂的十字架，底下站着一些人象，代表着欧洲国家。有一个男象是圣迈克尔，手持寒光逼人的宝剑，呼喚着其余的人；其余七个都是女象，代表着各国，有的心甘情愿，有的不大情愿；有一个人正在竭力督促最不情愿的人，英国前进。原本送給了沙皇；翻印本——“遵照德意志皇帝和普魯士国王威廉第二的草图，克那克夫斯繪，一八九五年”——上面印有法文和德文的御笔題詞——“欧洲各国！保卫你們的财产！”

① 一九〇〇年八月七日拉賽尔 (Lascelles) 爵士致薩里貝利勳爵函，見“中国，第一号”，一九〇一年第六〇頁；同日，杰克逊 (Jackson) 致海約翰函，見“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三三一頁。參看下頁注④。

② 一九〇〇年八月八日斯各脫爵士致薩里貝利勳爵函，見“中国，第一号”，一九〇一年，第六四頁。

③ 德賽加賽致波蒂昂 (Boutrion)，一九〇〇年八月十四日，“法国外交文件”，一九〇〇年，第一二五頁。

复說，它将“极其愉快地同意”，并且“看到所作出的安排使这样一个杰出的軍人成为国际部队的首脑觉得非常滿意。”^① 美国政府“非常愿意获得象瓦德西这样一个杰出的和有經驗的將領来担任任何联合軍事行动上的指揮，”但是希望将有关方法的問題在发生时随时解决。^② 日本的接受显然是由于瓦德西伯爵将是在中国的官阶最高的將領的关系。^③ 意大利和奥地利都毫无保留地接受。

二十六 九月二十五日瓦德西到达天津

瓦德西伯爵是一个杰出的軍人，別的国家的人在他的指揮之下作战，如果单纯从这一点来看，那是值得驕傲的。他在一八七〇年战事中有过良好的战績，曾經是总參謀长毛奇 (Moltke) 的助手，一直到这位伟大的战略家逝世的时候为止；后来他被任命为第九軍团的司令；他曾經屡次担任过帝国秋操中一軍的指揮官；并且在一九〇〇年他曾經是五个軍事檢閱官之一，官阶是元帅。經過很多典礼之后，他在八月十九日离开柏林，在九月二十五日到达天津。在那些典礼中，曾过分強調了他的最高指揮官的职位，^④ 过分渲染了嶄新的德国国际地位。在天津他駐留到十月十五日，随后

① 一九〇〇年八月九日薩里貝利助爵致拉賽尔爵士函，見“中国，第一号”，一九〇一年，第六六頁。

② 一九〇〇年八月十日亞第致杰克遜函，見“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〇年，第三三一頁。

③ 指林男爵，見薩里貝利致怀特海函，一九〇〇年八月九日，見“中国，第一号”，一九〇一年，第六七頁。

④ 在加塞尔 (Cassel) 的德皇于八月十八日授予瓦德西伯爵以元帅节鉞，他在致詞中有这些詞句——“我祝賀你成为文明世界联軍的首領……我为这样一个事实而欢呼，那就是，当大俄罗斯皇帝提議之后，所有的文明世界毫无異議地都欣然拥戴閣下为它的部队的統帥……为了我們人民的利益，我盼望我們共同的远征能够成为推动欧洲各国相互尊重和相互和平的坚强的保証，如果这样，那么我們过去不曾从和平方法获得的东西，或許将来就可以用我們手里的武装去获得。”——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日，“泰晤士报”。

他前往北京，在十月十七日进城，于是他以联军总司令的资格，在中国皇宮內設立了他的司令部。他的命令中有一个是这样的，凡是关系大家利益而以前交由将領會議或分別交由各国司令官处理的事件，例如关于天津临时政府之类的事件，應該直接呈遞給他，由他再交与将領會議中他的同僚；^①但是英国統帥(別国的无疑也是这样)却明白要求說，在軍事以外的事件，應該直接递交与他，不必經由瓦德西伯爵。^②

二十七 瓦德西的任命为其他联盟 国家冷淡地予以接受

安排瓦德西伯爵作为最高統帥的提案是被各国政府一致附和的，从英国接受时所表现的溫暖直到法国的冷淡；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会贊同这样一种傲慢的說法，即他的任命是以德国公使遇害这一原因之外的其他原因为基础的自然权利；在中国接受他的地位是勉强的，也并不完全一致。在英国方面，由于它記得德皇打过电报給克魯格总统 (President Kruger)，由于实际上不易阻拦向波尔人运送軍火的德国船只，以及由于在德国报纸上流行着的一个活跃的反英运动，它有各种理由愿意同德国政府和睦；因而在中国的英国軍事当局是忠实地服从这位最高統帥的。至于俄国，它的沙皇已經被确定是原来的提案人，可是它有自己的野心，它决不会承諾服从这位最高統帥，并且早已就向各国建議停止一切的軍事行动以及从北京撤退它們的部队；它在远东的軍隊的数目也能够使它追求它自己的目标。日本供給了曾經解救使館的远征軍的主力，并且，在滿洲以外，那就是在直隶，它的部队差不多等于所有其他联盟国家兵員的总和；現在期望它将它的軍事行动服从于一个

① “天津临时政府”，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② 同上，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解放使館上沒有出过力的国家的政策，自然要使它担心推行德国政策的行动，可能引起它同俄国的冲突，而俄国是日本总要有那么一天同它发生冲突的国家；現在，正如在七月間一样，^①它在还不能明确地看出其終点的道路上勉强地迈出了步子。奥地利和意大利接受了这位最高統帅，但是它們所供应的兵員合起来也只是一个小数目。法国可以接受一个德国人作为一个軍事會議的首腦，但是並沒有意思，而且也不能期望它讓他来指揮它的軍隊。美国在所有的联盟国家中，是一个不能怀疑其在中国有領土想望的国家，因为这样，它并不害怕任何政治的紛扰会影响到它的利益；但是美国的政策是尽可能的避免协同行动，只在其他办法都沒有效驗^②的时候，才贊成合作；因而美国軍事司令官的服从最高統帅的指揮也几乎是名义上的。^③

二十八 中国军队的分散

北京攻下以后，中国军队分散了。在初期，据报告天津附近有不時出沒的散股，虽然他們已經不成为威胁的力量；^④但是通常他們总是四散逃遁的——除非他們並沒有碰上敌人。关于他們的动向一般得不到报告，除掉发生过两次“拳民和部队”的潰軍，企图退回山东，被袁世凱的部队打敗，損失惨重，仍旧折回的事情：一次发生在八月二十三日，在山东的西北角，靠近德州的地方；一次发生在十月八日，在直隶东南，靠近滄州的地方。^⑤在八月二十九日，

① 參看第十章第六、七节。

② 參看第二章第五、十一节；第八章第二一三頁注④，第十六节；第十章第八节。

③ 九月十一日司令官會議，“法国、日本和美国的將領們說，他們并不曾接到讓他們自己服从元帅指揮的明确的命令。”——向高級副官的报告，見美国陸軍部报告，一九〇一年，第四章，第四八三頁。沙飞將軍在一九〇〇年和杜威(Dewey)海軍上將在一八九八年对于干預他們的作战或他們对自己部队的控制权的国外軍官，曾經采取断然的步驟并且使用粗野的語言。參看本卷第三〇二頁注①。

④ “天津临时政府”，散見各号。

⑤ 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九日，十月十七日，“北华捷报”。參看本章第十二节。

羅馬天主教徒，在獻縣被圍困了兩個多月，為直隸布政使廷雍指揮下的軍隊所解救，廷雍當時在保定府代理着總督，急於想給自己造成一個積極反對義和團的名聲。^① 帝國有組織的軍隊已經向西逃遁——西南逃向保定府和山西，西北逃向張家口和口外一帶；還有大量的軍隊，包括董福祥和他所部甘肅軍隊，護衛了車駕在從太原府向西安府的途中逃亡。

二十九 援救北京附近的教徒

北京城本身就義和團，^② 但是沒有多久他們就屈服投降了；在近郊四鄉中也都有義和團，劫掠着和恐嚇着村莊；^③ 在比較遠一些的地方有散兵游勇；更遠一點的地帶還有維持原來編制的帝國軍隊。赫德寫道——“我預料到在聖誕節會看到北京完全被包圍起來——一個大圈子，但是這種圈子會影響供給和交通。”^④ 軍事當局看到這個危險決定加以處理，但是，甚至在他們採取有組織的行動以前，剛剛從浩劫中逃得余生的教士們，就採取了步驟去解救在四鄉村莊中的教友，這些人也是曾經被迫害過和經歷過很多艱險的。在這些遠征中，教士們必須由武裝的衛兵護衛，他們還因此受權迫使那些曾經犯有屠殺或虐待基督徒罪行的村莊接受條件；同時，他們還能夠使他們自己成為檢察官和審判官，並執行他們自己的法庭的判決；他們的行動引起了許多不利的評論，特別是在美

① “北華捷報”，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九日。參看第十章第一節，本章第三十二節。

② 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九月六日，赫德致杜德維函。

③ 參看本卷第三〇九頁注①②。

④ 一九〇〇年九月六日赫德致杜德維函。

国，因为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是美国人。^①但是，虽说他们行使权力很严厉，却行使得很公道；并且他们判定的惩处几乎全都是罚款，这些罚款是用来充作供应同一村庄中贫苦的教友们食粮的，否则那些人在行将到来的冬天就一定要挨饿了。

三十 北京、天津近郊的肃清

军事当局最初几乎集中了全部的力量来恢复北京和天津的秩序，他们并没有派遣军队到乡间去。在九月八日，派出了一个混合纵队到天津以南十五英里的一个义和团的中心独流去，并且焚毁了这个地方。在九月十一日，一支由一、七〇〇德国人组成的军队从北京出发，开往距京汉铁路起点约十五英里的良乡；在遭遇顽强的抵抗之后，它攻克了这个城市。在九月十六日，三个纵队，一个是英美的，一个是德国的，还有一个是日本的，从北京开拔，向京以西十八英里的三家店进军；一个兵工厂被毁灭，两个作为义和团司令部的庙宇被焚毁；并且作为对于六月九日^②英国使馆避暑处的被焚的惩罚，一个塔被炸毁；拳民们是逃遁了，原因是德国纵队没有联络得上。^③这些就是直到瓦德西伯爵到达天津时为止的唯一有组织的远征军，并且他们鲜明揭出的唯一的目的是将敌军

① 一个美国教会对于通州附近乡村曾经有过下列内容的要求。在二十三个村庄中有教友一六六人被义和团杀害，教友房屋一八四座被毁坏。为了补偿，这些村庄被判处一六、一五〇两银子的罚款（用作救济村庄内的灾难）并拨出田地九十六英亩；它们又被责令重建十九座小礼拜堂，偿还过去被破坏的教友们的财产，还被责令划出墓地二十处。但并没有为教会要求财产。——十月十日托克斯伯莱（E. G. Tuoksbury）语，引自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三日沙飞将军致康格函，见美国陆军部报告，一九〇一年，第四章第四五三页。

② 参看第八章第十一节。

③ “日本部队照预定时间到达他们的地点；德国人届时却完全没有出现。这是用一个很大的远征军去达成一个很小的目标。”——致美国高级副官报告，前引文件，第四八四页。

驅逐得离开北京和天津更远一些，便于他們取得粮秣的供应；在这个时期以后，德国照会中所表明的膺惩政策，造成了討伐队的大量增加以及对于許多城市实施的报复惩处。

三十一 九月二十、二十九日北塘和 山海关炮台的占領

然而，就是在联軍最高統帅来到以前，联軍司令官們也曾經决定，如果北塘和山海关的炮台保留在中国人手里，他們軍事地位的安全是一定保不住的。那里的駐防兵在所有动乱的期間毫无活动，所巴望的显然只是不要受到侵犯就好；但是秦皇島却是唯一的不冻港口，在三个月冬季中，外国軍隊可以在那里和外界保持往来。經過一个仅仅名义上的抵抗之后——这是李鴻章发出的命令所收的效果，北塘各炮台在九月二十日由六国国家組成的联軍攻克，美国人和日本人并没有参加作战。① 山海关和秦皇島的炮台，发觉已經在李鴻章的命令之下被它們的守軍放棄，山海关的主要炮台实际上已經在九月二十九日被英国炮艦“侏儒号”（Pigmy）的十七个人所占領。北塘七个炮台，秦皇島一个，山海关五个，都分配給各国（俄、日、英、法、德和意大利），由它們分別扼守，但这却是为了联軍共同的利益。② 虽說这种行动为了保持交通綫通暢是必要的，人們还觉得在这种行动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③。

① 英国人和意大利人参加实际的攻击太迟了，那地方在預定時間以前就已經接收了。

② 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六日，十月三日“北华捷报”；“中国，第一号”，一九〇一年，第一七八頁；“中国，第五号”，一九〇一年，第三頁。

③ “就北塘來說——着手不嫌有点太迟了么？并且它在解救北京等等上究竟有什么用处？这或許是另一个在演变和发展中的外国計劃和食欲的节目的开始。”——赫德致杜德維函，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三十二 十月派往獻縣和保定府的討伐隊

瓦德西伯爵的出場，在軍事行動上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十月八日，一支一千人的法國部隊從天津向南進軍，解救了喀塔（譯音，原文為 Kata）的教會，“那里的一、八〇〇個教徒已經被大批的義和團隊伍緊密地圍攻了並且經常地攪擾了三個多月”；摧毀了那些“積極參加屠殺基督徒”的村莊；並且留下了兩個連隊在冬季保衛獻縣的教會。同時另外一支法國軍隊向保定府進軍；他們在路上或在那城市都沒有遇到抵抗；因而就在十月十三日進城，救出了一些被布政使廷雍的部隊所看管的教士；他們又拯救了在正定府的教士。①在十月當中，一支由德國兵、法國兵、英國兵和意大利兵三、五〇〇人組成的縱隊從北京出發，另外一支由德國兵和法國兵組成的縱隊從天津出發，他們在十月十八日到達保定府。因為城池早已被從獻縣開來的法國縱隊所佔領並且是在法國人的管理之下，於是聯軍就等待中國駐防軍的撤走。這個，由於追隨李鴻章政策的關係，是辦到了；蓋斯里將軍當時曾經想同一位外面派來的道台談判解決，可是失敗了；（中國）部隊就被迫在二十日退出城去。於是組織了一個國際的軍事法庭去研訊七月一日的殺害傳教士案件；②它將布政使廷雍、滿將軍和曾經將那想在他的營盤避難的傳教士們逐走的營管帶判處死刑。廷雍“在整個一年中曾經是義和團運動的贊助人”③，但是後來又曾經想用鎮壓拳民的办法來恢復他的名譽；但是對於這三個人的判決却都執行了。道台譚文煥被解送天津，他在那里被審訊判罪，在十二月七日被行刑斬首，

① 海關十年報告（天津），一八九二——一九〇一年，第二章第五二四頁。

② 參看第九章第十五節。

③ 史密斯：“中國在動亂中”，第二章第七一四頁。

他的首級还被悬挂示众六天。^①除了这些之外，城門和城墙的一角被拆除了，两个与杀害案件有关的庙宇被拆毁了，一宗一〇〇、〇〇〇两銀子的罰款被征課了，并且在藩庫里发现的二四〇、〇〇〇两銀子也被抄沒了。一支由二、〇〇〇名德国兵和一、二〇〇名法国兵組成的駐防軍在冬季駐防城內。^②在主力撤退时，一个支队派到六月一日杀害案件^③出事場所的永清；它拆毀了一个城門和三处庙宇，并且征收了一笔四〇、〇〇〇两銀子（四、〇〇〇两現款，三六、〇〇〇两是立了契据）^④的罰金。这宗款項是充作救济永清灾难的专款的。^⑤保定府远征軍部队的行为，曾經成为一个由李鴻章提出的官方抗議的題目；美国、俄国和日本的公使不加理会，因为他們的国家并没有軍队参加；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公使，“鉴于这位总督的公文的口气是完全應該駁斥的，因为我們同他并没有公事上的关系，因而决定将公文退回給他。”^⑥

三十三 德国陸續派出远征軍；其他各国的态度

在这以后，各国一个接着一个开始不贊成这些远征軍，只有德国对于它們坚持到底。从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十二日起，到一九〇一

① “天津临时政府”，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五日。

② 海关十年报告，見前；美国陸軍部报告，一九〇一年，第四章，四六〇頁以后。

“保定府的作为，我恐怕，将会玷污我們，使我們在中国人的估价中永久是毫无信义的；我們得到亲王下令中国士兵避开，官員出来以友好态度相待；我們却轉过来审讯了一大批官員，加他們以判决等等，如果所传是实，那么下一个步驟就是洗城了！真是卑鄙透頂的事。”——赫德致杜德維函，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六日。

③ 參看第八章第六节。

④ 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八日薩道义爵士致薩里貝利勋爵函，“中国，第五号”，一九〇一年第一五五頁。

⑤ 史密斯：“中国在动乱中”，第二章第七一七頁。

⑥ 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五日薩道义爵士致薩里貝利勋爵函，“中国，第五号”，一九〇一年，第一五三頁。

年四月底，一共派出了四十六支远征軍；有三十五支只是由德国部队組成，还有四支只是由意大利部队組成，其他七支是由各国混合組成，不过其中有为了处理新乱事而派出的美国和英国的部队各一支。^① 在这些远征軍中俄国都沒有参加；他們的政策很明显——占領沿海地方（他們后来也参加了北京和天津的占領），要求中国当局去弥平他們自己的混乱。这也是日本的政策，不过这也許由于其他的动机，他們只在极少数几支远征軍中参加一部分人，并且参加得很勉强。法国同俄国密切地結合在一起，他們的行动倒符合于李鴻章下給中国將領的命令——那就是要他們絕不抵抗，在一切場合只要碰到外国軍队就撤退。有一次法国人曾經同德国人协同行动，他們在危难的場合組織后备队，而使德国人担当出击的主力；又有一次，法国司令官也同德国人合作，派出軍官要求中国統帥撤退，后者答应了，于是使德国人贏得了一个便宜的胜仗。^② 英国維持了完全一致行动的外貌；但是在全部的討伐战役中，盖斯里將軍除了派出一个軍官和一班卫兵到远征軍中去作为本国旗帜的标志以外，就沒有作更多的事情；并且在一月一日政府表示它的意見說，“由于期待着談判，除非中国人的行为有必要使我們派遣軍队以外，不應該再派出远征軍。”^③ 美国是不贊成这种政策的，也沒有意思在政策的执行上进行合作。沙飞將軍曾經命令說，在一切場合，“我們的部队在放出第一枪之前，必須已經被射击了，并且一般地說，不應該破坏財產”；他又报告說，“美国部队並沒有参加两次中任何一次的远征〔一次是十月間派往保定府的，一次是十

① 北京皇宮德軍司令部一九〇一年五月十日发布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十二日至一九〇一年五月十日联軍所有远征軍花名册，見美国陸軍部报告，一九〇一年，第四章第四九五頁。

② 海关十年报告，第五二六、五二七、五二八頁。

③ 一九〇一年一月一日兰斯东勋爵(Lansdowne)致薩道义爵士函，“中国，第六号”，一九〇一年，第一頁。

一月間派往张家口的], 我的意見是, 由軍事行动造成的这个国家的混乱愈少, 那么由外交上要求对所犯罪行安排充分賠償的机会就来得愈快, 并且还有更进一步的理由, 就是所有的消息都指出了中国人有組織的武装抵抗已經完全崩潰。”^① 美国軍方的意見是, “德国的分遣队沒有来得及加入解救使館的远征軍, 他們是和大多数的軍人一样, 渴望进行实际的战斗, 于是这些远征軍就供給了壓足他們欲望的唯一的园地。”^② 美国人民的意見在一篇社論中有很好的表述, “无可避免的結論是, 实现中国和平的最大的唯一的阻碍就是德国的不愿講和的态度……在侵略和作恶方面, 当首推德国。”^③

三十四 在部队調动上反映的官方态度

官方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在部队的調动方面。在十二月初, 据各有关司令官的报告,^④ 在直隶省有以下的部队, 但是需要注意, 按照对于政治不大感觉兴趣的美国軍官們的意見, 这些报告是言过其实的。^⑤ 俄国有三十七个連队和中队, 总数可能有五、五〇〇人; 其中有二十五个队駐在山海关和沿鉄路綫一带, 只有两队

① 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沙飞將軍致副官函, 見美国陸軍部报告, 一九〇一年, 第四章第四五〇頁。

② 达格特: “解救駐华使节远征軍”, 第一四一頁。

③ “紐約民族”, 一九〇〇年十月十八日。

海約翰在国务院的一位同事写信給他——“早已安排妥当的瓦德西的来到似乎是一个劫数。危险的是在德皇大放厥詞之后, 他为了証明任用瓦德西的正当, 也許覺得有引起一場乱子的必要。”作者补充說——“这也是海氏的意見。”——泰耶尔: “海約翰的生平和函牒”, 第二部, 第二四五頁。

④ 一九〇〇年十二月, 联軍在北直隶花名册, 駐东亚陸軍司令部, 北京 皇宮, 十二月十一日, 見沙飞將軍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十九日致高級副官函, 載美国陸軍部报告, 一九〇一年, 第四章第四八八頁。

⑤ 美国陸軍部报告, 一九〇一年, 第四部, 第四四六、四八三頁; 达格特: “解救駐华使节远征軍”, 第五七頁。

駐在北京；并且“到一九〇一年一月一日，俄国军队的大部分都要从北直隶省撤出”；但是关于它在满洲的大量军队却没有报告。德国有七十二个连队，总数可能在九、〇〇〇人到一一、〇〇〇人之间；其中至少有四十九个队駐在北京和保定府，十九个队駐在天津。法国有七十六个连队，約有九、五〇〇人；其中有四十个队駐在北京和保定府，十八个队駐在天津。日本有三十个连队，大約有四、〇〇〇人；其中有十七个连队駐在北京。意大利有十八个连队，二、〇〇〇人，十三个连队是駐在北京。英国有一一三个连队，大約有一二、〇〇〇人，除了炮兵和四五〇名水兵之外，全部是印度部队；其中有四十五个连队駐在北京一带，五十个连队駐在天津以及十八个连队駐在山海关。美国有十六个连队，一、八七六人，^① 其中有十三个连队駐在北京和三个连队駐在天津；在九月底美国军队数目有五、〇〇〇人。^② 美国只保留了一个使馆卫队；其他各国維持了它們对于山海关的占领，以免它被俄国拿去追求它的自私的目的，但是在别的地方各国的目的又是不一致的。英国保持了一种等待的态度，它已經大力增加了它的部队，但是并不参加远征軍。日本縮减它的部队到它以前最高数字四分之一以下，它也同样拒絕加入远征軍。意大利集中了它的微小的军队在北京，准备寻找任何机会。法国是同德国合作的，但是它的行动用在保护教会和京汉铁路方面，在支持俄国政策方面，要比討伐方面来得多。德国集中了它的力量在北京，它独自全心全意地推行討伐性的远征的政策。

三十五 各国对于九月十八日德国照会的态度

这种暴露說明了那些必須考虑德国照会的各国当局的心理状态。^③ 美国政府回答說，它已經完全确定要“追究对于过去任何罪

① 达格特：“解救駐华使节远征軍”，第一四三頁。

② 同上，第一三五頁。

③ 見本章第二十三节。

行須要負責的當局的最大責任”；並且“相信對於他們的懲處將是任何有效的解決的一個重要的因素”；但是它又“認為沒有別的懲處辦法能夠……比由最高帝國當局本身對於負責當局的懲處和革職更為有效”；而這樣一種懲處的要求“實質上是在磋商最後解決辦法的談判中所要包括和準備的一個條件”；因此它主張立刻開談判。^① 日本政府在原則上贊同這個照會，但是對於它實際上的效果他們卻“預料有重大的困難”，並且提議進一步交換意見。^② 俄國政府認為提案“有點不確定”，並且“提出劊子手的任務，如果有必要的話，最好應該由中國政府擔任。”^③ 法國、意大利和奧地利採納了這個提案。^④ 英國政府答復說，它完全体会到提出提案者的心情，但是它不願意作出除非懲處執行之後不能開談判的諾言，因為懲處“不是用我們的權力可以執行的。”^⑤

三十六 九月二十五日中國頒發上諭懲辦禍首

在九月二十五日中國皇帝發出上諭，庄親王和怡親王以及貝勒載濂和載瀼都革去爵職，端郡王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尹議，並着停俸；載瀾公爵、英年、剛毅和趙舒翹都交都察院吏部議處。^⑥ 德國政府於是發出第二個照會，主張聯盟各國應該訓令它們駐北

① 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一日希爾致斯丹堡男爵(Baron Speck von Stlernburg)函，見“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一年，附錄，第二四頁；“中國，第一號”，一九〇一年，第一七九頁。

② 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二日，懷特海致薩里貝利勳爵函，見“中國，第一號”，一九〇一年，第一八〇頁。

③ 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日哈定致薩里貝利勳爵函，前引，第一八四頁。

④ 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四日拉賽爾爵士致薩里貝利勳爵函，又九月二十三日赫伯特致薩里貝利勳爵函，前引，第一八五、一九七頁。

⑤ 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五日薩里貝利勳爵致拉賽爾爵士函，前引，第一八七頁；一九〇〇年十月二日又函，見“中國，第五號”，一九〇一年，第二頁。

⑥ 一九〇〇年十月二日伍廷芳致美國國務卿函，見“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一年，附錄，第二五頁。

京的公使呈报以下各点：(1)上諭所包含的应予惩处人員名单是否完全和正确；(2)所提惩处是否和所犯罪行适合；(3)各国在何种状态下能够监督这些惩处的执行。①

三十七 九月二十四日俄国着手吞并满洲

經過在解救使节上的暫时的团結之后，現在各国很明显地在追求着各自的目的。俄国是采取积极步骤以达到其政策目标的第一个。在九月二十四日俄国部队攻击并占領了牛庄的中国城市，在二十六日攻占了鞍山县，以及在二十八日攻占了辽阳；在十月二日他們又占領了奉天府，在四日占領了鉄岭；在十月六日他們穿过了牛庄的条約口岸营口，到达河的西岸，并且占据了中國沟帮子鉄路的終点站；并且在十日占据了田庄台。②于是他們在两个多星期的短短战役中，将南滿的全部，南起旅順港，北至鉄岭，西面远达北京山海关新民府鉄路，都攫取到他們手里；由于中国軍队已經处在瓦解状态，他們曾經有效地建立了直到直隶边境为止的整个占領地区的統治，③但是山海关却逃脫了他們的手掌。因为追随李鴻章的节节撤退政策，山海关的駐防軍已經从守地撤出，在駐軍撤出以后不多几个小时，俄国軍队就开到，他們仅仅比“侏儒号”的登陆部队迟到一个小时，“侏儒号”的兵員占領了它并且在上面升起英国国旗，因而为联盟各国取得了这个要塞。由于它在天津的优势，俄国攫取了从天津到北京的鉄路，但是却被迫交出，由各国共同使用和占領，还有唐山煤矿，由于德璀琳对于俄国当局的

① “美国外交关系”，第二五頁；“中国，第五号”，一九〇一年，第三頁。參看第十二章第七节。

② 牛庄通訊，一九〇〇年十月十七日“北华捷报”。

③ “俄国正在进行吞并滿洲，沒有遇到重大的障碍”——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七日“北华捷报”社論。

影响，才得归还中国原主张燕謀；^①它又攫取了天津到山海关及其以北的鐵路，这一条路仍旧保持在它的手里。在十一月底，它仍旧拒絕交出，并通知英国政府說，只有在它的占領費用被偿付的条件之下，它才能够同意这样办；^②在一九〇一年二月之前，它对于这条路的掌握一直沒有放松过。^③

三十八 十月四日俄国在牛庄的行动

牛庄的港口营口，在八月四日被俄国部队占領，他們在海关和炮台上悬挂了他們的海軍旗。^④他們发出一項保証說，“暫时的管理……并不干犯各国和中国以前在营口所享有的权利和特权”^⑤；但是，照八月九日公布的規章，俄国管理机关是隶属軍事当局的，而中国海关又放在它的監督之下，海关稅收被拨充开支它的費用的专款。^⑥在十月四日，在海关房屋上悬挂的俄国海軍旗換了俄国的海关旗，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变化，虽然政治局面限制了各国及时提出抗議；但是中国公使却曾經向英国政府保証說，关于“俄国的占領滿洲，中俄之間曾經达成一个協議的說法，并不是事实。”

三十九 十月四日俄国在天津的侵略

在天津的俄国当局將它們的目的作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說明。

① 十月二十五日天津電訊，見一九〇〇年十月三十一日“北華捷報”。

② 十一月二十四日又電，見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前報；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泰晤士報”。

③ 參看本章第四十一節。

④ 參看第十章第十節。

⑤ 一九〇〇年八月六日阿列克謝也夫海軍上將致富爾福德領事函，見“中國，第一號”，一九〇一年，第一九二頁。

⑥ 一九〇一年一月十五日蘭斯東勳爵致薩道義爵士函，見“中國，第六號”，一九〇一年，第一三頁；但須參看本卷第三二六頁注③。

在外国人居留地被围的时候，守卫着它的俄国部队多于其他一切国家；在六月二十三日的增援中，俄国人的军力也比较雄厚，正象他们过去派去援救西摩尔远征军的军队时一样；甚至在派出北京解围军之后，俄国军队留下来的也多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在天津外围作战中，俄国人担任河东岸的防务，他们在那里扎了营，占据着英国和法国租界对地面的地面，在这个地面中有火车站和车站的岔道。这条铁路是在中国人管理之下的，外国人并没有控制它，但是它却曾经向英国银行举借过抵押放款。^①当俄国军队驻扎在天津的期间，俄国当局并没有忽略他们的优势地位：因此，例如，在天津临时政府各部门职位的分派上，俄国代表当作权利一样，要求作为整个机器枢纽的秘书长的职位，这个要求被他的同僚们应承了。^②在十月四日，英国统帅通知天津临时政府说，“俄国兵曾经阻止一个英国军官在英租界对面河东岸地面上架设野战轻便电报线的工作，理由是这块土地是属于俄国的”；他认为“俄国对这块土地并不比其他国家享有更多的所有权，它是在临时政府管辖之下的”；于是他请求天津临时政府干涉。^③

四十 十一月六日俄国要求在天津的租界

俄国司令官答复说，他是遵奉阿列克谢也夫海军上将的命令办事的，天津临时政府应该将这个问题向他提出。^④上将是在满洲，事情拖延了一个月时间，由于英国哨兵和俄国哨兵在巡逻时是犬牙交错的，所以“一把刺刀插进去，不管是偶然的或有意的，那就象是火上浇油。”^⑤俄国当局在十一月六日发出一个同文照会，肯

① 参看第四章第十一、十五节。

② 同上，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三日。

③ 同上，一九〇〇年十月四日。

④ 同上，一九〇〇年十月五日。

⑤ 诺曼·司徒亚特：“我的服役时期”，第三四〇页。

定地說，“既然六月十七日中国朝廷的部队曾經联合义和团袭击由俄国部队占据的外国租界和火車站，并且是由于六月二十三日俄国的增援，才解除了封鎖，扫蕩了白河左岸……以及依靠武装力量和俄国人流血牺牲的代价才得以占有，从而确定了他們自己的征服的权利”；那么这块长约两英里包括着火車站在內的土地，就已經“成为俄国部队通过六月二十三日的战事行动而取得的财产”；因而它被宣告是在俄国单独控制之下的土地。① 一个国家的哨兵在爭执着这块土地上的控制权，那么从这个国家来的抗議，就一定要成为一桩极其严重的事情，并且“在这爭执的場合，德国人和法国人，一定会急急忙忙地起来援助哥薩克人”②；但是美国公使却竭力反对这种“攫取”行动，認為这将是从小糾紛开始起联盟国家所达成的一切协約上的一个裂縫，并且着重指出，“現在，在联軍在中国的当前行动之下，还有更强有力的理由說明为什么这块包括着一个很重要的公共火車站以及其他财产在內的有广大面积的土地，必須由各国公用，而不应该被单独一个国家占为私有。”③

四十一 俄国坚持要求，反对抗議

俄国公使，用了似乎只有俄国官員說得出的异常矛盾的語言答复說，“既沒有由于俄方的征服而取得領土的問題，也沒有对于火車站的占領的問題，”因而，假如那个照会“所包含的任何辞句能够使人作这样的解释，那一定是在行文遣字上有了錯誤。”④ 但是这位公使显然并不完全了解他的政府的意图；所以，在答复美国駐天津領事前述的抗議时，他被告知說，“关于这个事件的一切

① 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六日俄国照会，見“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第四一頁。

② 前引司徒亚特：“我的服役时期”。

③ 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四日康格致格尔思(M. de Giers)函，前引，第四五頁。

④ 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格尔思致康格函，同上。

問題需要同俄国軍事当局洽商。”^①俄国的爭执最后是得胜了；于是一块将近一、〇〇〇英亩的带有一一、〇〇〇英尺沿河地带的地面，变成了一个俄国租界；但是这个糾紛的根子，从北京到山海关的鐵路，却由于圣彼得堡的談判以及作为总司令的瓦德西伯爵的决定这双重行动，在一九〇一年二月移交給了英国当局；由于这一个轉变，包括火車站及其設備在內的地面就又保留在中国人管轄之下。^②

四十二 各国在天津爭夺租界

象这样开始的“攫取”竞技，其他各国也相繼效尤。这里从一八六一年起，本来产生了三个租界，英国的、法国的和美国的；在美国租界中从来沒有实行过美国的統治，但是对于它的权利美国也沒有正式放棄。这个口岸的商业主要是集中在英国租界，它有一条三、〇〇〇英尺的沿河地带；这个租界在一八九七年向西扩展，增加了七〇〇英亩的面积，但是所扩展的面积中有五五〇英亩并不是以“租界”名义，仅只是以“居留地”或“居住备用地”名义划予的。在一八九五年又划了一个德国租界，它坐落在美国租界沿河的下流，有河岸綫五、〇〇〇英尺；在一八九六年，在法国租界和天津城近郊之間又划了一个日本租界。这些都是在中国貿易中有利害关系的商业国家；而現在，俄国开一个头，其他各国就跟上来了。在十一月七日，俄国同文照会发出之后的一天，比利时領事发出一件正式通知說，比利时当局要求一个比利时租界，它将处在俄国租界沿河的下流，有一公里河岸綫（三、三〇〇英尺）和二三八英亩的面

^① 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五日波普（Poppe）致拉格斯德（Ragsdale）函，見“美国外交关系”。

^② 关于鐵路和車站糾紛全貌，散見于“中国，第七号”，一九〇一年，可参看一九〇一年二月十五日瓦德西的决定，在一二二頁。

积。① 于是接着法国当局就要求将法国租界向西扩展到泥墙；② 意大利人要求在俄国租界前面有一个意大利租界；③ 奥地利人要求在意大利租界前面有一个奥地利租界；④ 而日本人也要扩充日本租界，将他們原来的租界扩展到天津城根，包括着广大的中国人的近郊，外加德国租界下游的一个巨大的地段。⑤ 对于这些要求美国公使一一表示抗議，坚持着有关各国应该等待到外交局面澄清的时候；但是对于他的抗議，并没有理会。翌年，德国的和英国的租界都扩充了，但是并没有抗議。美国当局一度起过重提恢复他們的旧美国租界的要求的念头，以免他們完全被人逐出天津；但是，到后来，在附有收回权的条件下，将它归并于英国租界。⑥

四十三 十月十六日英德协定

如果说俄国曾有領土野心，那么德国也曾經有它的野心——

① 比利时照会，見“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第四二頁。

一八九九年，在那里有利益的各國，在中国条約口岸的侨民和商号的数目如下：

	商 号	侨 民
所有外国	933	17,193
英国	401	5,562
日本	195	2,440
美国	70	2,335
法国	76	1,183
德国	115	1,134
俄国	19	1,621
意大利	9	124
奧匈帝国	5	90
比利时	9	234

② 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国照会，前引，第四二頁。

③ 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一日，薩尔瓦致康格函，前引，第四七頁。

④ 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齐干致康格函，前引，第四六頁。

⑤ 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日本照会，前引，第四七頁。

⑥ 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二十七日，海約翰与康格往来函件，前引，第四八頁以下。参閱第三四一頁附图。

一个是想用从中国撤走的方法达到目的，^①另一个是想用恫吓政策获得进展。然而，必须阻止俄国达到它的目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在十月十六日就成立了一个包括四项条款的“英德协定”。第一条宣称，“中国口岸对于一切国家国民的贸易和其他一切合法形式的经济活动，保持自由与开放，不加歧视，这是一桩有共同的和永久的国际利益的事情”，这一点两国政府同意支持；第二条宣称，两国将“不利用当前混乱状态，在中国疆土内为自己取得任何领土的利益，并且它们的政策方针将是维持中华帝国的领土条件使其不致减少”；第三条是，“如果另一个国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利用中国混乱以期取得这种领土利益”，“关于保护它们自己在中国的利益所要采取的最后步骤”，两国同意协商；还有第四条是，两国要邀请其他联盟国家参加。^② 美国政府的答复是，接受前面的两条，因为它们同它一开头就主张的政策完全一致；对于第三条，它表示说，因为它所涉及的是两个国家，它“本身并不以为需要对它表示任何意见”^③。法国附和英国答复的内容；意大利、奥地利和日本无保留地赞成；俄国却宣称它早就发布了它的大公无私的声明。^④

四十四 联盟各国的同床异梦

俄国继续进行它对满洲的吞并，虽说俄国和中国两方都正式否认它们之间关于这些省份有任何协议。^⑤ 德国并不放弃它曾经

① 一定要常常记住，满洲虽说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可是它并不在中国本部。

② 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三日英国与德国大使致海约翰函，见“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三一頁。

③ 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九日海约翰复大使函，同前引。

④ 一九〇〇年十月十日哈定致薩里貝利勋爵函，见“中国，第五号”，一九〇一年，第四五頁。

⑤ 一月六日斯各脱爵士致兰斯东勋爵函；一九〇一年一月十五日中国公使致兰斯东勋爵函；“中国，第六号”，一九〇一年，第四、一三頁。

在山东所维护的排他的权利，并且积极地采取讨伐远征的政策。法国，虽说倾向于同德国远征军合作，但是只要遇有机会，就仍旧对俄国予以外交上的支持。意大利在它的有限的军力范围之内采取了一个积极的政策。日本担心将来，因而对于俄国抱了一种戒心。美国固执开放门户，推动了与勒逼不同的谈判，而且从瓦德西伯爵来到之后在任何军事行动中都不参加。英国忙于南非战争，除了保持一种警戒的态度之外，就不能再有什么别的；在外交方面海约翰先生曾经发表了一个公平的意见，他是当时参加这个战役的任何一个国家中的最敏锐的观察家：

“对于约翰牛(John Bull, 系英国人绰号。——译者)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你晓得他对于德国的态度么？当‘英德协定’公布以后，我曾经用过一两天功夫去推敲它的含义是什么。我不久从柏林获悉它意味着对英国开一个可怕的地道的玩笑。从伦敦我又发现了我已经料想到的东西，但是在一切都已证实以后使我感到惊讶的是——那个他们又并不知道！当日本参加这个协定的时候，我问过他们为什么。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不过假如有什么有趣的事，我们就要参加。’喀西尼^①却怒不可遏——这也許是因为并没有让他也参加这个玩笑。”^②

① 駐华盛顿俄国大使。

② 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海约翰致亨利·亚当士（他的最密切的朋友）函，见泰耶尔：“海约翰的生平和函牍”，第二部，第二四八页。

第十二章 外交解决

- 一 长江流域各总督对于議和的态度352
- 二 朝廷仍在排外势力控制之下353
- 三 中国全权大臣和各国的犹豫354
- 四 一九〇〇年十月四日法国照会各国355
- 五 联盟各国对于法国照会的态度356
- 六 中国对于惩罚的提案的不够357
- 七 中国提案内容的增加;仍嫌不够358
- 八 外国公使认为提案不当而且荒唐358
- 九 诱导宫廷返回北京的企图359
- 十 十月十五日中国全权大臣开談判;并无結果361
- 十一 各国公使研究和修改法国照会362
- 十二 各国公使討論惩罚問題363
- 十三 十二月二十四日发出联合照会;上諭接受365
- 十四 总督和全权大臣对于联合照会的看法365
- 十五 一九〇一年二月十五日瓦德西建議作进一步的
軍事行动366
- 十六 傳說中的中俄滿洲协定367
- 十七 协定被否認、承認、修改、放弃368
- 十八 美国提出的有关賠款和修改条約的建議369
- 十九 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最后草案签字370
- 二十 第一条:克林德被害的賠償371
- 二十一 第二条:惩办貴族和首禍諸臣371
- 二十二 外省官員的惩办372
- 二十三 停止科举五年373
- 二十四 第三款:杉山彬被害的賠償373
- 二十五 第四款:在被污瀆的各墓地建立碑碣以昭伸雪373
- 二十六 第五款:禁止軍火进口两年373

二十七	第六款:賠款:各国的不同意見	374
二十八	各国公使組織委員會研究賠款的偿付方法	375
二十九	賠款确定为四万万五千万两分四十年付清	375
三十	各国要求的賠款数目	376
三十一	第七款:設置使館卫队的权利	378
三十二	外国使館区域的划定	379
三十三	第八款:削平大沽及別处炮台	381
三十四	第九款:占領北京到海口的数处据点	381
三十五	第十款:公布上諭	381
三十六	第十一款:条約的修改;改善北河和黄浦两水道	382
三十七	第十二款:外务部的設置	382
三十八	北京撤兵的協議	382
三十九	中国地位一落千丈	382

一 长江流域各总督对于議和的态度

虽然联盟国在取得一致行动上有着它們的困难，可是中国大臣們的任务却也不容易。政府已經解体，过去帝国所具有的那种威权已經落在总督們的手里，他們在鬧乱子的期間最初向头脑糊涂的人随后向头脑清醒的人呼吁，現在坚定地站在他們的皇上和皇太后一边，一方面反对那些主张皇太后要对她的罪行負严重責任的外国公使們；一方面也反对那些要帶領她繼續走义和团路綫的滿洲貴族們。在反对前者方面，他們要求完全开脫皇太后，充分保證她人身的安全；^①在反对后者方面他們在向朝廷提出的一个奏折中參劾滿人的領袖們，悬請皇太后“懲办那些曾經将帝国和朝廷引导到現在局面的人們”。这个弹劾案却被这样的問題所反对——“你們准备推荐什么懲处？”并且，因为对于这些高級貴族分子所犯

^① 总督們致領事們的同文照会，一九〇〇年八月十八日霍伦領事致薩里貝利勛爵函，見“中国，第一号”，一九〇一年，第九五頁；八月二十日总督們致罗丰祿函，前引，第九九頁；九月三十日饒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前引，第二〇〇頁。

罪行的合法的判刑要經過冗长的程序才执行，总督們就弄得进退失据了。^① 由于外国公使們的提議，两位长江流域的总督作为帮办全权大臣协助庆亲王和李鴻章工作。^② 在原来的代表团中荣祿也作为帮办全权大臣参加在內，但是他被反对了，反对的理由在当时似乎是很正当的，不过現在已經知道是不合理的。^③

二 朝廷仍在排外势力控制之下

两宮和朝廷都还在排外势力的控制之下。他們在西狩途中，曾經在太原府耽擱一个短時間，那里“一向声名恶劣的”毓賢仍旧担任巡撫职位；并且，就是在他們到达西安府之后，主持朝政的要員还是端郡王和庄亲王，而且护卫他們的部队大部分还在董福祥統帶之下。就算两宮有充分决心接受李鴻章的頗有政治家风度的政策和采用他所建議的方案，他們也无力使他們的决策見諸实行——他們能做的事也不过是发布些上諭，向列强乞怜罢了；——但是事实上从西安府发动的一切朝政，只是表明朝廷的排外和拥滿傾向繼續不变。十月，据說“在两总督的周围正逐漸由滿族官員代替汉族官員”；并且，在他管轄之下的三省，三个巡撫当中有两个以及所有三个布政司都已經是滿洲人。^④ 对于在武昌的湖广总督曾經强派給他著名排外的河南巡撫裕长作湖北巡撫（他的衙門也

① 一九〇〇年十月三十一日“北华捷报”。

② 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三日龔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見“中国，第一号”，一九〇一年，第一八一頁；一九〇〇年十月三十一日张之洞致罗丰祿函所引九月十三日上諭，見“中国，第五号”，一九〇一年，第六〇頁。

③ 一九〇〇年九月十日龔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見“中国，第一号”，一九〇一年，第一五〇頁；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康格致海約翰函，見“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三六頁。

④ 一九〇〇年十月六日上海霍伦領事致薩里貝利勛爵函，見“中国，第五号”，一九〇一年，第七頁。

在武昌)。^①一般人都觉得这一个任命使长江流域各总督的地位摇摇欲坠，并破坏了长江协定，^②于是各国提出抗议；最后由上谕撤去以前任命给裕长的职位。^③在十月份闽浙总督奉令逮捕所有维新党的成员；^④这遭到了抗议后也就收回成命了。^⑤朝廷的情况可以总结为下列几句话——“两宫陛下，现在被反动大臣们所操纵，所以在行动上不得不小心谨慎”^⑥；“在西安府的朝廷完全被董福祥所控制”^⑦；“皇太后落在董福祥的手掌里——她象是一个骑着老虎的人——她不敢下来，怕的是老虎回过头来吃掉她。”^⑧

三 中国全权大臣和各国的犹豫

李鸿章的迟迟北上推迟了中国的提案；^⑨即使当时在职的官员情愿把它们提出，或是他们对于中国所处局势的严重性已经有所警觉。^⑩就是在十月十五日已经采取第一批步骤以后，各国和它们的公使还不能作出决定：在同中国全权大臣协议之前，他们首先要在自己之间取得协议。^⑪俄国和德国支持两种相反的政策。

① 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北华捷报”。

② 同上，一九〇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③ 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萨道义爵士致兰斯东勋爵函，见“中国，第五号”，一九〇一年，第一〇五页。

④ 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四日霍伦领事致萨里贝利勋爵函，见前引书，第四九页。

⑤ 一九〇〇年十月三十日萨道义爵士致萨里贝利勋爵函，见前引，第五五页。

⑥ 一九〇〇年十月六日傅磊斯领事引用张之洞总督语，前引，第八九页。

⑦ 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华捷报”。

⑧ 同上，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⑨ “可惜的是亲王并没有立刻去谈判；如果他曾这样做，或者李曾抓紧时间赶来，那么，在德国人以其‘先惩办，后谈判’的照会破坏路线以前，我们早就可以行动起来了。”——赫德致杜德维函，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⑩ “有一桩事情是希奇的：我看不出有哪一个官员对于局势的严重，或是对于罪过的重大，或是对于这种使中国立场和地位发生变化的事件，有足够的认识。”——又函，一九〇〇年十月八日。

⑪ “公使们在商量着，如果他们商妥他们的要求，那么，也许这个星期内，他们会去谒见庆亲王和李的。”——又函，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这里谈判还没有开始。公使们正试图在他们自己之间首先达成协议。”——又函，一九〇〇年十月六日。

俄国公使遵照俄国的声明，在九月二十九日离开北京；但是因为没有一个别的国家学他的样，他又在十月二十一日回来；而新任德国公使在他能够得到瓦德西伯爵和他的军队的支援以前，迟迟没有到达。①各国一致意见的难以达成曾经由一位观察家明白表述——“从八月中旬以来我一直在此地努力工作，但是所作出的成绩只是，两个中国全权大臣等待着各国作出决定，它们向中国要求的究竟是什么。”②

四 一九〇〇年十月四日法国照会各国

在七月三日美国照会之后，法国政府曾经提议一个折衷办法；③现在，继九月十八日德国照会之后，④在十月四日法国又发出了一个通牒，建议以下列各点作为谈判的基础：

- 一、各国驻华使节提出的罪魁的惩办。
- 二、军火输入禁令的维持。
- 三、对于国家、社团和个人的公平的赔偿。
- 四、一个永久性的保护使馆的卫队在北京的设立。
- 五、大沽炮台的拆毁。

六、在北京⑤至大沽道路上二三据点的军事占领，这样就可以为使馆通往海岸，或为从海上来的以首都为目标的军队经常开辟一条道路。

① “至于大家的意见和政策，我是一点也推想不出：俄国人用他们的离去暗示了一种意见，而德国人又用他们的迟到暗示了另一种。”——赫德致杜德维函，一九〇〇年十月六日。

“格尔思〔俄国公使〕到了：德国人指望这个星期——我猜想，一定会效法俄国人的先例。”——又函，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② 又函，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五日。

③ 参看第九章第三节。

④ 参看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

⑤ 英国蓝皮书作“天津至大沽”，但是错误在以后的文件中纠正了。“美国外交关系”作“天津至北京”。目的是在于警卫从海岸到达使馆的整个路途。

法国政府認為，“由各国代表集体提出并由国际军队支持的象这样的合理条件，会不被中国政府所立即接受，那是不可能的。”^①

五 联盟各国对于法国照会的态度

对于这些建議条款中的第二点和第三点，是沒有異議的。联盟国家一定要运用它們的力量来制止中国，不論是政府或反叛团体，取得軍火用来反对它們；而所有的国家也同意要求物质的賠償，作为实际上遭受的巨大損失的补偿，以及作为它們所支出的非常沉重的軍事費用的补偿。第四点在原則上也沒有反对意見；但是美国政府照会說它“在未經立法机关授权之前不可能作出这种永久性的約定”，然而又指出，它已經“在北京駐扎一支适当的使館卫队”；^②而日本^③和俄国^④表示宁愿設置个别的、分属各国的使館卫队。于是法国政府就把它提案文句修正为：

四、每一个国家为它駐在北京的使館設置一支常設的卫队。^⑤

第五点除了美国保留它的意見之外，也沒有爭執。^⑥对于第六点，美国政府也象对第四点一样表示反对；同时各国也普遍認為由国际军队警卫道路是不合适的，宁愿由每一个国家在近海地区掌握一座炮台。^⑦于是这一点的文字又修改为：

① 法国大使备忘录，一九〇〇年十月四日，見“中国，第五号”，一九〇一年，第五頁；“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二六頁。

② 国务卿致法国大使函，一九〇〇年十月十日，見“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二七頁。

③ 怀特海致薩里貝利勋爵函，一九〇〇年十月十四日，見“中国，第五号”，一九〇一年，第三四頁。

④ 薩里貝利勋爵致哈定函，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三日，前引，第四九頁。

⑤ 薩里貝利勋爵致蒙森爵士函，一九〇〇年十月十七日，前引，第四一頁。

⑥ 国务卿致法国大使函，一九〇〇年十月十日，同上。

⑦ 薩里貝利勋爵致蒙森爵士函，一九〇〇年十月十一日；致哈定函，十月二十三日，前引，第二四、四九頁。

六、为了保持道路的經常开放等等起見，由各国之間协商决定，对于某些据点加以軍事占領。^①

六 中国对于懲罰的提案的不够

犯罪的懲罰曾經被采取为談判基础之一；但是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經在原則上采納德国照会^②；可是，懲办一举在德国照会中占据了全部內容，而在法国照会中却仅只占据一个条款，各国的共同意見自然是贊成德国照会的办法。在同中国全权大臣开始对于其他要求的任何談判之前，曾經有过一段長時間的延宕局面，但是懲办却并不拖延地在进行。九月二十五日的上諭^③宣布要实施懲办，它所宣布的对罪魁禍首的懲办自称是严厉的。这个上諭受到了批評，理由是“懲办大抵是不适当的；貴族的爵位很容易恢复，而一个中国官員革职，隔不多久又会复职或者升任一个更高的职位，那也并不是罕見的事”；“所有罪魁中最坏的人”毓賢和董福祥的名字在名单中沒有列入，特別引人注目。^④英国公使报告說，“虽說这个上諭本身并不能証明皇上有无决心或力量实施懲办，但可以承認它是向正确的方面走了一步。”^⑤中国官員的意見是，所实行的已經足够，因而談判現在就該开始^⑥；但是这不是駐在北京的外国公使們的主張。^⑦

① 薩里貝利勛爵致蒙森爵士函，一九〇〇年十月十七日，見“中国，第五号”，一九〇一年，第四一頁。

② 蒙森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一九〇〇年十月七日，前引，第八頁。

③ 參看第十一章第三十六节。

④ 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〇年十月四日，“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三九頁。

⑤ 賽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一九〇〇年十月三日，見“中国，第五号”，一九〇一年，第七頁。

⑥ 中国公使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一九〇〇年十月六日；又賽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十月十三日，同上，第一八、三八頁。

⑦ 賽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一九〇〇年十月九日，同上，第二二頁。

七 中国提案内容的增加;仍嫌不够

十月十九日的一个上諭禁止降职皇族繼續在朝廷当差,并且革去毓賢山西巡撫的职位^①——这是一个显然不能适当地满足外国期望的措施。十月二十七日駐在北京的公使們一致同意,“需要判处死刑的共有十一个官員……”那就是,端郡王、庄亲王、怡亲王溥靜、載濂和載灃两貝勒、載瀾、董福祥、毓賢、刚毅、赵舒翹和英年。^②有一个提案認為,这些官員應該在各国代表在場之下,在北京斬首,这个提案是討論过的,但是后来却决定死刑的种类和执行仍归中国政府处理。中国全权大臣們恳求各国能“体諒中国現在所处的极其困难的地位,并且寬减[对于死刑的]要求,即行开始談判,停止軍事行动以及撤退軍隊”。^③这个要求沒有获得反响,于是朝廷就只得在十一月十三日进一步发布一个上諭,在这个上諭里,端郡王和庄亲王革去爵职,监禁終身;怡亲王和載灃监禁終身;載濂革爵;載瀾和英年降級調用;刚毅已死,免于惩处;赵舒翹降职留用;毓賢发往极边充当苦差;董福祥的惩办留待将来考虑,因为他当时还統率了帝国軍隊。^④

八 外国公使認為提案不当而且荒唐

中国朝廷的确是“势成騎虎”。要不是在极其巨大的压力之下,它决不敢对于金枝玉叶的滿洲皇族,象列在最大的祸首中的端郡

① 薩道义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六日,見“中国,第五号”,一九〇一年,第五二頁。

② 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七日,“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四三頁。

③ 全权大臣致中国駐外国公使函,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七日,見“中国,第五号”,一九〇一年,附录第八二頁。

④ 又函,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五日,前引,第九一頁。

王和載瀾等人判处死刑；^①并且，为了企图保全皇族中刚毅和毓賢等人，它还被迫采用了东方人慣用的詭計。据报告說，刚毅因为經不起向西安逃亡途中的艰辛而死去；这个报告是在劝告下接納的，后来怀疑了，后来又不相信了，但是最后却認為是确实的。据官方报告毓賢已經畏罪自杀；甚至还曾声明說，“这个消息是完全确实的。”^②可是他虽然死了，还是被革去职务；^③于是关于他的自杀的报告被人怀疑了，但是他已經离开了山西省；^④他正活着向边境出发，于是就在充軍途中，被一道下令将他斬首的上諭追上，斬首是見諸实行的。董福祥引起了最大的困难。他率領了一支一万五千人的能征慣战的部队警卫着宮廷，对于其他部队的长官也能发生巨大的个人影响，他是处在发号施令，可以拒絕接受任何刑罰处分的地位；現在，他的名字就暫時不再討論了。^⑤在这个时期，各国使节同意將他們自己的共同一致的意見記錄在卷，那就是十一月十三日上諭的口气是“不妥当的也是荒唐的”^⑥。

九 誘導宮廷返回北京的企图

为了避免外交上的混乱，各国一般都同意最要紧的一着就是應該劝导宮廷毫不迟延地返回北京。在八月底以前，日本政府就

① “我相信德国的要求将会达到惩办除皇室人員以外的全部人員的目的。我想朝廷会牺牲庄亲王之流的人，但我不相信端郡王和載瀾不經捉拿就会归案，捉拿就意味着一种軍事上的远征——不知要征討到什么地方去，——不知要經歷多久，——不知要引起多少别的困难。”——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九日赫德致杜德維函。

② 李鴻章致康格函，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七日，見“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四四頁；张之洞致罗丰祿函，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五日，見“中国，第五号”，一九〇一年，第五一頁。

③ 中国上諭，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八日，見“中国，第五号”，一九〇一年，第五六頁。

④ 张之洞致霍伦領事函，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七日，前引，第八二、八七頁。

⑤ 康格写道，“我恳求我的同僚們在最初要求中不列他的名字，这样他才会执行帝国所下的处决其他人員的命令。”——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日，見“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四八頁。

⑥ 薩道义爵士致兰斯东勋爵函，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九日，見“中国，第五号”，一九〇一年，第九四頁。“惩办大抵都是不适当的，一点也不和罪行相称。”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日，見前引“美国外交关系”。

已經看到主張這一着的明智；^① 到九月中旬，各國公使也都同意，“如果皇上和皇太后能夠被勸導返回北京，那將大大地有利于議和”，並且這樣可使他們“脫離端郡王和其他有害的顧問們的影響”，於是除了德國之外，每一位公使就照這個意圖發出一個非正式的照會給慶親王。^② 回信答復說他早就具折懇請兩宮回鑾。^③ 宮廷聲明了它繼續停留在西安府的意圖，因為“京都現在還被外國軍隊所占領”，而且擔心北京在“軍事行動”以後會發生一場瘟疫^④；在十月十八日李鴻章正式申明，“皇上已經決定前來北京並且預計在六個星期時間之內到達”^⑤；但是宮廷本身却在一道上諭中宣告，說它要“在和平初步解決時候回鑾”。^⑥ 以後就發動了進攻保定府的軍事遠征，^⑦ 在那里守護着城池的中國部隊奉了上級命令撤退。這次遠征是在蓋斯里將軍所開的談判沒有得到結果的時候進行的。除了懲罰着這個城池——這是第二次——并駐留一個外國駐防軍之外，還有三個官員立刻被處決。這些人中有布政使廷雍，他就算是沒有下令，也一定是允許對於傳教士的大屠殺的，並且還是義和團的一個領袖；但是他在代理總督時候，在八九月中間也會

① 薩里貝利勛爵致懷特海函，一九〇〇年八月三十日，見“中國，第一號”，一九〇一年，第一二七頁。參看第十一章第十七節。

② 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〇年九月十六日，見“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一年，附錄，第三四頁；賽納樂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五日，見“中國，第五號”，一九〇一年，第一〇〇頁。

③ 賽納樂爵士函，見前引。

④ 長江流域總督們致羅丰祿函，一九〇〇年十月四日，見“中國，第五號”，一九〇一年，第一七頁。

⑤ 賽納樂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一九〇〇年十月十八日，前引，第四二頁。“據說皇帝在回京途中。我希望這消息是確實的；他的回來將使一切事情好辦。”——赫德致杜德維函，一九〇〇年十月十九日。

⑥ 盛宣懷致霍倫領事函，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四日，見“中國，第五號”，一九〇一年，第四九頁。

⑦ 參看第十一章第三十二節。

經用保护教徒和鎮压义和团的办法来表示他的悔改。他的处决“确屬罪有应得”^①；但是李鴻章却向使节們发出了一个正式的抗告，“它的整个口气都是应予駁斥的”^②；而友好的总督张之洞也用書面控訴說，中国臣民的处决應該归中国当局办理，并認為中国人民一定会感到一种自然的憤恨，因为他們認為再次惩罚一个已經惩罚过的城池是一种失信背約的行为，同时他还主张應該停派軍事远征軍。^③ 保定府的惩罚“大大地威吓了宫廷，使它早日返回北京更加困难也更少可能”^④；被抓在猫脚爪里的老鼠是很难相信它自己的。

十 十月十五日中国全权大臣开談判；并无結果

在英国使館中，寶納乐爵士的职务由薩道义所代替，来实行围攻前所作的安排；美国使館由于柔克义被任为美国代办而加强；^⑤ 俄国公使回任；在法国使节中，鮑渥 (Paul Beau) 代替了毕盛的职务；新任德国公使穆默也已經到任。在这个外交团体的組織完成之

① 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六日，見“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四七頁。

② 薩道义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五日，見“中国，第五号”，一九〇一年，第八二頁。

③ 张之洞致柔克义函，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一日，見“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四六頁。參看第十一章第三十二节及第三三八頁注②。

④ 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六日，前引第四七頁。

“直到此次瓦德西到保定府巡視之前，一切事情似乎都进行得很好，我恐怕这一事件对于中国其余部分将要发生很不幸的后果。”——海約翰的私信，一九〇〇年十月十六日，泰耶尔所引，見“海約翰的生平和函牋”，第二部，第二四五頁。

⑤ “海約翰派了柔克义先生——对于这一位，他認為是仅次于亨利·怀特先生的〔美国〕在职的最好的外交官——到中国”。——泰耶尔，“海約翰的生平和函牋”，第二部，第二四四頁。

柔克义是一九〇五——一九〇九年的駐華公使，一九〇九——一九一一年的駐俄大使，一九一一——一九一三年的駐土耳其大使；他在一九一五年去世。

前，中国全权大臣采取了打开談判的第一个步驟；在十月十五日，在一个向各使节发出的同文照会中，他們提出了一个“我們建議的初步的和約”草案。第一条，中国承認攻击各国使館是违反国际公法，它已經認罪，并且提出保証以后这种事情不再发生。第二条，中国承認它償付賠款的責任。第三条，建議各国可自行决定，或則修正現行商約，或則商訂新条約。第四条，总理衙門机关和档案应交还中国。第五条規定，和議开談后，战事應該立即停止。①各国公使認為这些提議是狂妄的，但是中国的談判人希望至少他們能作为推动談判进行的支柱；②公使們並沒有采取步驟——事实上，他們也沒有权力——将这些建議加以考虑，于是它們也就流产了。“从最可靠的权威方面”得悉，中国全权大臣們完全預备采取法国照会中的条件作为談判基础；③但是公使們并不准备开始討論；甚至在較后一个时期中，也只有俄国、日本和意大利公使被授权对于談判基础作任何接触。④

十一 各国公使研究和修改法国照会

有些国家的公使在十月十日和二十六日举行會議，所有各国的公使在十月二十八日和三十一日举行會議，研究法国照会。⑤

第一条增加了对于指使围攻使館和屠杀教士的罪魁官吏，特

① 賽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一九〇〇年十月十六日，見“中国，第五号”，一九〇一年，第三九頁；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〇年十月十九日，見“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四〇頁。

② “庆亲王和李送出一个草約給各国使节研究：各国使节認為有点狂妄——对于这一点我并不十分覺得；但是無論如何，这总起了个头，提供了装条件的箱子，表示歉意并且允承賠償。”——赫德致杜德維函，一九〇〇年十月十九日。

③ 賽納乐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日，見“中国，第五号”，一九〇一年，第四四頁。

④ 薩道义爵士致薩里貝利勛爵函，一九〇〇年十月三十日，前引，第五五頁。

⑤ 参看本章第四节。

別指明了董福祥和毓賢兩人，判處斬刑的要求；還增加了在全國公布上諭，宣布凡是在其轄境內發生排外糾紛的官員應該立即革職的要求。

第二條照原案通過。

第三條通過了；美國和俄國政府曾經表示一種意見，認為賠款總額應該通知海牙國際法庭，這一點也通過了；並且大家也覺得理應對於那些因為服務於外國人而遭受損失的中國人，給予補償。

第四條修改為保證“各國為它的使館維持一支衛隊的權利”；並且提議劃定一個使館區域，區內中國人沒有居住權利。

第五條擴大適用範圍到大沽以外的別處炮台。

第六條將文字修正為——“各國為了保持京都與海岸之間的交通起見，在他們自己之間得以安排對於某些據點的軍事占領。”

在會議上也提出了並且討論了別的条件。

第七條規定頒布禁止加入排外會社、違者處以死刑的上諭，在全國各地張貼兩年。這一點也採用了。

第八條——“應該任命外務大臣，取消總理衙門。”

第九條——“同中國朝廷的關係，應該建立在切實基礎之上。”

前面兩條在原則上是接受了，但是它們的正式採用是後來實現的。在十一月五日，對於克林德和杉山彬被殺所要求的賠償的方式，按照德國和日本公使^①提出的辦法，予以同意。

十二 各國公使討論懲罰問題

雖說有了這種明白的協議，可是各國之間爭論的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英國、美國、日本、俄國和法國政府“反對由於堅持着中

^① 薩道義爵士致薩里貝利勳爵函，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八日，見“中國，第五號”，一九〇一年，第一五五頁；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三十日，又十一月二日，見“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一年，附錄，第四三頁及以下各頁。

国政府所不能实行的斩杀高级中国官员而危及谈判的局面”，甚至表示了“对于硬提这个要求的可能性的深刻的怀疑”。^① 俄国、日本和美国在北京的公使们相信对于皇族成员端郡王和载瀾等^②“现在还不可能处以死刑”；美国公使指出，“董福祥掌握了扈从朝廷的全部军队，实际上是左右大局的人”^③，而在他奉派到甘肃以后，认为“稍隔一些时光才适于要求对他处以较严厉的惩罚”^④；至于俄国公使却只有在将“死刑”改变为“最严厉的惩罚”的条件之下才同意接受草案。^⑤ 为了共同一致起见，各国公使接受了这种改变，他们的政府也是这样，虽说原文的力量是被英国、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政府所赞扬过的。^⑥ 在二月底，中国接受照会草案已有将近两个月的时候，指明要加以惩办的中国官员补充名单又摆在公使们面前；它包括一百个名字；它提出十个人应该处决，其余革职，有些还要流放。俄国公使声明他的政府反对向中国人提出更多的斩刑的要求；美国公使说美国总统衷心的愿望是流血应该停止，如果各国同意不作更多的判处死刑的要求，他一定会感到欣慰；^⑦ 因而对于围攻使馆一节没有向中国要求更多的人头，只有屠杀教士的各省官员要受到惩办。

① 兰斯东勋爵致萨道义爵士函，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见“中国，第五号”，一九〇一年，第一〇四页。

② 康格致海约翰函，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六日，见“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六九页。

③ 又函，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日，同上，第四八页。

④ 又函，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十二日，同上，第五五页。

⑤ 又函，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五日，同上，第五四页。

⑥ 同上；又兰斯东勋爵致萨道义爵士函，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九日，见“中国，第五号”，一九〇一年，第一二一页。

⑦ 柔克义致海约翰函，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见“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九四页；斯各脱爵士致兰斯东勋爵函，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五日，见“中国，第六号”，一九〇一年，第一一八页。

十三 十二月二十四日发出联合照会；上諭接受

有些不重要之点也在爭执之中。照会草案最初被說成是一个“最后通牒”。但是又觉得这个名詞包括一个時間的限制，因此又換成“不能更改的条件”的字样。美国公使建議將“不能更改的”改为“絕對必需的”，理由是前者会使各国自己不能接受修改；这一点为了取得一致，各国公使也同意了，但是到后来“不能更改的”字样又保留下来了。美国公使又建議炮台應該是“解除武装”，而不是“拆毀”，但这一点並沒有被同意。經過了很多討論之后，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各項要求以联合照会的形式提出了，^①不过在討論过程中英美两国政府表示更贊成使用分別发出的同文照会。它用电报拍发到西安府，它的条款也在十二月二十六日用电报发出的上諭表示接受；这个上諭，由于各国公使的要求，在一月十六日附送了加盖御璽分致各国照会的副本。^②

十四 总督和全权大臣对于联合照会的看法

长江流域的总督們曾經接到一个保証說，他們的意見在解决的时候一定会被考虑，^③但是他們並沒有被正式諮詢。他們現在插进来了，請求对于“皇室人員案件〔端郡王和載瀾〕，应以終身充軍代替死刑”；又指出禁止軍火的輸入同加在中国官員們身上的平定叛乱的責任是不符合的；并且还提出修改要求的其他几点的請求。然而他們无条件地接受了照会，只是希望在最后解决的时候会考虑他們的意見。^④首席全权大臣庆亲王和李鴻章，附以表示他們意

① 原文見“美国外交关系”，第五九頁；同上，第六〇頁。

② 同上，第六四頁；同上，第七一頁。

③ 參看第十一章第十五节。

④ 薩道义爵士致兰斯东勋爵函，一九〇一年一月四日、五日、十七日，見“中国，第六号”，一九〇一年，第三、一一九頁。

見的备忘录，最后接受了联合照会。他們同意加紧要求比較严厉的懲办，結果在最后草約上所接受的懲办就由二月十三日和二十一日上諭^①命令执行；他們对于禁止軍火的輸入也同总督們一样表示了異議；他們对于所要求的賠款表示了應該符合中国財源的希望；有关杀害和褻瀆坟墓的条件他們无保留地接受；并且他們还請求在其他事件的細节上，例如使館卫队和使館区域、拆毁炮台、維持通往海岸交通、保护传教士等等方面，得到諮詢。^②

十五 一九〇一年二月十五日瓦德西

建議作进一步的軍事行动

以后的八个月就消磨在談判之中，但是这并不是同中国全权大臣們談判，却是在各国之間由代表它們的公使們談判；九月七日签字的最后草案本身就是这些談判的最好的說明。这些談判的进行中間还夹杂了两个再度标志着各国意見分歧的插曲。外国公使們可能妄自以为已經削去联军統帅的势力；^③可是在这些談判期間討伐队还是繼續派出；^④在二月十五日瓦德西伯爵发布了一个軍方通令，这个通令即使不是他的政府命令他这样办的，也表示了他对于联盟各国公使們所代表着的那个文职部門的藐視。他开头說——“虽說和議仍在繼續，可是它們目前的进行情况却使

① 参看后面第二十二节。

② 全权大臣致各国公使函，一九〇一年一月十六日，見“中国，第六号”，一九〇一年，第一四、一二二頁；“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六六頁。

③ “关于德国的第一次荒謬的行动〔九月十八日照会〕，当全世界似乎願意参加它的时候，当欧洲大陆的全体新聞界以及在这一边的大多数报纸都贊同它的时候，我們在制止它的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总是一桩可喜的事情。我們行动的时候，其余的世界在犹豫，最后也站到我們这一边来；而德国政府，它通常是殘酷的但并不总是愚笨的，也恢复了理智，不再傲然自視了。……”——海約翰致一个密友函，一九〇〇年十月十六日，泰耶尔，“海約翰的生平和函牒”第二部，第二四六頁。

④ 参看第十一章第三十三节。

我有理由指出，現在不得不采取大規模的、积极的軍事行动”——随后他“要求”为了“这个月底”的一次行动进行准备并安排装备。^①英国司令官和公使贊成，^②但英国政府則不然；美国司令官并不贊成，而且美国公使还提出抗議。他注意到“大多数的軍事司令官有一种經常的傾向，总想凭借最脆弱的借口去做出一些事情来或帶同他們的軍隊進軍到什么地方去”；他所以提出他的抗議，“目的在于反对那种可能妨害議和成功的擅自采取任何独立行动的权利，而不是专为反对这次特別提出的行动〔西安府是假定的目标〕”^③。

十六 傳說中的中俄滿洲協定

俄国已經使它自己在滿洲立足，^④进一步就想巩固它的地位。一个在傳說中的有关南滿的中俄两国之間的協定的存在，是由“泰晤士报”駐北京記者莫理遜博士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一个電訊里，最早透露出来的。^⑤駐北京的英国公使对于这个条約的“真实性并不怀疑”，但是补充說，“似乎还没有在北京批准。”^⑥看来，在十月战役以后，中国司令官曾經要求一次休战；但是俄国当局拒絕了，声明除非“將兵工厂和全部軍火繳出”才有可能。后来，在十一月十一日，一个条約在旅順港簽訂，內中規定中国人“对于建筑鐵路不

① 原文見“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九二頁；“中国，第六号”，一九〇一年，第七八頁。

② 盖斯里將軍致哈弥登勳爵函，薩道义爵士致兰斯东勳爵函，一九〇一年二月十八日，兰斯东勳爵致拉塞尔爵士函，一九〇一年二月十九日，見“中国，第六号”，一九〇一年，第七五、七七、七九頁。

③ 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一日，見“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九一頁。

④ 参看第十一章，第三十七、三十八兩节。

⑤ “泰晤士报”，一九〇一年一月三日。

⑥ 薩道义爵士致兰斯东勳爵函，一九〇一年一月二日、四日，二月五日，見“中国，第六号”，一九〇一年，第三、三七、七二頁。

加抗拒”〔从哈尔滨到旅順的鐵路〕，并备办俄国警卫队的供应；他們将解散他們的部队并繳出全部軍火；沒有被俄国人占領的南滿洲的炮台要拆去，但是中国人为了治安目的得以設置一队宪兵；已被俄国人占領的“营口和其他地方”应由他們管理，直到他們“将来完全滿意于中国境內的平定情况”为止；并且“滿將軍必須将他可能采取的任何重要措施充分告知旅居奉天的俄国侨民。”^①

十七 协定被否認、承認、修改、放棄

俄国政府否認这个所謂协定的存在，^② 中国人也是这样^③；但是据报告說对于这个并不存在的条約的修改的談判正在圣彼得堡进行着，^④ 而在二月中，据說俄国正在坚持要求立即批准。^⑤ 随后俄国政府声明，所作的協議是“純粹临时性質的暫定条約”，并不构成一个国际条約^⑥。尽管有这种对于任何野心思想的拒不承認，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政府却警告中国政府說，同任何一国訂定单独的条約将会是中国灾难的一个来源。^⑦ 中国政府曾經否認这个协定的存在，但是湖广总督却发表了它的要点，并且詢問关于拒絕簽訂协定，英国究竟会給中国多大支持；^⑧ 而中国皇上也申請

① 俄中条約原文；周冕致李鴻章說帖，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一日；前引书第七二、七三頁。

② 斯各脫爵士致兰斯东勛爵函，一九〇一年一月六日，兰斯东勛爵致賽納乐爵士函，一月十二日，見前引，第四、一一頁。

③ 中国公使致兰斯东勛爵函，一九〇一年一月十五日，見前引，第一三頁。

④ 薩道义爵士致兰斯东勛爵函，一九〇一年一月六日，斯各脫爵士致兰斯东勛爵函，一月二十二日，見前引，第四、二九頁。

⑤ 薩道义爵士致兰斯东勛爵函，一九〇一年二月五日，見前引，第三七頁。

⑥ 斯各脫爵士致兰斯东勛爵函，一九〇一年二月六日，見前引，第三九頁。

⑦ 兰斯东勛爵与賽納乐爵士往來函件，一九〇一年二月十三、十五日，薩道义爵士致兰斯东勛爵函，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見前引，第四一、一〇七頁；海約翰致康格函，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六日，見“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二年，第二七一頁。

⑧ 薩道义爵士致兰斯东勛爵函，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見“中国，第六号”，一九〇一年，第九〇頁。

英国、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共同調停。①俄国政府拒絕发表这个协定的正式原本或加以討論，并且声明說，假定各国表示不信任俄国在八月份提出的保証，“俄国一定要注意于保卫它自己的利益。”②事情已經公开出来，俄国現在觉得有必要对这个协定作极大的修改，完全从有利于中国方面着眼③，甚至还避免要求簽訂明确的条約；④但是俄国在滿洲伸出的手也并不因而退縮，⑤两年以后那里的局势就变成了中华帝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十八 美国提出的有关賠款和修改条約的建議

另外一种单独行动也采取了，但是它却是属于調停各国意見分歧的性质。有两个題目很容易引起每一个国家的自私念头，那就是偿付实际損害和軍事費用的賠款以及对于商务条約的修改；俄国和美国政府都贊成将賠款問題提請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解决；⑥而現在，在一月中，美国政府又提議应该将这两个問題从火热和偏激气氛的北京移到华盛顿或者其他联盟国家的首都去，因为在北京这个地方要解决这些問題“是极其困难的”⑦。別的国家都觉得駐北京的公使們的专门知識，在这些問題的任何討論上都很重要，并且將談判移轉到別的首都一定会引起拖延，而且也是沒有意义

① 中国上諭，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見“中国，第六号”，一九〇一年，第九三頁。

② 斯各脫爵士致兰斯东勛爵函，一九〇一年三月七、十一、十三日，見前引，第一一三、一一六、一一七頁。

③ 薩道义爵士致兰斯东勛爵函，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七、十九日，斯各脫爵士致兰斯东勛爵函，一九〇一年四月五日，見前引，第一三一、一三四、一六八頁。

④ 兰斯东勛爵致斯各脫爵士函，一九〇一年四月五日，見前引，第一六九頁。

⑤ “那些七月公告是什么意思？是否俄国魔掌更加强硬和更加伸張，以后有沒有带来什么变化？”——赫德致布拉(C. A. V. Bowra)函，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⑥ 参看前面第十一节。

⑦ 仇德(Choate)致兰斯东勛爵函，一九〇一年一月四日，見“中国，第六号”，一九〇一年，第二頁。

的，于是提案就立刻撤回了。^① 曾經又一次地企图限制各国的賠款要求。駐在北京的美国公使在二月中和三月底两度提議，对于賠款的数目，“應該采取一个在中国支付能力以內的总数，倘使这个总数显然不够完全支付所提的要求，那么每一个国家應該同意將它們的要求作比例的削減。”这个提案並沒有完全被他的同僚們欣然接受，除了日本人之外，沒有一個人表示贊同。^②

十九 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最后草案签字

同中国全权大臣並沒有多少談判，他們不能不接受所提出的那些条件；但是在联盟各国之間却有很多談判，并且时常提心吊胆惟恐不可能得到解决。^③ 联盟各国之間的談判，在某些問題上，是在“互相忍讓”之下进行的，如象死刑，为了取得一致起見，那些傾向更严厉的惩办的国家贊同最低限度的要求；在別的問題上，如象賠款，每一个国家都容許毫无牵制地表明它自己的要求；因而最后的草案^④ 在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就是在联盟国家要求初次形成之后的十一个月，才被簽訂。草約由中国全权大臣庆亲王^⑤ 奕劻和威毅伯李鴻章，以及以下的各国全权大使签字：

德国：穆默

① 兰斯东勋爵致薩道义爵士函，一九〇一年一月十一日，見“中国，第六号”，一九〇一年，第一〇頁。

② 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一年二月十八日，柔克义致海約翰函，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九日，見“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八六、一二一頁。

③ “我充分認識你所遭遇的各种困难的程度以及你在克服这些困难的极大部分上所取得的成功，并且衷心祝賀你在結束这次談判的这个重要阶段上的成就。”——兰斯东勋爵致薩道义爵士函，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見“中国，第一号”，一九〇二年，第二三六頁。

④ 原文見条約集，一，第一一一頁；“中国，第一号”，一九〇二年，第二三七頁；“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三〇六頁。

⑤ 除英美两国外，別国將这位亲王的爵号“Ching”（庆）用拉丁字母拼为“K'ing”。

奧匈：齐干

比利时：姚士登(M. Joostens)

西班牙：葛罗干(B. J. de Cologan)

美国：柔克义

法国：鮑渥

英国：薩道义

意大利：薩尔瓦

日本：小村寿太郎

荷兰：克罗伯(F. M. Knobel)

俄国：格尔思

那些曾經和中国有条約关系的国家，如挪威、瑞典、丹麦、葡萄牙、巴西、秘魯、墨西哥和朝鮮等并没有参加；而签约国家中，象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等并没有参加援救使館或以后的軍事行动。

二十 第一条：克林德被害的賠償

第一条規定对于克林德被戕害一事的补偿。一位帝国的皇族，醇亲王載灃，^①于七月十二日离开北京代表中国皇帝和政府(中文条約原文为“国家。”——譯者注)向德国皇帝表示对于这个刺杀事件的歉意。这个歉意，还用拉丁文、德文和中文作成銘志，刻在遇害处所建立的牌坊的碑上，这座牌坊的寬度占滿整个街衢。

二十一 第二条：惩办貴族和首禍諸臣

第二条重叙对于义和团暴行的惩办。在二月十三日和二十一日の上諭中，对于“此案首禍諸臣”加以下列惩办。皇族端郡王載漪和輔国公載瀾，均定斬监候罪名；但是又經約定^②皇上可以加

① 皇帝胞弟。

② 二月五日全权大臣會議：薩道义爵士致兰斯东勛爵函，一九〇一年二月六日，見“中国，第六号”，一九〇一年，第一六〇頁；康格致海約翰函，二月七日，見“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七一頁。會議決定的惩办办法就是最后采用的办法。

恩貸其一死，即发往新疆永远监禁^①，永不减免。滿族庄亲王和英年，以及汉大臣赵舒翹^②，均定为賜令自尽。毓賢、启秀和徐承煜，均定为即行正法。刚毅、徐桐和李秉衡均处以死后的革职，这种革职“是和他們被判处死刑所遭受的一样，具有相同的效果和法律的效力”，包括着对他們财产的籍沒。^③到現在还不能动的董福祥，也被革职“俟应得罪名定讞懲办。”另外一个上諭开复徐用仪、立山、許景澄、联元和袁昶等人的原官，以示昭雪。

二十二 外省官員的懲办

对外省犯罪官員的懲办是不很容易的。大部分的証据是从中国人方面得来的傳聞証据，中国全权大臣們就利用一切疑点来申請減輕。俄国公使奉有命令不要坚持更多的斬首罪名，他避免参予任何进一步要求懲办的場合。美国政府是反对提出更多的死刑罪名的，但是坚决要求适当的懲办，柔克义在說服他的同僚將他們对人头的要求从十顆减为四顆上是成功的，那四个人在对传教士的屠杀中正是出名活跃的人。随后他联合了他的同僚要求并且坚持对于总数共九十六人的懲办，那就是——四人死刑，十一人判处死刑，寬减为永远流放，十三人終身流放，四人监禁終身，二人长期监禁，五十八人永不录用，二人譴責，二人追夺官职。浙江巡撫，由于他的年高，当时已經七十岁，曾經將他的罪名从流放寬减为革职，但是其他减免的申請都被駁回了。^④

① 參看第六章第二十二节。

② 參看第八章第二十八节。

③ 二月五日全权大臣會議，出处同前。

④ 柔克义致海約翰函，一九〇一年四月二日、六月五日，見“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一二三、一九二頁。

二十三 停止科举五年

知識階級是中国的上等人，他們在任何排外运动中总常常是領袖人物；他們在考試中得到补充，考試給他們准备了踏进公共生活的門路。在第二款第二項中，他們受到了八月十九日发出的上諭的打击，这个上諭下令“將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鎮停止文武各等考試五年”。它列举了四十五个城市，六个在滿洲，十二个在直隶，二十二个在山西，两个在河南，一个在湖南，一个在陝西，一个在浙江。

二十四 第三款：杉山彬被害的賠償

第三款規定簡派那桐为专使大臣向日本国皇帝表示对杉山彬被害的歉意。

二十五 第四款：在被污瀆的各墓地 建立碑碣以昭伸雪

第四款規定在被污瀆的各墓地建立碑碣以昭伸雪。为了供应建碑費用，中国政府早已支付了一笔根据估算的概数，計京師一帶每处一万两，外省每处五千两。京師一帶一共有七处（英国一处，法国五处，俄国一处），^①付出了总数七万两銀子；但是外省各处所支付的数目并没有记录。

二十六 第五款：禁止軍火进口兩年

第五款禁止运入軍火暨专为制造軍火的各种器材，为期两年，直到一九〇三年八月为止。在义和团战事期間所有各国都是同意

^① 柔克义致海約翰函，一九〇一年八月八日，見“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二九六頁。

的，但是；当某些国家暗中觉得这桩有利可图的貿易的损失重于对叛变和混乱的防止的时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以后所有各国的合作是一个梦想。結果使得大家感到寬慰的是，由于要求中国政府来执行禁令，因而达成了協議。規定两年的条款是决定了，而且禁令还可以續展二年；但是被認為“很少有希望提出展限的要求。”^①

二十七 第六款：賠款：各国的不同意見

第六款关系賠款。美国和俄国曾經建議將所有的要求提請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解决，但是这一点沒有被其他各国所接受。美国公使于是主张要求一个中国支付能力所及的总数，每一个国家的要求應該加以削減以便适合这个总数；他估計这个总数是五千万鎊，因此四千万鎊賠款的要求是完全正当的。俄国和法国公使主张在討論草案之前先听取所属委員會的报告。日本公使“相信各国需要考虑对于賠款的核減；在評定私人要求上，大多数虽說采用了一般的原則，可是在評定战争費用上却并没有适用这些原則。”^②德国公使“看不出为什么各国在这个問題上要表示过分寬容的气量”来降低要求；^③“在賠款問題上德国的态度是最强硬的”，它的代表对于任何削減的提議一律拒絕。^④英国公使最初表达了他的政府的意見，認為所提出的要求不應該超过合理的数目；^⑤但是后来，由于“在中国問題上英国有同德国維持協議的迫切的必要”，它“对于德国所坚持的要求偿付它巨額賠償的主张作了許多讓步”。因此，^⑥美国这个減輕賠款的主张又失敗了。

① 柔克义致海約翰函，一九〇一年八月八日，見“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二九七頁。

② 又函，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前引，第一四一頁。

③ 又函，同上，

④ 又函，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前引，第一七五頁。

⑤ 又函，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出处同前。

⑥ 又函，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出处同前。

二十八 各国公使組織委員會研究賠款的償付方法

从三月二十三日起曾召开一个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公使們在內的委員會，研究中国政府財源的范围。他們所要討論的这个帝国的財政，根据所得到的最可靠的情报，每年預算指出有根据的岁入在一万万两銀子以下，而有根据的岁出是超过一万万一千两銀子。在它的开会期間，它得到了赫德爵士、薩道义爵士、希利尔(Guy Hillier)先生、包柯第祿夫(Pokotiloff)先生、盧普先生、賀璧礼(Alfred E. Hippisley)先生、小村先生、奧古斯丁(M. Augustin)先生的口头陈述或書面报告，他們都是有資格表示意見的专家；而且它在研究这个問題时也同中国全权大臣的代表交換了意見。摆在委員會面前的問題是一方面要指出增加岁入的来源，另一方面要将那些实际征之于人民，却被稅吏和他們靠山以及被帝国官員所中飽的庞大数目的一部分，归属于賠款；在五月一日，它发表了一个报告，提到了所有的建議，最后的解决就是建立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之上的。①据这个委員會估計，从某些特种的来源，岁入能够增加一千八百万两銀子左右，而各国提出的要求总数約达六千七百五十万鎊，或四万万五千万两左右銀子。②

二十九 賠款确定为四万万五千万兩分四十年付清

公使們就根据这种情况要求了一个賠償总额，計达四万万五千万两銀子，这个数目被五月二十九日的一个上諭所接受。利息

① 負責賠款償付問題的委員會的报告书，是內部印行专供外国使节参考之用的。这报告仅見于“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一四六頁；“中国，第一号”，一九〇二年，第一四七頁。

② 虽說賠款的数目以銀兩表示，并且适用于所有各国，但載明系“金币債務”并照下列固定汇率計算：

四厘，从一九〇一年七月一日起支付；清偿在一九〇二年一月一日开始至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底终止；本息都用黄金付给，依照固定汇价，逐年清偿，一九〇二年清偿数为一八、八二九、五〇〇两，一九一一年起为一九、八九九、三〇〇两，一九一五年为二三、三八三、三〇〇两，一九一六年起为二四、四八三、八〇〇两，一九三二年起到期满每年为三五、三五〇、一五〇两；这样偿付的全部本息总额为九八二、二三八、一五〇两。每年应偿款项逐月摊付给由每一个有关国家所派的银行董事收存；又指定了若干财源承担这些偿付，那就是（1）海关（条约中文作新关。——译者注）收入的剩余款，加上由进口货税照切实值百抽五所增的税款；（2）各通商口岸的常关，它们均归海关管理；（3）盐政各进项的余款。为了考虑调整海关税则，同意“北河黄浦两水路均应改善，中国国家即应拨款相助。”

三十 各国要求的赔款数目

在计算所要求的战争费用上并没有采取共同的原则，每一个政府提出的数字没有受到吹毛求疵的审查。每一个国家的公私方面的要求，在七月一日估定，并最后确定在草约里的，详见下表。①

一两——英国 3 先令

德国 3.055 马克

奥匈 3.595 克勒尼

美国 0.742 圆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3.750 佛郎克

日本 1.407 圆

荷兰 1.796 弗乐林

俄国 1.412 卢布

（以上各国货币名称均依照原约中文本译名。——译者注）

① 柔克义致海约翰函，一九〇一年六月八日，见“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二二五页。

七月一日估定数字见委员会报告和公文。

七月一日估定的及最后确定在草约中的各国公私要求表

	1901年7月1日估定数字				草约规定数字	
	公家要求		私人要求		合计银数	总银数
	本国货币	银两	银	两		
俄国	177,000,000卢布	125,316,000	8,000,000	133,316,000	130,371,120	29.0
德国	255,600,000马克	83,581,200	7,705,843	91,287,043	90,070,515	20.0
法国	193,500,000法郎	50,979,250	24,800,000	75,779,250	70,878,240	15.75
英国	6,285,933金镑	41,839,173	9,824,856	51,664,029	50,620,545	11.25
日本	47,574,000日元	33,777,540	1,775,000	35,552,540	34,793,100	7.7
美国	25,000,000美元	(包括)	公	34,072,500	32,939,055	7.3
意大利	77,000,000里拉	20,366,500	6,747,427	27,113,927	26,617,005	5.9
比利时	31,175,000佛郎	—	—	8,607,750	8,484,345	1.9
奥地利	14,240,000克朗	3,958,720	20,800	3,979,520	4,003,920	0.9
荷兰	835,000佛罗林	492,763	307,237	8,000,000	782,100	0.2
西班牙	454,000比索	120,000	158,055	278,055	135,315	0.1
葡萄牙	—	—	—	—	92,250	
瑞典	—	—	110,000	110,000	62,820	0.1
其他要求	—	—	—	—	149,670	
总计				462,538,116	450,000,000	100.0

有两个使館的眷属在表上的私人要求被固定为总数四百万两，其他私人要求也被認為是可以大大减少的；賠款委员会“認為四万万五千万两的总额至一九〇一年七月一日为止，不得超过。”^①美国政府在初期的声明是符合于它过去贊成采用一个总数的主张的，它表示美国的要求将是二千五百万美元，包括公私两项要求在內，并且这个数目将“不論軍事行动时间的长短始終保持不变”^②；在一九〇八年，这个賠款的一部分退还中国，条件是所退还的款項應該专用于教育^③。在上表上可以看出，俄国和德国的要求合起来差不多同其他六个联盟国家要求的总数一样大，法国也是一个不弱的第三位，而意大利的公家要求是同它軍事上所尽的力量不相称的。比利时要求的大部分是为了賠补京汉铁路所遭受的損害。对于这些数字也許将来的历史家可能要比今天作出一个更好的評断。

三十一 第七款：設置使館卫队的权利

在第七款，中国同意“各使館境界为专用之区并单独由使館管理，中国人概不准在界內居住，界內亦可自行防守”；并且它“应允諸国有权設置常駐兵队以保使館。”各国任命了一个軍事委员会討論所提出的各国应維持的軍力的問題，原案如下：^④

	人員	大炮	机关枪
奥匈	250	2—4	6—8
法国	250	2	2
德国	300	5—6	6

① 主席函件，出处同上。

② 賠款委员会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會議记录；柔克义致海約翰函，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九日，見“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一八一頁。

③ 这个条件是由当时駐北京的美国公使柔克义提出的。

④ “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八四頁。

英国	250	6	4—6
意大利	200	2	2
日本	400	4—6	若干
俄国	350	2	4
美国	100	2	2—3

英国公使建議將以上的軍力縮減到最大限度，將五個國家每一國的人員縮減為二〇〇。將別的三个國家(奧地利、意大利和美国)每一國的人員縮減到五〇至一〇〇；但是德國正在建造容納三〇〇人的營房，它的公使覺得如果定額加以縮減，各國政府一定會感覺不便。^①沙飛將軍認為有一個連隊就足以擔任美國衛隊，美國公使也認為，“根據這個國家的情勢，看不出有什麼堅強的理由在現在就把人員增加一倍”，並且“這樣做也是失策的，特別是因為有些國家可能會利用這個事實來擴充它們早已強大的衛隊。”^②

三十二 外國使館區域的劃定

使館區域或許可以當作在一個敵對國家的首都的「心臟」中樹立的一個防禦性的堡壘——為了這個目的那它就太大了；或者可以當作抓住一個好機會為各國的外交代表們提供環境清幽、脫離以前不衛生條件而以中國為犧牲的寬廣區域，——要是這樣那就太不公道的了。這個劃出的區域是以一排堅實的房屋，從東到西約一、二〇〇公尺，從北到南有六五〇公尺，面積大約有二〇〇英畝；環繞這個面積有一塊四〇公尺寬的空地，這個區域北面距離紫禁城宮牆一〇〇公尺，南面包括着內城的城牆和它凸出的城垛。西面圈進了兵部、工部和刑部的一部，以及鑾輿衛的全部，但是在北面

① 薩道義爵士致蘭斯東勳爵函，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日，見“中國，第六號”，一九〇一年，第一三六頁。

② 柔克又致海約翰函，一九〇一年三月八日，見“美國外交關係”，附錄，第一〇一頁。

并没有将翰林院包括进去。英国使馆向西面扩充了，它的面积增加了两倍，从十二英亩变为三十六英亩。俄国使馆也向西面扩充了，增加了三倍，从五英亩变成十九英亩。美国的面积也扩充了，但这是为了卫队，使馆本身几乎没有变动；它从前门起延展到水关，不过其中插进了别的房舍，连起来就是——美国操场，美国兵营，荷兰使馆，美国使馆，道胜银行，东方汇理银行，美国使馆学校——它承担了警戒内城城墙七〇〇公尺长的任务。德国抓住了机会并且扩充了它的使馆面积，使它从二又二分之一英亩变成二十五又二分之一英亩，同时还担任了警戒内城城墙八〇〇公尺的工作。法国使馆从六英亩扩充到二十英亩，现在它的周围都是别的使馆，因而现在没有一条防线需要它警戒。奥国使馆将它以前的不到两英亩的面积换成了十英亩的面积，这个使馆所要管理的在中国的政治的和商业的利益是并不重要的。旧的意大利使馆有一英亩大，已经足够维护很小的意大利的利益，可是意大利现在也要求了一块十二又二分之一英亩的新面积。在这块面积中包括海关总税务司公署和总税务司及各秘书的官邸；但是至少有某些国家很关心于这种对半外国的中国机关权利的侵犯，^①于是在各国代表聚会中，意大利对于它的要求作了某些让步；可是它仍旧保留它对海关公署和它的僚属住宅的主张，它只是将赫德爵士住宅及其园地的一部分归还了他，并且将它的旧使馆让给海关使用，但是它要求从前归属法国的某些土地作为补偿。由于这种调整，意大利使馆的面积是十英亩。海关总税务司土地的另一部分被国际总会拿去；但是在使馆区域中海关取得了总数约有十一英亩的五块土地。日本使馆扩充到这样，即将整个肃王府也包括在内，因为它的卫队曾经英勇

^① 兰斯东勋爵致萨道义爵士函，一九〇一年二月三日，见“中国，第六号”，一九〇一年，第八八页；柔克义致海约翰函，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见“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九三页。

地抵禦过袭击，因此将它的面积从一英亩扩充到十四又二分之一英亩。荷兰使館仍旧設在原来的地址，它的面积增加三倍，达二英亩；曾經有人提議，它并不参加內城城墙的防守，它應該搬到邻近的地方去，^①可是这个意見并没有实行。比利时在使館区域中取得了一个新址，比它的哈德門大街的旧址大了一倍。西班牙使館扩充到两英亩左右。

三十三 第八款：削平大沽及別处砲台

在第八款，中国应允将大沽砲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的各砲台削平。这一款的解释是很广泛的，包括了北塘、秦皇島以及山海关的各砲台。拆毁的工作授权天津临时政府，它以認眞的态度担当了这个工作。在十一月签订了拆除天津、大沽、蘆台、北塘及山海关二十五座砲台的合同，全部費用共一七七、四七五美元，工作在一九〇二年六月完成。^②

三十四 第九款：占領北京到海口的数处据点

在第九款，讓予了留兵駐守数处之权，“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絕之虞”。中国全权大臣曾經請求，地点的确定应获得他們的同意，但是他們所能得到的却是草約中“諸国駐守之处”的重复——沿北京向海口的鉄路綫包括山海关在內的所有十二处据点。

三十五 第十款：公布上諭

在第十款，中国政府同意“在两年期間在各府厅州县将以前所須之上諭公告”：(一)禁止参加任何排外的会社；(二)列举犯罪的惩办；(三)在諸国人民被屠杀或虐待的各城鎮停止考試；(四)申明各省官吏在发生伤害各国人民或违反条約的情况下个人应負的責任。

① 軍事委员会报告，同前，第八四頁。

② “天津临时政府”各号。合同数目見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會議录。

三十六 第十一款：条約的修改；改善 北河和黃浦兩水道

第十一款涉及对于現行条約“諸国視為应行商改之处”的談判；并且按照第六款規定，关于北河黃浦兩水路的改善，中国同意如下：（一）一俟治理天津事务交还中国之后，中国就要派員会办，^①并每年付款六万两供工程开支；（二）对于黃浦应即設立一个混合的管理局，而工程費用，預計在以后二十年中每年为四六〇、〇〇〇海关两，“此数平分，半由中国国家付給，半由有关外国出資。”一份詳細的各种“改善黃浦河道規定”，附具在附件十七号之內。

三十七 第十二款：外务部的設置

第十二款重申了七月二十四日頒发的上諭，“总理各国事务衙門”被改为“外务部”，班次在各部之前；并且記錄了关于“諸国欽差大臣覲見礼节”的一个協議，它的詳細項目在附件十九号內載明。

三十八 北京撤兵的協議

最后它还申明了，和約以及后附由諸国公使所发文件，“均系以法文为凭”；各国也同意了，除了防守使館卫队外，外国部队应在九月十七日从北京撤退，并且除了第九款所列举的十二处以外，也应在九月二十二日从直隶省撤退。

三十九 中国地位一落千丈

仲夏时节疯狂的勃发，因为王公大臣的支持而更加严重，由于

^① 参看第十一章第十节。

这一个短暂的横祸，中国就不得不支付沉重的代价。它曾经派遣头等专使，其中有一个是皇帝的嫡亲，去为委任公使的可耻的谋杀道歉；它曾经自己对于它的最高级大臣行刑，处以死刑和革职；它曾经停止考试，而考试是它的学者们赖以飞黄腾达的天然门路；对于因弹压它的反对文明的叛乱而引起的费用，它曾经负担支付一笔要束缚住它的手脚四十年的款项；它曾经接受在它的都城建立一个外国堡垒和一支驻防军，因为根据举世的意见，派遣公使到它的朝廷要能保持住安全，这是唯一的办法；并且，在其他次要的让步以外，它还曾经在原则上同意它在一八五四年和一八五六年^①以及从一八七〇年^②以来所一再不断地反对的条约的修改。中国在同西方国家直接发生关系的七十年以后，经历了一系列的步骤——一八四二年、一八五八年、一八六〇年、一八八五年、一八九五年——而到了现在一九〇一年，它已经达到了一个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低到只是保持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的属性的地步。如果它的皇帝要保持神圣的地位，如果它要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显然它必须改变从一八三四年到一九〇〇年所遵循的行动方针。

① 参看本书第一卷，第十五章第十三至十九节。

② 参看本书第二卷，第十章各节。

第十三章 商务协定

- 一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七日李鴻章的逝世……………385
- 二 中国官員們的其他遭遇……………386
- 三 一九〇一年十二月溥儀的廢立; 张蔭桓的开复……………387
- 四 一九〇二年一月朝廷迁回北京; 它的友好态度……………387
- 五 将天津交还中国管理的决定……………388
- 六 一九〇二年八月十五日天津临时政府将行政权讓交总督……………389
- 七 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駐軍从上海撤出……………390
- 八 賠款: 英、日、美要求的适可而止……………391
- 九 中国因銀价跌落而遭到的困难……………392
- 十 修改稅則: 中国处境的困难……………393
- 十一 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商約的修訂……………395
- 十二 拟議的全国裁厘……………396
- 十三 拟議的改革未能实现……………397
- 十四 关税和通商事宜的章程……………398
- 十五 英国的要求基本上获得明文規定……………398
- 十六 为传教士和教徒获得完全的权利……………399
- 十七 禁止嗎啡进口……………400
- 十八 中国貨币的混乱情形……………400
- 十九 中国必須采行划一鑄币和度量衡……………401
- 二十 中国在改良司法制度方面获得协助……………402
- 二十一 改訂矿务章程……………402
- 二十二 商标、版权和专利权的保护……………403
- 二十三 上海华洋案件的管轄权……………404
- 二十四 天津北河的水道改善事宜……………405
- 二十五 上海黄浦的水道改善事宜; 一八七四年、一八八〇年、
一八九九年各方案……………406

二十六	根据最后草約的一九〇一年方案	407
二十七	一九〇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采行的新方案	408
二十八	黄浦河道局的組織	410
二十九	黄浦河道局基金的捉襟見肘	410
三十	一九一二年四月四日濬浦局成立	411
三十一	濬浦局工作的优良結果	412

一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七日李鴻章的逝世

最后草約在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签字,当签字的时候,李鴻章已經是一个临危的人了。他在十一月七日逝世,享年七十九岁,他的两位主上以封他为侯爵和賜給他滿清一代汉籍臣民从来没有享到过的哀荣,来表示他們損失的重大。^①自一八七六年文祥去世之后,他就是中国仅有的一位具有健全国际知識的政治家了。——“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人,正象他在凡他所治理的地方上保持住的秩序中所表示出来的那样;他是一个能干的人,虽則不免跋扈,他不象大多数中国政治家那样,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而他却体察事实,并且对于中西现实关系具有充分的实践知識。”^②在四十年身居高位的历程中,他蓄积了一大笔资产,但他也积累了丰富的經驗,就他的見識所及,用来为他的国家服务。在一八九六年他曾經得出这样一个結論,認為除俄国而外,没有一个西方国家能够貽中国以大患,或是給予中国以有效的帮助,因此为了爭取俄国,他情愿付出对方要求的代价。^③这个代价的一部分就是中俄滿洲条約,并且这件条約正以一种修訂过的形式,^④在他去世的时候等待

① 北京电,十一月八日,“北华捷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② 社論,同上。另参看齐罗尔(V. Chirol):“远东問題”(The Far Eastern Question),第二五頁;和漢兰德:“李鴻章”,第三一一頁中对他的一個极有鉴别力的評价。

③ 参看第四章第十二节;第十二章第十六节。

④ 参看第十二章第十七节。

着他签字。各省总督，他的同事们，一直抗议这件条约；俄国公使则一直催促完成条约的手续；^①但是他没有签字就死去了；这样就连在他死的时候，因为没有能把他的最后计划付诸实施，他也为他的国家作了最大的服务。

二 中国官员们的其他遭遇

其后一年，在一九〇二年十月六日，比较伟大而坚毅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也死了，享年七十四岁。^②湖南派因他的逝世，失去了它的公认领袖，正如安徽派因李鸿章的逝世失去了它的公认领袖一样；荣禄死于一九〇三年四月十一日，享年六十七岁；于是国事就听由次一流的人物们去办理了。在这些人之中，最著名的是张之洞，一个出色的学者，^③以公文典雅著称，特别忠实和热心于他的国人的福利，在官场生活中，他是一个随风转舵的人。^④刘坤一死后，他回任他从前的职位，署理驻南京总督。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立刻奉派继他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⑤另一个有伟大天才的官员盛宣怀，铁路和电报总办，现在本来可以有一个飞黄腾达的机会，但不幸的是他的忠诚既不被中国人，也不被外国人所信赖；由于他对于扬子江协定和华中和平的保全方面所作的贡献，他获得了太子少保的荣衔。同一道上谕也以同样的荣衔赏赐给赫德爵士，“总税务司赫德，随同商办和约，颇资赞助……以示奖励。”^⑥

① 北京电，十一月七日，“北华捷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② 根据十月七日上谕（“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二年，第二六八页），刘坤一晋封男爵，赏太保衔。

③ 他在一八六三年中第三名进士。

④ 参看第六章第十、第十一、第二十一节。

⑤ 北京电，十一月八日，“北华捷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⑥ 上谕，开封，十二月十一日，同上，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三 一九〇一年十二月溥儀的廢立；

張蔭桓的開復

朝廷現在顯然已經擺脫了攘外派的控制，于是在一九〇一年十二月，那個已經在一九〇〇年一月立為大阿哥^①的端王的兒子溥儀^①正式被革去了他那些前程遠大的尊榮，^②並且被送往他父親充軍的所在。^③同時，開復原官的辦法也採行了，這是美國公使力主列入最後草約而沒有能做到的。^④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一道上諭毫不客氣地寫道，為應英、美公使之請，張蔭桓^⑤“着加恩開復原官，以敦睦誼。”^⑥原官的開復對於他的家屬是有利的，他們相當感激。^⑦

四 一九〇二年一月朝廷遷回北京；

它的友好態度

在最後草約簽字和外國軍隊從北京撤退之後，朝廷決定還都。沿江各總督曾經要求對西太后本人完全免於置議，他們也和李鴻章及袁世凱不約而同，堅持認為，如果要保全朝代，早日返回北京是當務之急——“帝國的廢續存在，應有賴於皇上對這個問題的決定。”^⑧事情決定了，朝廷在十月六日從西安府啟程，^⑨在河南府作

① 參看第七章第二十九節。

② 上諭，開封，十一月三十日，“北華捷報”，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四日。

③ 同上，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④ 柔克義致海約翰函，一九〇一年七月三日、八月二十九日，“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一年，附錄，第二五四、三〇三頁。

⑤ 參看第六章第二十二節；第十章第二節。

⑥ 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二年一月二日，“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二年，第一四〇頁。

⑦ 又函，一九〇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同上，第一四一頁。

⑧ 會奏，引証于漢蘭德及白克浩司：“西太后治下的中國”，第三九五頁。

⑨ 西安府電，十月六日，“北華捷報”，一九〇一年十月九日。

短暫休息之后，在开封府又作了长期的逗留。正当朝廷逗留在那里的時候，李鴻章在北京逝世。朝廷在十二月十四日离开封府，搭乘火車（洋鬼子的新奇玩意）到正定府，在一九〇二年一月七日正午抵达北京車站（馬家堡），隨即按照帝国通常的仪节，直接进宮——一年来陆軍元帅瓦德西伯爵設立总部的所在。“当西太后乘輿經過使館人員站立的阳台时，她在轎中欠起身来，以非常和藹的态度向他們回礼。”^①这种希冀言归于好的心情在依据新条約所举行的第一次召見中也表現出来。各国使节在一月二十八日受接待。——“召見从头到尾是在格外多礼、格外庄严和給予外国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进行的；这件事之所以特別值得注意，乃是因为这是西太后第一次在召見中公开露面”，而不是在紗幕后面的。在二月一日她接待“外交团中的各位夫人”；她非常“亲切”；請那些經歷过围困的人們站出来之后，她“在問候这些夫人的时候，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并且一边和她們說話，一边流泪。”^②中国的滿洲統治者們或許已經汲取了一些教訓；也許他們仅只想要別人相信他們已經汲取到教訓；但是，毫無疑問，他們太健忘了，并且想象別人也都同样健忘。

五 将天津交还中国管理的决定

北京已經讓出，但是天津是一个防护通海交通綫的“占領据点”，因此它的軍事占領依然繼續。中国当局通过总督袁世凱的发言，表示希望“立刻将天津交还中国当局管理，以便总督可以負起

① 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二年一月七日，“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二年，第一四二頁。

② 又函，一九〇二年二月五日，同上，第二〇五頁。

他的全部职责”；这项建议得到了各国驻北京公使的同意。①美国政府赞成归还，并设法探询联军各政府的意见。②它们都极力赞成临时政府的迅速撤销，惟独德国政府例外；它本来可以同意，“但是有一件事使它不能这样做；那就是中国迟迟没有改善北河的水道。”③瓦德西伯爵始终认为在外国驻军占领天津期间，行政权不应交还中国；④但是在外交压力之下，驻扎华北的军事司令官们在一九〇二年四月十二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同意交还。虽然预料“所有各司令官都会认为没有临时政府，天津万一有事发生，局势将很困难，但如果为了政治上的原因，外交团认为有交还天津政府的必要”，他们准备同意；不过只有在他们所提出的二十八项条件和两项建议被接受后，才能实行。⑤这些建议在美国公使极力坚持之下，经各使节予以削减；可是因为美国在天津临时政府中的代表已经撤回，所以美国公使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正式的地位。已经削减的条件还是向中国方面提出，并被接受；⑥布置交还工作的命令于是发出。

六 一九〇二年八月十五日天津临时 政府将行政权让交总督

在一九〇二年八月十五日天津临时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二九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时，总督袁世凯是在场的。他们提交给他：

① 伍廷芳致海约翰函，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日，“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二年，第一八四页。

② 海约翰致美国各大使函，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同上，第一八五页。

③ 怀特致海约翰函，一九〇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同上，第一八七页。

④ 瓦德西伯爵致葛洛干(de Cologan)函，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同上，一九〇一年，附录，第一七九页。

⑤ “建议云云”见康格致前人函，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一日，同上，一九〇二年，第一九〇页。

⑥ 又函，一九〇二年七月十五日，同上，第一九八、二〇〇页。

一、委员会議事紀錄一份。
二、两年来財務工作报告。
三、为完成已兴办的工程所需款項和目前移交的現金結存的支票。

四、尚未办理竣事的司法判決一覽表。

五、兴办中的工程一覽表。

六、委员会業經簽訂而尚未履行的合同一覽表。

总督收下了支票，登記了文件，并保證执行判決、工程和合同。①在这两年之中，委员会曾征得二、七五八、六五一两銀子的稅收，开支了二、五七三、六二七两銀子；它初成立的时候，这个城市是商业凋零，庫藏如洗；現在秩序已經恢复，商业已經复甦，大規模的改进已經着手；庫里余銀一八五、〇二四两。中国官員們如果愿意的話，可以从它管理一个中国城市政府的工作中，找到一个誠实而有效的服务的榜样。

七 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駐軍从上海撤出

当各使館的解围还很沒有把握，北方的騷扰情形很严重而且蔓延很广的那个时候，外国軍隊为了維持秩序，曾經在上海登陆；紧接着首先到达的英国（印度）軍隊之后，其他各国軍隊在互相猜忌的情形下也接踵而至，生怕有一个国家会在揚子江流域占了优势地位。在一九〇二年，四国（英、法、德、日）在那里的軍隊各有二、〇〇〇——三、〇〇〇人不等。在七月底，中国当局力請“外国軍隊在交还天津的同时，撤出上海。”四国同意撤兵，条件是其他各国同时撤退，并保留在其他任何一国重新占領上海的情形下，照样行事的权利；但是德国外加一項条件，即“北京政府和沿江总督必

① “天津临时政府”，一九〇二年八月十五日。

須担保既不給予任何国家以政治、軍事、海上或經濟性質的特殊权利，也不允許任何国家占据上海上下游其他任何控制长江的据点。”德国政府在保留山东省的絕對优势地位并对于华北显然抱有很大的野心的同时，还公然主张揚子江流域的門戶开放原則。其他三个国家虽然早已同意那項原則，但是它們反对以它作为共同撤出上海的先决条件；它們向中国提出抗議。各总督担保不对于这个問題签署任何秘密协定；但是德国政府却揚言它已經“从中国中央政府和各总督方面得到一項按照它所要求的拘束条件措辞的一般性声明，即中国政府决不割舍中国主权的任何部分，并且决不同意违背門戶开放原則的任何优惠权利。”協議的原文，虽經要求，但并没有照会对方；事实上，駐武昌总督只是在一件公文中声称：“所建議的保証，如以揚子江区域为限，是碍难承認的……如应用于中国全部領域，則是画蛇添足。”英、日两国都向中国抗議說，它們“决不承認中国 and 任何国家关于上海撤兵事宜所作的任何協議，对于它們有任何影响”，如果它們不是該协定的締約方之一。^①

八 賠款：英、日、美要求的适可而止

对于某一些国家，最后草約規定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有关商約的修訂事項，但是对于另一些国家，則賠款是更重要的事。凡是賠款要求在总数中所占百分比最大，而且和它們在解救使館的危急以及平复义和团起事所造成的騷乱方面所作的軍事努力不成比例的那些国家，都属于后一类。^②在派遣远征軍参加共同戮力的国家中，只有三个国家在提出要求的时候，似乎还有一点适可而止的

^① 通信，一九〇二年七月三十日至十一月十六日，“中国，第三号”，一九〇二年。

^② 参看第十二章第三十节。

精神。英国的要求，照他們在軍事方面所尽的力量來說，應該算是适度的。日本的要求也應該作如是觀，何況它的大臣們竟計算得如此精細，以致使他們不能不因賠款利息訂到四厘之低而要求允准提高他們所要求的款額。①美国政府共总只要求二千五百万美元的数目，不論有何意外决不增加，并且包括公私双方的要求在內②；公方提出的要求并不能抵付所使用的陆海軍的全部开支，而只能偿付战費中超过平时編制所需經費的數額。③所有各国都曾經在天津和北京两地劫掠銀条；④但美国政府，就有案可查的而論，是唯一还多少退还給中国政府一些的一个政府。在一九〇〇年七月，美国軍隊在天津盐政衙門搶去一笔五十万兩銀子的款項，但在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四日以三七六、三〇〇美元相等价值的一笔款項交还中国。⑤

九 中国因銀价跌落而遭到的困难

为了能以一种共同貨幣計算起見，賠款曾經按三先令的固定匯率和按它种貨幣的相应匯率，折成海关兩；但是却經明文規定作为一种金債務。三十年來，⑥銀价已經从八〇便士跌到三六便士，并且繼續下跌，直到一九〇二和一九〇三年，这两年內的平均价值跌到三二便士以下。当一八七一年白銀具有十足价值的时候，兌付英金一〇〇鎊所需的銀數是三〇〇兩；在一九〇一年最后草約的

① 柔克义致海約翰函，一九〇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一年，附录，第二五〇頁。

② 参看第十二章第三十节。

③ 参考資料遺失。

④ 参看第九章第二十一节；第十章第二十七节及本卷第三〇七頁注①。

⑤ 海約翰和伍廷芳的往來函，一九〇一年七月十三日到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四日，“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二年，第一二九頁及以下各頁。

⑥ 参看图表，本书第二卷，第四五四、四五五頁間。

时日，則是六六六·六七兩；在一九〇三年，中国政府却必須付出不少于七五〇兩的數目。但是賠款雖然構成了一種金債務，中國憑以償債的財源，却純粹是按銀計征的財源，而且這些財源已經完全被抵押作為現有債務的擔保品了。中國方面於是訴諸構成他們承認這項債務的那道上諭中的字句，而那道上諭所承認的卻是一種銀兩債務。列國不能接受這一點，因為他們的開支是按各該國的金貨幣計算的；但是美國政府“始終把這項協定的涵義理解為債務應按銀兩支付。”^①在一九〇三年，比利時公使建議允准中國暫行按銀支付，在攤還期屆滿時，再給付金銀的差價。^②經過很久的躊躇和商榷之後，中國政府“擔心比利時建議的不可靠”，提議在某些有關利息和匯率的附帶條件下，承認金債務。^③最後，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各國公使同意了七月間所作的建議，^④根據那項建議，滯付款項按八百萬兩銀子的數目一次清付；保票應行照發；從按月攤還額的實際支付日期起到半年期賠款給息日期止，准算還計息；以及一切事宜應行在年底以前處結。除由中國政府照付八百萬兩銀子以外，在那年年終結算時，計算還中國共銀二七三、八五五兩。^⑤

十 修改稅則：中國處境的困難

據最後草約規定，海關稅則的進口貨從量關稅應該提高到切實值百抽五，並且進口稅應暫按值百抽五從價計征。草約中規定

① 海約翰致康格函，一九〇二年七月十一日，“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四年，第一八四頁。

② 姚士登致外交團領袖函，一九〇三年十月一日，同上，第一七七頁。

③ 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同上，第一八二頁。

④ 致慶親王聯合照會，一九〇五年十月二日，同上，一九〇五年，第一五六頁。

⑤ 致慶親王聯合照會，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同上，第一五九頁。

了兩個月的寬限，中國還另給了四天的寬限；按暫行稅率的征收則從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一日開始^①。在鴉片征課方面沒有作任何變動，新稅率也不適用於出口稅和沿岸貿易稅（按即復進口稅——譯者），並且也不推行於陸路邊境各關；但是對於從前免稅進口的許多重要品類的貨物，諸如酒和酒精、外國菸草、肥皂等等，現在都征收關稅了。按照以前三年平均市場價值為標準的從價抽五稅率來調整新進口稅則的從價稅的工作，已經由一個聯合委員會開始進行；新稅則在一九〇二年九月調整竣事，並於十月三十一日付諸實行^②。在那個日期，它只得到八個國家的承認；在八國之中，計有英、美、德、日等商業國；但是根據領事裁判權原則，却必須聽憑其他十個有約國的商人任意“對於他所輸入的任何商品繳納條約規定的從價抽五的從價關稅，而不按修訂稅則繳納從價關稅”；並且根據“最惠國條款”，如果任何未承認新稅則的國家的商人對於任何商品行使這種選擇權，那麼任何承認稅則的國家的商人也可以對於同樣商品要求同樣的選擇權。^③這種領事裁判權所造成的混亂情形，為期達兩年之久，直到一九〇四年九月十九日，才有這樣一件通知：“唯一還不是簽字國的國家就是現在正在上海進行着條約談判的葡萄牙。”^④以早已過時的一八五八年價值為標準的從價抽五的稅則，現在已經為中國利益計改正為以一八九七——一八九九年的價值為準了；除鴉片不計外，一八九九年征收的洋貨進口稅共銀六、六五六、八八一兩，占海關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一五年共銀一四、二三三、八〇一兩，約為總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九。

① 總稅務司通令，一九〇一年九月三十日。

② 同上，一九〇二年十月十四日。

③ 同上，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六日。

④ 同上，一九〇四年九月十九日。

十一 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商約的修訂

商約修訂是事关共同利益的，中国建議举行“圓桌會議”以便对这个問題共同筹商。在原則上，这至少是列强中的一国可以接受的；^① 但一般的意見是：既然最后草約已經是一种合作的举动，条約修訂應該和各国分別談判，因而这也就是后来实行的办法。在談判中，中国的全权大臣始終其事的是呂海寰和盛宣怀，并由正式奉派参与其事的海关職員裴世楷爵士 (Sir R. E. Bredon)、賀璧理先生 (Mr. A. E. Hippisley) 和戴乐尔先生 (Mr. F. E. Taylor) 帮同办理。第一件拟行商訂的条約是对英条約，英国的特派專員是詹姆·馬凱爵士 (Sir James L. Mackay)^②，由旅滬商人查理·杜强先生 (Mr. Charles J. Dudgeon) 帮同办理；这件条約^③是在一九〇二年九月五日签字的。“中美”^④ 和“中日”^⑤ 条約都是在一九〇三年十月八日签字；美国的全权代表是駐北京公使艾德文·康格先生 (Mr. Edwin H. Conger)、駐滬总領事約翰·古納先生 (Mr. John Goodnow) 和旅滬商人約翰·希孟先生 (Mr. John F. Seaman)；日本的全权代表是公使館參贊官日置益和总領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美国条約，除去下文所指出的而外，往往在約文上都完全以英国条約为蓝本；日本条約实际上則是一件詳細的“最惠国”盟約。对德談判隨即开始；但是在他們进行不久之后，中国全权大臣就发现十九个有約国中的其他每一个国家都处心积慮要对修約所將給予中国的全部利益要求它的特殊代价；于是一切談判

① 參看第十二章第十八节。

② 后来是因其卡普勳爵 (Lord Inchcape)。

③ 約文載“中外条約汇编”，卷一，第三五一頁；“中国，第二号”，一九〇二年。

④ 約文載“中外条約汇编”，卷一，第五三六頁；“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三年，第九一頁。

⑤ 約文載“中外条約汇编”，卷二，第一三四五頁。

都停頓下來，從此也就沒有恢復。英國和美國條約構成了中國現在所必須遵從的法典，只要對這兩項條約的內容加以考慮，也就足夠了。

十二 擬議的全國釐厘

各項規定自然地分成為三類：有關對外貿易一般利益的一類；為中國改革所必需的一類；以及認為是英、美特殊利益所必需的一類。在第一類中，具有頭等重要性的項目就是一件使中國能夠廢除它的苛擾的厘金制度的詳細方案，厘金乃是對於商品的每一種國內運轉上的一項稅課，它是前四十年許多國際摩擦的因素。這個問題是如此重要、如此錯綜複雜，以致涉及這個問題的那一條款比英國條約中所載十六項條款的其餘一切條款都要長得多。^①“向設各厘卡及抽類似厘捐之關卡，概予裁撤……不得復設”；但現有各常關得照舊保存。洋貨于進口時，除切實值百抽五外，應另行繳納正稅一倍半之數的一種額外稅，“以抵裁撤厘金、子口稅及洋貨各項稅捐”；但是現行洋藥稅捐仍保留不動，並且“英國本無意干預中國征抽土藥稅項之權”；鹽斤運轉上的厘捐應改以鹽稅代替。中國得修改出口正稅至切實值百抽五，“又因裁撤厘金及各項貨捐之故，所有土貨販運出洋，或由通商此口轉運通商彼口，除出口正稅外，可于出口時加抽出口正稅之半，以為抵補”，惟絲斤和蠶茧不在此例。凡在內地流通的土貨得抽征“銷場稅”，但只可在銷售的地方抽征。“凡用機器制成的洋式產品”必須抽征一種出廠稅。由各省選定若干海關人員“監察常關、銷場稅、鹽務、土藥征收事宜”；如有告發案件，應由會訊法庭查辦。為昭慎重起見，中國應行頒布一道上諭并使各省官吏負起責任，以期各項規定得以切實執行。

^① “中英條約”，一九〇二年，第八款和附件乙；“中美條約”，一九〇三年，第四款。

十三 拟議的改革未能实现

如果没有需要裁撤的厘金，或是中国国家的结构已经能够組織和征收一种銷場稅；使厘金的裁撤成为輕而易举的事；如果与此利害相关的只有两个国家，条約也就会早已付諸实施了。協議所据以达成的条件是：

一、凡現在[計十九国]和以后得在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国家，应按照英国(美国和日本^①)政府所承担者，締結同样的約定。

二、各国所作的諾許不得直接或間接以中国給予任何政治利权或独占的商务利权为轉移。

这两項条件不可避免地使全部協議失去效力。英国締結了協定，美国步其后尘，日本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些規定；果真那項办法得以实行，縱令接受德国所加的任何特殊条件，那也不过是付出一笔很小的代价罢了，因为这四个国家(包括它們的附属国在內)約提供中国进口貨的百分之八十六；出口貨的百分之五十五左右也是輸往这四个国家，此外占出口价值百分之二十五的絲产品則輸往法国和意大利，另出口貨价值的百分之十五則主要是茶叶，并且主要是通过陆路国境輸往俄国的。^②如果这只是一个正常的貿易的問題，除絲茶出口而外，中国和这四个国家的協定，本可以把這個問題解决了；但是在領事裁判权的原則下，每一个国家，就連最小、最僻远的国家都必須予以同意，^③并且为給那項同意，它們都可以

① “中日条約”，一九〇三年，第一款。

② “中国貿易报告”，一九〇五年，第六頁。

③ 当上海工部局当局負起取締賭場任务的时候，因所有权的陸續变更，审判从一个領事館轉移到另一个領事館；結果一个案件中的一个阿根廷共和国公民和另一个案件中的一个古巴共和国公民都作所有权的声明，以致造成了这样一种复杂局面，使审判不得不停止进行。參看“上海工部局报告”，一九〇三年、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五年、一九〇七年。

勒索代价。在一个税务上没有担负任何义务的新兴国家里，这项拟议的办法也会是聪明的和有政治家风度的；但是較小的国家既須一一考虑在内，又不能加以胁迫，而英、美商人又不相信中国方面有执行这个方案的誠意，中国又不能树立一种誠实有效的文官制度，因而协议始終沒有发生效力。

十四 关税和通商事宜的章程

若干关税事宜都作有规定。在四十年之中，凡为退还已付税款而掣发的存票，一律不能兌現，而只能用以繳納它稅，只是从一八七六年起，才准領特別批明付現的存票；現在据双方同意，一切洋貨进口稅的存票都可以兌領現銀。①修訂稅則得到了正式的承認②，据規定，两国如要求修改稅則，应俟十年屆滿。③保稅存棧的利权得到了扩大④，內河行輪也获得新的便利；⑤滿洲的奉天、安东、和大东沟，⑥湖南省的长沙，⑦广东省的江門，⑧一律辟为通商口岸，其他三埠(四川万县、安徽安庆、广东惠州)的开放也載在未能实行的裁厘方案中。

十五 英国的要求基本上获得明文规定

英国条约对于特別有关英国的若干利益，也分別加以规定。中国同意“凡民船載貨，由香港往来广东省內各通商口岸，所納之

-
- ① “中英条约”，一九〇二年，第一款；“中美条约”，一九〇三年，第八款。
 - ② “中美条约”，一九〇三年，第五款。
 - ③ “中英条约”，一九〇二年，第十五款；“中美条约”，一九〇三年，第十七款。
 - ④ “中英条约”，一九〇二年，第六款；“中美条约”，一九〇三年，第六款。
 - ⑤ “中英条约”，一九〇二年，第十款；“中美条约”，一九〇三年，第十二款。
 - ⑥ “中美条约”，一九〇三年，第十二款；“中日条约”，一九〇三年，第十款。
 - ⑦ “中日条约”，一九〇三年，第十款。
 - ⑧ “中英条约”，一九〇二年，第十款。

稅，連厘金合算，不得少于海关征收輪船所載相同貨物之稅數”^①；并且承允清除于一八八四和一八九四年間在珠江中对航行設置的人工障礙物。^②中国也同意对于它禁止沿海裝运米谷的权力加以限制。^③这些为香港貿易利益和英国船舶利益計的特殊規定，都是适度的、合理的，但是这些規定却給予別国一个考虑它們的特殊利益的借口。

十六 为傳教士和教徒获得完全的权利

美国条約对以前只根据“最惠国”条款享受的一些特权都作了明文規定。現在双方同意，美国使节得駐扎京城，并且在駐京期間，应以“与該大員品位相当”之礼予以接待；^④美国駐中国的領事应与中国駐美国的領事受同样的尊重；^⑤美国公民得在任何通商口岸“居住，办工商工业、制造业^⑥以及各項合例事业。”^⑦英国条約^⑧則只对于研究傳教士問題的委员会作有規定。根据美国条約，^⑨傳教士和教徒在一切有关信仰方面的事宜上，获得了完全的保障；傳教士应不得干涉中国对教徒的管轄权，但中国官員也不得歧視教徒；羅馬天主教自一八六〇年以来享有的那种在帝国各处置产的权利，現在也賦給了美国教会团体。

-
- ① “中英条約”，一九〇二年，第三款。
 - ② 同上，第五款。
 - ③ 同上，第十四款。
 - ④ “中美条約”，一九〇三年，第一款。
 - ⑤ 同上，第二款。
 - ⑥ 参看本书第二卷，第十五章第九节。
 - ⑦ “中美条約”，一九〇三年，第三款。
 - ⑧ “中英条約”，一九〇二年，第十三款。
 - ⑨ “中美条約”，一九〇三年，第十四款。

十七 禁止嗎啡进口

条約中的其他規定都是打算引导中国走上革新之路的。当时中国有一些維新人物，也象在一八九八年曾經表現的那樣；但是結果却証明他們的意見对于国家並沒有支配力；在十五年之中，除去嗎啡条款而外，沒有一項規定曾經完全貫徹实行，这项事实似乎也可以証明，这种外来的革新試探，时机尙未成熟。列强同意，除非为医药用途輸入者外，中国得禁止嗎啡和嗎啡注射用具的进口；中国也同意禁止在中国制煉嗎啡。^①因禁令的結果，进口从一九〇二年的一九五，一三三盎司的最高額降到几近絕迹的程度；但是一般人相信，“这种一落千丈的情形，并不是由于需要减少，而是由于走私。”^②

十八 中国货币的混乱情形

五十多年来，中国以及同中国通商的各商业国的最迫切需要，一直就是它的币制改革和为国际汇兌設定一种标准的鑄币。在十九世紀中叶以前，这种需要对于外商并不显著，因为一切国际汇兌和外国人的买卖，都以西班牙銀元为准。中国商人承認这种鑄币为一种稳定的代用货币；外商用它来进行他們的交易；外国銀行也按那种由一个和远东沒有貿易的国家所发行、而且在一八〇八年名义上就已經停止鼓鑄的外国鑄币作汇价挂牌。太平天国所造成的一切貿易的脫节，使商人們不得不为了国际貿易在华南采納墨西哥共和国所发行的銀元，在华中和华北采納中国的銀两单位。可是出口貨的收購和进口貨的分配是在中国人手里，經過很長的一个时期之后，外商才認清，如果要做生意，不但必須要用他侨居

① “中英条約”，一九〇二年，第十一款；“中美条約”，一九〇三年，第十六款。

② 馬士：“中朝制度考”，第三六二頁。

的口岸的公認貨幣去做，而且要用許許多多地方的各色各樣貨幣去做——否則就會有一些中國代理商為他代勞而從中漁利。^①

十九 中國必須採行統一鑄幣和度量衡

在中國的匯兌問題上有三個因素。第一，這裡有造成一切國際匯兌所共有的或高出或低於現金銀運價的波動情形的那種流通期票的供求關係；其次，這裡也有在進出口商的貨幣和中國千百種貨幣中的其他任何一種或數種間的種種不同的兌換；而且在這兩者之間還有一種事實情況，即一切中國貨幣都是單純以銀為基礎，甚至於連西方列強的一些亞洲附屬國的那種脆弱的本位制都不具備，而歐洲和北美的貨幣則又以金為基礎。因這種標準分歧而造成的匯兌上的波動是這樣的大，以致在一切貿易中都滲入了賭博的成分，這種弊病必須糾正；但是議和人員雖欲予以補救，却並沒有試圖加以討論，而竟討論到中國沒有通用貨幣這另一個純內部問題的弊病上去了。英、美條約甚至於連這樣都沒有做到，而只要求中國“規定全國一律的鑄幣”^②；但是日本條約却要求中國“改定一律通行之國幣，將全國貨幣俱歸劃一。”^③ 這個改革是打算把中國的錢商和貿易商從錢兌業者的那種次要、但必需全神貫注的業務中解放出來，並使一個人能專心於純銀業務，而另一個人能按一種只須計數、勿庸權衡重量的通用貨幣從事買賣；然而這對於對外貿易利益只不過是間接的。在這十五年之中，時運一直不佳，也許庫存一直不足，所以除任命魏西林博士(Dr. G. Vissering)

① 參看本書第一卷，第八章第三十五節、第十八章第十一至第十四節；第二卷，第十九章第十八、第十九節；“中朝制度考”，第五章，貨幣；魏西林：“中國貨幣論”。

② “中英條約”，一九〇二年，第二款；“中美條約”，一九〇三年，第十三款。

③ “中日條約”，一九〇三年，第六款。

为財政顧問外，沒有采行任何決定性的措施，因而改革沒有實行。日本條約也規定了中國度量衡的極需劃一，^①但是在這方面的改革也沒有做到。

二十 中國在改良司法制度方面獲得協助

中國更大的一个弊病就是司法行政的情況，但是外國人因享有領事裁判權的特權，並沒有受到它的影響。^②這種特權對於中國人是一件不平的事，爭取這種特權的取消，象日本已經做到的那樣，乃是他們一貫的目標；同時在另一方面，只要外國人沒有把握在他們容或會牽連進的一切司法案件中都能得到公平裁判，他們就不準備放棄這種特權所給予的保護。中國法律不是西方法律，可是真正的爭執點並不是法律上的不同，而是法律應用的捉摸不定——或直截了當的說，是司法行政上的腐敗和偏執的絕對不免。議和人員以一項不表示確定意見的條款規定了這個項目下的改革，這一款無論在目前或在最近將來，對一方的希望和另一方的特權，既沒有增加，也沒有減損。據規定，^③中國在改良司法制度這一點上將得到協助；“一俟查悉中國律例情形及其審斷辦法，以及一切相關事宜皆臻妥善，英國即允放棄其治外法權”。

二十一 改訂礦務章程

從很早的時期起，中國的礦產就引起外國觀察家的注意，後來它的規模曾經由一些進行勘查的觀察家予以報道，其中可以舉出伊利亞斯·內(Elias Ney)、李希多芬男爵(Baron von Richthofen)、托瑪斯·金斯密爾(Thomas Kingsmill)、阿契巴德·李德爾

① “中日條約”，一九〇三年，第七款。參看“中朝制度考”，第六章度量與度量。

② “中朝制度考”，第七章，領事裁判權。

③ “中英條約”，一九〇二年，第十二款；“中美條約”，一九〇三年，第十五款。

(Archibald J. Little)、巴貝爾 (E. C. Baber)、艾密爾·羅謝爾 (Emile Rocher) 等許多人，所有這些人都曾經游歷過許多省份，具有敏銳的觀察力，但並不是都賦有專門的知識。近年以來，若干礦業專家已經作了許多有用的調查，在開礦方面曾經作了一些試探，特別是煤礦；但是中國的官吏、資本家或官僚資本家們抱定決心要使採礦企業的利潤歸諸中國和中國人；而外國的官吏或資本家們則相信沒有適當的外國專家的監督，沒有外國資本的參加，採礦事業就不可能成功。外國利益集團準備提供這兩者，但是以操持財政和工程管理為條件；中國人也準備接受這兩個條件，但一般不願讓出管理權。議和人員試圖以一項條款^①來調和這兩種矛盾的意見，根據該條，中國同意“將中國現行之礦務章程重新修改妥定，以期一面於中國主權毫無妨礙，於中國利權有益無損，一面於招致外洋資財無礙，且比較諸國通行章程於礦商亦不致有虧。”這一條並沒有強迫外國人提供資本或中國人出讓管理權，也沒有解決因外國人或外國資本進入內地而必然把領事裁判權也帶到那里去的這種固有的困難；因此我們不能說條約的這些條款在現有程序上作了任何重大變更，儘管它是那樣不能令人滿意。

二十二 商標、版權和專利權的保護

外國人的人身和財產都同樣只受他本國法庭的管轄；在侵犯商標的案件中，外國犯罪人必須受控於該犯罪人的本國法庭，中國犯罪人則受控於中國法庭。中國法律不保護商標，這一點曾經以一項條款^②予以補救，根據該款，中國同意“保護英商貿易牌號，以防中國人民違犯迹近假冒之弊”，並設立局所，以便呈請注冊。這

^① “中英條約”，一九〇二年，第九款；“中美條約”，一九〇三年，第七款。

^② “中英條約”，一九〇二年，第七款；“中美條約”，一九〇三年，第九款。

項規定的效力沒有經過考驗。中國政府願意辦理注冊，並且建議將注冊章程在一九〇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付諸實施，因此這項新辦法的後果將必單純取決於中國法庭判決的質量。但是有幾個外國從中作梗；在不同所有人於不同國度中注冊同一商標的情形下，中國法庭在互作權利主張的兩者之間，似乎就無法裁決；而且因下述的事實情況更加重了其中的困難，即在這種重複注冊之中，一種注冊往往隱含着對另一個國家里占先一步的寶貴發明的侵犯、假冒或迹近假冒的行為。^① 當外商們發現，他們所得到的名義上的保護只能對抗中國人而不能對抗其他外國人的侵犯時，他們就不再希望在中國作任何注冊了；^② 既然已經失去這種推動力，國際困難又是這樣的牢不可破，以致注冊辦法沒有採行。^③ 保護版權^④ 和專利權^⑤ 的規定也遭到同樣的命運。

二十三 上海華洋案件的管轄權

有些問題是在續議條約以外解決的。關於居住在上海租界里的中國人的管轄權，一直沒有明確的規定。這是由於兩個不同的原因：中國當局主張對中國臣民間的案件有管轄權，即使其中有一造或兩造居住在外國租界，也不例外；法國當局主張在他們的租界里有絕對管轄權，並且在公共租界的司法事務中也有平等的發言權。現在中國人被迫放棄了他們的主張，而各外國間的敵對情形獲得了妥協；並且在一九〇二年六月十日達成了下述的協議：^⑥

① 和美國駐北京公使的通信，一九〇四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載“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六年，第二三四—二五九頁。

② 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四年十月十三日，同上，第二四二頁。

③ 阻礙主要來自德、法兩國。通信中沒有提到日本，但盡人皆知，商標問題上的主要反對者是日本人。

④ “中美條約”，一九〇三年，第十一款；“中日條約”，一九〇三年，第五款。

⑤ “中美條約”，一九〇三年，第十款。

⑥ “中國，第二號”，一九〇三年。

一、凡中国人之间的民事案件，原告应依从被告，在被告居住地的会审公廨呈控。

二、凡中国人控告中国人而不牵涉外国人的刑事案件以及租界中中国居民被控违警的案件，只有犯罪或违警行为所在地的租界会审公廨有权受理。

三、凡华洋混合的民事案件：

(甲) 如原告是外国人(非法国籍)而中国被告是公共租界的居民，应控告于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

(乙) 如原告是法国人而中国被告是法租界的居民，应控告于法租界的会审公廨。

(丙) 如原告是外国人(非法国籍)而中国被告是法租界的居民，应控告于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其拘票或传票，经法国领事副署后，得由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法警，在法租界巡捕的协助下，予以执行或送达，勿需先经法租界会审公廨的审讯。

(丁) 如原告是法国人而中国被告是公共租界的居民，应控告于法租界会审公廨，其拘票或传票，经领事副署后，得由法租界会审公廨的法警，在公共租界巡捕的协助下，予以执行或送达，勿需先经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审讯。

四、凡原告是外国人(非法国籍)的刑事案件，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有权管理；如原告是法国人，法租界会审公廨有权受理。

第三条 丙、丁 两款项下关于执行拘票的规定，也适用于本条款。

二十四 天津北河的水道改善事宜

在续议条约没有包括的问题中，影响对外贸易利益最为重大的乃是北河和黄浦的改善。海河(北河)的改善曾经由中外有关利

益方面^① 会同进行，頗著成效，因此在一九一三年从天津到大沽口的河道就已經从五十六哩縮减到四十哩；在一九〇六年着手对穿过拦江沙的河床进行的加深工作至此已經有了成就，使前所未聞的排水量在十三呎以上的輪船都能够駛进，溯河直抵天津——計一九一四年四十四艘，一九一五年八十四艘。可是在一九一三年，在北河上游通州附近一处河岸的崩潰，使得河水外溢，并取道北塘入海，因而减少了河中水流的冲涮，致造成更大的淤积。^②在这后几年中，破冰船被用来保持冬季月份中港口的通暢，因为在那些月份中，港口通常是冰封的。

二十五 上海黃浦的水道改善事宜；一八七四年、一八八〇年、一八九九年各方案

为处理吳淞内外沙滩問題，修治黃浦河道局已經成立了。上海商业社会对于黃浦的修治已經紛紛議論了四十年。在一八七四年，他們曾經劝动外交团将这个問題提請中国政府考虑，但一无成就；^③ 在一八八〇年再申前議，結果是中国当局置办了一架挖泥机，利用了一个时期，^④ 但是沒有一劳永逸的效果。在一八九九年，他們建議对于从上海口岸的上停泊所边界到揚子江的外沙滩长达二十美国法定里的河道全程加以处理。据建議，九人委员会的席次应分派如下：

由領事团体选定的外商二人；

由商会选定的外商二人；

代表航运利益的外商二人；

① 參看第十一章第十节。

② “天津貿易报告”，一九一五年。

③ 參看本書第二卷，第十三章第十四节。

④ 同上，第十五章第十一节。

代表工部局的委員二人；

代表港口当局的海關稅務司一人。

這項工作的經費來自下述各財源：

(甲) 外國租界房地產估值的百分之〇·一 (約計每年可得銀三三、〇〇〇兩)；

(乙) 沿河兩岸產業估值的百分之〇·一；

(丙) 進出口價值的百分之〇·一 (約計銀五五、〇〇〇兩)；

(丁) 一切進出上海和吳淞的船舶每登記噸銀〇·〇五兩 (約計銀五二、五〇〇兩)；

(戊) 中國政府實際由航行移作教育經費的噸稅的十分之三^① (銀一二〇、〇〇〇兩)。

這些建議雖然得到外交團的贊同，但是因為事關重要，不能在北京解決，因此問題擱置了一個時期。^② 這個方案的固有的缺點在於上海外國商業社會對於他們要求作為一個自治共和國的那種陳腐的、被揚棄了的主張，具有太濃厚的意識；^③ 他們願意擔負起為他們的口岸利益所不可少的一項工作，但是在承擔這項工作的同時，他們主張行使理應歸諸中國的主權權利；他們提供所需的款項不過半數，卻主張不許中國參加經費的管理，又為防止中國官府的貪污腐敗的風氣，竟然主張將管理權交給一個九人委員會，其中八個都是由他們自己的團體中選拔；甚至於連第九名委員，雖則是中國政府的一個忠實公仆，卻依然是一個外籍人士。

二十六 根據最後草約的一九〇一年方案

根據最後草約附件第十七號中國訂立了“修治黃浦水道章

^① 參看本書第二卷，第七章第十七節；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第十七節。

^② “北華捷報”，一八九九年八月十四日；“中國，第一號”，一九〇〇年，第二九一、三九六、四〇〇頁。

^③ 參看本書第二卷，第六章第十一至第十四節。

程”，它和一八九九年的建議大致相同。在修治黃浦水道局的收入來源之中，(甲)項到(丁)項都保留未動；但是噸稅十分之三的規定則代以——(戊)“中國國家每年津貼該局之數應與外國有關方面每年所付該局各款總數相同。”局中的中國代表，因增添一位道台，由一名增加到兩名。在外國方面（除航運集體利益的兩名代表之外）又增訂“各國在上海口岸如每年進出船隻噸數逾二十萬噸者，由該國國家特派一員”；以一九一三年的數字為標準，這就使外國代表從八人增加到十五人。除去外國社會在管理權上的這種優勢地位而外，該局又據規定，一切案件必須呈控於領事公堂，在其他方面則隸屬於領事團體之下；它完全不受中國地方和司法當局的管轄，可是它們必須負責執行它的決定。在這種幾乎絕對的外國管理的情形下，其中由於工業利益的衝突，也有可能不調和的因素。在一九〇四年五月，德國政府委派它的駐上海總領事永久代表德國的航運利益，並指派一個德國工程師為它的永久代理人，可是據章程規定，這些代表國家利益的委員，應每年委派一次。其他國家都非常關心，並且預見到它們將有不得不照樣行事的趨勢。^①

二十七 一九〇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採行的新方案

義和團危機之後剛剛松一口氣，中國政府就看出它必須買回它已經失去的那些可以用金錢贖回的主權權利了，^② 黃浦水道的修治就是這樣贖回的利益之一。一八九九年的方案和最後草約的方案都是沒有咨商海關海事部而擬定的，但海關海事部却是唯一對於這個問題的水路情況方面有一些或能夠有一些確凿和連續知

^① 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四年五月十二日，“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四年，第一八六頁。

^② 本卷第四章第十九、第二十五節。

識的机构。在一九〇四年五月，当德国人正强行要求在局中优势地位的那一天，駐南京总督根据賀璧理的条陈，提出一項新建議，用以代替最后草約的方案，以期将管理权归还中国，并将海关海事部的专门知識加以利用。外国的捐助約計每年銀二三〇、〇〇〇两。这笔款項被放棄了，而建議^① 应由中国担負全部开支并且“資助四六〇、〇〇〇两銀子以充作經費，这笔拨款將繼續到工竣时为止”；黃浦修治工作委由上海道台和海关稅务司監督；工程师准于三个月之內派定；季度收支帳目应送至上海領事团；最后，一切經費既由中国提供，最后草約的附件第十七号应即废止，“在上海或上海附近对船只、商貨或土地为这项用途征收任何捐稅，也將一律視為非法。”外国使节們贊賞他們自己的高明計劃，拒絕“考虑象这样由駐南京总督首先提出的、而且以不正常方式提出的建議。”^②美国^③和英国^④的本国政府在原則上贊同这项新建議——“各国間的協議，直接求之于本国政府比求之于它們的駐京代表們要容易得多”，这样情况还是常常有的^⑤。中国方面因为必須获得大笔債款以开始工作，提請以若干沒有作过抵押的土产鴉片的稅收充当担保品；因此美国政府在十一月間以一件同文照会提請各国考虑。^⑥对于适当执行工作的担保虽則仍有一些議論，但是最后在一九〇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体现中国新建議的章程十二款却由中国和十一个与約国家签了字。^⑦

① 領袖領事致外交团領袖函，五月九日；庆亲王致各国公使函，一九〇四年六月九日；“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四年，第一八七、一八九頁。

② 英国和德国公使的备忘录，五月二十四日；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同上，第一八八、一八九頁。

③ 海約翰致康格函，一九〇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同上，第一九〇頁。

④ 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四年八月二十日，同上，第一九六頁。

⑤ 又函，一九〇四年八月十二日，同上，第一九三頁。

⑥ 海約翰的同文照会，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同上，第一九九頁。

⑦ 約文載“中外条約汇編”，第一五〇頁；“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五年，第一二二頁。

二十八 黃浦河道局的組織

一位在荷兰和日本对类似工作具有广泛經驗的著名荷兰工程师利桀克(J. de Rijke),在前几年中曾經一再受上海社会之托,作过测量,曾經对現有情况提出过几件报告并对修治工作有所建議。他深得航运和商业有关方面以及外交团和中国官吏等各方的信任;由于普遍的同意,他在一九〇六年一月奉邀担任总工程师职位。在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上海德国协会(Deutsche Vereinigung)试图以当时进行的工作的結果不圓滿,赶他下台;①但是他仍拥有一般社会的信任,得繼續留任,貫徹他的建議。組織工作是掌握在上海道台瑞澂和江海关稅务司好博逊(H. E. Hobson)两位能員的手里;秘書人員則是由海关調充。在道台、稅务司和工程师三人主持的局面下,修治工作进行得很有成就;在四年結束的时候,斜貫黃浦江的較深的輪船航道已經封閉,現在以公平女神航道(Astraea Channel)著称的旧有沙船航道已經挖到适当的深度;事实上吳淞內滩已經消失了。

二十九 黃浦河道局基金的捉襟見肘

在这个阶段上,困难情形发生了。基金已經差不多用尽,政府助款立刻就会全部被耗用在偿付貸款的本息上,再沒有余款供作經費之用。而且据一般的了解,一九〇五年协定是只关系于吳淞內外滩的,但是它現在对于該协定确定范围以外的新增工作也必須承担起来。黃浦河道局报告称,为維持現有的工作和进一步的修濬,需要增加八百万元的一笔款項。中国大臣自然是非常厭煩。他們認為他們已經为一个确定而完善的計劃資助了一大笔錢,并且已經把它的实施委托給黃浦水道局。計劃的目的距离完成还是

① “美国中国协会季刊”,一九〇七年十一月,第六四頁。

这样的远，以致倍于原估計額的款項显然是不可少的。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政府謝絕和利桀克重訂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到期的合同；在他去职之后，濬浦局代替了从前的黄浦河道局，一个瑞典工程师海登斯丹 (H. von Heidenstam) 奉派为总工程师。在偿付修治水道貸款本息后的政府助款的金額，一概撥給新設的濬浦局。

三十 一九一二年四月四日濬浦局成立

濬浦局是由中国貿易和外交特派員、海关稅務司墨賢理和港务长卡尔逊海軍大佐 (Captain W. A. Carlson) 所組成；并且它发觉它本身面临着一件要以不充分的資力执行各項重要工作的困难任务。这种困难是商业利益受到严重威胁的上海社会所承認的。海事部的主持人巡工司戴乐尔海軍大佐 (Captain W. Ferdinand Tyler) 現在非正式地提出一項建議，這項建議是一切有关方面都可以接受的，并且在領事团、西商总会和一些国家协会的共同支持下送呈各国使館。革命发生，帝国复亡，袁世凱充任共和国的总统；于是在一九一二年四月四日“濬浦局暫行协定”签了字。根据这项协定，濬浦局停止領取政府助款，代之以对一切进出口貨物价值按千分之一·五的定率抽征“碼頭捐”，以充作基金；除此而外，后来它又承領出售“升科”地的价款——所謂“升科”地就是涨潮的淤积或填筑，按照中国法律，乃是皇室的土地。濬浦局对黄浦江的管轄权，从揚子江起一直伸展到它的涨潮綫——也就是向內地伸展到远超过太平軍起事的三十哩半径以外的一点。协定中进而訂明，“濬浦局所受托的权利是由中国政府付托給它的”；上海社会的利益則是成立一个五名外国委員和一名中国委員的顧問委员会来予以保障。

三十一 濬浦局工作的优良結果

濬浦局最初做了一些疏濬水道的工作，后来又做了一些使水道舍弯路而取近道的工作；但工作中的主要特征还是用柳木垫成长扫海綫和微弯曲綫的方法来引导江流，以减少淤积、加深河床。凭借这种以人工补自然之不足的办法，黄浦江已經大有改善。在一九〇七年一月，外滩的深度是低基准水平以下十六呎，十二月是十六呎半；这个滩已經消失了，代替它的在一九一三年是寬九〇〇呎、深度在低基准水平二十四呎以下的一条水道。内滩是在一个斜交叉上，这个交叉上的水道的深度在一九〇七年計从二月間低基准水平以下十四呎的最高点到九月間十一呎的最低点不等；这个滩也已經消失了，代替它的是深度沒有一处不到低基准水平以下二十四呎的那条循着水流路径的新公平女神航道。这是从揚子江到浦东角全程的深度，只有在一九一三年有短短的一段深度是二十三呎。一九〇六——一九一五年十年的总支出是九、八九二、三八九上海两，收入是九、九二六、八〇七上海两。在收入之中，政府助款計銀三、五五〇、四四八两，貸款計銀四、三九〇、二二九两，濬浦捐及其他收入計銀一、九八六、一三〇两^①。黄浦江的修治是西方的工程技术和管理方法适用于中国情况的一个令人鼓舞的范例，也是中国海关为中国作有效服务的許多事例之一。

^① 参看附录3。款数系照上海两計算，按海关两打九折。

第十四章 协定中的海关

- 一 海关总税务司署，一个中国机关.....414
- 二 给付行政开支的固定经费.....414
- 三 以吨税十分之七充作经费的照明和海事设备.....415
- 四 获有中外人士信任的海关.....416
- 五 海关工作范围的扩充.....416
- 六 义和团协定所加的新职责.....417
- 七 常关管理，一个时代的要求.....418
- 八 赫德爵士处理问题办法中的精神.....419
- 九 对旧员司所表示的关切.....419
- 十 对待中国监督有温和谦顺的必要.....420
- 十一 逐渐注入的革新精神.....421
- 十二 税收增加，但希望没有实现.....422
- 十三 贸易和商人的主要收获.....423
- 十四 赫德爵士在早期所取得的政治影响力.....424
- 十五 他的影响力因他的谨慎态度而加强.....425
- 十六 在常关管理上所持的谨慎态度.....426
- 十七 在征税办法上的谨慎态度.....427
- 十八 安格联在税款征收上所作的变动.....427
- 十九 赫德爵士对海关管理的绝对性.....430
- 二十 他的政治影响力激起的不满.....431
- 二十一 一九〇六年五月九日税务处成立.....432
- 二十二 外国关系方面的不安；赫德爵士重申保证.....432
- 二十三 赫德爵士的日暮穷途；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日
逝世.....433

一 海关总税务司署，一个中国机关

关于列强如何谨慎提防一节姑且置诸不论，中国海关乃是中国赖以无灾无难地度过从义和团协定起到帝国结束止这一段漂泊无依时期的凭借。本着阿礼国爵士 (Sir R. Alcock)^① 所抱的中国行政(外国人当时所要发生接触的那唯一部分)中必须注入诚实干练因素的那种高明的见解，它是由李泰国予以草创，由赫德的天才予以组织、发展和使之臻于尽美尽善的。它是一个远不限于仅仅征收关税的机关，在它很早期的历史中，中国政府就表示出它对于海关为帝国所做的工作的伟大价值，作了正确的估计。^② 海关的主持人曾经责令他的一切属员“必须记住，他们是中国而不是外国的官吏，并且在他们和中国官厅的交往中，一定不要忘记这个事实，”而且也曾经声明，“海关总税务司署是一个中国机关，而不是一个外国机关”；^③ 海关从上到下都是本诸这种精神的。

二 给付行政开支的固定经费

根据中国制度，任何官厅或机关的经费都是由固定的按年拨款来接济，虽然不得超支，可是却准一成不变地照数请领。这种制度也为海关采用了，但是其他中国机关，一律是挪用供作员工开支之用的那些未报销的款项来贴补它们“经费”的不足，海关则是严格地限定于，并且它也拘泥于正式请领和报销的款项。供海关本身开支之用的经费是按月分拨的，最初每年共计银七四八、二〇〇两，从一八七六年一月起，增加到一、〇九八、二〇〇两。洋药的

① 参看本书第二卷，第一章第二十一、第二十二节。

② “在一个月以前，总理衙门在一件奏报英、法赔款即将付清的章折中，奏请继续保存海关总税务司署，并奉旨准如所请，这足证中国政府同样满意于海关的一般工作和所得到的成果。”——总税务司通令，一八六六年二月二十日。参看本书第二卷，第七章第一节。

③ 参看附录 4。

稅厘并征提供了一个申請增加經費的机会，于是从一八八八年四月起，数目增加到一、七三八、二〇〇两，其中三三〇、〇〇〇两取自洋藥厘金。为支給边境各口和派往朝鮮服务的海关員司，經費在一八九三年七月增加到一、八五八、二〇〇两；一八九五年台湾各口的淪陷使經費削減到一、七八六、二〇〇两；但是从一八九六年十月起又提高到一、九六八、〇〇〇两。自从最初发給經費以来的三十多年中，原来訂定的标准相当公平寬大的薪金，就購買力來說，对于以黄金为当然通貨标准的外籍員司已經至少下跌了一半，甚至对于以銅錢为市場通貨的中国員司，購買力的丧失也在四分之一以上。職員薪給不足而寄以重大責任的情形，对于国家的危險是显而易見的，因而从一八九八年七月起，政府增拨經費一、二〇〇、〇〇〇两，将总数提高到每年三、一六八、〇〇〇两。

三 以吨稅十分之七充作經費的 照明和海事設備

为了海事工程，总稅务司署領有专门拨供該項用途的另外款項。海关已經担負起沿海备办灯塔、浮标和望楼的工作；政府未經申請就将所收吨稅的十分之七拨充这项开支的經費。^①自一九〇六到一九一五年这十年来，每年从这十分之七中所領的平均数额，計为九四二、〇四三两。靠这笔基金，海关在一九一五年已經备置并且維持有一八二座灯塔（其中一六座是第一綫的，另五三座是閃光的或掩蔽的），五艘灯船、四四艘灯艇、一七一个浮标（其中二个是自动鳴笛或燃点煤气灯的）以及七九八座望楼（其中六四九座是設在哈尔滨区内松花江航路上的）。靠这笔基金維持的，还有負責勘查和疏浚工作的巡工司人員；海事人員（除去唯一的一艘灯塔看守船由这笔基金开支外，其他巡船都由海关的普通基金开

① 參看本书第二卷，附录二。

支)；后几年归并于工务部的工程人員；以及上海的港务人員(其他各口的港务人員概由海关人員調充并由海关經費中开支)。

四 获有中外人士信任的海关

海关人員从很小的規模开始；一直增加到一八七五年的四二四名外國人和一、四一七名中国人；在一九〇六年，当它又承担起邮务工作的时候，人数是外國人一、三四五名，中国人一〇、六二五名；至一九一五年，在邮政独立經營后，人数是外國人一、三二七名，中国人六、一五〇名。当中国行政人員对于国际問題的掌握还没有經驗的时候，这个机关曾經一再对于他們有过很大的帮助。它曾經是支付一八五八和一八六〇年“中英条約”和“中法条約”規定的賠款的机关；它曾經协助筹募过几笔借款；并且在一切国际問題上，从談判一件条約直到解决一項土地爭端，总理衙門在还没有經驗的时期，总是凭靠北京总稅务司的忠告和协助，而总督、巡撫和道台們則总是征詢各口稅务司的意見，以便照計而行。外商和領事們从显然敌对的态度中，① 逐漸明白了海关确能排解困难而并没有制造麻煩；外國公使們始終支持它的权威；② 中国京朝和各省官員則認清，通过它的帮助，他們可以得到一切應該得到的东西，而且可以避免盲人瞎馬的危險。赫德爵士和他所主持的机关，凭着办事效率和誠实可靠，从一个非常受猜忌的地位中，博得了中外人士的信任。

五 海关工作范围的扩充

灯塔和其他助航設備、領港、某些口岸的市政工作、外國語文和科学的講授等等，凡是从任何方面看来在性質上不是中国事务的工作都一律托付給这个机关；它本身曾經創辦邮政工作，曾經將

① 參看本书第二卷，第七章，第四至第六节、第十五节。

② 同上，第七章第一、第十五节。

它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行政組織，并且一直管理到一九一一年它脱离海关而独立的时候为止；^① 在一八九八年它又对于厘金得到一部分的监督权。为准备偿付中日战争后的第三笔借款（第二次英德借款），揚子江流域的六所厘金和盐稅征收机关的收入每年要担保为数达五、〇〇〇、〇〇〇两銀子的款項；这些征收机关都置諸海关总稅务司署的监督之下，如有不能履行义务的情形，則由总稅务司署予以接管。^② 每一个人，特别是这些征收机关的厘金征收人員，都滿以为这个机会必将被用来扩充海关的效用和权力范围；但是赫德爵士太練达了，对于他在中国官場中所处地位的危險也認識得太清楚了，自不会沒有絕對必要就任性干涉帝国的内部行政。他委派了一个副稅务司去监督各征收机关的工作；但是只要沒有不能履行义务的情事——从来确也沒有过那种情事——他經過第一个阶段的考察之后，就决定不要海关积极参加征收工作。

六 义和团协定所加的新职责

可是在义和团起事的那一年以后，中国和列强双方都打算以海关作为履行中国所負条約义务的一个机关，这种义务的履行，照列强的看法，需要有比中国官員所具备的更多的技巧和更能認真办事的精神。北河和黄浦江的修治已經分別委托天津和上海两地的稅务司負行政管理的責任；^③ 为香港的利益所作的特殊規定^④ 势必要由海关貫徹执行；中英条約第八款中筹拟的野心勃勃的計劃^⑤ 需要海关关員在他們从前活动范围以外的若干点上身与其事，以

① 参看本卷第三章。

② 参看第二章第三十五节。

③ 参看第十三章第二十四至第二十九节。

④ 参看第十三章第十五节。

⑤ 参看第十三章第十二、第十三节。

期措施得宜；商标的注册，^① 在因国际政治问题而废止实施以前，一直是由海关掌管；关栈自必归于海关管辖；为筹备足够的款项以偿付赔款，各口“常关”一律置于洋关总税务司署的管理之下。^②

七 常关管理，一个时代的要求

这是赫德爵士毕生劳瘁所致力的一点——即获致一个管理全国海关的机关，甚至在他还躊躇于是否去干冒因接管常关而必会引起的那种猜忌的时候，他依然是努力不懈。^③在一八八七年，香港和澳门以及中国各口的贸易已经置诸总税务司署的管辖下。^④在一八八九年，来自新嘉坡的沙船必须在海南岛的南端报关，以便缴纳它们所载鸦片的关税；在一八九三年，办法又进一步加强，以期制止已经发现过的偷漏情事。^⑤可是这些步骤都是香港和澳门的鸦片工作的直接结果，而并没有导致任何的进展。根据一八九〇年三月三十一日签字、一八九一年付诸实施的“烟台条约续增专款”进行的宜昌、重庆间的贸易必须由江船转运；这些江船在外商租用时，一律归由海关总税务司署管理和征税，但是这也并没有导致任何的进展。现在根据最后草约，总税务司署应接管所有各口的常关；并且照各使馆的解释，所应管理的乃是毫无例外地在每一个通商口岸和周围五十里（十七哩）半径以内对非外国船所运商货的厘金以外各种捐税的征收工作。^⑥这种管理应该和切实值百抽五税则的实施同时开始于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一日（阴历十月一日）。

① 参看第十三章第二十二节。

② 参看第十二章第二十九节。

③ 参看本书第二卷，第十八章第十八、第十九节及该卷第四三〇页注⑤。

④ 同上，第十八章第二十五节。

⑤ 在一八八八至一八九二年五年之内，在瓊州和北海海关完税的外国鸦片从二、二〇六箱减到九〇四箱，而来自新嘉坡的沙船载货则从六〇〇箱增加到一、七八六箱，其中有許多是逃避报关、检查和纳税的。——赫德，备忘录，一八九三年四月三日。

⑥ 总税务司通令，一九〇一年九月十七日，十月二十二日，二十六日，十一月一日。

八 赫德爵士处理問題办法中的精神

赫德爵士現在分配到一件比他在六十年代初期負責組織“洋”^①关的时候所分配到的更艰难的任务。那时他奉有全权，而且在人事管理方面不受牽掣；現在他却必須凭外交术和影响力而不是凭威权办事了，并且他第一步就是要稳住各口稅务司也能以同样的方法行事。当問題仍悬未解决的时候，他写道：“稅自然必須征，但是最关重要的事却是鼓励貿易和便利一切貿易經營；所以海关手續應該尽量放寬，它的目的應該是促进新业务的发生和发展，而不是咬文嚼字地解释条文或执行得过分严格，同时处处應該显示出寬大和合情合理，使商人們覺得奉公守法不仅仅是他們作为守法人民的一种責任，而且也是最有助于貿易行为的。”^②甚至于在管理四年之后，他发觉还有必要来保护中国公众——“凡犯毆击罪的外籍关員，立刻解职，凡濫用职权的中国职員，送县究办。”^③这些訓令都是赫德爵士充分了解中国情况的証明。中国的輿論虽仍声微力弱，但是它却能用許多隱蔽的方法宣泄出来；并且人民不滿的情緒一定会被官僚階級抓住，他們对于任何影响到他們的外水这类性质的变动，都是强烈反对的。

九 对旧員司所表示的关切

另一个必須考虑的因素就是作为官僚队伍公認的一部分的那些有关机关的官吏。那些人都是照例地、公开地花钱买缺，那些錢便是机关負責官員私人外水的一部分；他們所取償的則是一份

① 这个字是中文中一个涵义不明的字。洋字主要解作“海洋”，因而“外洋”，也就是外国的意思。所以管理外洋貿易的洋关，对中、外人士來講，都同样含有“外国海关”的意思。

② 总稅务司通令，一九〇一年五月十日。

③ 同上，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六日。

名义上的薪金，某些共同分潤的附屬稅源中的一个規定份額，以及为履行他們因职位的关系所必須尽的職責而索取報酬的一个机会。他們和政府以及公众的关系是錯綜复杂，很难闡明的；他們是中国那种薪金小而外水大的制度中的一部分，所以任何改革都必須以支給适当的薪金为必要前提。关于这些人，赫德爵士写道：

“記住这一大批人，这一大批旧員司，对于保持事物的現狀和把事情掌握在他們的手里，是怎样切身利害攸关；如果他們知道变动的理由是为偿付外国賠款，又一定会怎样憤怒；所以我們不但要寬留逐漸轉變的时间，而且我們必須服从于一項确定不移的事实，即反抗不会很快的消失，誤解和誤会一开始就会造成困难，即使不致酿成风波。”

于是他命令在初开始的时候，不得調換一个人：

“凡有应办的工作，应优先录用旧員，指导原則應該是留用而不是排斥旧机关的人員；在适当的过程中，他們都会安排就緒，只有那些办事显然不力或不必要的人，才得予以解职；但是就連这个步驟也不要立刻进行，或仓促从事，而必須先行呈报，等奉有我本人的授权后再办。”^①

这样办的結果就是机关中留下一批无用的人，而这批冗員只有用死后不补缺的方法来逐漸裁汰。^②

十 对待中国監督有温和謙順的必要

重要的是对待各有关口岸的監督們——“河泊”、將軍或道台等，必須要更加温和謙順；他們都是地位很高的官員，他們不但喪

① 总稅務司通令，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② 于一九〇三年作者在广州用了很大一部分时间来阻擋粵海关監督想要填补遺缺的迫切願望。粵海关監督已經不再是一个很肥的职缺了，因而在一九〇四年撤銷。參看本卷第四一八頁注②。

失了他們一大部分的外水，而且被迫減少他們對省里和京里的上司們所作的敬獻^①。損失是不可避免的，但這是因義和團起事後的中國地位而造成的，總稅務司、稅務司和監督等都取決於外交協定的條件。根據這種協定，海關總稅務司署已經陷入和官僚階級對立的地位；它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國的外國債權人的收款機關；並且它現在不得不干涉官僚階級的个人外水了。這種處境是微妙的，赫德看清他必須小心翼翼。他首先訓令各稅務司向每一位監督說明，“他並不打算在手續上和人事上作任何不必要的變動。”^②監督也接到下述的通知：

“擬議的移交，並不是以排斥常關和引用洋關的員司為目的，而是當軸迫於情勢的需要和帝國財政的困難才不得不如此，稅收部門的兩個系統，無論叫做常關或洋關，原本屬於一家，因而為官民的一般利益計，應該通力合作，實心辦事。”^③

十一 逐漸注入的革新精神

常關工作“應由原有人員，在原主管，但會同稅務司的共同監督下，照舊進行；可是這個新同事稅務司並不是一個尸位素餐，而卻是一個積極負責的伙伴，並且他不是居于隸屬，而是居于領導地位的。”^④稅務司的首要責任就是研究機關的工作情形，籌劃改組的方法，但是“在這樣做的時候，他應該時時考慮到稅收的利益、商人的利益和舊人員的利益。”^⑤最後一項利益所得到的照顧就是將舊

① 這是一九〇六年一件盡人皆知的事：一位身兼四職的維新大臣，正式薪金和津貼總共不過一〇,〇〇〇兩銀子一年，他自願確定他的薪金數額，誓不另收外水。經過詳細調查這幾個職位對於他的前任的價值之後，他確定俸額為三六〇,〇〇〇兩銀子一年——十倍於一個英國閣員的薪金，二十五倍於一個美國閣員的薪金。

② 總稅務司通令，一九〇一年十月一日。

③ 同上，一九〇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④ 同上，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⑤ 同上。

人員留用在本机关；但是他們的工作現在是处于一种貫注有干練因素的監督之下，并且将来“征收費用将是工作人員公認的薪給，而不是远近随从之間的分肥，或是私下討价还价，以及上下其手中飽稅收的結果。”^①花紅（一种实得盈余或特別附加稅的公开分配）由适当的薪金予以代替；但是若說“私下討价还价”至此已經完全制止，或是說行政中已經沒有不老實的情形，則未免言过其实。改进仍須注意，机关仍須改組。

十二 稅收增加，但希望沒有實現

稅收已經有了改善。据官方声称，^②“議和人員估計稅收至少每年五、〇〇〇、〇〇〇兩，”但这并不确实符合在外交委員會作証的最高权威人士所表示的意見。^③包柯第祿夫估計常關稅收为每年三、〇〇〇、〇〇〇兩；薩道义爵士估計为至少三、〇〇〇、〇〇〇兩，可能增加至四、〇〇〇、〇〇〇兩；賀璧礼声称造冊的進項为二、一二五、〇〇〇兩；赫德爵士估計收入为三、〇〇〇、〇〇〇兩，可能增加到五、〇〇〇、〇〇〇兩。希利尔估計可能的收入为五、〇〇〇、〇〇〇兩，小村声称實計收入是一、三七〇、〇〇〇兩，但是認為可以增加至五、〇〇〇、〇〇〇兩。委員會在它的最后报告中，是按最低限度三、〇〇〇、〇〇〇兩、最高限度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兩（向来沒有一位权威人士甚至于提过一下这个数目）的标准估計的。在一九〇八——一九一〇年三年之中，常關實征稅收平均每年二、九八一、七五七兩，但是在一九一三——一九一五年三年之中，为每年三、三六七、六六一兩；在一九一五年，

① 总稅务司通令，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② 同上，一九〇一年十月一日。

③ “賠款支付問題研究委員會”會議記錄，內部發行。參看第十二章第二十八節。

稅收是三、七八四、五七〇兩。^① 行政費用是由坐扣所征稅款十分之一的定額提充的。

十三 貿易和商人的主要收穫

人員得到了照顧，官僚的利益在不违背国家的义务的程度下尽予考虑，稅收已經增加，虽然沒有能达到所希望的程度，但是主要的收穫却是在貿易和商人方面。为考虑商人們的利益，每一种努力都已經作过，但是在初开始的时候，他們惋惜“在中国的监督下在中国办理报关事宜的那种方便”，对此，外商們在一八五六年也曾經时时恼丧。^② 改革受到了强烈的反对。按照为各級商品确定的办法作数量上的短报，再按申报的数量完納正稅（連同附加）曾經是通常的慣例，关員在接受短报报单方面的慷慨情形也得到相

① 將小村的各征收机关所报的实收数字和一九一五年实征稅款作一比較，是饒有趣味的：

	小村	1915年
牛庄	118,300兩	171,702兩
天津(甲)	65,100兩	1,109,345兩
烟台	36,600兩	72,681兩
宜昌和沙市	—	78,273兩
九江	303,200兩	407,932兩
蕪湖(乙)	139,200兩	637,054兩
揚州和淮安	92,600兩	—
上海	37,200兩	228,155兩
宁波和溫州	29,000兩	143,356兩
福建各口	201,100兩	336,915兩
广东各口(丙)	201,800兩	599,157兩
共計	1,370,200兩	3,784,570兩

(甲) 天津关曾經是一个肥沃的牧場，但是天津临时政府的管理在它的工作上投射了充分的光明。

(乙) 安徽(蕪湖关)是李鴻章家族的专用牧場。另看下文第十六节。

(丙) 广东各关的特別稅源已經一个接一个地被夺去。

② 參看本书第二卷，第二章第三节及該卷第二八頁注③。

当的承認。經過一个时期以后，这种办法停止了，^①而且这种变动不久就为商人所默从。姑且把失去了一个中国行政机关的“方便”置諸不論，一切变动都是为了商人們的利益。稅則公布了，这似乎是起碼的事，但是却从来没有这样办过。許多机构都不止有一个稅則，有的有好几个，而且都是重迭繁复的；只要有人能說动中国的負責人把一項稅課固定成一条稅則，事情也就那样办了，但这只不过是两、三个征收机关里的情形。赫德爵士的态度是——“抽征的每一件东西都应该作为稅收登录造冊，但是在另有命令之前，各种征課的地方名称应一律保留，并且每一笔稅收都应该在它的专门名称項下按照它的特別分类登記”；同时他指出說，“关于沙船載貨准按洋船載貨在通商口岸繳稅的同一稅則納稅一层，似可予以考虑。”^②他一貫注重“常”关和“洋”关的不同，無論在它們的精神方面，或是在它們对商人和貨物的待遇方面；^③他認為讓常关照旧办事而只要加进作为洋关根本的誠实干練那一項因素就足够了。因此，稅务手續的准則乃是要使商人比从任何程度上的方便都能获得更多的利益。

十四 赫德爵士在早期所取得的政治影响力

起初在一八六〇到一八六四年的时候，外国公使和商人們的意見是，海关总稅务司署應該設在上海这个商业中心，而不應該設在北京这个政治都会；当它根据政府的創議和直接命令迁往北京的时候，怨声四起。所怕的是，“以一种准外交人員的資格駐在北京”，总稅务司会“在他本机关的事务范围以外，成为中国人的顧問”；^④而这种忧虑竟变成了事实。总稅务司署負責管理外国船舶

① 总稅务司通令，一九〇二年八月四日。

② 同上。

③ 同上，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六日。

④ 參看本書第二卷，第二章第二十二节及該卷第五一頁注①。

和外商的貨物，而这两者都享有領事裁判权，并須严格服从对外条約的規定；从一八六〇年起，它成为偿付英、法賠款的出納机关；它在新穎而困难的国际問題上是中国大臣們唯一获得情报和建議的桥梁；为了这种种原因，它当然是要置于一度发展成为帝国内閣的那个处理洋务的中国机关总理衙門的管轄下。所以总稅务司不仅是中国政府的臣仆，而且特别是总理衙門的一个属僚；当然他常常被征求意见，不但在稅务和商务問題方面，而且在外交問題和內政事务方面。^① 他的各口的属員，海关稅务司們，在一切发生于或影响到省当局的轄区內的那些国际問題上，也常受到各該省当局的諮詢。^②

十五 他的影响力因他的謹慎态度而加强

总稅务司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取得了一个赋有很大影响力的地位。象李泰国这样一个人可能会把这样的影响力轉化为权力；在六十年代中国的混乱情况中，他固然可以成功于一时，但是不久他必会失势的，因为中国人虽然始終欢迎忠实的劝告，可是从来不受挟制，只有在一九〇一年处于胁迫之下的时候，方作別論。赫德爵士是另一种类型的人。自从早期耶穌会教士起，沒有一个外国人能象他那样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他洞悉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并且因深通中国語文，所以能把事情敷陈作那样一种形式，致使西方讀者看来似乎瑕疵百出，幼稚可笑，可是却頗投精細有余而胸襟开闊不足

^① 葛德立告訴作者說，在一八六七年的时候，他正担任总稅务司署的秘书，一天走进总稅务司的办公室，他請他的上司注意京报上一道簡派某甲为云南总督的上諭，赫德拿起他的日記，指給葛德立其中所記的一件事，即他曾經建議任命某甲为云南总督、某乙为四川总督，其实在这两个轄区中都沒有对外貿易。某甲已經見报，在这段插曲的一个月之后，某乙也見报了。

^② 在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作者正任台北稅务司，当时对于凡有关国际公法、西方战争法、外交以及中国在一八六〇年后所必須研究的其他問題，帝国的高級官員們无不仰仗海关稅务司的指教和忠告的情形，深为詫異。

的那些中国知识分子之所好；虽然在财政经济方面能力不强，可是在组织和指导别人的工作上，他是一个奇才；但是他的最优异的品质则是他的谨慎。在受到攻击的时候，他绝不放下武器，并且他从来不抛棄一个作法不聪明的税务司，即使在他误解了明晰的训令的时候；但是他绝不把脚迈进到不能拔回的地步，并且在他对一项重要问题作一郑重建议之前，他一定敢保这项建议会被采纳，这不是因为他已经小心地作好准备，就是因为他已经看透大势的趋向。

十六 在常关管理上所持的谨慎态度

赫德爵士的谨慎态度在许多方面都表示出来，所以在他应付因“常”关交由他管理而造成新局面时，也可以看到一个明晰的事例。他在这方面所持的过分小心谨慎的态度，造成许多破例的情形，以致总税务司署的管理权有自天津临时政府直接继承而来的直接管理的那种最高形式，直到仅具名义上的监督的那种最低形式的种种不同。他在燕湖所行使的就是那样一种名义上的监督，以李瀚章和李鸿章久居高位为凭恃的李氏豪族在那里声势非常煊赫——和那样一种势力去抗衡是不聪明的。那里的“管理”只限于收受监督方面实征款数的报表，转报中央行政当局，并提取十分之一的固定经费以供机关开支而已；税务司是一个投闲置散、而不是一个积极的伙伴，总税务司署的接管工作所作的唯一变动就是领取经费，这不妨说是为使不惹事生非而付给的一笔钱。革命使得有必要把一切指定的税收都从成立方才几个月的那个政府的各色集团管理下转移出来，而使总税务司署加强对税款的掌握，俾得扫除一切阻挠的势力；它对于“常”关机构的管理加强了，并且和行之于天津的办法取得了划一。燕湖的机构就是这样置于比较严格管理下的机构之一，结果是呈报的税款从一九一一年的一三八、二五六两银子增加到一九一五年的六三七、〇五四两银子。

十七 在征稅办法上的謹慎态度

但是这个謹慎态度的最明显表现就是处理稅收的方法。關稅應繳入特定的“海關銀号”，它的第一个机构在一八五二年稅務管理委員會成立之前，開設于上海。^① 在每个口岸，这种銀号都是地方的，在監督的直接和单独管理之下，稅務司在任何方面都无权干涉。銀号收到任何稅款之后，即發給与海關机构掣发的“驗单”相符的号收，于是款項立刻任由監督支配。号收轉送海關机关，构成实收稅款季度报告的根据，报告則分送監督、总稅務司、总理衙門（或外務部）和戶部查核。总稅務司署所属机关估稅，監督收款，总稅務司署呈报；但是没有一个中国口岸有总稅務司署的任何机构掌握稅款的任何部分。^② 这便是赫德爵士組織和維持的制度，并且在帝国政府的权力沒有遭到反抗之前，它一直就是这样的。

十八 安格联在稅款征收上所作的变动

安格联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奉派为总稅務司，^③ 在他奉派后几天之内，就面临革命所造成的新情况，这使他不得不放棄这种謹慎态度，而采取一种全新的办法。我可以把他所写的一篇关于当时所采用的办法的备忘录，轉录于下：

“备忘录

“辛亥革命和海關

“随着一九一一年政治动盪之后，海關产生了新的义务和加倍的責任。在各口方面，这种职责就是要收受和計算稅款的現金。

① 參看本書第二卷，第一章第十一节。

② 九龍（香港）和拱北（澳門）兩關是例外，那里的稅款是由海關机关直接征收，按月匯解中国該管官厅。

③ 安格联从一九〇九年四月起一直代理总稅務司，在一九一一年十月一日才接到正式任命。

在总稅务司署方面，則是总稅务司必須負責審核各口稅收并将帳目轉報中国政府，与此相关联的是經理債款和賠款事宜，以供备中国一切以海关稅收为担保的对外債務的支付，以及一切以常關稅收和未抵押的海關稅收余款为担保的庚子賠款的支付。在革命以前，各海關稅务司只对他們协征的稅款作帳，而并不經營凭单繳入代收關稅銀号的現金。海關惟凭号收准貨物通關放行，这些号收构成稅务司手里的稅收凭証。海關銀号并不是在稅务司，而是在監督的管轄之下，監督往往是皇帝直接簡派的地方官。对于各口海關稅款的支配首先要向高級省当局負責的就是監督，各該省当局再轉咨戶部。仅有一部分稅收真正解往北京，并且就所知道的來說，其中沒有分文特別指撥作为它所担保的債務支付之用。中国对外債務的償付集中在上海的上海道手里，基金都是由各省省庫撥解給他——每省負責一个固定的年度比額。中央政府一旦确定了應該協助的款額，似乎就再不大管償債的事了，因而無論在基金的来源方面，或是在撥解的日期方面，伸縮性都很大，至少直到义和团起事时止是如此的。但是即使在动亂期間，債款的支付，一旦到期，上海道也是照例履行。庚子賠款大大地加重了省財政所承担的債務負擔，道台此后所負責的債賠兩款的合并清償事宜似乎使得省款的撥解有了更严格、更准确的必要。虽然实际奉行其事的手續还不尽可知，但是結果是滿意的，并且沒有一个債權人有抱怨应付款項不准期支付的情形。不必說，外国收款銀行方面是滿意于当时情况的，并且也沒有就政府对于担保稅款的支配提出过任何問題。可是当各省开始脫离中央政府的时候，事情就立刻摆明：一向凭以償付外債的制度势必陷于瓦解，因此为求保存抵押作为外債和賠款担保品之用的稅款的每一分錢而把这笔稅款从省当局的管理下轉移出来，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事了。

“縱令应付这样一次事变的必然性已經在意料之中，但是一九

——一年十月間的反滿运动的事起仓猝和蔓延的迅速也不容許事先作好任何行动计划的准备。因为各口的帝国当局不是被赶走，就是逃跑或是投入革命党人一方，所以每一个海关稅务司便都直觉地以总稅务司的名义接管了海关銀号和稅款。对于接管日期以前的已收款項，他們不負任何責任。在設立管理权的过程中，他們沒有遭到什么困难，在控制現款以供作战之用最为事关重要的时候而干涉海关稅款的試图竟不多觀，这充分地說明革命領袖們的爱国情緒和他們对国債的責任感。在大多数地方，只要一語解释就够了；在很少几处地方，有人要求总稅务司保証絕不将海关稅款交由帝国政府支配，并且有一个独立的巡撫直到总稅务司同意在他的地方稅收帳目名称的前面加上‘中立’两字，才認為滿意。在很少的国家里，象这类的事情会以这样一种恕道和合情合理的精神来处理，因为我們必須記住，总稅务司乃是帝国政府的屬吏，并且在政府仍保有管理权的北方各口，他和他所属的稅务司們协征的很大数目的稅款还毫无限制地繼續流入帝国的金庫。总稅务司因此而陷入的地位的尷尬情形，自然不久就变得很难堪了，因为各使館已經为外債清償办法的完全崩潰焦虑起来，并且已經到了要提出要求的阶段，所以总稅务司建議帝国政府，将未独立的北方各口的海关稅收也照已接管的各口稅收的同样办法，置于他的管理之下。这项建議立刻奉准允行——足証帝国当局为維持国家信用而尽力去作一切正当的和适当的事情的意愿，也不落后于革命諸領袖。各使館依次提出抗議，但是在复文中它們得知，对于保証一切为償付外債和賠款之用的已抵押的稅款，中国方面業經采取了步驟。于是双方訂定国际协定，将債賠清还事宜交由总稅务司掌管；①可是

① 参看“中国，第一号”，一九一二年第一二一号；“中国，第三号”，一九一二年，第一、第五九、第八一、第九二、第一一三号；“中国，第三号”，一九一三年，第二四、第二五、第三一、第三七、第四〇、第六三、第七三号。

應該注意的是，這些協定是帝國政府在其瓦解以前訂定和批准的，繼它而起的共和政府也曾經慎予尊重。最初在支應上項協定締結期間滯付的債款方面，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耽擱，但是所有這些款項最後都很容易地從這期間蓄積的基金中予以支付。滯付的賠款則成為比較困難的事，有採取特殊辦法予以清償的必要；但是在這一點辦妥之後，債賠兩款的清還事宜也就順利進行，無須令人操心了。有了抵押作為賠款第二擔保品的鹽稅方面的協款，基金始終是足以應付一切需要而有余的。債賠兩款的清償事宜由稅務司奉總稅務司之命在上海進行。定期會計表報由後者分別送呈中國政府和代表外國債權人利益的銀行委員會查核。這項協定中所體現的諒解——將債務的管理連同對外國債權人的絕對擔保品一并留在中國的手裡，顯然是這個國家的特色；但是沒有一個特殊性質的海關組織，這一定是辦不到的。若說海關人員在一九一二年時曾居于它的僱主和‘債款出納’機構之間以為緩沖地位，的確不是言之過當的。”

安格聯在一九一二年三月間對於他的同事們，各海關稅務司應付困難局面的方法之所以表示滿意，可說是有充分理由的：

“海關在一個財政完全解體的時候，對維持國家信用所作的重要貢獻，以及各關稅務司為一般利益計所盡的努力，已經得到公認，我能見到這種情形，殊以為慰。談到過去的問題，對於各位準備有素，臨事措置適宜，並且在某一些地方處於危險和不安的情形下，應付並克服了不平常的困難，現在我願意表示我本人的感佩之忱。”

十九 赫德爵士對海關管理的絕對性

雖然赫德爵士在中國政府中所處的是個很有影響力、但並沒有權力的地位，可是對於海關人員，他的權力卻是不受監督，他的管理是不受節制的。在早年間，他的稟賦的謹慎使他能自行克

制——他自設一項章程，規定除去稅務司缺職的選補外，晉級應照例根據年資，只是每五個人之中保留一人，由他根據特殊功績選補；但是隨着他的權力的滋長，他丟開了一切限制，他差不多以“功績”為他唯一的指南——但是海關中的輿論並不盡同意他對於功績的評定。約翰·勞倫斯爵士 (Sir John Lawrence) 在印度總督任內，曾經有一次被他的一个近親問道：“你為什麼不給我這個位置？我也和別人一樣的合適。”約翰爵士回答說：“問題正在這裡；正是因為你也和別人一樣的合適，但是你是我的近親，你必須比別人更加合適，那才使我有理由把這個位置給你。”^①赫德爵士，特別是在他的晚年，一定是接受了這種論親屬的邏輯，而且還把這種親屬關係推用到許多血緣以外的人的身上。在他的暮年，海關中不滿的情緒很大，但是他深沐中國行政方面的恩寵，沒有任何辦法可以削弱他；也沒有任何物議可以限制他的獨裁統治——一種想怎麼辦就怎麼辦的統治。

二十 他的政治影響力激起的不滿

他畢竟已經喪失了他的權威地位。他在行政方面的影響力一年年地增加，直到一八八七年前後，達到了登峯造極之點；從那時起就一蹶不振。^②這部分是由於個人失了身價，但主要是因為官僚階級對他的外交政策的憤慨。供備對日戰爭賠款之用的一八九五、一八九六、和一八九八年的借款都是以海關稅收為擔保的，^③稅款中只剩了一小部分關余供帝國的需用；官僚階級現在看清洋關的存在，主要是作為外國債權人的收款代理人，而再不能達

① 包斯華茨·斯密司 (H. Bosworth Smith)：“勞倫斯勳爵傳” (Life of Lord Lawrence)，卷二，第四六五頁。

② 參看第二卷，第十七章第三十節；第十八章第二十四節。

③ 參看本卷第二章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節。

成作为它繼續存在之根本的那个目的——認真征收和照实呈报一笔足額的稅款以供帝国政府的使用。而且海关已經攫得对港、澳、沙船貿易的管理权——中国官吏(特别是滿洲人)的一块禁脔；已經插足于一部分中国国内稅的督征；繼而又指揮和經營日益发展的邮政事宜。現在，当中国作城下之盟的时候，它通过“辛丑条約”和一九〇二与一九〇三年諸商約的規定，变成了它的主人的主人；現在要扩大它的重要性的的是外国关系方面，而不再是中国人；可是失去了中国人的欢心，它也就失去了它的大部分重要性。

二十一 一九〇六年五月九日稅务处成立

海关的重要性和总稅务司所發揮的影响力的根源乃是总稅务司对外交部門、总理衙門或外务部(現在的外交部)的直接依附关系和海关人員对总稅务司的絕對隶属关系。中国当局虽然那样为局势所煩惱，虽然急于寻求一个解决办法，他們并没有打乱后一种关系；但是他們切断了另一个根源，即总稅务司和一个部的关系，那个部曾經管理中国对列国和列国使节的关系，而且在一九〇一年以前，实际是政府的內閣。一九〇六年五月九日的一道上諭派戶部尚書鉄良为督办稅务大臣，外务部左侍郎唐紹仪为会办大臣，“所有各海关华洋人員統归节制”；并且后来的一道上諭又令飭成立稅务处——海关事务处，以他們两个人为主持人。^①在这两个人之中，鉄良，滿人，是一个溫和进步派；唐紹仪，汉人，是广东极端維新派的領袖。

二十二 外国关系方面的不安；赫德爵士重申保証

外国各界人士立刻相当普遍地現出惊慌。当那时外交政策的主要凭借，洋关被打击的时候，每一件事情似乎都失去了依据。外

^① 总稅务司通令，一九〇六年五月十四日、七月二十七日。

交家們怕要有一次政治改革；商人們怕海關中又要改行中國辦法；債權人們怕他們的貸款的保證要削弱；英國報紙怕這是要規避聘用英國人為總稅務司那項義務的一個狡猾的東方手法。^① 赫德爵士急速把這些紛擾平息下來，象向來一樣地忠實於政府而不顧念自己的地位。他向他的新首長們說明公眾的疑懼，並且特別經他們和外務部授權，把他所奉到的海關工作仍照常進行的訓令公布——“總稅務司與稅務處之位置，既照向日與外務部同一辦法，各關與郵局亦均照常辦理”。^② 在他的私人通信中，他也同樣着重聲明，管理權的變動並沒有造成他的地位的變更。^③

二十三 赫德爵士的日暮窮途；一九 一一年九月二十日逝世

他的個人地位畢竟受到了一個嚴重的打擊。甚至於在稅務處

① 參看第五章第二十六節。

② 總稅務司通令，一九〇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十月三十日；“中國，第一號”和“中國，第二號”，一九〇六年；“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六年，第二八〇及以下各頁。

③ “這對於我依然還是一件‘隨你是什么’的事。雖然我是向稅務處而不是向外務部報告，但是工作仍象以往一樣地進行，若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倒只有更好一點……一切物議都忽略了一件事實，即中國只負有按照劃一制度辦事的責任，並沒有保持總稅務司署的義務，我從來就不是獨當一面的，而始終是受管轄的，只是現在管轄機構是處而不是部罷了。……海關在部的管轄下有多長的壽命，在處的管轄下也會有多長的壽命，但是中國人治中國的說法已經風靡一時。……處固然不是象部那樣的一個仰之彌高的上級機構，但是我們的地位將有賴於我們的工作，而不在乎我們所隸屬的部門，我們在處的管轄下和在部的管轄下，都一樣可以把事情辦好的。”——赫德致漢南(C. Hannen)函，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漢南在赫德奉派作他的上司的時候，已經是一位稅務司，現在(一九一七年)退職居住英國。

“海關在稅務處下面工作，和在總理衙門與外務部下面工作是完全一樣的。……海關的性質和聲望全要看它本身、它的品質和它的工作，而不在乎管轄它的那個中國部門的名義。如果我還能工作三十年的話，我樂意象為部一樣地為處服務，我所以不得不考慮離職的原因，是年齡的關係而不是厭棄，是身體日衰，而不是工作無法施展或打擾橫生。”——赫德致馬士函，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成立以前，他已經看出外務部不大願意邀他去幫忙，^①後來他更認清他已經不再是中國國際關係上的一個謀士。^②在一八八五年他曾經呈請辭職，以便就任英國的駐北京公使，但是當他察覺他不能阻止因李鴻章的影響而任命德璫琳為他的繼任者時，他打銷了辭意。^③在一八八八年，他著實為他的健康情形擔心，曾經想退休；當時他果真辭職，他的繼任者或許因劉坤一的影响，會是威廉·葛德立(William Cartwright)，一個敏於決斷和特立獨行的英國人。在一八九六年他又想退休，這時他的繼任者會是賀璧禮，也是一個英國人。從一八九七年，有作他的繼任人迹象的是他的親戚裴世楷；但是當一九一一年赫德爵士逝世的時候，他是由安格聯繼任的。自從一八八八年以來，年復一年地，在他的私人通信中，盈篇累牘都是些關係他的健康和迫切需要休息的話，以及他打算擺脫工作的意思；但是一年又一年，他被中國國際關係上的一些危機給羈留下來，在這類危機之中，政府是決不許可他離去的；一年又一年他勉強以他的衰病之軀作他奉派的工作。在一九〇八年春季，他作第三次——也就是最後一次——的休假，在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日，仍正式在家休假的時候，主持了他留有特殊印象的一個龐大機構半世紀之後，與世長辭。在那半個世紀中，他為中國和與中國有條約關係的各國完成了一件有很大價值的工作；他的工作備承各國頒賜榮典，以作酬答。^④

① “外務部現在在我主管的範圍以外，不大需要我的幫助或建議了；既然一應聽我自便，干預其事的机会也就不太多了。除駐外公使(專使)給予充分的情報和建議外，部里的三、四名通譯人員使該部能够离开我而辦理——或办錯——它本身的業務。”——赫德致杜德維函，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五日。

② “雖然稅務處並沒有過分干涉我的工作，但是處境却今非昔比了；因為同外務部的接觸已經少到這樣的程度，致使總稅務司簡直成了一個稅務處的人；這種滋味將會使人一天天地感覺得更深。”——又函，一九〇七年十月二十日。

③ 參看本書第二卷，第十八章第一至第四節。

④ 關於他領受的榮典一覽表，參看附錄5。

第十五章 帝国的复亡

- 一 汉人对满洲统治者的愤慨.....436
- 二 一九〇二年二月同化满汉的上諭.....437
- 三 一九〇二年一月通飭教育革新的上諭.....438
- 四 传教士教学的开端.....438
- 五 美国和其他教会学校的伟大工作.....439
- 六 同文館或方言館.....440
- 七 中国赴美教育考察团.....440
- 八 一九〇〇年以前的国立大学堂.....441
- 九 义和团以后的山西教育事业.....442
- 十 国家一般教育事业在中国的創始.....442
- 十一 一九〇七年一月瞬息即逝的尊孔的逆流.....443
- 十二 满洲的局势；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英日协定.....444
- 十三 因而产生的一九〇二年四月八日的中俄协定.....445
- 十四 俄国盘踞东满不放.....446
- 十五 一九〇三年四月俄国人奉派主持牛庄海关.....447
- 十六 一九〇三年四月俄国对中国的新要求.....448
- 十七 报告經俄国人断然否認.....449
- 十八 俄国阻止通商口岸的开放.....450
- 十九 一九〇四年一月俄国不再阻挠英国的要求.....452
- 二十 一九〇四年二月八日日俄战争开始.....453
- 二十一 战争中的陆海軍大事.....454
- 二十二 满洲以外的中国宣布中立.....455
- 二十三 中国对俄国兵船的待遇.....456
- 二十四 中国对禁运品方面的措施.....457
- 二十五 中国在新局势中的束手无策.....458
- 二十六 一九〇五年一月中立国声明与己无涉.....459
- 二十七 应六月八日美国的邀請，各派全权大使.....459

二十八	交涉經過；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的朴茨茅斯條約	460
二十九	使中國舉國震驚的結果	461
三十	一九〇五年五月至九月，抵制美貨	462
三十一	反吸食鴉片風潮的再起	463
三十二	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の上諭；應聲而起的 反應	464
三十三	外國鴉片進口的銳減	464
三十四	一九〇九和一九一二年的國際鴉片會議	466
三十五	憲政改革的學潮	467
三十六	一九〇六——一九〇八年憲政改革的嘗試辦法	467
三十七	所行辦法的毫無希望	468
三十八	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四、十五日，皇帝和西太后 的逝世	468
三十九	新皇帝宣統；袁世凱的倒台	469
四十	堅持立刻召集國會的要求	470
四十一	一九一一年五月第一任總理慶親王；他的性格	471
四十二	一九一一年十月的革命；一九一二年二月 十二日皇帝退位	471
四十三	一八三四——一八六〇年衝突時期的總結	472
四十四	一八六一——一八九三年屈從時期的總結	473
四十五	一八九四——一九一二年的被制服時期；帝國留 給共和國的遺產	474

一 漢人對滿洲統治者的憤慨

在一八六〇年，當中華帝國的軍隊被兩個西方國家打敗，而另一個國家又將它的滿洲版圖內烏蘇里江以北一帶據為己有的時候，當它的中原各省幾乎沒有一省得免于叛民侵擾的時候，它已經江河日下；在一九〇二年，它卻又因義和團起事的解決辦法，而達到了自從滿洲人的大清朝統治以來，乖運的頂點。照西方列強看來，這個解決辦法是索諸帝國的一個公平取償，因為帝國的

統治者和領袖們曾經不顧它的最有經驗的政治家們的明智意見，公然挑畔，破壞了國際公法的每一個原則；但是照中國人民大眾看來，取償似乎和過失不成比例。凡年來國內有一些排外騷動，^①都是以傳教士為目標；但是這些騷動一般都交織着對於增派和開征新稅的不滿情緒，那些捐稅是各省官吏為彌補因帝國政府支付賠款之需致使省庫的財源和他們自己的外水匱竭，而強行派征的。無論對中央政府或省政府都是民怨沸騰，這表現在許多省份的盜賊蠶起，而以廣西和江西的武裝叛亂為最高峯；這種不滿的情緒更為孫中山所領導的強有力的反清黨（實際上是廣東全省）和大多數省份中主張變法的康有為的信徒們不斷地激盪鼓動。^②

二 一九〇二年二月同化滿漢的上諭

帝國的滿洲統治者們模糊地看到確有作一些興革的必要。在一九〇二年二月一日慈禧皇太后接待外交團眷屬的那一天，^③她以自己一個人的名義頒布了兩道懿旨。^④第一道，首先述明“入關之初，風俗語言，或多未喻，是以著為禁令，今則風同道一，已歷二百餘年”，自應開除禁令，並著准彼此通婚；其中擯斥漢人婦女纏足的风氣；但飭令滿洲幼女仍須應選秀女，“免蹈前明弊政。”第二道令飭慎選宗室和八旗（滿洲各旗）的少年，遣赴各國留學，“借資練習而廣見聞，用副朝廷圖治育才之至意。”這兩道懿旨，在無知的西方讀者看來，似乎是無關宏旨的，但是這却表示出得勝的滿洲人對降服的漢人的態度上的一種異常的轉變，遠比英國最初兩位諾曼王治下的同樣轉變要重要得多；但是這些卻沒有觸及帝國的臨頭

① “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二年，第一五九及以下各頁；一九〇四年，第二〇〇及以下各頁；一九〇六年，第三〇八及以下各頁。

② 參看第六章第三、第四、第五節。

③ 參看第十三章第四節。

④ 譯文載“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二年，第二〇八頁。

大祸的根源，国家还是依然故我。

三 一九〇二年一月通飭教育革新的上諭

另一項改革接触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利益，教育。一九〇二年一月十日的两道上諭^① 飭令将翰林院人員“量才”分等，和重建京师大学堂，以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在京师大学堂的外籍教职員中，經驗丰富的汉学家兼教育家美国人丁韪良博士 (Dr. W. A. P. Martin) 任总教习。西方知識——即发軔于东方，后經西方学得，并在近世予以发展，而現在又重新輸入东方的那种科学——的教育曾經循由四个途径来发展：教会的教育运动；北京和广州的同文館；中国駐美教育考察团；以及最后，政府为使普及于全国所采取的措施。

四 傳教士教学的开端

中国最早的外籍教师是耶穌会的神甫。在明朝历代皇帝治下，他們的科学知識得到了承認和利用；利瑪竇 (Matteo Ricci)^② 将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本 (Euclid) 譯成中文，熊三拔 (Sabatin de Ursis)^③ 則奉皇帝之命，担任校正历法的工作。在滿清历代皇帝治下，这些伟大名字的衣服由耶穌会的許多別的人接传下去，其中最著名的是湯若望 (Adam Schaal)^④ 和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⑤，他們都躋身于很高的政治地位；但是这种地位有它的危险性，因而在一七二四年开始了对羅馬天主教会的大迫害，它的传教士都被逐出中国。俄国人在他們的一七二八年“恰克图条約”中，取得在北

① 譯文載“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二年，第一八二頁。

② 在一五八二年到达中国，死于一六一〇年。

③ 在一六一一年到达中国。

④ 一六二九年到达，死于一六六五年。

⑤ 一六六二年到达，死于一六八八年。

京設立一个授业学堂的权利；它对于填补因耶稣会教士被逐所造成的空隙，作了一些工作，但是一个世紀之后，它的遗迹也一并泯沒不存了。台湾的荷兰殖民者（一六二四——一六六一年）似乎并没有对它的落后居民作过任何教育工作。真正基督新教教会的工作是在十九世紀开始的，英国人自一八〇七年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到达开始，美国人自一八二九年裨治文（E. C. Bridgman）的到达开始；在后一个日期的二十年之后，在中国的基督新教传教士，于成年男子之中，計有十九个英国人、四十四个人、二个瑞士人和二个德国人。在早年間，传教士本人就是学生；他們所作的講授必然是只限于訓練他們的助手；但是他們的妻子往往教授中国青年；① 在澳門，传教士建有馬礼逊学堂（Morrison School），由美国海外布道会（American Board）的柏郎瓦牧师（Rev. S. R. Brown）主持。

五 美国和其他教会学校的伟大工作

半世紀中，特別是一般本人是大学毕业生的美国人，利用他們的才能教学，并使它成为把福音带到中国的一种助力。② 在早期的教育家之中，可以提到的計有山东登州府的梅礼士牧师（Rev. C. W. Mateer），直隶通州的謝斐德牧师（Rev. D. Z. Sheffield），上海的林乐知牧师（Rev. Young J. Allen），以及在后一代中上海的卜舛济牧师（Rev. F. L. Hawks Pott）和北京的罗瑞牧师（Rev. H. H. Lowry）。③ 在这些和其他許多教师的倡导下，开办了几百所学校以教授中国青年。在一九〇五年，基督新教教会主持下的学校总

① 例如，容闳最初就是在一八三九年受教于郭士立夫人（Mrs. Gutzlaff）。

② “文学博士李提摩太牧师（Rev. Timothy Richard，本人是英国人）曾經叫人注意到这事实，即差不多中国所有的专门学校都是由美国人创办和配备的。”——路易斯（R. E. Lewis）：“远东的教育征服”（The Educational Conquest of the Far East），第一七一頁。

③ 这些人分別属于长老会、公理会、美以美会和圣公会。

数在中国計有二、五八五所，其中十四所（內有美国的十二所，英国的二所）可以說已經躋于十足的专门学校的地位；学生人数达五七、六八三名，內男生四七、七五四人，女生九、九二九人。^①在一九〇〇年以前，中国正是从这些和香港的一些官立学校来吸取它的男女人才，他們至少具有一些西方知識，尽管不尽完备，也至少总有一些使用英語的能力，尽管在讀、写、算各方面都还不尽正确。

六 同文館或方言館

在一八六〇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和外国使节发生直接关系，在一八六二年同文館或方言館直接奉恭亲王的札諭开办，附設于新成立的总理衙門。在一八六五年，課程中增添了科学，从而把学校提高到专门学校的地位；这个学校的管理交由海关总稅务司負責，当时总稅务司已經在北京設署办公。在一八六九年，丁韪良博士奉派为总教习，他担任这个职位一直到一八九四年；在一八八四年其中計有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国际法、化学、数学、天文学和生理学各班。学生全部都是調自八旗的子弟；領有生活津貼，“实領奖学金”的名額在一八八七年是一二〇名。这个专门学校和广州的一个規模較小的类似专门学校供給总理衙門和駐外使館的一切翻譯人才，陆續达三十多年之久，但是它对于帝国的教育制度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②

七 中国赴美教育考察团

容闳在一八二八年生于广东，在澳門馬礼逊学校学习英文，并在一八四七年由他的老师柏郎宜帶往美国。一八五四年毕业于耶魯大学，然后返回中国。他深信中国需要象他自己那样精通西学

① “基督新教在中国一百年”，上海出版，一九〇七年。

② 关于北京同文館比較詳細的評价，參看附录6。

的人，在一八七〇年他得到了曾國藩、李鴻章和丁日昌等三位帝國的重要漢籍政治家的贊助。根據他們的創議，一八七一年八月降下一道上諭，核准組織中國教育考察團，以容閔和陳蘭彬為監督。審慎選定的學生一二〇人，自一八七二至一八七五年每年分送四分之一赴新英格蘭。他們分住在當地各村鎮的私人家中，每家不過學生二人，然後他們及時被送入最好的中學或小學，然後那些合格的人再繼續升入大學或專門學校。在幾年之內，因為不斷有學生們逐漸失去他們的中國特性而已經美國化的報告，中國政府的守舊本性又被煽動起來；於是在一八八一年考察團解散，學生全部被召回。在他們回國之後，他們受到一批盛怒的官僚們的極其侮辱的待遇，并被分派到最低級的事務工作上；^①但是他們的顯著才能，特別是在對日戰爭之後，逐漸產生了效果，於是他們一個個地從落魄之中，擢升到顯著的地位。在一二〇名曾經派赴美國的学生中，到一九〇七年還活着的有八十名，其中二十三名已經晉到候補道或更高的品級。

八 一九〇〇年以前的國立大學堂

國家的獎勵西學是遲遲其來的，但是在對日戰爭之後，北京京師大學堂、天津北洋公學和上海南洋公學等的創辦，已經作了一個開端。這三個學校都有有力的官方支持；並聘有三位博學的美國教育家為它們的總教習，^②和一大批以美、英人為多数的教授，它們不久就有了足以承擔一個總計劃的骨干任務的資格。這的確也就是張之洞和劉坤一的計劃中所要加給它們的任務；^③但是這些

① 一篇很好的簡要的敘述載在佟開生(Tong Kai-son, 譯音)著“中國駐美教育考察團的歷史和成果”(History and Outcome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天津, 一八八八年。

② 丁韞良、田夏禮(Charles D. Tenney)和福開森(John C. Ferguson)。

③ 參看第六章第九、第十一、第十二節。

计划在反革命运动中被扫荡净尽了，在义和团乱事之后，只剩下三个没有教育基础的大学，而全凭传教士所建立的学校，来为它们造就学生。

九 义和团以后的山西教育事业

在义和团乱事之后，山西省接受了一个由国家补助的办学计划，以作为开脱该省境内所犯反叛罪的别样处罚的一种方法。在一八七六——七八年间大饥饉的时候声名素著并且非常受人尊敬的传教士、慈善家和教育家李提摩太博士^①救济山西飢民，曾经最为热心，^②在随后十年之中，也一直是在该省工作。一九〇一年，他应山西巡撫和中国議和大臣們的邀请，充作山西和列强間的調停人。除去其他建議而外，他声称，无知是中国困苦的主要原因，他想用一项教育计划为那犯有如此罪行但又为他如此心爱的一个省份，消除这个原因；为完成这项计划，他建議由该省在十年之内支付一笔五〇〇、〇〇〇两銀子的賠款，在太原府建立一个大学并在各重要城市分建学堂。^③中国人欢迎这个计划；各教会不想为他們被戕杀的教士要求报复而热心于推广它們慈善事业方面的工作；列强也接受了撇开他們的軍事和外交顧問們而对这个问题所作的解决办法。錢源源而来，用这些錢設立的大学校和学校，虽說在外国管理之下，^④却是一些国立的学校。

十 国家一般教育事业在中国的創始

在一九〇一年年底，当朝廷正在迁回北京途中的时候，有一道

① 担任中国基督教文会(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of China)的常任秘书多年。

② 参看本书第二卷，第十五章第一、第二节。

③ 明恩溥：“中国在激变中”卷二，第七二九頁。

④ 邓肯(Moir Duncan)是太原府大学的校长。

上諭令飭籌辦國家的西學教育，並為具有這種知識的學生們進修起見，公布一項確定方案，又在一九〇三年成立了一個新的部，學部，即教育部。一切革新的步驟都被日俄戰爭牽制住了；但是在一九〇五年有一項創辦各級學校的方案付諸實施。根據這項方案，在一九〇九年底共總創辦了五個大學、八個專門學校、四四〇個中學和師範學校和五七、〇一一個其他的學校，共計教師九〇、〇九五，學生一、六三七、四四一名。^① 對於如此廣袤的一個帝國，這不過僅僅是一個開端，但卻是一個大有希望的開端，可是一想到這樣一個偉大事業的缺乏適當師資的情形和上述年份該部經費僅只一、一五五、六三一兩的數目，又不免令人寒心。^② 當時並沒有作過任何嘗試來吸收，甚至以任何方法來承認外國傳教士所創辦和經營的許多優良的專門學校和學堂，雖則這些學校實際上很少，或許根本就沒有強求它們的學生作任何宗教宣誓，或採取任何直接辦法來影響他們的宗教信仰。除去國立大學的學生以外，還有許多人前往外國去吸取他們在國內所不能受到的教育——每年有幾千人去日本，幾百人去美國，幾十人去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在這些晚期的留學生之中，於一九〇九年，有十三人錄為翰林，五十二人為進士，一百九十人為舉人。^③

十一 一九〇七年一月瞬息即逝的尊孔的逆流

舉國趨向“西”學。那曾經裝備了列國并使它們能夠憑以挾制中國的正是這個東西；那曾經使日本能憑以從同樣俯首聽命的地

① 學部的報告，載“中國年鑑”，一九一二年。

② 學部大臣的“薪俸”是一八〇兩銀子一年，但是那一年所得的“津貼”約達五、〇〇〇兩。——“中國年鑑”，一九一二年，第三二一頁。

③ 同上，“約有學生百人在九月九日搭暗輪船‘中國號’離滬赴美，擬分別入專門學校和大學攻讀，修業四、五年。一行之中有女生十五人。大多數學生都是以政府的賠款獎學金留學的。”——“聖約翰回聲報”，上海，一九一六年九月。

位躋身于国际平等之林的，也正是这个东西；那么所需要借以賦給中国以同样能力的，自然是舍此别无他物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不分滿、汉，已經准备将一切把中国人弄成这种样子的那些学問，拋到垃圾堆里，牺牲他們二十五个世紀以来从篤信孔子哲学中所得到的这一切事物。但是国里却有一派人，希望保存旧学，保持中国的原样；并且他們在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得旨，把孔子从国家大臣們所祭祀的配享日月的地位，提高到惟有皇帝才能祭祀的配享天地的地位。一九〇七年一月六日的上諭，飭在山东曲阜县，孔子的降生地建立一个大学，专门闡揚他的教訓；一月十四日的一道上諭飭将西学附丽于中学。^①这个运动是张之洞领导的，他从而也就把他的維新建議拋棄得一干二淨了；^②但是就連他的名字的魔力也堵塞不住滾滾的浪潮，这个背逆潮流的措施沒有能够达到它的目的。

十二 滿洲的局勢；一九〇二年 一月三十日英日协定

一九〇二年这一年是以俄国軍队对滿洲全境的确实的軍事占領为开始的。^③ 在各国已經作过与己无涉的声明之后；这样一种局勢对于一切外国利益，以及名义上是領土主人的中国的一切利益，就大有危險了。为了抗衡起見，英国和日本締結了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的“英日协定”，^④ 协定的非正式談判是在上年四月間开始的。这项协定为期五年，并規定：两国中的任何一国为保护它在中国和朝鮮的利益，得采取必要行动；如果在采取这种行动

① 北京“专訊”，伦敦“泰晤士报”，一九〇七年四月二十日。

② 参看第六章第十一、第二十一节。

③ 参看第十一章第三十七、第三十八节；第十二章第十六、第十七节；第十三章第一节。

④ 譯文載“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二年，第五一四頁。

时，任何一国受到攻击，另一締約国应“严守中立，并尽力防止其他国家参加对它的盟国的軍事行动”；但是“倘如第三国家参加对盟国的軍事行动，則另一盟国应立即声援，共同进行战争，并協議締和。”这个协定被公公道道地称为“防守同盟条約”^①；据称“其中并没有任何可以视为侵略或自私趋向的規定”^②；并且俄国这个受直接影响的國家，也承認这种性质，但同时却自行保留在迫于“危及中国的完整和自由发展”的情况时，采取任何行动的权利。^③

十三 因而产生的一九〇二年四月八日的中俄协定

这个行动的直接結果就是加速俄、中滿洲条約的締結，这个条約已經拖延很久，但于一九〇二年四月八日在北京签字。^④根据这项条約，俄国允在东三省各地归复中国权势；在适当履行前已存在的諸契約的条件下，^⑤俄国同意将它的軍隊在六个月以內从辽河以西的地方撤退，十二个月內从盛京和吉林其余各段撤退，和十八个月內从齐齐哈尔撤退；中国軍隊应先行商得俄国当局的同意后，方得重新占領已归复的各省；此外对于鉄路的交还、一切新的修建工程以及俄国經費的賠償等等，都訂有特殊协定。根据条約，辽河以西地方和山海关、营口、新民府各鉄路，应在六个月以內如期交还中国管理。^⑥辽河东岸的营口（牛庄的通商口岸）是在“盛京……其余各段”的西边上，依限应在一九〇三年四月八日以前撤兵。俄

① 仇德致海約翰函，一九〇二年二月十二日，“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二年，第五一三頁。

② 兰斯敦勳爵致贊納乐爵士函，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同上。

③ 提交給兰斯敦勳爵的俄、法联盟政府的备忘录，一九〇二年三月十九日，“中国，第二号”，一九〇四年，第三五頁。

④ 譯文載同上，第四〇頁；“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二年，第二八〇頁。

⑤ 参看第四章第十二至第十五、第二十六节。

⑥ 薩道义爵士致兰斯敦勳爵函，一九〇二年十月三日、十一月六日，“中国，第二号”，一九〇四年，第四八、五〇頁；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二年十月六日、三十日，“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二年，第二八一頁。

国当局在那里是完全占有一切的：洋关工作必須和他們咨商；常关掌握在他們的手里；两关所征的稅款都不繳入中国的銀号，而繳入俄国的华俄道胜銀行。因此，口岸的地位和口岸的撤兵問題也就是和諸商业国多少有些关系的一件事了。

十四 俄国盤踞东滿不放

营口方面并没有如期撤兵，在北京方面，俄国公使所持的理由是中俄医务人员商定检疫章程的協議还没有圓滿竣事；^① 在营口方面，所持的理由是該处还没有道台；^② 在圣彼得堡，中国公使接得通知說，这是因为有外国兵船出現于該口；^③ 在伦敦，俄国大使声称，“如果牛庄方面的撤兵工作还没有进行，那只是因为有些特殊和充分的理由致有所耽擱。”^④ 前三个理由显然只是借口，真正的原因可得自于最后一項。俄国想要在鴨綠江以西作滿洲的主子，就象日本已經在鴨綠江口以东是朝鮮的主子一样；可是俄国当局已經看出日本有向他們的优势地位挑衅的迹象。^⑤ 关于“俄国私人可能已經[在鴨綠江流域]取得了木材利权”的事，正是在这时候

① 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三年四月十八日，“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三年，第五三頁。

② 唐来(Townley)致兰斯敦勋爵函，一九〇三年四月九日，“中国，第二号”，一九〇四年，第五一頁。

③ 斯各脫爵士致兰斯敦勋爵函，一九〇三年四月十五日，同上，第五二頁。

当时港內有两艘俄国的，一艘英国的和一艘美国的炮艦，以期保护外侨免受騷扰。
——唐来致兰斯敦勋爵函，一九〇三年四月十七日，同上。

④ 兰斯敦勋爵致斯各脫爵士函，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同上，第五三頁。

⑤ “鴨綠江附近已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一定是日本人在那里有什么进展，俄国大不惬意；但是据我了解，它們已經就地采取措施，此間并没有談商这件事。……外务部对于延迟撤兵的問題默不作声。”——赫德致包瑞(C. A. V. Bowra)函，一九〇三年四月十二日。

在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已經接到俄国軍隊向鴨綠江方面調动的令人不安的报告。
——唐来致兰斯敦勋爵函，一九〇三年四月八日，斯各脫爵士致兰斯敦勋爵函，四月十五日，“中国，第二号”，一九〇四年，第五二、七一頁。

第一次被正式提到的，据承認，有“一个退伍的俄国軍官”貝卓布拉左夫將軍(General Bezobrazoff)已經取得了这样一种利权；^①但是俄国的帝国野心和日本的同样野心勃勃的目的，乃是說明两国在那一年中的行动的原因。

十五 一九〇三年四月俄国人奉派主持牛庄海关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海关有一个俄籍員司奉派为主持牛庄关的稅务司。作这样一种委派的問題，在一年前已經发生，但是包瑞，一个英国人，正負責主持該关，并且听說要他“坚守堡壘”^②——象柏卓安曾經坚守朝鮮的堡壘一样。^③一年之后，俄国对中国政府的压力已經强硬到在这样一个小問題上都使人无法招架，于是一个名叫科諾凡洛夫的俄国人奉派繼任包瑞的职务。^④这项委派“造成許多不滿意；在牛庄，俄国現在将拥有海关稅务司、常关和海关道”^⑤；但是不滿意是沒有充分根据的。对于外国势力范围内的海关，赫德爵士一貫是在外强方面的压力或中国方面的訓令下，委派各該外强所能同意的稅务司。大連关稅务司，自从一九〇五年以来，一直是日本人；胶州关是德国人；九龙关（香港）是英国人；东京边关照例是法国人或美国人；騰越关是英国人；自一九〇五年以来，滨江关是俄国人。科諾凡洛夫象他的所有同事一样，早已为“固有的一視同仁精神所熏染同化”，因此俄国的

① 又函，同前引。

② “至于調派一个俄籍稅务司到牛庄去的事，我还没有听到什么，我把你看成是下一年之内那个地方的固定人选。如果你的健康情况允許你的話，就繼續做下去：你現在不但是为了你自己的前途正在奋斗之中，而且你是‘在坚守堡壘’，这不是調防的时候。”——赫德致包瑞函，一九〇二年三月十七日。

③ 参看第一章第十九节。

④ 赫德致包瑞函，一九〇三年四月十二日。

⑤ 唐来致兰斯敦勋爵函，一九〇三年四月十七日，“中国，第二号”，一九〇四年，第五二頁。

希望和別國的疑懼一概都沒有成為事實。^①

十六 一九〇三年四月俄國對中國的新要求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俄國開始籌劃以一項所謂“條約七款”（“Convention of Seven Points”）的對華新協定，來鞏固它在滿洲的地位。俄國要求中國同意作為滿洲進一步撤兵的前提條件的這七款，是：不得在滿洲开辟新通商口岸或駐扎外國領事；在華北的公職中，除俄國人而外，不得雇用其他外國人；蒙古行政的地位保持不動；牛莊海關的進款繼續存放於道勝銀行；牛莊的衛生委員會由俄國人管轄；俄國保留旅順口—營口—奉天電報綫的管理權；滿洲的領土不得割讓與任何國家。^② 關於第二點，中國大臣們“秘密告訴我說……直隸也打算包括”在禁止雇用非俄籍外國人的區域內。^③ 美國政府立刻抗議中國接受這前兩款，並保留對其他各款的磋商；^④ 英國政府以接受俄國要求的危險，警告中國；日本則“致送一件警告兼抗議的通牒。”^⑤ 禁止在滿洲开辟通商口岸和駐扎領事是極關重要的事。美國的議約委員已經要求開放鴨綠江上

① “科諾凡洛夫的任命自然是有種種原因的，我料想這項措施的明智日後會從它的結果中表示出來，但是在初開始的時候，它不免使人思想波動，引起物議，甚或招致反對。科諾凡洛夫將會居於一個複雜而困難的處境，但是他曾經和我共事，並在我自己眼前工作了三、四年，他已經受了真正的一視同仁精神所薰陶，我希望他會使我本人，和終於使大眾滿意。作這項任命的人，我自己，自然會受四面八方的詆毀；但這是日常工作中司空見慣的，我始終是自己為自己作決定，自己作事，自己負責。”——赫德致包瑞函，一九〇三年四月十九日。

② 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五月四日，“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三年，第五三、五六頁；唐來致蘭斯敦勳爵函，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七日，“中國，第二號”，一九〇四年，第五四—五六頁。

③ 唐來致蘭斯敦勳爵函，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同前引。

④ 海約翰致康格函，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三年，第五四頁。

⑤ 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同上。

的安东和大东沟以及奉天为通商口岸；^①而現在，五月間，他們报告称：“中国委員因未奉政府訓令，謝絕討論滿洲各口的开放。”^②

十七 报告經俄国人断然否認

对于外传有关滿洲問題協定的可靠性一节，俄、中两方曾一度、矢口予以否認。^③現在中国不但承認这件事實，而且立刻將俄国要求的原文照會各國公使。^④俄国亟力否認；它的外交大臣和駐外國的大使、公使們一致堅持地和負責地声称，这些消息全无實据；^⑤只有一位俄国駐北京代辦竟这样坦白地說，撤兵的延迟是由于俄国軍方的緣故，但是就連他也声称，“照他看，牛庄方面会在短期內撤兵的。”^⑥这些否認之辭，自然沒有人相信：英、日、美互相保證，

① 參看第十三章第十四節。

② 古納致海約翰函，一九〇三年五月二日，“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三年，第五頁。

③ 參看本卷第四二二頁注②。

④ 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三年五月四日，“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三年，第五六頁；唐來致蘭斯敦勳爵函，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三十日，“中國，第二號”，一九〇四年，第五六、六一頁。

⑤ “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三年，第五四、五六頁；“中國，第二號”，一九〇四年，第五八、五九、六三頁。

⑥ 唐來致蘭斯敦勳爵函，一九〇三年四月三十日，同前引。

“我們有了俄国政府肯定坦率的保證，據說俄国並沒有向中國提出過所謂的‘條約七款’。我有此間喀希尼伯爵 (Count Cassini) 的保證，有麥考米克 [Mc Cormick, 美國駐俄大使] 在聖彼得堡直接從蘭斯道夫伯爵 (Count Lamsdorff) 得來的保證，還有通過赫伯特爵士 (Sir Michael Herbert) [英國駐華盛頓大使] 從俄国駐倫敦大使處得來的保證。……相反，我們卻從駐北京的康格，從我們駐上海的各委員，從此間的日本公使館和從英國大使館，得到了幾份實質相同的‘條約七款’，俄国方面曾經，甚或仍繼續向中國施用壓力，應是毫無疑問的。……我曾經諷示喀希尼，他們現在這種侵略行徑必不可免的結果將是各國分奪中國各省，一舉而將帝國瓜分。他叫喊着回答說：‘事情早已就是這樣作了。中國已經被瓜分，我們有權要求一份’。”——海約翰致羅斯福總統函，一九〇三年五月十二日，載泰耶爾：“海約翰的生平和函牘”，卷二，第三六八頁。

他們對於勸告中國拒絕要求一節，一定彼此聲援。①可是美國只能運用道義影響力；②英國不準備超出外交壓力的範圍，但以它與日本方面談妥的那個保持中立的協議為補充條件；日本則必然是抵抗俄國在滿洲的圖謀的主角，因為它對於滿洲，也有野心不亞於俄國的圖謀。

十八 俄國阻止通商口岸的開放

俄國的外交方針可以從有關新口岸開放所採取的步驟中表示出來。英國謹守一八五八年條約第五十四款的“最惠國條款”，并向中國提出抗議；③美國曾經要求滿洲某幾處口岸的開放，並且它的駐北京公使奉命堅持其要求；④兩國都向俄國作友好的建議，並要求俄國聲明它的宗旨。⑤在四月二十九日，俄國大臣蘭斯道夫伯

① 蘭斯敦勳爵和赫伯特爵士(在華盛頓)及聶納樂爵士(在東京)的往來函，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中國，第二號”，一九〇四年，第五六一—五八頁。

這是三個主要通過海路和滿洲對外貿易有利害關係的國家。在一九〇三年，棉貨進口約計如下：

英國	216,000匹	和紗19,765,000磅
美國	1,733,000匹	
日本	79,000匹	和紗 3,941,500磅

② “滿洲問題要複雜得多，也麻煩得多。俄國曾經給過我們最確切的保證，說是盛傳的‘條約七款’，根本就不存在。我們有一份和普蘭松(Plance, on)先生提向中國政府的那份連同序言和附錄的條約全件一字不差的抄本。如果他們寧願否認普蘭松的一切所作所為，並且中止他們破壞協定的企圖，我們將可平安無事；但是如果他們所打的謊語，只圖把事情瞞過一兩個星期，那麼局勢將會越來越嚴重。中國人，以及俄國人，似乎都明白，我們所憑靠的純粹是道義力量，如果俄國人相信我們不會為滿洲而戰——我想我們也不會——而中國人又相信他們所會得之於我們的，除去好意之外，不會有別的，所會得之俄國的，則除去挨打之外，也不會有別的，那麼對於中國這一些可憐蟲們，攤開的手就不象舉起來的棒錘那樣有說服力了。我們還是應該以我們所能運用的方法來盡我們最大的努力。”——海約翰致亨利·懷特函，一九〇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載泰耶爾，前引，第三六九頁。

③ 蘭斯敦勳爵致唐來函，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國，第二號”，一九〇四年，第五四頁。

④ 海約翰致康松函，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三年，第五四頁。

⑤ 蘭斯敦勳爵致斯各脫爵士函，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國，第二號”，一九〇四年，第五八頁。

爵通知美国大使，并且俄国大使也通知海約翰先生說，“关于建議締結条約的消息，完全不确，俄国并没有意思排斥其他国家在滿洲所享受的利益……也不会有关闭已开放的門戶或妨害美国商务的举动。”^① 在五月四日，康格报告称，整个問題都有待返任途中的俄国駐京公使予以安排。^② 在五月十九日，俄国駐北京代办还没有奉到俄国不反对开放口岸和派駐領事的訓令；^③ 在五月二十七日他通知中国大臣們說，他們在允准开放新口岸或派駐領事之前，必須咨商俄国政府；^④ 在五月三十日和六月六日，他仍然沒有訓令。^⑤ 在六月四日俄国駐华盛顿大使向海約翰保証說，他的政府“不反对口岸的开放”^⑥；六月六日，根据他的要求，談判在北京暫停，而在华盛顿举行。^⑦ 俄国公使雷薩尔 (Lessar) 在五月二十九日返抵北京——沒有訓令；^⑧ 六月十六日，应兰斯道夫伯爵之請，康格奉命将新口岸的要求正式提出，并照会雷薩尔，他“将受权将俄国的态度向中国政府坦白說明”^⑨；雷薩尔收到了照会，但是他“沒有訓令……不能就俄国的态度向中国政府，或任何人，作任何說明。”^⑩ 中国在这期間，已有开放口岸的充分准备，并且愿意“立刻

① 海約翰致康格函，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三年，第五四頁。

② 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三年五月四日，同上，第五六頁。

③ 唐来致兰斯教勛爵函，一九〇三年五月十九日，赫伯特爵士致兰斯教勛爵函，五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二号”，一九〇四年，第七〇、七二頁。

④ 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三年，第六〇、六一頁。

⑤ 又函，一九〇三年五月三十日、六月六日，同上，第六三頁。

⑥ 赫伯特爵士致兰斯教勛爵函，一九〇三年六月四日，“中国，第二号”，一九〇四年，第七四頁。

⑦ 又函，一九〇三年六月六日，同上；海約翰致康格函，一九〇三年六月六日，“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三年，第六三頁。

⑧ 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三年五月三十日、六月九日，同上，第六三、六四頁。

⑨ 海約翰致康格函，一九〇三年六月十六日，同上，第六四頁。

⑩ 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三年六月十八日，同上，第六五頁。

这样作，但是俄国的占领造成困难。”^①七月十一日，俄国政府在华盛顿和伦敦正式撤回它对于开放新口岸的反对，以关系俄国铁路系统至为重要的哈尔滨作为一个例外。^②这项撤回原案的举动并没有通知中国政府，所以中国政府不肯“在俄国占领满洲期间”有所行动；^③但是最后，海约翰同意接受，庆亲王也同意给予一项正式保证：规定开放新口岸的条约准于十月八日签字，即依照中俄协定，盛京东部撤兵竣事的六个月之后。^④

十九 一九〇四年一月俄国不再阻挠英国的要求

四月的条约七款现在似乎已经渐成过去了；但是在九月间，俄国提出一件性质温和得多的新协定。^⑤英国政府虽然看到“所提的新条件中的要点，大有妨碍”，但是需要更确凿的情报。^⑥日本立刻训令它的驻北京公使反对两项“与门户开放完全对立”的条件：一件是中国同意绝不将满洲三省的任何部分割让给任何外国；另一件是给予松花江沿岸的贸易权。^⑦日本对于俄国迟迟不撤退它在满洲的军队，已经大不耐烦；因为这个事实已经在俄国当局的前面摆明，所以他们就设法使他们自己于一旦事与愿违，而日本竟对俄国的野心进行武装抗拒时，得免遭日本以外其他反对者的阻挠。在十一月底，兰斯敦勋爵声明，英国和向来一样，准备“承认作为

① 康格致海约翰函，一九〇三年七月一日，“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三年，第六六页。

② 海约翰致康格函，一九〇三年七月十四日，同上，第六七页；兰斯敦勋爵致斯各脱爵士函，一九〇三年七月十一日，“中国，第二号”，一九〇四年，第七九页。

③ 康格致海约翰函，一九〇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三年，第六八页。

④ 海约翰和康格的往来函，一九〇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八月十四日，同上，第七〇、七一页。

⑤ 林董男爵致兰斯敦勋爵函，一九〇三年九月十一日，萨道义爵士致兰斯敦勋爵函，九月九日，“中国，第二号”，一九〇四年，第八六、八七页。

⑥ 兰斯敦勋爵致爱纳乐爵士函，一九〇三年九月三十日，同上，第八九页。

⑦ 爱纳乐爵士致兰斯敦勋爵函，一九〇三年九月十五日，同上，第八八页。

滿洲毗鄰國的俄國的優越利益”，但“重要的是，英國在中華帝國全國各地的條約權利，必須受到尊重”；並且作為俄國誠意的考驗，他問道，“僅就牛莊的情形而論，是否不能商定早日實行撤兵”，他“希望俄國政府停止實行現在牛莊海關以（進款）存放道勝銀行和以部分現款由俄國截留的辦法。”^① 在一九〇四年一月八日，俄國政府正式聲明，“今後俄國絕對沒有任何意思要阻擾列國繼續享受它們因現行有效條約而取得的〔在滿洲〕的權利。”^② 蘭斯敦勳爵對於俄國沒有給它準備實踐諾言的意向以具體的證明，例如牛莊方面的撤兵等，表示遺憾。^③

二十 一九〇四年二月八日日俄戰爭開始

日本因俄國威脅它在朝鮮的統治和在滿洲的貿易擴張，久已寢席不安了；為避免這雙重危險，它決心在必要時，和俄國一決雌雄。它首先要求俄國必須完成滿洲的撤兵，必須承認日本在朝鮮的優越地位。這個要求沒有被接受，於是日本提議在北朝鮮劃一道分界綫，界綫以北的地方承認為俄國的勢力範圍，以南為日本的勢力範圍。俄國試圖遵循它在外交上通常的拖延策略，但是日本已經有了準備，拒不允許拖延；於是在一九〇四年二月八日，它斷絕外交關係。戰爭就這樣開始了，這個戰爭將要決定兩個外國中的哪一國可以對於中華帝國的三省地方，朝代和統治種族的發祥地佔據優勢；這場戰爭，在陸戰方面，完全是在中國領土上進行的，而保守中立的中國則瞠目以視，惟念念於它在滿洲的土地和人民究將置於俄國抑是日本的支配之下這個問題的怎樣解決。

① 蘭斯敦勳爵致斯普林-瑞斯 (Spring-Rice) 函，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國，第二號”，一九〇四年，第九六頁。

② 本根道夫伯爵 (Count Benkendorff) 致蘭斯敦勳爵函，一九〇四年一月八日，同上，第九七頁。

③ 蘭斯敦勳爵致斯各脫爵士函，一九〇四年一月八日，同上，第九八頁。

二十一 战争中的陆海军大事

日本是说打就打。在宣战的第二天，日本进攻旅顺口外的俄国舰队，并且将它打败；突围战失败，俄国在旅顺口的舰队反而被困困在那里，海参威的舰队也被包围得如此严密，以致一筹莫展。军队在济物浦登陆，在三月中旬，日本在该据点和鸭绿江之间已经有一〇〇、〇〇〇人。鸭绿江是在五月一日没有遭到什么抵抗的情形下渡过的；第二支军队于五月四日在貔子窝登陆，第三支于五月十九日在大孤山登陆；俄国军队经过五月间的一连串作战被迫后退，直到旅顺口的守军和北面的主力军被隔断为止。日本人在五月三十日占领大连湾（达尔尼 Dalny，大连 Dairen）。于是开始围攻旅顺口，双方伤亡不计其数；十一月三十日，日本以极重大的牺牲攻占以“二〇三米炮台”著名的这个要塞，完全控制住全城和港口；舰队试图逃跑，有些船被击沉，另一些负重伤逃走；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一日斯托叶塞将军（General Stoessel）以要塞和守军向乃木将军投降。战场上的战役在这期间仍然继续，而且还采取了战壕战术并有长达几天之久的大会战，其中主要的会战如下：

五月二十六日——金州和南山。俄军被隔断。

六月十四日——十五日——德利寺。之后由库罗巴特金（Kuropatkin）亲自指挥。

八月二十四日——九月四日——辽阳。

十月十二日——十四日——沙河。

一月二十五日——二十九日——黑沟台和浑河。

二月二十三日——三月十日——奉天。

三月十六日——铁岭——李尼叶维奇（Linievitch）接替库罗巴特金。

三月二十一日——昌图府被日军占领。

罗哲斯特温斯基海軍上将 (Admiral Rodjestvensky) 統率的俄国波罗的海艦队于一九〇四年十月十五日駛离利堡 (Libau), 經過許多波折之后, 于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抵对馬海面。在当天和第二天, 于日本海大战中, 它就在那里受到东乡海軍大将的艦队的攻击, 并且实际上全軍复沒。^①

二十二 滿洲以外的中国宣布中立

在战争爆发之后, 中国发布了它的中立宣言。^②两天以前, 海約翰曾經力荐采取这个步骤, 以求“中国的中立和它的行政完整得受双方尊重……軍事行动的区域得以局部化和有所限制, 俾可防止中国人民的过分憤激和騷动, 并使世界商务及和平交往尽量少遭受損失。”^③同日, “在直隶省内自北京至山海关之間的各据点上派有軍队进行占領”的英、法、德、意等四国公使同意发一件同文电报, 促請他們各自政府“建議交战双方声明它們将不派遣軍队进入直隶”; 并据指出, “这一步的优点在于可使帝国朝廷安心, 以防政府在惊慌失措之际逃走”。^④各中立外国采納了这项建議, 两交战国同意照办, 中国朝廷也安心了——“留在这里維持秩序, 是朝廷的一个既定目的; 京城至关重要, 不应再有乘輿出幸的事情。”^⑤在接受战区局部化的建議时, 俄国主张必須将整个滿洲包括在內, 即使已交还中国的部分, 辽河以西也不例外; 因此中国将用于維持已

① 主要是概括卜紡济著“中国史綱要”中(第二一六——二二〇頁)的簡明敘述。查塞尔(Chasseur)的“日俄战争”(Russo-Japanese War)一书对战争作有一番細心的研究, 于日本軍略尤其慧眼。

② 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二日上諭, 將以前的一項宣言公布周知。參看本頁注④。

③ 海約翰致康格函, 一九〇四年二月十日, “美国外交关系”, 一九〇四年, 第一一八頁。

④ 康格致海約翰函, 一九〇四年二月十日, 同上, 第一一九頁。

⑤ 外务部致康格函, 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一日, 同上, 第一二三頁。

交还地方治安的军队計一八、〇〇〇名，撤守直隶边境。^①

二十三 中国对俄国兵船的特遇

就履行关于交战国船只问题的中立地位而论，中国作了一个很坏的开端，因为它没有认清它的责任基本上是行政警察性质的，而不是一个适宜于外交商谈的题目。^②在战争爆发之际，俄国炮艇“满洲人号”(Manjur)正在上海，除非甘冒在领海外被击沉或被捕获的危险，就不能离去；在一九〇四年八月十日俄国在旅顺口的海军突围战之后，“亚斯柯德号”(Askold)和“暴风雨号”(Grozovoi)也躲避在上海。中国的中立声明对这种情况所规定的办法是，凡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不离境的交战国船只，应即下令予以拘禁；但是中国却以进行商谈来代替行政措施。在上海，道台——根据海关税务司的劝告——同两个交战国的领事对这个问题进行商谈；在北京，政府也同两个交战国的公使进行讨论。结果，经过冗长的谈判之后，船只才被解除武装和拘禁。^③中国当局从这次经验中汲取了教训，并且在罗哲斯特温斯基海军上将的舰队到达东方海面之后，委派从前供职英国海军而当时在中国服务的巡工司戴乐尔海军大佐为海军统帅的中立事宜顾问官。在一九〇五年五月底，有几艘为俄国舰队——几天之后溃败——执行职务的俄国运输舰，抵达吴淞。统帅叶提督立时宣布它们为兵船，并让它们立即离境和听受拘禁两者之间选择其一。叶提督拒绝和领事们讨论这个问题，也不许中国地方官干与其事。船只被拘禁后还拒绝宣

① 海约翰和康格往来函，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九日、三月四日，“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四年，第一二五、一二八页。

② 中国方面的情况叙述于准备提出海牙国际会议的备忘录中，见附录7。

③ 康格致海约翰函，一九〇四年三月四日，八月二十六日；古纳致罗米斯(Loomis)函，一九〇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四年，第一二八、一三八、一四〇页。

誓的頑強俄國人，當被禁錮；關於中國在履行中立責任方面絕對不受交戰國領事裁判權的限制這項重要原則，已經明白昭告于世并且付諸實行了。在這以前，於一九〇四年八月十一日有幾艘船舶從旅順口逃出。其中的一艘驅逐艦“剛毅號”(Ryeshitelni)避難於海峽對岸距離旅順口四十哩芝罘的通商口岸。這時候，薩提督統率的三艘中國巡洋艦正在芝罘。在同一天內，停泊在中國旗艦近邊的“剛毅號”已經聽受拘禁，它的解除武裝工作實際上也已經竣事。在日暮之前，有兩艘日本驅逐艦駛進港口，作了一番偵查，然後離去。在日暮之後，這兩艘，也許是別幾艘，又駛回停泊在中國艦隊附近。薩提督本人往訪日本高級軍官，告訴他說“剛毅號”已經被拘禁。日本艦長答復說，他就要離港。在午前三點鐘前後，“剛毅號”突然被日本人奪去，而不顧當時在船上的中國守衛官的抗議，并被拖往外海。俄國人曾經抵抗，據說雙方都有傷亡。這是對中國中立的一個重大暴行，可是始終沒有得到補償。^①

二十四 中國對禁運品方面的措施

為維持中國中立，首當其衝的就是海關，甚至連上文所述的那些事務也由兩個口岸的稅務司去負責承辦。交戰雙方都想取得中國的供應品以充它們野戰部队的給養，可是交戰雙方都將米谷等食用品開列在它們的禁運品單上；中國為了討好雙方，应付辦法是禁止大米和其他谷類以及谷粉等，^② 從中國通商口岸運往滿洲^③

① 又函，一九〇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日本正式聲明附於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四年，第一三八頁。慕爾(Moore)：“國際法匯要”，(International Law Digest)卷五，第五五五及以下各頁；卷七，第一〇九一頁。

② 康格致海約翰函，八月二十六日，同前引。

③ 庚親王致康格函，一九〇四年三月九日，同上，第一二九頁；總稅務司通令，一九〇四年三月十日。

和朝鮮^①的口岸；這項禁令后来又擴充到糠麸、豆类、豆餅、以及其他油餅和蛋類^②。凡從中立口岸駛往交戰國口岸或戰區口岸、中途在中國口岸停泊的船隻，必須將一切“純軍事供應品，如槍械、軍火等”在中國口岸起岸；^③ 後來這種被忽視的中立國的權利得到較為充分的承認，惟運往日本途中的炸藥的轉口，准“作為一種普通的商業來經營”。^④ 在戰爭末期，為交戰國用的煤斤出口是禁止的；^⑤ “準備在海上轉船的袋裝煤斤”的裝運，絕對禁止。^⑥ 這些限制都委由海關執行。

二十五 中國在新局勢中的束手無策

這是第一次中國有必要來保持它自己的中立，由於它本身的沒有力量和它的官員們沒有應付這種局面的經驗，他只得盲人瞎馬般地作去。中國商人們對於這個意外贏利機會的熱中，是不亞於中國各通商口岸和各該本國的外商們的；凡是有機可乘的人都是不分厚薄地以供應品供給雙方，因此兩交戰國的外交代表經常地抗議有利於對方的破壞中立的行為。^⑦ 在中國束手無策的情形下，海約翰訓令美國駐北京公使“支持中國政府在它的領海內要求保持中立的主張；中國不能強制人們遵守它的章程，因此交戰國一方瀆犯中立，勢必要惹起另一方的報復行為；所以交戰國任何一方瀆犯中國港口的行為，必須適當地運用中立勢力來加以防

① 總稅務司通令，一九〇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② 同上，一九〇四年四月二十日。

③ 同上，一九〇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④ 同上，一九〇四年九月十七日。

⑤ 同上，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六月九日。

⑥ 同上，一九〇五年五月三十日。

⑦ 海約翰致康格函，一九〇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四月二十九日、八月二十二日、二十六日，一九〇五年一月十四日、三月九日、四月二十八日；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四年三月三十日、五月十四日、十六日、八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五年五月二日、四日；“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五年，散見各頁。

止。”^①在同一天，康格給予中国一項品性證明書，声明他“确知中国政府，就它对于国际公法及例案的知識和它对于实施及执行該法的能力而論，正尽其最大的努力以保持严格中立，如果其間有过失之处，那不是由于地方或軍事官員的专擅行为，就必是由于交战国一方或双方的无理行动。”^②

二十六 一九〇五年一月中立国声明与己无涉

在一九〇五年五月底，俄国艦队已經被逐出东海，俄国陆上部队也已經从北緯三十八度四十九分（旅順口）被逐退到北緯四三度（昌图府以北二十哩）。在一月間，局势已經洞若观火，于是象近年来一切战争中所常有的情形那样，干涉之說又甚囂尘上。^③在那个月中，德皇滿腹狐疑，生怕俄、法、英合謀中国的瓜分；海約翰根据他的建議，发出一件同文通牒，要求中立国相約在締和或其他方面为交战国作的任何效劳，絕不为他們自己索取任何形式的报酬。这立刻得到英、法、德、意諸国的同意。^④大可注意的是，德国的干涉摩洛哥事件发生在六月，而德賽加賽的辞去外交部长职务則是在六月七日。

二十七 应六月八日美国的邀請，各派全权大使

一九〇五年六月八日，罗斯福总统向俄国和日本发出同文照会，促請两国指派全权大使，考虑和平条件，但是否認有斡旋，甚或干預磋商的任何意思。^⑤两国政府立刻接受，并同意在华盛顿举行

① 海約翰致康格函，一九〇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四年，第一三七頁。

② 康格致海約翰函，一九〇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同上，第一三八頁。

③ 海約翰日記，一九〇五年一月三日，泰耶尔，“海約翰的生平和函牘”，卷二，第三八四頁。

④ 海約翰日記，一九〇五年一月五日至十九日；同上泰耶尔書，第三八五——三八七頁。

⑤ 照会全文載“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五年，第八〇七頁。

會議；但是這個地點改為新罕布什爾 (New Hampshire) 的朴茨茅斯，因為在八月的酷熱天氣中這是一個比較合適的地點。在全權大使們會面之前，中國政府致送美、俄、日政府一件照會，聲明：“但此次失和，曾在中国疆土用武，現在議和條款內，倘有牽涉中國事件，凡此次未與中國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認。業經本部電知出使大臣照達貴國政府，預為聲明。”^① 現在並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兩交戰國對於這項抗議比在戰時對中國在滿洲的主權權利曾經予以略多的注意。在朴茨茅斯會晤的兩國代表：俄國方面是國務大臣兼內閣總理大臣維特 (Sergius Witte) 和前駐東京公使、現任駐華盛頓大使洛森男爵 (Baron Roman Rosen)；日本方面是外相小村壽太郎男爵和現任駐華盛頓大使高平小五郎。

二十八 交涉經過；一九〇五年九月

五日的朴茨茅斯條約

俄國全權大使大體接受了戰爭的仲裁，關於朝鮮和滿洲各點立刻達到協議，日本在朝鮮的統治被承認；兩國撤出滿洲，歸復中國的絕對行政，惟遼東半島除外，該半島的租借權轉讓給日本；中國在滿洲的主權和門戶開放都得到明白承認；俄國將自旅順口起北至寬城子(長春)的鐵路讓給日本，保留自該地以北的鐵路。繼而困難發生了。日本全權大使們，滿腹的勝利感，一意要收取果實；日軍占領着庫頁島南部，而全權大臣們却要求將全島割讓；此外，他們要求一筆賠款，據清楚了解，他們所擬要求的數目是十六萬萬盧布。但是俄國還有一個主戰派，相信日本已經超過他們的滿潮標，已經達到了既沒有兵源也沒有財源來繼續戰鬥的標點；對於這種信念，俄國全權大使們具有同感。所以他們聲稱——“不賠款，不割讓俄國領土。”在八月二十五日，談判陷入僵局，俄國全權大使

^① 慶親王致柔克義照會，一九〇五年七月六日；中國駐華盛頓公使致國務院函，一九〇五年七月十日，“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五年，第八一八頁。

奉到严格命令，飭于二十九日以前不能达到圓滿協議时，即終止談判。于是两个急性人协力来保全和平了。在八月二十七日，罗斯福总统致电德皇，要求他促請沙皇在不索賠款和以庫頁島北半归还俄国的基础上締和；同时向日本全权大使說明理由，以期能使他們請到具有那样涵义的一道訓令。俄国的主战派提出抗議，但是沙皇下令締和，于是在八月二十九日的會議上，日本方面沒有提出賠款的要求，并且建議将庫頁島上北緯五十度以北的一半归还俄国。于是以法文和英文写成的朴茨茅斯条約在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新历)签字。^①

二十九 使中国举国震惊的結果

义和团乱事的后果使得朝廷和原打算借以改善他們地位的滿洲人大为震惊；但是对于一般汉人，它的結果在某些省份是莫知所措，在另一些省份則是悲憤填膺。它已經使得滿人和汉人的知識階級深信不妨害他們的特权或不損害他們威望的某种性質的变法是應該实行的，但是它并不曾在人民大众之中激起任何維新的新热誠。相反地，日俄战争的結果却使举国震惊。在这次战争中，亚洲人已經把欧洲国家打得大敗，并且取代了它在南滿的支配勢力的地位；日本已經翻轉了久經承認为东西方間当然存在着的那种关系；亚洲的一个小国已經作到的事，在面积、人口和資源上更大的一个国家当然也可以成功。每一个中国人，甚至于不識字的农民都不禁发問，日本究竟靠什么方法作到这样的結果；許多敏辯之才便滔滔不絕地闡明日本如何以全盘采用西法为凭借。日本已

^① 主要是由身預其事的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 of America)經理密維尔·斯东(Melville E. Stone)在一九〇八年向作者亲身的叙述汇编而成的。他后来将这段故事写成一篇論文載在“周末晚报”(Saturday Evening Post)，菲列得尔菲亚，一九一五年一月三十日。

条約全文載“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五年，第八二四頁。

經汲取了西學，采行了一部憲法，設立了一個議會，照新法改組了軍隊，接受了西曆，採用了西裝和理髮的式樣，中國只須照辦罷了。

三十 一九〇五年五月至九月，抵制美貨

剛興起的國家意識的第一次表現就是抵制美國貿易，中國人民用以作為手段來幫助他們的政府，脅迫美國政府准許中國人向美國的無限制移民。^① 第一次的警告在一九〇五年五月發自上海，^② 但是運動是由舊金山方面發動和助成的，中國駐該城的領事公開宣布，抵制貿易有中國政府的支持。^③ 抵貨運動在許多地方都展開了，其中主要的是廣州、廈門、福州、上海、漢口、天津和牛莊；它在廣州和上海最為成功，最為生氣勃勃，而在上海產生了最大的效果。其他外強，以官方行動和它的報刊為代表，承認一切外國利益在這件事情上的休戚相關；運動在香港和青島被強硬手段鎮壓下去，在牛莊也被日本人鎮壓下去。中國政府盡力予以取締，總督袁世凱在天津將它撲滅，各省巡撫和道台則在其他口岸發布強硬告示。帝國政府也為此頒下嚴厲的命令，並且通知公使說，它“切盼將騷動立刻制止”；有一次，在八月二十六日抵貨運動達最高潮的時候，慶親王心慌意亂，竟通知公使說，“中國政府對抵制美貨不負任何責任，運動是由商人們發動的，而且它已經採取了足征友誼的行動”；但是它的態度一般是正確的。這的確是一個偉大的民眾運動，由廣州和舊金山的廣東人操縱指揮，由新時代的學生，特別是曾經在日本讀過書的學生，從中鼓動。中國政府接獲通知說，它必須對於“抵制美國貿易的陰謀”所造成的任何損失負責，但是，即

① 參看本書第二卷，第八章第十八、第十九節。

② 國務院致北京使館函，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六日，“美國外交關係”，一九〇五年，第二〇四頁。

③ 舊金山監察官加德納(J. E. Gardner)的報告，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七日，同上，第二〇九頁。

使有那种刺激，它的措施还是没有充分的效果。可是在九月間，抵貨运动逐渐消沉下去，因为曾經按照长期合同購買美国匹头貨的中国商人，已經发现他們无法处置他們的存貨；当商人們群起反对这个抵制美貨运动的时候，抵貨运动随即告終。^①

三十一 反吸食鴉片风潮的再起

因其具有道德意义而性质更加良好的一种新国家意識的群众表現，就是遏制吸食鴉片恶习的措施的复甦。早先为求达到这目的的嘗試，一直是从上而下的运动：一七二九、一八〇〇、一八三八和一八五〇年的历次运动都是起源于皇帝的意志，只为他的官員中极少数人所支持，而没有能得到他的那些冷淡而无意于此的人民的服从；^②一八八一年复甦的运动原是意在帮助中国試求关税改革，可是主要的結果却是进口鴉片稅收的大量增加。^③現在学生們开始处理这个問題，并且青年中国将它的意志强加在老朽中国的身上。学生們觉得，这种形式的恶习乃是使他們的国家在国际間降入低等地位的一种恶习。在一九〇三年，留美学生抗議在圣路易城(St. Louis)举行的路易斯安那博覽会(Louisiana Purchase Exhibition)将鴉片烟具列入中国展覽品中，欽差大臣溥伦順从了他們的明显愿望。数千名留日学生从一个絕對禁止鴉片进口和吸食鴉片的国家中得到了鼓励，并且他們也把这一点列为促使日本前进而致中国落后于国际竞争的原因之一。外国传教士的长期教导已經对于数十万直接受他們影响的人，并通过他們而对于数百万人，发生了作用。列强已經准备帮助中国把它自己从它因統治者

① 柔克义致国务院函，一九〇五年七月六日至十一月二十五日，同上，第二〇五——二三二頁。

② 参看本书第一卷，第八、第九、第二十三各章。

③ 参看本书第二卷，第十八章第十至第十四节。

的愚昧而降落到的低下水平上提高起来，并且比历次都更愿意承認在这个問題上的国际責任。自有史以来，中国政府向来是在社会改革和提高人民方面以領導者自居的；可是現在它却看到这样一种改革不但可以加以領導，而且还可以使它发生实效，并且显然又不致损伤朝代和滿洲人的最高权势。学生运动遍及全国，于是政府在大有受人民前所未有的拥护的展望下，采取了行动。

三十二 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的上諭；应声而起的反应

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一道上諭令飭凡种植罌粟的土地必須在十年以內分期减少种植；凡吸食鴉片的人必須請領執照，六十岁以下的人逐漸减低消費量；烟具的出售和烟館的增設，应予限制；凡在政府服务的人絕對禁止吸烟；談判应即举行，以期能使外国鴉片的进口逐漸减少，在十年以內，完全禁絕。^① 全国雷厉风行。对于减少栽种是使用强迫手段的，因設有帮同社会改革的警察，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吸食鴉片的人成百万地戒絕烟癮；当众吸烟已經很不时髦；年輕的人都避不沾染这种习惯。自然还有好几百万人繼續吸食，但是下一代的中国人已經长成，其中极少人染上这种两世紀来为中国人所特有的习惯。

三十三 外国鴉片进口的銳减

輸入中国的外国鴉片差不多全部是产于英属印度和波斯，并且完全是从英属各埠运来的。波斯和中国沒有訂約，因此不能享有領事裁判权的特权或最惠国条款的待遇。英国政府对于这个伟大道德运动中要求协助的呼声，立刻予以应合，并且在一九〇六年

① 章程全文，見馬士，“中朝制度考”，附录己。

十二月同意从一九〇八年起，每年限减印度出口的十分之一。这项的协定暂行三年，但是在期限届满时，却发现中国土鸦片的减产实际上已经超过规定的速度；于是一九一一年五月八日的一项新条约规定了继续合作和减少进口的办法，限外国进口在一九一七年底以前完全停止。一九〇七年的进口曾经估作五一、〇〇〇箱，据同意每年应按这个数目减少五、一〇〇箱，因此在一九一五年，进口是四、一三六箱。^① 另据同意，凡属切实证明罂粟的种植和土鸦片的生产已经完全停止的省份，即可禁止外国鸦片的输入；在一九一五年，外国鸦片公开输入的省份只有三个——江西、江苏和广东。^② 最后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中国政府同意“为医药之用”，按每箱八、二〇〇两银子的价格，购买进口鸦片的有照存货共约二、〇〇〇箱。

① 一九〇七年的进口净额是四八、五三〇箱，计五四、四七五包。

② 下表开列已肃清鸦片的省份，凡表中未列的省份，都是罂粟种植很快就绝迹的省份：

省名	宣布禁绝的日期
奉天	一九一一年九月十一日。
吉林	同上。
黑龙江	同上。
四川	同上。
山西	同上。
直隸	一九一三年三月一日。
广西南	同上。
湖南安	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五日。
安徽	同上。
山东	同上。
福建	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
湖北	一九一四年六月一日。
浙江	一九一四年六月十六日。
河南	同上。
新疆	一九一五年六月一日。
甘肃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一日。

“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一九一六年四月。

三十四 一九〇九和一九一二年的国际鴉片會議

其他各国仍然可以生产鴉片，并且它們的国民在現行的条約下，仍可任便輸入不拘何处生产的鴉片；为应付这种情况，一九〇九年二月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国际會議。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自从一八四三年以来，政府、人民和商人自从一八五六年以来，就一心一意帮助中国作反鴉片的努力；現在召集开会的正是美国政府，并且非常合适的是以美人勃兰脫主教 (Bishop Charles Henry Brent) 来主持会务的进行。會議通过決議，承認“中国政府禁除全国鴉片出产行銷，实力施行，具有坚誠”；并敦請派有代表出席會議的各国政府，采納決議各款；帮助中国完成它所公布的目的。^① 第二次會議是一九一二年一月在海牙举行的，派代表出席的計有中国、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国、日本、荷兰、波斯、葡萄牙、俄国和暹罗；主持會議的还是勃兰脫主教。會議中同意并簽訂了一件公約，規定：

“締約各国应頒布有效力之法律或章程，以检查生鴉片之生产与分配；

“締約各国应采取办法，以逐漸切实禁止熟鴉片之制造及国内之販卖并吸食，并应禁止熟鴉片之輸入及輸出；

“締約各国应頒布法律以检查嗎啡、高根及其他化合質料之国内販卖及吸食；

“締約各国应会同防止将上述藥品走私运入或运出中国。”

这样，在鴉片問題的財政和商务方面經過一个多世紀的冲突之后，中、外各国达到了一个以道德方面为基础的協議；代价——稅收的損失是由中、英两国毫不迟疑地予以支付的。

^① “美国外交关系”，一九〇六年；“中国，第一号”，一九〇八年；“国际鴉片委员会报告书”，两卷，上海，一九〇九年。

三十五 宪政改革的学潮

那个曾經酿起抵制美国和使禁烟运动重新振作起来的酵母，繼續鼓动着全国。义和团以后时期的青年学生更加了一把力；但是在这时候，容闳考察团的一小批不足一百之数的留美学生已經从他們被貶降的微末地位之中嶄露头角，^①已經在維新运动中得到他們应有的地位。在新宪法的起草中，他們和少数在別国受过教育的人們担負起主要的工作，在留美学生中，最著名的是唐紹仪、梁敦彥和梁誠，以及在英国获有律师資格的伍廷芳；他們以袁世凱强有力的支持为后援，这次宪政运动中的主流所以不是留日学生怀抱的那种过激或革命精神，而是少数在民主美国和英国受过教育的人精神所寄的那种稳健保守主义，这是要归功于汉族的那种老成持重的意識的。

三十六 一九〇六——一九〇八年

宪政改革的尝试办法

一九〇六年九月下詔准行行政制度、法律和財政方面的改革以及陆海軍方面的改組；并准备在几年以內实行宪政，在行宪以前則給全国以宪政教育。十一月六日又下詔废除旧有的各部，代之以十三个新部，并設立民选代表組成的資政院。一九〇七年九月下詔筹备資政院，十月各省成立諮議局；并且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詔書給予一个将来由民选的国会通过法律和控制行政部門的希望。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的一道詔書，决定以九年的期間来逐步实行宪政改革的程序，九年屆滿，召开国会，成立完全的立宪政府；就选民和議員在义务方面的訓練而言，据声称，这九年的間隔期是有

^① 参看上文第七节。

必要的。同时拟定的宪法草案已经公布，其中第一条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遵戴”；另一条规定皇帝的权力，大臣们的责任，臣民的特权和义务，国会的权利和程序，以及投票权的限制等。

三十七 所行办法的毫无希望

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时期，在这期间中国的后起之秀专心致力在旧的基础上建造一个适合在现代世界中自处的新中国。他们的工作是值得和宪法创作者塞叶(Sieyès)的工作相提并论的；可是他们的工作却也分沾了他的那种适合于乌托邦而不适于一个广大帝国的缺点，因为这个帝国具有二千多年根深蒂固的传统和习惯于旧事物而畏惧新事物的人民。^① 他们的改革开始于金字塔的顶端，而任它的主体和基础保留不动。真正需要的改革是要保证臣民以公平的赏罚，保护纳税人不受勒索，以固定薪金代替无定额的外水，并责成官吏将取自人民的全部税款缴纳国库。这些卑不足道的改革，虽不如实际拟定的那些冠冕堂皇，可是或许可以由一个国会贯彻执行，如果它的议员们具有自治的固有资格的话；但是在一个亚洲国家里，既有通过官僚代表以高压手段实行管理的传统，改革也就只有由一个决心清除陈年积秽的奥古斯都(Augustus)或拿破仑才能予以实行了。

三十八 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四、十五日， 皇帝和西太后的逝世

满人恭亲王、文祥和荣禄，汉人曾国藩，李鸿章和刘坤一，这些

^① “原则是：一种慢慢演化、却非有意计划而成的制度，将和它的环境作配合的发展，或强使它的环境和它本身相配合。”——劳伦斯·罗威尔(A. Lawrence Lowell)，《英国政府》(The Government of England)，卷一，第二五一页。

政治家和朝代的忠心大臣們都相繼凋謝了。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这位或以皇帝身分或以摄政身分在中国握有皇权达一世紀以上（原文作“for over a century”，“over”一字疑系“half”之誤）的唯一强有力人物慈禧太后逝世了，享年七十三岁。十一月十四日傍晚光緒皇帝的逝世先于她的死二十小时。他在临死之前拒絕将他自己从他在—八九八年被幽禁的宮中移往一个皇帝應該壽終正寢的宁寿宮；并且他沒有穿着一个大行皇帝应着的龙袍而死。① 老佛爷出人意外的逝世，距皇帝的死又这样的近，致引起了一般人疑心她有謀害的情事；② 鉴于她的年齡，比較自然的解释是，既然作为帝国不容爭辯的統治者已近半世紀之久，她認清讓这位神經衰弱的皇帝在帝国发展如此重要的关头来領導帝国，祸患必不可胜計；既是宮中不容爭辯的女主子，③ 又預見到她自己的临危，她也就采取避免祸患的必要步驟了。

三十九 新皇帝宣統；袁世凱的倒台

慈禧太后在皇室、在宮中以及在帝国之內始終保持着的权力，从她最后的举动中表示了出来。在十一月十四日傍晚，她宣布以醇亲王三岁的儿子溥仪为皇帝，并派他的父亲为监国摄政王。④ 新皇帝立刻登基，改元宣統。袁世凱曾經从直隶总督任調入軍机处，这是一个臣民所可能有的最高尊荣；新朝代的第一批措施之一就是他和张之洞在十二月十八日同时拜命为太子太保。但是袁世凱的地

① 北京专訊，十一月十五日，“泰晤士报”，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② 同上。

③ 慈禧身后在內宮地窖中留下一笔私藏的金銀块，計銀九千九百万两，金一百二十万两（約英金二千二百万鎊）。——中国报纸，轉載于“北华捷报”，一九〇九年四月十七日。

④ 光緒是醇亲王奕譞的亲生子，过繼給咸丰作儿子。溥仪是老醇亲王的儿子醇亲王載灃的儿子。参看本书第二卷第十三章末尾的世系表。

位是不稳定的：他曾經在一八九八年出卖过維新党；他曾經在一九〇〇年因拒絕支持义和团运动而深受反动滿洲人的厌恶；何况在慈禧逝世之后，他已經在政府中失去他的主要支援。一九〇九年一月二日的一道上諭以他因足疾沒有依式行礼为理由，命令他辞职回河南原籍。因懼怕有更坏的遭遇，他避难于天津外国租界；但是在身居要津的滿洲人亲自給以担保之后，他回到北京，又从那里放逐回籍。

四十 坚持立刻召集国会的要求

滿洲人沒有汲取到一点教訓，他們还認為帝国是他們的。在一九〇九年年底，在十一个主要的部中，十五个最高級职位有九个由滿洲人担任，一个由蒙古人担任，五个由汉人担任；十一个次一級的职位有七个由滿洲人担任，一个由蒙古人担任，三个由汉人担任；^① 几位皇太后——同治的三个遺后和光緒的隆裕皇后也选定了这个时期在宮內爭权。^② 在各省之中，維新的汉人又恢复了他們的活動。省諮議局在一九〇九年十月第一次召开會議，虽然在宪法上，各局只不过是討論的团体，它們却集体要求速开国会，要求必須在两年之內举行。这项要求在一九一〇年一月十日的一道上諭中被拒絕。第一次資政院會議在一九一〇年十月三日召开于北京，以溥伦为总裁。它立即敦促提早召集第一次国会；朝廷躊躇不决，但是最后頒下一九一三年召开国会的上諭。資政院不以此为滿足，而要求立刻召集国会，更坚持軍机处必須对国会負責。这一点被拒絕了，但是咨詢是許可的，于是會議在一九一一年一月十一日閉幕。

^① 北京專訊，一九〇九年十一月九日，“泰晤士報”，一九一〇年一月四日。

^② “北華捷報”，一九〇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泰晤士報”，一九一〇年九月六日。

四十一 一九一一年五月第一任

总理庆亲王；他的性格

根据一九一一年五月八日的上諭，国家的三个較高机构被裁撤，代之以一个內閣和一个弼德院；已撤軍机处的領班大臣庆亲王奉派为总理，規定內閣和各大臣职责的詳細条例也已經公布。庆亲王是过繼到皇室中的一个宗室；他在一八五二年过繼的时候封为貝子，一八七一年晋貝勒，一八八四年晋王爵，一八九四年晋亲王，一九〇八年十二月晋亲王世袭罔替。他已經是官职荣宠集于一身——可是这位亲王兼政府大臣的人却是一个庸才。他年七十三岁，多妻，因此他和帝国的大批王公显宦都有姻亲关系。“他在北京的王府几十年来一直就是候补官員們的朝香地，‘他的門庭若市’是中国人当中的口头禅；每一个跨入府門的人都必須递門包。”他被称作是“一个优柔寡断、詭計多端、腐敗无能的老朽”，^①近年来中国政府的种种不幸多少也是由于他的优柔寡断和不能称职所致。可是已經很快开去了袁世凱职缺的朝廷竟找不出一位比这个老朽更能干的大臣来寄以主持国政的重任。

四十二 一九一一年十月的革命；一九

一二年二月十二日皇帝退位

資政院第二次會議定于一九一一年十月举行。在那月十一日，武昌的一次暴动突然酿成成为革命。在汉口和汉阳当地及周围一带有一些战斗，結果是革命党占优势。中国其他各主要城市的

^① 北京专訊，四月二十七日，“泰晤士报”，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七日。如果袁世凱可以視為中华帝国未来的茶坦姆伯爵(Chatham，按系英国的政治家)。——“我知道我能够拯救国家，并且我知道沒有別人可以作得到”。——那么庆亲王确实具有那时期的新喀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的一些品质。

乱事也接踵而起，这个与其說是革命，无宁說是总罢工性质的运动，在华中和华南一致取得了胜利。袁世凱現在奉召出山，朝廷給以最大的权力，以作保全朝代的万一之想。他控制住北方各省，甚至能够以武力归复汉口和汉阳；但是中南革命党的一致坚决态度和清廷及貴族的优柔寡断与保守主义，合而使他已經开始的保全王朝作为一个君主立宪的元首的工作，成为泡影。康有为的信徒都被撇棄；孙中山的党人肩負起革命的责任；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皇帝退位，朝廷撤往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时曾經作过避难城的热河。

四十三 一八三四——一八六〇年冲突时期的总结

在中华帝国和西方列国之間，除去商务关系而外，国际关系已經有了七十几年。在一八三四年，律劳卑曾經按照一个英王的使节所应该作的一切行事；中国朝廷和駐广州总督則按照所应期望于他們的一切行事；^① 结果是律劳卑勋爵的有辱使命。在一八三九年，一桩事关所有旅粤外商的冲突发生了，但首当其冲的是英国；照中国和中国人看来，冲突唯一显明的原因是鴉片問題；照英国政府和人民看来，它的唯一原因是国与國之間的平等地位和保护旅居中华帝国的外商們的生命财产的权利。^② 在一八四二——一八四四年間諸条約所作的解决办法中，鴉片問題并没有解决，但是其他的問題，就当时西方意見已經准备予以討論的，都作了处理。^③ 中国意見不同意这项解决办法，中外間的摩擦繼續不已，直到一八五六年，給予英、法两国以发动第二次战争的理由。这次战争是以一八五八年解决中西关系的四个条約为結束的。^④ 为克服

① 参看本书第一卷，第六章第二十四至第二十八节。

② 同上，第九章第四十五至第四十九节。

③ 同上，第十一章第一、第十九节。

④ 同上，第二十四章第二节。

主战派的反对，一八六〇年的第三次战争有了必要。一八六〇年的解决办法巩固了一八五八年的协定，由于三次战争的结果，中国人懂得了，也当作法律般地承认了，从前强定条件凭以维持国际关系的是中国，而今天则轮到西方各国强中国以从己意了。^①这就结束了冲突时期。

四十四 一八六——一八九三年屈从时期的总结

接踵而来的便是中国接受战争决定的屈从时期。各省官员也许会采取按照他们本身利益来解释条约规定的那种自然而然的办法；但是当帝国的威望被它的对外战争摇撼的时候，它已因伟大的太平军叛乱而元气丧尽；^②它的中央政府是无法抗拒外强的要求的。若干年来，这些要求都纯粹是针对条约的执行，并且各国驻京公使也联合一致来支持清廷，^③但是各国的野心渐渐暴露了。在这些年份中，中国几乎丧失了它对所有藩属国——曾经环绕帝国并保护它免于和外界直接接触的一带缓冲国——的控制权，其中计有琉球^④、伊犁的边缘地带^⑤、暹罗^⑥、缅甸^⑦和安南^⑧等；在一八九四年剩下来的仅仅有西藏、蒙古和朝鲜。在这个时期中，一个明智而有力的政府，在一个帝国的分崩离析、元气丧尽的情形下，本可改组和加强它的行政和财政；任何力能实行统治的统治者都会注意到帝国的防务。但是这个寻常的责任竟被帝国政府忽视了，这个屈从时期——也是和平时期，就等闲虚抛。

① 参看本书第一卷，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九节。

② 同上，第十七章；第二卷，第四、第五章。

③ 参看本书第二卷，第六章。

④ 同上，第十五章第十七节。

⑤ 同上，第十六章。

⑥ 同上，第十七章第一节。

⑦ 同上，第十八章第五节。

⑧ 同上，第十七章。

四十五 一八九四——一九一二年

的被制服时期；帝国留给共和国的遗产

繼之而来的是被制服的时期。在一八九五年，对日战争带给中国以奇耻大辱和朝鲜的丧失。在一八九八年，四个强国各在中国沿海攫夺海军基地和商业口岸以为己有，帝国的瓜分，似迫眉睫。随后在邻近北京的仅仅几省之内，发生了有满人支持，但由汉人发动的一九〇〇年的疯狂暴动；在惩罚之下，中国沦为这样卑微的一个被奴役的国家，以致帝国倘欲图存，根本改革的必要，已是不待明眼人而可见的事。屈从时期已经等闲虚掷；在被制服时期之中，一八九五到一九〇〇年的前半期，已经荒废；一九〇一到一九〇五年的后半期，则浪费在毫不触及统治种族的威望和外水的那些零星琐碎、无补实际的改革上；并且在最后一段时期，帝国试图以为时已晚和有违初衷的改革来堵塞汉人高涨的民族意识的浪潮。所有这些亡羊补牢的努力都失败了，大清帝国于是复亡，留给建筑在它的废墟上的这个共和国的是纲纪废弛、行政腐败和屈居于外强奴役地位的一份遗产。

附录 (1)

一八七四—一九一一年間中国所借外債表

名 称	发 行 年 份	数 额	利 率	偿 还		迄 1911 年 12 月 本 金 已 清 偿 数	1912 年 1 月 本 金 内 尚 未 清 偿 数
				起 始	清 偿		
1. 汇丰銀行	1874	627,615 磅	8	1875	1884	627,615	—
2. 东亚銀行	1874	2,000,000 兩	9	1875	1884	666,667*	—
3. 怡和洋行	1875	1,000,000 兩	8	1876	1885	333,333*	—
4. 汇丰銀行	1878	1,604,276 磅	8	1878	1884	1,604,276	—
5. 汇丰銀行	1878	1,750,000 兩	8	1879	1884	583,333*	—
6. 汇丰銀行	1881	4,000,000 兩	8	1883	1887	1,333,333**	—
7. 汇丰銀行	1885	1,505,000 磅	7	1886	1895	1,505,000	—
8. 汇丰銀行	1886	750,000 磅	6	1887	1895	750,000**	—
9. 巴林洋行 (Baring Bros. & Co.)	1886	1,500,000 磅	6	1887	1895	1,500,000	—
10. 汇丰銀行(第五款)	1886	767,200 兩	7	1888	1917	75,500**	39,700**
11. 柏林納公司 (Berliner Handels Gesellschaft)	1887	5,000,000 馬克	5 1/2	1893	1902	250,000	—

名 称	发 年 份	数 额	利 率	还 清		迄1911年12月 本金已清偿数	1912年1月 本金内尚未清偿数
				起 始	清 偿		
12. 汇丰銀行	1894	10,900,000磅	7	1904	1913	1,303,000*	327,000*
13. 汇丰銀行	1895	3,000,000磅	6	1900	1914	2,400,000	600,000
14. 麦加利銀行	1895	1,000,000磅	6	1900	1914	733,300	266,700
15. 德国国家銀行	1895	1,000,000磅	6	1900	1914	733,300	266,700
16. 俄法借款	1895	400,000,000佛郎	4	1896	1931	4,452,527	11,367,473
17. 英德借款	1896	16,000,000磅	5	1897	1932	3,602,575	12,397,425
18. 英德借款	1898	16,000,000磅	4 1/8	1898	1942	1,977,375	14,022,625
19. 汇丰銀行	1905	1,000,000磅	5	1906	1915	800,000	200,000
20. 日本借款	1911	1,000,000磅	5	1921	1936	—	1,000,000
						25,236,134	40,487,623
赔 款							
21. 第一款	1901	11,250,000磅	4	1902	1940	1,493,862	9,756,138
22. 第二款	1901	9,000,000磅	4	1911	1940	—	9,000,000
23. 第三款	1901	22,500,000磅	4	1915	1940	—	22,500,000
24. 第四款	1901	7,500,000磅	4	1916	1940	—	7,500,000
25. 第五款	1901	17,250,000磅	4	1932	1940	—	17,250,000
						1,493,862	66,006,138

名 称	发 行 年 份	数 额	利 率	偿 还		迄 1911 年 12 月 本 金 已 清 偿 数	1 9 1 2 年 1 月 本 金 内 尚 未 清 偿 数
				起 始	清 偿		
26. 关内外铁路(英国)	1899	2,300,000磅	5	1905	1944	402,500	1,897,500
27. 京汉铁路(比国)	1899	4,500,000磅	5	已偿还	见(36)项	4,500,000	
28. 山西铁路(俄国)	1902	1,600,000磅	5	1913	1932		1,600,000
29. 汴洛铁路(法比)	{ 1903 1907	25,000,000佛郎 16,000,000佛郎	5	1915	1934		1,640,000
30. 沪宁铁路(英国)	1904-7	2,900,000磅	5		1953		2,900,000
31. 道清铁路(英国)	1905	700,000磅	5		1935		700,000
32. 粤汉铁路(英国)	1905	1,100,000磅	4 1/2	1906	1915	660,000	440,000
33. 广九铁路(英国)	1907	1,500,000磅	5	1920	1937		1,500,000
34. 沪杭甬铁路(英国)	1908	1,500,000磅	5	1919	1938		1,500,000
35. 津浦铁路(英德)	{ 1903-9 1910	5,000,000磅 3,000,000磅	5	1919	1938		8,000,000
36. 京汉铁路(英法)	1908	5,000,000磅	5***	1919	1938		5,000,000
37. 京汉铁路(英法)	1910	450,000磅	7	1916	1920		450,000
38. 满洲铁路(日本)	1909	{ 225,000磅 33,300磅	5		1934		258,300
39. 湖广铁路(英美法德)	1911	6,000,000磅	5	1921	1951		6,000,000
西国银团						5,562,500	31,885,800

名 称	发 行 年 份	数 额	利 率	偿 还		1912年1月 本金内尚未清偿数
				起 始	清 偿	
电 报						磅
40. 英 丹	1900	210,000磅	5	—	1930	210,000
41. 英 丹	1901	48,000磅	5	—	1930	48,000
42. 英 丹	1911	500,000磅	5	1911	1929	486,112
总 计						744,112
						32,806,384磅
						139,123,673磅

* 1磅折合3两。

** 1磅折合6.667两。

*** 1923年后为4厘。

附 录 (2)

一九一五年在中国領土內已完成, 在建造中,
或已訂約承造之鐵路表

(主要根据北京交通部資料編制)

鐵 路	完 成 度			在 建 造 中	主要 建造 費	押 借 款	
	干 綫	支 綫	側 綫 等			數 額	何 種 來 源
	公 里	公 里	公 里	公 里	磅	磅	
外國鐵路							
西伯利亞鐵路(滿洲段)	1,529	—	—	—	12,225,000	—	俄國資本造
北滿鐵路(哈爾濱至寬城子)	212	—	—	—	1,300,000	—	同上
南滿鐵路(寬城子至大連)	705	122	?	—	20,000,000	{	同上(轉讓日本)
南滿鐵路(奉天至安東)	304	—	—	—			
山東鐵路	394	59	?	—	2,645,520	—	日本資本造
滇越鐵路(軌距1米)	465	—	—	—	6,600,000	—	德國資本造
	3,609	181		3,790	42,770,520	—	法國資本造
中國固有鐵路							
吉長鐵路	128	—	23	—	619,359	225,000	日本

鐵 路	完 成 長 度			在 建 中	主要建造費	押 借 款	
	干 綫	支 綫	側 綫 等			數 額	何 種 來 源
京奉鐵路	公里 845	公里 114	公里 264	公里 —	鎊 5,821,752	鎊 { 33,300 2,300,000	日本 英國
京張鐵路	211	27	84	—	1,294,031	—	—
張綏鐵路	191	—	36	—	955,326	—	—
京漢鐵路	1,214	94	272	—	10,257,980	5,000,000	英法
山西鐵路(軌距1米)	243	—	81	—	2,309,215	1,600,000	俄法
道清鐵路	150	2	32	—	728,114	700,000	英國
汴洛鐵路	185	—	18	—	1,335,578	1,000,000	法比
津浦鐵路	1,013	98	205	—	9,423,728	9,800,000	{ 德國 英法
湖廣鐵路	—	—	—	約1,000	—	6,000,000	英德法美
粵漢鐵路	—	—	—	約1,000	—	—	—
粵漢鐵路(在粵省境內)	—	—	—	約235	—	1,100,000	英國
萍株鐵路	97	—	10	—	474,304	—	—
滬寧鐵路	311	16	70	—	3,043,615	6,050,000	英國
滬杭甬鐵路	258	6	55	126	1,562,025	1,500,000	英國
廣九鐵路	143	—	20	—	1,670,841	1,500,000	英國
廣三鐵路	49	—	22	—	326,249	—	—
	5,038	357	1,192	2,360	39,822,117	33,808,300	

铁路	完成长度				在建造中 公里	主要建造費	借 款	
	支 綫		側綫等				押 額	何 种 来 源
	干 綫	公 里	公 里	合 計				
中国商办铁路	公里	公里	公里	公里	公里			
厦門至漳州	28	—	—	28	22	216,000	—	
汕头至潮州	40	—	—	40	—	337,460	—	
新宁至江門	60	—	—	60	—	259,137	—	
	128	—	—	128	22	812,597	—	
总 計	8,775	538	?	10,505	2,382	40,634,714	33,808,300	

附注：規定金幣折合率：25 佛郎 = 20 馬克 = 10 日元 = 1 英鎊。

中国国有铁路的主要建造費系以銀元計算，現已按照虛似之折合率 10 元 = 1 鎊，折合英鎊。押借債款系原金額，清償數未減去。

總計一行數字表明所有铁路的长度，但主要建造費一項仅指中国铁路的部份。

附 录 (3)

上 海 凌 浦 局

歲 入 之 部

年 份	中國政府每年拨款	借 款	凌 浦 捐	未分类收入	向德華銀行透支	总 計
1906	上海兩 124,001.19	上海兩 —	上海兩 —	上海兩 119.38	上海兩 —	上海兩 124,120.57
1907	552,731.78	—	—	2,356.96	—	555,088.74
1908	1,544,840.00	750,000.00	—	4,262.23	—	2,299,102.23
1909	437,145.00	1,500,000.00	—	4,342.98	—	1,941,487.98
1910	467,609.00	1,500,000.00	—	82,887.58	—	2,050,496.58
1911	390,700.16	375,000.00	—	279.32	—	765,979.48
1912	27,850.18	—	277,024.47	7,645.04	—	312,519.69
1913	5,570.03	—	507,793.24	11,798.81	—	765,162.08
1914	—	—	454,568.54	76,109.58	—	603,678.12
1916	—	—	435,186.97	121,755.27	265,229.00	509,171.24
合 計	3,559,447.34	4,125,000.00	1,674,573.22	311,557.15	265,229.00	9,926,806.71

歲出之部

年 份	岁 出	借 款 利 息		透 支 利 息	总 計
		上 海 兩	上 海 兩		
1906	上 海 兩 109,992.93	—	—	上 海 兩 109,992.93	
1907	527,795.52	—	—	527,795.52	
1903	2,273,877.25	—	—	2,273,877.25	
1909	1,856,570.59	65,625.00	—	1,922,195.59	
1910	1,819,191.72	170,625.00	—	1,989,816.72	
1911	642,151.24	269,062.50	—	911,213.74	
1912	284,957.82	—	—	284,957.82	
1913	758,474.28	—	1,848.22	760,322.50	
1914	586,227.30	—	16,696.75	602,924.05	
1915	488,215.24	—	21,077.54	509,292.78	
合 計	9,347,453.89	505,312.50	39,622.51	9,892,388.90	

附 录 (4)

海关:应有的精神鼓励,指导它的方针,
它应达成的任务;一般論点和特別規章

北京总稅务司公署一八六四年通函第八号

(一八六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先生:

(1) 在已往三年当中所发生而引起我注意的各种事項誘使我想,臚列各論点送达各位稅务司;其結果可能是对大家有不少的功用,这些論点是属于一种性质,估計它們对于各位稅务司尽他們的职分时應該奉作南針的有些原則方面可以导致更为正确的概念,并且它們可以提示几种观点,这些观点是总稅务司作为中国政府的負責代理人不得不依从着而去注意各位稅务司的行动的,特别是当那种行动不拘在外国人或中国人方面招来輿論的批評或者引起不贊同的表示的时候。以此为目的,并且要宣布本海关的某些規章,特发此通函送交各口岸負責海关的諸位先生:請他們特別注意其內容。

(2) 首先要清清楚楚而且經常記在心里的就是,稅务司公署是一个中国的而不是外国的服务机关,既然如此,它的每一个職員的本分就是要在避免引起冒犯和恶感的条件下去对待中国的官民。不問侨居在这个国家里的其他外国人可能自觉有权做些什么事(不拘是由于他們的地位,或者由于想象中胜过华人的优越感,或因任凭偏見的驅使,对于那些和他們本国不同的习俗籠統地加以藐視,借以显示出他們的文明高人一等),所期望于身受俸祿而是中国政府的臣仆的那些人們的就是他們至少要这样去行事,要

既不触犯他人的癢处，也不引起嫉忌、猜疑和憎恨。所以海关里的外国职员在应付本地官员以及和本地人民交往方面最好应该记住他们是那些官员的兄弟辈，而且在相当范围内由于他们已经在某种意义下变成了那些人民的同国人，他们已经承受了某些义务和责任：抱有这种观念的人将要趋向于以礼貌对待那些官员，而以友谊对待那些人民；礼貌将使公务处理得顺利，从一种正直的友情出发的行为将逐渐摈除一般地在许多地方对着外国人表示的不少憎恨。

(3) 虽然在一方面任何人应该记住并且依照前书里的暗示去行事，但是，自然并不期望他忘却他是那个进步性的，几乎在每一方面都和这一个国家的文明不同的文明的代表人；既然如此，也就不期望他遏制住那个天然要引导他去企图使中国人对那个文明发生兴趣的意向，以及要引导他去提倡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已经显示出会产生一般有利结果的那些设备的意向。但是这一论点所包括的行动必须是属于次要的一种：每一个人应当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是中国政府之下支取薪金去做指定工作的人，所以把那项工作做好应该是他的主要任务；随着进步的潮流而向前推进的那些计划与行动必须从属于那项工作之下，要使它们有利而又成功，也必须用理智为先导，这就是要耐心守候机会，要能够作出建议而不自命不凡，要竭力去说服而不去强迫命令，并且要能够在不因暴露缺点而引起刺激的条件下提出补救方法。

(4) 有充分明显的理由可以无须再将那种应该作为行动指南的广泛原则的应用加以详论或说明。如果适当地受到重视的话，它将在个人在中国的公务和私生活方面的最细小的一举一动当中发挥其影响。每一位税务司有特别的事务要去做，有特别的责任要去尽，看他在所派在的口岸里的地位如何。他需要审察他与总税务司、关监督、领事、商人大众以及海关一般人员之间的公务关

系，對他們的不了解將使他處理和他們有聯系的事務時易於發生錯誤。他是總稅務司的代表人（應當記得，總稅務司是海關中唯一由中國政府委託負責者），奉派去管理那些協助中國關監督去徵收關稅和辦理海關事務的外國職員的；在地位上，他是關監督下面的行政首領，並且，雖然不一定如此，但由於情分關係，他在一切有關所在口岸的對外貿易事項中是關監督的顧問。作為行政首領，他的職務雖然重要，卻很簡單，並且是一個具有常識的人幾乎不可能不會把它們做得滿意而有效的，因為他有口岸章程作為指導，這些章程對於差不多每一件尋常可能發生的事情都提供了辦法，再則他還可借助於辦事規程，有了這規程，事務的處理應該正確得如同機械一樣了。作為關監督的顧問，他的地位就變成一個不同而且較為困難的地位；他的專長是——或者說，至少人們以為是——他具有關於外國人同中國進行貿易所遵照的那些章程方面的一種正確的知識，而且認為當然的一件事就是，具有這種知識就應該連帶地熟悉那些外國人的習慣、意願、思想情況，以及他們對於事情的看法，並且要比別的外國人更加熟悉中國人的性格、情況和權利。所以稅務司可能被關監督認為是比他自己更具有資格去對發生的各個問題發表一種正確的意見，而且儘管他可能頻頻在事後不贊助稅務司的行動，他將很少在事前不採納他的意見而推崇他的看法的。關監督諮詢稅務司的意見，也是一件正當而且自然的事，因為他可以認為稅務司完全明了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相互義務、權利和行動方法，致使他能夠成為一位可靠的顧問；並且從另一方面來看，如果關監督是新上任的一位，他的不熟悉情況與稅務司應該熟悉情況恰好成一对比。稅務司應該充當關監督的顧問也是他居于總稅務司的代表人的地位的自然結果，並且在有些方面是他作為關監督下面的行政首領的權利，不過每次諮詢或意見的採納僅是由於關監督的情分關係罷了。這類論點自然將要引導總稅務司

去期望每一处海关的行政部門彻底地熟悉它的职务，彻底地在各方面發揮其效能，并且他将盼望稅务司注意到这事；再者（并且这也是自然的），总稅务司将期望向关监督提供的意見是健全而正确的，如果发觉到关监督採納了那个意見之后竟处于一种失策、失当，尤其是一种不堪維持的地位的話，那么，沒有一件事要比这件事会引起更大的驚訝了。关于这最后的一点，应当特別指出的是，一位稅务司所采取的任何行动或提供的任何意見，只要产生使一位关监督处于虛妄或不堪維持的地位的效果，将被認作是証据，証明那位稅务司沒有获得充分的經驗，并且不熟悉他的职务当中的較重要事項（只有熟悉这些事項才能使他合理地占有他的位置），因此，尽管覺得有必要去采取一种步驟是多么遺憾，然而总稅务司顧到中国政府、海关和商人大众的利益，却有責任去开革任何个人，只要他由于象上面說过的那种行动，証明不合做一处海关的首脑。每一位稅务司的良好理智无疑地将要保全他不致在判断事項时犯那样的錯誤，并且阻止他不讓本节所含有的警告去产生那种誘使他由于害怕負責而无所事事的结果。

（5）虽然在奉派在海关供职的各种各样的外国人办事有效率和可靠方面，以及在負責行政的洋員的一般工作方面对中国政府負責的是总稅务司，但是就事实而言，在适当处理每一个口岸的海关职务方面正式負責的却是那一个口岸的关监督。所以稅务司的职位必須是次于关监督，而且虽然在人的关系上他不同于关监督的下屬（适当的称呼是这样），他却不宜于在不必要的情况下事事向前，而且在不拘是外国人或中国人的眼中看来，除掉合乎由他負責的事情以外，还寻求或承担許多責任；如果稅务司擅自僭用关监督的腔調，这也是不审慎而且可能带来恶果，因为从一方面看来，象这样的一种作风不見得不恼怒关监督本人，从另一方面去看，这种作风是存心引导公众誤解稅务司职分的性質而要求他做

一些服务，这些服务如果是做了的话，除掉越权以外，还使他处于为将来打算是更加虚妄和困难的地位，但是如果拒绝去做的话，不独引起人家，和在相当范围内使人家有理由去责备他出尔反尔，徇私和对抗，而且也逐渐削弱和玷辱他的真正地位。税务司们越是守在幕后，在他们必须做的职务方面情势就越优，并且招致恶感的机会就越少。

(6) 税务司在口岸所居的地位自然会使他多少和各位领事发生接触，所以为了使困难问题得到迅速处置，以及为了事务的处理，同他们（尤其是同不经营商业的那些领事）的友谊应该带有亲密的性质，并且始终要保持友好关系。在无论什么由税务司对这样的领事官员所作的公务书信或谈话当中，较为相宜的就是要把关监督正式负责这个事实记在心里，并且要戒免采取一种腔调，致使领事们视关监督为傀儡或待他如傀儡一样，或者竟诱导他们把关监督的责任转移到税务司身上来。尽管最终的决定最好是由税务司提供过意见的决定，必不可忘记的是，在采取行动以前，提供的意见必须由当地海关的负责首脑——关监督——加以接受，根据这样的意见而达成的决定，就职权来说，就是关监督的决定了，所以应当留心，要戒免以任何方式抵触到关监督在保持他自己的地位尊严方面所抱有的成见，以及由此而发生的责任；因此，如果准许人们说什么决定之权就操在税务司的手中，那就会是这样的一种抵触。审慎地抑低自己，无论如何不会减损一个人受到别人尊敬的程度或他的真正势力；反过来说，过分地自以为是，尤其是我们看到的责任实在属于别人而擅作主张的一种，将要摧毁势力的根基，其终局必然使个人受到嘲笑。

(7) 税务司和海关职员日常接触到商人大众。据说大多数商人对于税务司制度怀有根深蒂固的憎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并不企图隐瞒这种憎恨；而且只要规章的实行对他们不利，或者甚至

当規章稽延实行，这对海关工作的处理虽属必要，但在他們看起来似乎是討厌而又不必需的时候，他們大家就一齐叫嚷起来了。这样的一种情緒竟然会存在，是应当引为憾事的，但是可以庆賀的就是这种敌意的恶毒性在有些口岸里却有漸漸消失的征象。說到的那种情緒是起源于几年前商人們一般享有的对于海关办的事可以不必理睬的那項权利，坦白地說，那种情緒一直存在着，并且在有些当儿，由于海关人員不可避免地在此方面缺乏效率，以及那情緒本身所引起的海关方面的人們的对抗，它倒差不多被認為是合理的了。責备海关对商人的利益不加留意，从有些方面消极地說，并不是一項毫无根据的責备。但是我們不是他人的喜爱和憎恨的主宰，所以不管我們的意愿怎样，我們对于商人們的情緒难以左右分毫；假使稅务司制度更为得人心的話，那对大家自然是愉快的事，但是我們很难希望它自始至終有深得人心的时候，因为征稅这件事在每一个地区和每一个时代总是招来反对和敌視的。然而我們有积极的任务要做，我們順利地达成那些任务和我們因为要达成它們而使人家討厌比較起来是一样容易。和商人們对抗不是一位稅务司或他的办事人員在办理海关事务中应当奉行的原則。稅收的宝箱很快地注滿时就是商务发达的时候，而且要使商务发达，就應該在它的一切运用方面尽量予以便利而尽可能少地加以限制；另一方面，稅务司制度本身的利益需要工作不但做得有效率，而且要順利，要海关工作进行順利而有效率，必要的就是規則和章程應該是属于最不累贅而又最可理解的一种，——海关里的每一个人員應該彻底地熟悉他自己部門的工作——商人們應該知悉向何人以及用何种方式去申請將他們的业务加以处理；尤重要的，惟一的情緒的流露應該象可能从乐于帮助別人的意愿中表現出来的那一种（帮助的意愿越是属于相互报答的，越妙）。一位公務人員感覺到了最使人不快的职务是用最不使人不快的方式去

做的这一个事实将是給他的一种十足报酬；究竟帮助別人的企图是否受到別人的感激，这倒对他没有什么关系。从这样的一个观点出发，将要看出，以实际結果为目标去好生研究所在各口岸的情况和要求是負責各处海关的諸位先生的职责；在适当地顧到保护稅收的条件下，商人們的利益应该是他們主要加以留心之事；他們應該注意，不去把无用的規則付諸实施，属于一种不必要的討人厌烦性质的規則要加以修改；他們应当通过經常亲自监督，去使自己确实知悉他們各关里的人員彻底明了各人的职责，小心地把它們做好，并且表現得愿做事，肯帮忙；作为公务人員，他們就不得不在处理自己責职所在的事务中帮助公众，并且他們的目的应该是在实际方面表現出，不独在現狀下为了处理事务而作的安排是最适当的安排，而且这个現狀，就其附带的利益和优点而言，是优于或者可能变为优于任何其他状况。無論哪位稅务司都无须懼怕他为了便利事务的进行和連帶地顧到貿易及商业的真正利益而作出的努力将要被总稅务司指为奉承商人；高尚地保持自己地位的尊严和适当而小心地顧到他人的，即使是最微細，却是正当而合理的利益并不是两不相容的。所以商人大众应当受到鼓励，从他們那一边和他們的观点提出一些关于办理事务的建議，这些建議在他們看来似乎可能逐步使工作变得容易些；誠然，他們用来指出現有缺点的措詞越是有力量，就越可理解。人类的制度罕有完善的，但是我們的制度不受那种妨碍別的部門的行动的官僚习气所束縛；所以我們有責任，并且也应该乐于使我們的制度臻于完善。一步一步地接近完善，不管人們知情与否，就其本質而言，作为既得的成績，将足够酬报任何可能吃到的辛苦。总稅务司的看法和愿望既如上述，有信心地期望于稅务司們的就是他們将要奉为南針，并且高兴合作以推行一种政策，这种政策結果将被发现为最足以減輕海关的工作而使各部門首长的任务易于达成。

(8) 为了使海关服务具有更大的效能，稅务司們應該凭他們的劝告和榜样努力去感动他們的下属对工作发生兴趣并且培养一种团体精神，足使低級職員获得升做高級職員所具备的知識和資格，并且使海关的各首长們对于海关人員的能力抱有信心。只要是能够做到的人，大家对于中文的学习應該稍加注意；中文的学习将要被發現并不是就其本质來說完全沒有兴趣的事，并且虽然从一方面說来，获得中文的知識可以在以后被証明为有利于个人，一如其有用于海关那样，但从另一方面來說，中文的学习，無論如何，将使我們对于所效劳的那个政府和我們休戚与共的那些人民获得相当的認識，并且发生相当的兴趣。总稅务司的目的是要使海关具有效率；稅务司和他們的屬員們去設法使它受到人家的尊敬吧。

(9) 稅务司們应当达成的專門任务是从他們同中国海关的关系和他們在中国海关里的地位发生出来的。作为稅务司而去充分而有效地达成他們本身的任務，将不会留給他們什么時間来从事于任何別种工作，并且一般說来，从事于任何別的工作，其結果則对于他們本来的任务注意不够，这的确是太可能的事。所以总稅务司以为應該尽量防止参与海关以外事务的那些人的行动。但是因为稅务司們由于和中国官員的較為亲密的关系一般地或許能够比別人更加容易地影响那些官員，要发布一項絕對的禁令，禁止越出海关范围去干預事务，这可能是不明智的；因为稅务司的友好劝告，如果是健全的話或許在許多事例中产生好的結果，但如不健全，則可能招来不幸的牽涉。然而总稅务司却愿意大家明确知悉，虽然这类的事情必須由他讓稅务司們个别地依从爱好去自由处理，可是他将不分担这类行动的責任；并且无端的或者不审慎的干預将要被視為提供了証据，証明这人不合留在象稅务司那样的可以信托的位置之上。再者，不拘何时，当一位稅务司逾越，或者意

欲逾越他本来的职务范围时，如果他将所采取或者意欲采取的行动忽略不报，那将被视为大堪斥责之事。涉及无关于海关的事项，与当地或其他官员有书信来往，必须抄录副本送呈总税务司备阅。

(10) 虽然干预所在口岸的海关以外的事务的问题要看当时的需要由税务司自由权衡作出决定，但是必须明确知悉的就是，总税务司将绝对不准许任何一位税务司对于别的口岸内或者超出他主持的海关负责监督的区域范围以外的，不拘属于海关方面或其他任何种类的事项进行干预。为使各税务司充分知晓每一位获得授权去行动的范围（越过这范围，行动就得停止），总税务司在此处附抄作为各口岸和各关卡的界限的那些地方的名称。……

(11) 关于侨居当地的外商人数、征收关税的数额和其他方面，各口岸互有差异；并且有些口岸由税务司管辖，别的口岸只有代理税务司，甚至只有助理税务司，而且各级支取薪金也不同，总税务司并不是不知晓这个事实。但是大家应当明确知悉，不管名义怎样，薪给怎样，凡遴选去管理各口岸的那些员司被总税务司视作（就现时而言）具有完全同等的地位，并且除掉另有特别训令作相反的指示外，一位助理税务司既然由总税务司授权依照他的职位去行事，就有充分的权利对负责别的口岸的员司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作书信来往。……

(18) 设若任何海关职员，不拘是本地人或是外国人，受到任何侮辱，或任何虐待，税务司职责所在，应即向关监督建议惩处犯罪者，如果他是中国人的话；但若是一位外国人，应即备一份正式控诉书送交有关领事，要求对控案作一次正式而且公开的调查。设若该领事拒绝进行调查，或该领事在本案中有偏袒嫌疑，致使本海关遭受损害，税务司职责所在，应即向总税务司呈报案情，将一切文件副本寄达，并建议关监督向总理衙门作类似之呈报。税务

司必不可借命令一艘船隻停航，禁止人員進入海關，或任何其他類似之行為，用強力實行報復。

(19) 稅務司各辦公處所僱用的各洋員們是否行為端正，誠信無欺，辦事富有效率，是由總稅務司對中國政府負其責任的，設若總稅務司的服務或他推薦錄用的那些人們的服務為中國政府所不滿，他可以立即被革職。稅務司、助理員或關員，以及一般洋員，在中國政府需要他們服務的條件下保持他們的位置，只要他們的一般行為和辦事方式，能够使中國政府的負責代理人總稅務司認為滿意。總稅務司是唯一有權將人員予以錄用或革職，升級或降級，或從一地調往他地者。一位稅務司或正式助理員，如由總稅務司認為宜于或需要免去職務的話，應在前三個月前收到通知，設若未行通知，則應得三個月的新給，但持有委任狀，載明免職時另有不同之規定者不在此限。……

(24) 根據以上所述，各位稅務司可以明了，總稅務司所抱的目的不過是使海關備具規模、辦事有效和一切正規化，以及防止誤會和錯誤；所以同樣明顯的就是，高興而忠誠地推行所指示各點，並配合各項建議的精神去行動起來，將是為了總稅務司的利益，也是為了各位的利益。

總稅務司

驚賓·赫德(簽字)

此函分致各稅務司。

北京總稅務司公署一八六九年通函第二十五號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一日)

先生：

(1) 前寄一八六九年第十三號通函，論及各口岸應辦事項和海關改組情形，茲已收到各處復函，經將各種建議予以比較，並經

慎重考虑过复函的一般内容，我趁着公布海关新章程的机会将此实际最需要说明的各点加以说明。

(2) 首先，由于各税务司对于我请他们发表意见的各点给予注意，并各抒所见，坦白敢言，我不得不总括地对他们表示谢意。即使我的一八六九年第十三号通函并没有其他效果，它将被看出已经起了作用，它一面诱导海关高级职员自由发表意见，一面通过那种意见的发表，就在所有各阶层发展了一种更强有力的团结和更加互相靠攏的情绪。

(3) 把各处的复函视为一个总体，它们放在我面前有三类建议：

1. 有关每一个口岸所需要的职员人数的建议；
2. 涉及整理海关的规章而在总税务司权限内能够清理的建议；
3. 一般地在总税务司本人着手处理以前须由海关任命一个委员会加以考虑的建议。

第一类的建议是关于个别口岸的，将要在和有关各口岸通函时予以讨论，第三类的建议或许要在我有机会亲自同作出建议的各位税务司商谈之后送交一个委员会再加考虑；第二类的建议，只需将建议人的意见仔细比较一下，凭个人观察的结果对这些意见加以检验，再联系到海关设立十年来的特征检查一番，即可予以清理。

(4) 在一八五四年，当叛军（按：指太平军。——译者）占据上海的时候，英、法、美三个条约国鉴于这种特殊事态在主要条约口岸（按：指上海。——译者）内所引起的某些困难，授权成立一个应由每一个国家推派代表参加的外国税务司机构，以与帝国官员在管理有关外商的那一部份海关事务中进行合作。第一位英国税务司威妥玛先生（Mr. Wade）先前是上海副领事，他任职几个月之后

被英國領事館里的翻譯官李泰國先生所接替，這個稅務司機構按照當時組成的樣子——除在法國方面愛棠先生(Mr. Edan)接替了史亞時先生(Mr. Smith)，美國方面費許博士(Dr. Fish)接替了賈意流上校(Captain Carr)外——自一八五四年起繼續辦理上海海關里的外商事務到一八五八年為止。在一八五八年，天津各條約在談判中，以後簽訂於上海，公布稅則和附帶章程的那些協定內插入了一項條款，規定各口岸應採取一律辦法，條約國的人民得各自為中國政府所選派，以協助管理關稅征收等事宜。那時，我充當廣州英國領事館里的翻譯官，由於巡撫勞崇光和粵海關監督恒祺知我很深，他們就向我提議，叫我在廣州設立一處象李泰國先生在上海主持的海關；可是我謝絕了，然而我一面告訴兩位大人，如李泰國先生本人受到邀請，他一定肯為此事來到廣州，一面寫了一篇長的備忘錄寄給李泰國先生，述及廣州情形，於是我终于在一八五九年六月底脫離領事館而就任廣州副稅務司之職。這時，上海地方的稅務司機構已經改變了性質：法國籍和美國籍的稅務司已經給資遣散，李泰國先生被帝國外務大臣何桂清（那時還沒有外交部）任命為總稅務司之後就委派已故的戴維士先生(Mr. Davies)為負責上海海關的稅務司。一八五九年十月，在一切事項先行安排妥當之後，吉羅福先生(Mr. Glover)奉派為負責廣州海關的稅務司，一八六〇年一月，汕頭海關開辦，以華德先生(Mr. Ward)負責關務。一八六〇年，戴維士先生因病假返回英國，由已故費子洛先生(Mr. Fitz-Roy)負責上海海關。在一八六一年初，李泰國先生由新成立的外交部（按：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譯者）加委為總稅務司，同年四月，他請假回到英國；在此處我應當說明，李泰國先生在那時還沒有到過北京，和他相識的在外交部行走的大臣只有前任粵海關監督恒祺；他在那個當兒到歐洲去是不顧我本人和別的人們鑒於他自己的以及在襁褓中的海關的利益而給他的勸諫的。

在李泰国先生离开以后，总税务司的职务由費子洛先生和我本人会同担任。作为我們所获得的授权，我們所持有的并非李泰国先生的委任状，而是总理五口通商大臣薛煥和华北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劄子，到了当年六月，外交部的首长恭亲王又給我們以正式委任。李泰国先生到一八六三年五月才回到中国，其时所有其他各口岸的海关已經当他不在中国的时候設立起来。在他回到中国，戴維士先生又逝世了以后，我被外交部委派为上海税务司，并負責指揮长江各口岸及宁波的关务。在同年十一月，当李泰国先生的任期終了的时候（按：赫德的这句话是顧全李泰国的顏面的，实则李泰国在那时被革职，詳情見本書第二卷第二章第二十一节。——譯者），我由外交部任命为总税务司。在一八六三年李泰国先生在中国消磨的几个月中，他主要地忙着經办那支不幸的小艦队的事項（按：指李泰国——阿思本艦队，詳情見本書第二卷第二章各节。——譯者），因此，所发生的情况是，自从一八六一年春季起，海关事务的安排就主要地由我在控制。在一百名現时属于內勤方面的人員中，大約只有二十人是最初由李泰国先生委任的，并且在这二十人当中，虽然有两人是由李泰国先生任做税务司的，別的人获得他們的升迁却大多数由于我本人；現在海关服务的其余的八十位先生們——除掉三位或四位是最初由費子洛先生暫予提名任用者以外，获得他們的首次任用和后来的升迁也都是由于我本人。以上所述，将足以达到我的目的，那就是用少数的几句话記錄出海关的早期历史，并追述而使你們回忆到我从一开始就怎样亲切地同海关及海关各事相联系，以及我本人是怎样密切地与差不多每一位海关人員的經歷有关連。

（5）从上节写出的那个簡短的历史叙述，我現在接下来請你們注意几点說明，这些說明給你們看到或許是有益的，并且是特別写給那些升級比較地慢，瞧見同国籍或別的国籍的低級職員升迁

得比他們快，或是為了別的理由就感到失望或不滿的人們看的。

(6) 鑒於一些或許不為大家所明了，但是却存在着，而又不能不顧到的理由，在任用人員方面，尤其是在擢升到比較高級的位置方面，却不得不特別謹慎；因此就有必要加以選擇。可是要選擇的話，就必然會使選擇者處於一種地位而使很多人看起來似乎是在無定見地、任意地和無識見地選擇人。在一個新的服務機構里，即使是只由同一國籍的人組成的，也沒有人會主張一種僅憑年資而升級的原則；只有依靠特別的任命和審慎的選擇，才能使辦事效率達到一個服務機構的創始人和計劃者所希望達到的那個標準，並且使安排的職位適合於他們希望完成的那項工作；時間長久下去，資歷當然能夠受到更大的重視，但是只要效率並非屬於絕對的必要，或者特殊的條件需要特殊的資格，非常的情勢需要非常的行動的話，那麼，甚至連資歷一層也只好擱置一旁。海關這個機構就是這樣，我們可以說它不過是起源於一八六〇年批准各條約的時期，不能說它已經存在了有足夠的時間，可以不必加以特殊巧妙的運用而僅注意年資即行；更有言者，在個人服務時期不過比別人多幾個月或幾年的條件下，任何僅憑年資而要求升級的企圖將意味着在考慮擢升的權利時很不適當地強調一個很小的因素。在開頭，我們可以說擢升的權利是完全沒有的：每一個人保持着他的職位，一部分是依靠海關能夠證明它自己具有這樣的效率而使中國政府認為值得把它繼續維持下去，而一部分却依靠它能夠達成那樣徹底地世界化而足以使各外國對它抱有好感，因而防止它們進行干涉而中斷它的生存；要滿足這些條件，僅僅限於年資的那種考慮就不得不擱置一旁了，並且總稅務司不得不在一方面尋求優越的效率，在另一方面要在各級人員當中混合各種不同國籍的人而使大家可以接受。同時，假使別種事項都相等的话，年資是一向被給以應有的價值的；它項資格的相等或不相等，以及其他考慮

的比較重要或不甚重要，應該由總稅務司本人親自加以判斷，這一層不過是需要應付的一種事實，而且是海關首長的任务中的一个自然部分——因为在一切的服务机构中，举凡各种要求的衡量以及补充空位的各个人員的遴選，到了最后，都不得不由某一人加以注意。因此，在过去十年內——海關存在期間的第一个十年內——年資照例是一种次要的考虑，而个人的效率、特有的資格和国籍却为首要。

(7) 曾經有人說过，中文知識的重要性被夸大了，它种資格沒有被給以适当的估价。要回答这句话，可以说，它种資格从来没有被認為是毫无价值的：相反地，我倒看見过一个人可能是一位极好的中文学者，可是由于某几种資格的不合而不适宜于在一所繁忙的公事房里占一位置；但是我曾經而且現在仍然以为沒有理由不應該去物色些具有学习中文的能力而同时由于能够繕写清晰和計算准确，又有資格在公事房里干記室工作的人。一个人可能繕写清晰，計算准确，而不具备学习中文所必需的修养或能力(虽然不一定是天生的对于学习語文的特殊才能)；从另一方面来看，能够学习中文的人不致如此缺乏能力，竟不能訓練自己去做好一位記室的任務。所以我曾經竭力去物色愿意学习中文的人，并且对于学习有成效的給予奖酬；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我总是在勉力使人們确实知悉中文并不是个人的惟一資格，个人在中文方面虽然优于他的同伴，在别的方面無論如何也要和他們相等，并且对于所在的职位也要毫無疑問地适宜。有些顧問人士对于海關人員一般地学习中文持反对意見，他們以为稅務司們不会說中国話而由会说中国話的翻譯人員有时給予协助，将会使事情办理得格外順利，并且从許多观点来看是較优的。然而我却抱有，并且將繼續抱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意見；在驅使我去形成一个說中国話的海關的理由当中有以下被考虑过的几点：在任何政府下的雇用人員應該講

他們受雇所在的國家的語言；我屢次收到中國關監督們的來信，央求我不要派遣不會說中國話的稅務司到他們的口岸去；大家獲得中文知識，度量起來，似乎可以保證海關繼續存在下去，因為那樣一來，海關就可以希望能夠以固有的價值博得中國官員們的稱贊；大家獲得中文知識，可以使總稅務司不致做出那種惹人嫉忌的事而有時不得不把會說中國話的低級職員提升到不能說中國話而在其他方面却是資格很好的高級職員之上；誘導大家學習中文，就給了每一個人以在本質上是這一個國家里的最重要的東西，並且基於這樣地使海關和中國政府離開我而獨立這一個事實，我曾經更抱有希望，要為海關增添生存機會；經驗曾經指明，不問當首長的那個人的品級如何，中國官員却正願把會說中國話的人視作真正要去應付的對象，所以照我看來，錄用不會說中國話的稅務司而把一切困難中的掌握形勢的權力仍然委諸翻譯官的那種反常的舉動，儘管一時可以使總稅務司的地位增強，却是不值得加以支持的；學習中文的人對於中國的國民性一定可以作出一種較正確的估計，對於他們在中國政府下所處的地位以及為中國政府所做的工作一定可以作出一種較正確的評價；最後，從國際方面來說，有這麼多的在中國雇用之下的能干而又受過教育的人學習中國語文，這是有獲得好處的可能與希望的。如此說來，以卓越的地位給予中文的學習並不是沒有理由的，然而這並不是說，別種資格就被絕對地置而不顧。

(8) 有第三點需要說幾句話，那就是海關里有幾位成員堅持一種想法，以為他們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這或是因為他們的薪給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變動，或是因為他們的薪給一時被提高了以後，過了一個時候又回復到原來的等級；屬於前一類的訴苦者忘記了我僅僅保有一筆固定的、按年計算的金額以維持海關，因而我無從隨意增加薪給，只有在高級位置發生缺額時才能批准增加，

至于那后一类的訴苦者，他們却忘記了在奉派去代理一位請假的較高級人員時，在代理期間所能支領的較高薪給不過是代理薪給，這當然要在被代理者回職以後退到以前的等級。

(9) 我認爲現在是一個適當的機會說出前面的一些話來：我還以為最好要補充一點。不滿的情緒，只要是合理的，是可以准許的；但是訴苦者和訴苦的對方，若要弄清訴苦的真正是非曲直，就必須在形勢和時間兩方面從同一點出發。所以我相信以後如有任何人想到他沒有適當地受到重視，或者覺得有什麼事情要申訴一下的話，他將會立刻使我知道，詳細地敘述他的情形，用書面按照通常方法經由他的直接上級，服務所在口岸的稅務司，呈上；用現在我指出的這種方法來表白自己是不需懼怕觸犯我的。

(10) 第一次訂立的海關辦事章程是在一八六四年我的第八號通函內宣布的，我覺得最好在此處再提一提，一來是重新闡明其精神而非注重其文字，二來是糾正這章程所引起的幾種誤解。

(11) 有人說過，由於那次的通函，我剝奪了稅務司們的一切主動精神。這樣的說法是誤傳了那封通函里所包括的那些警告的目的。我一直不過是太急切於看到在各口岸里的那些首長們願意而且能夠有所創制，這不拘是在他們所轄海關內做些改進工作，或是在鄰近區域內有所改良。必須記牢，總稅務司公署不是一個政治性的機構；它的任務，毋寧說是工商業性質的；然而假使任何人能夠由他自己做出任何事情來，不拘是推廣商業利益的范围，或是創辦工業，甚至是促成政治情況的改良（雖然這後者含有對於最好不要去碰的事情進行一種多事的干預的可能性），沒有人比我将要更加迅速地予以承認，徹底地加以尊重，並且熱烈地給以支持。我曾經不願意，並且現在也不願意去做的事是這一種；我不願意承受那種瞞着我，或者沒有在適當的時間內使我充分地知悉而去作出來的行動的責任，並且我反對用威逼或試圖威逼當地官員

的手段来达到目的的任何創制。在計劃中的行动應該首先报告我知道：但是必須报告这一层并不含有不应計劃，或者行动将不邀贊許的意思。

(12) 也有人以为在海关用費方面我不會給稅務司們以充分的自由。解释是簡單的。如有任何严格的地方，是由于这个事实，那就是总稅務司不过被許給了按年固定的一笔款項以充維持海关之用，因而反轉来有必要把每一处海关的用度也限制在按年固定的一宗款項之上；至于許給的各种数目却是这样地布置，要保證年終获得一項貸方余額，总稅務司就可以从这余額內拨款支付为任何口岸的賬目中所无的一些用途——比如北京总稅務司公署的維持費，防疫船經費，住宅經費，退休金——这一切必須籌得款項，儲以待用。我不會禁止或拒絕批准任何必要的开支；但是在我批准拨款以作薪工杂費之用以后，我的确要，而且必須要責令每一位稅務司在他承担的負債超出了因日常需要而承担的那些普通負債之外以前，或因特別用途而負債到任何限度以前，都要申請特別批准；并且为了要有款項去应付寻常的一般需要，以及在急需时有所倚賴，总稅務司自然有必要去繼續需求凡是前已承担下来的开支都應該为他本人所知悉，注意到，并且加以批准。

(13) 还有遭到反对的事就是那封通函在宣布各处海关主管人都是平等的时候沒有給高級職員以应有的尊重。遭到这样反对的那段話的目的被誤会了。它的真实意义是这样：随便那处海关的主管人，当主管时期，在口岸事务管理方面，不但要对总稅務司負責，而且是唯一的負責者，所以任何其他職員——不管級位怎样高，或怎样能干些——都不应干涉他，或給他以訓示，或在他所轄口岸的范围以內采取行动，或临时看待他好象除平等負責以外还有任何其他的责任那样。

(14) 此外也有人訴說那次通函不惜力图降低稅務司的地

位。关于此点，我仅须说明，一位税务司在任何口岸里的地位很多是由他自己所造成，那次通函所抱的目的就是要向每一位指出那个界线，如果以为可以超过它而负起责任来，那可能是危险的，再者，也是要阻止每一位担负起由于他在口岸里所造成的地位，却没有理由去相信关监督不致加以反对的那些责任。

(15) 在谈过了据说有误解存在着的那几点以后，我现在用简单言词重新说明那次通函的精神。

(16) 那次通函的要旨自始至终就是规劝大家顾念别人，和衷共济。希望每一位税务司都不去肩负不属份内的责任——不去侵犯他的口岸内的任何中国或外国官员的职权——他应该同他的同僚，中国关监督，以及同领事们，同中国和外国公众培养友好关系；他应该努力使他的职司成为办事确当和迅速，以及便利贸易、鼓励贸易的榜样；他的行为，一般地说来，应该是在对付公众时表现得宽大；对付一切遭遇到困难的人们时表现得审情度势；并且正因为总税务司的目的是要使海关的服务效率良好，所以盼望海关的每一位成员努力使海关受人尊敬。那次通函提醒大家都在为中国政府服务；它也叫大家不要忘记都是基督教文明的代表人，所以——从那一方面看来——大家虽然是支取中国薪给的雇员，但在工作方面也兼有其他任务。

(17) 在先前一节里，我曾经对于创制的问题说过一些话；我现在不得不对于类似创制的一个问题提出我的看法，那就是海关案件的就地解决问题。中国外交部无限地情愿看到发生的问题在口岸内平静而公正地获得解决，而不愿让它们被提交北京来解决。在一位领事和税务司对于应该采取的方针获得同意而关监督却坚持一种不同的意见的情况下，提交北京确属必要，那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在任何事情的开头，当它仍在税务司本人的手中时，他应当权衡轻重，自己去判断是否值得使关监督知悉，以致由于函札来

往而有扩大范围，不得不提交北京的可能性。在过去十年中曾經发生的許多事情可以表明，如果一个問題过早地向一位关监督提出，是多么有害：一个正式記錄一經創立下来，除非經由公認的正式途径是不能終結的，所以我常常大惑不解，在諸如此类的案件送达北京之后，这种牵动那么庞大的机构的行动究竟有什么道理。在許多事例中，所发生的爭端属于这样一种性质，只要商人解释一下，就应当立刻予以接受：別种爭端却属于瑣屑的性质，扣留貨物或勒令解释即含有斥責的意义，應該足够代替懲罰与警告了；还有其他的爭端是显然咎在商人的一类，如果用友好的方式同領事商得应采取的行动，也不应当有什么困难：——在所有这类案件中，只要商人并不請求法院进行联合調查，稅务司不必提交关监督即可采取行动，如果商人的确要求举行联合調查，关监督在十次之中总有九次将函愿請稅务司代他出面，那么，后者將繼續掌握权力，可以同領事达成諒解，一面对犯法行为作适当处分，一面消除上訴到北京的一切必要性。領事們并不是天生比別人不講理或不公正些，所以只要他們发现稅务司有意用友好的方法来处理各事，他們通常将不致对促进口岸事务的順利进行持反对意見。如果行动与那作为一项規章的基础的原則相抵触，因而就認為行动与原則相抵触，决不應該采取，这是謬妄的；案件发生后，需要作出例外的行动，是常有的事，并且由領事出面干涉的那些案件一般地就是宜于这样地特別加以处理的案件。任何事項在最初的时候都容易由私下用非正式的方法談一談，談过以后，关于应采取的行动也照样容易达成相互諒解；反之，匆遽执笔，互換公文——唱出高調，站在一种除非自甘失敗便摆脱不了的正式地位——，最恶劣的，竟把关监督过早地拉入現場——，这样，适足以引起敌意，示弱于人，并且使私人关系恶化。关于这点，我終於說到如此地步，目的是要使大家注意常識的判断，并且要表明，一般說来，尽人事而

免官腔才多么适当。对于造成任何犯法行为的那些情势，应当多方予以体谅，对于領事們提出的关于他們認為是合适的办法的那些理由，应当多方加以权衡；对于細小之事作无止境的辯論，应当小心避免，因为不管这类小接触是战胜了，还是战敗了，它們仅仅趋向于在办理其他的和更重要的事务方面产生困难。不拘何时只要稅务司們对于那些由于触犯保护国家岁入的法律而发生的爭論予以就地解决，他們可以信賴总稅务司的支持和外交部的嘉許；再者，虽然稅务司們对于这类事項可以自由处理，对他們的唯一限制就是期望他們一方面要按照上述各节所含有的精神去行事，一方面要将每一案件所特有的情形和它的最終解决办法詳細具报总稅务司，以便归档备查。

(18) 关于薪給的問題，最好也要說几句话，特別是要供本海关里的低級職員的思考。大家持有差不多是錯誤的意見，这从回答我的一八六九年第十三号通函的复信（不止一封）中可以看出；但是最奇怪的是那样的一封复信，它建議薪給和津貼應該足够使人“在服务十年之后”离开中国时处境优游。发給所有各級職員的薪金都相当优厚，如果把有些高級位置的薪金看作同奖金一样，也不为过；但是大家的生活并不是經商投机的生活——也不是象在一个待遇菲薄的机关里服务的一位官員的生活，那种生活經過悠久的岁月之后仅仅提供些微薄的养老金。縱令在海关服务并不足以使一人暴富起来，却也不見得只把他維持在飢餓綫上，然后，当他退休的时候，給他一笔和他的生命一同消逝的养老金；相反地，在海关里，沒有一个等級的人是不可能省下金錢来的，并且任何員司不需節約或过分刻苦，在服务二十五年或三十年之后，年齡不到五十的光景，就應該能够告老离职而手里拥有足够的一笔錢，可以使他居家而得到相当优厚的收入——这一笔錢，就它所产生的收入方面去看，縱令与那些高級的，在更为正規的机关里干了同

样长久的官員們所支領的养老金比較起来略有逊色，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优厚的，那就是說，它使一个人能够在亡故的时候留下家屬的贍养費。所以低級職員們應該未雨綢繆，謹慎将事；他們应当記牢他們是既不能指望获得养老金，也不能指望获得退休金的，因此从一开始就应该为将来打算，逐月儲蓄一点，那怕是怎样地少；他們也应该准备，并且坚决指望至少服务二十五年以上。升迁将不复如过去的那样頻繁和快速，但是每一位職員可以自覺到那种事实，就是他的薪金是相当优厚——只要輪到他加薪的时候，他的薪金将会增加的——并且加薪一事可以被認作是有确切的时期，足以擯除一切焦急。那些得了真正优厚的薪金，但因追求快乐，以致扫数花尽，甚至負了債的職員們自作自受，不能尤人；他們不能期望既享乐，又得到官方的垂怜而以发給津貼或养老金的方式來使他們晚年愉快。

总稅务司

鷺宾·赫德(签字)

此函分致各稅务司。

附 录 (5)

中国海关总稅务司及邮务总办 赫德爵士所受荣典表

中国部分：

- 一八六四年 賞加按察使銜。
- 一八六九年 賞加布政使銜。
- 一八八一年 賞賜头品頂戴。
- 一八八五年 賞賜双龙二等第一宝星。

- 一八八五年 賞戴花翎。
- 一八八九年 賞加三代正一品封典。
- 一九〇一年 賞加太子少保銜。
- 一九〇八年 賞加尙書銜。

比利时部分：

- 一八六九年 利俄波尔德(Leopold)上級爵士勳章。
- 一八九三年 利俄波尔德武官勳章。
- 一九〇六年 利俄波尔德勳帶。

瑞典部分：

- 一八七〇年 华刹(Wasa)下級爵士勳章。
- 一八九四年 北极星十字勳章。

奥地利部分：

- 一八七〇年 佛兰西斯·約瑟夫(Francis Joseph)上級爵士勳章。
- 一八七三年 佛兰西斯·約瑟夫十字勳章。

法国部分：

- 一八七八年 荣誉勳位(Legion of Honour)上級爵士勳章。
- 一八八五年 荣誉勳位武官勳章。
- 一九〇七年 越南龙十字勳章。

大不列颠部分：

- 一八七九年 圣迈克尔及圣乔治(St. Michael and St. George)下級爵士勳章。
- 一八八二年 圣迈克尔及圣乔治上級爵士勳章。
- 一八八九年 圣迈克尔及圣乔治十字勳章。
- 一八九三年 联合王国从男爵。

意大利部分：

- 一八八四年 意大利王冠武官勳章。

一九〇六年 意大利王冠十字勳章。

羅馬教皇宮廷部分：

一八八五年 庇護九世(Pius IX)上級爵士勳章。

葡萄牙部分：

一八八八年 基督(Christ)十字勳章。

荷蘭部分：

一八九七年 奧蘭治·那騷(Orange Nassau)十字勳章。

普魯士部分：

一九〇〇年 一等王冠勳章。

日本部分：

一九〇六年 一等旭日勳章。

俄國部分：

一九〇七年 聖安(St. Anne)十字勳章。

挪威部分：

一九〇七年 聖俄拉夫(St. Olaf)十字勳章。

丹麥部分：

一九〇八年 丹尼布羅格(Danebrog)十字勳章。

一八五三年 愛爾蘭王后大學(Queen's University, Ireland)文學士并榮获奖學金高級生。

一八七五年 愛爾蘭王后大學名譽文學碩士。

一八八二年 愛爾蘭王后大學名譽法學博士。

一八八六年 密歇根大學(Michigan University)名譽法學博士。

一九〇八年 牛津大學(Oxford)名譽民法博士。

一九〇八年 都柏林大學(Dublin)名譽法學博士。

一九〇八年 倫敦市自由民。

一九〇八年 伯爾發斯特城(Belfast)自由民。

一九〇八年 湯吞自治邑 (Borough of Taunton) 自由民。

萊比錫 (Leipzig) 人类学博物館发起人。

上海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名誉會員。

維也納 (Vienna) 东方博物館名誉委員。

伦敦英国皇家統計学会名誉會員。

国际公法学院 (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名誉委員。

附 录 (6)

同 文 館 沿 革

第一任總教習丁建良撰

使这一个古老帝国有革新之望的那种新式教育的开端是同文館。有很多支流对这个主流有所貢獻；但是最初的源泉是同文館，这是将近五十年前为了研究外国語文而在北京开办的一所小規模的学校。

当鷺宾·赫德爵士奉派为海关总稅务司的时候，他发现有所学校，但是这个婴儿是如此孱弱，要使它活着，就不得不施行一种人工呼吸法。正确地估計了它的潜能之后，他就把它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并且替它的发展訂下了远大計劃。它在他的照管下是幸运的，因为由于他，它就从一只螢火虫变成一座灯塔。

緣 起

它的誕生是由于有必要去供应翻譯人員以协助进行外交上的來往，这是由于一八六〇年强迫中国开放京城以便外国使节常川居住而强加于中国的。一八五八年簽訂的中英天津条約包含了类似这样的規定。但是，由于中国竭力阻止条約的实施，要說如果沒

有一八六〇年的战争來确定了外国使节有住居京城的权利而不必在必要时才进京訪問的話，这所学校的校址就不会如此靠近皇上，那也不失为妥实之言。

条約第五十款有三句話，其中任何一句虽不明白指出中国有义务去設立一所培养翻譯人員的学校，但也足使它非开办不可。那項条款規定（1）嗣后英国文書俱用英字書写；（2）暂时仍以汉字配送；（3）自今以后遇有文詞辯論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本，此次定約亦照此例。

这个条約是在一八六〇年秋季批准的；但是經過一整年，还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步驟去开办似乎被那些条件所需求的一所学校。这时，咸丰帝已經在自愿流亡中逝世；他的幼子同治已經宣告由两位皇太后摄政而登位；恭亲王要以議政王的名义实际上居于摄政的地位，已經大刀闊斧地一举而告成功。他就是創立称做总理衙門的那个外交部的人。

他是这个衙門的行动首长，为了紀念他，我們應該說，他的真知卓識使得許多进步的措施变为可能：但是这类措施总是由別人建議——不少是由总稅务司赫德先生建議的。这所翻譯人員的学校在这个有势力的衙門的庇蔭下发育滋长，并且有这位亲王做它的主要保护人，是特殊幸运的。

这位亲王和一些大臣們在一八六一年十月的一个奏章中說，“請飭广东上海各督撫等分派通解外国語言文字之人，携带各国書籍來京，广东則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物色相当人員并无結果，所以他們又說，“是以日久未能举办。各国均以重貲聘請中国人講解文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語言文字之人。广东江苏既无咨送來京之人，不得不于外国人中延訪。”（按：原奏章見于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八卷第二十九頁。——譯者）

这不是可耻的么？然而时事的推移却注定了要使中国相信，

不独在語文方面，就是在使一个国家变为强大的任何事情方面，它将不得不接受外国人的教訓。

最初創辦情形

这所学校在最初創辦的时候包括三个班級，英文班、法文班和俄文班，每班有十个学生——这是因为最初的条約就是用那些文字書写的原故。当德国已經变为一个强国，并且用它本国的文字和中国訂了一个条約的时候，在那些班級之外又添設了一个德文班。

由于需要最迫切，英文班在一八六二年六月就开办，法文和俄文班在次年春季开办。就年齿來講，这后者是它們大家的母亲——去今一百年，在理藩院中就設立了一个俄罗斯文館；这表明中国已經开始認識了它的北方邻人的重要性。那个俄文館曾經正式移交給同文館；但是不容易看出究竟移交了些什么东西，因为它既沒有教师，也沒有学生。它的无形资产是某些成案和章程。后者曾經被人随意摹仿，前者則經常被人引述，借以消除反对意見，并且証明这个新办的事业并不是一件創举。說來奇怪，恭亲王和一些大臣們是怎样地小心翼翼，以致于向皇上奏明有关这个新机构的每一种情况——这表明他們至少把它当作一件酝酿着严重后果的国家大事。

学生則限定从旗人（不拘是滿洲，或是汉軍）中挑选。他們生下來就是領取恩俸者，所以这种办法将节省开支；它也可保障統治种族获得可能产生的任何利益或好处。

从这样地强加在它上面的許多限制來看，这所翻譯人員的学校并不构成国民教育計劃的一部分，不是明显的么？逃亡的朝廷（按：指咸丰帝逃亡至热河。——譯者）曾經被胜利的同盟国（按：指第二次鴉片战争时英法联盟。——譯者）允准回京，可是四十年后它又須逃跑而再一次給恢复了政权，致使中国相信有必要去改

变它的教育制度的基础。然而沒有一件事足以更好地表明那个早期运动的重要性，除却从那四个班級里已經培养出許多位派到外国去的公使和一位外交大臣还有其他外交官和領事这一个事实以外。

初期的教習

英文班的第一位教習是包尔騰 (J. S. Burdon)——他后來是香港維多利亞主教。第二人是傅兰雅博士 (Dr. John Fryer)，他以后在江南制造局任翻譯官，目前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汉文教授。繼任的第三人是丁韪良博士，他本來在总理衙門从事翻譯一本万国公法，暂时被邀补充傅兰雅博士的遺缺。

法文班的第一位教習是天主教徒司默灵 (Rev. Smorrenberg)。俄文班的第一位教習是俄国公使館里的翻譯官柏林先生 (Mr. A. Popoff)，他繼續任职五年以上。

發展情形

虽然恭亲王和一些大臣們曾經是胆怯地在开始作这一种嘗試，可是他們很快看出中国要在同外国的交往中不致繼續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就必須向西方国家借鏡。他們眼光敏銳实足惊人，但是他們在維新的道路上只能行走得适可而止；因为他們遭到那些“井底之蛙”的頑固派人物的反对，这些人有足够的力量在每一件进步措施的道路上投下障碍物。在一八六五年曾經作出决定要把这所翻譯人員的学校升做一所学院，添設一个格致館，并且招收精通汉学的学生。新校舍已經造成，总稅务司已經奉到訓令，要去延聘一批适当的教習——这个措施无疑地是由他最先提議的。

这一个举动的范围和动机曾經由恭亲王和他的同僚們在两个奏章里說到。

在第一个奏章里，他們說：“洋人制造机器、火器以及行船行軍无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現在上海、浙江等處講求輪船各項，若不從根本上用著實功夫，即學習皮毛，仍無裨于實用。臣等共同商酌，現擬添設一館，招取滿漢舉人及恩拔歲副優貢，漢文業已通順，年在二十歲以外者。舉凡推算學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鈎河摘洛之方，倘能專精務實，盡得其妙，則中國自強之道在此矣。”（按：原奏見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四十六卷第三至第四頁。——譯者）

在另一個奏章里，他們為他們的建議所受到的責難作了辯護。他們說，“臣等伏查此次招考天文算學之議并非矜奇好異，震于西人術數之學也，蓋以苟不講求機巧之原，制作之本，竊恐師心自用，枉費錢糧。論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舉為不急之務者，必有以舍中法而從西人為非者，甚至有以中國之人師法西人為深可耻者。”（按：原奏見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四十六卷第四十四頁。——譯者）

回答這三種反對的意見時，他們對於最後的一種曾經引述康熙的榜樣作為先例，康熙是傾慕西人之術，并延用西人以充欽天監的監正者。他們又說，“查西洋各國互相師法，制作日新，東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國，學其文字，究其象數。日本蕞爾國耳，尚知發憤為雄，獨中國狃于因循積習，不思振作，耻孰甚焉！”（按：原奏見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四十六卷第四十五及第四十六頁。——譯者）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開明的辯證是在四十多年前寫成的，而且這種拿日本做榜樣的議論自那時以後已經由中國在它的島國鄰人的手下所受到的一頓痛擊予以證明。

那位親王和大臣們接下去又建議說，“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等官學習此項天文算學，程功必易。”（按：原奏見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四十六卷第四十六頁。——譯者）。這項建議遭到翰林院掌院學士，太傅，滿人倭仁的反對而被破壞。可是高級的其他學生却被招收入京，從八旗里選派來的學生人數增加了一倍；學生們從

广州和上海的学堂里选派来入学；总数增至一百名。

在一八六八年夏季，算学班成立，由教习李善兰主持；这是一位能干的人，除掉掌握中国固有的学识以外，由于同伟烈亚力先生 (Mr. Wylie) 合译天文算学的教科书而熟悉了西洋的法术。

这所学校就这样地扩充到一个学院的模样，丁韪良博士被任为总教习，兼任万国公法教习，这个万国公法的讲座是他在两年以前就受任的。他继续担任这双重职务达二十五年。

赫德爵士在一八六六年访问英国期间曾经延聘了一个德国人来担任天文讲座，一个法国人来担任化学讲座。前者证明是一个江湖人物，他把臭名误认为是令誉；他企图不费力而赚钱。后者除引导我们的好多学生对于那一门使中国夸耀的炼金术黯然无光的科学窥见奥密外，还给了中国人以他们从来没有过的，用他们自己的文字写成的第一部化学教科书。毕利干 (Bellequin) 教习是中国的化学祖师，但是在先于毕利干先生的著述而印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的一本书中给了这门科学以它现有的名称的那种荣誉应该属于丁韪良博士。

一八七一年，设立了医学和生理学讲座，由伦敦教会的德贞博士 (Dr. Dudgeon) 担任第一任讲师。

一八七七年，天文学讲座由密歇根大学文学硕士海灵敦 (Harrington) 充任。他因健康关系辞职，由俄国观象台里的费理筋博士 (Dr. Fritsche) 继任；到一八七九年由伯尔发斯特 (Belfast) 皇后学院文学硕士罗骚 (Russell) 继任。

从这同一学院在同一年受聘来教英文的欧礼斐 (Oliver) 先生以后改任物理学教习；在一八九四年丁韪良博士辞职时，他继任为总教习。

在一八七六年有一个拥有七部印刷机和四副铅字的印刷所附设在这个馆里，它代替了武英殿印铸局地位。

在一八八七年，保送學生的名額增至一百三十人。

在外交方面的初次收获

在同文館早期，中國既沒有外交機構，也沒有領事人員。它曾經习惯于接納附屬國派來的使節，可是除掉遣使頒賜榮典或降詔于它的屬國外，它不曾派過任何使臣。

它的統治者在打破一個尊嚴的先例以前猶豫不決，而且要誘導他們破例去做，就需要不少的說服功夫，這是不足為奇的了。同文館的歷史联系着他們在外交上來往的草率開端；並且也联系着現在更為成熟的外交事務。

赫德爵士在打消中國當局的成見或启发他們的愚蒙方面是絕不錯過一次機會的，一八六六年，適逢他請假返國，他就建議為了觀光外國，應該派遣一位官長和他同往，並且要在我們的学生當中选派幾人伴同前去。學生們可以考驗他們的心得，他們的那位官長的報告將會象他們親目所見的那樣。

人選落在斌椿的頭上，他是赫德的漢文教習——一位彬彬有禮，具有詩才的滿洲人。這次遠行的一个收获是用燦爛的詞藻描寫出國外生活和國外旅行景色的一卷詩。學生們好生利用了他們的時間，以致在第二次遣使出洋時他們奉派了充當翻譯官。

那第二次的遠行，同樣是屬於試驗性質的——並且同樣由赫德爵士努力促成的——是一八六九年蒲安臣的出使外洋，由于攜帶國書去訪問世界上的半數國家，這個使節曾被称为周游全球的使節。隨同美國卸任公使蒲安臣先生出使的有一位滿人（按：指志剛。——譯者）和一位漢人（按：指孫家谷。——譯者）充當會辦。附屬在他們之下的有六個學生，名義上是英、法、俄文翻譯官，雖然事實上使團里的事務是由海關派去的人員掌理的。那次出使外洋曾經被稱道為一個新紀元的開始；但是在不幸和失望中結束了。

使团的著名領袖(按:指蒲安臣。——譯者)葬身在俄羅斯的冰天雪地之中;他的同僚回國以後在政治上的情形是——一個埋沒在蒙古的荒野之上,一個埋沒在中原——在這兩個地方,人們想來,他們是不會做出任何危害的事情來的。至於那些學生,他們不得不長期等待,才能獲得相當的擢升。

可是最近他們很受需要。兩位曾經到日本去當公使;一位到英國去當公使;一位到法國去當公使;一位到德國去當公使;並且還有很多人在公使館和領事館,以及在各省官衙內找到工作。

對於促進教育的成效

中國官員對於他們嘗試的結果(儘管在外國人的眼中看來是微不足道)覺得滿意,這可見於一八八五年的一個奏章中,在這奏章中他們追述那種嘗試的經過。他們說:“自開設同文館并向外洋延聘教習,於今二十餘年。該洋教習等不辭辛勞;學生等受其教誨,日見成效,有至外洋使館者,有受任各省官職者;至若派赴沿海各地供職,亦不乏其人,凡此均足視為辦理著效之明証。”(按:原奏章未見,以上係按英文移譯。——譯者)

因此他們替總教習請求三品銜,替教習畢利干和發普羅(Va-pereau)請求四品銜。

當同治帝着手讀英文的時候,他的教習就是在同文館的學生中挑選的;並且當光緒帝決定開辦一所大學堂的時候,無疑地他是鑒於同文館的成績才那樣做的。丁韋良博士提升二品,並受任為大學堂總教習。然後,同文館就解散了,或者說,合併在那所大學堂里。①

茲附錄兩表,一列教習的名號,一列翻譯書籍的名稱,表中所列實無法使之完備。我所存的同文館目錄被義和團燬掉了;我沒有

① 同文館似乎已經恢復舊名而稱做譯學館了,中國的事情常是這樣。

能够获得一本在一八八八年以前的目录。

丁韪良

一九〇七年六月十九日于北京。

外国教習

(包括臨時兼課的海關人員)①

英文教習包尔騰 (Rev. J. S. Burdon)	一八六一年
法文教習司默灵 (Rev. Smorrenberg)	一八六二年
俄文教習柏林 (Mr. A. Popoff)	一八六二年
英文教習傅兰雅 (Mr. John Fryer)	一八六三年
英文教習丁韪良 (Dr. W. A. P. Martin)	一八六四年
化学教習毕利干 (Mr. A. Bellequin)	一八六六年
法文教習雷比秀 (Mr. E. Lepissier)	一八六六年
英文教習俄比賴恩 (Mr. M. J. Q' Brien)	一八六七年
万国公法教習丁韪良	一八六七年
算学教習李善兰	一八六九年
总教習丁韪良	一八六九年
俄文及德文教習韦柏 (Herr C. Waeber)	一八七〇年
法文教習达尔諾克斯及李司特尔許伯 (Messrs. d'Arnoux, Ristelhueber)	一八七〇年
法文教習发普罗 (Mr. G. Vapereau)	一八七〇年
英文教習麦金 (Mr. E. McKean)	一八七二年
俄文及德文教習哈根 (Herr Hagen)	一八七三年
英文教習科尔斯 (Mr. J. P. Cowles)	一八七四年
法文教習比萊 (Mr. A. Th. Piry)	一八七六年

①、录自一八八八年同文館目录——这是現存的最近的一本。在以后十年内的人事变动,并未設法查明。欧礼斐先生在一八九四年任总教習。

法文教习罗邱(Mr. L. Rocher)	一八七六年
天文学教习海灵敦(Mr. Harrington)	一八七七年
天文学教习費理筋(Dr. Fritsche)	一八七七年
英文教习馬士(Mr. H. B. Morse)	一八七八年
英文教习欧礼斐(Mr. C. H. Oliver)	一八七九年
天文学教习罗騷(Mr. S. M. Russell)	一八七九年
俄文及德文教习潘达(Herr Pander)	一八八一年
法文教习射則尔(Mr. Scherzer)	一八八三年
英文教习罕科克(Mr. H. Hancock)	一八八四年
生理学教习布錫尔(Dr. S. W. Bushell)	一八八四年

教習和學生所翻譯或編纂的書籍

万国公法(Wheaton's International Law)	丁韪良譯
格物入門(Natural Philosophy)	丁韪良編
化学指南(Chemistry for Beginners)	毕利干編
法国律例(Code Napoleon)	毕利干譯
星輶指掌(Guide Diplomatique)	联芳, 庚常合譯
万国公法(Woolsey's Int. Law)	汪凤藻, 凤仪合譯
英文文法(English Grammar)	汪凤藻編
政治經济学(Fawcett's Political Economy)	汪凤藻譯
俄国史(History of Russia)	俄文班学生編
世界史綱(Outlines of the World's History)	楊树, 张秀合譯
化学闡原(Advanced Chemistry)	毕利干譯
格物測算(Mathematical Physics)	丁韪良譯
全体通考(Physiology)	德貞編
天文历書, 一八七七年	海灵敦編
天文历書, 一八七八年	費理筋編

天文历書, 一八七九年	罗騒編
公法会通 (Bluntschli's Int. Law)	联芳、庆常合譯
算学課艺 (Mathematical Exercises)	席淦, 桂云 (譯音) 合譯
中国古世公法 (Int. Law in Ancient China)	丁建良編
天文学 (Elements of Astronomy)	罗騒与学生譯
海峡殖民地律例 (Penal Code of Straits Settlements)	汪凤藻譯
法华字典 (Franco-Chinese Dictionary)	毕利干編

这些書大都是由教习和学生会同編譯的。

附 录 (7)

关于日俄战争时期中国中立 問題的备忘录摘要

(为提交海牙国际和平大会, 由
巡工司戴樂爾海軍大佐擬)

史密斯与希尔貝 (Smith and Silby) [日俄战争时期对国际公法的解释] 說, “从中国在这次日俄战争中的行动来看, 它似乎对于几乎为近代中立国家所必須履行的那些义务連一种初步的观念都沒有”; 这种說法将要連同类似的其他說法被法学家們所讀到, 因而不免产生一种对中国的偏見。

但是这种說法是显而易見地不公平的。从战争一开始起, 中国就十分急切地想作出正确的行动, 頒布中立規則就是一个例証, 这些規則如果有什么錯誤的地方, 仅是失之于过严。中国在有些地方設或有疏失之处, 这不足为奇——別的国家也是如此——并且中国对于可能发生过的象这样的錯誤愿意承担一切責任。我們立刻

可以指出，象这样的錯誤却在少数，如果不是从单一而又不甚可靠的一个例子上去看的话。

现在可以便于討論中国作为一个中立国所牵涉到的个别事項了。这些事項如下：

- (1) 在滿洲的战争行动。
- (2) 在战区以外的破坏中立問題。
- (3) 船舶的拘留問題。
- (4) 被拘留人員的管轄問題。
- (5) “滿洲人号”和“亚斯柯德号”两船案。
- (6) 驅逐艦“刚毅号”事件。
- (7) 驅逐艦“拉斯特罗尼号”事件。
- (8) 拘留在芝罘的驅逐艦問題。
- (9) 波罗的海艦队的避难船只問題。
- (10) 违禁品貿易問題。
- (11) 日本对中立責任的干涉。

(1) 在滿洲的战争行动

一切軍事行动都发生在名义上属于中国的領土上这一事实已經被日本人用作借口以指明中国的中立是不完全的，并且就国际公法來講，事态是一种反常現象和矛盾。这样的一种說法是不正确而且不公平的，特别是在它被用来作为一种明目张胆地破坏中立的借口的时候。在这次战争之前，滿洲是存在着某种的情况的。这种情况就是俄国人沒有得到中国的同意而对滿洲作軍事的占領。当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在那个地区并不行使着充分的主权职能。这种情况存在的經過及原因对它的中立責任問題並沒有关系。事实是，当战争爆发的时候，有全然不可克服的障碍阻拦了它在那里充分地保护它的中立。任何法律总不能把一种义务加在

一个不可能去履行它的人的身上。无论如何，中立的破坏是双方造成的，而且象“佛罗里达号”案一样，并无诉苦的余地。

这种情势更由于海約翰先生的照会所促成的那个实际上的协定而变为正常，那个协定规划了名义上属于中国而战事却可能发生的那片领土的区域。

在这些情况下，在中国领土内实行军事行动这个事实无论怎样不足以减损它为完全中立国的地位。

(2) 在战区以外的破坏中立问题

这是更加难以公平讨论的一件事。无疑地，中国的愿望是要严格地去尽一个中立国的责任，这可由它的中立规章和它发布给边疆官吏的命令予以证明。

中立责任的要素是不帮助任何一方。连带的一种责任就是积极地防止中立的破坏。前者是经常可以实行的责任。后者或许是不可能实行的。在这一方面，中国曾尽力而为。再者，在这件事当中，还有别的一种重要因素。中国在这次战争中有两种显然不同的责任——一种是保持它的中立；另一种是避免牵入战争。

这后一种责任不单是对它本身的一种责任，否则倒不能适当地用来作为它全然不履行中立义务的借口了。这是一种国际上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是由全世界强加在它身上，而且加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成为一种国际公法的责任。由于克尽厥责的重要性，这个责任变成了优先的责任，对于它，如果有必要的话，别的一个责任就只得让步。

再次须说明的，中国作为一个中立国的地位不应因此而受到影响。事实上它面对着史无前例的许多困难而须尽其中立的责任，它竭尽智谋并就力之所及而尽了它的责任了。

(3) 船舶的拘留問題

(4) 被拘留人員的管轄問題

只要公有的船只是按照中立國的國內法而避難于中立口岸內，治外法權的原則是適用的，中立國對這些船隻沒有管轄權。但是船隻被拘留後就有另外一種情況存在。拘留是除掉開往公海以外的另一種辦法，這是要看中立國的意願怎樣的，因此就要依從中立國所加的条件。中國認為它有權利去主張被拘留的俄國船員具有和陸上部隊被拘留時同樣的地位。但是這樣就發生了另一問題，按照條約，外國人在中國是享有治外法權的。那麼，從管轄的觀點來看，被拘留的俄國人的地位怎樣呢？中國在這件事方面所持的意見如下：

規定外國人享有治外法權的那些條約是關於正常情況的。中國邊境既然有了戰爭狀況存在，而且它維持中立，責有攸歸，那麼，情況就不復是正常的了。

關於這件事，中國不獨為它本身，而且也是為了國際方面去行動。它變成執行國際法的警察。有了這些屬於主權方面的崇高責任要去盡，顯然它就必須具有相應的崇高主權能力使它能够盡那些責任。如果被拘留的人免于受它管轄的話，它怎能對他們負責任呢？既然要負責，它就不得不處在國際法之下。所以它認為那個優先的義務是要盡的，而且因此就不能讓治外法權去干涉它的中立職能。在最近的拘留案件中，官長和士兵在表面上都服從于“這類案件中所慣有的管束”。

但是中國一面維持這種態度，一面却十分了解它的司法制度是完全不適于應付這個緊急局面的。所以它就在實際上把管束的

权力委交给当地俄国官员去行使而以不损害它因迫于情势而在管轄上采取任何行动的权利为条件。

例如拒绝立誓永不逃跑的士兵就解到一艘中国军舰上作为囚犯而不必征询俄国领事馆的意见。对于这种程序，只要是属于军事预防性质的举动，俄国官员是默然予以同意的，但是关于寻常刑事方面的管轄，他们却要求十足的治外法权。

在那发生过的一个案件中——黄浦滩杀人案（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当时“亚斯柯德号”船上的一个水手在黄浦滩无故杀死一个中国人，俄国官员拒绝中国官员在审判时出庭监督，并且由于那个犯人从不曾落在中国人的手里，所以情势所趋，中国除抗議外很难另有什么举动。

然而中国规定遇有任何别的案件，只要犯人落在他们手里，就应该由一位中国官员在俄国领事法庭开庭时陪审或由俄国领事在一艘中国军舰上开审。中国主张这种权利的机会并不曾有过。

（5）“满洲人号”和“亚斯柯德号”两船案

在耽延了很久之后，这些船才依照中国的命令解除武装，不然就得开往公海。可是只要我们体会到拘留和解除武装是缺乏先例可援的，而且有关方面对于这一个问题大都怀有一般的误会，那么，发生稽延情事也不足为奇了。尽管迟慢，尽管手忙脚乱，中国对于这些船却完全尽了它的中立义务。这些俄国船在某一个时候实际上是被拘留的船只，不过拥有桀骜不驯的船员罢了。这些船员破坏中国的中立是就纪律的意义而言。在另一方面，日本军舰因此而开到吴淞来，却构成一种显明的对中国中立的破坏行为。

关于此事，中国对日俄双方都可以表示不满，但日本和俄国却没有一方可以对它申诉。

(6) 驅逐艦“剛毅号”事件

在一九〇四年八月十一那天，当薩提督所率領的一队三艘中国巡洋艦泊在芝罘港时，俄国驅逐艦“剛毅号”开到，当天遵从命令被拘留。

在傍晚的时候，这艘軍艦解除武装的情形是，所有枪炮的尾栓，所有魚雷的弹头，以及一部引擎的偏心輪都被拆卸，另一部引擎是已經完全毀坏了的。俄国官兵仍然留在船上，但是有一艘看守船由一位中国軍官率領着，守候在旁边。俄国管带已經为他自己和艦上的士兵立了誓，不再作战。

在傍晚以前，有两艘日本驅逐艦开进港口，偵察了一番就离去。晚間，这两艘軍艦(或是别的軍艦)又駛回，在中国艦队和“剛毅号”左近拋錨停泊。一位中国軍官登上日本驅逐艦解释說，“剛毅号”已經向薩提督投降而被拘留，并且已經解除武装。薩提督又亲自訪問日本軍官，并且告訴他們說，“剛毅号”这时已在中国的保护之下。日本司令官回答說，他不久将离去，或許就在当晚。

在清晨三点鐘，一位日本軍官登上“剛毅号”，提出要求，叫它駛到外海作战，不然就向他投降。俄国艦长回答說，他已經解除武装，不能作战，而且他已經立过誓，不再参加战争，并且他現在已經在中国的保护之下。

中国看守船上的軍官登艦証实了这句话，然后觉察到日人已經占有了这艘軍艦，就回到他的主艦“海容号”，請求援助。“海容号”的一位高級軍官立刻乘着汽艇赶来，但是在他赶到以前，又有两艘日艦已經駛靠“剛毅号”旁边，射击和肉搏战正在进行，一艘日本驅逐艦已經拖着“剛毅号”在行駛。另外的一艘驅逐艦駛近中国旗艦“海圻号”，在后者发出信号以后就停輪，允許通报消

息。薩提督当即派遣一位軍官規劝日人不应在中国海面擄去一艘在他保护之下的船，尤其是在他們先前作了保証以后。日本司令官回答說，他将設法把那只船带回，于是就离去。

在这个事件中，死亡的人数不明。日人尸体一具，未經受伤，还有子弹洞穿了心脏的俄人尸体一具曾經被覓获。

关于中国海軍在这次事件中的行动，或者說是缺乏行动，事实似乎是十分明显。

这次将船擄去是純粹的袭击。考虑到曾經作出的解释，以及日本軍官所給的保証，考虑到俄艦还没有在它无论如何都有权利利用的一个中立口岸內避难滿二十四小时这一个事实，薩提督不可能想到如此明目张胆的一次暴行竟然早在筹划中。

那位中国的看守軍官應該留在他的崗位之上，而且應該不惜任何牺牲去抵抗那次擄劫，但是只要袭击已經成功，在薩提督方面是沒有任何行动足以挽救这局面的。

向日艦开火而以阻止那次擄劫为目的，为时已經太迟。向另外一艘驅逐艦开火，除作为一种报复的措施外，不可能有其他目的。不但要考虑到直接的結果，也要考虑到这样一个步驟的最后結果，是薩提督的責任。他达到一个結論，不去采取报复的措施而讓这事由外交方法來解决，是顧到一切情形而应付得宜的。

然而这是中国十分明显地对俄国負了責的一个案件。但是日本对中国負了什么責任呢？

日本在答复中国的历次抗議時曾竭尽詭辯之能事。它开头就爭辯說，中国的中立是不完全的，并且只能适用于不为交战国任何一方的武装部队所占領的那些地区。这种說法会使中国的中立变为完全无效，并且会使日本有权去攫夺上海港口內的俄国船只。

它又說俄国不能借移动它的船只到中国的經過协商作为有条件的中立地区而逃避战敗的后果。芝罘是怎样地，又在什么时候，

变为有条件的中立地区却没有说明，而且“有条件”字样在那句话里作何解释也没有说明。

说到芝罘的中立应该随着那个事件的结束而恢复，这是非常天真的一句话，它显然指明一个事实，即这地在先前是中立的。

提到上海的俄舰，这是完全离开本题的。中国有责任对这些船只保守中立，并且它曾经尽了它的责任，至于经过多少困难却与本案无关。

有人说，“刚毅号”案和“佛罗里达号”案显有不同，我们十分同意，因为前者的被掳走是一个更加明目张胆的举动，这只船在当时是处于中国旗舰的保护下并且真实地解除了武装的。

又有人把本案和“阿姆斯特隆将军号”案相提并论，可是那艘船曾经向英国军舰开火，而“刚毅号”则在被占有以前未曾施用武力，在以后亦不过施用手臂的力量而已。

中国对于这次破坏它的中立的行为仍然极端反对。鉴于日本政府对于这次事件的态度，中国认为本案是一件应该提交海牙国际法庭的案件。

(7) 驱逐舰“拉斯特罗尼号”事件

在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早晨，中国巡洋舰“海筹号”泊在芝罘港的时候，俄国驱逐舰“拉斯特罗尼号”开到，当天它愿意投降而受拘留的消息由俄国领事馆通知了中国官员。但是在中国军官登舰执管以前，舰上的官兵已经离舰而去，不久以后它自行炸沉于港口之内。它的军官与士兵携带全副武装登了陆。经过几次恳切劝说之后，他们才愿受拘留，同日被遣送到“海筹号”舰上。

关于此事，美国总领事是日俄两领事馆交往中的居间人，他传达了一个信息给后者说，除非把“拉斯特罗尼号”舰上的官兵立刻遣送到“海筹号”舰上，日军将登陆占领俄国领事馆。

俄国司令官把他的船炸沉在一个狭小的停泊地段，以致危及通航这一个举动无疑地是很不适当的。这个举动的目的是十分明显。他不愿讓他的船只蹈“刚毅号”的复轍。但是这样的一个理由不能构成他的行动的有效借口，若要使中国对他的船只的丧失負其責任，那是更不可能的。

要說他有一些理由，据以怀疑中国給他保护的能力，这是可以承認的；但是在这方面采取合理的防范与做他确实做出的事这二者之間，距离很大。

(8) 拘留在芝罘的驅逐艦問題

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二日早晨，有四艘俄国驅逐艦和一艘汽艇駛入芝罘港，当天上午，它們情愿投降而受拘留的消息被通知了中国官員。因为港內沒有中国軍艦，中国官員就請求海关稅务司对于这些艦艇的解除武装和拆卸事宜采取必要的步驟。因此，这些工作在相当的困难之下由一位英国籍的稅务司监督着进行。

当天午后有几艘日本驅逐艦駛來，停泊在俄艦左近，它們的意图是要在俄艦的解除武装和拆卸工作做得不彻底和不迅速的情形下把它們劫走。

为了要使“刚毅号”事件的重演的危險减少到最小程度，俄国驅逐艦上的官兵被迁移到岸上來居住，船只由中国官員完全掌管。

(9) 波羅的海艦隊的避難船只問題

这些船只曾經有一个时候对拘留作消极的抵抗，这时它們处在被日人劫走的迫在眉睫的危險之中，因为日人有一支艦队在馬鞍島准备着。

如果日人劫走了那些船的話，中国会提出抗議，但是不会抵

抗。

中国对日本将会示表不满，而俄国对中国却不会。

在那些船只服从拘留之后，在吴淞被劫走的危险并没有完全消灭，但是这时中国已经准备不惜任何牺牲来保卫它们，并且作好布置了。

(10) 違禁品貿易問題

.....

(11) 日本對中立責任的干涉

俄国和日本都试图利用在想象中的中国在中立事项方面的软弱。俄人主要地是对中立规章作消极抵抗，日本则侵犯了芝罘的中立，但主要地是企图对中国的中立责任在有关它自己的一方面发出强迫命令。

日本有权对于有关中立的事项表示意见，并对中立国的贸易进行侦察(在相当限度内)，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企图在措施方面过细地发出强迫命令，这是错误的，并且可能危害中国的中立地位。此处只须说明由于日本的表示，中国除掉它自己认为必要的行动以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还有必须予以否定的观念就是日本作为一个交战国就有权干涉中国的中立责任方面的细节。

关于此事，中国的态度如下：中国在尽中立责任方面是作为执行国际公法的警察而行事的。它将倾听任何一方表示的意见，但是它拒绝讨论它的责任，或拒绝对它施展的压力。使国际公法生效的责任就落在它的肩上。设若它犯了一种错误，可以经过适当手续获得补救。它不进行讨论，它作出行动来，并且对它的行动承担责任。

附 录 (8)

一五一七——一九一一年間各國派至 北京政府之外交代表名單

葡 萄 牙

特 使

- 一五一七年 比勒斯(Thomé Pires, 1523年在北京逝世)。
一六六七年 薩尔当亥(Emanuel de Sáldanha)。
一七二六年 麦德乐(Alexandre Metello de Souza e Menezes)。
一七五二年 札維尔(Francisco Xavier Pacheco Sampaio)。
一八六二年 基瑪良士(Izidorio Francisco Guimarães, 以后封格兰德子爵 Visconde de Praia Grande)。
一八六四年 啞嗎嘸(José Rodrigues Coelho d'Amaral)。
一八八七年 罗紗(Thomaz de Souza Roza)。

特命全权公使

- 一八六二年 基瑪良士。
一八六四年 啞嗎嘸(兼澳門总管)。
一八六七年 庞特(José Maria Ponte e Horta, 兼澳門总管)。
一八六九年 苏喳(Antonio Sergio de Souza, 兼澳門总管)。
一八七二年 眞諾里窩(Visconde de S. Januário, 兼澳門总管)。

- 一八七五年 嗎喇亞 (José Maria Lobo d' Avila, 兼澳門總管)。
- 一八七七年 高里亞 (Carlos Eugenio Corrêa da Silva, 兼澳門總管)。
- 一八八〇年 格拉沙 (Joaquin José da Graça, 兼澳門總管)。
- 一八八三及一八八七年 羅紗 (一八八三——一八八六年兼澳門總管)。
- 一八八六年 哥士他 (Firmino José da Costa, 兼澳門總管)。
- 一八八九年 太克齊拉 (Francisco Teixeira da Silva, 兼澳門總管)。
- 一八九一年 馬加爾 (Custodio Miguel da Borja, 兼澳門總管)。
- 一八九四及一九〇〇年 賀爾太 (José M^o de Souza Horta e Costa, 兼澳門總管)。
- 一八九七年 加爾哈端 (Eduardo Rodrigues Galhardo, 兼澳門總管)。
- 一九〇二年 白朗谷 (José Azevedo Castello Branco)。
- 一九〇八年 柏羅德 (Barão de Sendal)。

荷 蘭

特 使

- 一六五五年 { 哥頁 (Peter Goyer)。
开澤 (Jacob Keyser)。
- 一七九四年 鉄俊甫 (Titsing)。

一八六三年 攀大何文(J. des Amorie van der Hoeven)。

駐京公使

一八七二——一八九五年 費果蓀(Jan Helenus Ferguson)。

一八九五——一九〇一年 克羅伯(F. M. Knobel)。

一九〇三——一九〇八年 希特斯 (Jonkheer Adolf Jacobus van Citters)。

一九〇九年—— 貝拉斯(Jonkheer Frans Beelaerts van Blokland)。

俄羅斯

特使

一六七五年 尼果賽(Nicolaus Spafari)。

一六八九年 葛洛文(Feodor Alexievitch Golovin)。

一七一六年 蘭基(Lange)。

一七二七年 務拉的思拉維赤伯爵(或稱薩瓦, Count Sawa Wladislavitch)。

一七六八年 克洛朴托夫(Kropotow)。

一八五一年 科凡勒夫斯基(Kovalevsky)。

一八五八年 木哩斐岳福(Nicolaus Muraviev)。

特命全權公使

一八五八年 普提雅廷(或稱布恬廷, Count Euphimijs Putiatin)。

一八五九——一八六〇年 伊格那提業福 (General Count N. Ignatieff)。

一八六——一八六三年 把留捷克(General L. de Balluseck)。

- 一八六三——一八七三年 倭良嘎哩 (General A. Vlangaly)。
- 一八七四——一八七八年 布策 (Eugène de Butzow)。
- 一八八三——一八八六年 博伯傅 (S. Popoff)。
- 一八八六——一八九一年 庫滿 (Alexis Coumany)。
- 一八九一——一八九七年 喀希尼 (Count A. P. Cassini)。
- 一八九七——一九〇一年 格尔思 (M. N. de Giers)。
- 一九〇一——一九〇五年 雷薩尔 (P. M. Lessar)。
- 一九〇五——一九〇八年 璞科第 (D. D. Pokotiloff)。
- 一九〇八——一九一二年 廓索維慈 (I. J. Korostovetz)。

大不列顛

特使

一七九二——一七九四年 { 特命全权大使：馬戛尔尼勳爵 (The Earl of Macartney)。
使团秘書，大使缺席时任全权公使：乔治·李·斯当东爵士 (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

一八一六年 { 特命大使，全权公使，使团首席：阿美士德勳爵 (Lord Amherst)。
使团二席：乔治·湯·斯当东爵士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使团三席：艾礼士爵士 (Sir Henry Ellis)。

訂約专使

一九〇二年 馬凱爵士 (Sir James Lyle Mackay)。

大 使

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 額爾金伯爵 (James Bruce, Earl of Elgin and Kincaidine)。
及一八六〇年

特命全權公使

一八四一——一八四四年 璞鼎查爵士 (Sir Henry Pottinger, 兼香港總督)。

一八四四——一八四八年 德庇時爵士 (Sir John F. Davis, 兼香港總督)。

一八四八——一八五一年 文翰爵士 (Sir George Bonham, 兼香港總督)。

一八五三——一八五八年 包伶爵士 (Sir John Bowring, 兼香港總督)。

一八五八——一八六五年 卜魯士爵士 (Sir Frederick Bruce)。

一八六五——一八七一年 阿禮國爵士 (Sir Rutherford Alcock)。

一八七——一八八二年 威妥瑪爵士 (Sir Thomas F. Wade)。

一八八三——一八八五年 巴夏禮爵士 (Sir Harry S. Parkes, 死于北京)。

一八八五年 赫德爵士 (Sir Robert Hart)。

一八八五——一八九二年 華爾身爵士 (Sir J. Walsham)。

一八九二——一八九五年 歐格訥 (Nicholas R. O'Connor)。

一八九六——一九〇〇年 寶納樂爵士 (Sir Claude M. MacDonald)。

一九〇〇——一九〇六年 薩道義爵士 (Sir Ernest M. Satow)。

一九〇六——

朱遜典爵士 (Sir John N. Jordan)。

北美合衆国

全权专使

- 一八四三——一八四四年 顧盛(Caleb Cushing)。
一八四五——一八四七年 义华业(Alexander H. Everett)。
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 毕德尔 (Commodore Biddle)。
一八四八——一八五〇年 戴維斯(John U. Davis)。
一八五二——一八五四年 馬沙利(Humphrey Marshall)。
一八五三——一八五四年 麦蓮(Robert M. McLane)。
一八五五——一八五七年 巴鴛(Peter Parker)。
一八八〇年 { 安吉立(James B. Angell)。
帅腓德(John F. Swift)。
笛克脫(William H. Trescot)。
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年 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

特命全权公使

- 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 列卫廉(William B. Reed)。
一八五九——一八六〇年 华若翰(John E. Ward)。
一八六一——一八六七年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 劳文罗斯(J. Ross Browne)。
一八六九——一八七三年 鏤斐迪(Frederick F. Low)。
一八七四——一八七五年 艾竹敏(Benjamin P. Avery; 死于北京)。
一八七六——一八八〇年 西华(George F. Seward)。
一八八〇——一八八二年 安吉立。
一八八二——一八八五年 楊約翰(John Russell Young)。

一八八五——一八九八年 田貝(Charles Denby)。
 一八九八——一九〇五年 康格(Edwin H. Conger)。
 一九〇五——一九〇九年 柔克义。
 一九一〇—— 喀尔霍(W. J. Calhoun)。

法 蘭 西

大 使

一八四四——一八四六年 拉蓴尼(M. de Lagrené)。
 一八五七——一八六〇年 葛历劳士(Baron Gros)。

特命全权公使

一八四七——一八五〇年 福斯罗昂(M. de Forth-Rouen)。
 一八五一——一八五七年 } 布尔布隆(M. de Bourboulon)。
 一八六〇——一八六二年 }
 一八六三——一八六五年 柏尔德密(M. Berthemy)。
 一八六六——一八六八年 兰盟(M. de Lallemant)。
 一八七二——一八七四年 热福理(M. de Geofroy)。
 一八七六——一八七九年 白罗呢 (M. Brenier de Montmorand)。
 一八八〇——一八八三年 宝海(M. Bourée)。
 一八八三——一八八四年 德里固(M. Tricou)。
 一八八四——一八八五年 巴特纳 (M. Patenôtre)。
 一八八五——一八八六年 戈可当(M. G. Cogordan)。
 一八八六——一八八七年 恭思当(M. Constans)。
 一八八七——一八九三年 李梅(M. Lemaire)。
 一八九三——一八九七年 施阿兰(M. Gérard)。
 一八九七——一九〇〇年 毕盛(M. Pichon)。
 一九〇一——一九〇二年 鲍渥(M. Paul Beau)。

- 一九〇二——一九〇五年 呂班(M. Dubail)。
 一九〇五——一九〇九年 巴思德(M. Bapst)。
 一九〇九——一九一二年 潘蓀納 (M. Jacquin de Margerie)。

比 利 時

特 使

- 一八四五年 兰哪(Lannoy)。
 一八六二年 包礼士(L. Bols)。
 一八六五年 金德俄固斯德 (Auguste T'Kint de Roodenbeke)。

特命全权公使

- 一八六五——一八七一年 金德俄固斯德。
 一八八八——一八九五年 謝惠施 (Leon Verhaege de Naeyer)。
 一八九六——一八九九年 費葛 (Baron Carl de Vinck de Deux Orp)。
 一九〇六——一九〇九年 葛飞业 (Baron A. Grenier)。
 一九一〇—— 柯霓雅 (E. de Cartier de Marchienne)。

瑞 典 与 挪 威

特 使

安諾斯特德上校 (Captain Annerstedt)。

特命全权公使

- 一八四七年 窩疏男李利华 (Carl Frederik Liljevalch)。

德 意 志

特命全权公使

- 一八六二年 艾林波 (Graf zu Eulenburg)。
一八六四——一八七三年 列斐士 (M. von Rehfues)。
一八七五——一八九三年 巴兰德 (M. von Brandt)。
一八九三——一八九六年 紳珂 (Freiherr Schenk zu Schweinsberg)。
一八九六——一八九九年 海靖 (Herr von Heyking)。
一八九九——一九〇〇年 克林德 (Freiherr von Ketteler, 在北京遇害)。
一九〇〇——一九〇六年 穆默 (Freiherr Mumm von Schwarzenstein)。
一九〇六——一九一一年 雷克司 (Graf von Rex)。
一九一一—— 哈克司紹紳 (Herr von Haxthausen)。

丹 麥

特 使

- 一八六三年 拉斯勒福 (Waldemar Rudolph von Raaslöf)。

西 班 牙

特命全权公使

- 一八六四年 }
一八六八——一八七〇年 } 瑪斯 (Don Sinibaldo de Mas)。
一八六七年 克維度 (Heriberto Garcia de

一八六八年	Quevedo)。
一八六九——一八七一年	罗淑亚(Tiburcio Faraldo)。
一八七二年	巴周德(Don Adolfo Paxot)。
一八七六——一八八〇年	自来辣(Juan M. Pereyra)。
一八八二年	伊巴里(Don Carlos Antonio de España, 死于北京)。
一八八六——一八八九年	} 罗德里(Don Tiburcio Rodriguez y Muñoz)。
一八八四——一八八五年	
一八九二——一八九四年	薩时鐸(Don Leopoldo de Alba Salcedo)。
一八九五——一九〇二年	德拉拔(Don José Delavat)。
一九〇二——一九一〇年	葛罗干(J. B. de Cologan)。
一九一〇——	賈思理(Don Manuel de Carcer)。
	巴斯德(Don Luis Pastor y de Mora)。

意大利

特使

一八六六年	阿尔明雍(Captain Vittorio Arminjon)。
-------	----------------------------------

特命全权公使

一八七一年	費三多(Count Fe d'Ostiani)。
一八八〇——一八八九年	卢嘎(Ferdinando de Luca, 后更名为卢嘉德, 已故)。
一八八九——一八九三年	潘薩(Alberto Pansa)。
一八九四——一八九八年	巴尔迪(Alessandro Bardi)。

- 一八九八——一八九九年 馬迪訥 (Renato de Martino)。
- 一八九九——一九〇一年 薩尔瓦 (Marquis Giuseppe Salvago-Raggi)。
- 一九〇二——一九〇四年 嘎厘訥 (Count Giovanni Galina)。
- 一九〇四——一九〇七年 巴乐里 (Carlo Baroli)。
- 一九〇七——一九一〇年 文吉 (Count Giulio Cesare Vinci)。
- 一九一〇——一九一一年 巴里来里 (Federico Barilarî)。
- 一九一一—— 斯弗尔扎 (Count Carlo Sforza)。

奥地利与匈牙利

特命全权公使

- 一八六九年 毕慈 (von Petz)。

常驻公使兼总领事

- 一八七一——一八七四年 嘉理治 (Heinrich Freiherr von Calice)。
- 一八七四——一八七七年 史福礼 (Ignaz Freiherr von Schäffer)。
- 一八七九——一八八三年 何福尔 (Ritter Max Hoffer von Hoffenfels)。
- 一八八三——一八八八年 薩魯斯齐 (Karl Graf Zalusky)。
- 一八八八——一八九三年 毕格里本 (Rüdiger Freiherr von Biegeleben)。
- 一八九五——一八九六年 比田布祿古 (Christoph Graf Wydenbruck)。

特命全权公使

- 一八九六——一九〇五年 齐干(Moritz Freiherr von Czikkann)。
一九〇五——一九一一年 顧觀斯基(Eugen Ritter von Kuczynski)。
一九一—— 卢紹因(Arthur von Rosthorn)。

日 本

特 使

- 一八七三年 副島仲臣(外务权大臣)。

特命全权公使

- 一八七一年 藤原宗臣。
一八七四年 大久保。
一八七四年 柳原前光。
一八七五——一八七八年 森有礼換。
一八七九——一八八一年 宾戶机。
一八八二——一八八五年 榎布武揚。
一八八五年 伊藤博文。
一八八六——一八八九年 盐田三郎。
一八八九——一八九五年 大島圭介。
一八九五——一八九六年 林董。
一八九七——一八九九年 矢野文雄。
一八九九——一九〇〇年 西德二郎。
一九〇一年 小村寿太郎。
一九〇一——一九〇六年 内田康哉。
一九〇六——一九〇八年 林权助。

秘 魯

特命全权公使

一八七四年 葛尔西耶 (Captain Don Aurelio Garcia y Garcia)。

一八七五年 爱勒謨 (J. F. Elmore)。

一八八二年 喀拉多 (Eduardo Callado)。

巴 西

特 使

一八八〇年 { 喀拉多 (特命全权公使)。
薛尔菲拉 (Admiral Silveira da Mota, 全权)。